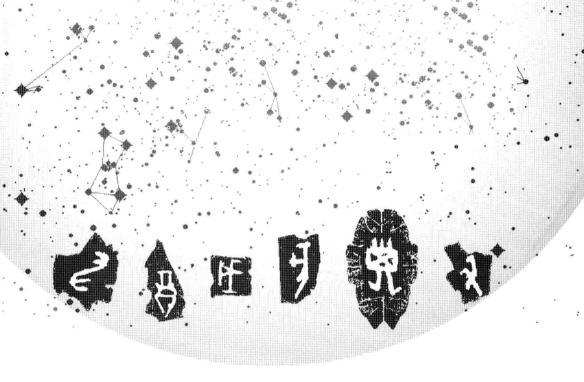


汉字的天文学起源与广义先商文明

一殷墟卜辞所见干支二十二字考

陆星原・著





汉字的天文学起源 与广义先商文明

——殷墟卜辞所见干支二十二字考

陆星原・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的天文学起源与广义先商文明——殷墟卜辞所见干支二十二字考/陆星原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ISBN 978 - 7 - 80745 - 877 - 7

I. ①汉··· Ⅱ. ①陆··· Ⅲ. ①干支-考证 ②汉字-字源-研究 Ⅳ. ①P194. 3 ②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0636 号

汉字的天文学起源与广义先商文明——殷墟卜辞所见干支二十二字考

作 者: 陆星原

特约编辑: 夏宁

责任编辑:徐 侗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6.25

插 页:2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45 - 877 - 7/P • 000

定价: 49.80元

自 序

2009年7月22日,由于阴雨天气,号称几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奇景并未如期展现在上海市民的眼前。显然,这对于任何一位准备到位的天文爱好者来说都绝对是个坏消息,但是,这对于我这个并无准备的另类天文爱好者来说却绝对是个好消息。因为,当上海城在日食黑影和倾盆大雨的夹击下早已伸手不见五指之时,当我无聊地点亮灯光去随手翻看一本启蒙级的星图之时,我无意中竟然"穿越时空",首次目睹了四五千年前中国赤道十二星座的原貌。

网逢困敦、旃蒙赤奋若、柔兆摄提格、强圉单阕……这些既载于《尔雅》又实用于《史记》的拗口纪年术语究竟是哪里来的?甲子、乙丑、丙寅、丁卯……这些支撑着殷墟甲骨文之半壁江山的天文历法术语究竟又是哪里来的?本来,假如不是这次无聊,假如不是这本启蒙级的星图,我对郭沫若先生等前辈的观点无疑是基本认同的:这些拗口的术语也许真的都是舶来品,虽然其源头未必一定是古巴比伦。而事实上,就在这次日全食前的几个月,我也是这样回答一位好友的:当时他刚收藏了一幅晚清的扇面,问我这上面题写的年款"雄在元默雌在执徐"是什么意思,我的回答是,壬辰年,1892年,岁雄岁雌名"元默执徐"的含义不明(当然"壬辰"的含义同样不明),据说是外来语,所以旧文人可以用它们来点缀辞章以增加玄奥神秘之感。

但是,此刻,当我面对着久违的启蒙级星图,一切的疑问都不复存在了,因为3300年前的子、丑、寅、卯等十二个甲骨文已经化成了4000多年前更古老的十二个"恒星汉字"展现在了我的眼前,而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阙等十二个中国星座的古汉语别名其含义也已经不言而自明:假如不是因为它们太古老了,古老到竟然有了两次的"岁差"乾坤大挪移,那它们的小秘密肯定早就被无数抬眼望星空或低头看星图的有心人发现了……

总之,以星空为证,以考古发现为证,我相信,任何看完本书的读者都会与我有同感:中国汉字是最伟大的,中国文明是最伟大的,她和几乎同时诞生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一样,都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母体。当然,作为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幸运儿,我之所以能率先目睹到我们祖先写在星空上的"天书",并因此解读出了15座龙山城址和前龙山城址的古老历史,这完全要感谢近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家们的努力以及近百年来古文字学家们的努力。鉴于本书之内容涉及多学科多专业而本人能力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我希望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和热心读者能给予帮助和指正,并从此展开更广泛深入的研究,以便让这门用"干支密码"研究中国文明和中国汉字的新学科能够正式成形。毕竟,假如"埃及学"和"亚述学"这些研究已消亡文明和死文字的学问都能算作显学的话,那我们的"广义中国学"和"干支汉字学"无疑更有资格成为世界的显学,因为中国文明至今犹存,而且必将永存。

陆星原 2010年12月24日于上海

CONTENTS

第一篇 世界最早的星期制度——中国十干纪日考 / 1

- 一、破译干支密码的中国版"罗塞塔碑"/2
- 二、殷商及先商时代中国人的宇宙论模型 / 5
- 三、释十干、十月阳、十岁阳 / 9
- 四、十干纪日制度与中国的有机宇宙论 / 16

第二篇 世界最早的十二星座天文坐标系——中国十二支纪月考 / 19

- 一、考古证据所见世界最早的周天十二星座 / 19
- 二、中国天文学与近东暨西方天文学的本质差别 / 23
- 三、释十二支、十二月名、十二岁阴、十二岁名、十二星次 / 32
- 四、战国楚帛书所见十二月神像考 / 59

第三篇 甲骨文中最早的史实人物——殷墟卜辞所见上甲微之前先商王名干 支考 / 71

- 一、根据《离骚》还原的中国干支取名制度 / 72
- 二、上甲微之前的先商世系考 / 76
- 三、狭义先商史的年代学框架 / 92
- 四、用干支密码复原的狭义先商史 / 97

第四篇 中国最早的史实人物——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所见广义先商诸王朝 王名干支考 / 109

一、"人名干支密码表"与广义先商年代学的重建 / 112

- 二、"穴熊(子)=鬻熊(子)"与先楚世系考 / 114
- 三、"弃(丑)=叔均赤(丑)"与先周世系考 / 122
- 四、"女憍(丙)=女志(丙)"与夏后氏世系考 / 126
- 五、"后羿(午)=伯翳(午)"与有穷氏世系考 / 136
- 六、"虞幕(巳)=有吳迥(巳)"与有虞氏世系考 / 146
- 七、"陬訾氏(子)=恆儀(子)"与少皞氏世系考 / 174

第五篇 中国最早的城邦守护神——文献暨甲金文所见十二古国与龙山文化 十二城址考 / 195

- 一、临淄桐林龙山文化城址群与五鸠氏考 / 199
- 二、平顶山蒲城店龙山文化城址群与有仍氏考 / 210
- 三、濮阳戚城龙山文化城址与豕韋氏考 / 219
- 四、滕州庄西里龙山文化城址群与有穷氏考 / 228
- 五、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与炎帝氏考 / 237
- 六、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与五觀氏考 / 251
- 七、阳谷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群与有扈氏考 / 264
- 八、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群与有易氏考 / 272
- 九、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址与共工氏考 / 282
- 十、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与三鬷氏考 / 292
- 十一、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群与有城氏考 / 304
- 十二、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群与有崇氏考 / 318
- 十三、龙山文化城址群印证下的中国守护神文化 / 330

第六篇 最早的中国——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牌饰所见十二星座图与大汶口文 化城址考 / 337

- 一、中国文明的海洋摇篮 / 337
- 二、五莲丹土大汶口文化城址考 / 346
- 三、良渚文化遗址群考 / 354
- 四、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牌饰所见十二星座图考 / 361

第七篇 人类唯一的思维型文字体系——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与汉字干支密 码起源考 / 373

- 一、人类的四种独立起源文字之对比 / 374
- 二、大汶口陶文和良渚玉文的释读 / 375
- 三、陶寺朱书陶文的释读 / 386
- 四、汉字的载体: 从契刻到朱书 / 390
- 五、汉字的族属:从九黎族的"十二支"到华夏族的"十干"/394
- 六、汉字的密码:从隐性干支到显性干支 / 399
- 七、汉字干支密码的终结者: 八卦和五行 / 404
- 八、思维型文字与语言型文字 / 410

第一篇 世界最早的星期制度 ——中国十千纪日考

今天,全地球的人类都工作生活在由巴比伦人和犹太人原创而由西方人全盘继承的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日星期制度之下(表 1-1)。不难想象,假如没有这种虽然古老简单却也十分行之有效的"数字化"时间周期分配制度,整个人类的工商业社会和城市文明就会彻底瘫痪,无论是企业的生产计划、商场的促销计划、银行的结算系统,还是城市政府的管理程序都将乱套停摆。

表 1-1 七曜日星期制度与占星学七大行星暨七大星神 (始于西元前 7—前 6 世纪)

星期	星期纪日名	行星天体	巴比伦神祇	希腊/罗马神祇
星期日	日曜日 Sunday	∃ Sun	Shamash	Helios/Sol
星期一	月曜日 Monday	月 Moon	Sin	Selene/Luna
星期二	火曜日 Tuesday	火星 Mars	Nergal	Ares/Mars
星期三	水曜日 Wednesday	水星 Mercury	Nabu	Hermes/Mercurius
星期四	木曜日 Thursday	木星 Jupiter	Marduk	Zeus/Juppiter
星期五	金曜日 Friday	金星 Venus	Ishtar	Aphrodite/Venus
星期六	土曜日 Saturday	土星 Saturn	Ninurta	Kronos/Saturnus

然而,考古和文献证据却早已显示,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且最长期连续使用

星期制度的却并非是巴比伦人和西方人,而是我们中国人。相比西元①前 7—前 6世纪才最终诞生于近东地区的七曜日星期制度,至少在西元前 14世纪,殷商王朝的中国人就已经在中国式的"星期"制度——十日周期循环的"日旬"制度下生活很长时间了,并且作为官方或民间的作息制度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时期;而作为中国人风俗用历和物候用历的"夏历"之基本组成部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干"日名的日常循环更是一直沿用至今而从未中断。②

一、破译干支密码的中国版"罗塞塔碑"

不过,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的这种十元制星期历太古老了,它难免也会遭遇到一切古老的文化遗产都会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其起源和出处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被人遗忘了。自1900余年前《说文解字》以当时最时髦的"五行谶纬"理论诠释商代的"十干"以来,自20世纪的学者们用西方式的"象形文字"理论诠释中国的"十干"以来,在众说纷纭的各种版本释"十干"假说中,至今我们也没有听到过一种真正是出于先秦时代的、真正是出于中国占星历法专业方面的原汁原味之解释。而被遗忘紧跟着必然是被怀疑,这些连中国人自己也读不懂的"甲乙丙丁"们真的是中国人发明的吗?它们会不会也和当代中国人日常习用的七曜日星期作息制度一样,是来自某个遥远的地方,比如古埃及③、古巴比伦?

那么,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十干纪日"其文字学本义和历法起源究竟应该如何诠释?显然,这与埃及最古老的"象形文字"究竟应该如何诠释一样,首 先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的理论水平而是取决于考古实证。而幸运的是,尽管殷

① 本书采用国际学术界的通行惯例,凡在"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1582年10月15日(合"儒略历"1582年10月5日)之前的纪年和日期,一律是指"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和"外推儒略历"(Proleptic Julian calendar)的纪年和日期,标示为"西元"。

② 例如,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完整的六十干支表。参见《甲骨文合集・37986》。

③ 按,尽管古埃及的所谓"旬星"(Dekanoi)周期其实并不是独立于天文年月之外的真正星期制度,其每月的第一天永远是"星期一",第十天永远是"星期十",其纪日术语也与甲乙丙丁没有任何关联,但貌似十日一循环的雷同表象仍然让人有了猜疑和想象的空间。当然,事实证明,古埃及人的"旬星"制度不仅与中国的"日旬"制度基本概念绝不相同、绝无"血缘关系",而且其最早诞生的年代(约西元前 21 一前 20 世纪)也并不比中国的十干纪日更早。关于中国十干纪日的最早诞生年代之考古证据,参见本书第七篇。

城甲骨卜辞由于其用途所限并非字典而没能告诉我们"十干纪日"的原始含义,但随着 20 世纪 40 年代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①的出土,我们亟需的考古实证性"干支密码字典"其实早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众所周知,当年,"死亡"已达 2 000 年之久的古埃及文字其含义最终是依靠著名的"罗塞塔碑"(Rosetta Stone)才释读成功的,因为该石碑上铭刻有圣书体埃及文、民书体埃及文、希腊文共三重文本之同义对照,显然,其密码学和文字学的意义完全相当于一本"埃希对照字典"(图 1-1);而与之类似,通过与战国《楚帛书》这份出于先秦时代的占星历法专业文献进行对比验证,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中国文化中失传其义已久的甲骨卜辞干支二十二字也同样有其神秘的中国版"罗塞塔碑"留存在世可资研究,那就是《尔雅·释天》这份与战国《楚帛书》内容完全吻合的先秦字典文献。②而有趣的是,《尔雅·释天》这份堪称"古今汉语对照字典"的权威性著作其所完整保留的关于"天干地支"的诠释也同样是一份"同义对照三重文本",即所谓"纪日干支"(今版显性二十二干支)与"纪岁干支"、"纪月干支"(两种早已失传了的"古版隐性二十二干支")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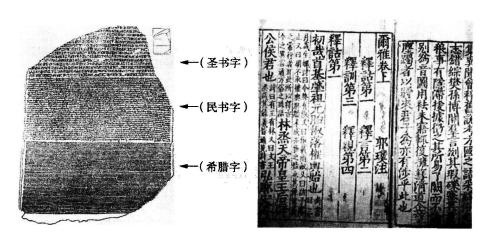


图 1-1 出土的托勒密王国罗塞塔碑铭文(刻于西元前 196 年)与传世的中国古籍《尔雅》(约成书于西元前 5—前 3 世纪)

①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

② 经与战国《楚帛书》所载之12月名互证、《尔雅·释天》的这部分资料之来源至少不会晚于战国时代。参见李学勤:《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文物》1960年第7期。

三者之间的神秘——对应关系,其中关于"十干"部分的原文如下①:

大歲在甲日關逢,在乙日旃蒙,在丙日柔兆,在丁日強圉,在戊日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日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尔雅·释天·岁阳》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尔雅·释天·月阳》

而再结合《史记·历书》关于"古版隐性二十二干支"的同类记载,这份足够为我们破译"干支密码"提供一手证据的中国版"罗塞塔碑"(十干部分)最终可归纳为表 1-2 所示的内容。

表 1-2	破译中国文明之谜的"罗塞塔碑"(十干部分):
	《尔雅》中的"显性十干"与"隐性十干"对照

显性干支	隐性干支		
业庄1文	月阳	岁 阳	
甲	毕	网逢(焉逢)	
乙	橘	旃蒙(端蒙)	
丙	修	柔兆(游兆)	
7	图	强圉(强梧)	
戊	厉	著雍(徒维)	
2	则	屠维(祝犁)	
庚	窒	上章(商横)	
辛	塞	重光(昭阳)	
壬	终	玄黓(横艾)	
癸	极	昭阳(尚章)	

括号内为《史记•历书》所载异文。

① 根据文字学考释等需要,在本书中,部分古文献资料的引文保留了繁体字。在行文中,有些文字因论证的需要,也保留了繁体字。

然而,很可惜,正如历史学家们所熟知的,要破译古埃及文,单单靠拥有"罗塞塔碑"这一工具还是远远不够的:在法国人商博良(Champollion)指出所谓"埃及象形字"其实主要并不是靠单体"象形"而是靠系统化协同"表音"来构造词句的卓见之前,罗塞塔碑的意义仍然只是在为迷信"象形字理论"的欧洲人提供拆字游戏的素材;而同样,虽然中国人自 2 000 多年前就一直拥有着《尔雅·释天》这份关于"十干"释义的珍贵一手文献,但由于我们的思想仍然还停留在汉代人的"六书理论"或者西方人的"象形文字理论"上,而不能从"十干就是十种东西的象形符号"之旧论中跳出来,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无法正确而完整地释读"甲乙丙丁"们,仍然只能把"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等等当作点缀文辞、炫耀博识的谜语、外语乃至神秘天书来使用。

事实上,古今各种以"象形字理论"诠释干支的论著,为什么竟会把原本应该同气连枝的"十干"符号解释成了既包括钉子(释"丁")、刑具(释"辛")①,又包括鱼肠(释"乙")、鱼尾(释"丙")②等琐物的不伦不类之大杂烩?为什么会把原本代表着1、2、3、4之井然次序的有序系统解释成了貌似可以随意拼凑的混乱结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钉子"必须排第四位而不是第八位、"刑具"必须排第八位而不是第七位……但是西方七曜日的时间次序和逻辑来源则是很清晰简明的,参见图1-2。)毫无疑问,这些论著正是因为缺少了关于"十干"字符总体上不是代指十件东西而是代表"同一类东西"乃至"同一件东西"的关键认识,从而犯了商博良氏之前的欧洲人都认定古埃及文字仅仅是独体"象形字"的同类错误,从而只能与中国版的"罗塞塔碑"们失之交臂,只能让《尔雅·释天》继续成为所谓"神秘干支之谜"的制造者而不是破解者。

二、殷商及先商时代中国人的 宇宙论模型

那么,"甲乙丙丁"们作为一个整体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 为什么 2 000

① 参见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1929年。

② 参见《尔雅·释鱼》。

定者和颁布者(按在上古时代制定颁布法典乃是国王的特权,所以中国的"伯夷"就好比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Hammurabi]王或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姆[Ur-Nammu]王)。而作为"有虞氏"第四任国王"蟜牛(鼓延)"的亲弟弟兼"兄终弟及"父系王权制度下的合法继承人,"伯夷(殳)"担当的王当然也不会是别国的国王,他只能是前者的直接继任者即"有虞氏"的第五任国王。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伯夷"这个名号的前缀"伯"字所代表的特殊含义:即"伯"字对于排行"老二"的他来说只能被解释为"邦伯(国君)"而无法被解释为伯仲之"伯(老大哥)",那么我们对"伯夷"其人的君王身份就更不能有任何疑义了。

而事实上,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蟜牛"和 "伯夷"这对兄弟国王曾经统治过古冀州"有虞氏"王国的证据还远不止此。

例如,在《左传·昭公元年》的记载中,子产曾引用晋国本地(有虞氏故地)的史料和传说转告我们: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臺駘。臺駘能业其官, 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我们不难解读出这其实是前述《山海经》所载有虞氏世系片段的另一种版本:

- ★ 所谓"金天氏裔子昧",其实就是指"帝喾(高辛)",因为"昧"—本作"晞",都训光照、燥柴即"昭阳(辛)",至于所谓的"金天氏"则是后人按照"西方庚辛属金"之后出五行理论为"高辛氏"宗族所起的绰号:
- ★ 所谓"允格",其实就是指"蟜牛=鼓延(寅)",因为"允格"即得名于"摄 提格(寅)";
- ★ 所谓"臺駘",其实就是指"伯夷=殳(未)",因为"駘(tai)"通"斄(tai)", 臺、駘、斄(麳)诸字古音相通,本是指麳麥、莊稼,即"天厨=壮=协治(未)"。

因此,这一则宝贵的史料不仅再一次确认了《山海经·海内经》关于"吳權(金天氏昧)之妻阿女緣婦是生鼓延(允格)、殳(臺駘)"之王朝世系记载的真实无误性(此所谓"生"并非指"父生子"而是泛指"前辈生后辈"),并且还正式补充了作为帝喾(金天氏昧)后辈的蟜牛(允格)、伯夷(臺駘)这对兄弟国王所处的确切地理位置和族属信息,即他们都是曾经"封诸汾川"统治着整个"汾、洮"

为七重世界,即按阶梯状排列直通天穹的所谓"七重天",所以,他们最终把自己京城最壮观的建筑"巴别通天塔"(即埃特门南基神庙[Etemenankiziggurat],建于西元前6世纪)也建成了七层天阶相叠加的模样(图1-2)。所以,很明显,当西元前7世纪的巴比伦僧侣准备编造原始版本的"一月四分七曜星期历"之时,当西元前586年的犹太祭司准备编造成型版本的"七曜星期历"之时,他们首先所想模仿表达的无疑也是这种日、月、火、水、木、金、土七层天穹"伟物"共同支撑宇宙的"七重天宇宙论"。总之,"星期历"的命名必须既体现通俗的"神祇"信仰,也必须体现深刻的"宇宙论"思想,这就是古代巴比伦文明创造"星期历"之全过程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因此,关于"中国式星期历"中所采用的"甲乙丙丁"之真正取象源头,我们也完全应该首先到中国古代最流行的"宇宙论"思想中去寻找,而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部落图腾象征物"等粗浅狭隘的文化表象中去寻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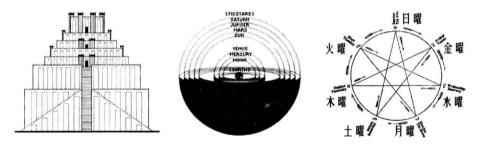


图 1-2 左: 巴比伦城遗址的七级"通天塔"埃特门南基神庙(Etemenanki Ziggurat) 复原图(西元前6世纪);中: 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 100—175)的 七重天水晶球宇宙模型;右: 七大行星的天文学排序(圆圈顺序)与七曜日的占星学排序(七角星顺序)之一一对应关系

三、既然通过对比古代巴比伦人的星期制度,我们已能得出"十干=神物+ 伟物"的公式,那么我们想要找的最终答案自然也就呼之欲出了。因为,一方面, 关于上古中国的至尊神祇和"神物"究竟为何,我们早已知晓,那就是殷墟甲骨卜 辞以及先秦文献屡屡明确提及的"帝"。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甲骨文的"帝"应是 "楴"的本字,其字面含义是万物之根楴和宇宙的缔造者,也就是说,殷商王朝所 崇拜的最高神祇"帝"其神话喻义与植物生长、生命诞生、宇宙起源等有关①,

① 许多著作把"帝"直接释作取象"花蒂"的象形字,不确。关于"帝"字的造字本义与起源,作者将另文专述。

其字形则明显类似一棵"神树"(图 1-3)。而另一方面,关于中国上古最流行的"宇宙论"模型其详情究竟如何,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一些著名的出土文物来得到最直观的图解。例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约前 12 世纪)就可证明,"扶桑十日"①这个见载于《山海经》等古文献的天文神话其实就是中国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宇宙论"。按照这种从黄河到长江、从中原"华夏"到西蜀"蛮夷"都十分流行的"十元宇宙论"思想之描述,中国先民相信,从大地到天空,宇宙其实是由一棵拥有十大分支枝杈或者十种时空化身的通天巨树支撑着的,正是这十大轮回的通天树杈或者时空化身承载了天穹上的一切事物,从天幕到云彩,从星辰到闪电,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每天照耀我们的十个金乌(太阳)。所以,基于中国古人心目中最至尊至圣的神物本叫"楴"以及能通天彻地的伟物本叫"扶桑"这两大证据,我们最终可得的结论就是:中国天干十字的创意原型,绝对应该与刑具、鱼肠、图腾动物或人体器官等无关,而只能是来自我们祖先所选定的古老"宇宙论"模型——通天树。









图 1-3 左起: 殷墟甲骨文中的"帝"字(前 14—前 11 世纪);曾侯乙墓漆器上的通天树"扶桑"图(前 433 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乌十日"青铜神树(约前 12 世纪);《甲骨文合集·37986》之纪日"干支表"(前 14—前 11 世纪)

① 在最早的中国神话中,所有的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等"天体"都各有其特别的通天神树支撑,例如姖木、若木、建木、梨木、枫木等等,扶桑仅仅是其中之一。参见本书第五篇。

三、释十干、十月阳、十岁阳

通过以上分析,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堪比"罗塞塔碑"的"干支密码"可靠破译工具《尔雅·释天》,既然我们已经找到了堪比"通天塔"的中国宇宙论模型"通天树",那么,考释"十干"的线索和证据显然已经具备,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文字的校勘和训诂了。而对于《尔雅·释天》的校勘工作而言,以下的这些问题无疑是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

虽然,《尔雅·释天》是记载"岁阴岁阳"等"干支密码"的最完整版本,但却从来都不是最精良的版本。因为,对比另一种同样也记载了这些术语的关键文献《史记·历书》,今本《尔雅·释天》的缺点讹误之多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尔雅·释天》仅仅是文字训诂之书,其与《史记·历书》这种实际应用"岁阴岁阳"进行纪年和运算的天文历法专业文献是无法比拟的。仅就十干部分为例,《尔雅》云"在庚曰上章(尚章)",按《史记》"尚章"应为"在癸";《尔雅》云"在癸曰昭阳",按《史记》"昭阳"应为"在辛"(表 1-2)。因此,为了确保我们能在最可靠的文献证据基础上去破译"干支密码",我们必须确立如下的校勘原则,即首取正字必须尽量参考各种天文历法方面的专业资料,比如出于太史公的《史记·历书》、出于历法专家"贞人"们的甲骨卜辞、出于其他先秦文物上的天文学或占星学文字资料等等。而在此原则之下,经作者最后勘定复原的《尔雅·释天·岁阳月阳》同义词对照表即中国版"罗塞塔碑"(十干部分)的内容如下(表 1-3):

表 1-3 天干、月阳、岁阳对照 (据《尔雅·释天》、《史记·历书》等校勘复原,陆星原制,2009年)

	天千=月阳=岁阳
1	甲二畢二於逢
2	乙=橘=端萌
3	丙=條=蘇兆
4	丁=圉=强圉
5	戊=厲=著離
6	己一則二屠犁
7	庚=窒=倉黄

1	4±.	圭	`
(奨	敄)

	天干=月阳=岁阳
8	辛=寨=昭陽
9	壬=終=孫艾
10	癸=極=上章

而据上表的三重同义对照,以及殷墟甲骨文的十干字形,十干各字可具体 考释如下:

(1) 释"甲=畢=於逢"

★ 於逢:於,按《说文》,"亏,於也",意为亏缺破裂。(《尔雅》中"於"作 "阏",《史记》作"焉",皆通"於"。)逢,通"缝",即缝隙。故岁阳名"於逢"的本义 就是亏缺破裂、绽开缝隙。

★ 畢: 通縪,按《玉篇》,"縪,冠縫也",知縪可训缝。又,畢音必、宓,古可通假于處、虖、罅诸字,亦为缝罅之意。故月阳名"畢"的本义就是缝罅。

★ 甲: 既然於逢、畢的意思都是"裂缝",那么甲字的本义也应与"裂缝"有关。而据甲骨卜辞,甲字如图 1-4 所示原作"十"字形,正像初次坼裂之中心开花十字裂缝。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可推知,"甲"(古音同匣)应是"罅(瑕)"和"匣(有缝罅可开之壳形物)"的本字,本义是坼裂破缝而出,即以"通天树"的坼裂破壳而出之萌芽状态代指十干纪日次序之第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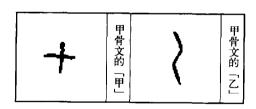


图 1-4

(2) 释"乙=橘=端萌"

★ 端萌: 端,按《说文》,"端,物初生之題也",指动植物初生的尖端头角。 萌,按《说文》,"萌,草芽也",即草木的苗头萌芽。故岁阳名"端萌"的本义就是 苗头才露尖尖角。("萌"字《尔雅》、《史记》原皆作"蒙",通"萌"、"芒"。)

★ 橘: 通矞,按《说文》,"矞,以錐有所穿也,—曰滿有所出也"。故月阳名 "橘"的本义就是脱颖锋芒。 ★ 乙: 既然端萌、橘的意思都是"苗头芒刺",那么乙字的本义也应与"苗头芒刺"有关。而据甲骨卜辞,乙字如图 1-4 所示为一婉转向上的曲线,正像一枝破土屈曲而出的新生苗头。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可推知,"乙"(古音ya=轧)应是"穵"(古扎字,训穿通刺探)和"芽"的本字,本义是端芽扎刺上出,即以"通天树"的端芒初露之幼苗状态代指十干纪日次序之第二位。

(3) 释"丙=條=繇兆"

- ★ 繇兆: 繇,通爻,本义为条状的筮草棍交叠成的占卜算卦图像。(《史记》中"繇"作"游",《尔雅》作"柔",皆同音假借字。)兆,本义为用龟甲占卜时烧灼出的条状清晰裂纹,即有条理有信息的纹理文彩。繇兆,则又可写作窈窕、窈窱、杳稼、窅稼、繇條等,为古文献之常见成语,本义指植物或人的条理清晰、文彩飘杳,即《尚书・禹贡》所谓的"草繇木條"、《诗・关雎》所谓的"窈窕淑女"等等。故岁阳名"爻兆"的本义就是纹路条理清晰。
- ★ 條: 训條理,同上,也是"窈窱"的略语。故月阳名"條"的本义就是条理清晰。(《尔雅》中"條"作"修",形近之讹字。)
- ★ 丙: 既然繇兆、條的意思都是"条理清晰",那么丙字的本义也应与"条理清晰"有关。而据甲骨卜辞,丙字如图 1-5 所示原作一门枋之形,从"门"从"八","八"之两斜笔画是指示符号,代指"门"字形门框内的辅助性木条即斜角交叉楣枋结构。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以及《说文》关于"仿"、"枋"(古音bing=柄)等字籀文字形原作"俩"、"柄"的解释可推知,①"丙"应是"枋(柄)"和"娉"的本字,本义是枋条、像枋条一样娉婷有条理,即以"通天树"的堪作门楣斗枋之渐成条理阶段代指十干纪日次序之第三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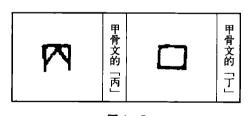


图 1-5

(4) 释"丁= 圉= 强圉"

★ 强圉:强,训强直、刚强。圉,意为栏杆圈圉。故岁阳名"强圉"的本义

① 按上古汉语的读音早已失传,本书标示的通假字拼音仅供近似理解,并非精确拟音。

就是方直强固的围栏圈圉。(《史记》中"圉"通假作"梧(圄)")

- ★ 圉: 同上,即"强圉"的略语。故月阳名"圉"的本义就是围栏圈圉。
- ★ 丁: 既然强圉、圉的意思都是"围栏圈圉",那么丁字的本义也应与"围栏圈圉"有关。而据甲骨卜辞,丁字如图 1-5 所示原作一四方形的"口"字形,这显然与某些著作所释的"钉子"之形无关,而是指四方形的围栏圈圉。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可推知,"丁"字其实应是"梃"和"亭"的本字,本义是木梃、像木梃一样亭直不曲,即以"通天树"的亭直强圉堪充篱墙围栏之成丁阶段代指十干纪日次序之第四位。

(5) 释"戊=厲=著離(重光)"

★ 著離: 著,训显著、附著。離通麗,即附麗。("離"字今本《尔雅》作"雍", 《史记》作"维",皆传抄形讹。)故岁阳名"著離"的本义就是光显附麗之意。

此外,综合对比分析《尔雅》及《史记》后可知,岁名"著麗"又可作"重光"。因为,重,训重复附丽;光,训光华显著。故重光就是附麗光华之意。而由此可知,"重光"与"著離"古皆可同义互训。至于今本《尔雅》"在辛曰重光"一语则明显有误,据《史记》可知,"辛"之岁名本是"昭阳",故校勘后的《尔雅》原文当作"在戊曰重光"而非"在辛"。

- ★ 厲:通麗,意为附麗、華麗。故月阳名"厲"的本义就是華美附麗。
- ★ 戊: 既然著離、厲的意思都是"華美附麗",那么戊字的本义也应与"華美附麗"有关。而据甲骨卜辞,戊字如图 1-6 所示原作从"戈"从"丿","丿"为指示戈刃小枝(戈字的一横)的指事符号,意指刀戈兵器上的华丽纹饰和金玉珠宝等附丽物(此类兵器系贵族或王者所持的仪仗兵器即西方所谓的权杖,例如良渚文化的兽面纹玉钺、春秋时代的错金铭文青铜剑等),以此表示事物锦上添花的华丽成熟状态。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可推知,"戊"(古音 mu或mo)应是" 税(楙)" 和" 茂"的本字,本义是华丽多饰、 懋美贵重,即以"通天树"的堪作王税权杖之華美茂盛状态代指十干纪日次序之第五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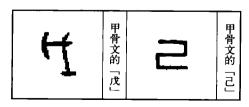


图 1-6

(6) 释"己=則=屠犁"

★ 屠犁: 屠,通图,意为图划、划分(《史记》"屠"音讹为"祝")。犁,通剺, 意为剺划分割;又通釐、厘,意为治厘规划(《尔雅》"犁"音讹为"離",又形讹为 "维")。按,古时图划厘治的缺省对象就是土地,并称划土、厘田的耕种工具就 叫铧(划)、犁(厘),故屠犁的本义就是指屠铧、耕犁。故岁阳名"屠犁"的本义 就是图划厘治之物、铧犁。

★ 則:为"測"的本字,测通畟(ce),据《尔雅》"畟畟,耜也"可知,测(畟)的本义为耕田划土的锋利工具。故月阳名"則"的本义也是指测土治田的铧犁。

★ 己: 既然屠犁、则的意思都是"铧犁",那么己字的本义也应与"铧犁"有关。而据甲骨卜辞,己字如图 1-6 所示原作等距平行的三长横加二短纵之形,正是耕犁在地面上连续割画横向平行线的动态轨迹之写照①。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可推知,"己"应是"杞(相)"和"纪"的本字,本义是指耤田犁土、经纪疆厘,即以"通天树"的堪作相犁、堪负犁土纪田重任之良材重器状态代指十干纪日次序之第六位。

(7) 释"庚=窒=倉黄"

★ 倉黄: 今本《史记》原作"商横"。"商"古通"倉"②;"横"字则通"廣 (黄)",故"商横"就是"倉黄"。仓,按《说文》,"倉,穀藏也。倉黄取而藏之,故 謂之倉",本义为充塞粮食的封闭仓库。黄,甲骨文字形作带坡顶建筑物,无 "共"字头,是"廣"的本字,本义为堆塞东西的大屋,即古代天子的大内仓房 "中黄"、"黄藏府"之类。故岁阳名"仓黄"的本义就是充塞收藏东西的封闭 仓房。

(按,《尔雅》本条作"在庚曰上章",大误,幸有《史记》明证在庚为"商横"。)

★ 室: 意为室塞、充塞,又指起室塞防御、充塞储藏作用的古代建筑物如"窒皇"、"库室"等等。故月阳名"室"的本义就是窒寒充实。

★ 庚: 既然仓黄、窒的意思都是"充塞",那么庚字的本义也应与"充塞"有 关。而据甲骨卜辞,庚字如图 1-7 所示原作上"干"下"A(宀)"形,正是一个用 梗棘茅草堆出的可充塞粮草的仓囤草垛之形。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可推

① 按,此种 S形轨迹是世界公认的耕作典型路线,比如在文字排版上西方人即称与之类似的 S形行文为"牛耕式转行书写法"(boustrophedon)。

② 参见《尔雅·释鸟》:"仓庚,商庚。"

知,庚字其实应是"康"(园)^①和"梗"的本字,本义是指园藏充塞粮食的仓廪和梗棘堆垛,即以"通天树"的渐成梗棘之苍枯衰黄阶段代指十干纪日次序之第七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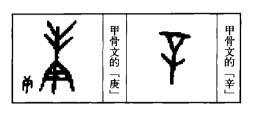


图 1-7

(8) 释"辛=寨=昭陽"

★ 昭陽: 昭,即"照"之本字,意为燃火照明。陽,通"煬",训炙燥、煬烧。 故岁阳名"昭陽"的本义就是能燃烧照明的发光体。

★ 寨: 为"柴"的本字,即柴火。(《尔雅》"寨"作"塞",音形义皆近之错别字。)故月阳名"寨"的本义就是照明取暖的柴火。

★ 辛: 既然昭陽、寨的意思都是"可燃发光物",那么辛字的本义也应与"可燃发光物"有关。而据甲骨卜辞,辛字如图 1-7 所示原作一直立树枝"中"形加带半片枯叶"▽"形,正像枯枝干柴之形。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可推知,"辛"字其实应是"薪"和"焮"的本字,本义是薪柴火把,即以"通天树"的焮焮可燃之枯于辛辣阶段代指十于纪日次序之第八位。②

(由此再次证明,今本《尔雅》"在辛曰重光"实误,"重光"是指抽象意义上的对比级别之光大显赫,"昭陽"则是物理意义上的柴木燃烧之实际发光,在上古语言中本不混淆。)

(9) 释"壬=終=孫艾"

★ 孫艾: 孫(xun),为"遜"的本字,本义为逊退、收敛。艾,据《博雅》"艾,老也",即老熟;又通刈,意为刈绝、收割。故岁阳名"孫艾"的本义就是终老收敛。("孫"字今本《尔雅》作"玄",音形相近之脱讹。《史记》别作"横艾",则为黄髪艾老之意,字意亦通。)

① 按"康(療)"为"因"之本字,本义为用建筑空间充塞储藏粮食。参见《尔雅·释诂》"漮,虚也"。另参见《诗·小雅·笺》"康,空也"。

② 按今日"辛"字的常用义项"辛辣"即从薪柴燃烧之刺鼻烟味和滚烫热气引申而来,因为辣椒味和烟味都是刺激性的和灼热性的。

- ★ 終:即终点、终结。故月阳名"終"的本义就是终结尽头。
- ★ 壬: 既然孫艾、終的意思都是"终老收结",那么壬字的本义也应与"终老收结"有关。而据甲骨卜辞,壬字如图 1-8 所示原作一竖线加两头两短横,两短横为空间指事符号,指示竖线"丨"形的上下两个终点。(按,"终"字的本义,正如古今许多著作所指出的是指一束丝的两个端点尽头,可见"壬"、"终"确可互训,都是指几何学概念的直线端点。)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可推知,"壬"字其实应是"稔"和"飪"(大熟曰飪)的本字,本义是线性尺度即一维时间的终点尽头,即以"通天树"的稔熟收割、老朽终结之阶段代指十干纪日次序之第九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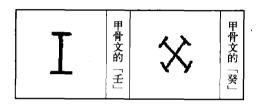


图 1-8

(10) 释"癸=極=上章"

- ★ 上章:上,意为至上至尊至极。章,按《说文》"章,樂竟爲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本义为完结终极。故岁阳名"上章"的本义就是时空的终极尽头。
- ★ 極:按《说文》"極,棟也",本义指房屋的最高处、极高点。故月阳名"極"的本义就是空间尺度的尽头极点。
- ★ 癸: 既然上章、極的意思都是"终极尽头",那么癸字的本义也应与"终极尽头"有关。而据甲骨卜辞,癸字如图 1-8 所示原作"×"形加尽头四短画,尽头四短画为空间指事符号,指示"×"形坐标线的四个最远点尽头。而再据"通天树宇宙模型"可推知,"癸"字其实应是"究"(古音 gui=轨)和"暌"(训暌违离散)的本字,本义是指二维空间的四至极点和穷究尽头(《易·说卦·疏》:"究,极也"),即以"通天树"的枝叶飘零暌分四散、生命来自天涯四方又复相违相离散于天涯四极的叶落归根阶段代指十干纪日次序之第十位。正如西谚所云,尘终归尘,土终归土,十干变化至此完成了"通天树"生命的伟大循环,并暗示了卷土重来、生生不息、来日春风吹又生之意。

(按,今本《尔雅》本条作"在癸曰昭阳",参照《史记》作"尚章"可知明显有

误,毋庸置辩。而终与極、壬与癸的区别也于此凸显:终与壬是时间和一维概念,極与癸是空间和二维概念。时间只拥有两个不对称的"无穷远"终点,分别叫终、始;而空间却拥有四个对称的"无穷远"极点,或谓之东西南北,或谓之左右前后,事实上古人言"極"者必称"四極",例如《尔雅·释地》即有云"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極"。)

四、十干纪日制度与中国的有机宇宙论

殷墟卜辞中的"十干"字符究竟是代表了何种神秘含义?毫无疑问,通过《尔雅·释天》这本"古今汉语对照字典"提供的如上翻译,我们不难精确地还原出其初始的含义,那就是"十干"字符确实并不是一组随意拼凑的代码,而是一组有着严密内在逻辑的表达时间次序的汉字,其具体的次序含义可分五组每组两字简单归纳如下:

甲:"鏬"的本字,裂罅而出之种胚。 乙:"芽"的本字,发芽而出之苗头。

丙:"娉"的本字,娉婷多姿之新秀。 丁:"梃"的本字,成梃强直之良材。

戊:"楙"的本字,懋丽华贵之珍料。 己:"相"的本字,耜田犁土之重器。

庚:"梗"的本字,梗阻荆棘之老朽。 辛:"薪"的本字,枯薪干柴之老辣。

壬:"稔"的本字,稔熟收割之终结。 癸:"暌"的本字,暌散四分之尽头。

而通过对这组距今至少有 3 300 年的"十干"神秘文字之破译,以及对其背后更加古老的"通天树"字宙论之解读,我们最终不难发现,"十干纪日制度"

确实是一项中国先民的本土发明,因为该"中国式星期制度"所使用的甲、乙、丙、丁等十个字符不仅全都符合中国汉字的造字原则而绝无外来影响成分,而且其背后所体现的"通天树"宇宙论也是一种与古巴比伦、西方或古埃及等地的宇宙论性质迥异的中国本土思想体系。具体而言,这两者之间至少存在着如下几点不可弥合的巨大差异:

首先,就"宇宙论"罗列的元素而言,中国的"通天树十干宇宙论"所罗列的 五类十种元素其本身都是非独立的、无法同时并存的"通天树"之阶段性化身 (图 1-9),因为,所谓"十干"其字面本义无非就是在描述同一棵木本植物的十

阶段生物学"生活史"(Biological life history): 萌发(甲乙)、生长(丙丁)、成熟(戊己)、枯残(庚辛),以及以个体衰亡为代价的群体复生(壬癸);而与之相比,古巴比伦—西方的"七曜宇宙论"所罗列的"日、月、火、水、木、金、土"这七大星体则都是独立的、可以同时并存的客体。因此,中国人的这种"宇宙论"所充分强调了的"局部离不开整体"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与古巴比伦和西方的"宇宙论"都喜欢强调的"多元分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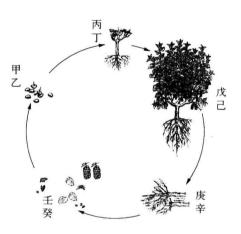


图 1-9 中国十干符号所描述的 木本植物生活史

思维模式是根本不同的(此外古希腊和古印度的土、水、气、火"四大元素"宇宙论也是如此)。

其次,就"宇宙论"关注的重点而言,中国的"通天树十干宇宙论"关注的重点是宇宙的"生、长、壮、老、死"时间结构,而巴比伦一西方的"七曜宇宙论"关注的重点是宇宙的"七重天"空间结构。因此,中国人的这种"宇宙论"最早是通过天文历法和符号文字等抽象的途径表现出来的(因为时间无形可象),这与巴比伦的"宇宙论"最早是通过"通天塔"等空间有形物体来表现也是根本不同的(古埃及象征太阳神创造和主宰宇宙的"金字塔"和"方尖碑"亦是如此)。

最后,就"宇宙论"本体的比喻而言,中国的"通天树十干宇宙论"是将整个宇宙比喻为同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通天树,而巴比伦—西方的"七曜宇宙论"则将整个宇宙比喻为一架无生命的机械装置——通天塔或水晶球。因此,

中国人的这种"有机宇宙论"在最最本质之处也是与巴比伦一西方的"机械宇宙论"完全不同的。

总之,纵观人类历史,如果说,西方文化及其巴比伦、埃及前辈们的文化是一种更看重哲学式个人思辨的机械主义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就是一种更看重实验性集体智慧的有机主义文化。因为,在西方人及其文化前辈的眼里,宇宙的主角和母体永远是"七曜水晶球"之类的"机械一空间元素"、"土、水、气、火"之类的无生命孤立物质,因此人类征服宇宙所需要的最高智慧就必然是一种同样充满了机械性、逻辑性的理性认知,是一种除了面对孤立物质就是面对孤立自我的哲学式个人思维;然而,在中国人的眼中,宇宙的主角和母体"生、长、壮、老、死"或曰"生命一时间元素"却另有其独特禀性,她们都是一些互动的过程而非机械的结果,都是一些有机链条上的物态而非无生命的孤立物质。因此,当中国人面对宇宙时所能进行的最佳思考,就必然是一些看似不合静态逻辑却能在互动的现实生活中屡试不爽的玄妙经验,看似只言片语、微不足道却能像有机体的无限繁殖般集腋成裘的伟大集体智慧。而正是这种看重生命和时间的"有机主义文化"和"有机宇宙论"之广泛存在,才最终促使了中国的"十干纪日制度"之诞生,也即世界上最早的一种"星期制度"之诞生。

第二篇 世界最早的十二星座 天文坐标系——中国 十二支纪月考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西方儒略历(Julian calendar)为原型的所谓"公历"早已取代了中、日、韩等东方古国的传统"农历",就像源自西方世界的"十二星座"占星术正日渐取代东方的"十二生肖"而成为中国新一代国民的精神必需品一样。显然,在这种西方文化强势进攻的历史背景下,假如有人试图论证这种"西化现象"并非是历史性的第一次,而只是几千年前古巴比伦天文学"西风东新"传入中国之重演,就像早年郭沫若先生所试论过的那样①,那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重视这种观点的。毕竟,无论是《史记•天官书》所记载的"困顿"、"赤奋若"、"摄提格"等十二个拗口如外语的"岁阴(太岁)"纪年术语,还是《逸周书•周月解》所记载的"建子"、"建丑"、"建寅"等十二个神秘的"斗建(星建)"纪月术语,其原本的含义早就失传有年了,它们究竟是"中式"的发明物还是"西化"的舶来品,确实是值得我们就此去求索一番的。

一、考古证据所见世界最早的 周天十二星座

然而,很可惜,关于支持中国"十二岁阴"纪年体系或"十二地支"子午线坐标系本是源自古巴比伦"黄道十二星座"(12 Zodiacal Constellations)的种种假说,随着近一个世纪的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进展,其证据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早

①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1929年。

已枯竭。





图 2-1 天文坐标系:中国曾侯乙墓二十八宿天文图(前 433 年)和 埃及 Hather 神庙十二星座天文图(前 52 年)

一方面,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早已指出,"黄道十二星座"作为一个能够大 致十二等分黄道经度的完整恒星坐标系,其出现于古巴比伦和古亚述地区的 年代并没有当初某些著作所官称的那样早(据说至少可早至西元前 18 世纪的 Hammurabi 王时代),事实上其最早的无争议证据不过是抄录于西元前 686 年 左右的亚述泥版文献《Mul-Apin》(见图 2-2)。而按照该文献记载的春分点位 置(spring equinox)等天文数据推算,其所述内容的最早可追溯的年代也不会 早于西元前 1000 年 ①(而且当时的巴比伦─亚述周天坐标系上总共排列有 17 或 18 个星座,十二星座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于那些早先被认定是描写 十二星座的更古老证据,例如,铭刻于古巴比伦喀西特(Kassite)王朝(西元前 16-前 12 世纪)那几块"kudurru"石碑上的疑似星座名的神像、神徽或神名 (古代星名都兼为神祇名,但神祇名未必是星名),现在业已证明其当初的本义 并不是指按天球坐标次序排列的星座,而仅仅是指按神话谱系特意罗列的各 路神祇。至于古巴比伦人和古希腊人在这些众多神祇中选出十二个用以固定 指代黄道十二星座和黄道十二宫,则已经是许多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也就 是说,真正被我们今人所熟知的"黄道十二星座",是西元前5世纪左右才最后 成型的, 巴比伦和西方最早的划分十二星座的文字证据始见于大约西元前 419年的泥版文献②;最早的图像证据始见于大约西元前52年(图2-1)。显 然,对于这种晚到西元前419年左右才刚刚成型的西方"黄道十二星座"而言,

① 参见 Hermann Hunger and David Pingree: Mul. Apin, An Astronomical Compendium in cunei form, Berger Verlag, 1989。

② 参见 Knappich, Wilhelm: Geschichte der Astrologie, Frankfurt/Main, 1988。

其要在 78 年之内跨越上万公里的空间距离,以便赶在西元前 341 年之前成为另一个早已成型的中国"十二岁阴纪年"术语体系之"外语老师",这在时空条件上是基本没有可能的。(据《楚辞·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知,早在屈原①降生的西元前 341 年之前,"摄提格"等十二个貌似"外语译音"的术语就已经作为一个严整的纪年体系被中国人所广泛熟知和使用了)。至于亚述文献《Mul-Apin》所能追溯到的西元前 1000 年,显然更早不过中国文献《国语》所能追溯到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之年代。(《国语》"岁在鹑火"等记载说明了至少在公元前 11 世纪的殷代末年中国已经有了"鹑火"等"十二星次"即"赤道十二星座"。)





图 2-2 左:记载有十二地支王名"高祖亥"(即王亥,约前 19 世纪在位)的甲骨文(前 14—前 11 世纪);右:记载有若干黄道星座和"春分点"(约前 1000 年左右)的亚述泥版文献《Mul-Apin》(前 7 世纪)

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无到有的一个多世纪发展过程中,有关中国天文历法起源的许多重要文物正不断地被惊世发现,例如载有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二十八宿"坐标系(赤道十二星次的等价坐标)的随州曾侯乙墓漆箱盖天文图(不晚于西元前 433 年)、江陵九店楚简(约前 5—3 世纪)、天水放马滩秦简(约前 4 世纪)等等。而所有这些新的发现无一例外都在把中国人使用"十二等分恒星坐标系统"或"天球赤道坐标系"(Celestial coordinate system)的开始时间大大地推前。尤其是,即使暂不考虑那些更古老更惊世的

① 限于篇幅,关于屈原生辰的考证不在本书讨论范围内,作者将另文专述。此处仅列出考证结果西元前341年。

证据(详见后文),只要我们看看安阳殷墟出土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天文历法专用汉字(刻写于前 14—前 11 世纪,参见图 2-2 和图 2-5),我们就完全可以确信,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最早懂得借用星座标志把宇宙空间划分为十二等分、借用天文学术语把宇宙时间的循环周期计算为十二个岁阴年、十二个斗建月、十二个地支日的人绝对就是以汉字为母文字的古代中国人。

中国的"十二支"汉字其本义究竟为何物?其实,甲骨文中最常见的"子丑 寅卯"纪日功能早已暗示了其造字的来源——天文历法。当然,在"干支混合 纪日"功能中充当"十干"的配角绝非是这十二个汉字的初始用途,更不是其唯 一的用途,因为根据《史记•律书》和《汉书•律历志》等中国典籍的记载,"士 二支"代码总共计有如下这几种最早期的含义和用途,其一,代表"干支纪日" 中"十干"的配角共同构成六十甲子循环;其二,对应十二个音律名;其三,代表 十二个月份名;其四,代表十二个中国星座以及十二条赤道子午线。那么,在 这些含义和用途之中,究竟哪一种才是最古老的、最接近于"子丑寅卯"造字本 义的呢?毫无疑问,答案只能是第四种:"十二地支=十二星座。"因为,一方 面,在"干支纪日"中"十二支"不仅是"十干"的配角,而且由"子日"至"亥日"的 循环周期"十二支日"其本身并无任何的天文学含义(相比起来,"十干日"不仅 有天文学近似含义"三分之一个朔望月",而且有专门的单位"旬"),所以"十二 支纪日"绝对无关"十二支"汉字的本义而纯属借用;而另一方面,用"十二支" 对应十二音律名也明显是一种借用性质的术数理论,因为据《史记•律书》,十 二地支与十二律的对应并不唯一,而是至少有两种互不统一的对应关系,其一 是"黄钟=子、大吕=丑、太蔟=寅、夹钟=卯……"的音高顺序对应,其二则是 "黄钟=子、林钟=丑、太蔟=寅、南吕=卯……"的所谓"生钟分"顺序对应(即 按"三分损益律"的相生次序),可见,"十二律"这种立体多序结构并不是"十二 支"这种单一直线次序结构的可能来源。至于第三种用途,即用"十二支"代表 十二个月份名,则明显是"十二支"第四种用途的同类变种:众所周知,人类之 所以最习惯把周天方位划分为"十二星座"而不是其他整数,完全是因为要服 从"一年~十二个朔望月"这一天文学周期的自然规律,以便我们在每个月都 能看到一个独特的"当令星座",所以,中国古代所谓的"建子之月"、"建丑之 月"、"建寅之月"等等,其天文学的本义当然也只能是指先用十二个星座直接 代表十二个周天方位,再用十二个周天方位的空间转变间接代指十二个朔望

月的时间转变(详说见下文)。因此,基于排除法,在排除了第一、第二种可能性之后,甲骨文"十二地支"汉字的造字本义无疑最有可能就是代表了十二个中国星座之名(或同名的赤道子午线),以及与之等价同源的十二个"斗建(星建)"纪月之名。

《史记•律书》有云"营室……其于十二子为亥、虚……其于十二子为子、 牵牛……其于十二子为丑、箕……其于十二子为寅……", 显然, 中国天文学中 的亥、子、丑、寅等"十二地支(十二子)"与营室、虚、牵牛、箕等"十二星座"两者 之间自有记载以来就是有明确对应关系的(参见表 2-1)。因此,只要我们能 更进一步地证明,这种一一对应关系不仅是表面上的,而且是本质上的同构同 源关系,甲骨文的"十二地支"汉字确实就是在直接描述中国天文学的"十二星 座",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最终就可证明,以殷墟甲骨文为证据支撑的"中国十 二星座"绝对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星座天文坐标系"。也就是说,即使暂不考 虑传世文献记载中的更古老案例以及出土文物中的更古老证据,古巴比伦的 "黄道十二星座"也远远要比中国的"赤道十二星座"晚发明七八百年(就文献 本身最早撰写的年代来说,殷墟卜辞为西元前 1200—西元前 1300 年左右,亚 述泥版为西元前 686 年;就文献内容来源最早可追溯到的年代来说,殷墟卜辞 中可追溯的十二地支名最早使用者是图 2-2 所示的约西元前 1800—前 1900 年在位的商先王王亥,亚述泥版如前所述则仅可追溯到西元前 1000 年左右)。 总之,事实将证明,某些著作所假设的"中国十二岁阴(十二地支)西来说"明显 是缺乏根据的。

二、中国天文学与近东暨西方 天文学的本质差别

如果说,要破解"十干"之谜主要是一个密码学、词源学或古文字学的问题,那么,要破解"十二支"之谜就主要是一个天文学的问题了。因为,与"十干纪日"或"七曜纪日"这些人为性文化选择的历法术语迥然不同,所谓"十二地支纪月"、"十二岁阴纪年"或"黄道十二宫"等等其名字的本身就意味着它们都是与非人为性的实测天文数据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虽然这些天文学产物表面上看起来都有着把宇宙时空"一分为十二"的类似形式,但实际上只要稍有天文学常识,任何人都会马上意识到,其实它们背后的天文学含义很可能是

完全异质的。例如,仅仅凭"一分为十二"的表象,我们是很难判断它们所要拟合的天文数据究竟是如下哪一种:

1回归年=12.3683 朔望月

1 恒星年=12,3687 朔望月

1 木星年=11.86 地球年

.....

因此,假如在没有天文学的可靠证据之前,我们仅仅想从语音的比较分析等角度去分析中国的十二地支、十二岁阴体系与巴比伦或希腊的十二星座、十二宫体系的异同,那无疑是十分盲目的(例如,郭沫若《释支干》通过比较语音,称中国岁阴名"摄提格"即巴比伦的大角星名"SU. PA"之译音;中国岁阴名"敦牂"即巴比伦的金牛宫名"Gu. An"之译音等等)。

而只要我们把目光投入到天文学的领域,我们自然就将体会到,即使撇开考古学的年代证据,仅仅从天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分析,我们也能独立证明,中国的"十二地支纪月"(或"十二岁阴纪年")根本就不可能是源自古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因为,这两者背后所代表的中国天文学体系和古巴比伦(或古希腊)天文学体系根本就是两种技术目的迥异的、功能性质相左的、完全不相兼容的技术体系。也就是说,从天文学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天文学与西方的天文学之间至少存在着如下几点本质的差别,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将它们归为同源师承之物。

(1)"赤道"与"黄道"的差别

众所周知,Aries(白羊座)、Taurus(金牛座)、Gemini(双子座)、Cancer(巨蟹座)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西方星座之所以今天仍被称为"黄道十二星座",首先就是因为它们都是全天八十八星座之中位置最靠近黄道(ecliptic)的特殊星座;而以黄道为天球零纬度大圆的黄道坐标系也正是构筑古巴比伦和古希腊天文学的基础:西方天文学最看重的春分点、夏至点等"十二宫"分界点就无不是用黄道经纬度定义出来的。但是,同样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天文坐标系却是一个建立在与黄道保持着23.5度巨大交角的天赤道(equator)大圆上的赤道坐标系;就中国最主要的十二星座(十二星次)来说,其元枵(三女十虚十危)、星纪(三斗十牵牛)、析木(三尾十箕)、大火(三氐十房十心)等成员无不是

位置尽量靠近赤道零纬度大圆的特殊星座(按现代观测到的中国十二星次既偏离于赤道也偏离于黄道,但如果把时间倒推到 4 000 年前乃至更早,它们明显都是些赤道星座,详见下文);就中国天文学最看重的"终夜七襄"测时系统来说,其基本概念也完全是用子、丑、寅、卯等十二条赤道坐标子午线定义出来的。总之,最纯粹的中国天文学在其诞生之初确实是只认"赤道"不认"黄道"的。

那么,基于赤道的中国坐标系与基于黄道的西方坐标系究竟在天文学上意味着多大的差别呢?我们只要随便举一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了:

例如,据《后汉书·志·律历中·贾逵论历》的记载,中国汉代著名学者贾逵(30—101)就曾明确论述过赤道坐标系与黄道坐标系的绝不可混淆性:"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日月同……"显然,早在 2 000 年前,中国天文学家们就已用实例告诉我们,任何人妄图要把赤道坐标系统与黄道坐标系统直接合并为一体的举动都是会直接导致整个天文历法体系的混乱崩溃的。

又如,元代郭守敬(1231—1316)等人为了调和波斯阿拉伯天文学传统与中国天文学传统而编造所谓《授时历》的过程表明,任何人即使仅仅想把赤道天文学与黄道天文学在形式上间接杂糅为一体也是需要付出重大代价的,这不仅要使中国历法原本具有的简洁实用性被"弧矢割圆术"等复杂繁琐的数字游戏所替代,而且最终会使《授时历》这种堪称世界上最最繁文缛节的历法变成一种实际上两头不讨好的怪胎:一方面,它早已失去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诸多延续性,也不能与中国几千年丰富的天文记录积累实现无缝对接,注定了它只能是一部短视的临时性历法;另一方面,它也不如真正的阿拉伯历法那样具有精确预报日、月食等天象的功能,从而导致了它在元代仅仅是和《万年历》等各种版本之《回回历》并行使用的历法之一,在明代居然要靠把《回回历》纂入《授时历》(明代称《大统历》)来弥补其对未来天象预报的不精确性。

再又如,明末清初汤若望(1591—1666)等人成功地把高度西化的《西洋历法新书》推荐成所谓"中华帝国官方历法"(即《时宪历》)的经历表明,任何人想要把中国赤道历法体系与西方黄道历法体系最终"完美"统一起来的方法也许只能够有一种,那就是直接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把"白羊宫"、"金牛宫"等"黄道十二宫"牵强翻译成"降娄宫"、"大梁宫"等"赤道十二星次",以中国历法之名

行全盘西化历法之实。因为,正如这些精明的西方传教士曾经做到过的,唯有这种偷梁换柱之术,才是彻底避免赤道天文学思想与黄道天文学思想之间发生不可调和之冲突的终极"妙法"。(而有趣的是,即使是在这场 17 世纪的"西风东新"真实案例中,我们最终看到的依然是西方的"黄道十二宫"之名被中国的"赤道十二星次"之名所取代而不是恰恰相反,Aries、Taurus 等洋文的译音仍然无法被汉语所接受。)

因此,综上所述,正如瑞士学者 Horace-Bénédict de Saussure(1740—1799) 早就指出过的,相比以"黄道十二宫"为基础的西方天文学,以"赤道十二子午线"为基础的中国天文学,在本质上是一个根本不同的系统——"它是天极的、赤道的,而不是行星的、黄道的……(黄道坐标系则是)观察恒星的偕日出和偕日没,也就是观测黄道附近的恒星在日出前或日没后瞬间的出没。我们都记得古埃及著名的对天狼星的偕日观测。进行这种观测并不需要天极、子午或赤道等的知识,也不需要任何测时系统,它自然地导致人们熟悉黄道各星座,以及距黄道远近不等的和黄道星座同时出没的恒星……"

(2)"逆行"与"顺行"的差别

如果说,中国人选择赤道与西方人选择黄道的差别还仅仅是一个 23.5 度的差别,那么,中国人排列赤道十二星座的"从东往西"顺序与西方人排列黄道十二星座的"从西往东"顺序就完全是一个 180 度的差别了:正如《史记·天官书》之"岁阴左行……岁星右转……"中所明确提示的,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中,无论是十二岁阴(太岁)的每年迁移方向、周天十二星座的环列排序方向,甚或是所谓"四象"("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的占星术数轮回方向,其走向居然都是从东往西"逆向"环列的,即是与"七曜"等所有真实行星的轨道运行方向一"左"一"右"完全相逆的,与巴比伦或西方的黄道十二星座排序是完全相反的(图 2-3)。

那么,东西方天文学这种"逆行"与"顺行"的 180 度之外在形式差异,究竟意味着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内在渊源关系呢?毫无疑问,从天文学的基本概念来说,这只能意味着它们事实上是两大类根本无法互相沟通、互相理解的对立性天文学派,它们完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人使用的"困顿"、"赤奋若"、"摄提格"等按"逆向"排列的十二"岁阴"术语体系根本不可能是从只懂"顺行"不懂"逆行"的古巴比伦人那里舶来的外语译音,而只可能是从只懂"顺行"不懂"逆行"的古巴比伦人那里舶来的外语译音,而只可能是从同样按"逆向"排列的中国本土十二星座、十二地支那里借用派生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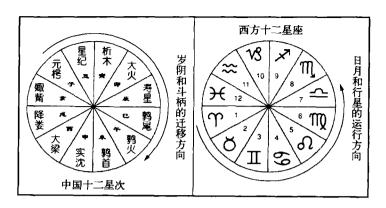


图 2-3 西元前 1 世纪的天文坐标系示意图: 中国顺时针 "左行"十二星次与西方逆时针"右转"十二星座

的。因为,很显然,事实上不要说在古巴比伦或任何西方古国,即使到了今天,对于大多数的西方学者或西式学者们来说,他们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天文坐标系设计成"逆天而行"的,乃至于最终只能炮制出所谓"虚拟天体"的奇谈怪论,硬说中国古人用来纪年的逆向迁移之"太岁"乃是一颗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虚拟行星"云云①(然而,按照最基本的天文学常识,任何"行星"相对"恒星"的视运动总体上都是"顺行"的,只有"恒星"相对"行星"的反向视运动才有可能永远"逆行","太岁"既然只会"逆行"那它就应该是一颗"恒星"而不可能是什么"虚拟行星",详说见后)。而由此我们不难想见,东西方天文学在基本概念上的鸿沟究竟有多么不可逾越,中国天文学渊源自古巴比伦之假说究竟有多么地不合逻辑与事实。

因此,综合以上这些天文学的常识性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丝绸之路还没有开通的远古时代,中国人的天空向右转(左行),古巴比伦人和西方人的天空则向左转(右行),两者从没有融汇沟通过的可能。

(3)"双坐标"与"单坐标"的差别

当然,假如我们要想彻底理解最早的中国天文学究竟为什么要选择"赤道"而非"黄道"、"逆行"而非"顺行",我们还必须去分析东西方天文学的第三

① 参见《辞源》:"太岁,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星名,与岁星相应。又称岁阳或太阳,岁星即木星。古代认为岁星十二年一周天(实际为11.86年)。因将黄道分为十二等分,以岁星所在的部分,作为岁名。但岁星运行的方向为自西向东,与将黄道分为十二支的方向正相反,为避免这种不方便,假设太岁作与岁星实际运行相反的方向运动,以每年太岁所在的部分来纪年。"

个最根本差别,那就是中国天文学的"双坐标"传统与西方天文学的"单坐标"传统之差别。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天文学的两大最核心技术"斗建纪月"和"岁阴纪年"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天球地球双坐标系"概念之上的,它与古巴比伦或西方天文学只依赖单一的"天球坐标系"进行观测计算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技术概念。

众所周知,与苏美尔、埃及等古老文明以"行星"(古代"行星"概念包括日、 月在内)运动作为其主要天文观测对象不同,中国天文学自有历史记载以来, 其观测技术和计时技术就是以"恒星"作为主要对象的。例如,已经被甲骨文 印证了其"析、因、夷、隩"等四方神位关键信息的《尚书·尧典》就可告诉我们, 在远比甲骨文要早的所谓尧舜时代,中国的天文历法主要就是依靠观测"星 鸟、星火、星虚、星昴"这四大恒星星座定四季、依靠观测所谓"璇玑玉衡"北斗 七星定一年十二月的(按,此"鸟、火、虚、昴"四季天象很容易就可判断是西元 前 2000 年以前即"尧舜时代"的天象实录,并非后人杜撰)。而既然中国天文 学是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号称"行星天文学"的"恒星天文学",那么其用来描 述"恒星"迁移的坐标系当然也就要有别于描述"行星"运动的坐标系了. 因 为,顾名思义,所谓"行星"就是相对于"天球坐标系"不断运行移动的天体,而 所谓"恒星"就是相对于"天球坐标系"基本上"恒定不动"的天体,因此,假如有 人说"恒星"也是经常运动的,那他必然指的是相对于"天球坐标系"之外其他 坐标系的运动,例如"大地(地球)坐标系"。也就是说,为了让"恒星"不再"恒 定不动"也运动起来,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无疑是需要天、地两套不同的坐标系 来共同完成其观测和计算的。

而一旦我们能理解到中国天文学其实是建立在"天球坐标系"和"地球坐标系(大地坐标系)"这"双坐标"基础之上的天文学,那么我们对历来争论不休的所谓"斗建纪月"和"岁阴纪年"究竟是指何物就能有一个最终的解答了。

什么叫"斗建纪月"?显然,根据《史记·天官书》记载的"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云云可知,"斗建纪月"其实就是一种以某指定"恒星"及其所在子午线为运动指针、以大地及其"行星"绑定物为固定钟面的双坐标式"恒星钟表"纪月技术:其中,"恒星"与赤道子午线的锁定方位(即杓携龙角=辰、衡殷南斗=丑、魁枕参首=申等等)是按"天球坐标系"标定的,而"恒星"相对于大地的迁移方位(即北斗建子、

北斗建丑、北斗建寅等等)是用"地球坐标系"标定的。至于太阳这颗纪月"行星"在中国天文学中则是被绑定于某一时刻(例如"昏建二日落"、"夜半建二子夜"或"平旦建二日出")而不许其"移动"的。

譬如,在上述记载的三种"斗建纪月"方法中,我们以"夜半建者衡"为例试作分析:相对于"天球坐标系",该"恒星钟表"的运动指针就是"南斗"诸星所在的"星纪(斗、牛)"星座中轴线即"丑"位子午线(18h赤道子午线,西元前104年);当南斗诸星不可见时,该"恒星钟表"的等价备用指针是"衡殷南斗"即同样指向"丑"位子午线方向的北斗七星之斗柄(术语称"衡");相对于"地球坐标系",该"恒星钟表"的固定钟面则是与"夜半时刻之太阳(位于正北子位)"绑定的"地球坐标系"之十二个等分方位:子(正北)、丑(北偏东)、寅(东偏北)、卯(正东)······

因此,当我们把时间倒推至西元前 104 年 6 月 25 日夏至夜半,我们不难 发现当时这座"恒星钟表"的恒星运动指针(天球"丑"位子午线)恰好指向了大 地固定钟面的"午"位(地球正南方向"午"),所以我们称该日所在的月份为"午 月(仲夏月)";

而当我们把时间再继续后拨一月至西元前 104 年 7 月 24 日夜半时刻,我们将发现这座"恒星钟表"的恒星运动指针(天球"丑"位子午线)又恰好指向了大地固定钟面的"未"位(地球南偏西方向"未"),所以我们称该日所在的月份为"未月(季夏月)";

而当我们把时间又更继续后拨一月至西元前 104 年 8 月 24 日夜半时刻,我们将发现这座"恒星钟表"的恒星运动指针(天球"丑"位子午线)又恰好指向了大地固定钟面的"申"位(地球西偏南方向"申"),所以我们称该日所在的月份为"申月(孟秋月)";

而依次类推,我们自然就能得知中国传统的十二个月份为什么会被我们祖先称作"子月"、"丑月"、"寅月"、"卯月"等等的真正原因了(图 2~4)。

什么叫"岁阴纪年"?显然,只要我们弄明白了"子午卯酉"等十二个地支术语在中国天文学的"双坐标"下其本来所具有的双重含义,那么我们对《史记·天官书》中"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的记载就再也不会是一头雾水而需要用什么"真实岁星十虚拟岁星"的理论去牵强解释其"左行"与"右转"的字面矛盾了。因为,正如图 2-4 所示,所谓"岁阴纪年"其基本原理其实和"斗建纪月"完全一样,都是同一类以"恒星"(天球坐标线)为指针、以大地及其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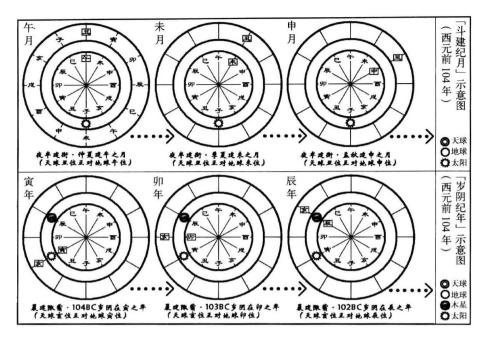


图 2-4 天球和地球双坐标系:中国天文学的"斗建纪月"和 "岁阴纪年"示意图(西元前 104 年)

定行星(地球坐标线)为钟面的"恒星钟表"技术,只不过其所选的"恒星指针"和"绑定行星"都有所不同罢了(即必须用每十二年运行—周天的"木曜"代替每十二个月运行—周天的"日曜")。

例如,根据对《史记·天官书》的相关分析可知,在西元前 104 年开始使用的《太初历》中,其"岁阴(太岁)纪年"选定的"恒星指针"其实就是中国赤道十二星座之一的"陬觜(即营室、东壁)"星座,该星座的中轴线为"天球坐标系"的"亥"位子午线(22h 赤道子午线,西元前 104 年);其"岁阴纪年"选定的"绑定行星"固定钟面则为"晨出东方"的木星,在"地球坐标系"定义下木星被绑定处即为大地东偏南之"辰"位,此外为便于直接观测也可同时绑定凌晨之太阳,在"地球坐标系"定义下太阳被绑定处即为大地东偏北之"寅"位(当然,这就意味着每年实际上只有一个月份是可以直接观测"岁阴"坐标的"窗口时间",其余月份必须结合观测数据作间接推算)。

因此,当我们读到《天官书》记载的"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这段文字时,我们就会明白,这其

实是在说,西元前 104 年的"窗口时间"正月孟春之某日凌晨,当木星位于"监德(斗、牵牛)"星座之内时(天球坐标系"丑"位),"岁阴纪年"的恒星指针(天球"亥"位的陬觜星座)恰好指向了大地固定钟面的"寅"位方向(地球东偏北"寅"),所以我们称该种天象出现的年份为"寅年(摄提格岁)";

当我们读到《天官书》记载的"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人"时,我们就会明白,这是指西元前 103 年的"窗口时间"二月仲春之某日凌晨,当木星"右转"进入了"降入(婺女、虚、危)"星座之内时(天球坐标系"子"位),"岁阴纪年"的恒星指针(天球"亥"位的陬觜星座)恰好"左行"指向了大地固定钟面的"卯"位方向(地球正东"卯"),所以我们称该种天象出现的年份为"卯年(单阏岁)";

当我们读到《天官书》记载的"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时,我们就会明白,这是指西元前 102 年的"窗口时间" 三月季春之某日凌晨,当木星"右转"进入了"青章(营室、东壁)"星座之内时 (天球坐标系"亥"位),"岁阴纪年"的恒星指针(天球"亥"位的陬觜星座)恰好 "左行"指向了大地固定钟面的"辰"位方向(地球东偏南"辰"),所以我们称该种天象出现的年份为"辰年(执徐岁)";

• • • • • •

而依次类推,我们自然就能得到中国传统的十二个年份为什么在十二生肖诞生之前就已经被称作"子年(困顿岁)"、"丑年(赤奋若岁)"、"寅年(摄提格岁)"、"卯年(单阙岁)"等等的真正原因了①(图 2-4)。显然,"岁阴左行"总是针对"地球坐标系"而言的,"岁星右转"总是针对"天球坐标系"而言的,这两者本不矛盾,近代某些著作所谓"太岁是假设的第二木星"之假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总之,通过以上的天文学分析,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上古中国天文学与古巴比伦暨西方天文学的本质区别之所在,那么,作为上古中国天文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神秘汉字以及与之一一对应的十二岁阴纪年术语之起源和本义也就昭然若揭了:正如《史

① 按,由于木星的运行周期并非整数的 12 年,而存在所谓的"超辰"现象,所以在不同时代制定的历法中,年岁的地支名并不一致。事实上,西汉《太初历》的"岁阴纪年"与今日通行的夏历"干支纪年"或"生肖纪年"就并不能直接衔接。例如,《太初历》以西元前 104 年为"寅年(摄提格岁)",但今历则以西元前 104 年为"丑年(牛年)"。关于太岁纪年的起源,作者将另文专述。

记·天官书》等文献所描述的,中国的"十二地支"无论是作为十二条周天子午线的空间方位指代术语,还是作为十二个月份、十二个年份的时间序号指代术语,其所原始对应的本体对象都只能是十二座按照"靠近赤道、逆向排列、可以天地对照互为标识"之原则画出的中国传统星座,而绝不可能是源自按照"靠近黄道、顺行排列、仅用于标识天球坐标"原则画出的古巴比伦十二星座。

三、释十二支、十二月名、十二岁阴、 十二岁名、十二星次

中国"十二支"的本义真的就是指十二座中国星座么?显然,通过我们如上所作的考古学和天文学之多方位分析,对于这个在《史记·天官书》等天文学专业著作中早就言之凿凿的答案,我们本来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证据和理由可以为之投出赞成票了。无论如何,相比于古天文学早有定谳的"十二地支=十二星座",看图说话式的"象形汉字"理论把"寅"说成是箭矢、"辰"说成是蛤蚌、"戌"说成是兵器、"亥"说成是野猪等等①无疑是论据贫乏的。但是,假如我们要想彻底解开中国"十二地支"与中国"十二星座"的渊源关系之谜,我们无疑还有一个基本的阅读障碍问题需要解决。因为,对于大多数不太关注天文学问题的今人来说,假如我们要想直接按字面信息去解读《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律历志》等文献所记载的关于十二地支名称与十二星座名称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表 2-1),那无疑只会更增加我们头脑中信息的混乱程度(中国星座名称包括了十二木星纪岁名、十二星次、二十八星宿共计三种表达方式):

表 2-1 未经"岁差"校正前的岁名、星次与十二地支对照 ("青章"等十二岁名据《史记·天官书》,"诹訾"等十二星次 据《汉书·律历志》,反映了西元前100年左右的天文实况)

岁名=星次(星宿)	地支(子午线)
青章=诹眥(菅室、东壁)	亥
降入=玄枵(婺女、虚、危)	子
监德=星纪(斗、牵牛)	丑(★冬至点)

① 参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

(续表)

岁名=星次(星宿)	地支(子午线)
天皓=析木(尾、箕)	寅
天泉=大火(氐、房、心)	gp gp
大章=寿星(角、亢)	辰(★秋分点)
天睢=鹑尾(翼、轸)	E
长王=鹑火(柳、七星、张)	午
大音=鹑首(东井、與鬼)	未(★夏至点)
长列=实沈(觜觽、参)	申
天津=大梁(胃、昴、毕)	酉
	戌(★春分点)

显然,对于表 2-1 这样的对应关系,即使古文字学水平再高的专家也是无法读懂的:

"子"字(《新华字典》:"指儿女")与"空虚之星"(玄枵、虚)能有什么关系?

"卯"字(《甲骨文简明词典》:"卯,象对剖之形")与"大火之星"能有什么 关系?

"未"字(《说文》:"未,滋味也")与"鬼怪之星"(與鬼)能有什么关系?

"酉"字(《甲骨文字典》:"象酒尊之形")与"大横梁之星"(大梁)又能有什么关系?

.....

那么,以上的这种种字面阅读障碍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毫无疑问,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回答这个关于天文星座的问题,我们首先还得从天文学的一个重要常识"岁差"(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说起。

众所周知,表 2-1 所据的《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律历志》分别是成书于西元前 2—前 1 世纪和西元 1 世纪的两汉著作。然而,殷墟甲骨文却告诉我们,"子午卯酉"等天文学术语的诞生年代是在西元前 19 世纪的商先王"王亥"时代乃至更早。因此,根据天文学的"岁差"数据推算可知,我们如上所进行的妄图用西元前 2 世纪的天象实况资料来直接解读西元前 19 世纪商王王亥时代就诞生了的"子午卯酉"等天文学术语的方法是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的:要知道,正如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们早就指出的,由于地球旋转的本身存在着

"进动"(Precession)分量,所谓"黄道十二宫"或"赤道十二辰位子午线"其相对恒星星座的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从东往西按大约每72年移动1度(或1/360周天)、每2150年移动1宫(30度)或1辰(1/12周天)的速率缓慢移动的;虽然,这种微小的移动在许多短期的场合下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从王亥所处的先商王朝(约西元前22—前17世纪)到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王朝(西元前3—1世纪),岁差值已经超过 $1700/72\approx24$ 度、接近30度,完全达到了移1宫、迁1辰的天文学"改朝换代"标准了。也就是说,是天文学的"岁差"运动之客观存在才最终造成了我们对表2-1的阅读障碍。

因此,只有在我们考虑了天文学的"岁差"效应,即把表 2-1 中所有地支的对应位置都向上移一格(即等于向东回迁 30 度),把"子"的对应星座从"元枵"换成"娵觜",把"丑"(即冬至点所在子午线)的对应星座从"星纪"换成"元枵",以下依次类推,以符合不晚于西元前 22—前 17 世纪的天象(以下为表达方便皆以西元前 2000 年计算),那么,我们亟需寻找的破解"十二地支"之谜的第二份"中国版罗塞塔碑"就会自动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其经过文字勘误后的详情正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岁差"校正后的岁名、星次与地支对应关系 (据《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律历志》上推,陆星原绘制,2009年)

岁 名、星 次	对应地支,岁差校正后 (西元前 2000 年)	对应地支,岁差校正前 (西元前 100 年)
青章=娵觜(营室、东壁)	子	亥
降入=玄枵(女、虚、危)	丑(★冬至点)	子
监聽=星纪(斗、牵牛)	寅	丑(★冬至点)
天皓=析木(尾、箕)	97	寅
天宗=大火(氐、房、心)	辰	卯
大章=寿星(角、亢)	E	辰
天睢=鹑尾(翼、轸)	午	E
长王=鹑火(柳、七星、张)	未	午
天晉=鹑首(东井、與鬼)	申	未
长列=實沈(觜觽、參)	酉	申
天津=大梁(胃、昴、毕)	戌	酉
路踵=降婁(奎、婁)	亥	戌

而由此再联合《尔雅·释天》记载的第一份"中国版罗塞塔碑"(十二支部分),即"地支、月名、岁阴三重同义对照表":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治,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闍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尔雅·释天·岁名》

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尔雅·释天·月名》

那么我们最终就将会得到一幅综合的"十二地支信息密码"全景图了。当然,关于今本《尔雅·释天》中的"十二支"部分,即"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病,四月为余……"云云,我们同样还必须面对一个天文历法方面的阅读障碍,那就是旧注多认为"陬、如、病、余……"这些月名乃是按今人最熟悉的"夏历"排列的,于是《尔雅》的十二月之首月"陬月"就被释读成了"夏历正月";然而,参照《史记·历书》这一天文历法的专业文献所记载的"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月名畢聚,日得甲子"等语可知,所谓"聚(陬)月"本指"子月"(《太初历》十一月),是周历之"正月"(子月)而非夏历之"正月"(寅月),十二月之其余月名亦同。很明显,这一非专业的严重误读是必须予以纠正的。而一旦我们用"陬月三正月三子月"的正确释读代替了"陬月三正月三寅月"的误读①,那么我们可勘误复原出的"十二地支信息密码"全景图最终将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地支、岁名、星次、月名、岁阴综合对照 (陆星原绘制,2009年)

西元前 2000 年的地支、岁名、星次对照表 (据《史记·天官书》、《汉书·律历志》上推)	地支、月名、岁阴对照表 (据《尔雅·释天》、《史记》、《楚帛书》等)
子=青章=娵觜(菅室、东壁)	子=陬=困敦
丑=降入=玄枵(女、虚、危)	丑=如=赤奋若
寅=监聽=星纪(斗、牵牛)	寅=乗=摄提格

① 按屈原的生日就是"陬月",参见《楚辞·离骚》。

(续表)

西元前 2000 年的地支、岁名、星次对照表 (据《史记·天官书》、《汉书·律历志》上推)	地支、月名、岁阴对照表 (据《尔雅·释天》、《史记》、《楚帛书》等)
卯=天晧=析木(尾、箕)	卯=余=单阙
辰=天宗=大火(氐、房、心)	辰—皋—執徐
巳=大章=寿星(角、亢)	巳=且=大荒落
午一天睢一鹑尾(翼、轸)	午=相=敦牂
未=长王=鹑火(柳、七星、张)	未二壮二協治
申=天晉=鹑首(东井、與鬼)	申=玄=涒灘
酉=长列=實沈(觜觽、參)	酉=参=作器
戌=天津=大梁(胃、昴、毕)	戌=辜=淹茂
亥=路踵=降婁(奎、婁)	亥=涂=大淵獻

毫无疑问,现在我们是再也不会在"十二地支"这座神秘而古老的天文学迷宫中迷路了,因为面对甲骨文中每一个地支"字谜"的挑战,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四五倍之多的"武器"可以从容对付:根据表 2-3,我们都至少拥有了一个月名、一个岁阴名、一个岁名、一个星次名来作为其古汉语的同义词和解说词,此外还有两到三个所指恒星大致可知的星宿名称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其天文学来源和沿革的关键线索。下面,我们就根据表 2-3 给出的占星学字义以及图 2-5 给出的甲骨文字形,对"十二支"各字的天文学起源作具体考释如下。

- (1) 释"子=陬=困敦=青章=娵觜=营室"
- ★ 陬: 通娵、媰,按《说文》"媰,婦人妊身也";又通"娶",训嫁娶婚姻。故 月名"陬"的本义是娶妻生子、怀孕。
- ★ 困敦:通"混沌",按人的胎衣古称"混沌衣",今作为中医术语犹如此, 故岁阴名"困敦"的本义是怀胎。
- ★ 青章: 青,古字从丹从生,生亦声,通"性(生)",按《释名》"青,生也"可知,其本义训孳生、生育、性命生机。章,即保障;"章(音 zhuang=幢)"古又通"墥(洞)",训洞穴窟室。故岁名"青章"的本义是生育性命、养育保障、筑巢产卵。
 - ★ 娵觜: 娵通媰,妊娠之意。觜通孳,孳生之意。故星次名"娵觜"的本义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已	辰	卯	寅	丑	子
タ	H	₹	ž	*	8	7	A	44	*	Ą	÷.
7	ħ	₹	26	*	•	ક	Ħ	4	Ŕ	Ŕ	户
4	7	Ŧ	岸	#	ł	7	F	41	A	٦	Ĩ
F	ĸ	Ö	3rc	¥	8	9	RG.		李	â	ဓ
ъJ	『婦子 『婦子 『字 『	₽	ż	*	1		P 1		ト 発		異
4	*	₹	*				P		大辞 [鼓]字		出

图 2-5 甲骨卜辞中的"十二支"字形(西元前 14—前 11 世纪)

是怀孕孳生。

★ 营室: 营,营生之意。室,妻室、家室之意。正如《史记·律书》所云"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也。又,按《夏小正》所载,"营室"星本又名"鞠"星,鞠通育、鬻,《方言》"鞠,养也",训养育、生育。故星宿名"营室(鞠)"的本义是娶妻成家营胎养子。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史记·天官书》所谓"营室为清(青)庙"的"营室"最初是一个完全等同于"青章"天区或"娵觜"所属诸星的、占据 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为靠近赤纬+0°赤经20h(西元前 2000 年)的飞马座 α、β、γ和仙女座 α 四星(alpha Peg, beta Peg, gamma Peg, alpha And,见图 2-6)。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把其东部二星拆分另立为"东壁",而"营室"本身则被削减成为所谓离宫阁道之星"室宿"以专指飞马座 α、β二星。

★ 子: 既然以上陬、困敦、青章、娵觜、营室的本义都是"孕育怀胎",那么子字的本义也应与"孕育怀胎"有关。而据甲骨卜辞,子字如图 2-5 所示原正作一从"囟"之字形(另有简写体略去"×"形只留方框者),该字用特写的胎儿头部(囟门等)指代胎儿全身,犹如甲骨文"牛"、"羊"等字以特写的头部(牛角、羊角)指代牛、羊全身之构思一样。而再参照图 2-6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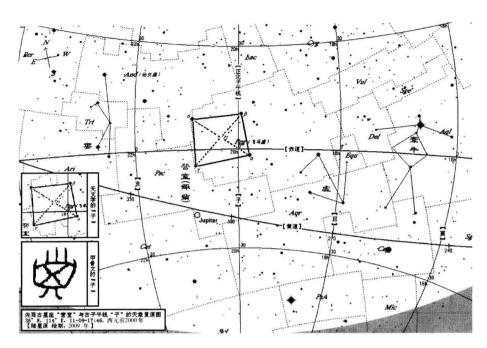


图 2-6

难发现"营室"四星所组成的著名"飞马仙女四方形"(另加飞马座 71 星就构成"囟"字形)与"胎儿头颅的囟字形"之间的"象形"关联。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得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子"应是"孳"和"字"(本义为在室内哺育)的本字,本义是孳生生命营育胎儿;而作为天文学术语,"子"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营室"四星,以及 4 000 年前最初位于"营室"星座内的正北方向(赤经 20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一位。

(而到了 2 000 多年前,该 20h 子午线"子"因"岁差"向西移入了"虚"星座即"降入"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子……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人"。)

- (2) 释"丑=如=赤奋若=降入=玄枵=虚"
- ★ 如:《楚帛书》作"女",通"怒(奴)";如又通"若(喏)",训大声吼喏。故 月名"如"的本义是奋起发怒。
- ★ 赤奋若: 赤,通哧(嚇),训威嚇咆哮。奋,即奋发、奋舞、奋臂武斗。若, 通"喏",训大声唱喏、吼叫。故岁阴名"赤奋若"的本义是嚇吼奋舞。
- ★ 降人:降,训威武降伏。人,古音通"栗",训严栗、威严、威吓。故岁名 "绛人"的本义是动武降伏、威严栗吓。

★ 玄枵: 玄,通咺(喧),即《诗经》所谓"赫兮咺兮"。枵,通号(號)、猇,本义为虎狼的呼号咆猇。故星次名"玄枵"的本义是喧嚇咆猇。

★ 虚: 通嘘(响),据《广韵》"响與吼同"可知,其本义为野兽的嘶吼嗥叫。故星宿名"虚"的本义是嘘嗥咆哮。故《史记•天官书》有云"虚为哭泣之事",哭泣亦武斗伤痛而壮烈悲号之余义。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尚书•尧典》所谓"星虚以殷仲秋"的"虚"最初是一个基本上等同于"玄枵"所属诸星的、占据 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为靠近赤纬+0°赤经 18h(西元前 2000 年)的小马座 α、宝瓶座 β、α、飞马座 θ、ε 五星(alpha Equ, beta Aqr, alpha Aqr, theta Peg, epsilon Peg,见图 2-7)。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把其东部三星拆分出来另立为"危宿"三星,而"虚"本身则被削减成为所谓"虚宿"以专指小马座 α、宝瓶座 β二星。此外,"虚"星座的别名"女(如)"则由其西部邻近的诸小星(宝瓶座 μ、ε等)继承,变成了仍然隶属于"玄枵"的"女宿"。(当然,"女宿"本当读作"怒宿"已经无人知晓了,后人只能望文生义地以为该星宿的造型是一个女孩即"婺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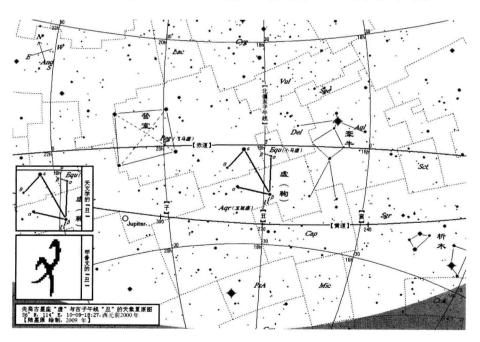


图 2-7

★ 丑: 既然以上如、赤奋若、降人、玄枵、虚的本义都是"奋舞號叫",那么

丑字的本义也应与"奋舞號叫"有关。而据甲骨卜辞, 丑字如图 2~5 所示原正作一扇形三岔羽翅奋张勃怒之态。而再参照图 2~7 复原的古星象, 我们更不难发现"虚"五星所组成的"扇形三岔鸟翅"天象与甲骨文"丑"字造型之间的何其相似。因此, 综合以上分析, 我们的结论是, 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 "丑"应是"妞(古音 hoo=好=号)"和"怒(奴)"的本字(小篆"丑"、"又"混淆不分, "奴"字从其音义看本当从"丑"), 本义是怒号奋舞; 而作为天文学术语, "丑"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虚"五星, 以及 4 000 年前最初位于"虚"星座内的北偏东30 度方向(赤经 18h)天球子午线, 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二位。

(而到了 2 000 多年前,该 18h 子午线"丑"因"岁差"向西移人了"牵牛"星座即"监聽"天区,故《史记》原文作"岁星右转居丑……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聽"。)

- (3) 释"寅=秉=摄提格=监聽=星纪=牵牛"
- ★ 秉:《尔雅》本作"病",据《楚帛书》①之该月名"秉"改正,本义为秉持、 权柄。"秉"又通"彭",训鼓声。故月名"秉"的本义是击鼓发令、主秉。
- ★ 摄提格: 摄,按《说文》"摄,引持也"。提,按《说文》"提,挈也"。格,古通"鞈",训鼓声。故岁阴名"摄提格"的本义是击鼓引导。
- ★ 监聽: 监,古通銮(蓝),训銮铃。聽,通霆,训鼓噪之声响如雷霆、击鼓为号指引军队(今本《史记》"聽"原作"德",形近之訛)。故岁名"监聽"的本义是振铃击鼓、号令。
- ★ 星纪: 纪,古音通施、喜,训旗鼓、喜乐。故星次名"星纪"的本义是施旗 击鼓之大星。
- ★ 牵牛: 牵,即牵引、牵头。牛,按《尔雅·释天》"何(河)鼓谓之牵牛"可知,此"牛"本指牛皮大鼓。按,甲骨文"鼓"字作"壴",上部从"牛"而下部像鼓形(图 2-5),可证《尔雅·释天》所记不虚。鼓为古代行军、围猎、集会、赌赛、歌舞祭祀等集体活动的指挥工具,实有指引领导之大用。故星宿名"牵牛"的本义是击鼓发令牵引指导。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尔雅》所谓"何(河)鼓谓之牵牛"的"牵牛"最初是一个大体上等同于"星纪"所属诸星的、占据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为靠近赤纬+0°赤经16h(西元前

① 按,本书所引《楚帛书》皆指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绘有"十二月神像"的战国楚帛书。可参见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

2000 年)的天鹰座 α,β,γ 、HD 194013、 η,θ,δ 、海豚座 ε 、宝瓶座 ε 、摩羯座 α 共十星(alpha Aql, beta Aql, gamma Aql, TYC 505 - 2355 - 1, eta Aql, theta Aql, delta Aql, epsilon Del, epsilon Aqr, alpha Cap,见图 2 - 8),整体造型作一击鼓之巨人状。因为此星座恰处银河之畔,故号称"河鼓"。而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把"河鼓"巨人的右足摩羯座 α 星拆下来和其附近小星一起组成所谓牛羊牺牲品"牛宿",把巨人的左足宝瓶座 ε 拆下来划归其东部邻居"女宿",把巨人的右手天鹰座 δ 拆下来组成所谓旗鼓相当之"右旗星"(附属牛宿),把巨人的左手海豚座 ε 拆下来组成所谓牺牲供品"败瓜星"(附属牛宿),把巨人的左手海豚座 ε 拆下来组成所谓牺牲供品"败瓜星"(附属牛宿),把巨人的左手海豚座 ε 拆下来组成所谓牺牲供品"败瓜星"(附属牛宿),把原来的"鼓身"拆下来变成所谓牺牲祭神用的鼓槌"天桴星"(附属牛宿)……总之,除了巨人之头颅颈项"河鼓三星"还能作为保留在民间传说中提担挑引两小儿的"牛郎星"外,原来的"牵牛"星座早就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被彻底肢解了。而同样的,"河鼓"诸星本来所共同保有的"摄提星"之光荣称号,也转让给了牧夫座的六颗小星,即转让给了五行谶纬学家眼中的占星学第一号星座"东宫苍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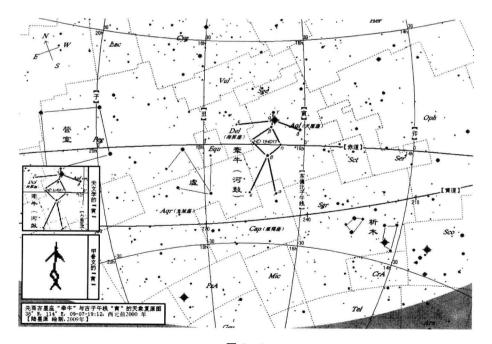


图 2-8

★ 寅: 既然以上秉、摄提格、监聽、星纪、牵牛的本义都是"击鼓引导",那

么寅字的本义也应与"击鼓引导"有关。而据甲骨卜辞,寅字如图 2 - 5 所示原作从大从壹省,"大"为正面人形张两臂以待击鼓(金文更添左右两"又"以突出击鼓的双手),中间之"口"形(或作"○"形、或作"◇"形、或作一横一"口"形)则为"壹"字之省,指一种类似今日之腰鼓的便携式牛皮木鼓或陶鼓(图 2 - 9),古称"提"鼓或"摄提"鼓(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師帥執提"及《注》"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而再参照图 2 - 8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河鼓"十星所组成的"击鼓巨人"天象与"寅"字造型的相似度。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寅"应是"演"和"縯"(本义训为引)的本字,本义是击鼓表演以引导进退;而作为天文学术语,"寅"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牵牛"十星,以及 4 000 年前最初位于"牵牛"星座内的东偏北 30 度方向(赤经 16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三位。





图 2-9 陶寺文化土鼓和马家窑文化陶腰鼓,西元前 25—前 20 世纪 (据《周礼・春官・龠章》郑玄注:"土鼓,以瓦为框,以革为两面,可击之。" 知此类文物原当蒙有牛皮等革面。)

(而到了 2000 多年前,该 16h 子午线"寅"因"岁差"向西移入了"箕"星座即"天晧"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寅·····与尾、箕晨出,曰天晧"。)

- (4) 释"卯=余=单阏=天晧=析木=箕"
- ★ 余: 通餘,即殘餘、餘留。故月名"余"的本义是割殘之餘。
- ★ 单阙: 单,通殚,即殚残、杀灭。阏(e),古音同害(割 ge)、锷(e),即分割、伤害。故岁阴名"单阏(单害)"的本义是殚杀分割。
 - ★ 天皓: 皓,通皓,即桎梏、刑械。故岁名"天皓"的本义是天上的刑械。

★ 析木: 析,按《说文》"析,破木也",即剖析、拆分。故星次名"析木"的本义是像木头一样被劈分剖开,特指一分为二又可合二为一的刑械"桎梏"。

★ 箕: 箕音通剞,训剞刀凿分。故星宿名"箕"(奇)的本义就是剖分。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尔雅·释天》所谓"析木之津、箕斗之閒"的"箕"(奇)最初是一个基本上等同于"析木"所属诸星并兼跨"南斗"天区的、占据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为靠近赤纬+0°赤经 14h(西元前2000年)的、被"劈分"为对称两半的人马座 δ 、 γ 、 η 、 ε 四星和 φ 、 σ 、 τ 、 ξ 四星(delta Sgr, gamma Sgr, eta Sgr, epsilon Sgr, phi Sgr, sigma Sgr, tau Sgr, zeta Sgr, 见图2-10)。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把其东部四星拆分出来作为"南斗斗魁",再加上"斗柄"人马座 λ 、 μ 二星一起另立为"斗宿"六星,而"箕"(奇)本身则被削减成为所谓簸箕星兼口舌争讼星"箕宿"以专指人马座 δ 、 γ 、 γ 、 ε 四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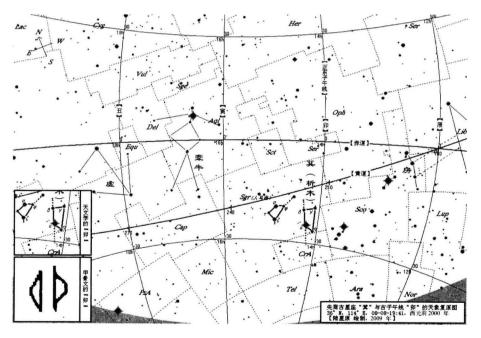


图 2-10

★ 卯: 既然以上余、单阙、天晧、析木、箕的本义都是"刑割桎梏",那么卯字的本义也应与"刑割桎梏"有关。而据甲骨卜辞,卯字如图 2-5 所示原作被剖开的左右对称之两半圆形(或作两半方形),正中两平行竖线兼为指事符号,

指示其两分切口,整个字形正如《甲骨文简明词典》等所指出的是"象对剖之形",实则就是"桎梏"之形。而再参照图 2-10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上古"箕"(奇)八星所组成的"箕宿四星与南斗斗魁四星左右对仗分列"之天象与"左半块与右半块被刀斧切开"之卯字字形的同构关系。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卯"应是"劉"(劈殺)和"铆"的本字,本义是劈割、铆梏(甲骨文常见之"卯祭"即用劈割之小块牲肉代替全牲祭祀)。而作为天文学术语,"卯"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箕"(奇)八星,以及4000年前最初位于"箕"(奇)星座内的正东方向(赤经14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四位。

(而到了 2 000 多年前,该 14h 子午线"卯"因"岁差"向西移入了"房"星座即"天宗"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卯……与氐、房、心晨出,曰天宗"。)

- (5) 释"辰=皋=执徐=天宗=大火(明堂)=房"
- ★ 皋:《广韵》"皋,高也",本通高,按《说文》"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甲骨文"高"字之形正像一带斜坡屋顶的高台建筑物。故月名"皋"的本义是高耸倾危的建筑物。
- ★ 执徐: 执,古音通"矢(仄)",《说文》"矢,倾头也;仄,侧倾也",训倾斜。徐,为"斜"的本字,亦通"邪",本义为倾斜、邪而不正。故岁阴名"执徐"的本义是偏矢倾斜。
- ★ 天宗: 宗,按《说文》"宗,尊祖庙也",即指宗庙等大型建筑物。故岁名 "天宗"的本义是天上的危危庙堂。(今本《史记》作"天泉","泉"为"宗"之形 讹,据《汉书》引《石氏》"曰名天宗"订正。)
- ★ 大火: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大辰……火房也"以及《史记·天官书》 "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之记载可知,心宿(大辰)所属的最亮恒星"大火" 古又称"火房"、"明堂",而"大火"则是指能震动倾摇大堂高房的电光雷火。故 星次名"大火"(明堂)的本义是指震斜堂房的雷火。
- ★ 房: 通"庞",本义为高屋;又通"旁",训旁侧、倾斜。故星宿名"房"的本义就是高危欲倾的楼房。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曾侯乙墓"二十八星宿图"所谓"民祀惟房,日辰于维"的"房"最初是一个在中国最受重视的大星座,是一个完全等同于"天宗"天区的、占据 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有两组,其一为位于赤纬+0°赤经 12h(西元前 2000 年)附近的天蝎座 β 、 δ 、 π 、 ρ 和天秤座 β 、 α 、 σ 七星(beta Sco, delta Sco, pi Sco, rho Sco, beta Lib,

alpha Lib, sigma Lib, 见图 2-11),代表了"倾斜震摇的房子";其二则为更东面一些的、因而起源可能更古老的天蝎座 α 、 σ 、 τ 三星 (alpha Sco, sigma Sco, tau Sco, 见图 2-11),由于天蝎座 α 为著名的红超巨星,正像夜空里的一团红火,所以其天然代表了"震摇房屋的电光雷火"。而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把"房子"的"斜坡房顶"拆掉,把其中的天秤座 β 、 α 二星加上 γ 、 α 二星一起另立为所谓苍龙之胸"氐宿"(邸宅之宿),天蝎座 α 等三星则彻底独立为所谓苍龙之心"心宿",而"房"被削减后残留下的天蝎座 β 、 β 、 δ 、 α 、 α 四星则成为所谓天驷马房之"房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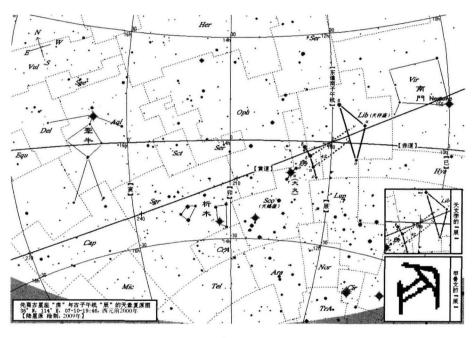


图 2-11

★ 辰: 既然以上皋、执徐、天宗、明堂(大火)、房的本义都是"被雷电震摇的斜房子",那么辰字的本义也应与"被雷电震摇的斜房子"有关。而据甲骨卜辞,辰字如图 2-5 所示正是作一斜侧歪倒的斜坡顶房子之象形。而再参照图 2-11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上古"房"七星所组成的"倾斜的房子"之天象与甲骨一期卜辞中"倾斜的房子"之辰字字形拥有完全同构的关系。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辰"应是"宸"和"震"的本字,本义是震摇倾危的高堂宸宇。而作为天文学术语,"辰"则专

指中国上古星座"房"七星或"大火"三星,以及 4 000 年前最初位于"房"星座内的东偏南 30 度方向(赤经 12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五位。

(而到了 2 000 多年前,该 12h子午线"辰"因"岁差"向西移入了"亢"星座即"大章"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辰……与角、亢晨出,曰大章"。)

- (6) 释"巳=且=大荒落=大章=寿星=亢"
- ★ 且:通"相",据《说文》"相,木閑也"可知本义为门栏;又通"阻",本义为险阻屏障、门隘阻隔。故月名"且"的本义是门栏阻隔。
- ★ 大荒落: 荒,按《礼·丧大记注》"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即蒙蔽障掩之物;荒又通櫎、框,可训门栏、门框。落,即篱落、藩篱、篱笆门墙,见《晋书·天文志》"落,天之籓落也"。故岁阴名"大荒落"的本义就是网罗森严的篱落门墙。
- ★ 大章:章,通障,即障隘、障塞、屏障、门障。故岁名"大章"的本义是巨大的门障。
- ★ 寿星: 寿,通幬,本义为覆幬、门帷;又通焘,本义为覆焘、庇护。故星次名"寿星"的本义是门帷护焘之星。当然,考虑到门户可以预防贼敌蛇兽、保障生命的安全健康,门户坚固好比买了人寿保险,故"寿星"也有"长寿健康星"的意思,上古的"南极老人星"其实本就指此星(今船底座α星被称为"南极老人星"是战国秦汉以后的事情)。
- ★ 亢:通閱,本义为閱閬高門;又通抗,本义为抗阻险隘。按,《史记·天官书》明言"亢为疏庙……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可知"亢"本来就叫"南门"。此外,今南鱼座 α星(alpha PsA)古称"北落师门",由此寻绎推理可知"亢"就是"大荒落南门","北落师门"和"大荒落南门"这两星一北一南,一近子一近午,都叫"落",都叫"门",适可互相印证。故星宿名"亢"的本义就是抗御危险的閱閬高门。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史记》所谓"亢为疏庙(荒即疏)"的"亢"最初是一个基本上等同于"大荒落"天区或"寿星"所属诸星的、占据 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为靠近赤纬+0°赤经 10h(西元前 2000年)的室女座λ、κ、ι、υ、ζ、α 六星(lambda Vir, kappa Vir, iota Vir, upsilon Vir, zeta Vir, alpha Vir,见图 2-12)。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把其西部二星拆分另立为所谓苍龙之角的"角宿"(据《史记·正义》云"角星为天关,其间天门",可证"角宿"原是从"南天门"拆下来

的),而"亢"本身则被削减成为所谓苍龙之颈的"亢宿"以专指室女座 λ,κ,ι,ν 四星①。而同样的,"亢"六星原本所保有的"南门星"、"南极老人星"等光荣称号,也从此分别转让给了半人马座 α 星、船底座 α 星等其他恒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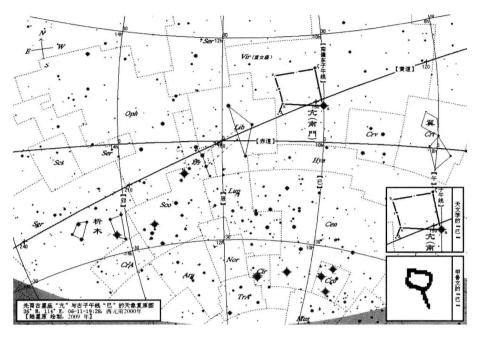


图 2-12

(按,"亢"之所以也可被称为"南门"、"寿星"、"南极老人星"等等,原是出于古天文学按"地球坐标系"方位排比转借而来的"天球坐标系"赤道经度定位术语,即以亥、子、丑方向为北,以已、午、未方向为南,故南鱼座α星虽然身在天球南半球深处却犹被中国人称为"北落";但后世的阴阳五行占星学则混淆了"双坐标"概念而把经度之南北篡改成了纬度之南北,于是南门星和南极老人星就都真的"搬家"到南极圈附近去了。不过,简单的天文数据计算告诉我们,今日星图上之"南极老人星"即船底座α星,其作为一颗南天恒星,在先商和商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终年处于天球"恒隐圈"之内的,当时的安阳地区居民根本没有看到过它们的可能性。)

① 按,据湖南省博物馆藏之唐代铜镜上的"二十八星宿图",亢宿一、二、三三星原为一直线排列,故"亢宿三"原当指室女座 v 星而非晚近星图所列的并不排在一直线上的室女座 ϕ 星。

★ 已: 既然以上且、大荒落、大章、寿星、亢的本义都是"门户屏障",那么已字的本义也应与"门户屏障"有关。而据甲骨卜辞,已字如图 2-5 所示原作一口加一竖之"P"字形,与"户"字十分接近。而再参照图 2-12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上古"亢"六星所组成的天象也是"P"字形。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已"应是"戺"和"闱"(古音yì=祎=以,可通 sì=似)的本字,本义是槛戺门闱。而作为天文学术语,"巳"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亢"六星,以及 4 000 年前最初位于"亢"星座内的南偏东 30 度方向(赤经 10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六位。

(而到了 2 000 多年前,该 10h 子午线"巳"因"岁差"向西移入了"翼"星座即"天睢"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巳……与翼、轸晨出,曰天睢"。)

- (7) 释"午=相=敦牂=天睢=张(鹑尾)=翼"
- ★ 相: 相为成语"相羊"之略语,又作"相翔"、"徜徉"、"倡佯"、"彷徉"等。相,即相辅相托、守望看护;羊通祥,即平安祥和。故月名"相"的本义就是相辅看护、凭靠安祥。
- ★ 敦牂: 即"享羊"、"相羊",同上。故岁阴名"敦牂"的本义也是相看安详。
- ★ 天睢: 睢(hui)通"徽",本义为徽索缠缚、绳捆看守。故岁名"天睢"的本义就是上天的徽缠看守者。
- ★ 张(鹑尾):按,《广雅》云"张谓之鹑尾",知十二星次之"鹑尾"或名 "张"。"张",《楚帛书》作"倉",皆通"常",训张弓守卫、恒常安定、常羊、徜徉。 故星次名"张"(鹑尾)的本义也是徜徉安详。

图 2-13),其形状作弓矢之形,喻义张弓守护。而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把"翼"附属的弓矢形六星正式另立为"轸宿"和"左右辖"(因为轸、车的喻义是乘车安坐、凭托承载,与"馮翼"之喻义类似,可知其本属同一星座体系),而"翼"的主体"8"字形"安全绳"七星则被解体重组,最终和周围的大量暗淡小星一起重构成了所谓朱雀之翅膀"翼宿"二十二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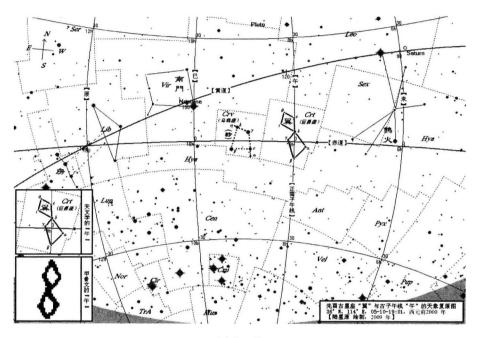


图 2-13

★午: 既然以上相、敦牂、天睢、张(鹑尾)、翼的本义都是"看护安靠",那么午字的本义也应与"看护安靠"有关。而据甲骨卜辞,午字如图 2-5 所示原正作一根"8"字形的"安全绳"。而再参照图 2-13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上古"翼"七星所组成的天象也是"8"字形。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午"应是"卸=御(神)"、"幺=幽"的本字,本义为缚止安卸、守御安系、幽囚看守(按甲骨文"午"字与作为偏旁的"幺"字字形全同而读音为一声之转,可证本为一字)。而作为天文学术语,"午"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翼"七星,以及 4 000 年前最初位于"翼"星座内的正南方向(赤经 8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七位。

(而到了2000多年前,该8h子午线"午"因"岁差"向西移入了"柳"星座即"长王"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午……与柳、七星、张晨出,曰长王"。)

- (8) 释"未=壯=協洽=長王=鹑火=柳"
- ★ 壯:即壮硕身肥。又通"脏",即脏腑胃口。故月名"壯"的本义是身壮 肠肥、开胃贪食。
- ★ 協治: 協,古通"汁",即汤汁美味。治,即滋味融治、适合。故岁阴名 "協治"的本义就是滋味调和、协洽适口。
- ★ 長王: 長,即肥壮长大;又通"餦",即餦餭,甜美的饴糖。王,通"鵟",据《山海经》本训五色有冠之鸟,其义同"鹑",都是喻义像鸡雉、鹑、鵟那样整日啄食不停地疯狂"贪吃"行为(见下条"鹑火"释文),故岁名"长王"的本义就是身长肚肥、疯狂贪吃。
- ★ 鹑火: 鹑,通"享"、"烹",即烹调美味、享受美味。火,指厨房灶火。又,据《左传·襄公九年》"咮为鹑火"可知,星次"鹑火"古本名"咮"。而据《尔雅·释鸟》"生哺鷇,生噣(咮)雏"及《疏》"鸟子生,须母哺而食之,名觳,谓燕雀之属也;鸟生子而能自哺食者名雏,谓鸡雉之属"云云可知,"咮"(鸟嘴)的本义是指鸡雉、鹑鸽等鸟类的整日啄食不停之"贪吃"本能。故星次名"鹑火"的本义就是厨灶和啄食贪吃之星。
- ★ 柳: 柳(榴)通"餾"、"穆"(音卯)、弊,训禾麥、粮餾、烹饪饭食。又《晋书·天文志》云"柳八星天之厨宰也",可知"柳"原为中国的厨神兼食神。故星宿名"柳"的本义就是厨中的美食。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尔雅》所谓"柳,鹑火也"的"柳"最初是一个基本上等同于"鹑火"所属诸星的、占据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为靠近赤纬+0°赤经 6h(西元前2000 年)的长蛇座 α、ι、θ、ν1、λ、狮子座 α、ο 七星(alpha Hya, iota Hya, theta Hya, upsilon1 Hya, lambda Hya, alpha Leo, omicron Leo,见图 2-14)。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在 6h 子午线西移等主客观因素影响下,把原来"柳"的最西一星长蛇座 θ拆分出来连同其更西部诸星共同组成新的所谓朱雀之嘴"柳宿"八星,把原来"柳"的最东二星长蛇座 ν1、λ连同其附近诸星共同组成所谓朱雀之嗉囊"张宿"六星,把狮子座 α、ο二星拆分给附属"星宿"的所谓南宫之权"轩辕"星官,而包括真正的橘红色"鹑火星"长蛇座 α 在内的"鹑火七星"则仅剩二星,后人为了附会"七星"之古名便又凑合其附近的小星组成所谓朱雀之颈"星宿"七星,不过,这全新的压缩版的

"七星"就再也不是当年《尧典》所谓"日中星鸟(鹑火)以殷仲春"的全天四大标志星座之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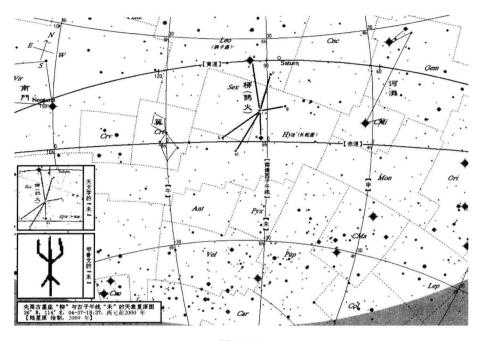


图 2-14

★ 未: 既然以上壮、協洽、长王、鹑火、柳的本义都是"吃食美味",那么未字的本义也应与"吃食美味"有关。而据甲骨卜辞,未字如图 2-5 所示正作一株谷穗茁壮的谷物形状。而再参照图 2-14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上古"柳"七星所组成的天象也是"未"字形。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未"应是"味"和"胃"的本字,本义是饱食美味开胃贪吃。而作为天文学术语,"未"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柳"即"七星",以及4000年前最初位于"柳"星座内的南偏西30度方向(赤经6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八位。

(而到了2000多年前,该6h子午线"未"因"岁差"向西移入了"與鬼"星座即"大音"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未……与东井、與鬼晨出,曰大音"。)

(9) 释"申=玄=涒灘=天晉=东井(鹑首)=與鬼(河漢)"

★ 玄: 据卜辞字形和字音分析,玄当为"縣"(懸)的本字,本义为懸系、承担、负载;玄又通泫,按《集韵》"困泫,水深廣貌"。故月名"玄"的本义就是指能

够载舟承物的深广大水。

- ★ 涒攤:"涒"古音煜,通"薀(蕴)";本义为蕴含、包藏、载纳;又据《集韵》音通"渊",训深渊井泉。灘通"漠",即大水、天漢;灘又通"攤"、"担"、"撣",本义为担举、懸系、承载。故岁阴名"涒灘"的本义也是指能够载舟担物的深广大水。
- ★ 天晉: 晉音通"涒"(《史记》"天晉"形讹为"大音",今据《汉书·天文志》 引《石氏》订正)。故岁名"天晉"的本义也是"涒灘"。
- ★ 东井(鹑首):按,《博雅》云"东井谓之鹑首",知十二星次之"鹑尾"本名 "东井"。东井,按《史记》"东井为水事",即指位于银河东面另外的大井水、大水源,即"井水不犯河水"这一成语的真正原始含义。故星次名"东井"(鹑首)的本义就是位于银河东面的人工开挖水利设施。
- ★ 與鬼(河漢): 與,通"舁",本义为共举、舁抬、承载;舁之互训字"共"又 通"洪",即洪水。鬼,通"裹 huai"、"懷"、"淮",按《释名》"淮,圍也",即四周懷 抱围绕之大水。故星宿名"舆鬼"的本义就是能够舆载舟船懷抱容物的深广大 水。此外,据《新唐书》"舆鬼居两河之阳"可知,假如考虑岁差因素,"舆鬼"作 为标志星座在上古本来还应该包括其近邻"两河"即著名的"南河三星"和"北 河三星",因为,"两河"的"河(荷)"训担荷、载荷,明显也是"涒灘"、"舆鬼"的同 义词。因此,假如再考虑到"南北两河"其实正坐落在"天漢(银河)"之上,我们 不妨把该古星座合璧简称为"河漠"(此名并非仅是拼凑所得,中国古文献中本 就有实用例证,参见本文第五篇)。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新唐书》 所谓"舆鬼居两河之阳"的"舆鬼"最初是一个完全等同于"涒灘=河漠"天区 的、占据 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有两组,其一为靠近赤纬 $+0^{\circ}$ 赤经 4h(西元前 2000 年)的小犬座 β , ϵ , α 和双子座 ρ , β , α 六星 $(beta\ CMi,$ epsilon CMi, alpha CMi, rho Gem, beta Gem, alpha Gem,见图 2-15),是为堪 与其浩瀚银河之背景相抗衡的"南北双河";其二则为更东面一些的、起源应该 更古老的巨蟹座 θ、η、γ、δ 四星 (theta Cnc, eta Cnc, gamma Cnc, delta Cnc, 见图 2-15),其四方形的造型代表了一口人工开挖的"井水"。而直至春秋战国之 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在4h子午线西移的背景下把 "东井为水事"的光荣称号转让给了其更西部的双子座 7 星等八星组成所谓 "井宿"(但其形状却并不像井);而"與鬼"的名字则已经被演绎成了《史记》所 谓的"鬼祠事",并和著名的"积尸气"(NGC2632/M44)一起变成了所谓朱雀之

眼"鬼宿";至于原本视星等最高也最著名的南北"两河"六星由于位置不尴不 尬恰恰处于"井宿"和"鬼宿"的中间,因而就被排除在了"二十八宿"标志星之 外,从此退出了中国天文学的主流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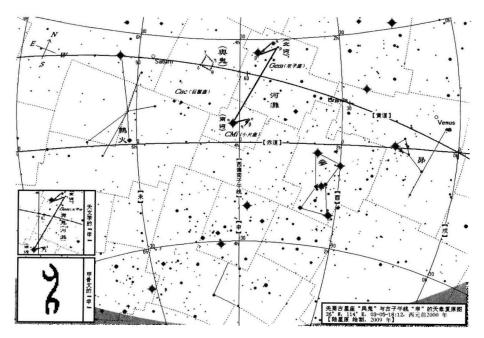


图 2-15

★ 申: 既然以上玄、涒灘、天晉、东井(鹑首)、與鬼(河漢)的本义都是"水能载舟容物",那么申字的本义也应与"水能载舟容物"有关。而据甲骨卜辞,申字如图 2-5 所示原作一近似"Z"字形的构造,正像一波三折绵延伸展、南北对称的运河模样。而再参照图 2-15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上古"涒灘"六星所组成的天象也是"Z"字形。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申"应是"绅"和"淹"(所从部首为"水"、"大"、"申")的本字,本义是能绅约载系、淹没包容的大水。而作为天文学术语,"申"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與鬼"四星与"两河"六星,以及 4 000 年前最初位于"與鬼"星座内的西偏南 30 度方向(赤经 4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九位。

(而到了2000多年前,该4h子午线"申"因"岁差"向西移入了"参"星座即"长烈"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申……与觜觿、参晨出,曰长列"。)

(10) 释"酉=》=作器=長列=參神(實沈)=参"

- ★ 學:《尔雅》原作"陽",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作"易",实际上都是曑字之讹(曾侯乙墓天文图正作从"日、人、乡")。曑即"参宿三星"的专用字,原作"参"(叁)。但"参宿"其实并不仅有三颗星而是至少有七颗标志星,把七颗星特称为"参"还应有别的意思,即"参"通"斟",训斟酒勺器。故月名"曑"的本义就是参豫作为、堪为器用。
- ★ 作器:《尔雅》原作"作噩",按金文"器"与"噩"几同一字,极易误识。作器,即制作器具。故岁阴名"作器"的本义就是大器有为。
- ★ 長列:长,即擅长、特长技能;长又通"瓺",即器皿、器具。列,《汉书》作烈,烈通"裂",训裁裂、裁制、制造(列、制二字古文音、形、义皆近)。故岁名"長列"的本义就是器能、制造。
- ★ 參神(實沈):按,《左传》云"實沈,參神也",知星次名"實沈"本名 "參"。故星次名"參"(實沈)的本义同上。(按"實沈"本为族名,即尧臣"和 仲氏",其职责为"平秩西成"即观测"西宫白虎叁星",故后世奉其为參神,详 见后文。)
- ★ 參: 同曑。故星宿名"参"的本义也是参豫、器用。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史记》所谓"参为白虎"的"参"最初是一个完全等同于后世占星学所谓"白虎七星"的、占据 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为靠近赤纬+0°赤经 2h(西元前 2000 年)的猎户座 ζ、ε、δ、α、γ、κ、β七星(zeta Ori, epsilon Ori, delta Ori, alpha Ori, gamma Ori, kappa Ori, beta Ori, 见图 2-16)。众所周知,此七星图案是全天最易识别的"无疆界星座",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类对其都有惊人的认同,只不过古埃及人称其为复活神兼丰饶神 Osiris,古希腊人称其为神猎手 Orion,先商的中国人则称其为巧匠神"作器"。因此,此一星座在中国天文史上有着与众不同的命运,即使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此星座仍然可以保持完璧,只不过在"参"的古老名字之外又被赋予了"白虎"的别名,变成了所谓"白虎七宿"的核心星宿"参宿"。
- ★ 酉: 既然以上曑、作器、长列、参的本义都是"器用",那么酉字的本义也应与"器用"有关。而据甲骨卜辞,酉字如图 2-5 所示原作一酒器之形。而再参照图 2-16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上古"参"七星所组成的天象也是酒坛之形。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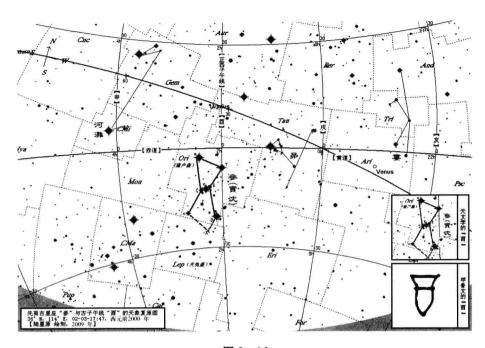


图 2-16

"酉"应是"猷"和"就(酒)"的本字,本义是智用猷谋、巧造器具、酿就事业,正如《说文》所云"酉,就也"。而作为天文学术语,"酉"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参"七星,以及 4 000 年前最初位于"参"星座内的正西方向(赤经 2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十位。

(而到了2000多年前,该2h子午线"酉"因"岁差"向西移入了"昴"星座即"天津"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酉……与胃、昴、毕晨出,曰天津"。)

- (11) 释"戊=辜=淹茂=天津=大梁=昴"
- ★ 辜: 即辜權、估计、待价而沽,"辜"字今又作估、沽等;辜(gu)又通賈(gu),即商賈们按量计價公平交易。故月名"辜"的本义是估量和贸易。
- ★ 淹茂: 淹(奄),通敛,即掩藏、敛财、奄有财富。茂,通贸,即贸易、财源 广茂。故岁阴名"淹茂"的本义就是奄聚财富和贸易。
- ★ 天津: 津,通"肆"、"市",即市肆、市卖,故岁阴名"天津"的本义就是天之商贸市肆。(今本《史记·天官书》正文"天津"作"开明",据《史记·集解》"徐广曰"订正。)
 - ★ 大梁: 梁,通"量",即称量计价。故星次名"大梁"的本义就是巨大的称量物。

★ 昂:通"贸",即贸易互利、公平计价。又,曾侯乙墓"二十八星宿图"之该星名不作"昴"而作从木从一点之古字(图 2-5),正像一木为秤杆横梁、中间一点为天平秤支点的象形。故星宿名"昴"的本义也是公平贸易、公平秤量。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尔雅》所谓"大梁,昴也"的"昴"最初是一个完全等同于天秤之星"大梁"的、占据 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为靠近赤纬+0°赤经 0h(西元前 2000 年)的金牛座 Pleiades 星团("昴星团")即"天平右臂"、金牛座 ν星(nu Tau)即"天平左臂",以及金牛座 ε、δ3、δ1、γ、α、61、71、λ 八星组成的"天平悬架"(epsilon Tau, delta3 Tau, delta1 Tau, gamma Tau, alpha Tau, theta1 Tau, 71 Tau, lambda Tau,见图 2-17),如果把Pleiades("昴星团")总计为一星则"昴"原共有十星。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把明亮耀眼的"天秤悬架"八星拆下来另立为所谓捕兔子之网"毕宿"("毕"通"逼=富"),而"天平左右臂"在失掉了支点之后自然再也无法保持平衡,其"右臂"的昴星团由于位置尚佳、亮度尚可而还能勉强被保留为所谓胡星"昴宿"("胡"通"辜"),其"左臂"的 ν星则由于位置既偏、亮度又差而最终在中国人的星图上被彻底抹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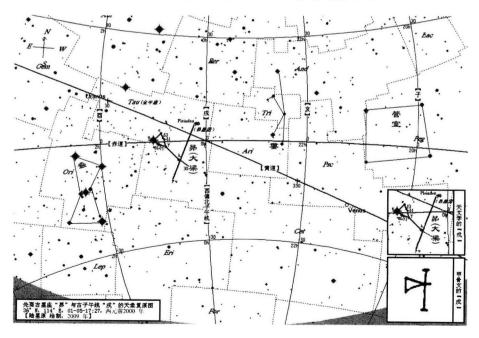


图 2-17

★ 戌: 既然以上辜、淹茂、天津、大梁、昴的本义都是"贸易秤量",那么戌字的本义也应与"贸易秤量"有关。而据甲骨卜辞,戌字如图 2-5 所示原正作一侧卧的杆秤之形,其两头带短横的一竖为秤杆,其左侧居中的三角形则为杆秤的悬架,"秤杆"与"三角悬架"的交叉处即物理学的"杠杆支点"。而再参照图 2-17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上古"昴"十星所组成的天象不仅形状是同样的"杆秤",而且当其升到正南中天时的位置也是向同样方向"侧卧"的。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戌"应是"咸"和"成"的本字,本义是两端重量咸同、计量公平有成,有如衡重工具杆秤或天平一般。(正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载"夏书曰'地平天成',称也",上古"成"与"平"本为同义词,平即"天平秤",成即"称"和"秤"的本字;而《史记》之所以说"西宫咸池"而不说"西宫白虎",也正说明作为"西宫"天区最重要成员的"昴"本叫"咸池",即两端咸同、一平如池水的天秤之星。)而作为天文学术语,"戌"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昴"十星,以及4000年前最初位于"昴"星座内的西偏北30度方向(赤经0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十一位。

(而到了2000多年前,该0h子午线"戌"因"岁差"向西移入了"娄"星座即"路踵"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戌……与奎、娄晨出,曰路踵"。)

- (12) 释"亥=涂=大淵獻=路踵=降婁=婁"
- ★ 涂: 同途,即路途、道路,水路叫"溝涂",陆路叫"途径";又通塗,指泥土。故月名"涂"的本义是道路和泥土。
- ★ 大淵獻: 淵,通蜵,即"蜵蜎";獻通巘(yan)、巗,即"巉巗"。渊獻,即古成语"巉巗"、"巉临"、"巉岏"、"蜵蜎"、"蜿蜒"、"蝉娟"等之异写,本义为蜿蜒盘旋的山路和巉巗的山石。宋玉《高唐赋》云"登巉巌而下望兮",《诗·大雅》云"陟則在巘,復降在原",可见巉巌、巘都是可以登、陟的山路土石。故岁阴名"大渊獻"的本义就是巉巌的山路大道和土石。
- ★ 路踵:路,即道路。踵,即踵迹、足迹、踪迹、径迹。《史记》—本作"跰踵",义同。故岁名"路踵"的本义是路径足迹、足踏尘土。
- ★ 降婁: 降,本义为下降而行、下脚履践。婁,通屨、履,即屦踏之迹、足下之土。"降婁"又作"奎婁",奎通逵,即逵衢大道。故星次名"降婁"的本义就是行走的道路、践踏的泥土。
 - ★ 婁: 通屨,同上训履足践土。又《史记·天官书》云"奎······为沟渎",可

知"奎婁"本是中国占星术中主管水道沟渎、土石堤防的星神。故星宿名"婁"的本义也是道路足迹和堤垄土石。而由以上综合考证的推论可知,《尔雅》所谓"降婁,奎婁也"的"婁"最初是一个完全等同于"降婁"所属诸星的、占据 1/12 赤道大圆的上古赤道星座,其标志恒星为靠近赤纬+0°赤经 22h(西元前 2000 年)的白羊座 α 、 β 、三角座 α 、 β 、 γ 和仙女座 γ 六星 (alpha Ari, beta Ari, alpha Tri, beta Tri, gamma Tri, gamma And,见图 2-18)。直至春秋战国之际拆分十二子午线星座为"二十八星宿",人们才把"奎婁"之古星名一拆为二,把"奎"字张冠李戴地送给了其更西部的仙女座和双鱼座十六颗星组成所谓"封豕"之星"奎宿",而"婁"本身则被削减成为所谓天獄之星"婁宿"以专指白羊座 α 、 β 和三角座 α 三星 $\mathbb Q$,另外的三角座 β 、 γ 、仙女座 γ 三星则被附属"婁宿"的新编星官"天大将军"夺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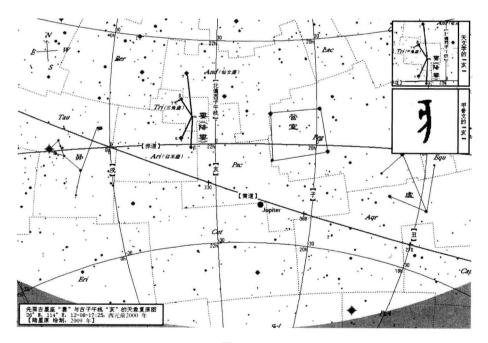


图 2-18

★ 亥: 既然以上涂、大淵獻、路踵、降婁、婁的本义都是"路土足迹",那么

① 按,据湖南省博物馆藏之唐代铜镜上的"二十八星宿图","娄宿二"原当指三角座 α星(在今日某些星表上名为"娄宿增六")而非晚近星图所列的白羊座 γ星。

亥字的本义也应与"路土足迹"有关。而据甲骨卜辞,亥字如图 2-5 所示原作野兽(或兽身神祇)的一足三趾而向下岔开之形,类似甲骨文的"夊(各)"字,(只不过"夂"是人足趾而"亥"是兽足趾)而上加一横则为指事符号(类似甲骨文"止"下加一横为"之"字)。而再参照图 2-18 复原的古星象,我们更不难发现上古"婁"五星所组成的天象也是同样的"一脚三趾"造型。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作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亥"应是"骸"(胫骨、腿足)和"垓"(路阶、土地)的本字,本义是骸胫足迹、垓阶路土。而作为天文学术语,"亥"则专指中国上古星座"婁"六星,以及 4 000 年前最初位于"婁"星座内的北偏西 30 度方向(赤经 22h)天球子午线,即周天十二地支方位的第十二位。

(而到了 2 000 多年前,该 22h子午线"亥"因"岁差"向西移入了"营室"星座即"青章"天区,故《史记》原文作"星居亥……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

四、战国楚帛书所见十二月神像考

中国的天文学术语"摄提格"真的是古巴比伦语"SU. PA"(大角星)之译音吗?中国的天文学术语"敦牂"真的是古巴比伦语"Gu. An"(金牛宫)之译音吗?中国的"十二岁阴"真的是源自古巴比伦或其他外来文化吗?毫无疑问,通过以上的分析,天文学和古文字学的综合证据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距今至少有3800多年历史的中国"十二岁阴=十二星座=十二地支"其可能是来源自3000年前才初具雏形的古巴比伦十二星座或任何外来影响的几率等于零,以"赤道十二星座"和"十二地支纪月"为标志的中国天文学绝对是中国人的原创发明。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即使是在西元前2000年的先商星图上(见图2-6至图2-18),中国十二星座的位置在总体上仍然是偏处十二子午线以东的这一事实,我们完全还可以推测,基于"岁差"这架"天文时钟"的测量和暗示,中国的"十二星座"文化甚至还可能有比王亥时代或西元前2000年更加古老千年的起源。

中国的天文学术语"寅"真的是指"箭矢"吗?中国的天文学术语"戌"真的是指"兵器"吗?中国的甲骨文真的都是靠"看图说话"就能直接读得通的所谓原始"图画文字"吗?毫无疑问,通过以上的分析,《尔雅·释天》这份中国最古老的"古今同义字典"已经明确告诉我们:中国甲骨文和金文所反映的造字思想之抽象性和成熟性绝非如我们传统所想象的那样低级原始,中国古文字学

的所有传统理论和字典中的大量传统解释都完全有重新检讨和重新改写的必要。正如古埃及圣书字之"猫头鹰"形字符并不是指一只鸟而是指脱离了字面图形的声音符号"m"那样,中国甲骨文中以干支二十二字为代表的许多"字根"级汉字其实都是脱离了具象字形的抽象文字:"寅"字虽然取象于"鼓"(不是"箭矢")却并不直接指名词"鼓"而是指动词抽象概念"摄提格"(引导);"戌"字虽然取象于"秤"(不是"武器")却并不直接指名词"秤"而是指动词抽象概念"奄贸"(聚财、贸易);"酉"字虽然取象于"酒坛"却也并不直接指名词"酒坛"而是指动词抽象概念"作器"(制作、成就、酝酿);"甲"、"乙"、"丙"、"丁"等天干十字更不是指其本身所取象的任何事物而是指宇宙时空结构的系统抽象概念。总之,正如罗塞塔碑可以告诉我们古埃及的所谓"象形文字"其实并不是原始图画文字而是新成系统的拟音模块文字那样,《尔雅·释天》的"干支密码表"同样能提醒我们,中国的甲骨文也从来不是有一物就造一字、零敲碎打慢慢积累起来的单个原始符号之拼凑,而应当是一种从一开始就在整体大局观念指导下创造的系统化模块文字,其神秘复杂的起源正有待我们在全新思路的指导下去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中国的天文历法术语"辰"真的是指"蛤蚌"吗?中国的天文历法术语"亥" 真的是指"野猪"吗?中国的赤道十二星座创意真的是像西方黄道十二星座那 样大多是发源自蛮荒僻陋的"动物崇拜"和"图腾文化"吗?毫无疑问,通过以 上的分析,甲骨文地支十二字所保留的西元前 2000一前 1800 年左右之中国 十二星座构图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关于所有人类文化都 是起源于"图腾崇拜"的理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对研究古老的中国文明 之起源是并不适用的。因为,假如以动物崇拜为主的"图腾"作为一种无所不 在的原始信仰真的曾经存在于先商时代的中国,那么它就必然会占领"占星 学"这一古代文化的核心高地,并在至今仍能见到的文化孑遗物中多少有所表 现,就像羊(Aries 星座)、牛(Taurus 星座)、蟹(Cancer 星座)、狮(Leo 星座)、蝎 (Scorpio 星座)、魔羯(Capricorn 星座)、鱼(Pisces 星座)等动物造型曾大批出现 于古巴比伦和西方的十二星座想象图之中并孑遗至今一样(古巴比伦和西方 的星座造型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美女加野兽",而且以野兽居多)。然而, 殷墟甲骨文却告诉我们,在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乃至占星神话的起源其实都与 所谓的"动物崇拜"或"图腾文化"无关: 在 4 000 年前中国人的星图上,中国赤 道十二星座的原始造型最初都是些"人造物品"和"抽象行为"而非"野生动

物",其原始文化母题都是些"社会现实问题"而非"图腾信仰问题":"辰"字并非是指"蛤蚌图腾"而是指"房屋庙堂","亥"字也并非是指"野猪图腾"而是指"道路堤防"(见表 2-4);至于今人更熟知的所谓"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等"四象"动物造型以及"十二生肖"动物序列,则反而是春秋战国之际受了边远异族地区"图腾文化"的影响和"五行谶纬学派"占星学的影响而后加到中国星象图中去的。显然,像中国占星文化和中国文明这种先讲世俗"科技"、后讲图腾"迷信"的发展模式,对于一切现有的文明起源主流理论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完全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全新文化课题。

表 2-4 先商十二星座的天文学原始造型与占星学原始命题(陆星原制,2009年)

星座名	天文学的原始星座造型	占星学的原始文化命题		
子=菅室	胎儿或产房	子嗣生育		
丑=虚	舞动的翅扇	威武奋斗		
寅=牵牛	腰鼓	礼乐喜庆		
卯=析木_	刀劈两半木	刑罚杀戮		
辰 = 房	震歪的大房子	雷火能量		
巳=南门	门户	保险长寿		
午=翼	安全绳	扈卫安祥		
未=柳	人工种植的谷物	农厨美食		
申=涒灘	人工井渠	水利黄泉		
酉一實沈	酒坛	匠作智巧		
戌=昴	秤	商贸财富		
亥=婁	足迹	道路堤防		

当然,中国先商"十二星座密码"的破解,其除了能对以上这些理论问题的解答作出贡献外,更重要的是,其还能对大量的考古学实际问题之解答作出巨大的贡献。例如,作为目今所掌握的能够直接印证《尔雅》"干支密码"的最古老实物证据,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十二月神像"造型(图 2-19)其本身就是中国考古学最著名的未解之谜之一。但是,现在我们只要按照"十二月神=十二星座"的公式去"按图索骥",这些神像的造型来源之谜其实

是很容易破解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假如我们能证明这些最古老的自带题名之中国神像(绘制于约西元前5一前3世纪)①其占星学观念也是直接源自"干支密码"的,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将为"中国十二星座=中国十二神祇"的结论提供出更加直观的独立新证据,从而最终使之成为无可动摇的定论。下面,就让"干支密码"带领我们去看看,这些神秘的"十二月神像"究竟是些何方的神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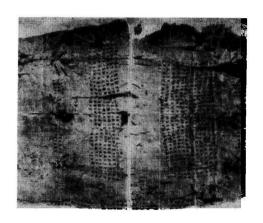




图 2-19 左: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公元前 5—前 3 世纪); 右:楚帛书红外照片局部:"蒤司冬"神像

(1) 战国楚帛书所见"取(陬)"神像者

据《尔雅·释天》"正月为陬"可知,《楚帛书》题名为"取(陬)"之神像实即"营室(子)"星座之神。而从前述的关于"陬"、"营室"、"子"的本义皆为成家筑室、嫁娶生育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20)其实是取象于所谓的"混沌袋(子宫或胎盘羊膜袋)"之造型,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主司嫁娶和生育之女神。因为"子"对应的岁阴名就叫"混沌(困敦)"。而事实上,此神还有一个更加拟人化的形象,那就是《楚辞·九歌》中的女神"少司命",其神职为"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即主司人间的子嗣生育,与此全同。

(2) 战国楚帛书所见"女(如)"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二月为如"可知,《楚帛书》题名为"女(如)"之神像实即 "虚(丑)"星座之神。而从前述的关于"如"、"虚"、"丑"的本义皆为嘶鸣咆虢、

①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

神名:取(陬)

星座: 营室(子)

形象特征:蛇首蛇尾腹 为混沌袋

斗建时空:正北方,仲冬

神话职司:生育抚养、子嗣香火、嫁娶营造、成家立业、月魄盈亏、万物繁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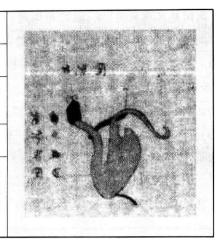


图 2-20

奋扬威仪、奋斗攫取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21)其实是取象于羽毛奋张、怒发直竖、鸟爪抓攫之猛禽造型,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主司鹰扬奋发、怒哧威武之战斗神。而其四首并列造型则明显是来源自对"丑"星座的自然天象之模仿(按,所谓星座的定义,除了其主要的恒星位置和主要的造型含义必须基本固定之外,在具体的连线构型方式上则往往是因人因时因地而稍有不同的,这就像西方星座的"星座想象图"从来都版本众多绝难统一一样,所以,"丑"星座五颗主要恒星除了可以按图 2-7 那样被连线画成"三盆鸟翅"外,显然也可以按图 2-21 左下角所示的那样被连线画成"四岔连体鸟")。

神名: 女(如)

星座:虚(丑)

形象特征: 鸟身四首、奋羽张爪、鸟冠高竖

斗建时空:北偏东,季冬

神话职司:英武威仪、威武奋斗、运动舞蹈、咆哮 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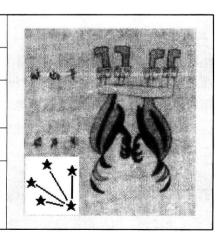


图 2-21

(3) 战国楚帛书所见"秉(病)"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三月为病"可知,《楚帛书》题名为"秉(病)"之神像实即"牵牛(寅)"星座之神。而从前述的关于"秉"、"牵牛"、"寅"的本义皆指用夔牛皮作鼓、击鼓演出以导引指挥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 - 22)所描绘的其实就是中国神话所谓的"夔一足"著名造型,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主司鼓乐之神。因为,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之"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人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云云可知,中国神话中的鼓乐神"夔"之三大形象特征确实就是"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与此图基本吻合。

神名: 秉(病)

星座: 牵牛(寅)

形象特征:牛身人面、苍背無角、一足

斗建时空:东偏北,孟春

神话职司: 鼓乐、礼节、 喜庆、爱情、音乐表演、号 令监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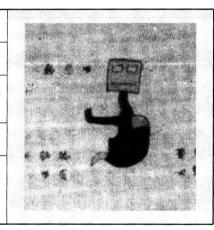


图 2-22

(4) 战国楚帛书所见"余"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四月为余"可知,《楚帛书》题名为"余"之神像实即"析木(卯)"星座之神。而从前述的关于"余"、"析木"、"卯"的本义皆指剖析砍断、割双为单、刑罚桎梏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 - 23)其实是取象于一条身体分为左右两半的双尾共首毒蛇之造型,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主司刑罚断狱、宰割砍伐、毒刑拷打的凶毒杀伐之神。

(5) 战国楚帛书所见"昃(皋)"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五月为皋"可知,《楚帛书》题名为"昃(皋)"之神像实即 "大火(辰)"星座之神。而从前述的关于"皋"、"大火"、"辰"皆指中国古代最重 要的授时天象"大火三星"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24)其实是直接取象 神名:余

星座: 析木(卯)

形象特征:蛇身蛇首、双 尾共首

斗建时空:正东方,仲春

神话职司:刑罚断狱、分析判断、宰割砍伐、陷阱挫折、孤单离散、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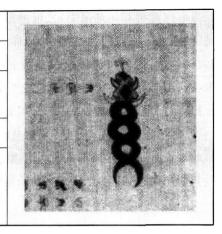


图 2-23

于"大火三星"的,即用拟人化的"三首"造型代表"三星"之数,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代表"大火三星"、主司震房撼心之雷火、照耀明堂之灯火、刀耕火种之农业的大神。事实上,该雷火之神也是所有中国十二星神中的主神(这与希腊神话的主神是闪电神"宙斯"、印度早期神话的主神是雷雨神"因陀罗"颇为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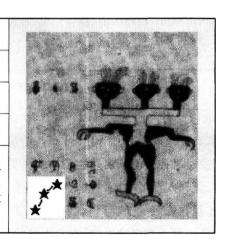
神名: 昃(皋)

星座: 大火(辰)

形象特征: 三首赤面

斗建时空:东偏南,季春

神话职司: 震房撼心之 雷火、照耀明堂之灯火、 刀耕火种之农业、大 火神



. 图 2-24

(6) 战国楚帛书所见"虚(且)"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六月为且"可知,《楚帛书》题名为"虘(且)"之神像实即 "南门(已)"星座之神。而从前述的关于"且"、"南门"、"巳"的本义皆指门关阳 隔、健康长寿有保障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 - 25)其实描绘的就是一尊"方齿虎尾"的南天门之看门神造型,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主司门户出人和健康寿夭的大神(方齿代表口齿健康和年齿长寿、虎尾代表虎豹恶犬等看门猛兽)。因为,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之"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以及《楚辞·招魂》记载之"虎豹九关"云云可知,上古中国神话中的"九关"天门之神"祖(且)"之形象特征确实就是"方齒虎尾"形同虎豹的,与此图基本吻合。而事实上,此神还有一个更加拟人化的形象,那就是《楚辞·九歌》中的天神"大司命",其职司为"广开兮天门……寿夭兮在予",即主管门户和寿夭,与此全同。

神名: 虘(且)

星座: 南门(巳)

形象特征:方齿虎尾、手 操两蛇

斗建时空:南偏东,孟夏

神话职司:门障阻隔、藩 篱帷幕、健康阴阳、死生 寿夭、门户出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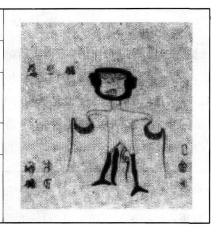


图 2-25

(7) 战国楚帛书所见"倉(相)"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七月为相"可知,《楚帛书》题名为"倉(相)"之神像实即"翼(午)"星座之神。而从前述关于"相"、"凴翼"、"午"的本义皆指翼扈看顾、卸止徜徉、凭靠安祥可知(倉音徜,亦训徜徉、常羊),《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 - 26)其实正是在取象一个羽翼丰满可供庇护、头带羊角守卫安祥的造型,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主司翼护看守、安宁吉祥的鸟身羊首之神。

(8) 战国楚帛书所见"臧(壮)"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八月为壮"可知,《楚帛书》题名为"臧(壮)"之神像实即 "柳(未)"星座之神。而从前述关于"壮"、"柳"、"未"的本义皆指食物美味可 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27)其实正是在取象一个贪吃美味的长舌大肚尖 首怪兽之造型,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主司厨粮和美味的健壮食神。

神名: 倉(相)

星座:翼(午)

形象特征: 鸟身有翼、人 面羊角

斗建时空:正南方,仲夏

神话职司: 扈从守卫、止 卸徜徉、凭靠依托、安宁 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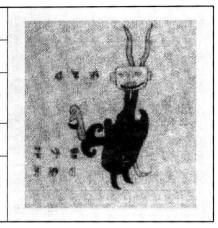


图 2-26

神名: 臧(壮)

星座:柳(未)

形象特征:长舌、大肚、兽首

斗建时空:南偏西,季夏

神话职司:饮食烹饪、厨 房灶火、园艺种植、宴会 宾客



图 2-27

(9) 战国楚帛书所见"玄"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九月为玄"可知,《楚帛书》题名为"玄"之神像实即"涒灘(申)"星座之神。而从前述关于"玄"、"涒灘"、"申"的本义皆指天象"南河三星"与"北河三星"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 - 28)其实是融合了"河灘六星"星图造型以及龟蛇水族造型而成的,其构思即用具象化的"二首四足"造型代表"六星"之数,也同时代表了龟蛇所居的水元素,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代表"河灘六星"主司南北水利的龟身蛇首之水神。

神名:玄

星座: 河灘(申)

形象特征:二首四足、龟 身蛇首

斗建时空: 西偏南,孟秋

神话职司:载舟承托、开 渠挖井、洪水灾害、江河 波浪、黄泉水府、水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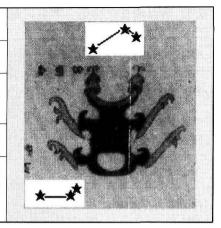


图 2-28

(10) 战国楚帛书所见"易(纍)"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十月为陽(曑)"可知,《楚帛书》题名为"昜(曑)"之神像实即"作器(酉)"星座之神。而从前述的关于"昜(曑)"、"作器"、"酉"的本义皆指制作器物、工巧技能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 - 29)其实描绘的就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天才神兽"能"之造型,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主司工巧作器和才智技能之神。因为,据《说文》记载之"能,足似鹿……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云云可知,中国神话传说中的才智神兽"能"之形象特征确实就是"似鹿",与此图中四足有角而似鹿非鹿之动物造型基本吻合。此外,此图中之神兽侧视图其实也很明显是模仿了"参(酉)"星座七颗恒星的天象来布局的:兽首相当于"参宿五"、兽尾相当于"参宿七"、前足相当于"参宿四"、后足相当于"参宿六"、中心身躯则相当于"参宿三星(一、二、三)"。(而事实上,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该神兽为什么明明"似鹿"却偏要长出一条长尾巴,因为该神话创作者假如全部按照真鹿给"能"兽也画一条短尾巴,那就不能符合天象而自圆其说了。)

(11) 战国楚帛书所见"姑(辜)"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十一月为辜"可知,《楚帛书》题名为"姑(辜)"之神像实即"昴(戌)"星座之神。而从前述的关于"辜(贾)"、"昴"、"戌"的本义皆指商贾贸易和财富积累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30)其实正是取象于上古时代中国的商业运输工具"牛"之造型,借以喻义该神是一尊主司贸易和财富之神。因为,根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商人们无不是以"牛"为其业务主角的:例如

神名: 易(曑)

星座:實沈(酉)

形象特征: 似鹿而有长尾、四足有角

斗建时空:正西方,仲秋

神话职司:作器、酿造、 才智技能、事业成就、能 工巧匠的保护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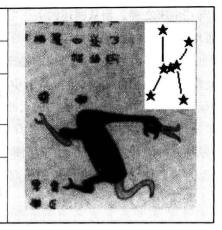


图 2-29

《尚书·酒诰》有云"肇牵车牛远服贾"就已明确指出殷末周初的商人都是以牛为其贸易运输工具的;又例如《左传》有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更明确指出了春秋时代的大商人都是以牛和牛皮制品(韦)为其最贵重的大宗商品和准货币的……毫无疑问,无论是先商时代的贸易之王"王亥服牛"还是春秋时代的爱国商人"弦高市牛","牛"无疑一直是中国商人的必备运输工具、财富标志和首选职业象征物(这和古罗马人一度以"牛"为货币单位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

神名: 姑(辜)

星座: 昴(戌)

形象特征: 牛首人身、左
右对称

斗建时空: 西偏北,季秋

神话职司: 商业贸易、财
富积累、计算估量

图 2-30

(12) 战国楚帛书所见"藻(涂)"神像考

据《尔雅·释天》"十二月为涂"可知,《楚帛书》题名为"蒤(涂)"之神像实

即"降婁(亥)"星座之神。而从前述的关于"涂"、"降婁"、"亥"的本义皆指泥土山石、足履地下可知,《楚帛书》之该神像(图 2-31)所描绘的其实就是中国神话中主司土地和地下世界之神"土伯"的造型。因为,正如《楚辞·招魂》所云"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中国神话中的幽都土神"土伯"之主要形象特征确实就是"九约(九倍腰围的大肚子)"、"其角觺觺",与此图的粗腰大肚、头竖犄角人物基本吻合。(至于《楚辞》提到的"参目虎首",正如图 2-19的楚帛书原件红外照片所显示的,由于该图年久模糊,其面部究竟是二目还是"参目"今已难辨其详细,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至于图 2-31 为今人摹本,其面部结构并不准确。)

神名: 藻(涂)

星座: 降婁(亥)

形象特征: 九腰大腹、其角豬豬、参目虎首

斗建时空: 北偏西, 孟冬

神话职司: 土石堤防、道路出行、水来土掩、以旱抗涝、旱神、冥神

图 2-31

第三篇 甲骨文中最早的史实人物——殷墟卜辞所见上甲微之前先商王名干支考

1899年,当被埋没了3000多年的殷墟甲骨文重新又出现在了全世界的面前,一个经常被西方学者们质疑的王朝终于拥有了证明自己的铁证。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早就生活在殷商文明种种余荫下的中国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熟知于殷遗民孔夫子身世的东方人来说,殷商王朝的真实存在性本来就是无须证明的。甲骨卜辞的重新面世,与其说是带给了我们对这段熟知历史的冗余证明,倒不如说是带给了我们对这段熟知历史的更多疑惑。

其一,正如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所述,殷商王朝(西元前17—前11世纪)最独特的文化标志就是其国王和部分贵族的名号诸如大乙(汤)、武丁、妲己、帝辛(纣)等都是用乙、丁、己、辛等十干序号命名的。然而根据《史记》等文献所载,这种清一色以干支序号作人名的风俗制度,却基本不见于其他时代、其他地域的汉语族群,无论是先于商朝的有虞氏、夏后氏还是后于商朝的周王朝、楚王国。(当然,那些在商族文化影响范围内的非商族人物也有使用干支命名的,例如先商时代的孔甲、履癸,商亡后犹染遗风的王子午、曾侯乙等等,但这明显是受商族影响的个别性事件而非普遍性制度。)也就是说,殷墟卜辞似乎证明,殷人与绝大多数汉语族群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都迥然有异。显然,假如事实真的是这样,那么按照一族一语俗的标准,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怀疑,殷商文明也许是一种外来的非土著文明,殷商王朝其实是一个外来"异族"入侵统治的王朝,殷商甲骨文乃至汉字的源头本是一种外来文字……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其二,既然《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商先公上甲微(约西元前19世纪在位)

之后所有带十干名号的三十六代商王绝大多数已经被出土甲骨文所证实,那么反过来说,《史记·殷本纪》记载的上甲微之前的先商(proto-Shang)世系,或者至少是玄王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这五代的先商世系就在甲骨文证据面前显得十分可疑了:关于这些最早的殷商君主之名,显然既不直接见载于殷墟甲骨文,也不符合商王们以十干取名的一贯风俗制度,无论如何,他们都有纯属虚构的可能……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其三,既然《史记·殷本纪》都有一半遭到了甲骨文证据的质疑,那么《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先周世系、《史记·楚世家》记载的先楚世系、《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夏后氏世系,乃至《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尧、舜等古帝世系,就更加与甲骨文证据扯不上关系而应该去接受全盘质疑了……事实又果真是这样的吗?

显然,假如在我们还没有破解《尔雅·释天》的"干支密码"之前,对于这些早已困扰了我们近一个世纪的问题,今天我们也许只能是继续束手无策。不过幸好,我们的祖先在留下了这些谜团的同时,毕竟也留下了"干支密码"这根解谜的线索。而借着干支密码的线索,今天我们已然可以找到以上这些问题的最终谜底,那就是:"干支取名制度"其实并不是晚到王亥和上甲微时代才出现的文化现象,更不是殷人祖先所独创的文化,它本来是所有汉语土著族群及其亲属族群所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古老文化制度;而无论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等殷先王之名,还是尧、舜、禹、帝杼、帝槐、弃、不窋、陆终等其他上古帝王之名,细究起来其实都是符合卜辞所见之"干支取名制度"的真实人名。只不过,他们并不是直接用"甲、乙、丙、丁"等晚出的"显性干支"二十二字来命名的,而是用比之更加古老的"畢、橘、條、圉"等"隐性干支"汉字来命名的罢了。

一、根据《离骚》还原的 中国于支取名制度

其实,只要弄明白了中国的"二十二干支"及其各种等价表达方式的本义 是代表了中国天文学的二十二种术语兼中国占星神话中的二十二尊神祇,那 么,关于王亥、上甲微、盘庚、妣母戊等中国的帝王贵族们为什么要采用干支符 号来作为自己名字的理由其实也就十分清楚了(图 3 - 1)。因为,用星宿神祇

或其他神祇之名来命名国王和贵族之名号,乃是世界性的普遍文化现象,其实 例举不胜举。例如,在古巴比伦地区,国王们常用本地的神祇兼星宿之名 "Sin"(月神)、"Marduk"(木星神)等来命名自己以获取神祗的庇护,比如大约 西元前 21 世纪的 Naram-Sin(阿卡德国王)、西元前 6 世纪的 Amel-Marduk(新 巴比伦国王);在古埃及,法老们也常用太阳神等神祇之名来命名自己以显示 其宗教权力,比如大约西元前 14 世纪著名的法老 Tutankhaten 的名字原带 "Aten"(朝日神)字样,后因"宗教改革"又改名为 Tutankhamun(图坦卡门)即 带"Amun"(暮日神)字样(图 3-1);而即使到了中世纪和近代,在古风犹存的 两方和阿拉伯诸国,当地的典型人名也仍然是采用某一组数量有限的神人名 单来固定命名的,比如 Maria(圣母)、John(圣使徒)、Alexander(被尊为神的古 代国王)或者 Mohammed(先知)等等。因此,上古中国的国王和贵族们只在最 神圣的干支二十二字名单及其同义词范围内正式取名的风俗制度,其本身并 不是什么罕见怪异而需要特殊阐释的文化现象。真正需要特殊研究阐释的, 反而是后人对"干支取名制度"这种先秦基本文化制度的种种误解,比如关于 商王用十干取名的"生日说"(生于甲日者即名甲)、"死日说"(死于乙日者即名 乙)、"死后庙号说"等等,尤其是,关于"干支取名制度"是仅仅存在于商族和商 代之"殷俗"(王国维语)的历史性重大误解。









图 3-1 取名制度:中国安阳殷墟司母戊青铜鼎的铭文"母戊"(西元前 13 世纪);埃及 Luxor 帝王谷 KV62 墓彩绘木箱的题名"Tutankhamum"(西元前 14—前 13 世纪)

用干支取名真的仅仅是殷王室的专利吗?显然,在"干支密码"的提示下,我们知道,这种说法并不属实。因为,只要随便翻开一本先秦古籍,我们就会发现,带有"隐性干支"的中国古人名字其实满眼都是,其数量是要远远超过带有"显性干支"符号的殷商人名的。例如,《尔雅》云"在丁曰圉",于是商先公"曹圉"、周先公"高圉"、"亚圉"、晋怀公"子圉"等古人竟然都抢着用"圉"这个

看似不祥的字眼(可代指奴隶)来命名自己的历史疑案也就可以豁然开释了: 原来,"圉"字作为人名的本义并不是指什么"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左传》所 裁晋文公属下编浩污蔑晋怀公的政治谣言),而是指神圣的十天干之一"丁"。 又例如,《尔雅》云"五月(辰月)为皋",于是夏王"帝皋"、秦先公"字皋狼"、"旁 皋"、相马大师"九方皋"等人名的本义也就昭然若揭了,原来,他们都是指神圣 的十二地支星神之一"辰"(宅神兼光明神),"宅"、"狼(廊)"、"旁"、"方"等字样 也都是该古星座名"房"字的同义字或通假字。再例如,《尔雅》云:"在乙曰端 芒",我们可以找到隐性名"乙"的第九代夏王"帝芒";《尔雅》云:"在已曰则", 我们可以找到隐性名"己"的先商时代临淄地区之方国君主"季萴(则)";《尔 雅》云:"在千曰终",我们可以找到隐性名"千"的楚王室远祖"陆终";《尔雅》 云:"在丑曰赤奋若",我们可以找到隐性名"丑"的商先公"昌若"等等。总之, 一切历史文献和出土文字都能表明,无论是4000多年前先商时代的王公之 名还是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大夫之名,无论是齐、楚、秦、晋各边远 地区的人名还是夏、商、周中央王朝的人名,中国上古绝大多数的史实人名无 疑都是与"干支取名制度"紧密相关的,殷商王室的显性"十干"取名制度不过 是这种流行了千百年的古老风尚的后来继承者和改良者罢了。

不过,与以上所举的一切上古人名比起来,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无疑更显重要,那就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屈原(前 341—前 277)。因为,关于商先公"曹圉(丁)"、夏王"帝皋(辰)"等隐性干支人名的具体取名过程毕竟年代久远早已无史可查,关于殷商王族"武丁"、"妲己"等显性十干人名其究竟是选取自"生日"、"死日"、"死后庙号"还是其他因素也全是后世学者们的假设猜想而并非实证结论。总之,这类的古代人名虽然数量众多,但对于可靠地还原"干支取名制度"并无直接的帮助。然而,关于"屈原"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我们却早已通过这位诗人的亲口自述而所知甚详: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显然,在《离骚》这首"自传体"的长诗里,诗人屈原一开篇就用现身说法的

方式给我们还原描绘出了2300多年前中国贵族们的取名全过程:

屈原的名字是谁起的?——答案是"肇锡余以嘉名",是卜兆(肇)即上天 "天命"所起的,而不是任何凡人所起的,因为,给新生命取天文干支名号的神 圣权力本只属于"天";

屈原为什么名"平"?——答案是"名余曰正则",是根据随机占卜得到的结果天干第六位"则"起的,《尔雅》云"在己曰则","平"即"正则"也。屈原与妲己一样都被老天赐名为"己";

屈原为什么字"原"? ——答案是"字余曰灵均",是根据"名与字必互训"的中国传统取名规则起的,据《史记》的记载,天干"己"等价于岁阳"祝犁",而"均(畇)"字训以犁畇田,"原(泉)"字古通"钱(泉)"训钱镈农具、耘田耕犁,可见"原(泉镈)"即"灵均(畇)"也。

屈原的名字干支与他的诞生日干支有关系吗? ——答案是没有任何关系,屈原的诞生日是"惟庚寅吾以降"的"庚"日,但屈原的干支名字却是"己"……

也就是说,按照屈原对自己名字来历的实况解释,我们可以推知,"高圉"(丁)、"宅皋狼"(辰)、"帝芒"(乙)、"陆终"(壬)等大量上古贵族人名的真正取名程序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根据《尔雅》中的"干支密码"分析可知,上古中国所有王公贵族的名号并非是可以随意自取的,而是必须在代表神祇的干支二十二字及其同义字词范围中按程序选取一种,此即所谓的"干支取名制度"。而《离骚》中的取名实例则告诉我们,该种制度不仅曾严格存在于先商和商代,而且其风俗残余一直流传到了两周之世(虽然当时许多人早已不遵此俗)。

其二,"干支取名制度"在上古中国曾广泛流行的真正原因则是源自一种"神祇时代"人类最基本的文化观念:即人的生命是神祇赋予的,故人的姓名也应由神祇赐予。因此,用抓阄、抽签、占卜等等卜问"天命"、"神意"的随机程序取名,无疑是古人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所当然的取名方式。至于干支名号来源的所谓"生日说"、"死日说"、"死后庙号说"等则明显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误解。(相较可知,后世提出的所谓"谥法"很明显是用"世俗二次取名权"挑战"神祇取名权"的表现,是西周、春秋以降"世俗王权社会"逐步取代"神祇社会"的反映,并由此逐渐产生了父亲有权为儿子自由取名的新风俗。)

其三,"干支取名制度"虽然在形式上可分为两大类型,即比较随意的"隐

性干支取名制度"(非商族)和比较严格的"显性十干取名制度"(商族),但这两者在本质上则是完全相同的,都是早期汉语族群的标志性文化风俗。因此,殷商王室贵族以"十干取名"的事实表明,殷商族群根本不是什么"异族"而是纯种的汉语方言族群。

其四,在"干支取名制度"下,中国上古人名称谓虽然普遍存在着"一人多名"的现象,但对于同一人物的多个别名,其干支含义必然是等价的(例如屈原的多个别名、表字"原=平=灵均=正则"其干支含义都是"己")。此即后世中国人取名规则中"名讳与表字必义近互训或相反相成"现象之滥觞。

而一旦我们还原出了真实版的"干支取名制度",那么,我们要想在殷墟甲骨文中找到比上甲微更古老的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等等先商君主们的名字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因为,一方面,无论是对于曼涅托(Manetho)《埃及史》提及的大量法老名字还是对于《左传》提及的大量贵族名字来说,"一人多名"在全世界的古代文献中无疑是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所以古文献记载的这些名字完全有可能只是某些位殷商祖先的别名,就像《史记》中的"汤"、"微"其实只是甲骨文中的"大乙"、"上甲"之别名一样,或者希腊文中的法老"Cheops(齐阿普斯)"只是象形文字中的法老"Khufu(胡夫)"之别名一样;而另一方面,殷墟甲骨文中也确实还存在着大量尚未被识别的先公先王之名,例如"高祖夒"、"高祖河"、"兇"、"王吴"等等,而只要我们能认识到这些反复出现的古老名字也必然是符合"干支取名制度"的隐性干支名号,那么在"一人多名干支互训"的取名规则下按图索骥,我们也完全有能力把这些王名与《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对应起来。

因此,下面就让我们按照比商代"显性十干取名制度"更加古老、更加普遍盛行的先商"隐性干支取名制度"之文字游戏规则,来重新审视这些西元前2 千纪的殷墟甲骨文,来看看究竟谁才是甲骨文记载之中最古老的史实人物吧。

二、上甲微之前的先商世系考

如果说,"鲇鱼王 = Menes"或"鲇鱼王 \neq Menes"是埃及学家们 (Egyptologists)最急于求证的命题,那么,"高祖要=玄王契"或"高祖要 \neq 玄王契"也许就是中国历史学家们最急于求证的命题了。因为,正如出土文物所描绘的埃及第一王"鲇鱼王"(即某些埃及学家释读为"Narmer"者)至今尚无法

与后世文献传说的埃及第一王"Menes"画上等号一样,中国甲骨卜辞中的殷商第一王"高祖夒"(《合集·33227》)①至今也仍然无法与《史记》记载的殷商第一王"玄王契"画上等号。那么,究竟是出土卜辞有问题还是传世文献有问题? 抑或两者都没有问题而只是我们自己的解读有点问题? 本来,假如没有《尔雅》和《离骚》共同为我们还原出的中国"隐性干支取名制度"来作关键旁证,那么,中国的"高祖夒猜想"也只好继续和埃及学的"鲇鱼王猜想"一起成为人类永恒的不解之谜了。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中国人这次似乎比埃及人更走运,因为我们的"高祖夒猜想"已经有了最准确可靠的答案,那就是"高祖夔≠玄王契"。

(1)"帝俊=简狄=高祖聚"考

"高祖夒"为什么不是"玄王契"?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干支取名制度"规定的游戏规则之下,"夒"的干支密码对应地支第八位"未",而"契"的干支密码则对应地支第九位"申",这两个名字当然不可能是指同一个人。

要,甲骨文原字如图 3-2 和图 3-3,字形从"欠",正如王国维等人所考,"要"本亦可释为"夋"(也从"夂"),即与《山海经》之"帝俊(夋)"为同一人名用字之异写。"夋(要)"通"餕",训餕饔、餐食、协治美味;"夋"又与"鵔(皴cun)"、"鹑(chun)"为同音通假字。《尔雅》云"在未曰协治",故夋(要)字按"干支取名制度"本当是指"协治=鹑火"即地支第八位"未"。而另一方面,根据《说文》"要,贪兽也"云云可知,卜辞"要"即"饕"之本字,训贪吃饕餮,其字形正作一贪吃神兽形状,与《楚帛书·壮神图》极其类似,可见,"要=饕餮=壮(未)"也直接成立②,"高祖夒"名号于支属"未"无疑。

契,通"挈",按《说文》"挈,縣持也"可知,即提挈、縣持之意;而据《荀子》等的记载可知,契又名"玄王","玄"通"縣"(懸),亦指懸系、縣持之意。《尔雅》云"九月(申月)为玄",故无论是"契"还是"玄王",按"干支取名制度"来看都是指某个以地支第九位"申"(玄)命名的人名。

因此,通过以上的简单分析,我们既证明了"高祖雯(未)≠玄王契(申)"这一根本命题,也同时证明了"高祖雯(未)≠帝喾(辛)"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帝喾高辛氏"这个曾被许多学者(包括王国维在内)纷纷认定等同于"高祖

① 按本文所称《合集》皆指《甲骨文合集》,下文皆同。

② 关于地支第八位星神"壮"别名"饕餮"的考证,可参见本书第五篇。

要"的古帝之名,无论是从其众所周知的别名"高辛氏"来看,还是从"喾"(通 "晧")字本身可与"昭阳"(辛)互训来看,无疑都只能是指天干第八位"辛"而 非"未"。

那么,甲骨卜辞之殷商第一王"高祖夒(夋)"既不可能是指"玄王契",又不可能是指"帝喾",他究竟是指正史所载的哪一位人物呢?显然,剩下来的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指"玄王契"的母系亲戚(舅舅)、常常被误解成女性的有娀氏男性君长"简狄"。

《史记·殷本纪》开篇有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显然,如果 仅仅就此孤文个例来看,"简狄"一名本来就是指一个女子的私名似乎已是铁 案如山了。然而,假如我们用更多的相关历史案例来作对比分析,我们将不难 发现,"简狄"其实本来更可能是指有娀氏部族的男性君长即玄王契的母舅之 名(或是其他母系男性亲属),而不太可能是一个女子的私名。因为,一方面, 从近一个世纪的甲骨卜辞研究来看,殷商之先妣有干支私名者始见于示千之 妻妣庚(《合集•36183》),早于此的先妣则是没有私名的,卜辞中仅以先妣的 男性亲属名号来代称先妣本人,比如"三报母"、"王亥母"、"兇妣"、"河妻"等等 (其实即使是妣庚之后的许多先妣在卜辞中也仍然有用此格式称呼的,例如 "祖乙奭"、"伊奭"等),因此,作为整个商王族的始妣,玄王之母援例也应该没 有私名,"简狄"这个带隐性干支的名号作为女子名本应该是"简狄女"的略称, 即"简狄王家族的女子"。而另一方面,从传世的文献古籍来看,正如后世的中 国汉族女子皆无法定私名而必须附于父兄族氏或丈夫之名来称谓一样,关于 玄王之母,在最权威的殷商族史诗《商颂·长发》中其也有类似的称谓:所谓 "有娀方将","娀"即"戎女"二字之合文,即"有戎氏之女",其格式明显与"孟姜 (姜姓之长女)"、"李氏(李氏宗族之女)"、"乐羊子妻"、"岳母(岳飞之母)"近 似。因此,《史记》和《楚辞》等提及的"简狄"作为女子名完全应该解释为"简狄 女(简狄王家族的女子)"之略称,至于"简狄"一名的真正拥有者则应该是另一 位男性的商族祖先。而这位伟大的男性,无疑只能是指被甲骨卜辞尊称为"高 祖夋(變)"、被《山海经》尊称为"帝俊"的所谓"殷商第一王"了。

"高祖夋(變)"为什么就是"简狄"?因为,狄通"翟",与"鹑"互训都指雉科鸟类,作为人名则可指地支第八位"鹑火"(未);"简",字音近"减"(咸),"咸"又与"戎"(娀)古文字字形相近,故知今本《商颂·长发》之"戎"字原为"咸(成)"字之讹。尤其是,"變"在卜辞中又常被称为"戌變","戌變(夋)"即"咸變(夋)"

之合文略写(《合集·33272》,见图 3-2)。所以,"有戎(娀)氏"作为一个国号族氏本当作"有咸(简)氏";所以,"高祖夒(未)=戌夒(未)=帝俊(未)=简狄(未)"成立;所以,甲骨卜辞中的殷商第一王"戌夒"(咸夋)完全可以与文献中的殷商第一王"简狄"(帝俊)合二为一,"高祖夒猜想"就此证毕。此外,假如我们考虑到商汤《史记》又称"成汤","成"字与"咸"字在殷墟卜辞中常被通假使用,那么我们对"戌夒"与"成汤"本属同族、"有娀氏"本为"有娀(咸)氏"之讹的结论就更能确认无疑了。



《甲骨文合集 · 三三二七二》



「戌夒」合文

图 3-2 殷墟甲骨文(西元前 14—前 11 世纪)记载的 殷商第一王"戌婴"(西元前 22—前 21 世纪)

上甲微之前的殷商先王真的大都是不见载于殷墟卜辞的虚构人物吗?显然,通过以上对"高祖婴猜想"的求证,我们对于《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的真实可靠性其实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信心,《史记·殷本纪》记载的"简狄生契……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之世系从整体上看无疑是真实可靠的(虽然其中还缺漏了几位殷先王,但却绝无编造添加之成分)。因为,既然像帝夋(约前22—前21世纪在位)这么古老的人物都可以被殷墟甲骨卜辞所证实,那么其他比之时代更靠后的殷商先公先王就更不可能是编造的了。而事实上,只要按照与求证"高祖婴猜想"的类似方法,那么至少还有如下这几位带"隐性干支"名号的殷商先王,我们也同样可以给出其在甲骨卜辞中确实存在的完整证明。

(2)"玄王契=高祖河"考

如前述,虽然"玄王契"并不是卜辞中的"高祖憂",但作为《诗经·商颂》、《史记·殷本纪》等文献所公认的殷商王室之父系始祖,我们无疑有充足的理

由认定,"玄王契"这位地位最最重要的商王无论是作为祖先还是作为鬼神,其都一定早就大量出现在了甲骨卜辞的祭祀名单之中,他在商人心目中的重要性是绝对不会连"太丁"(商汤太子)这样的短命无冕王都不如的。因此,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要争论"玄王契"究竟在卜辞中有无其人,而是要求证"玄王契"究竟在卜辞中是哪位已知著名祭祀对象的别名,也就是说,是要寻找符合以下三项条件的卜辞人名:其一是要在卜辞中享有崇高的称号比如"高祖";其二是要在卜辞中拥有很高的出现频率和最高的神权(诸如能作为求禾、求雨等"国家级祭祀"的卜求对象);其三是要在卜辞中拥有与"玄(申)"、"契(申)"二字字义可互训的、干支属性相同的名号称谓。而全部能符合这些条件的卜辞人名无疑只有一个,那就是"高祖河"(见《合集·32028》),卜辞中通常简称作"河"。

《尔雅》云"在申曰涒滩",而正如本文第二篇所考证的,"涒滩=舆鬼(申)"星座又可称为"两河"、"河灘"。可见,"高祖河"之"河"本为"河滩"之略语,其字义训担荷,作为人名则指地支第九位"申"。因此,我们无论是从干支密码之"玄(申)=河滩(申)"来看,还是从卜辞所见仅有的四位"高祖"中恰好就有"高祖河"这一称号来看,卜辞中这位"出镜率"名列前茅且享有最高神权的祭祀对象"河"都是指殷商始祖"玄王契"无疑,他绝非如当今诸多论著根据字面来解释的所谓"黄河水神"。(当然,正如后世文献传说的"契长佐禹治水有功"所暗示的,作为一个用河灘星座"申"命名的开国君主,其在生前自诩为"大水星"下凡、死后被当作"大水星"的同位神祇而受到隆重祭祀是完全有可能的,只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河灘"神并不仅是小小的黄河之神,而是一尊主宰所有人间江河湖海和天上"天河"、地下"黄泉"的大神。)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玄王契=高祖河",那么我们对"高祖婴"和"高祖河"这两位殷商开国始祖之间的关系就会了解得更加清楚了:《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云"帝俊生帝鸿",既然"帝俊"是"高祖婴",那么"帝鸿"就只能是"高祖河"了。因为"鸿(洪)"训洪水、大水,"帝鸿"与"高祖河"一样都是指水神河滩(申),而在诸多殷商远祖中,既能够享有"帝"的尊称,又能够拥有名号干支"玄=河滩(申)",而且还是"帝俊"所"生"的商王,除了"玄王契"还能是谁,《史记》等所载的"简狄生契"之殷商史实显然是无可辩驳的。(按《大荒海内经》文辞古朴,所谓的"生"可以泛指父子、舅甥、祖孙等血缘关系,正如该书中的"鸟"常常泛指飞禽和走兽,"海"常常泛指水域和陆地一样。)

(3) "相土=烊"考

众所周知,在殷商史诗《诗经·商颂·长发》中,被殷商遗民们极力歌颂的 先商远祖只有两位,一位是玄王契,而另一位就是其孙相土,此即所谓"相土烈 烈,海外有截"。显然,作为一位武功赫赫而尊荣堪比开国始祖的殷商先公,相 土在殷人的祭祀中无疑应该享有不低于高祖夋和高祖河的待遇。因此,我们 同样可以根据前述的既拥有很高的"出镜率"和很高的神权,又拥有相同干支 名号的原则来求证"相土"之名在卜辞中的对应者。而这样的卜辞人名无疑是 唯一存在的,那就是"烊"(字形如图 3-3 所示从上"羊"下"火",旧释为"羔"或 "岳",见《合集·33331》等)①。

SA	先公的【邵】		8	Ä	ğ	商先公【兇】		SA A	直春	商先公【夋】
E	先公的【嗔】				I	商先王【写】	(1)	常	们们	商先公【河】
43	先公的【智】	*	* *	K	*	商先王【呉】	*	Ž	¥ \$	商先公【烊】

图 3-3 甲骨卜辞所见最早的九位殷商先公先王 (未带显性干支二十二字者)

"相土",旧说或以为其卜辞对应者即《合集·34185》等所列之祭祀对象"土"。诚然,假如仅仅从字面来看,类似当年王国维初见卜辞之"土"就立即联想到殷商一代名王"相土"的思路是完全有其合理性的。那么,我们又凭什么说"相土"并不是指"土"而是"烊"?因为,一方面,随着近一个世纪的深入研究,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卜辞中的祭祀对象"土"其实更可能是指一尊自然神祇"社",即卜辞中常见之"亳土(社)"、"四土(社)"等神祇的泛称,这就像卜辞中的其他自然神祇"四云"或"六云"可以泛称为"云"、"出日"与"人日"可以泛

① 旧亦有学者释卜辞"烊"为"羔"字,按,甲骨文已有"羔"字不从"火"而从"羊"从"少"(小) 训为"小羊",故知"烊"释为"羔"字不确。参见《胡小石论文集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95—97页。并参见《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14—415页。

称为"日"、"五山"或"十山"可以泛称为"山"那样;而另一方面,与之适成反例的是,"烊"这位卜辞中的著名祭祀对象虽然被许多论著勉强释作自然神祇"岳"(山神),但在卜辞中我们既无法找到"岳=山神"的直接可靠证据,也无法找到类似"五山"、"十山"之卜辞通例的"四岳"、"五岳"等说法(太阳之神"日"明明只有一个,还被殷人硬拆分为出日、人日等诸多日神,何况山岳之神更没有一岳独尊的理由,后世典籍之常常并举五岳即为明证),所以,很显然,比照卜辞中"自然神"与"人王"的诸多特征区别来分析,"岳(烊)"与其说更可能是一尊山神,毋宁说更有可能是一位人王。而"五山"、"十山"等等才是殷人祭祀的山神之标准称谓。

而更重要的是,根据"干支密码表","相土"与"烊"作为人名其唯一对应的隐性干支都是"午":相,即"相羊"之相,《尔雅》云"七月(午月)为相";土,通"杜"、"堵"、"睹",训杜止、安堵、睹望看守,即喻义"安祥=天睢(午)";而同样的,卜辞的著名祭祀对象"烊"字上半从"羊"下半从"火"(不是从"山",见图3-3),"烊"与"徉"(牂)相通,也是指《尔雅》所谓的"在午曰敦牂"。因此,"相土"一名由于是双字互训便只能是指地支第七位"午","烊"作为人名由于是相对的狭义字也只能是指地支第七位"午","相土(午)=烊(午)"无疑是成立的。而与之相反,甲骨文之"土"由于是个常用多义单字,其义项既可以指"社"、"杜",又可以指"徒"等等,其作为人名所代指的干支含义并非是唯一确定的。

因此,综合"烊"在卜辞中所拥有的堪与"高祖河"等著名先王比肩的出现频率和拥有"求禾"之最高神权的事实,以及"烊"在干支二十二字中只能指"午"的释名唯一性,再加上所谓的"山岳神"在卜辞中早已另有称谓,我们最终可以认定,卜辞祭祀对象"烊(午)"其实就是殷商的第四任君主"相土(午)"之本名。

(4)"曹圉=兇父"考

根据《史记·殷本纪》,殷商的第五任先公名叫"曹圉"(实际上应是第七任,详见下文)。显然,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位商先公的名字一望而可知是源出自《尔雅》所谓的"在丁曰圉",其名号属于天干第四位"丁"。而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在《史记·殷本纪》中看似无足轻重的"曹圉"本来也应是一位重量级的商王,因为根据"干支密码"易知,他其实就是诸多古文献都有记载的那个"番禺是始為舟"之"番禺(丁)"、"乌曹作博"之"乌曹(丁)"、"胡曹作

衣"之"胡曹(丁)",是个拥有诸多文明建树的上古名王(详说见下文)。此外, 他还是另一位重量级商王"冥"的父亲。

因此,关于"曹圉",我们同样可以比照上述的三大判据来找到其在甲骨文中的对应者:那就是既拥有很高的"出镜率"以及"求年"、"求雨"等神权,又拥有"父"的独特尊称、更与"曹圉(丁)"有着相同干支名号的"兇父"(见《合集·34266》等)。

"兇"的甲骨文字形从"凵"从"人"(见图 3-3),旧释作"兇",可从。"兇"通"耸"、"诵(勇)",训耸直不屈、强勇直圉,"兇父"与"曹圉"、"番禺"一样作为人名其本义都是代指天干第四位"强圉(丁)"。因为,"曹"通"槽",训槽圈、栏圉;番训强勇(见《尔雅·释训》"番番,勇也")、藩(番)篱栏圉,禺音通"圉(遇)"。所以,"兇父(丁)=曹圉(丁)=番禺(丁)"无疑是成立的,"曹圉"(约前 20—前19 世纪)作为一代名王在殷墟卜辞所列的祭祀名单中确实占据着其应有的重要地位。

(5)"冥=王亥"考

与其他几位因为没有显性干支名号而备受争议的先公不同,关于《史记·殷本纪》记载的第六任殷商先公"冥"(实际上应是第八任),当今学术界却罕见地有着一个传统的共识,那就是普遍赞同王国维当年提出的"季=冥"之假说,都倾向于认可"冥"就是卜辞人物"季"(《合集·21117》),也就是《楚辞·天问》提及的"该(王亥)秉季德,厥父是臧"之"季"。而由此出发,《史记·殷本纪》明确记载的先商世系"冥→振→微"自然就必须被面目全非的新世系"季→该→王恆→上甲微"所替代:因为按此假说,《史记》不仅把卜辞中的先公"季"胡乱写成了其罕见的别名"冥",而且还把"该"(王亥)误写成了形近错别字"振",此外更漏记了一世先王"王恆"(按此种释读则王恆是王亥之弟),总之是四错其三,错不可恕了。

那么,"季=冥"真的能成立吗?《史记·殷本纪》之世系名单真的犯了如此大的连环错误以至于要被"彻底改写"吗?显然,对于如此事关重大的问题,在有了"干支密码"新工具之后,我们完全应该去重新作出考证,以还历史之真相。而综合如下几项甲骨文证据、文献证据以及"干支密码"方面的新证据,我们可得的最终的结论是:"季=冥"假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传世文献中的"冥"绝非甲骨卜辞中的"季"之同一人;《史记·殷本纪》记载之"冥→振→微"世系也根本没有四错其三,"冥"没有错,"振"更没有错,其唯一的小错仅仅是漏记

了"王恆"一世而已(而且"王恆"并非"王亥"之弟)。

首先,通过对古文献和甲骨文资料的全面对比分析,我们知道,文献中的"冥"和卜辞中的"季"这两个人物其在殷商历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相差悬殊的,因而他们很可能并非是同一人物。因为,《国语·鲁语》早就说过,"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郊(祭)冥而宗(祭)汤":显然,作为敬业"勤死"传说的圣人级主角,作为国典"郊祭"的最高级尊崇对象,作为堪与头号名王"成汤"相提并论的伟大祖先,"冥"对于殷人来说无疑本是一位重量级的先公,他理应在殷墟卜辞中大量出现。然而,反观王国维等找来顶替"冥"的卜辞人物"季",这种重量级的地位在其身上却丝毫得不到体现:相比关于高祖乙、上甲、河、獿等的成百上千条卜辞,至今所见关于"季"的卜辞只不过寥寥数条而已,而且还是集中于某个短时期内而并非各个王世都有。因此,仅仅从这一项甲骨文资料的统计数据来看,我们就能初步判定,"季≠冥"成立。

其次,通过对所有古文献的全面解读而非一字一句的断章取义,我们知 道,"季=冥"假说的唯一论据,即王国维等对《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 臧"两句的释读是完全错误并且不合文法逻辑的,该两句诗文被释读成"殷王 王亥秉承乃父季之德、乃父季之臧善"不仅严重违反中国古文遣词精炼、力避 重复的惯例,而且与上下文文意严重脱节,最终则导致全篇的扞格难通。因 为,联系上下文通读可知,在《天问》的原文"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 喜?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恆秉季德,焉得夫僕 牛;何往營班禄,不但还来……"中,"该秉季(契)德"与"恆秉季(契)德"两句明 显是紧紧承接其上句"玄鸟致贻女何喜"而来,"季(系)"实际上就是"契"的同 音或近音假借字(楚音),即指"玄鸟致贻"所生的"玄王契"。所以,《楚辞•天 问》之"季(契)"实际上与甲骨卜辞之祭祀对象"季"未必有关,更与《史记・殷 本纪》之"冥"完全无关。至于"该秉季(契)德,厥父是臧"两句,其本义其实则 是指"王亥秉承了其始祖契之德性(指其继承了玄王契的神圣血统、荣誉和君 位),而且还有一位臧善的父亲(即曹圉)"。很明显,在这两句中"季(契)"与 "厥父"本是指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所以并未犯重复拖沓之语病。而唯有如 此解读,那么下文紧接的反问"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也才可顺理成章地成 立:王亥你身为圣君玄王契之后、一代贤王(曹圉)的儿子,却为什么一点也不 像乃祖、乃父而命丧"有扈氏淫乱事件"? 因此,通观全文,所谓《楚辞・天问》 中的"季"与"该(王亥)"两人本是"父子关系","季"就是"冥"的解读无疑是完

全错误的,这不仅犯了语病大忌,而且也与《天问》全篇的主旨不符: 众所周知,《天问》乃是一篇上穷碧落下黄泉、于重要古史传说无所不"问"的"大赋"或曰"百科全书",其对于殷商始祖"契"这样的重量级名字是不可能不提及的(就像其提及了夏的始祖禹和启、周的始祖后稷一样),而假如我们用"季=冥"代替"季=契"去解读,无疑就会出现"《天问》中有禹、有启、有后稷却没有商始祖契的名字"这样的奇怪结果。

再次,通过"干支密码"证据支持下的古文字分析,我们知道,《史记·殷本纪》所列之第七任商先王"振"(实际上应是第十任)并非如《汉书》等臆测擅改的是"核(该)"字之误,因为甲骨卜辞证明殷商先公先王中确实另有一个名"振"者(详细考证见下文)。由此可知,王国维等把《天问》之"季→该"与《殷本纪》之"冥→振"世系直接等同起来本是彻底失据的,其在此基础上推论出的"王亥=振"和"季=冥"皆属张冠李戴之论。

最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还进一步知道,《天问》的"季=契(申)"根本就与《殷本纪》的"冥(亥)"所代表的干支属性没有任何等价关系,在"干支取名制度"下根本就不可能是指同一个人。所以,事实上,甲骨卜辞的"季"或者应该是另有其人,或者就是《天问》的"季=契(申)"即"高祖河"之异名(待考),总之他绝不可能是指"冥"。至于真正的商先公"冥",我们仍然必须按照前述寻找"高祖河"的三大严格条件去另外寻找。而对于熟悉甲骨卜辞的人来说,这个我们要寻找的目标看似虽远在天边,其实却近在眼前,他就是前文一再被提及的、大名鼎鼎的"王亥"。

《史记·殷本纪》中的"冥"为什么就是指殷墟卜辞中的著名先王"王亥"本人而不是指"王亥的父亲"?因为,综合传世文献与殷墟卜辞的记载,"冥"与"王亥"这两个人物在以下所有几方面的关键特征上都是完全吻合一致的。

其一,"冥"与"王亥"的名号干支属性相同。"冥"通"塓",据《说文》"塓,塗也"可知,其本义为塗泥、路土,作为人名本是代指地支第十二位"涂(亥)"。所以"冥=王亥"成立,事实上这也是先商世系中唯一干支属"亥"的王名。

其二,"冥"与"王亥"在殷人祭祀的列祖列宗中都拥有突出的地位。古文献中的"冥"享受国典"郊祭"之尊崇礼遇已如前述,他和享受"禘祭"的帝俊①、

① 按,今本《国语·鲁语》之"禘舜而祖契"明显当为"禘俊而祖契"之误。参见本书第四篇、第五篇。

享受"祖祭"的玄王契、享受"报祭"的上甲微一样都是先商的四大名王之一;而殷墟卜辞中的"王亥"无疑也享有类似的待遇,他不仅在各期卜辞中频繁作为被祭祀对象而出现,乃至有用"三百牛"之惊人重祀者,而且还与"高祖蹇"、"高祖河"一样拥有"高祖"的至尊头衔,此外他还是甲骨文中第一个被冠以"王"衔的统治者,是殷商族实际称王的第一人。

其三,"冥"与"王亥"在殷商世系中的位置也完全相同。结合《史记·殷本纪》记载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以及《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之"帝俊生禺號(昌若),禺號生……番禺(曹圉)……番禺生奚仲(冥),奚仲生吉光(王恆)"之谱系可知,"冥(亥)"的又一著名别号叫"奚仲(亥)",其谱系位置是在"曹圉(番禺)"之后、"王恆(吉光)"之前。因为,"奚"通"蹊",训蹊径、路途,作为人名也是代指地支第十二位"路踵=涂(亥)",所以"冥(亥)=奚仲(亥)"成立。(关于禺號=昌若、吉光=王恆参见下文。)而另一方面,根据《楚辞·天问》记载的"该(王亥)秉季德"、"恆(王恆)秉季德"、"昏、微(上甲微)遵迹"之三段连属历史情节可以推知,"王亥"与"王恆"是前后相继的连续两任殷先王。所以,"冥"与"王亥"的世系位置是完全相同的。

其四,"冥"与"王亥"的历史事迹也十分相似。《国语·鲁语》有云"冥勤其官而水死",也就是说,"冥"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的殷王。而《山海经·海内经》有云"王亥託(博)于有易……有易殺王亥",《古本竹书纪年》有云"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也就是说,"王亥"也是一个意外死于非命的殷王。显然,根据受到严密保护的古代君王意外死于非命之几率本来就很小的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先商史料中这屈指可数的两条记载其所指者本当为同一人:所谓"水死"之"冥"应该就是"淫死"之"王亥"。毕竟,"水死"与"淫死"不过一字之差,"冥勤其官"与"王亥託(博)于有易"也都是在描述一个为国事或国家利益奔忙于外的勤劳君主,对于一则距今近4000年的古老史料来说,有这么一点歧说异词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此外,《世本》有云"奚仲(冥)作车",同书又云"胲(王亥)作服牛",可见,"冥"与"王亥"在所谓"技术发明"上也是完全类似的,"作车"、"服牛"本是同一事物的两面,都是指发明了以牛拉车之运输技术。

因此,综合以上这四点证据,我们的最终结论是,历来基于对《楚辞·天问》之误读而产生的"季=冥"的猜想其实是难以成立的,真正的商先王"冥(奚仲)"在殷墟卜辞中的对应称号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高祖王亥"(《合集·

34286》)。当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既拥有旧式"隐性干支"名号,又拥有新式"显性干支"名号的人。而作为这么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其拥有众多的别名和称号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除了"冥"、"奚仲"和"王亥",他的名字还有别的写法,例如根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之"駱明(昭明)生白馬(伯亥),白馬是為蘇"云云可知,"王亥"即"伯亥(白馬)"另有别名曰"鲧",因为,"鲧 xi"古通"奚","鲧"即"奚仲"之略写。也就是说,"冥三奚仲三鲧三王亥三伯亥"成立。

(按,先秦六国文字之"馬"、"豕"、"亥"等字形极易混淆,史称"鲁鱼豕亥",故知今本《海内经》之"白馬"应为"伯亥"之讹。此外,《山海经•珂案》注解有云:

《世本》作篇作胲,云"胲作服牛";《御覽》卷八九九引同書則作鯀;知胲可誤鯀……

可见,在《世本》等先秦文献中,"王亥"确实本有一个别名为"鲧"。当然,此"鲧"非彼"鲧",中国先秦史中名为"鲧"、"舜"、"禹"、"羿"的人物其实都远不止一人:以"鲧"为名者已知就有传说中的"夏后氏"之祖先"伯鲧"、商先王"鲧=王亥"、楚先公"娄鲧=熊嚴"等等。后人不察,往往会把所有的"鲧"、"舜"、"禹"、"羿"都混为一谈。详说参见后文。)

(6)"吉光=王亙"考

根据《楚辞·天问》的记载,继"亥(冥)"意外被杀之后,接下来统治先商城邦的君主就是"恆"了。"恆"作为一代殷商君主虽然不见于今本《史记·殷本纪》,但却见于殷墟卜辞,即《合集·14762》之"王亙"。那么,"王亙"的身份究竟是否像王国维等人认定的那样是"王亥之弟"呢?自然,根据上文已经提及的证据,这个结论也是错误的。

《山海经·海内经》有云"奚仲(王亥)生吉光",而按照"干支取名制度",这个"吉光"明显就是指"王恆":因为,据出土西周金文中常见的天文学月相术语"初吉"可知①,"吉(结)"字的本义是指缔结新生的月光、植物结果生籽、生育;而"吉光"作为人名正如《楚辞·天问》中的"夜光"一样都是源自月亮的别

① 关于地支第一位星神"陬"之神职也兼为中国之月亮神,参见本书第五篇。

名,其与"恆"字完全可互训,都是喻义"如月之恆"的月亮(语出《诗经》),以及像月亮一样会"死则又育"的孕妇子宫(语出《天问》),都是代指孕育女神即地支第一位"浑沌=青章(子)"。因此,"吉光(子)=王恆(子)"成立。

因此,"奚仲生吉光"就是"王亥生王恆","王恆"本是"王亥之子"而非"王亥之弟"。当然,这个结论与《楚辞·天问》中"该(王亥)秉季德"、"恆(王恆)秉季德"之记载也并不矛盾,因为"王亥"、"王恆"两人无论作为父子相继还是兄终弟及,说他们同为"秉季(契)德"之殷王都是不会错的,因为他们都是"季(玄王契)"的直系子孙。

(7)"振=王吴"考

众所周知,除了"王亥"与"王亙",卜辞中还有另一个殷商远祖也被径直冠称为"王",那就是最让当代学者们感到束手无策的"王吴(矢)"(《合集·1825》)。显然,假如不了解"干支取名制度"的秘密,任何人想要凭空研究"王吴"这么一位既在史籍中缺乏明确记载,又一望而可知其必为殷商之先王的人物都将是很困难的:事实上,我们除了能像某些学者通过字音的近似性去凭空猜测"王吴"之"吴"与"曹圉"之"圉"的关联性外确实也别无他法。然而,基于"干支取名制度"的提示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王吴"其实并不是指"曹圉"或任何一位已经被当今学界所确认的殷商先公先王,对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学来说,他是一位还从未被"发现"过的"新"商王,殷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看来又要增添新的篇章了。

"王吴"究竟是谁?其实,《史记·殷本纪》对此早就有过明确的记载:"冥卒……振立;振卒……微立。"也就是说,"王吴"就是那位年代列在"冥"之后、"上甲微"之前的殷先王"振"。因为,"吴"通"矢",甲骨文"吴"、"矢"字形不分(见图 3-3),按《说文》"矢,傾頭也",可知"矢"的本义训倾斜,作为人名则代指"执徐(斜)"即地支第五位"辰"。因此,通过甲骨卜辞,我们再一次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价值:王国维等所谓商先公"振(辰)"乃是"亥"字之误的论断无疑是轻率而武断的,《史记》其实并没有错记"振(辰)"这位商先王的名字,"振"确实史有其人,"振(辰)=王吴(辰)"成立。当然,考虑到《史记·殷本纪》的世系还必须补上"王恆"一世,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振=王吴"其人乃是王亥之孙、王恆之子、先商的第十任君王。

而事实上,关于"王吴=振(辰)"其人,我们不仅可以从《史记·殷本纪》的 简略性记载中找到其最基本的世系关系,更可以从《楚辞·天问》记载的大段 文字中找到其更具体的历史事迹:

······昏(唇)、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 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後嗣逢长?

显然,假如没有"王吴=振(唇)"的关键诠释,那么上面这段著名的历史故事就是完全无法读得通的:其一,假如按照传统的注解,上甲微这位功勋卓著的国君为什么要被冠以"昏"这么一个既不贴切也不符合屈原遭词惯例的前置称谓?众所周知,无论是《天问》还是《离骚》,屈原的作品中从没有在具体人名前直接冠以褒贬性称呼的文例,即使桀、纣这样的顶级昏君也没有被称作"昏桀"、"昏纣"的。其二,"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之句今人或据"王恆为王亥之弟"假说释作"王恆缺德害死乃兄王亥",然而这样的解释明显是断章取义顾头不顾尾的,一者史有明载王亥是死于有易、有扈二氏之手与王恆无涉,二者下文也明确指出了"危害厥兄"的凶手是"後嗣逢长"的,假如"王恆是王亥之弟"则"後嗣逢长"的就不是"凶手"王恆,而是被他杀害的王亥(因为甲骨卜辞对王亥大量祭祀而对王恆提及甚少),这显然将导致《天问》的上下文互为矛盾扞格难通。

因此,我们唯有根据"王吴=振(唇)"的诠释以及古文字学的分析,把所谓的"昏、微"二字解读为两个人而非一个人,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天问》所指控的"危害厥兄"之真正凶手:今本《楚辞》所谓"昏",本当为"唇(辰)"字之形讹,即指《史记》中的"振"或卜辞中的"王吴",据上下文可知"昏(振)"本是王恆之子、上甲微之兄;(由此又可知《史记》称"振"与"微"为父子关系有误。)而"微"当然是指上甲微本人,他也是王恆之子。而所谓"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後嗣逢长"的主角当然不可能是指王恆而只能是指上甲微,因为只有他才既可以有"兄"(王吴)可害,又可以有"後嗣逢长"而绵延不绝(整个商王室的近四十代君主都不是王吴而是上甲微的直系后裔)。

(8) 试考卜辞中的昭明、昌若、經梁

综合以上结果,现在我们已经在殷墟甲骨文找到了七位重量级的殷商远祖:戌聚=简狄、高祖河=契、烊=相土、兇父=曹圉、王亥=冥、王亙=恆、王 吴=振。而显然,即使我们暂时还无法找到另外几位并不是很出名的商先公 如昭明、昌若等,我们也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确认,中国传世文献记载的先 商世系其在总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了。更何况,即使对于那几位最不出名的"平庸商王",我们也绝不是毫无线索可供寻绎的,事实上,基于"干支取名制度"的无所不在,我们同样可以在众多的甲骨文资料中轻松地找到他们的蛛丝马迹,只不过,由于他们都是些注定要露面机会稀少且并不享有"高祖"衔、"王"衔的轻量级人物,我们毕竟还无法像前述的重量级七王那样通过其在卜辞中的"出镜率"或尊称头衔来一步到位地确认他们而已。

例如,关于第三任商先公"昭明",根据《尔雅》"在辛曰昭煬"可知其名号对应的干支就是"辛"。因此,殷墟卜辞的祭祀对象"卲"无疑就很有可能是指"昭明"。因为,甲骨文"卲"字字形如图 3-3 所示作从"刀"从"卩",而"卲"可通"昭"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人名其确实可代指天干第八位"昭煬(辛)"。此外,据《合集·35174》"燎羊廿于卲"之记载可知,"卲"的受祭祀规格也不算太低。所以综合来看,"卲=昭明(辛)"是很有可能成立的。

又例如,关于第五任商先公"昌若",根据《尔雅》"在丑曰赤奋若"可知其名号干支就是"丑"。因此,殷墟卜辞的祭祀对象"真(〈火臣〉)"和"嗔(〈口臣〉)"无疑就很有可能是指"昌若"。因为正如图 3-3 所示,甲骨文"真"字字形作从"火"、从"臣"亦声,"嗔"字字形作从"口"、从"臣"亦声(参见《合集·22419》等),而"真(嗔)"为"瞋"的本字,训瞋目奋张、嗔怒号叫,作为人名确实可代指地支第二位"玄号=赤奋若(丑)"。(按,昌为苍、商之音讹,"昌若"即"商若"、"商王若"。)

此外又例如,相比《史记·殷本纪》的商王名单,《山海经·海内经》告诉我们"帝俊"一族的子孙世系中其实还应该再增加一名新成员"经梁":

帝俊生禺號(即昌若),禺號生经梁,经梁生番禺(即曹圉),番禺生奚仲(即冥),奚仲生吉光(即王恆)。①

而按《尔雅》"大梁, 昴也"可知, 商先公"经梁"的名号干支就是"大梁=昴=估(戌)", 因为经训经筹、度量, 梁通"量"训估量。因此, 殷墟卜辞的祭祀对象"묗(恂)"无疑就很有可能是指"经梁", 因为"零"甲骨文字形如图 3-3 所示作从"旬"从"兮"(参见《合集·32028》等), "旬"通"勾(钩)", 训钩衡称量、估

① "经梁"一本作"淫梁",此据北堂书钞本。参见《山海经·海内经》郝懿行注。

算计量,作为人名确实可代指地支第十一位"大梁=估(戌)"。

当然,关于第六任商先公"经梁=恂"的存在,除了《山海经》之外,《世本》的相关记载其实也可间接证明这一点。因为,相比《史记·殷本纪》而言,《世本》所记载的此段先商世系也多出一世:"昌若生粮圉,粮圉生根国,根国生冥……"(据《史记·殷本纪索隐》和《礼·祭法正义》引文。)可见,《世本》也认为在"昌若"和"冥"之间不只间隔一世而是应有二世,只不过,由于原本早佚,今见于诸书引文的《世本》其文字多已有错讹罢了。事实上,《世本》的此段原文很可能是"粮(经梁)、圉(曹圉)生冥",经过辗转传抄才讹变成了"粮圉"和"根国"之二世。

(9) 卜辞中的完整先商世系

总之,基于以上的"王名干支密码"分析,在传世文献和出土甲骨文的双重证据支撑下,至此被争论了百多年的殷商王室之世系终于可以第一次以完整而可靠的面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一度被学术界视为历史缺失一环的上甲微以前之先商远祖世系,现在业已被殷墟甲骨文证明是完全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干支密码"能给我们复原的先商世系共计有15.5世16.5 至(成汤因身跨夏、商两朝计为0.5世),除了上甲(微)、厂丁(报丁)、厂乙(报乙)、厂丙(报丁)、示壬(主壬)、示癸(主癸)、成汤这6.5世已知的商先王之外,其更早的九世十王可完整列表如下(表3-1):

	文献中的王名	卜辞中的王名	王名的干支	与前任关系	殷墟卜辞例证	
1	簡狄、帝俊	変(要)、咸 変 (戌變)、高祖矣 (高祖變)	鶉火(未)	契之母舅,商 国的前身"有 威氏"(有城 氏)统治者	《合集•33227》	
2	契、玄王、帝鴻、 帝江、季(系)	河、高祖河	玄、河 灘 (申)	商 王 朝 建立者	《合集•32028》	
3	昭明、骆明	邵(〈刀阝〉)*	昭阳(辛)	子	《合集•35174》	
4	相土、晏龍	烊	相羊、天睢(午)	子	《合集•33331》	
5	昌 若、禺 號、 禺猇	真(〈火臣〉)、嗔 (〈口臣〉)*	赤 奮 若、玄 枵(丑)	子	《合集•22419》	

表 3-1 先商王名干支与世系表(上甲微之前) 约西元前 22—前 19 世纪

(续表)

	文献中的王名	卜辞中的王名	王名的干支	与前任关系	殷墟卜辞例证
6	經梁、禺京、糧	詢*	大梁(戌)	子	《合集•32028》
7	曹圉、番禺、乌曹、胡曹、沮诵	兇父、兇	强圉(丁)	子	《合集•34266》
8	冥、王亥、該、奚 仲、白亥、鲧	王亥、高祖亥、 高祖王亥	大蜵巘(亥)	子,上甲之祖父	《合集•34286》
9	恆、吉光、仓颉	王亙	浑敦(子)	子,上甲之父	《合集•14762》
10	振、昏 (唇)、 天虞	王吳	執徐(辰)	子、上甲之兄	《合集•1825》

主要资料来源:《甲骨文合集》、《史记》、《山海经》、《楚辞》、《世本》、《尔雅》。 (注:带"*"号之卜辞名号为初步按干支取名规则释定,有待进一步之证据者。)

三、狭义先商史的年代学框架

谁是甲骨文中最早的史实人物?毫无疑问,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最终发现,殷墟甲骨文可以有效追溯的史实不仅远比甲骨文本身(前 14—前 11 世纪)要早,远比商朝本身(前 17—前 11 世纪)要早,也远比上甲微时代(约前 19世纪)要早:高祖婴(未)、高祖河(申)、卲(辛)、烊(午)、嗔(丑)、詢(戌)、兇(丁)、王亥(亥)、王亙(子)、王吴(辰)这十位甲骨文中最早的史实人物不仅可以把中国信史的起点提前到狭义的先商时代(proto-Shang,约前 22—前 17世纪),而且也一举突破了"夏朝是否存在"这个中国历史学的瓶颈。毕竟,夏王朝无论存在与否,现在都已经不再是中国先秦历史的最重要问题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与"夏朝"(约前 22—前 17世纪)时间跨度大致相当的"狭义先商时代"来作中国历史的新标杆。(何况,正如下文我们即将证明的,存在于甲骨文中的"干支取名制度"同样可以间接证明夏王朝的真实存在。)

那么,高祖變、高祖河等先商完整世系的最终确定,究竟是如何导致"西元前 22—前 17 世纪"这个年代学框架数据的得出的呢? 关于这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还得从"三十年为一世"这个中国古代最最重要的时间观念分析起。

(1)"三十年为一世"考

众所周知,综合考古测年和古文献记载数据的推算,中国"周朝"代替"商

朝"的绝对年代大致可以确定为不晚于西元前 11 世纪中期,而由此上推,我们现在要估算甲骨文中的殷商第一王"高祖婴"的大致在位年代无疑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已知整个商代共计 16.5 世 29.5 王,整个(狭义)先商时代共计有 15.5 世 16.5 王,而且也已知这些君主都是按父系的世袭制度连续统治的,所以,只要我们能证明,《说文解字》所谓的"三十年为一世"是个既符合统计学原理又符合历史事实的可靠数字,那么整个商朝和先商的年代学框架数据就可以由此较准确地得到了。

生物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相比于人类个体寿命的寿夭不等,人类血缘大家族的世代更替周期基本上是一个稳定值("工业革命"以前尤其如此)。譬如,以先秦时代的中国世袭君主为例,尽管其每任君王的具体在位年数可以相差悬殊(比如商中宗在位七十五年而鲁考公仅在位四年),但其基于父系继承制度的"每辈平均在位年数"却正如中国古籍所说都是稳定在三十年左右的,也即《说文解字》所谓的"三十年为一世"。显然,假如这个统计学数据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和普遍适用性,中国古人是绝不会特地为其造出一个汉字"世",并将其当成常用词汇大量使用的。

当然,对于我们想要重建的先商年代学而言,光凭古人自己说过"三十年为一世"还是不足为据的,我们更需要的是第一手的实测统计数据。那么,"三十年为一世"的说法究竟是否有实测数据的支持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史记》、《左传》等记载的西周、春秋之大量年代学数据来作直接验证:正如表3-2 所示,在西元前 9—前5世纪之间,周代中期的十二个世袭王室其父系血统连续换代的年限普遍都在26.5—32.3 年之间,平均约为28.3 年,这与"三十年为一世"的中国古代公认数据无疑是十分接近的。

国别	连续在位统治的君主 总人数、总世数	取样的连续在位总年数	每世平 均在位	每人平 均在位
鲁	12世18君(真公哀公)	388年(前 855—前 468)	32.3年	21.5年
齐	10世14君(武公—灵公)	297年(前850—前554)	29.7年	21.2年
晋	7世11君(文侯-景公)	200年(前780—前581)	28.6年	18.2年
· 秦	13 世*16 君(秦仲—哀公)	344年(前844—前501)	26.5年	21.5年
楚	14世21君(熊勇惠王)	416年(前847—前432)	29.7年	19.8年

表 3-2 周代中期世袭君主在位年数统计

(续表)

_				
国别	连续在位统治的君主 总人数、总世数	取样的连续在位总年数	每世平 均在位	每人平 均在位
宋	15世19君(釐公—景公)	406 年(前 858—前 453)	27.1.年	21.4年
卫	12世16君(釐侯灵公)	362年(前854—前493)	30.2年	22.6年
陈	12世16君(幽公—哀公)	321 年(前 854—前 534)	26.8年	20.1年
蔡	11世13君(夷侯-平侯)	316 年(前 837—前 522)	28.7年	24.3年
曹	13世19君(夷伯—靖公)	363年(前864—前502)	27.9年	19.1年
郑	13世18君(桓公-声公)	343 年(前 806—前 464)	26.4年	19.1年
周	10世*10王(厉王—襄王)	254 年(前 872—前 619)	25.4年	25.4年
均			28.3年	21.2年

注: 本表主要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并参考《国语》、《左传》、出土金文等。带*号者为太子未即位而长孙即位所导致的总世数多于实际在位君主之世数的情况。晋国的世系在晋文侯以下取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晋武公支系计算,周的王数计入了共伯和(摄王)。

因此,事实很明显,对于先秦时代的任何中国世袭王室来说,"三十年为一世"无疑是个既符合生物学规律和统计学原理,又符合史实的可靠数据,是我们可以用来计算西周、商乃至先商时代诸王朝之绝对起讫年代的"年轮"基准。只不过,在具体的应用上,我们还应该视实际情况而合理运用这个数据,因为,真正的"君主世代平均在位年数"除了是以生物学的世代更替周期为基础,还会受到世袭制度本身的影响而有所变化:

一方面,对于某些严格执行"嫡长子长孙继承制度"的王室,由于其尽量排除了幼子们的继承权,所以会使父子年龄差距和"一世"的时间跨度都明显缩短。例如,表3-2中的中期之周王室其"一世"仅有25.4年,明显短于同时代既容许"嫡长子"也容许"幼子"继位的其他诸侯国;又例如,从周成王到周厉王(截至共和元年),以"嫡长子"继位居多的早期周王室共历7.5世有余,然而同时间段内的晋、曹、蔡、齐、楚、宋等国之君位都仅传了6世左右,鲁国更仅传了不足5世(鲁真公在位其实只有一半在共和元年前,故也可算作4.5世),可见对于早期的周王室其"一世"的长度同样偏短,仅约为同时间段内晋、曹、蔡、齐、楚、宋等国的6/7.5=80%左右、鲁国的5/7.5=67%左右。

而另一方面,对于某些为了保障"幼子继承权"而特设"兄终弟及"继承制

度的王室则恰恰相反,由于在此制度下年幼的少子们只要不死都可继位,其 "一世"的长度则明显加长。例如,吴王寿梦(前 585—前 561 年在位)为了保 障其最喜欢的幼子季札的继承权,特设规定其四个儿子诸樊、余祭、余眛、季札 必须"兄终弟及"依次继位,假设季札(西元前 485 年仍然健在)没有最终"让 位"而也像其三个兄长一样依次合法继位,那么吴国该二世的总长度将超过一 百年,平均"一世"超过五十年;又例如,鲁国早期的五世八君(伯禽至鲁真公) 之中,有三世实行的是事实上的"兄终弟及"(考公之弟炀公、幽公之弟魏公、厉 公之弟献公),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鲁国早期(共和元年之前)的"一世"长度明 显偏长,其约为同时间段内晋、曹、蔡、齐、楚、宋等国的 6/5=1.2 倍以上、周王 室的 8/5=1.6 倍以上。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与人类寿命不断递增的历史趋势不同,中国世袭王 朝"一世"的平均长度并不是不断递增的,事实上,其一直是稳中有所递减的 (刨除一些非汉族的朝代)。相比西周之前的至少"三十年一世"、周代中期的 平均"28.3年一世",战国时代三大强国的"一世"普遍开始锐减:秦国由 26.5 年锐减到 23.3 年(最后十世),楚国由 29.7 年锐减到 23.2 年(最后九世),晋 国由 28.6 年锐减到赵国的 20.2 年(最后十世)……至于帝国时代的"一世"更 是普遍仅有二十余年:西汉十世十二帝(不计末世孺子婴)统治 212 年,平均 "一世"仅得 21.2 年;唐朝十三世二十帝(不计末世哀帝)统治 287 年,平均"一 世"仅得22.1年;明朝十二世十六帝统治276年,平均"一世"也仅得23 年……而很显然,这种锐减的原因同样还是与中国君主世袭制度本身的变革 有关:在战国之前,君主们实际继承的主要是父兄的"私产"即家族领地(即使 是周天子其直接权力也仅限于王畿的几百里领地以内),故"长子"与"幼子"作 为原则上拥有同等"民事继承权利"的私人个体谁上谁下并无大碍(因为不继 承君位者仍然有其他"遗产"领地可继承);但在战国秦汉之后,帝王们继承的 主题则变成了集权制度下的"公权"即无限皇权,故"皇长子皇长孙"与"皇幼 子"在原则上就是并不平等的"国家未来统治者"与"私人被统治者","公"与 "私"之分可谓是泾渭分明。所以,为了集权政治的需要,"皇长子(例如唐代 宗)"、"皇长孙(例如明宣宗)"乃至于"皇曾长孙"(例如汉宣帝)继位的比例都 必然会增加,再加上与集权经常伴生的弑君、废君意外事件之增加,集权体制 下"一世"的长度常常被人为缩减就很难避免了。因此,在刨除了战国秦汉以 降不适用"三十年一世"的诸王朝之后,先秦时代的所有王朝无疑都是能适用

"三十年一世"这一统计学数字进行王朝积年估算的,只不过,正如表 3-3 所示,在实际计算时我们还应该在三十年之上乘以一个"制度类型修正系数"。

世袭继承制度的 类型	兄终弟及制 (幼子制)	父死子继制 (长幼兼容制)	长子长孙制
"一世"的绝对长度	≥35 年	28.3—30年	≤25 年
制度类型修正系数	≥1. 2	1	≪0.8
典型实例	商朝(汤以后)、鲁国(早期)	先商、卫国、蔡国、姜 姓齐国、楚国(中期)	周朝(中晚期)、秦国 (晚期)、楚国(晚期)

表 3-3 先秦世袭王朝的"世"

(2) 商代积年与先商积年

综合以上的统计和分析,既然我们已知"三十年为一世"对于不同的世袭体系应该采用不同的算法,那么我们要估算商朝和先商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总积年无疑也应该采用完全不同的统计标准。

首先,对于虽然实行"父死子继"制度但并不强调"长子"或"幼子"的先商来说,采用"28.3—30年一世"的普遍性数据无疑是比较合理的,故先商 15.5 世(高祖變至商汤代夏之前)共计约 15.5×28.3=439年或者 15.5×30=465年,而考虑到殷人比其他族群对"幼子"更加偏爱之传统(例如"王亥=奚仲"排行老二,"仲"暗示了其前面也许还有史料失载的商先公、"上甲微"则是"王吴"之弟,他们都不是长子),我们可舍去偏低值而直接取先商总积年为大约465年。

而对于明显已改为实行"兄终弟及"制度的商王朝来说(就像原本也实行"父死子继"的吴国到了寿梦突然规定要"兄终弟及"一样),其"一世"的长度则至少要提高 1.2 倍,也即表 3-3 中"兄终弟及制"的"修正系数"下限,故商朝(商汤代夏之后)16.5 世共计约 $16.5 \times 28.3 \times 1.2 = 560$ 年或 $16.5 \times 30 \times 1.2 = 594$ 年,两数平均并取整可得商朝总积年大约为 580 年。

而在有了以上这些可信数据的基础上,那么先商年代学的框架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假设商朝灭亡于西元前 1050—前 1100 年左右①,那么加上 465+580

① 关于商朝灭亡的日期,中国史料中其实是有精确记载的,只不过其释读同样有赖于"干支密码",限于篇幅,作者将另文专述。此处仅先指出,该日期在西元前1050—前1100年之间。

年就可以得到先商第一王"高祖夒"在位的开始年: 西元前 2100 年左右(前 22世纪末期);而商朝的开始年则接近西元前 1650 年左右(前 17世纪中期)。

总之,相比碳14测年所面临的考古材料取样不确定性和校正方法不确定性①,以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为直接证据的先商历时15.5世和商朝历时16.5世无疑是两个100%精确的数据。而以此数据推算出的先商和商朝总积年是我们目前所能知道的可靠度、精确度都最高的年代学数据。所以,在我们处理相关年代数据之时,理应以此为主来甄别拟合其他数据(包括考古学的测年数据)而不是相反,就像同时出土的周代青铜铭文纪年可以甄别和否定某些碳14测年数据一样。而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确定,目前公布的某些年代偏晚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测年数据其实是有问题而应该舍弃的,至于和以下这些已公布数据相类似的测年数据则必须取其上限(埃及学和亚述学的年代数据其实也是经过类似的舍弃和修正而得出的):

偃师商城一期二段之 98YSJ1D2T1009G3(木炭)为: 西元前 1621—前 1524 年; 郑州二里岗下层—期之 98T232 夯土 VII(木炭)为: 西元前 1618—前 1537 年; 郑州二里岗下层—期之 C1H9: 25(卜骨)为: 西元前 1616—前 1546 年;

当然,除了碳 14 测年,古文献中关于商代积年的记载也同样可以用此来 甄别拟合:例如《左传·宣公三年》所谓"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以及 《孟子·尽心下》所谓"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无疑是来源自殷遗民的有 据之言,足以与甲骨文的世系年代互相印证;而《鬻子》所谓"汤之治天下也…… 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虽然貌似接近事实,但其数据居然能精确到个位数则 是很值得怀疑的,理应被看作是某种加工拼凑所得而非原始数据。

四、用干支密码复原的狭义先商史

其实,除了能比照甲骨文以证明先商远祖世系的真实存在性,"干支密码"的破解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无疑还有着更为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它还能进一步地证明绝大多数中国传世古文献其内容的可靠性和来源的古老性:正如描写

① 碳14 测年数据如果不被各种理论和技术"校正"过是根本无法使用的,但如何"校正"才算最合理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事实上,世界各地的碳14 测年数据其"校正"方式也是需要因地制宜、没有统一标准可言的。参见 R. Berger: Ancient Egyptian Radiocarbon Chronology, 1970 年。

商、周以降历史的中国古典文献如《逸周书》、《周易》、《今文尚书·商书》等总体上无可置疑、证据力等价于甲骨文、金文、简帛一样,现在通过比较勘核甲骨文中的隐秘部分,我们进一步得知,举凡描写先商历史的中国传世古文献(成书不晚于先秦者)本来也都是些非虚构的可靠资料,因为它们所带的"干支密码"信息格式是与殷墟甲骨文完全一致的,其最早的文本来源显然是与甲骨文同样古老的,绝非不懂"干支密码"的后人所能伪造得了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将这些古文献当作带有"干支密码"的隐秘资料去认真重读而非仅仅作字面的附会,那么其证据力同样可媲美于甲骨文。

譬如,无论是对于广义的先商时代(pre-Shang)还是狭义的先商城邦(proto-Shang)来说,《山海经》这部到处充满了"干支密码"、到处可以与殷墟甲骨文互相吻合的神秘作品,无疑就是这么一份最典型的"甲骨文级别"之传世文献。

众所周知,自从王国维等学者发现《山海经》在诸多方面(例如其记载的所 谓"四方风"和"四方神"神话体系等)是极少数可以和殷墟卜辞内容直接呼应 的一种超级古老文献以来,《山海经》在学术界的地位就已经从"荒诞的神话作 品"变成了"有史料参考价值的作品"了。而现在通过对"干支密码"的破译,我 们更惊奇地发现,《山海经》中成书最早的部分,即四篇《大荒经》和一篇《海内 经》,其有关先商世系描述的完整性和可靠性甚至超过了正史《史记·殷本 纪》:对于表3-1所列的卜辞所见之殷商前十王,《山海经》不仅全数尽录其王 名(帝俊、帝鸿、骆明、晏龍、禺號、经梁、番禺、王亥、吉光、天虞),而且其世系关 系描述在考虑了"某生某"之格式可以泛指父生子("番禺生奚仲"等)或远祖生 裔孙("帝俊生禺號"等)的情况下也全部符合《史记》、《楚辞》以及甲骨卜辞的 综合记述;而相形之下,《史记》本身不仅在世次上漏记了"经梁"和"王恆"这两 位商先王,即使在其具体的人名用字上也没有《山海经》的帝矣、帝江(鸿)、禺 號、王亥等更加接近于卜辞用字的原汁原貌。显然,对于先商历史来说,《山海 经·大荒海内经》^①独一无二的价值是任何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一方面, 《山海经》对先商列王世系、先商神话、先商的"隐性干支取名制度"等记载与甲 骨文完全吻合,足以证明其本身乃是一份"甲骨文级"的宝贵文献;而另一方

① 本文将今本《山海经》中的《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海内经》 五篇合称为《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下文皆同。

面,由于《山海经·大荒海内经》还广泛记载了中原各族群、各王朝的天文地理、宗教文化、政治军事、科技发明等多方位的信息,其信息来源的丰富性更是连只记殷商本朝而忽略非殷外族、只重占卜而忽略其余侧面的殷墟甲骨文本身都无法比拟的,其对于研究甲骨文涉及内容之外的殷商历史,乃至于殷商城邦以外尚无甲金文字等直接证据的其他时空之中国文明史而言,都是最为权威的史料。因此,一句话,如果说殷墟甲骨文是研究"殷商史"本身的"圣经",那么同样来源于"甲骨文时代"的《山海经·大荒海内经》就是研究"狭义先商史"乃至整部"广义先商史"的"圣经"。

而一旦我们明确了《山海经·大荒海内经》等先秦文献堪比"超级甲骨文"的价值,那么我们对"狭义先商史"乃至"广义先商史"就会有更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了,毕竟,干瘪无味的甲骨文先公先王名单绝对不是有血有肉的先商历史之全貌。下面,就让我们用"干支密码"破解过的《山海经》等古文献作指引,首先来看看"狭义先商史"除了表 3-1 所列的简单世系外还能有什么更丰富多彩的史实可以被我们重新发现。

(1) "天命玄鸟(申)"与先商思想史

首先,关于"先商"的思想史,结合"干支密码"证据和《山海经》等证据,我们显然马上就可以还原出一个重大的历史真相,那就是在近代学术界风行了多年的所谓"殷人信仰玄鸟图腾"和"殷人源于信仰鸟图腾之东夷族"的假说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它们都是在对古文献的错误解读下得出的错误结论。

因为,正如我们前文已经分析的,按照"干支取名制度",《诗经·商颂·玄鸟》所谓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实只是指商祖"玄王契(申)"个人得名于某种中国式"鸟占术"(ornithomancy)的占卜结果"玄(申)",而不是指整个殷商族群都信仰什么"玄鸟图腾"(如前述所谓"天命"即某种占卜术所显示的"天兆")。尤其是,假如我们考虑到,"鸟"字在《山海经》等"甲骨文级别"的古文献中其最初含义并非是字面的"禽鸟",而是所有动物的总称(其文常称"虎豹熊罴"为"四鸟"),也即"飞鸟"、"走兽"、"水族"等的总称,就像"海"字在《山海经》中是"海洋"和"陆地"之总称一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诗经·商颂》所谓的"天命玄鸟"占卜术其实与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与殷墟遗址之主人常常以被屠杀的牛(胛骨)、龟(甲)等动物作占卜工具是十分类似的:两者明显都相信动物可以占卜通神,但动物并不是神祇本身或所谓"图腾",而仅仅是祭神的特殊牺牲品。因此,对于《商颂·玄鸟》提及的"玄鸟",我们理应作如是观:此"玄(申)"

本非彼"玄(黑)",此"鸟(动物)"也未必本是彼"鸟(燕子)",近人仅仅据此只言 片语而提出的所谓"殷人信仰玄鸟图腾"假说明显是缺乏充分证据的。

当然,除了上述的严重误读,"殷人信仰玄鸟图腾"假说还存在一个最致命的漏洞,那就是我们在《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中居然找不到任何关于"殷人崇拜玄鸟图腾"的记载。试想,假如"玄鸟"真的是殷人的主要神话崇拜对象或曰"图腾"的话,那么它就完全应该以主角的身份大量出现在《大荒海内经》的记载中,因为,《大荒海内经》就其内容来看无疑就是殷人所作的以殷商神话为主题的著作(虽然今本有楚人添加成分),该书尊奉的主神是甲骨文中的殷商主神"帝"以及"四方神"、"四风神"等等,该书夸耀的主要"圣王"是甲骨文中的殷商第一王"帝俊(高祖變)"及其众多真真假假的"帝俊子孙"……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玄鸟"这一名词在《大荒海内经》中除了曾与一些野兽(青鸟、黄鸟、黄蛇、玄蛇、虎、豹、熊、羆等)和矿产(璿、瑰、瑶、碧等)一起列作两座荒山的"土特产品"或"陪葬牺牲品"被偶尔提及以外,其实并未作为任何实质性的神格或人格角色出现过。可见,《山海经》于殷族神话无所不包却独独不谈"玄鸟图腾"的事实证明,"玄鸟"确非殷人的神话信仰对象或"图腾物"。

因此,事实证明,西元前 3—前 2 千纪的殷人绝不是一个还停留在所谓"鸟图腾"原始信仰阶段的愚昧民族,无论是在殷墟甲骨卜辞的祭祀对象名单中,还是在《山海经·大荒海内经》的神话谱系中,殷人都是很明确地把非动物性的抽象神祇"帝"而非"玄鸟"列为最高信仰的。至于所谓的"鸟",正如前文已述的,殷人有泛称陆地和海洋为"海"、泛称飞鸟和走兽为"鸟"的习惯,在《山海经·大荒海内经》里"鸟"不过是所有动物的泛称,任何飞禽走兽都可以被殷人称为"鸟",任何凡人都可以"使四鸟——虎豹熊罴",即把它们当奴仆牺牲品来使用。也就是说,按照古文中的"鸟=兽"之自我诠释,所谓的"天命玄鸟"之中国式"鸟占术"其实就是"兽占术"之一种,也即殷墟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中最常见的"牛羊骨占卜"和"龟甲占卜"之类似占卜术罢了。

此外,关于殷人对待包括"玄鸟(燕子)"在内的所有"鸟(禽兽)"的总体态度,我们除了可以从《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之主观描述中体会得到,也可以从诸多考古证据之客观展示中体会得到。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殷人捕杀燕子的明确记载:

"隻(獲)燕五十……"(《海外甲骨录遗》)。

显然,事实证明,燕子或曰"玄鸟"这种动物在殷人的眼里不过就像野猪、麝鹿一样,都只是一种可抓可杀、可玩可吃的普通猎物兼牺牲品,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图腾"意义可言,殷人捕杀燕子纯属家常便饭。尤其是,假如我们还考虑到除了燕子之外雀、鹬、乌、雉等鸟类无不是见于甲骨文的捕猎屠杀对象,我们甚至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认为,"捕鸟业"本来就是殷人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因为,这不仅可从殷人创造的甲骨文"擒(華)"字是一张捕鸟网的象形、"獲(隻)"字是伸手抓鸟的象形可以看得出来(图3-4),更可从著名的商汤王"网开三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得出来:假如捕鸟业不是"先商"城邦随处可见、地位重要的产业,那么商汤王就不太可能随便逛一圈就会遇见"野张网四面",从而让其有机会表演"网开三面"、"德及禽兽"的政治作秀了。因此,甲骨文、金文和诸多涉及殷人与动物关系的出土文物都能证明,像殷人这样的对上天捕鸟、下水抓鳖、平地手格猛兽都乐此不疲的经济实用主义之民族,是绝不会产生什么膜拜"动物图腾"之冲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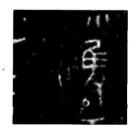


图 3-4 殷族的捕鸟业: 殷墟甲骨文的"擒"字和"獐"字(前 14—前 11 世纪)

总之,综合殷先王名号的"干支密码"分析、《山海经》中的殷族神话、殷墟出土文物中的"捕杀玄鸟"证据来看,始于西元前 22 世纪的殷商民族本是一支早已超越了原始图腾思维的汉语族群,他们非但不把"鸟(兽)"当"图腾"崇拜物,反而将之视为占卜牺牲品:所谓"简狄吞玄鸟卵"和"王亥两手操鸟"其实都是在实施中国式的"杀鸟(杀兽)卜吉"占卜术,其行为模式与后世的商王盘庚和宋元君"杀龟以卜吉"如出一辙,都是殷人重视抽象术数、绝不膜拜具象动物之基本思维境界的体现。而既然"殷人信仰鸟图腾"的假说不能成立,那么由此派生的所谓"殷人源于信仰鸟图腾之东夷族"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2)"乌曹(丁)作博"与先商经济史

其次,关于"先商"的经济史,结合"干支密码"证据和《山海经》证据,我们

同样可以还原出一个关键的历史真相,那就是"先商"城邦与后世中国的诸多 "重农轻商"王朝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对工商业十分重视的有"重商主义"倾向 的社会,或者说至少是个"商农并重"的社会。

虽然,按照静态分析,世界上任何一个西元前2千纪的社会,其经济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林、牧、猎、渔等"靠天吃饭"的产业,其手工业都是附属性的产业,其商业的绝大部分都是非货币化的实物贸易,但是,按照动态分析,这依然不妨碍我们一眼就分辨出它们之间事实上还存在的"重商"倾向和"重农"倾向之本质区别。那么,"先商"城邦究竟是像注重"商品经济"的苏美尔人或腓尼基人那样是个"重商主义"的社会呢?还是像执行"耕战立国"政策的西周王朝和秦王朝那样是个"贵农贱商"的农业社会呢?显然,与传统史料的字面描述相比,"干支密码"破译的《山海经》等文献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那就是"先商"城邦确实是个重视工商业的社会,因为至少在商汤灭夏之前,"先商"城邦就已经拥有了以下这些足以体现其"重商主义"经济倾向的重要产业。

其一,船舶制造业。《山海经·海内经》有云"番禺是始為舟",显然,根据"干支密码"告诉我们的"番禺(丁)=曹圉(丁)"以及考古学的线索,我们不难推断,造船业这项被直接系于商王曹圉名下的产业无疑是"先商"城邦十分重视的产业之一。因为,正如《史记》所说的,"殷人都河内",考古学上的"先商"下七垣文化所在地即"河内"地区在西元前3一前2千纪本是一个三面环水之地,其东面和南面为古黄河的大拐弯所包围,其北面是大陆泽和漳水等诸多古黄河支流水系,而其西面则是险峻的天然壁垒太行山。因此,殷人的远祖们无论是要想北上与非汉语诸族展开贸易还是要想东进南下与东夷、夏桀争霸中原,离开船这一必备工具都是寸步难行的。当然,造船术并不是殷人祖先的首创,在考古学上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已经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山海经》所谓的"番禺(曹圉)是始為舟"应该理解为,从先商第七代君主曹圉(番禺)时代开始殷人才有了本族的造船产业。当然,船舶运输古往今来一直是商业经济的基础组成部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其二,纺织制衣业。《世本·作篇》有云"胡曹(曹圉)作衣",也就是说,"曹圉"统治时代殷人不仅初步建立了本族的造船业,而且也初步建立了本族的作坊化纺织制衣业。当然,在男耕女织的年代,纺织业无疑是人类最大的经济支柱产业,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丝绸产业的发源地更是如此(距离河内地区不远的

荥阳青台遗址已经出土有距今 5 500 多年的世界最古老丝织实物)。再加上,布帛纺织品还是中国最古老且沿用时间最长的贸易支付手段即"硬通货",其自诞生以来直到近代一直都扮演着或明或暗的"准货币"角色,所以,重商主义的"先商"城邦是绝不会忽视这一产业的。

其三,弓箭制造业。《世本·作篇》云"挥(相土)作弓","挥"通"徽"训"天徽(午)",即商先王"相土(午)"之别名①。毫无疑问,以弓箭为代表的武器制造业是任何一个上古城邦或部族所必不可少的,而商汤王最终能够"一统天下"之事实,无疑也证明了先商城邦的弓箭制造业必不落后于任何其他城邦或部族。当然,殷人并非是中国弓箭的最早发明者,《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之"少皞生般,般是始為弓矢"告诉我们,中国最早的"国营"弓箭制造业是诞生于东夷"少皞氏",而山西峙峪遗址出土的距今约 2.8 万年的石镞则暗示了中国人发明原始弓的年代理应更为久远。所以,"挥(相土)作弓"同样应是指殷先公相土时代是殷人本族的"国营"弓箭业初步建立之时代。当然,正如枪炮是早期远洋商队的必需品一样,弓箭也是早期中国商队的必需品。

其四,酿造业。《世本·作篇》有云"仪狄(简狄)造酒",也就是说,远在先商第一王"简狄(帝俊)"统治的时代,殷人就有了自己的酿造产业。当然,从考古学上看,中国的酿造技术和造船、造弓、丝织技术一样都是世界范围内的领先者,早在8000多年前贾湖遗址的主人就酿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酒。所以,始于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时代的"简狄酒"并非是中国最早的酒,而只是中国最早的"名酒",比著名的"杜康酒(以夏王少康命名)"还要早。不过,由于酒对于古代人类的文化和经济之影响十分巨大,它既是最早的宗教祭祀必需品,也是最早的可精确计量商品之一,因此,"先商"城邦假如没有自己的酿造业支撑将是很难取得其精神上的政治资本和物质上的经济资本来与夏后氏王朝作正面对抗的。事实上,《尚书·酒诰》早就暗示我们,殷人本就是一个"湎于酒"、以酒自豪的族群,他们古老发达的酿酒业正是"先商"城邦发祥的标志,也是殷人重商主义经济的源头。没有酒,就没有"仪狄王"(帝俊),没有所谓的"商"族(甲骨文"商"字明显像一酒器);没有酒,也就没有后来的殷商青铜礼器、青铜文明。

其五,商业和运输业。《世本·作篇》有云"乌曹(曹圉)作博(贸易)",《山

① 关于"挥"本是殷商先王的进一步考证,参见本书第五篇。

海经·大荒东经》有云"王亥託(博)于有易、河伯、僕牛",《楚辞·天问》有云"恆(王亙)秉季德……往營班禄(经营贸易)"。(按,"託"通亳、博,《韵会》"博,貿易也"。班通颁,即颁赐、互赐;禄通録,训録取、采购;班禄,即指著名的中国式"贡赐"贸易、互赐交换。)显然,与其他产业不同,作为"商人"这个双关语的描述对象,博弈商贸、班禄贡赐无疑是"先商"城邦真正的"民族产业":无论是股族大规模"国家贸易"的开创者"乌曹(曹圉)",还是王亥、王恆这两代名王,历代"先商"君主对于其商业经济的直接投资和经营都是十分重视的,殷王王亥还因此命丧他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绝无仅有的为经营商业而殉职的国王。当然,有鉴于"先商"城邦的国际贸易范围十分广泛,其贸易对象包括了有扈氏、有易氏、僕牛氏、河伯氏(指古黄河边上的一个夏王朝之属国,详说见后文)、北方戎狄等等所有邻邦,因此,"先商"城邦也必然有发达的长途运输业来支撑其国际贸易,此即《世本》记载的"胲(王亥)作服牛"(牛背运输业)。此外,正如前文已述,"先商"城邦的其他产业,说到底也无不是通过服务于其"服牛商队"为其提供硬通货(布帛)、土特商品("仪狄牌"的美酒)、武装保护(弓)、摆渡工具(舟)等等而最终体现其价值的。

因此,综合分析以上各项"先商"城邦拥有的经济产业来看,"先商"城邦虽然在客观上还比不上"夏后氏"城邦那"禹贡(贡赐贸易)通九州"的贸易规模或二里头遗址那堆满了青铜器、货贝、漆器、宝石、美玉之库藏和各种大规模作坊的经济实力,但在主观上我们确实已经可以看出其"重商主义"的经济发展倾向:其由《尚书》所谓的"百宗工"所组成的半独立性工商经济,是与周代以后受国王或官府严格管制的非独立性附属型工商业是完全不同的。商民族确实无愧于其"商"的称号。

(3) "奚仲(亥)作车"与先商科技史

再次,关于"先商"的科技史,结合"干支密码"证据和《山海经》等证据,我们其实还可以还原出一个有趣的历史真相,那就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车辆制造发明者"奚仲"并非是什么"东夷薛国人",他其实就是殷先王"王亥",是个血统纯正的殷人;而中国车辆制造技术的真正"专利所有人"也并非是某个个人而是一个宗族集体,这个集体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技术工程师世家"奚仲氏",他们是殷先王"王亥"的一支旁系后裔子孙。

殷遗民孔子有云:"殷路车为善。"显然,结合考古发现,我们知道,孔夫子的这个说法绝对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殷墟发现的诸多车马遗迹足可说明,殷

商民族确实是中国最早的轮辐式马车之实际制造者。而由此进一步上溯至早商及先商时代,根据考古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车辙遗迹、偃师商城车辙遗迹(约前18—前17世纪)以及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青铜车唐陶范(约前17—前16世纪)等证据,我们同样知道,殷商族群也确实是中国最早的原始车辆制造者之一。(当然,和前述的造船、纺织、弓箭、酿造等一样,造车技术也很可能并非是殷人最早发明的,而是从二里头遗址的主人"夏后氏"那里学来的。)

那么,从夏代末年的人力小车直到殷代末年的轮辐式驷马战车,殷人的车辆具体究竟是谁所制造的呢?显然,根据"干支密码"告诉我们的"奚仲三王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令殷遗民们倍感自豪的造车世家就是"王亥"的后裔"奚仲氏"家族。

《世本·作篇》有云"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有云"奚仲生吉光,吉 光是始以木为车"。显然,"造车"与"奚仲"父子的关系总体上早有定论。那 么,再具体一步,最早"造车"的人究竟是"奚仲"还是"奚仲之子吉光"呢?很显 然,历史常识告诉我们,车辆制造过程本身就属于上古的高科技"系统工程", 绝非一人可为,所以,我们唯有把"奚仲作车"解读为"奚仲氏家族世代作车", 那么以上这些古文献一会说"奚仲作车",一会又说"奚仲之子吉光是始以木为 车"的字面矛盾才能得到最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综合各种古文献的记载来 看,该事件的历史真相应该是,在商先王"王恆(吉光)"在位统治的时代(约西 元前19世纪),有一支"王亥(奚仲)"的后裔宗族"奚仲氏"首先造出了原始的 木车,所以,这个历史事件既可以按"发明时间"被记载在"王恆(吉光)"的名 下,也可以按"发明者"被记载在"奚仲氏"的名下。

当然,关于"奚仲氏"本是一支殷王室宗族而非某个个人,我们还可以从《左传·定公元年》中著名的记载得到证明:"薛之皇祖奚仲,居薛(谢)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谢),以为汤左相。"①显然,按照先商以及商、周时代的"世官制度"可知,当时绝大多数的职官,尤其是有高度专业技术要求

① 按,"薛"古音通"谢","谢"为商汤分封给"奚仲氏"一族的旧有封地,在今河南南阳境内,到了西周前期该地仍然为其所有。今山东滕州市境内之任姓"薛国"则为周初"奚仲氏"的分支迁入建国后带来的旧有地名。至于《左传》此处薛宰自述的两句本国历史当分开读,前句"薛之皇祖奚仲(氏),居薛以为夏车正"为概述,指"奚仲氏"一族自"仲虺"以来都封于"谢(薛)";后句"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则是对前句的展开说明,指出在"仲虺居薛(谢)"之前,"奚仲氏"本是从"邳"迁徙而来。"邳"即"大伾山",在今河南浚县。关于"谢"、"邳"的考证,参见本书第五篇。

的职位(例如太史、陶正等等),其担任者事实上都是某一庞大世袭宗族而非某个个人,所以,《左传》所谓的"车正"一职其担任者"奚仲氏"明显也必须是一个世袭宗族。此外,就"奚仲氏"这个名词本身来看,其作为王室宗族分支的"族号"也是完全符合先秦列国王室支族的取名规则的:众所周知,楚国有以楚先公若敖、楚昭王、楚景王等王名为号的宗族"若敖氏"、"昭氏"、"景氏",殷遗民国家子姓宋国有以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宋穆公、宋庄公等列代宋君为号的宗族"戴氏"、"武氏"、"宣氏"、"穆氏"、"庄氏",此外郑穆公的七支后裔称为"七穆"、鲁桓公的三支后裔称为"三桓",很明显,先秦王室支族的"宗族号"无不是以其所出先王之名号直接冠名的,所以,同理可知,殷商王朝本身的各支宗族也应该是以其所出先王冠名的,"奚仲氏"正是这样的一支宗族。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奚仲氏"的来龙去脉,那么我们对一个中国历史的著名公案即薛国等"任姓"诸国的来历就能给出最终的答案了。因为,正如《左传》等所述,薛国等"任姓"诸国本是出于"皇祖奚仲(王亥)"的一支殷王室宗族"奚仲氏",在"夏代"(先商"王恆"时代)就有"发明造车"之功(但最初并非"车正"而是从事"胲作服牛"等运输业)。而通过控制运输业和商业(先是早期的"服牛官"后又改为武丁时代的"车正")这一经济命脉,"奚仲氏"这个古老的宗族虽然与殷王室的血统关系日益疏远,但却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势力:

- ——西元前 17 世纪,"奚仲氏"的首领仲虺出任了"汤左相",并受封于"谢(薛)";
- ——西元前 14 世纪,殷高宗武丁屡次隆重祭祀"奚仲氏"的始祖"王亥"并 用甲骨卜辞记录了下来,显示了"奚仲氏"作为新式战车制造者在武丁时代的 显赫地位;
- ——西元前 12 世纪,"奚仲氏"更代表殷商王朝与新崛起的姬周王朝联姻,下嫁其宗女"太壬"为周君季历之妃("太壬"与"母戊"、"妲己"等一样都是用显性十干命名的殷王室贵妇),并生下了著名的周文王,从此奠定了"奚仲氏"身兼殷、周两王室之血亲的地位,此即《诗经·大明》所谓的"挚仲氏任(奚仲氏之宗女太壬),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按"挚仲氏=奚仲氏",挚通"跖",与"蹊"同义)。
- 一西元前 11 世纪,随着武王伐商和周公东征,商王朝虽然被周人灭亡了,但"挚仲氏=奚仲氏"却依然备受周人优待,他们凭借着周王室先妣"太壬"的庇护而被赐姓为"任",除了旧有封地"谢"之外,他们还受到了更多的加封,

总共建立了薛、祝(疇)①、谢、章、舒、吕、终、泉、毕、过等十个封国(见《世本》), 此即《国语・周語》所谓的"昔摯疇之國(奚仲氏的后裔疇国)也由大任"。

而事实上,即使到了三四千年后的今天,"奚仲氏"的后裔们依然大量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而随处可见,此即任姓、薛姓、祝姓、谢姓等汉族人士。显然,他们应该为自己所拥有的世界最悠久之"工程师世家"血统而感到自豪。

(4) "仓颉(子)造字"与先商文化史

最后,关于"先商"的文化史,结合"干支密码"证据和《山海经》等证据,我们更可以还原出一个意义非凡的历史真相,那就是所谓的"仓颉造字"并非传说,"仓颉"其实确有其人,只不过他的身份并不是什么公元前3千纪的"黄帝之臣"或"黄帝时史官",而是一位西元前19世纪的殷王即"王恆"。

《世本》有云"沮诵、苍颉作书"、"苍颉造文字",《说文》亦云"仓颉见鸟兽蹄坑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治",显然,关于中国汉字的"发明权"属于沮诵、仓颉,中国古人历来都是众口一词,从无异议。那么,沮诵、仓颉究竟又是谁呢?我们当然无法"起古人于地下"去问他们个明白,所以只有依靠我们的神探"干支密码"来帮忙了。

按照"干支取名制度","诵(勇)"通"讼(讻)"、"兇",作为人名与"圉"互训皆指天干第四位"丁";"沮"则通"祖"。故"沮诵(丁)=祖兇(丁)","沮诵"就是殷墟卜辞中的殷商先祖"兇父"即"曹圉(丁)"。

《尔雅》云"仓庚,商庚也",也就是说,"仓"、"商"二字古可互相通假;"颉"通"吉",作为人名则与"恆"互训皆指地支第一位"子";因此,"仓颉(子)=商吉(子)","仓颉"就是《山海经•海内经》中的"商王吉光"即"王恆"。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古籍所谓的"沮诵"和"仓颉"其实就是指"曹圉"和"王恆"这两位殷商先王,那么我们对甲骨文和金文为什么是殷人所首创而不是别的族群所首创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了:原来,殷人对文字的持续热情远非从甲骨文时代(前 14—前 11 世纪)才开始,早在商汤统一中原之前,殷人就已经是中国最积极的文字改革者和文字创造者了:

约西元前 20一前 19 世纪,殷先公"曹圉(沮诵)"领导下的殷商民族首先改革了旧有的"隐性干支取名制度"及其相应的古文字体系,发明了直接取象于"赤道十二星座"的"显性地支"共十二个汉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① 任姓"祝国(疇国)"在今山东肥城县境内。

申、酉、戌、亥。于是,我们在甲骨文和传世文献中就读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用 "显性十二支"汉字命名的人名"王亥"。显然,"王亥"的名字正是由其父王"曹 圉"亲手给起的(当然也要借助占卜)。

西元前 19 世纪,殷先王"王恆(仓颉)"领导下的殷商民族进一步改革了旧有的"隐性干支取名制度"及其相应的古文字体系,发明了"显性天干"共十个汉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于是,"显性十干取名制度"正式诞生了,从"王恆"的儿子"上甲微"开始,我们在甲骨文和传世文献中再也读不到脱离这十个汉字的正式商王称号,商王族从此成为中国最标新立异的一族。当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用"显性十干"汉字命名的人名"上甲",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也是由其父王"王恆"亲手给起的。

当然,在"仓颉造字"之后,中国文明就从"隐性干支时代"进入了"显性干支时代",而古老的"干支密码"就此日渐式微,直到最后被所有的中国人所彻底遗忘①。

① 关于"仓颉造字"的细节考证,参见本书第七篇。

第四篇 中国最早的史实人物—— 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所见 广义先商诸王朝王名干支考

根据传统史料,中国最早的王朝历史记录并不是从甲骨文所见的商朝以及狭义"先商"时代(proto-Shang,西元前 22—前 17 世纪)开始的,正相反,这是一个在空间上比"先商"城邦或"下七垣文化"①分布更广、在时间上比"高祖婴"或"玄王契"更古老的"广义先商时代"(pre-Shang,前 3—前 2 千纪乃至更早)。在这个被《左传》描述为"执玉帛者万国"的时代,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与其说更像同时代的统一埃及(即"古王国"和"中王国",约前 26—前 18 世纪),倒不如说更像同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 正如 kish、Lagash、Uruk、Ur、Babylon等诸多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纷纷建立的地方性小王朝一样,从西元前 3 千纪起,包括"有虞氏"、"有崇氏"、"少皞氏"、"有穷氏"以及商朝的前身"有咸氏"在内的诸多中国汉语城邦也纷纷开始了其从"无名氏"到"有史王朝"、从地方性部族到一方霸主的成长旅程,并留下了足以与萨尔贡(Sargon,前 23 世纪)和汉谟拉比(Hammurabi,约前 18—前 17 世纪)相媲美的尧(前 23 世纪)、舜(前 22 世纪)、禹(前 22 世纪)、汤(前 17 世纪)等伟大的名字。

然而,由于年代相隔久远,《史记》、《尚书》等中国传世文献和近现代出土的简帛文献关于这个时代的具体描述,正如曼涅托(Manetho)《埃及史》、《苏美尔王表》等近东早期文献一样,也难免是充满了各种令现代历史学无法接受的缺点、讹误和自相矛盾之处的。也就是说,撤开诸如"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史

① "下七垣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和定义的"(狭义)先商文化"之一部分,参见王震中:《先商的文化与年代》,《中原文物》2005 年第1、2期。

记》)、"法老 Pepi II 在位九十四年"(曼涅托《埃及史》)、"吉加美士(Gilgamesh) 在位一百二十六年"(《苏美尔王表》)之类虽然明显违背历史常识但还不太影响大局的问题不说①,中国早期史料与近东早期史料一样,至少从一开始就都面临着以下这些足以颠覆其信史地位的重大问题之挑战:

其一,都有倾向用神秘术数理论人为编造早期王朝历史的问题,例如曼涅托《埃及史》把古埃及历史的开端说成是两个都拥有九位国王的王朝即所谓的"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以凑合埃及"九柱神"(Ennead)神话体系之神圣数字"九"(但当代学者们在试图把这份9+9名单中的 Menes、Athothis 等国王与出土图文资料中的所谓"蝎子王"、"鲇鱼王"、"战鹰王"等早期人物联系在一起时,都遇到了种种难以克服的自相矛盾之困难)②;《苏美尔王表》则把"洪水时代之前人类最早的国王"说成是 Alulim、Alalngar 等共十位"超级长寿之国王",也凑了个整数(但这些国王同样无一人能被证实);而《史记》等中国文献则把中国最早的统治者说成是"五帝"或"三皇五帝",以凑合"五行"、"三才"的中国术数理论(但"三皇五帝"具体究竟指谁却从来都是众说纷纭自相矛盾,连最起码的可信度都没有)。

其二,都有人为编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问题,例如曼涅托声称埃及诸土邦(nomos)自美尼斯(Menes)的"第一王朝"起就统一了(但考古学证据却显示在所谓的"第三王朝(古王国)"之前古埃及基本上都是地方部族争霸的局面);古巴比伦人也声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自"前洪水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统一的中央王朝(但这是众所周知的政治宣传而非事实);而孔子和司马迁等则声称"五帝"的统治范围都是"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的整个中国(但考古学的诸多证据也可以彻底否定这种说法)。

其三,都有因人为编造"君权神授"情节所导致的国王谱系人神混杂之问题,例如曼涅托《埃及史》声称埃及的王权是从类似"创世纪时代"的六个神祇王朝和九个"半神"王朝那里继承下来的;《吉加美士史诗》则声称乌鲁克(Uruk)第一王朝的国王吉加美士是女神宁松(Ninsun)之子,是个"半神"兼超

① 根据考古发现,即使刨除大量夭折婴儿,西元前 3 千纪人类的平均期望寿命都不足 40 岁,中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统计数据皆是如此,而即使作为物质生活条件优越的王者,其寿命也很难超过 70 岁的极限。可见,即使是最严谨的西方年代学数据,由于其仍然未放弃"法老 Pepi II 在位九十四年"等明显可疑数据,其中也是不无水分的。参见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61 年。

② 参见 Jacques Kinnaer: The Ancient Egypt Site, 2nd Edition, The Internet, 2003—2005 年。

人(三分之二是神祇,三分之一是人类),就像诸多美索不达米亚国王都声称自己是神祇的子孙一样;而《尚书》、《史记》等记载的中国古帝王谱系也无不是人神混杂身份难辨的,例如据说可以"绝地天通"的"帝颛顼"、可以用脑袋撞断"擎天柱"不周山的"共工氏"、可以上天盗窃天帝"息壤"的大禹之父"鲧"等等,他们之中究竟哪几个是被神化的人、哪几个是被拟人化的神,迄今都难作定论。

那么,基于中国史料和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史料都普遍存在的这些类似问题,我们是否最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史料所载的最早期部分其实和古埃及的 Menes 等 18 王或苏美尔的 Alulim 等 10 王相类似,都是不可直接作为信史采纳的虚构传说呢?

显然,假如就现有文献的传统解读来说,下这样的结论无疑是合理的;但 是,假如我们能考虑到,由于年久误深,在现有的中国早期文献中其实还存在 着大量未被解读和已被误读的"隐秘信息",并且我们已经找到了重新正确解 读这些"隐秘信息"的方法,那么我们也许就要改变我们的结论了。因为,正如 本文上一篇所证明的,中国历史的最早部分其实是用比甲骨文还要古老的"干 支密码"书写的,而"干支密码"将告诉我们,以上这三个对于古埃及史料或苏 美尔史料而言都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中国史料和文献而言却仅是一些 伪问题,因为中国早期王朝的种种非信史成分都是由于"干支密码"失传后被 误读误传累积而成的,其最初的源头并不是人为的故意歪曲而是自然的无意 讹传。所以,只要依靠在汉语古文献中无所不在的"干支密码"信息之帮助,我 们要想摒除类似 Alulim 或 Menes 之流的虚构凑数人物,例如所谓天皇、地皇、 人皇、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等等,进而复原出一份没有"大一统"、"禅让 制"等可疑成分的"广义先商史",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正如下文即将证明的, 中国最早的王朝历史,本来都是内无自相矛盾之处、外可与考古证据互相印证 的,其可以上溯的信史开端年代几乎与古埃及或苏美尔大体相当;中国最早的 王朝统治者们,包括"唐尧"、"虞舜"以及比之更早的十几代君王们,都是既有 非孤证性的世系族谱信息可考,又有非孤证性的考古遗址时空信息可供—— 核对的史实人物①。

① 本文"史实人物"是指既有真名可考又有史载事迹可寻的历史人物。但这些"史实人物" 并非是中国最早的有真名可考人物,因为中国出土古文字中还有另一类虽有真名可考但已无具体事迹可寻的"史料失载真实人物"。参见本书第七篇。

廉颇为什么要叫"颇"——难道这位素称健壮的将军居然是个歪脖子(颇字的本义)吗?

老聃为什么要叫"聃"——难道所谓"老子惊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号"的传说(见《太平广记》引葛洪《神仙传》)居然是真的吗?

商汤为什么要叫"汤"?——难道这位国王是因为被关过水牢(汤出重泉) 才改的名吗?

瞽叟为什么要叫"瞽"?——难道所谓"无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的注解(见孔安国《尚书·尧典·传》)也是真实可靠的吗?

毫无疑问,通过前文我们对甲骨卜辞中的高祖婴、高祖河以及传世文献中的昌若、曹圉等殷商远祖名号之解读,对于上述这些原本看起来像谜一样的古人名字,我们现在是再也不必作葛洪式或孔安国式的吃力猜测了。因为事实已经很清楚,廉颇(辰)、老聃(寅)、商汤(乙)、瞽叟(寅)这些名字,其实和高祖婴(未)、高祖河(申)、昌若(丑)、曹圉(丁)一样本来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怪名,恰恰相反,它们在词源学上都是来自同一种早期中国最传统的取名方法,即已被甲骨文反复证明了的"隐性干支取名制度",或者更具体一点说,它们都是来自如下这份"人名干支密码表"(表 4-1): 很显然,这份密码表是一直存在于先秦专业巫师卜者们的手中或脑中的。

表 4-1 先秦人名之二十二干支常见指代用字简表 (据《尔雅》、《史记》、《左传》等)

	人名之干支 用字举例	典型人名	时代	国族	其他先秦人名举例
甲	逢、窬、缺、毁	上甲微(毁)	先商	商	沃甲踰、衛侯毀
乙	芒、荡、橘、尖	子荡(樂轡)	春秋	宋	商汤、小乙敛(尖)
丙	蘇、朕、文、禹	外丙勝(朕)	商	商	徐子章禹
丁	強、圉、曹、勇	王孫圉	春秋	楚	司城強
戊	麗、業、杼、華	華(邾悼公)	春秋	邾	申麗、崔杼

(续表)

	人名之干支 用字举例	典型人名	时代	国族	其他先秦人名举例
己	則、原、犁、革	悪來革	商	徐夷	伯州犁、原(滕成公)
庚	庸、悅、遂、祿	禄父(武庚)	西周	殷	狐庸、東門遂
—— 辛	昭、柴、燭、纣	纣(帝辛)	商	商	高柴(子羔)
£	艾、終、歷、考	女艾	先商	夏后氏	伯邑考、富父终甥、蒍艾
癸	尚、極、桀、蟜	吕尚(太公望)	西周	齊	伍尚、公孫蠆(子蟜)
子	鳩、聚、産、恆	伶州鳩	春秋	周	子產、陳恆
丑	如、若、武、鸣	昌若	先商	商	季公若、燭之武
寅	鼓、喜、虺、耳	攸侯喜*	商	殷	瞽叟、仲虺、李耳(老聃)
帅	單、余、坎、佗	陈公子佗	春秋	陈	谷單、北宮佗
辰	挚、頗、皋、雷	廉颇	战国	趙	勾吳王頗高*、九方皋
틴	樊、阖、扃、启	闔閭(勾吴王)	春秋	勾吳	微子启、諸樊
午	翳、扈、馮、相	翳扈(周共王)	西周	周	公子馮、后羿、宁相
未	丰、和、齊、夷	放齊	先商	有虞氏	伯夷、叔齊
申	旦、儋、何、輿	周公旦	西周	周	孟軻(子輿)、太史儋
酉	瑚、璉、咢、敖	惠連(參胡)	商	楚	公孙敖
戌	賈、貿、贡、赐	屠岸贾	春秋	晉	王孫賈、子贡(端木赐)
亥	路、冥、履、巖	子路(仲由)	春秋	鲁	熊嚴、公子履

注:带*号人名为出土甲骨文、金文、简帛所见或所证实者。

而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份失传已达 2 000 多年的"干支密码表"及其背后的古人思维模式,那么我们要想在数量虽然众多、异说也很众多的中国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资料之基础上重建逻辑统一、来源可靠的"广义先商年代学"之框架,并从中找出不同于"三皇五帝"传说的中国真正之最早史实王朝和最早史实人物,也就是一件很值得期待的事情了。因为,既然"干支密码"可以把字面上毫无共性的传世文献之"简狄"、"契"与甲骨卜辞之"高祖夋"、"高祖河"统一联系起来,那么它也就同样可以把司马迁所"不敢言"的《山海经》等一手文献与《史记·五帝本纪》等二手文献的种种字面歧异之记载统一起来;既然"干支密码"可以在甲骨卜辞中释读出一个隐藏着的"狭义先商时代",那么它就也可

以在"甲骨文级"的《山海经·大荒海内经》等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中释读出一个隐藏着的"广义先商时代"。毕竟,中国传世文献或出土简帛由于其流传过程的未间断性、汉语媒介的无须翻译单一性,其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可读性是任何其他古老文明的文献所无法比拟的(西方传世的曼涅托《埃及史》本是辗转译述的二手文献,近东出土的《苏美尔王表》则属于对"死亡语种"的猜测性释读结果)。而中国历史经过"干支密码"随机加密后的高度防伪性和可修复性更是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的历史记录所无法企及的。

二、"穴熊(子)=鬻熊(子)"与 先楚世系考

要建立完整可靠的"广义先商年代学",我们除了需要对所有事实上是属于"先商时代"的王朝世系进行考证,同时还要对那些仅仅在传说中而非事实上是属于"先商时代"的王朝世系进行考证。因为要想"去芜存菁"就必须先有所证伪、再有所证实。例如,作为屈原的祖先,楚王室就是一个首先需要被证伪的对象:因为,该王朝虽然只是在商朝末年才以鬻熊(约西元前 12 世纪)担任"(周)文王之师"的形式出现在中国主流历史之中,但《史记•楚世家》等传统史料却都宣称,"先楚"王朝的世系应该还可以远远追溯到"先商时代"的古国"昆吾氏"乃至古帝"帝颛顼"。

那么,"先楚"王朝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先商时代"之王朝呢?显然,假如我们能利用"干支密码"回答好如下这三个关键问题,那么这个千古谜团自然也就可以解开了。

其一,楚国王室的始祖究竟是谁?究竟是传世文献所谓的"五帝"之一"颛顼",还是出土楚简所谓的"三楚先"之首"老童"和"祝融"?

其二,楚国王室的世系究竟是否连贯完整?《楚世家》所说的在"穴熊"和"鬻熊"这两位楚君之间那"弗能纪其世"的 1 000 多年历史空白究竟是否真的存在?

其三,楚国王室的历史究竟有多悠久?《楚世家》所说的"(楚先公)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楚先公)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等说法究竟是有据之史实还是附会之讹传?

首先,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楚国王室的最早祖先是谁,其实我们只要援引

对比前文已经得出的重要结论,即殷商王室所习称的最早祖先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表 4-2): 其舅系始祖为"帝咸夋",其父系始祖为"高祖河",其全族共同始祖则为"有咸氏"部族(王室的与非王室的),那么楚王室的类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正如前文所述,2 300 年前,楚武王(西元前 740—前 690 年在位,见图 4-1)的远支后裔屈原在《离骚》开篇中骄傲自述的楚国始祖名单也同样是一份"三位一体"的王者名单:"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甲骨文和古籍中的先商始祖	楚简和古籍中的先楚始祖
集体始祖(族名)	有威氏(有娀氏)	高陽氏
舅系始祖/始妣	咸夋(帝俊)/简狄女	高陽老童 /竭水氏女
父系始祖	高祖河(玄王契)	伯庸(祝融)

表 4-2 中国王朝始祖的三位一体结构: 先商始祖与先楚始祖之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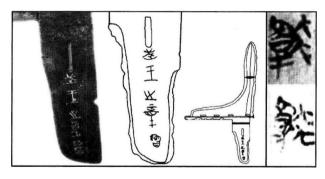


图 4-1 左:战国青铜戈铭文"(楚)武王之章敖";右:战国楚简 "(祝)融"字从"臺(墉)"(西元前5—前3世纪)

也就是说,其一,对于整个楚部族来说,其集体始祖乃是一个叫做"高陽氏"的远古部族或城邦(相当于殷商之"有咸氏"),该城邦的统治者头衔自然就可被后人尊称为"帝高陽";其二,对于楚王室的母系血统来说,其舅系始王的私名则是出土楚简中所常见的楚人之头号祭祀对象"老童",按卜辞惯例也可冠以国族号称为"高陽老童"(相当于殷商之"咸夋");其三,对于楚王室的父系血统来说,其真正的父系远祖第一人则是"伯庸",即文献中常被提及的楚祖"祝融"(相当于殷商之"高祖河")。

"伯庸"为什么就是"祝融"?因为,一方面,"庸"通"墉",义为墉防、窒塞;

而从字形本身来分析,"庸"更是一个"从庚用声"的汉字。所以,"庸"字作为人名其本义明显是代指天干第七位"窒=倉黄(庚)"。而另一方面,"祝融"之"融"本与"庸"为通假字;"祝"古通"兑",訓穴聚、倉窖、倉黄;故作为人名"祝"、"融"两字也都是代指天干第七位"窒=倉黄(庚)"。因此,根据"干支密码","伯庸(庚)=祝融(庚)"成立。

当然,除了"干支密码"相同,"伯庸"与"祝融"这两个君主名在楚王世系中的地位也是相同的:"伯庸"是楚武王后裔屈原明确自述的"皇考"(父系始祖),"祝融"则是被出土战国楚简屡次列为"三楚先"之一的先楚远祖。而且,出土楚简"融"字从"覃(墉)"旁,与"庸"直接通用①(见图 4 - 1)。因此,综合来看,楚王室父系始祖的私名其实就是"伯庸(庚)=祝融(庚)"。至于《史记》等所谓的楚祖"祝融"不是私名而是上古官号的说法则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其把重(戊)、黎(己)、吴回(辰)这三位源自《山海经》的神话人物都视作"火正祝融(庚)"和楚始祖的说法,既根本得不到出土楚简或楚国铭文等材料的证实,更得不到"干支密码"的任何支持,明显是出于对《山海经》文字的误解或附会之词(《山海经•大荒海内经》其实根本没有明示或暗示过"祝融"是个官号,或"祝融=吴回"的丝毫意思)。

"老童"为什么是楚王室的舅系始祖而非父系始祖?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老童(壬)"的名号干支是与楚始妣"竭水氏(壬)"相同的:"老"训终老,"童(鐘)"通"终";"竭"训竭尽终了;"老童"与"竭水氏"一样明显都是代指天干第九位"终(壬)"。因此,比照殷商的舅系始祖"帝俊(未)"与殷商始妣"简狄女(未)"其名号干支相通用之成例,我们可以推知,《帝系》所谓的"老童娶于竭水氏"其实本应作"老童有妹竭水氏生祝融",今日所见之老童与祝融父子相生关系明显是后人按"父死子继"教条改编的。

要之,楚王室的父系始祖本名"庸"别号"祝融"(与上古神话人物火神"祝融"巧合重名),舅系始祖与始妣则是古"高陽氏"政权的统治者"老童(壬)"与其姊妹"竭水氏(壬)"。至于古帝"颛顼高陽氏"则仅仅是与楚国古族名"高陽氏"的重名巧合,无论是"帝颛顼"还是重、黎、吴回等诸人物都与楚王室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就是我们结合出土文物证据、文献证据和"干支密码"证据所能得出的最可信之史实。

①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

其次,既然我们已经厘清了楚始祖并不是《楚世家》所谓的"五帝"时代(西元前3千纪)之人物,那么对于我们解答先楚世系的第二个关键问题,即"穴熊"与"鬻熊"这两个楚先公的世系关系问题,就首先排除了一大基本障碍。因为,既然楚祖祝融(伯庸)并非是什么先商人物,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理由再去拘泥于《楚世家》的可疑记载,把先楚世系硬说成是中间有断点的两大截:

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 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

因为,根据《楚世家》的取材蓝本《大戴礼记·帝系》之记载,《楚世家》所谓的"穴熊"与"鬻熊"两者之间那"弗能纪其世"的 1 000 多年历史空白原本是并不存在的:

季连产什祖氏(附沮),什祖氏产内熊(穴熊),九世至于渠,娄 鲧出……

(按"娄鲧"的名号干支为"降娄三亥",其人作为熊渠的直系子孙,当然就是指《楚世家》中的熊渠之孙"熊嚴"①而不是指大禹之父"鲧",因为熊严的名号干支也为"嚴=巘三亥",参见表 4-3。)

也就是说,按照《帝系》中的先楚世系,从"内熊(穴熊)"到"熊渠"(约西元前 10—前 9 世纪)其实是世数清楚的,凡共历"九世",而不是《楚世家》所谓的"弗能纪其世";而比照《楚世家》的记载,我们还进一步知道,"熊渠"之前的九世楚君不仅世数清楚,而且代代皆有真名可考,他们分别是: 鬻熊、熊麗、熊狂、熊绎、熊艾、熊亶、熊勝、熊杨、熊渠。

因此,我们的初步结论就是,楚国王室的世系从来都是连贯完整的,"穴熊"与"鬻熊"两位楚君之间也绝非是"隔世"的关系:他们要么是前任与后任关系,要么干脆就是同一人(考虑到"九世至于渠"一句有包括自己在内与不包括自己在内的两种可能解释)。

那么,"穴熊"究竟有没有可能就是"鬻熊"之同一人呢?这当然首先要去

① 《帝系》之所以特别提及娄鲧=熊严,是因为熊严本是楚武王、楚文王之直系始祖。

查一查我们的"干支密码表":根据《史记》,楚先公附沮之子原名"穴熊"(今本《帝系》作"内熊"为字形相近之讹),"穴"本义为窟穴、营窟,可代指地支第一位"营室=陬(子)";而"鬻熊"之"鬻"通"育",本义训生育,又据《集韵》"鬻,音鞠"可知"鬻"也可通"鞠"训鞠养,总之作为人名也是代指"鞠=陬(子)",所以首先我们能得出在干支属性上"穴熊(子)=鬻熊(子)"成立。

而除此之外,由于近年来"新蔡葛陵楚简"的出土和研究,关于"穴熊"与"鬻熊"分属前后任但名号干支相同的可能性也被最终排除了,因为该组战国楚简曾多次提到了"三楚先"的概念(也就是《楚辞》所谓的"三后"),其中既有写作"老童、祝融、毓畬(鬻熊)"三祖先的,也有写作"老童、祝融、穴畬(穴熊)"三祖先的,明显是视"鬻熊"与"穴熊"为同义词①。因此,综合以上的证据,我们最终的结论只可能是:"穴熊=鬻熊"。

最后,既然上述关于先楚始祖和先楚世系的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答,那么由此派生出的第三个问题,即先楚历史的积年问题也就初步地可以建立起框架来了。原来,芈楚王室的发迹史虽然不像正史所说的是始自周成王分封熊绎以"子男之田"那么晚(西元前 11 世纪),但也并没有传说中的是始自"五帝"时代那么古老(西元前 3 千纪)。事实上,如果参照楚君熊勇(前 847—前 838)至楚惠王(前 488—前 432)之间十四世二十一君平均每世 29.7 年的统计数据初步估算,从鬻熊(穴熊)时代(前 1100 年左右)上推四五世到附沮、季连、樊、陆终诸先公之前,先楚王室的始王老童和始祖伯庸真正在世的年代应该是在西元前 1300—前 1200 年之间,也即接近于《诗经•商颂》记载的商王武丁"奋伐荆楚"之年代。至于《国语•郑语》、《史记•楚世家》等文献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先商时代之"祝融八姓"或"陆终六国"等传说,在"干支密码"和文献资料的综合考量下看来,则明显都不属于信史而只是出于多种原因下的误传附会罢了。也就是说,《楚世家》根据所谓"祝融属于先商时代"的假设所作出的一系列推断,例如"(陆终之长子)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陆终之第三子)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等等,根本就是一段时空错乱、以讹传讹的文字。

《楚世家》凭什么说"(楚先祖)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详究其源头, 那不过是因为其和《国语·郑语》一样,都轻信北方古国"大彭豕韦……则商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灭之矣"①之"彭"与南楚古人"彭铿"之"彭"本指同一人、同一国罢了。然而只 要我们参核以楚国学者屈原的权威说法,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仅仅看字面就 对号人座的判断其实是很荒谬的:屈原《天问》有云"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 多夫何长",《离骚》又云"虽不周余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贵则",显然,作为一 个堪与巫咸(约西元前16世纪,商王大戊之臣)这样的为臣有方者兼养身有术 者并列的榜样级人物, 楚人彭铿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南面称孤的"大彭国国 君"或"殷之侯伯",要知道屈原是从不会拿帝王诸侯级的人物来自比的,他的 人生目标从来都是做明君之贤臣而不是自己裂土称孤。再加上,根据"干支密 码"的分析,"彭"的本义为鼓声,"铿"的本义为金石音乐之声,都是代指地支第 三位"河鼓(寅)",则"彭"与"铿"明显是一"字"、一"名"互训的等价关系,而不 是一姓氏(族号)、一名字的偏正组合关系,《史记·集解》所谓的该楚先公"名 铿,为彭姓,封于大彭"的附会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 看,历史上曾屡次被孔子和屈原等"为人臣者"列为偶像楷模的彭铿其人,虽然 是身为楚君陆终之子,但他却应该并未继承楚国君位或另立为什么彭国之君, 而仅仅是一位拥有领地的普通楚国贵族和优秀臣属罢了,这就像是虽然拥有 王室血统却甘当贤臣的孔子(殷王室后裔)和屈原(楚国王族)本人一样。

《楚世家》又凭什么说"(楚先公)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众所周知,那也不过是因为比附了《诗·商颂》之"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一句而作的字面推论罢了。然而很显然,按照"干支密码"的分析,《楚世家》所谓的"昆吾"完全更可能只是陆终长子的一个私名而并不是其封国名或族氏名:因为据《帝系》可知,这位楚先公名"樊"字"昆吾","樊"训樊篱、篱落,代指"大荒落(巳)";"昆"通"梱(閫)","吾"通"衙",都训门禁,也代指"南门二大荒落(巳)"。由此可见,所谓"昆吾名樊"正是一个"名"与"字"互训的标准格式先秦人名,其与《史记•集解》所谓的"昆吾名樊,为己姓,封昆吾"之说应该是根本不沾边的,其与《商颂》中的先商著名方国"昆吾国"更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要之,此"彭"非彼"彭",此"昆吾"也非彼"昆吾",这就是"干支取名制度" 所能告诉我们的历史真相。而由此真相出发,我们还能推知,所谓"陆终坼剖 而产六子"事件,其实也并不像《楚世家》等所说的那样是指西元前 3 千纪的 "古帝陆终"曾生出了卫、韩、郐、邾等六个独立国家的祖先,而只是指西元前

① 关于古国"大彭豕韦"的考证,参见本书第五篇。

12世纪间"先楚"王朝曾经出现过"陆终"的六个后裔宗族共同治国的局面,即 樊(巳)、惠连(酉)、铿(寅)、求言(丑)、安(午)、季连(酉)这六支同宗世族的联 合执政,这就类似后来的鲁国有"三桓"、郑国有"七穆"那样。至于《国语》所谓 的"祝融八姓"则正是在对"陆终六子共治"这个故事的曲解基础上再糅合了 "高陽氏八愷"的传说而凑数出来的谱系。事实上,在《国语》拼凑的"祝融八 姓"中,除了妘、曹、芈三姓确属楚裔外(但这三姓都是商末周初才赐封的),其 他己、董、彭、秃、斟五姓都与楚祖无关:例如己姓本为殷商王室分支"有苏氏" 的族姓,董姓源自东夷等等,他们最多不过是楚人统治下的异姓臣民而非楚王 室成员。而陆终的六大支族后裔之所以三支有姓而三支无姓,则完全是因为 他们在商、周交替之际的政治立场所导致的: 樊、惠连、铿三族因为助商(武 庚)反周,所以被周人彻底征服消灭而无"赐姓"可言;求言、安、季连三族由于 曾经助周或至少不反周,所以最终被周王室褒奖"赐姓封土",分别建立了妘姓 郐国、曹姓邹国、芈姓丹阳楚国等等。 这就是楚国王室的真正来龙去脉①。 (按中国上古土著城邦皆有氏无姓,因为顾名思义,"赐姓"是殖民大国的王室 为了防止各殖民地的同宗贵族间"同姓通婚"而设的,是一种千里大殖民的产 物;所以,在商、周王朝实现千里征服、大封"同姓"之前,中国根本就不可能有 "古姓"存在。)

事实上,关于楚史,2000多年前的孟子早就评价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也就是说,作为《帝系》和《楚世家》的终极资料来源,楚人自己编写的楚史《梼杌》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公认为是堪与《春秋》媲美的史书了。而通过前述"干支密码"的检验,我们更能证明,严格执行了汉语"干支取名制度"的楚人其实本就不是什么"蛮夷"外族,他们其实是比晋国和鲁国等杂错于游牧狄人间的中原列国更古老纯种的华夏土著民族之一支,后世楚王们之所以自称"蛮夷"不过是表示了不向周天子称臣的外交辞令罢了。显然,对于这么一个既拥有优良的史学传统,又被中原列国视为"唯楚有才"的泱泱大国来说,假如其连自己的先王世系究竟是始于"先商时代"还是"晚商时代"都搞不清楚那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幸好,通过"干支密码"的还原,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还"先楚"历史以终极真相:原来,所谓"弗能纪其世"而搞不清先楚历史的只是某些楚国后人的故作奇语而已(其目标就是为了夸大楚王室的

① 关于先楚历史以及楚人的更早来源,参见本书第五篇。

古老性和神圣性),虽然,《梼杌》早就失传了,但真正的先楚王室世系却靠着众多楚人后裔的不懈努力,毕竟还是被顽强保留到了今天,它和已被甲骨文完全证实了的殷商世系一样,都是完整、连续,并且全部符合"干支取名制度"的,完全应该有资格被重新写人我们的信史。至于"先楚"列代王名与甲骨文"干支取名制度"的具体吻合情况,则可完整列表如下(表 4-3):

表 4-3 先楚王名干支与世系(楚武王之前) 西元前 13—前 8 世纪

	王名	王名的干支	与前任关系	在位年代	王名简释
1	老童(竭水氏)	终(壬)	楚國的前陽氏"統治者		老訓终老,童通鐘、终;竭训竭尽终了
2	伯庸(祝融)	窒、倉黄(庚)	先 楚 王 朝 建立者	前 13 世纪	祝通兌,訓穴聚、倉 客,又通悅,訓康 悅;融通隔,訓止 隔、止窒,又通庸, 训康
3	陸終	終、孫艾(壬)	子		陸通戮,训刈、收终
4	樊(昆吾)	大荒落、南門(巳)	子		类 訓 类 籬、籬 落; "昆"通 梱、"吾"通 衙,都训门禁
5	季連	作器(酉)	弟,未在位		連通 璉,訓瑚璉、 器用
6	附沮(什祖)	著麗(戊)	子,未在位		附訓附麗,祖通著
7	鬻熊(毓 畬、 穴熊、内熊)	营室、鞠(子)	子,未在位, 周文王之师	约前 12 世纪	鬻通毓,训生育、养 毓;穴训窟穴、誉窟
8	熊麗	著麗(戊)	子,未在位		
9	熊狂	長王(未)	子,未在位		狂通王
10	熊绎	析木(卯)	子,丹陽楚 国建立者	前 11 世纪	绎通释,训解脱、开释、解析、了断
11	熊艾	逊艾(壬)	子		
12	熊亶(題)	河灘(申)	子		 型通担、 室、 溝、 漢
_13	熊勝	繇兆(丙)	子		勝通朕,训朕兆

(续表)

	王名	王名的干支	与前任关系	在位年代	王名简释
14	熊杨	敦羊(午)	弟		杨通羊
15	熊渠	壮、餾(未)	子		渠通秬,训未、餾
16	熊红(挚红)	析木(卯)	子		红通攻
17	熊延(执疵)	延缝(甲)	弟		《尔雅》"延,閒也", 训间隙,疵训瑕疵 缝隙
18	熊勇	强圉(丁)	子	前 847—前 838 年	勇训强勇
19	熊嚴(婁蘇)	降 婁、路 踵、 大淵巘(亥)	弟	前 837—前 828 年	嚴通 巖、巘;縣通蹊,訓蹊径、道路
20	熊霜	相(午)	子	前 827—前 822 年	霜通相
21	熊徇	奄贸(戌)	弟	前 821—前 800 年	徇 训 经 菅、徇 财 贸易
22	熊噩(咢)	作器(酉)	子	前 799—前 791 年	噩通 囂、鏊,訓鏊器
23	熊儀(若敖)	哧奮若(丑)	子	前 790—前 764 年	儀 训 威 儀、恐 嚇、 奮威
24	熊坎(霄敖)	析木(卯)	子	前 763─前 758 年	坎通砍, 霄通削, 训 析削
25	熊眴(蚡冒)	大 梁、奄 贸 (戌)	子,楚武王	前 757—前 741 年	眴通钩,训钧量;蚡 通颁,训贡赐;冒通 贸,训贸易

主要资料来源:《史记》、《大戴礼记》、《楚辞》、《尔雅》、《新蔡葛陵楚简》。

三、"弃(丑)=叔均赤(丑)"与 先周世系考

除了楚国,另一个也仅仅是在传说中而非事实上属于"先商时代"的可考 王朝就是周武王的祖先之国"先周"王朝了。 与扑朔迷离的先楚世系不同,《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先周世系无疑是中国早期诸王朝世系中最少争议的一份名单了。当然,最少争议并不等于没有争议,事实上,至少在如下的两大争议问题上,我们的"干支密码"还是会大有用武之地的,那就是周王朝的始祖究竟是谁的问题和先周历史积年的问题。

周王朝的始祖究竟是谁?假如完全按照古籍的字面解释,我们无疑又会陷入文字游戏的迷宫而不能自拔:因为,一方面,《史记·周本纪》告诉我们,周人的始祖是一对叫"有邰姜原"和"弃"的母子;而另一方面,《山海经·大荒西经》却又告诉我们,周人的始祖是一对叫"台璽"和"叔均"的父子或甥舅。显然,对于这两种字面上完全不等价的说法究竟应该如何取舍,从古至今都绝对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不过,现在我们是不必再为此而头痛了,因为,只要比照前述殷商王朝的"有咸氏"、"高祖夋"、"高祖河"之"三位一体"祖先(表 4-4),我们自然就会发现周王朝的始祖大名单其实也完全如出一辙:对于整个周部族来说,其集体始祖政权叫做"有邰氏";对于周王室的母系血统来说,其舅系始王是有邰氏的统治者"邰原"即"台璽";而对于周王室的父系血统来说,其真正的父系始祖则叫做"弃"即"田祖叔均"。

	甲骨文和古籍中的先商始祖	古籍中的先周始祖
集体始祖(族名)	有威氏(有娀氏)	有邰氏
舅系始祖/始妣	帝咸夋(帝俊)/简狄女	台璽(邰原)/姜嫄
父系始祖	高祖河(玄王契)	弃(叔均赤)

表 4-4 王朝始祖的三位一体结构: 先商始祖与先周始祖之对比

按照"干支密码",我们知道,"原=泉(錢)"作为人名是专指天干第六位 "屠犁(己)"的(例如前文已述的屈原);而同样的,"璽"通"鑈",据《方言》"鑈, 正也"可知,"璽"也可以训整治、厘正,并代指天干第六位"图厘(己)"。因此, "邰原(己)=台璽(己)"成立,《史记》与《山海经》都没有写错,先周世系中确有 一个始舅叫做"邰原"(台璽),也确有一个无名氏始妣比照舅舅的名字叫做 "嫄"(姜原)。

按照"干支密码",我们还能知道,"弃"字古音通"啼"、"泣",训啼泣、嘘號,作为人名可代指地支第二位"虚(丑)";"叔均"为周祖之尊号而非私名(详说见后文),其私名据《大荒西经》之"叔均……有赤國妻氏"及《海内经》之"叔均始

作牛耕、大比(妣)赤陰是始為國"两条记载可知当为"赤"(妻从夫名),作为人名也是代指地支第二位"赤奋若(丑)"。因此,"后稷弃(丑)=叔均赤(丑)"无疑是成立的,《史记》与《山海经》显然也都未记错,被《史记》描写为农业神(后稷)兼周始祖的"弃",当然只可能是被《山海经》也描写为农业神(田祖)兼周始祖的"叔均赤"之同一人,不然后世的周王就不会在《小雅·甫田》和《小雅·大田》中屡次自称是"田祖"的"曾孙"了。

此外,假如我们考虑到《诗经·生民》其实早已明确指出,周祖的得名是因为"履(礼)帝武敏歆",也就是说是因为姜嫄在礼祭"帝"时占卜得到了其儿子的幸运星座属"武敏(丑)",那么我们对周祖为什么名"丑"就更能确信了。显然,正如商祖契(申)的得名是源于占卜结果"玄鸟(申)"一样,周祖弃(丑)的得名也是源于占卜结果"武敏(丑)":"敏(悯)"古音通"奋(坟)","武敏"就是占星术语"北宫玄武=赤奋若"之同义词,而绝非《史记》所谓的"巨人迹"之意。由此可见,旧史中那些关于周祖得名"弃"是因为曾遭遗弃、姜嫄生子是因为踩了巨人的脚印等传说是多么的有违史实。(按、《诗经》明载周祖弃诞生时"无灾无害"、"上帝丕宁",并不像是郑庄公那样有"寤生"之灾而得罪过父母神灵,原本不孕的姜嫄显然爱之犹恐不及,哪有将求神求来的宝贝儿子再抛弃之理?何况那样就真的要得罪上帝了。故周祖名"弃"绝非曾遭抛弃之意甚明。)

既然,周王室的最早史实人物"台璽"及其外甥"叔均赤"通过"干支密码" 终于被我们找到了,那么,他们究竟是生活在什么年代的人物呢?显然,《史记·周本纪》所谓的"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云云,也即假定"弃"生活在西元前 23一前 22 世纪之说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左传》已经明言: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也就是说,周王弃虽然同样拥有"后稷"的称号,但他其实并不是《尚书》等文献所提及的那个"自夏以上祀之"的"后稷"(关于"后稷柱"的详说见后文)。因此,在刨除了以上的讹传数据之后,我们要想知道较真实的先周历史积年,最可靠的方法无疑只有一个,那就是必须通过先周世系的连续"世"数去推算,就像前文我们推算先商积年一样。然而,不幸的是,关于先周世系的世数,司马迁和班固这两位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根据《世本》的记载,周先公世系的原始名单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亚圉、云都、太公组紺、诸盩"。对于这段关键的文字,司马迁的《周本纪》认为这八个名号乃是四位周先公的"名"和"字",即"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亚圉=云都、太公组绀(類)=诸盩",因而从弃到文王的先周世系共该有十五代,恰好符合《国语·周语下》所谓"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的数据;但班固的《汉书·古今人物表》却认为,这八个名号本来至少代表了七位独立的周先公,因而先周世系应该至少再加三代而共计有十八代(按,今本《汉书》不知何故仍认为"太公组绀=诸盩")。

那么,"公非一辟方、高圉一侯侔、亚圉一云都、公叔祖類三诸整",司马迁的这些暗示性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显然,我们把这个问题让给"干支密码"去解答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答案是很明显的:正如表 4-5 所列,所谓"公非(卯)一辟方(巳)","高圉(丁)一侯侔(未)","亚圉(丁)一云都(戌)","太公组纇(甲)一诸盩(己)"无疑都是不成立的,班固无疑是基本正确的。也就是说,辟方、侯侔、云都这三位周先公理应按照《汉书·古今人物表》被计人先周世系,并再加诸盩一代,《史记》记载的先周世系无疑是有纰漏的。至于《国语》所谓"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云云,则很明显是指"公刘"之后的十五王而不是自"弃"之始的十五王,因为按照春秋时代的传说,"后稷"是周人的所谓"世袭官名","公刘"作为周国的实际奠基人是很有可能也被当时人尊之为"后稷"的。而以十九世二十王每世30年粗略推算,先周世系的始年当不会早于西元前17世纪。

因此,综合以上"干支密码"与《史记·周本纪》的证据,我们最终的结论是,所谓周政权(西土)是直接源自西元前 23—前 22 世纪的尧、舜、禹时代或者周人是源自西北羌戎外族的说法都是子虚乌有的,真正信史中的先周部族其实应该是一支严格遵守"干支取名制度"的汉语方言族群,其世袭族长的权力大约始于西元前 17 世纪,其连续的世系可列表如下(表 4-5)。

	王名	干 支	与前任关系	王名简释
1	台璽(邰原)	屠犁、則(己)	弃之舅氏,周 国的前身"有 邰氏"统治者	原通錢訓錢镈農具、耕犁;璽通 鑈,训正则;又"璽"字古文作 鉩、汆,"汆"或可能为"原"字之 误写,两字篆书形近易讹

表 4-5 先周王名干支与世系(周武王之前) 西元前 17—前 11 世纪

(续表)

	王 名	干支	与前任关系	王名简释
2	弃(叔均赤)	赤 奋 若、虚(丑)	周王朝建立者	弃通啼、泣,训啼泣、嘘號
3	不密	橘(乙)	子	密通茁,茁音橘
4	鞠	鞠(子)	子	_
5	公劉	析木(卯)	子	劉字從卯,訓劉杀、析割
6	慶節	河鼓、攝提格 (寅)	子	慶通磬,訓喜慶、鼓磬;節訓節 制調度、統帥攝提
7	皇僕	河鼓(寅)	子	僕通枹,训枹鼓
8	差弗	析木(卯)	子	差通磋,訓切磋、析割;弗通剌, 訓砍斫、刜斷
9	毀隃	於缝(甲)	子	毀训缺;隃通裔,训缝穴
10	公非	析木(卯)	子	非同判,训析割
11	辟方	南門(巳)	子	辟通闢,方通閉
12	高圉	疆圉(丁)	子	
13	侯侔(夷俟)	柳、咮(未)	子	侔通舞(柳),夷通颐,训朵颐贪啄
14	亚圉	疆圉(丁)	子	
15	云都	辜、奄贸(戌)	弟	云通釣,训釣衡估量;都通賭, 训賭博奄財
16	祖類(太公组紺、叔類)	於缝(甲)	子	類训瑕疵、缝隙;紺、類皆为類 之形讹
17	诸盩	屠犁(己)	子	诸通屠,盩古通畴,训耕治
18	古公亶父	河灘(申)	子	亶通澶、漠、潍
19	季歷(王季)	逊艾(壬)	子	《尔雅·释诂》"艾,歷也"
20	文王昌	攝提格(寅)	子,周武王之父	昌訓倡導、導引、攝提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资料来源:《史记》、《山海经》、《汉书》、《世本》、《尔雅》。

四、"女憍(丙)=女志(丙)"与夏后氏世系考

在考证了"先楚"和"先周"这两个仅仅在传说中而非事实上属于"先商时

代"的王朝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证那些真正属于"广义先商年代学"研究对象的王朝世系了。而"夏后氏"王朝作为《史记》认定的中国第一王朝无疑是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对象。

关于《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夏"是否真的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学者们最爱争论的问题。不过,在近年来不断充实的考古学证据面前,再结合我们的"干支密码"去分析,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伪问题了。因为,无论对于存在论者的正方和不存在论者的反方来说,他们的推测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虽然传统史书所极力描绘的帝国式"夏朝"很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作为广义先商时代的考古实例中随处可见的小国寡民式"夏后氏"城邦却一定是存在的。

事实上,即使暂不讨论二里头文化诸遗址(前19—前16世纪)和河南龙山文化诸城址(前26—前21世纪)等考古发现所带给我们的丰富历史信息和直接证据^①,仅仅就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诸多文字信息来看,其中也已经有许多不容伪造的证据可以证明"夏后氏"城邦的真实存在。例如,3000年前殷商遗民的史诗《商颂·长发》有云:

溶哲维商,长发其祥。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拔,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

也就是说,既然《商颂》所提及的"有娀(咸)氏"和"玄王"现已被"干支密码"证明就是甲骨卜辞所见之"咸夋"(约前 22—前 21 世纪)和"高祖河"(约前 21 世纪),他们都是无可置疑的史实人物,那么作为同样在此被提及的"夏后氏"始王"禹"(约前 22—前 21 世纪)自然也就成为间接可被证实的史实人物,这就像苏美尔的 Enmebaragesi 王(约前 26 世纪)之考古学存在性可以间接证明 Gilgamesh 王(约前 26 世纪)之史实存在性一样。(当然,这种证明是必须基于所有史料的共洽性以及考古遗址的存在性之上的。)

① 关于"夏后氏"城邦的考古证据分析,详见本书第五篇。

当然,除了以上这类可以与殷墟甲骨文间接挂钩的零星文字证据,我们还 有更重要的、可以与殷墟甲骨文直接挂钩的整体性文字证据,那就是《史记。 夏本纪》记载的"夏世系"其与殷墟甲骨文所见之"干支取名制度"的整体吻合 性,例如,正如前文所述,甲骨文"先商世系"的前半部分是严格遵循"隐性干 支取名制度"的("高祖河—河滩—申"等等),而《夏本纪》"夏世系"的前半部分 也明显遵循着同样的制度("帝槐-舆鬼-申"等等);再例如,甲骨文"先商世 系"的后半部分逐渐改为了"显性干支取名制度"("上甲"、"示癸"等等),而《夏 本纪》"夏世系"的后半部分也明显发生了大体同步的改变("孔甲"、"履癸"等 等)。因此,通过如上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史记》记载的与十七代 "先商"君主(包括灭夏前的成汤)同时并存的十八代夏王世系而言,其文字来 源的整体真实性绝对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这份堪称"甲骨文级"的古老世系 名单而言,现在我们真正必须要做的工作,那当然就是要用"干支密码"去对其 进行最后的细节核对。毕竟,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发现的《史记·殷本纪》其实 并不完全准确那样,由于久经辗转传抄,《史记•夏本纪》在大体准确的总框架 下其实也难免包含了一些细节的纰漏,而其中有些纰漏无疑是事关重大的。 例如,关于夏后氏王室的父系始祖究竟是"鲧"、"禹"还是"启"的问题,《史记。 夏本纪》的记载原本就是不足征信的。

(1) 夏始祖考

"夏后氏"的父系始祖究竟是谁?本来,这只要直接套用前述商、周等王室始祖的三位一体模式(表 4-6),我们是不难回答这个问题的。因为,前述案例早已经告诉我们,要判断"鲧"、"禹"、"启"这三者究竟谁是父系始祖,其唯一标准就是看谁是"夏后氏"始妣的儿子。然而,恰恰在"始妣"这项最关键的信息上,历史却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那就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夏后氏"始妣似乎不止一个。例如,《大戴礼记·帝系》有云:

也就是说,按字面的解读,"夏后氏"的始妣至少有两个,其一是所谓的大禹(文命)之母"女志氏",其二是所谓的夏后启之母"女憍氏"。

夏王室真的有两位始妣吗?毫无疑问,根据"干支密码"的揭秘,我们知道

这完全是一种讹传:因为,"女志"之"志(誌)"训誌记符号、图像征兆,作为人名本是代指天干第三位"繇兆(丙)",而"女情"之"情"通"交"训交爻,作为人名也是代指天干第三位"爻兆(丙)",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女志"与"女情"其实应该是指同一位"夏后氏"始妣。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夏后氏"同样是拥有唯一始妣"女憍(丙)=女志(丙)"的,那么我们要判断"鲧"、"禹"、"启"这三者究竟谁是舅系始王、谁是父系始祖就易如反掌了。因为,比照前述商、周王室的惯例,我们知道,始妣由于本来是被子孙追忆的无名氏女子,其见于后世文献的名号干支都应该是借用自与其平辈的舅系始王的,这就像"简狄女(未)"之名是借用自"帝夋(未)"或"姜嫄(己)"之名是借用自"台璽(己)"一样。所以,在"鲧"、"禹"、"启"这三人中,唯有与"女憍(丙)=女志(丙)"干支属性完全都相同的"禹(丙)=文命(丙)"无疑才是"夏后氏"的真正舅系始王:按照"干支取名制度","禹"通"龋"训龋齿裂纹、病兆征象,"文命"训条纹卦兆、天命征兆,作为人名都是代指天干第三位"繇兆(丙)"。

因此,再考虑到"鲧(亥)"、"启(已)"两人的名号干支属性(参见表 4-7)都与"女憍一女志(丙)"不同,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原来,正如殷人有其"有咸氏"和周人有其"有邰氏"一样,夏后氏也有其集体始祖政权"塗山氏三有崇氏"①;正如殷人有其"帝咸夋"和周人有其"台玺"一样,夏后氏也有其舅系始王"崇禹(丙)";正如殷人有其"咸狄女"和周人有其"有邰姜嫄"一样,夏后氏也有其始妣"涂山氏女憍一女志(丙)";正如殷人有其"契"和周人有其"弃"一样,夏后氏也有其父系始祖"夏后敢(已)"。也就是说,《逸周书》所谓的"崇禹生启"就像《山海经》所谓的"帝俊生帝鸿"一样都是指甥舅关系,大禹其实并不是夏王敢的"父亲"而是其"母舅",这就是"干支"密码为我们还原的关键历史真相(表 4-6)。至于"鲧(亥)",由于他与"夏后氏"的始王、始妣、始祖之干支皆不相同而又被排位在所有"先祖"之前,我们完全可以推论,"鲧"原本应该不是夏后氏的真正祖先而仅仅是一位神话人物,《山海经》所谓的"鲧腹生禹"原本是一段标准格式的"王权神授"血统神话,《史记·夏本纪》等径直把神话故事"禹之父曰鲧"列为信史实在是一个年代久远的美丽误会②。

① 据《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云"三涂,在陆浑县南"即嵩山之南可知,《史记》的"涂山氏(三涂)"就是《国语》的"有崇氏",进一步的证明可参见本书第五篇。

② 关于"鲧"属于神话人物,以及其与"有莘氏"的关系,详见本书第五篇。

	甲骨文和古籍中的先商始祖	古籍中的夏后氏始祖
集体始祖(族名)	有咸氏(有娀氏)	有崇氏(塗山氏)
舅系始祖/始妣	帝咸夋(帝俊)/简狄女	崇伯禹(文命)/女志(女憍)
父系始祖	高祖河(玄王契)	夏后启(建)

表 4-6 王朝始祖的三位一体结构: 先商始祖与夏后氏始祖之对比

(2) 夏王"循鞈"考

不过,虽然"鲧"被剔除出了"夏后氏"王朝的世系名单,但"夏后氏"王朝的历史却并不会因此而缩短一世,因为"干支密码"对我们的"夏后氏年代学"不仅能做减法也能做加法,也就是说,"干支密码"证明,《史记•夏本纪》的纰漏不仅是多记载了一位国王"鲧",也同时至少少记载了一位国王"循鞈"。

《山海经•大荒北经(藏经本)》有云:

禹生均國,均國生役來,役來生循幹,循幹殺綽人。

毫无疑问,这段文字的格式与"帝俊生禺號,禺號生经梁,经梁生番禺"完全一模一样,明显都是在描述一段某王朝的世系家谱。只不过,后者描述的是一段"帝俊"子孙们的商世系;而前者描述的是一段"大禹"子孙们的夏世系。而"干支密码"告诉我们,这两段《山海经》文字的相似性还远不止此,事实上,正如"禺號生经梁"能够为我们增添一位《史记》失载的商先公"经梁"一样,"役來生循鞈"也同样能为我们增添一位《史记》失载的著名夏王"循鞈",并同时把夏世系的总世数增加二世,总积年估算值增加半个世纪。

根据"干支密码","均國"之"均"当为"坰(扃)"字之讹训门扃,"國"通"國" 训门障,作为人名皆指地支第六位"南门(巳)"。"役來"之"役"通"芟"训耒耜枷芟①、犁田除草之农具,"來"通"斄(釐)",作为人名皆指天干第六位"徒犁=屠釐(己)"。而"循鞈"之"循"训循行、行路,另"循"也可能是"復(履)"字之讹,"鞈"通"靸"训屨(履),作为人名皆指地支第十二位"路踵=降婁(亥)"。因此,《大荒北经》为我们保留的是一段由"巳(均國)"、"己(役來)"、"亥(循鞈)"三个干支密码"加密"过的祖孙三代连续夏王世系。

① 参见《国语·齐语》及注。

而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史记·夏本纪》中也恰好有连续两代的夏王名号是"巳"和"己"(参见表 4-7),他们分别是第十二任夏王"帝扃(巳)"和第十三任夏王"帝廑(己)":"扃"作为人名当然是指地支第六位"南门(巳)";"廛"一本或作"廛",皆为"厘(釐)"字之形讹,作为人名当然是指天干第六位"图釐(己)"。而且,《史记·夏本纪》中的王名干支属"己"者也仅此一位。因此,我们不难作出最终的结论:"均國(巳)=扃(巳)"成立,"役來(己)=帝廛(己)"成立,《大荒北经》之"均國生役來"与《夏本纪》之"帝扃崩,子帝廑立"完全吻合。

而一旦我们确认了"均國(已)=帝扃(已)"和"役來(己)=帝廛(己)",那么我们对于《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的夏王"循鞈(亥)"之身份也就可以确认了。显然,根据"均國生役來,役來生循鞈"的明确记载,"循鞈(亥)"是第十二任夏王"均國=帝扃"的孙子、第十三任夏王"役來=帝廛"的儿子,是夏王朝的第十四任国王。只不过,这位夏王是一位中国"正史"所失载的国王:《史记·夏本纪》认为,夏后氏的第十四任国王是"孔甲"而不是"循鞈(亥)"。

《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会失载"循鞈(亥)"这位《山海经》认定的重要夏王?其实,按照"干支密码"分析,其原因也很明显,那就是在整个"夏世系"中王名干支属"降娄=亥"的原本共有两位:其一是"帝扃(均國)"之兄、第十一任夏王"帝降(亥)",其二则是"帝扃(均國)"之孙、第十四任夏王"帝不降—循鞈(亥)",《夏本纪》等史料正是误把"帝降"与"帝不降"两者混为了一谈,才最终造成了"失载":今本《夏本纪》有云"帝泄崩,子帝不降立",但据《史记•索隐》对该条的注解"《系本》作帝降"可知,《夏本纪》援引的一手史料《世本(系本)》原就认为"帝泄"之子、"帝扃"之兄本名叫"帝降"而非"帝不降",是《夏本纪》擅自加了一个"不"字;至于真正的"帝不降"则另有其人,他就是《夏本纪》所谓"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的那个孔甲之父"帝不降",他是"帝廑"和"孔甲"两王中间的一位夏王,也即《山海经》中"役來(帝廑)生循鞈(不降)"的"循鞈"。因此,按照《世本》、《大荒北经》等一手证据,《史记•夏本纪》的该段夏世系应该重新订正为:

······帝泄崩,子帝降立;帝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廛) 立;帝廑(廛)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

总之,通过"干支密码"的分析,《山海经·大荒北经》这份"甲骨文级别"的

古文献所能为我们复原的是这样一幅"夏后氏"王朝的真实时空背景:自大禹至夏桀,该王朝的总世数其实是十六世十八王而非旧史误传的十四世十七王,其总积年以"三十年为一世"估算亦当有 16×30=480 年左右,与狭义先商积年之 465 年大致相当,夏后氏王朝的始年则当在西元前 2100 年左右。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新复原的时空背景之下,中国古文献对于这段"广义先商史"的大量字面自相矛盾之记载也终将得到最合理的化解。

(3) 西元前 18 世纪之"夏史"考

如果说,西元前 18 世纪对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 折时代,那么几乎与之同时代的古代中国也正经历着诸多的历史巨变:正如 该时代的古巴比伦正从一个苏美尔人主导的土著社会转型成一个闪米特人主 导的外来殖民社会,该时代的古埃及正从一个内向型社会转型成一个拥有大 规模海外贸易、海外领土、喜克索斯式马拉战车、字母文字等新标志元素的外 向型社会一样,近一个多世纪来的考古学发现已经证明,西元前 18 世纪的中 国文明也正处在从"隐性干支文化"("神祇文化")转型成"显性干支文化"("半 世俗文化"),从"铜石并用文化"转型成大规模的"(以礼器铸造为特色的)锡青 铜文化",从众多"城邦"转型成"中央王国"的关键过渡时期。

然而,由于年深久远积累的误差,对于这段如此重要的历史,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记载却是充满了矛盾和混乱的。例如,关于中国历法和文字体系从"隐性干支纪日"转型成"显性干支纪日"即所谓"十日并出"事件,《古本竹书纪年》虽然也有"胤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并出"的记载,但"胤甲"究竟是何人却是历来就有争议的:《太平御览》认为改变十干汉字从而导致"十日并出"历法大乱的"胤甲"就是夏王"帝廑",而《路史》则认为"胤甲"是"帝廑"之子;又例如,关于中国从"铜石并用文化"转型成"青铜礼器文化"即所谓"铸九鼎"事件,《左传》虽然也有"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记载,但最早"铸鼎"者究竟是何人也同样是充满争议的:《史记》认为最早有能力铸造"九鼎"等青铜容器的是夏王"禹",而《墨子》则认为是"夏后启";再又例如,关于中国从众多"城邦"日渐统一成"中央王国"的兼并过程,《山海经·大荒北经》虽然也有"循鞈杀绰人……是此毛民"等战争记载,但夏王"循鞈"究竟是谁、被夏王"循鞈"杀伐并吞的"绰人"或"毛民之国"究竟在哪里,仅就现有资料来看原本也是个混乱不清无从考证的问题。

显然,假如我们想要彻底弄清这些"夏史"或"广义先商史"的重大问题,其

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首先给出一张完整而可供核对的"夏后氏王名干支与世系表",以便我们能通过"干支密码"去识别"胤甲"、"夏后启"、"循鞈"等"夏王"们的面目真假和时空背景。而因为已经拥有了表 4-1 的"干支密码表"作为考证工具,我们要想考证出一份"夏后氏王名干支与世系表"现在无疑是很容易的,其最终结果可列表如下(表 4-7):

表 4-7 夏后氏王名干支与世系 西元前 22—前 17 世纪

	王 名	干 支	与前任关系	王名简释
1	禹(崇禹、文命、憍、志)	條、蘇兆(丙)	啟之舅氏,夏后 氏的前身"有崇 氏"统治者	禹为龋本字,训龋齿裂纹、 病兆、凶兆;文训 紋章係 理,命训天命徵兆
2	啟(建)	南門(已)	夏后氏王朝建 立者	啟訓開啟、啟門、啓蒙;建 通鍵,训鍵閉、關鍵、門戶
3	太康	窒(庚)	子	康通园,训园藏、库窒
4	仲康(洛伯用)	窒(庚)	弟	用通庸,训墉、窒
5	相(相安)	相、敦祥(午)	子	安训安祥
6	少康(杜康)	窒(庚)	子	
7	佇(季杼)	著麗(戊)	子	杼、佇通著
8	槐	與鬼(申)	子	
9	본	端芒(乙)	子	
10	泄	赤奋若(丑)	子	泄训發泄、奋發
11	降	降婁(亥)	子	
12	扃(均國)	大章、南門(巳)	弟	局训門、關;均為坰之讹, 坷通扃,國通閩,训門限
13	廛(役來、廑)	則、屠釐(己)	子	廛、廑為厘之形讹;役通芟训犁芟农具,來通斄、釐
14	循鞘(不降)	路踵、降婁(亥)	子	循训巡行、行路, 幹训履、 屢(婁)
15	孔甲	延缝(甲)	子	
16	皋	皋(辰)	子	
17	發	赤奋若(丑)	子	發训勃怒、奋發
18	履癸(桀)	極(癸)	子	桀音通牒、極,训傑出極致

主要资料来源:《史记》、《山海经・大荒海内经》、《大戴礼记》、《尔雅》。

而一旦我们有了这张表,那么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有关西元前 18 世纪之 "夏史"的问题无疑就可以给出更准确的解答了。

首先,关于所谓"十日并出"的问题,我们核对表 4-7 就不难发现,"十日并出"事件的主人公"胤甲"根本就不可能像《太平御览》所谓的是指夏王"帝廑一名胤甲"或像《路史》所谓的是指"帝廑"之子,因为"帝廑(己)"或"帝廑"之子"不降(亥)"二人的名号于支属性都不是"甲"。事实上,综合殷墟卜辞和传世文献证据来看,《古本竹书纪年》所谓的"胤甲"根本就不是一位夏王,他其实是"殷王上甲微"即"殷甲"之讹。

正如前文所述,殷墟甲骨文早就显示,西元前19—前18世纪之间,中国的 汉字体系和历法体系发生了一次重大的革命: 原本用以纪日、取名的"墨、橘、 繇、圉"等"隐性干支"诸汉字逐渐开始被"甲、乙、丙、丁"等"昂性干支"诸汉字 所取代,而取代的最终结果就是"隐性干支"汉字最终摆脱了天文神话色彩而 成了用途广泛的"世俗汉字"①。当然,由于这场革命很可能使旧有的"畢、橘、 繇、圉"纪日顺序与新版的"甲、乙、丙、丁"纪日顺序不相衔接,从而导致了历法 大乱的阵痛,这就是所谓"十日并出"(十干日名混乱并用)神话故事背后的历 史真相。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十日并出"的本义,那么关于"十日并出"的始作 俑者是"胤甲=殷甲=殷上甲微"这一史实就很清楚了: 因为甲骨卜辞告诉我 们,从"隐性干支纪日"到"显性干支纪日"的革命首先正是从殷王王恆为其儿 子"微"取名"甲"开始的。而关于这一点,《吕氏春秋》也有明确的记载:"殷整 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显然,对比《竹书纪年》所谓"胤甲 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并出"之说,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原本就是指同一件 事: 所谓"殷整甲"就是"胤甲",所谓"徙宅西河"就是"居西河",所谓"猶思故 處,實始作為西音"就是"有妖孽,十日并出"("始作西音"和"十日并出"都指采 用新音汉字和新式历法的制度改革,"猶思故處"和"有妖孽"都指守旧势力对 改革的抵制和唱衰)。可见,"十日并出=始作为西音"的主角本是一位"殷"王 而非夏王是史有明载的。此外,根据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资料,"胤甲居西河"的 "西河"(即今浚县黄河故道以西地区)其地属于古河内地区即先商"下七垣文 化"的分布范围,所以我们同样能得出曾迁居西河田猎用兵的"胤甲"其人只能

① 今本《尔雅》之"畢、橘、縣、團"诸字皆非古字原型,但其音、形、义与4000年前的早期汉字往往十分接近,例如"縣"字的4000年前之原型已被考古发现,参见本书第七篇。

是一位殷王而不可能是一位夏王的结论。

因此,综合"干支密码"和考古学的证据,我们最终可以得出结论,西元前 19—前 18 世纪首先发动了"十日并出"革命的人并非是夏王"帝廑(己)"而是 殷先王"胤甲=殷整甲=上甲微"(当然还有其父王恆),该革命的发生地点"西河"则属于先商城邦"八迁"用兵地点之一而非《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注的夏后氏之都;至于这场文字和历法革命最后波及"夏后氏"则要等到稍晚的夏王不降也为其儿子孔甲取新式十干名"甲"以及夏王孔甲在其领地"東陽萯山"内"始為東音"的时代了(《吕氏春秋》)。

其次,关于所谓"铸九鼎"的问题,我们核对表 4-7 也不难发现,《墨子》所谓"夏后启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的"夏后启"很有可能是"夏后扃"之误:如前述,"启"训门户开启,"扃"训门扃,两者作为人名都是指地支第六位"南门(巳)";显然,在已知的夏后氏十八王中,"启"和"扃"的王名无论从干支属性还是字形上都是很容易被混淆的。

因此,结合《左传》所谓"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的记载以及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作坊等考古证据,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从"铜石并用文化"转型成"青铜礼器文化"的革命确实是从"夏后氏"城邦首先开始的,只不过"夏后氏"最早拥有"复合范技术"和"锡青铜合金技术"即传说中的"铸鼎"能力,其实是始于西元前 19—前 18 世纪的"夏后扃"时代,而并不是西元前 21 世纪的"夏后启"时代,当然更不可能是西元前 22 世纪的"大禹"时代。(《史记》等文献称"禹铸九鼎"不过是按先秦行文惯例用"禹"代指整个夏王朝而已;鼎数为"九"则纯属以周代礼制附会夏史之臆说。)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最早的大规模青铜铸造产业是"夏后氏"城邦通过战争掠夺和贡赐贸易,在整合了"昆吾氏"、"蜚廉氏"、"九牧"等城邦部族的铜锡资源和产业资源基础上,最终在西元前 19—前 18 世纪形成的。

最后,关于所谓"循鞈殺綽人"的问题,我们对比分析表 4~7 所列的"夏世系"以及与其同时并存的"先商世系"后不难发现,《山海经·大荒北经》所谓的倒数第五任夏王"循鞈殺綽人"事件与《古本竹书纪年》所谓的倒数第六任商先王"上甲微假師河伯殺綿臣"事件不仅在辈分时代上大致相同,而且在具体情节上也存在太多的相同点:其一,就作战的杀伐对象而言,上甲微杀的是"绵臣"而循鞈杀的是"綽人",毫无疑问,"绵"和"綽"两字任何人一看都会发现他们很可能是源于同一个古文字的讹传异化;其二,就作战的结果而言,《山海

经》称"有易(綿臣)"被杀后其国民"潛出為國","綽人"被杀后其国民也"潛為之國",两者完全相同;其三,就"潛為之國"的原因而言,"有易(綿臣)"是因为"河伯念(稔)有易","綽人"是因为"帝念之",显然,无论就"念之"情节还是"潛出"情节而言,在整部《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中乃至整部中国先商史中这都是绝无仅有的两例,其"剧情"之雷同性已经不是"巧合"二字所可以解释的了;其四,就作战的整体地缘政治格局而言,《古本竹书纪年》称上甲微的胜利主要并非依靠的是自身的军事力量而是依靠的"假師",而《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夏王"循鞈(不降)"作为当时中原列国的"盟主"无疑应该是其"假師"的合情合理之首选对象,郭璞所谓的"假師河伯"应该就是指向当时统治河洛之地的夏王借兵,而"河伯"正是夏王手下的头号诸侯兼头号猛将①。

而事实上,除了以上这些相似点,"干支密码"还能带给我们更直接的证据以支持关于"循鞈殺綽人"与"上甲微假師河伯殺綿臣"其实就是同一场战争的假说。《古本竹书纪年》有云:"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显然,根据"循鞈(亥)=不降(亥)",以及"九苑"之国其实就是《天问》中杀死王亥的"有扈(九扈)"之国②这两点证据,我们完全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西元前18—前17世纪那个曾导致了整个黄河流域从众多的"城邦"转型成"统一王国"的"百年兼并战争时代"就是从"循鞈殺綽人"一战开始的,这场战争是商汤王统一中原前的第一场"预演战争",其进攻方是古黄河之畔的两强夏王循鞈及其盟友殷王上甲微,其防守方则是古济水流域的有易氏国王綽人(绵臣)及其臣属邻国九扈氏(九苑),其战争结局是夏王循鞈吞并了九扈氏、有易氏(有狄氏),而殷王上甲微则"借刀杀人"杀了仇人綽人(绵臣)、收复了失地"僕牛氏",并获得了大量的狄、扈两族之奴隶(毛民、因民)。从此,夏、商这两个战胜国彻底奠定了其在整个黄河流域的霸主地位,而有易氏、有扈氏、有缗氏等古济水流域诸城邦(即岳石文化分布区)则彻底丧失了其早期的强大竞争能力,注定了要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中先后成为"被念之"的"潜國"(奴役之族)或"被统一"的兼并对象。

五、"后羿(午)=伯翳(午)"与有穷氏世系考

要还原所谓的"夏史"乃至整部"广义先商史",我们除了要关注"夏后氏"

① 关于夏王分封"河伯国"的历史过程,详见本书第五篇。

② 参见本书第五篇。

王朝以及"先商"城邦这两强,有一个与她们同时并存的更强大之王朝无疑也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有穷氏"王朝——众所周知,这个王朝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后羿之母国。

根据《楚辞·天问》、《左传》等文献的记载,"有穷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展开大规模武力征服的王朝,其赫赫武功包括了"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杀夏王灭夏朝)、"封豨是射"(兼并豕韦氏王国)、"射夫河伯"(击败河伯国)、"覆舟斟寻"(占领夏之三大加盟城邦斟灌氏、斟寻氏、有仍氏)等等,几乎染指了当时的整个中原地区;而更加重要的是,这次对中原地区的彻底"扫荡"在考古学上也得到了清晰的反映,那就是在与"有穷氏西征"大致相当的年代(约西元前21—前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面貌的重要转折点也几乎同步到来了:在中原地区繁荣了几近600年的"龙山文化"就此结束,而新的带有诸多"东方因素"的"二里头文化(含新砦期)"从此开始。

当然,除了以上的考古学印迹,"有穷氏"王朝对于"广义先商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其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有穷氏世系"名单可供我们今人去研究——要知道,这是全中国硕果仅存的三份真实版"夏代"世系名单之一(另两份就是殷墟甲骨文记载的"先商世系"和《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夏世系")。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有穷氏"一度还被视作"蛮夷"而颇受中原列国歧视,所以这份零星保留在《左传》等中原列国文献中的古老世系名单无疑是充满了错乱缺失和种种未解之谜而正亟待我们用"干支密码"去弥补和还原的。而在所有的这些错讹和谜团之中,最最惊人的一个当然就是关于"后羿"本人的:正如下文即将证明的,原来,"后羿"不是别人,他就是秦始皇的始祖"伯翳"之同一人。

(1) 有穷氏始祖者

大名鼎鼎的"后羿"居然和传说中的秦始皇家族始祖"伯翳"本是同一个人?确实,乍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完全脱离了传统史观的离经叛道之观点。然而,假如我们能刨除字面的差异而寻绎其思路,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种"伯翳之历史原型另有其人"的观点其实正是传统历史学家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的,只不过,当时的中国史学家认定的这位秦族传说人物"伯翳"之历史原型并不是神射手"后羿",而是水井工程发明者"益",即"伯翳—益"。

众所周知,根据《史记·陈杞世家》,司马迁早就明言"伯翳≠益". 因为 "伯翳"之后"封为秦"是诸多"嬴姓"东夷族群追认的远祖,而"益"之后"不知所 封"是个被崇伯禹和夏王启革了"天命"、灭了国的中原上古城邦君主(《天问》有云"后益祚革而禹播降"),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人物。那么,以班固为代表的其他史家们为什么还会一再去假设"伯翳—益",并最终因赢得了大量附议者而压倒了《史记》之成说成为主流观点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班固的思路至少在一点上是正确的,即秦人是绝不会在自己真正有记录可查的血缘始祖"恶来革"(西元前11世纪)之外去另外"记住"一个无名之辈作为自己的隔世远祖的,不管这个"远祖"是冒认的还是多少有其史影的。因此,假如有人大胆假设,那个除了作为秦人远祖外并不见于其他史料的陌生名字"伯翳",必定是某个其他著名历史人物(比如见于《尚书》的"伯益",又名"化益"或见于《左传》的"后羿")的别名异写,那他无疑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当然,从现在我们掌握的多方面证据来看,"伯翳—益"的传统假设很不幸是错误的,而"伯翳—后羿"才是最可能的正确答案。

"伯翳=益"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干支密码","翳"、"羿"都通"翼",作为人名都代指地支第七位"翼(午)";而"益"则训隘阻、窒塞,益作为人名本是代指天干第七位"窒(庚)"。因此,"后羿(午)=伯翳(午)"可以成立,而"伯翳(午)=伯益(庚)"不能成立。显然,事实再次证明,司马迁关于"伯翳"和"伯益"本是两个不同人物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要证明"伯翳(午) ≠伯益(庚)"很容易,但要彻底证明"后羿(午) = 伯翳(午)"则并不容易。事实上,仅仅凭"后羿"和"伯翳"的干支属性都属"午"就试图证明他们是同一个人那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先商时代名号干支属"午"的人物绝不止此一两个。我们之所以能最终作出"后羿 = 伯翳"的判断其实是出于对更多方面证据的综合考虑,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从时空地域上分析,文献记载的"后羿"和"伯翳"作为部族领袖都活动于先商时代、今山东省的汶泗流域地区,两者的时空特征是高度吻合的:《左传》称"后羿"的根据地为"穷石",据《帝王世纪》"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云云可知"穷石"(石通柘,训柘桑)当即曲阜附近的"穷桑"地区;而《史记》则称"伯翳"的根据地为"费",据《尚书·费誓》可知"费"当即曲阜附近之鲁国领地"费"地区。显然,这两个族群的起源地区大致都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之"尹家城类型"分布区或周代的鲁国之势力范围,属于同一个古文化地理单元。

其二,从族属血缘上分析,文献记载的"后羿"和"伯翳"都属于受中原列国 歧视的所谓"东夷"族群:"后羿"在《左传》中被直呼为"夷羿","伯翳"在《史 记·秦本纪》中则被说成是东夷"少皞氏"之分支"玄鸟氏"①的姻亲。显然,在这一点上两者的身份族别也是一致的。

其三,从人物的职业特长和个性爱好上分析,文献记载的"后羿"和"伯翳"都是以猎手形象出现的:《左传》称"后羿"是"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是个"只爱野兽不爱江山"的超级射猎爱好者,而《史记》也称"伯翳"是一个"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的高手猎人(上古驯兽师皆由猎人兼职属于同一种职业)。显然,从整天喜欢与鸟兽为伍这一点上看这两者也是一致的。

其四,从人物的人际关系上分析,文献记载的"后羿"和"伯翳"都是有一个 名字干支属于"戊"的前任国君的:一方面,据《左传》记载,"后羿"有一个前任 叫作"伯囧(伯朙氏)","朙"通"囧",囧按《说文》训"窻牖麗康",可代指天干第 五位"著麗(戊)";而另一方面,据《史记》记载,"伯翳"也有一个前任先公叫作 "大業",而按《说文》"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的解释可知,業的本義訓飾 麗、麗附,作为人名也是代指天干第五位"著麗(戊)";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 为"伯翳"的前任先公,"大業"还有一个配对的先妣叫"女華","華"训華麗无疑 也是一个代表天干第五位"著麗(戊)"的名字。因此,从"后羿"和"伯翳"的前 任或先公先妣来看,这两者也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即"伯囧(戊)=大業(戊)= 女華(戊)"。显然,如果仅仅是个人的名字有巧合那是毫不稀奇的,但连续两 任国王的名字都巧合就很值得令人深思了,为什么"后羿"和"伯翳"名字都叫 "午",而他们前任君主的名字又偏偏都叫"戊"呢?更何况,连续"巧合"的国王 名字其实不仅是两位而是至少有四位:《史记》和《左传》告诉我们,"大業"还 有两位孙辈后裔"鸟俗氏(未)"和"若木(丑)"其名字的干支属性其实也与"伯 明"的两位孙辈后裔"椒(未)"和"豷(丑)"是完全吻合的(关于"鸟俗氏=椒"和 "若木=豷"的干支考释详见表 4-9)。

因此,正是在综合分析了以上各项信息的基础上,我们不得不作出如此惊人的最后判断和结论:原来,"后羿"就是"伯翳",他就是秦始皇家族攀认的东夷嬴姓始祖之同一人(按嬴姓是周王朝对祭祀"伯翳"之东夷诸国的"赐姓",这些族群本无所谓"姓",秦人至其第八世祖非子才被"赐姓嬴")。

而在这个重要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对"有穷氏世系"的第一个重大考证结果也已可得出:那就是"有穷氏"王朝的历史其实并不是由"后羿=伯翳"本人

① "玄鸟氏"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

开创的,在"后羿"之前,"有穷氏"还被一位舅系先王"大業(伯囧)"和先妣"女 華"统治过。事实证明,"有穷氏"王朝和先商、先周、先楚、夏后氏等王朝一样, 都是拥有着"三位一体"之始祖结构的史实王朝(见表 4-8);"有穷氏"王国是一支充分体现了"干支取名制度"等古汉语文化的典型中国文明。

	甲骨文和古籍中的先商始祖	古籍中的有穷氏始祖
集体始祖(族名)	有咸氏(有娀氏)	大费氏
舅系始祖/始妣	帝咸夋(帝俊)/简狄女	伯囧(大業)/女華
父系始祖	高祖河(玄王契)	后羿(伯翳)

表 4-8 王朝始祖的三位一体结构: 先商始祖与有穷氏始祖之对比

(2) "浞因羿室"考

既然,在关于谁是"有穷氏"始祖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已经有了可靠的答案,那么我们要还原出一份完整的"有穷氏"世系现在就只差最后的一个小问题需要考证了,那就是"伯明"、"后羿"和"寒浞"这三个"有穷氏"最重要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左传》对其的描述原本显然是语焉不详的:"寒浞,伯朙氏之谗子弟也。伯朙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字面上去作普通解读,此三位王者之间的关系似乎都是非亲非故的,不但后羿与其他两位有"外国人"身份嫌疑的王者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被提及(据某些后世的注解所暗示,后羿是"有穷国"人而伯朙、寒浞是所谓的"寒国"人),就连寒浞与伯朙的关系,据原文看也不过是辈分不清的普通族人"子弟"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

"有穷氏"王朝真的是一个能容忍非血缘性王位继承关系,乃至能容忍"非我族类"之外国篡位者的王朝吗?毫无疑问,对于到处都讲究"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中国先秦社会来说,这种解释是明显不符合历史逻辑的: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先秦时代,一切政治权力的基础都是来源于宗族的力量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无论是田齐代姜的十世积累还是赵、魏、韩三家分晋的 200 年长期准备,一切史实都表明单枪匹马者在数年之内夺取他人政权是绝对没有可能性的,不管这个单枪匹马者是春秋时代的田完(前 706—?)、赵衰(?—前622),还是先商时代的后羿、寒浞。

那么,"伯朙"、"后羿"和"寒浞"这三个"有穷氏"国王之间既然不可能是非亲非故的,他们究竟是什么亲属关系呢?很幸运,由于"干支密码"信息带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能循着"后羿—伯翳"和"伯朙—大業"等线索而直接找到最终的答案了。原来,正如《史记·秦本纪》等文献所记载的,伯朙、后羿、寒浞这三人本来就是同一国、同一族的成员,而且都是"有穷氏"的王室成员,他们之间的王位继承关系即使真有篡位的因素存在,那也仅仅是第一继承人与第二继承人之间的争夺,都是在同一系宗族力量的支持范围之内:

"后羿(伯翳)"为什么得以上台继位?因为他本来就是"女華"之子,也即前任国王"伯朙(大業)"的外甥。对比商、周等王朝始祖传说之成例可知,《秦本纪》所谓"大業娶女華"明显是经过后世父系观念加工改造的故事,所谓"父子关系"原本当是"甥舅关系"。

"寒浞"为什么得以上台继位?因为他本来就是"伯朙(大業)"的另一个外甥兼"后羿"的共治者——《左传》所谓"伯朙氏之谗子弟也"即指寒浞原本是伯朙的合法继承人即众多外甥子侄之一,但因为伯朙不喜欢他"谗"而被废;所谓"夷羿收之、以为己相"即指寒浞是后羿的共治者,而所谓"浞因羿室"之说也正反映了这两人的同辈近亲关系,要知道收纳寡居妻室是同辈血亲才有的古代特权;而"寒浞"与"后羿"儿子的王位之争(《左传》"羿……其子……死于穷门"),那也不过是旧式城邦舅权制与新式王朝父权制之间的惯性争夺之表现。因此,旧注所谓的寒浞乃是"寒国"人,"寒国"故地就在今潍坊市寒亭区等等,都完全是断章取义的臆说,"寒浞"其人的真正祖籍就是"有穷氏"城邦,而"寒"不过是其后来征服的一块封地罢了,就像"過澆"之"過"、"戈豷"之"戈"一样①。总之,假如寒浞真的是个外国人,那么他凭一己之力居然就能争取到后羿的"家众"(同宗力量)来支持他并轻易"篡夺"政权的故事就会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因此,综合《左传》关于伯朙、后羿、寒浞、浇、椒、豷等有穷氏列王的记载, 关于少皞氏后裔有"四叔"重、该、脩、熙的记载(有穷氏本来也是少皞氏的后裔,详说见后),关于"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的记载,再加上《史记·秦本纪》关于大業、女華、伯翳、鸟俗氏、若木等嬴姓远祖的记载(如前述有穷氏后裔皆被赐姓嬴),我们最终可以按照"干支密码"拟合还原出如下的四世六王之"有穷氏"王朝完整世系(表 4-9):

① 关于"寒浞"之封地"寒"的地望考证参见本书第五篇。

	王 名	干 支	与前任关系	王名简释
1	大業(華、伯明、夷舜、重)	著麗、重光	羿之舅氏,有穷 氏的前身"大费 氏"統治者	業,按《说文》"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本义训飾麗、麗附;明通囧,训麗廔;舜训蕣華、光華
2	后 羿(伯 翳、 飂叔安)	売 翼、相 羊 (午)	甥,有穷氏王朝 建立者	羿通翼、翳;安训安舒徜徉
3	浞(寒浞、該、 董父)	路踵(亥)	姨表弟或胞弟, 伯囧甥	浞训骸足、履足;董通"踵"
4	澆(過澆、奡)	端萌(乙)	子	澆通翘,训萌芽上翘
5	椒(鳥俗氏、	柳、鶉火、协治(未)	子,或未在位	椒训大豆穀物,粮餾(柳);鳥 訓鶉;俗通谷、穀,训粮餾;熙 训熙和、协治
6	豷(戈豷、若 木、脩)	元 號、味 會 若(丑)	弟	据《说文》"豷,豕息",豷训喘 气、號叫怒味;脩音通然,训忽 然、咆哮、號叫

表 4-9 有穷氏王名干支与世系 西元前 21—前 20 世纪

主要资料来源:《左传》、《史记》、《楚辞》、《孟子》、《尔雅》。

显然,这是一个由甥舅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等合法血缘继承关系构成的标准血缘王朝,其所体现的"有穷氏"乃至整个"古东夷"族群的社会结构相比其西邻的"先商"、"夏后氏"等邻居并没有任何的本质不同。

(按:表4-9之所以把过浇、戈豷两王列为父子关系而非传统认为的兄弟关系,其依据有三:其一是《左传·襄公四年》所谓"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表明浇和豷有可能是分属于少康时代和帝杼时代的父子两辈人;其二是《左传·襄公四年》所谓"浞因羿室,生浇及豷"从上古文例来说并不必然是指"浞生了儿子浇及儿子豷",比照《山海经》等文例也可读作"浞生了儿子浇及孙子豷",《左传》作者完全有可能照抄古文而错会其意;其三则是在《史记·秦本纪》的"伯翳(后羿)"谱系中,"若木(豷)"之兄"鳥俗氏(未)"的名号干支与"浇(乙)"不符,但《左传·哀公元年》所谓"浇使椒求之"的"椒(未)"却恰好符合《史记》中"若木(豷)"之兄"鳥俗氏(未)"的干支和辈分关系,所以用排除法,过浇应该不是戈豷之兄而是其父。)

(3) 夷舜西征考

根据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 4 000—3 900 年前,中国文明的历史面貌正发生着一次巨大的转变:一方面,随着整个中国大陆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资源重组,拥有着山西池盐资源和大量农牧资源、地处"天下之中"交通贸易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夏后氏的驻地)最终取代了偏安的东部沿海地区(东夷及其邻近地区),从此成为东亚人类的最适宜居住区和人口最密集区;而另一方面,在黄河中游繁荣了近五六个世纪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东方移民和东方文化的大量融入下也彻底改变了其自身的面貌,从此被包括"新砦期"在内的广义"二里头文化"所取代。显然,对于这么一段几近全民规模的东夷文明"西征"史,《左传》将之仅仅归功于后羿一人,即所谓的"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是很难令人完全置信的。事实上,通过"干支密码"的解读,我们发现在古东夷人的心目中,至少还有一个人在这次"西征"中本来也享有着与后羿同样的历史荣誉,那就是《孟子》所谓"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的"夷舜"。

中国最著名的古帝之一"舜"究竟是"山东人"(古东夷)还是"山西人"(古冀州)?本来,假如不是"干支密码"破解出的"有穷氏"世系可以告诉我们"夷舜(戊)=大業(戊)":《孟子》中那位有着长途西迁经历的英雄"夷舜"其实就是"有穷氏"的首任国王"大業",我们是很难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因为,与另一个已经被确认属于"山西人"(《禹贡》冀州)的著名古帝"尧"不同,中国先秦古文献对于"舜"的生存时空乃至族属问题的描写历来是充满了矛盾的:一方面,《史记》明确认定舜是"冀州之人"(今山西);而另一方面,《孟子》也一口咬定舜是"东夷之人"(今山东)。显然,只要我们承认龙山文化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跨越山东和山西的"统一帝国"而只存在诸多地方性城邦之史实,那么"舜"作为一个如此忽东忽西没有确切时空属性和族源属性的人物,其要想被写进中国的信史就将十分困难了。

不过幸好,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千古之谜的谜底:原来,"舜"作为拥有确切时空属性和族源属性的历史人物是肯定存在的,只不过中国古籍记载的"舜"不是一个而是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冀州之舜"即"尧"的著名继承人"重华",另一个则是"东夷之舜"即"大费氏"的统治者"大業",《史记》和《孟子》本来都没有写错。因为,按照"干支密码","舜"字本义训蕣华、光华,作为人名本是代指天干第五位"重光(戊)",故无论是山西"有虞

氏"城邦的统治者"重华"还是山东"有穷氏"的始王"大業(女華)"都可以把"舜"作为自己的别号。而关于"大業"别名为"舜"的具体证据,其实《史记》也早就提供给我们了:在《史记·秦本纪》中,与"伯翳(后羿)"发生直接事件关系的人物只有三人次,一个是其先公"大業(戊)",一个是其先妣"女華(戊)",另一个就是周孝王(约前10—前9世纪)亲口说的"昔伯翳为舜主畜"的"舜(戊)",而很显然,对于周孝王说的这个典故,我们除了能理解为"昔年东夷国王伯翳曾为自己的先王夷舜(戊)=大業(戊)掌管野兽资源",我们是很难有其他更合情合理的解释的(比如把这位山东东夷国王的服务对象换成千里之外的山西有虞氏国王重华)。

当然,除了以上的"干支密码"证据,最终能够证明"夷舜(戊)=大業(戊)=伯囧(戊)"的决定性证据无疑就是《孟子》言之凿凿的"夷舜"西迁路线之本身了。任何看过地图(图 4-2)的人都不难发现,《孟子》所载的"夷舜"一族西迁路线即"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三部曲与《左传》所载的"有穷氏"一族西迁路线即"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三部曲其实是完全吻合的:"诸"与"鉏"古为同音字,皆指春秋时代鲁国季孙氏的封地"诸邑"、"柤"即古费国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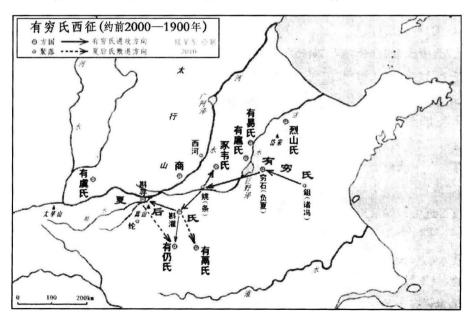


图 4-2 龙山文化的终结者:有穷氏王朝西征路线示意(约前 2000—前 1900 年)

近地区;"负夏"与"穷石"古为同地,皆指"负瑕(夏)"和"穷桑(柘)"所在的曲阜附近地区;"鸣条"与"夏民"所在都是指夷夏交界的豫东地区,为有穷氏兵锋西指的前进基地。因此,综合起来看,出生并成长于东夷故乡(今山东邹城县)的孟子所津津乐道的"老乡级"名人"舜",即"生于诸冯(今费县),迁于负夏(今曲阜),卒于鸣条(今长垣附近),东夷之人也"的"舜",其实只可能是指东夷国王"大業"而非冀州国王"重华"。

总之,通过以上的初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第一代国王"夷舜(大業)" 开始,由于"舜之时……振滔洪水,以薄空桑"①,有穷氏王朝就在经济压力和 环境压力下展开了它的千里远征计划,整部有穷氏王朝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 西征史。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证据来看,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 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尝试无疑都是由"有穷氏"这个东夷王朝由东向西 发起的。虽然,从政治上说,这个"因夏民以代夏政"的尝试最终失败了(因为 有穷氏最终并未能全歼逃到南方汝颍老巢的夏军,而且夏王少康很快"复国" 了),但从文化上说,这个尝试却无疑是成功的,一方面,"山东龙山文化"由于 其上层精英和巧匠都被"有穷氏"王朝裹胁西去或就地摧毁而失血枯萎,变成 了只有下层温饱而缺乏上层建筑的粗糙"岳石文化";而另一方面,"中原龙山 文化"却结合了"有穷氏"带来的东方因素而突变成了灿烂的"二里头文化",并 从此奠定了其对"岳石文化"等周边文化的不可逆转之优势,从而形成了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辐射中心。当然,这场史诗般悲壮的文化"统 一"与"融合",绝非是"革孽夏民"的后羿这一位英雄就可以完成的,它是经过 了有穷氏王朝"夷舜"、"后羿"、"寒浞"、"過澆"、"椒"、"戈豷"等几代人的努力 和自我牺牲,并经历了"夷舜西迁、羿代夏政、羿灭豕韦、寒浞篡位、浞灭斟灌、 浇灭斟寻、少康复国、帝杼灭殪"等几多历史反复才最后完成的。无论如何, "二里头文化"这个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能力"从中原辐射四方"的文明 实体其最早并不是由"夏后氏"本身造就的,而是由一群 4 000 年前的古东夷 征服者"得志行乎中國"(《孟子》语)造就的,这就是"干支密码"为我们还原的 所谓"夏史"中最有价值的一幕真相。

① 按中国古籍所谓"共工振滔洪水",与苏美尔人及西方人所谓"洪水方舟"一样,都本属神话,此"共工"本指中国之水神(考证详见本文第五篇)。但"夷舜"时代的"空桑"作为有具体时空背景的传说,或当有经济危机兼环境危机之"史影"为本,因为考古发现西元前 2000 年左右中国大陆的环境条件确有所变化。此引文见《淮南子·本经训》。

六、"虞幕(巳)=有吳迥(巳)"与 有虞氏世系考

按照《史记》的观点,中国的王朝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显然,假如这种说法真的成立,那么我们寻找中国最早的史实王朝和史实人物的工作到此就应该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把属于"夏朝"时间范围的所有史实王朝之世系都考证过了,她们分别是:殷墟甲骨文中的"先商世系"(开端于约前2100年)、《史记》中的"夏后氏世系"(开端不晚于前2100年)和《左传》中的"有穷氏世系"(开端不晚于前2000年)。也就是说,中国最早的史实人物仅仅能追溯到西元前22世纪左右的"咸夒"和"崇禹",至于《史记》中那些早于"夏朝"的所谓"古帝"们,则明显还缺乏成为"史实人物"的基本条件:正如前文所述,他们本身不但是与"治洪水"等神话传说和"禅让制"等政治宣传纠缠不清的,而且还缺少了"王朝世系"归属和"考古遗存"归属这两项最基本的历史信息。然而,由于"干支密码"的帮助,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以上这些基于传统观点所作出的推断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比"夏朝"更古老的中国史实王朝是绝对存在的,而且还并不止一个,这些王朝不仅是以非孤证性的"王朝世系"形式存在于中国的先秦文献之中的,而且也是以规模宏伟的"古城遗址"形式存在于中国的考古实物之中的。

例如,在《史记》成书几百年之前,《左传》和《国语》等中国先秦史书早就言之凿凿,中国最早的王朝历史记录并不仅是"夏商周"而是"虞夏商周"(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而这个名列虞、夏、商、周四大王朝之首的"有虞氏"地方王朝,其实就是一个中国最早的史实王朝之一。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可知,该王朝建立的年代应该比夏先王"崇禹"或商先王"咸夒"还要早至少200年(即大约始于西元前24世纪)。

虽然,由于"三皇五帝"传说的长期误导,在今天的"正史"体系中,关于"有虞氏"这个古老王朝的世系资料除了"虞舜"、"瞽叟"父子外早就被删削殆尽了;虽然,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今本《大戴礼记·帝系》所谓的"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云云之"虞舜族谱"绝对是属于有拼凑和伪造痕迹的孤证而不可全信的(详说见后);但是,通过对比解读《山海经·大荒海内经》这一"甲骨文级"的文献以及

新出土的简帛实物,我们最终惊喜地发现,真本的"有虞氏"世系其实并未被彻底埋没,而是以各种隐蔽的方式至今犹然存世的:在这个真本的"有虞氏世系"中,其所包括的王朝成员(国王们和王子们)当然远不止"古帝"虞舜一人,而是还包括了诸如《左传》提及的有虞氏家族成员"虞幕"、"(虞)瞽叟"、"虞遂"、《山海经》提及的有虞氏先王"吳權"(即"虞權")及其后裔"(虞)鼓延"、"(虞)殳"等等,当然,除了这些一望而可知其国别或族源是属于"虞=吴"的名号之外,正如许多学者早就指出的,"虞舜"的同城同事、前任国王"唐尧"无疑也是"有虞氏"的王室成员之一,不然《尧典》就不会被古人列人"虞书"而应该叫"唐书"了(关于尧、舜同族的考证详见下文)。总之,中国的一手古文献都表明,"有虞氏"绝对不是虞舜一个人"以章明德"的临时称号(《史记·五帝本纪》语),而是一个在古冀州汾涑流域繁荣兴旺了几百年的伟大王朝。

当然,关于"有虞氏"王朝的真实存在,今天我们不仅有历史学方面的文字 证据,更有了考古学方面的实物证据,那就是据报告称其城墙包围面积 [期已 达 56 万平方米、Ⅱ期更达 280 万平方米的襄汾陶寺古城址(约西元前 24—前 22世纪),其大城东西长约1800米、南北宽约1500米,城墙总长度当在十华 里以上①。正如许多专家指出的,这座无论在城市规模上还是出土文物之精 致上都堪称黄河流域之最的龙山文化古城(图 4-3),其在诸多重大特征上都 是与古文献中的尧、舜之都即"有虞氏"城邦是若合符节的,其一,就时空特征 来说, 陶寺遗址的古城是一座距今约 4 300 至 4 100 年左右的位于汾涑流域的 古城(陶寺 I 期的碳 14 测年数据为距今 4 340 ± 90 年),而据《左传》之"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史记》之"舜,冀州之人也",以及后世所谓的"尧都平阳"、 "舜都蒲阪"等记载可知,"有虞氏"的都城也是一座位于汾涑流域(即古冀州) 某地的尧舜时代(距今 4 100 年以上)之古城;其二,就历史地位来说,陶寺古 城是迄今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龙山文化古城,其作为当时整个黄河流域 的"头号"人口密度中心和政治实力中心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尚书》 中的古冀州"有虞氏"城邦能够"班瑞于群后"、"天下咸服"无疑也表现了其高 居"城邦实力排行榜"之首的历史地位;其三,就王朝结构来说,陶寺 [、[]期古 城从考古学地层堆积分析,其大约被绵延使用了逾200年,并发现了至少十座

① 谢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37页。

配有豪华棺椁、礼器的"王墓"(例如 I 期的 M3072、M3073、M3016、M3015、M3002 和 II 期的 M22 等大墓),而正如下文将要考证的,古文献记载的"有虞氏"王朝也至少包括了七世十代国王(此外还有其他知名的王子),无论是按平均每世在位 30 年计还是每代在位 20 年计,其历史总积年也应在 200 年左右。(此外,关于"陶寺遗址=有虞氏城邦"还有更直接的考古证据,详见本书第七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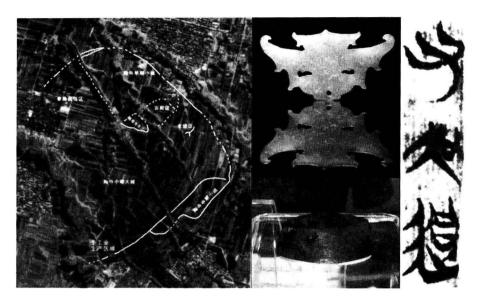


图 4-3 左: 襄汾陶寺古城遗址(约西元前 24—前 22 世纪); 中: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铜铃(约西元前 25—前 21 世纪); 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文字"有吴迥"(西元前 5—前 3 世纪)

因此,综合"陶寺遗址"的发现和传世、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看,"有虞氏"王朝的真实存在性绝对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世界奇迹"大金字塔可以见证埃及最古老王朝之一"第四王朝"(约始于西元前 26 世纪)的真实存在一样,作为另一"世界奇迹"万里长城的前身,陶寺遗址的"十里长城"(图 4 - 3)也足以见证中国最古老王朝之一"有虞氏"(约始于西元前 24 世纪)的真实存在;正如殷墟甲骨文和《史记•夏本纪》足以给我们还原出先商王朝和夏后氏王朝的完整世系一样,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山海经•大荒海内经》等中国最古老最可靠的文献资料也同样足以给我们还原出一份完整的"有虞氏"世系,即由"陈锋氏"、"吴權"、"虞幕"、"殳"、"鼓延"、"瞽叟"、"尧"、"虞舜"、"無淫"、"虞孝"等

至少十代国王所组成的悠久而古老的王朝世系。

(1) 有虞氏始祖考

要还原"有虞氏"王朝的可靠世系和真实历史,当然首先要从考证"有虞氏"王朝的第一任国王或"有虞氏"王室的始祖名单开始。

"有虞氏"的始祖究竟是谁?显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参考前述夏、商、周王朝都把始妣和舅系始王列为王朝开端的惯例,那么其答案是不难找到的:也就是说,"有虞氏"王朝的开国君主并非是尧或虞舜,而是一位与尧、舜之共同始妣"陈锋氏女"相对应的舅系先王"陈锋氏"。因为,《史记》和《帝系》等史料都有如下的记载: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尧)……

众所周知,妫姓"陈国"为周王朝所分封的"虞舜之後",故按中国古文献的行文惯例,"陈"字是可以代替"虞"字而冠名其前辈祖先的,例如《国语·鲁语下》的"虞胡公"就被《史记》称作"陈胡公"①。而由此可见,先秦文献所谓的"陈锋氏"其原始名号应该就是"虞锋氏"。那么,对于这位名字前明确冠以国族号"陈(虞)"的历史人物来说,对于这位在所有的古史资料中都和"尧"发生明确之母系血缘关系的历史人物来说,他究竟应该是何时何地何族之人呢?毫无疑问,比照中国所有早期王朝都"言必称始妣和始舅"的惯例,我们完全可以推知,"陈(虞)锋氏"其实就是"有虞氏"王朝的舅系始王,"陈(虞)锋氏女"其实就是尧、舜的共同始妣。

当然,除了以上史料的字面证据,"陈锋氏"这一古老王名背后其实还隐藏着更深层的历史信息和证据是足以证明其"有虞氏第一王"乃至"甲天下第一王"之历史地位的,那就是"干支密码"告诉我们的超级秘密:"陈锋氏(甲)=於逢(甲)。"

一个始祖级国王的王名干支属"甲"究竟还能意味着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对比以下这三个显著的例子就会一目了然了。其

① 后代的国号可以冠名在祖先的头上,其文例还有"崇禹"常被称为"夏禹"、"商契"常被称为"殷契"等等,参见《史记》。至于"陈胡公"则更是叠床架屋式的错误冠名,因为周朝的始封君主是没有谥号的,胡公满的最初国号就是"胡",后来才改称"陈",这就像鲁国始祖只称"鲁公伯禽"、晋国始祖只称"晋侯燮"而不称"鲁某公伯禽"、"晋某侯燮"一样,参见本书第五篇。

一,如前所试,根据甲骨卜辞记载的"先商世系",殷商王朝最早采用"显性十干 取名制度"取名的第一人是"上甲微"(约前19世纪),而蹊跷的是,他的名字不 取7、丙、丁、戊等等而偏偏取的就是天干第一位"甲";其二,根据传世文献记 裁的"夏世系",夏后氏王朝最早试行"显性十干取名制度"的国王"孔甲"(约前 18 世纪)其名字也是天干第一位"甲";其三,众所周知,秦始皇一统中国后革 除"王号谥法制度",新建"帝号世数制度",而其以身试法的方式就是自称"始" 皇帝。显然,在"十干取名制度"下,无论是对于殷王"上甲"还是夏王"孔甲"来 说,他们自命为天干第一位"甲"无疑都有着秦始皇自命为"一世"始皇帝之同 样的政治动机和历史意义。因此,基于以上这三次"取名制度改革"实例所展 示的惊人历史规律性,我们不难作出一个最合理的推论,那就是作为比"显性 十于取名制度"更古老的"隐性十干取名制度"之创立者,中国历史中无疑也应 该有一位自命为"於逢(甲)"的"甲天下第一王"存在才对,而且,考虑到"隐性 十干"是一种从"无名"到"有名"的原创而非像"显性十干"那样仅仅是旧瓶装 新酒式的改良,这位自命为"於逢(甲)"者也必定是某个王朝的最早有名可考 者即秦始皇式的"始王"。而仔细核查所有的中国远古帝王名单,其既能够符 合"始王"之身份,又能够符合名号干支隐性属"甲"之条件的"甲天下"式伟大 王者无疑只有一个,那就是"有虞氏"的始王"陈锋氏=虞锋氏(甲)"(约西元前 24 世纪在位)。

"陈锋氏"真的是中国最古老的史实人物之一、中国最古老版本的"上甲微"或"秦始皇",并且是中国"十干纪日"与"十干取名"制度的发明创立者吗?显然,乍听起来,这种说法多少还是有些令人难以信服的。因为,一方面,相比"上甲微"在殷商甲骨卜辞中的受重视程度和"秦始皇"在中国史书中的受重视程度,"陈锋氏"这个名字在先秦文献中的出现频率和受重视程度实在是太低了;而另一方面,相比上甲微创立"显性十干取名制度"有"十日并出"史影神话千古传颂、秦始皇创立"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制度有《史记》等正史文献郑重描写,"陈锋氏"创立用"逢、唐、繇、圉、舜、犁、遂、皓、终、极"这隐性"十干"进行纪日、记名的惊天地动鬼神之壮举居然没有留下丝毫史料乃至史影的描述也是十分奇怪的。

然而,假如我们考虑到在"干支取名制度"下"陈锋氏"还可以拥有另外一个更著名的别名即"太皞伏羲氏",那么以上这两点对"陈锋氏"历史地位的最后诘难无疑也就会马上不攻自破了。因为,根据"宓羲(甲)=锋(甲)"(干支考

释见表 4-11)以及"太皞=陈"(《左传》"陈,太皞之虚也")①推理可知,"陈锋氏"在先秦古汉语语境下本来就是"太皞宓羲氏"的等价别名。而毫无疑问,一方面,"太皞宓羲氏"相比"上甲微"乃至"秦始皇",其在中国历史中的知名度是毫不逊色的;而另一方面,关于"伏羲氏"首创"十干"的史料或史影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千古传扬、妇孺皆知的,不管是《书序》等所谓伏羲氏"始作书契(即十干字符)"的史影传说,还是《尚书》所谓伏羲氏之族裔"羲仲"、"羲叔"能够为尧舜王国"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世袭管理干支历法的正史记载,都足以证明这一点。总之,种种迹象都表明,"陈锋氏(甲)"作为上甲微和秦始皇们的前辈先驱第一人之历史地位,以及作为於逢(甲)、端芒(乙)、繇兆(丙)、强圉(丁)等"隐性十干代码"和"十干纪日制度"、"十干取名制度"之原创实施者(即使不是直接发明者)的历史地位,都是无人能够撼动的。

当然,除了"尧"的舅系始祖"陈锋氏","尧"的父系始祖"帝喾"无疑也是"有虞氏"的重要始祖之一。虽然,在儒家附会出的"大一统"帝王谱系中,"帝喾"似乎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因而也是无确切国籍族属和时代背景可考的可疑传说人物——按照《大戴礼记》所谓的"帝喾四妃"之说,他即是古冀州人"帝尧"的父亲,又是古东夷人"少皞帝挚"的父亲;既是 4 100 年前商王国始妣"简狄氏女"的丈夫,又是 3 600 年前周王国始妣"姜嫄"的丈夫……但是,通过解读比儒家二手史料更可靠的《山海经·大荒海内经》等一手文献证据,我们依然不难发现,"帝喾"其实确实是一位 4 300 年前的史实人物,而不是一位可以穿越千年时空去分别和殷始妣和周始妣先后幽会的神,"帝喾"其实确实是一位汾涑流域的"有虞氏"国王而不是什么"少皞氏"东夷人或其他族属的人。

"帝喾"为什么一定是史实人物而不可能是一位神话传说人物?因为作为中国一切神话传说的鼻祖,《山海经》早就告诉我们,"帝喾"在中国最初版本的万神殿中根本就没有资格占据一席之地,他在《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中的角色明显只是个世俗的帝王或酋长而已。如前所述,通过与殷墟甲骨卜辞的多处吻合互证,《山海经·大荒海内经》已被证明是中国传世文献中最接近甲骨文内容的可靠古老文献。然而,即使在这份以神话大全著称的文献中,"帝喾"这位人物并没有被添加任何的神话色彩,而是仅仅被赋予了一个世俗人王的称号格式"帝某"("帝某"与"某帝"两种格式在《大荒海内经》中是有明显区别

① 关于陈国与太皞氏的关系,详细考证参见本书第五篇。

的,"帝俊"、"帝尧"等等皆实有其人,而"某帝"则皆为神祇,详说见后),一个世俗情节"被埋葬"(神当然是不会死也无需埋葬的),以及一个世俗可考的实际埋葬地名"岳山"(即陶寺遗址附近的太岳霍山)。因此,事实证明,"帝喾"这位著名人物至少在甲骨文时代以前是被神话世界挡在门外的,他的原始身份是一位"死得其所"的真实国王,而不是一个"怪力乱神"的虚构人物。

"帝喾"为什么一定就是"尧"的族人而不是挚、契、弃等其他所谓"帝喾四 妃之子"的族人?因为,比《大戴礼记》更古老可靠的一手文献《山海经·大荒 海内经》和《左传》都告诉我们,"帝喾"的确切国籍和族属本就是尧舜之国、尧 舜之族,这一确定的时空属性决定了他和千里之外的东夷人"少皞帝挚"或者 千百年之后的"商王契"、"周王弃"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亲密的父子关系。— 方面,我们根据《左传》屡称"帝喾"为"高辛氏"可知,"帝喾(辛)"的国籍首先就 可以排除"先商"和"先周"这两种可能:因为"高"字古通"皋(皞)","高辛氏" 就是"皞辛氏",所以他不是属于"太皞氏=陈=有虞氏"就是属于"少皞氏",两 者必居其一;而另一方面,我们根据《大荒南经》原文"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 山"可知,"帝喾"一生的主要活动空间就是今山西省"岳山"(霍太山)附近的尧 舜之国,"帝喾"的族属血亲就是和其同葬一块墓地的帝尧、帝舜之族,由于没 有相反方面的记载,他属于东夷"少皞氏"成员的可能也可被排除。所以,在儒 家所谓的"帝喾四妃之子"中,只有"尧"才是他真正的同血脉子孙。此外,"干 支密码"还可告诉我们,"吳權(辛)=帝喾(辛)","帝喾"其实就是《山海经•海 内经》中的"虞權",他和诸多"有虞氏"王朝成员"伯陵"、"鼓延"、"殳"等都有亲 属关系(详说见后)。因此,通过与早于儒家的更多原始文献互相对比分析,现 在我们完全可以知道,儒家留给我们的各种自相矛盾的"帝喾"史料究竟孰真 孰伪:显然,孔子曰"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的说法无疑是绝对真实的(但 "高辛之子"应作广义理解为"高辛之子孙",实际上尧是"高辛之孙",详说见后 文),而皇甫谧曰"喾都亳(殷商都城之一),今河南偃师是"的说法则无疑是绝 对错误的,这完全是一个推理演绎自《大戴礼记》所谓"帝喾……次妃有娀氏之 女也……产(殷王)契"的以讹传讹之说。

因此,综合以上的初步分析,再加上后文还将举出的其他证据,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有虞氏"王朝原本就是一个中国最普通的"血统宗族制"王朝而非所谓的"禅让制"另类政权,比照夏、商、周等中国其他的古老王朝可知,他的王朝历史也是从一个"血统宗族制"的三位一体始祖结构开始的(表 4 - 10);

对于整个"有虞氏"部族来说,其集体始祖政权叫做"太皞氏";对于尧、舜的母系血统来说,其舅系始王是"太皞氏"的统治者"陈锋氏(伏羲氏)";而对于尧、舜的父系血统来说,其真正的父系始祖则叫做"帝喾(高辛氏)"。也就是说,《史记》所谓的"帝喾娶陈锋氏女"本应该广义地理解为"帝喾"是比"陈锋氏"小一辈的女婿辈亲属,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外甥,正如《山海经》之"帝俊生帝鸿"应该广义地理解为"舅舅抚育外甥"而不是狭义的"父亲生儿子"一样。总之,"陈锋氏"开创的王朝后来由其外甥或女婿"帝喾"继承,"帝喾"又生了嫡系子孙"帝尧",这才是"有虞氏"这个中国最古老王朝的真实可信之世系起源。

	甲骨文和古籍中的先商始祖	古籍中的有虞氏始祖	
集体始祖(族名)	有咸氏(有娀氏)	太皞氏(太昊氏)	
舅系始祖/始妣	帝咸夋(帝俊)/简狄女	太皞宓羲氏(陈锋氏)/陈锋氏女	
父系始祖	高祖河(玄王契)	帝喾(高辛氏)	

表 4-10 王朝始祖的三位一体结构: 先商始祖与有虞氏始祖之对比

(2) 虞幕考

按照《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在第一任国王"陈锋氏"和第二任国王"帝 喾(吳權)"之后,接下来统治"有虞氏"城邦的就是第三任国王"虞幕(伯陵)"。

关于"有虞氏"城邦在尧、舜之前还存在一位统治者"虞幕",中国史书的记载其实早有定论。例如,《国语》有云"虞幕能听协风······有虞氏报(祭)焉",就明确指出了"虞幕"是一位有功于世的"圣王",是一位享受着帝王规格之"报祭"的受祭先王,并且是一位拥有"有虞氏"王室纯正血统的先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例如,《左传》有云"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就更明确指出了"虞幕"不仅是一位所谓"无违命"即拥有"天命"王权在身的"有虞氏"最高统治者,而且是瞽叟、虞舜父子的直系先祖。显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虞幕"所拥有的"有虞氏"国籍和"有虞氏"王族血统之纯正无可争议性是连"虞舜"本人都比不上的(因为"虞舜"与"夷舜"是很容易混淆的)。当然,相比以上这些简约的史料,新近面世的战国简帛文献《上博楚竹书·容成氏》(见图4~3)对于在尧、舜之前还有"虞幕"称王一事无疑有着更直接而详细的描写①.

① 单育辰:《〈容成氏〉新编联及释文》,2008年。

(??)氏……以讓於有吳迥,有吳迥曰:'德速衰矣。'於是乎不賞不罰,不刑不殺,邦無饥人,道路無殤死者。上下貴賤,各得其(所)。四海之外寶,四海之內貞。禽獸朝,魚鼈獻。有吳迥匡天下之政十又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歿終……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被列在尧、舜二王之前率先"王天下"的古帝"有吳迵(有虞迵)"其实就是"虞幕":因为,"幕"訓帷幕篱落;而"迥"即"迥"之异体,训门扃、门障,两者作为人名都是代指地支第六位"大荒落=大障(巳)"。所以,"虞幕(巳)=有吴迥(巳)"成立。而据此记载来看,"虞幕"作为"王天下"数十年的"有虞氏"国王之身份无疑是更加清晰了。

不过,以上《左传》、《国语》、《容成氏》等文献或简帛虽然能够粗略地证明 "虞幕"的国别族属和王者身份,但却还并不能够进一步地详细证明"虞幕"究 竟是"有虞氏"王朝的第几位国王。而只有类似《史记·夏本纪》和《史记·殷 本纪》那样能够向我们提供"有虞氏"之连续世系名单的古文献,无疑才是破解 "虞幕"之谜的最关键证据。而十分幸运的是,"干支密码"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这样的可靠世系名单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它就被保留在了《山海经·海内经》 之中:

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殳……

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对于这段原本貌似无解的古老文字,现在 我们已是很容易解读了:

- ★ 所谓"伯陵",其实就是"幕"之别名,因为"陵"通棱(櫺)训門闌,幕训帷幕門障,"陵"与"幕"互训皆指地支第六位"南门(巳)";
- ★ 所谓"吳權",其实就是虞王"喾"之别名,因为"權"通"爟"训舉火照明, "喾(皓)"通"槁"训枯槁干柴,"爟"与"喾(槁)"互训皆指天干第八位"柴=昭阳(辛)";
- ★ 所谓"鼓延(廷)",其实就是"轎牛"之别名,因为"延"为"廷"之讹,"廷(霆)"训雷霆般之鼓声,"鼓廷"与"牛"互训皆指地支第八位"河鼓=牵牛(寅)";
 - ★ 所谓"殳",其实就是"伯夷(頤)"之别名,因为"吺(殳)"通"咮",据《尔

雅·释天》"咮謂之柳"可知, 鸟口之"吺"与大快朵頤之"頤"互训皆指地支第八位"咮=星鸟(未)"。

因此,就实质而言,这其实就是一段历史学家们 2 000 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真本"虞本纪"片段,它恰好能为我们复原出一段包括多达四代国王的"有虞氏"王朝之史实世系:原来,"虞幕"本来是"有虞氏"王朝的第三任国王,因为"虞幕=伯陵"是在"喾=吳權"死后按照"兄死妻其嫂"的世界性古老风俗收娶了其妻室"阿女緣婦"("緣"训因循继承,"緣婦"即"继妻"之意),并生下了儿子"伯夷=殳"和"蟜牛=鼓延",而这一行动本身就确切表明了"虞幕"的真实身份是"喾"的弟辈血亲(姨表弟或胞弟,即"兄死妻其嫂"特权的拥有者)兼妻室、财产和王位的直接继承者,他在"有虞氏"王朝世系中的位置只可能是排在第二任国王"帝喾"之后和"伯夷"、"蟜牛"、"瞽叟"、"尧"、"虞舜"等所有晚辈子孙之前,排名高居第三位。

(3) 轎牛、伯夷和四岳者

继"虞幕"之后,接下来统治"有虞氏"城邦的第四、第五任国王就是"虞幕 (伯陵)"的两个儿子"蟜牛(鼓延)"和"伯夷(殳)"了。

"有虞氏"的第四任国王为什么是"蟜牛"?因为,在《大戴礼记·五帝德》 中孔子曾明确告诉我们:

轎牛之孙,瞽叟之子也,曰重华(虞舜)……

而我们用这条史料与《左传》记载的"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相对比后自然就可以得出结论:既然"蟜牛"是"瞽叟"之父辈,即"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之系列中的一位成员,那他当然也是一位有"天命"在身的国王。当然,对此问题说得更清楚的则是《海内经》的"有虞氏世系":"伯陵(虞幕)生鼓延(蟜牛)","蟜牛"作为第三任国王"虞幕"的长子兼第一合法继承人,他自然是"有虞氏"的第四任国王。

"有虞氏"的第五任国王为什么是"伯夷"?因为,在和西周金文同样古老的《尚书·吕刑》中,周穆王早就以国家文告的形式正式通告我们:"乃命三后(伯夷、禹、后稷),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也就是说,"伯夷"这位上古著名人物的真实历史身份其实是一位"后"而非后儒们所谓的"尧臣",他是一位和"夏后禹"、"后稷"平级的无可争议之王者,是一位生杀大权在握的法典制

定者和颁布者(按在上古时代制定颁布法典乃是国王的特权,所以中国的"伯夷"就好比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Hammurabi]王或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姆[Ur-Nammu]王)。而作为"有虞氏"第四任国王"蟜牛(鼓延)"的亲弟弟兼"兄终弟及"父系王权制度下的合法继承人,"伯夷(殳)"担当的王当然也不会是别国的国王,他只能是前者的直接继任者即"有虞氏"的第五任国王。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伯夷"这个名号的前缀"伯"字所代表的特殊含义:即"伯"字对于排行"老二"的他来说只能被解释为"邦伯(国君)"而无法被解释为伯仲之"伯(老大哥)",那么我们对"伯夷"其人的君王身份就更不能有任何疑义了。

而事实上,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蟜牛"和 "伯夷"这对兄弟国王曾经统治过古冀州"有虞氏"王国的证据还远不止此。

例如,在《左传·昭公元年》的记载中,子产曾引用晋国本地(有虞氏故地)的史料和传说转告我们: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臺駘。臺駘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我们不难解读出这其实是前述《山海经》所载有虞氏世系片段的另一种版本:

- ★ 所谓"金天氏裔子昧",其实就是指"帝喾(高辛)",因为"昧"一本作 "晞",都训光照、燥柴即"昭阳(辛)",至于所谓的"金天氏"则是后人按照"西方 庚辛属金"之后出五行理论为"高辛氏"宗族所起的绰号;
- ★ 所谓"允格",其实就是指"蟜牛=鼓延(寅)",因为"允格"即得名于"摄 提格(寅)";
- ★ 所谓"臺駘",其实就是指"伯夷=殳(未)",因为"駘(tai)"通"斄(tai)", 臺、駘、斄(麳)诸字古音相通,本是指麳麥、莊稼,即"天厨=壮=协治(未)"。

因此,这一则宝贵的史料不仅再一次确认了《山海经·海内经》关于"吳權(金天氏昧)之妻阿女緣婦是生鼓延(允格)、殳(臺駘)"之王朝世系记载的真实无误性(此所谓"生"并非指"父生子"而是泛指"前辈生后辈"),并且还正式补充了作为帝喾(金天氏昧)后辈的蟜牛(允格)、伯夷(臺駘)这对兄弟国王所处的确切地理位置和族属信息,即他们都是曾经"封诸汾川"统治着整个"汾、洮"

流域和"大原"地区的土著国王,并且是千百年后仍被该地区居民(晋国人)引以为傲、视若神明(汾神)的人物。

又例如,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

殳始為侯(箭靶),鼓延是始為鍾、為樂風……

显然,这无疑表明了"殳(伯夷)"和"鼓延(蟜牛)"这对兄弟除了都是拥有 高贵血统的王族成员,而且还都是拥有"制作圣人"头衔的历史名人。而正如 前文屡述的,中国先秦古籍从来都是把"发明家"的头衔尽量归功于各种王者 名下的。因为,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模式中,任何人工"发明"的最关键要 素是"发明的时间和地点"而非"发明者"个人,而既然纪年特权和瓜分疆土的 特权都早已归于王者们的名下,那么任何"发明"自然也就只能都归于王老们 的名下了。所以,所谓"殳始為侯(伯夷在位年间虞国发明了靶侯),鼓延是始 為鍾(蟜牛在位年间虞国发明了青铜鍾)"①与其说是在称颂"殳(伯夷)"和"鼓 延(蟜牛)"的"发明家"身份,倒不如说是在暗示他们都是拥有"以王名纪年"特 权的王者。更何况,"侯(箭靶)"并不是什么普通的民用品,它是一种国家机器 训练甄选武士的军用装备;"乐风"所用的"鍾"(通鐘,指铃铎,图 4-3)更不是 什么普通的日用品,它是一种"礼乐治国"象征贵族等级制度的"礼器";"殳(伯 夷)"和"鼓延(蟜牛)"兄弟之所以能够被尊为神圣的"射礼"制度和"樂風"制度 之开创者,无疑表明了他们不仅是普通的君主更是一代名王的历史地位。很 显然,古文献屡屡羡称"伯夷主礼"与"鼓延是始為樂風",无疑正是对这两兄弟 统治下"有虞氏"王国礼乐隆盛的间接写照。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ssff",一个有实历兄弟的真实历史身份,那么我们对 "有虞氏"王朝的一项著名政治制度即所谓"四岳共治"制度的来龙去脉就可以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了。因为,正如《山海经·大荒海内经》所明确记载的,所谓 "四岳"并非如近代某些学者所猜测的是什么"民主选举"出来的部落长老,他 们本身其实就是"有虞氏"王朝的特权成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其实就是 "伯夷"等国王们的嫡系后裔和王室宗族势力的代表。例如,《山海经·海内

① 关于"鼓延是始為鍾(铃)"以及"伊耆氏(唐尧)之乐土鼓",核之陶寺遗址发现的实物陶鼓、鼍鼓、陶铃甚至铜铃,可证《山海经·大荒海内经》等文献记载之可靠性和古老性。参见《襄汾陶寺遗址研究》。

经》有云:

伯夷父生西岳 ……

显然,这条记载明确指出了"四岳"之一"西岳"的父辈确实就是著名的国 王"伯夷"。又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

有壽麻之國。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而据《路史》这段世系的异版文字又作:

嘻生季格,季格生帝魁 ……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这段世系记载也明确指出了"四岳"之一"南岳"与"蟜牛王"诸位子孙们之间的近亲关系,因为:

- ★ 所谓"女虔(嘻)",其实就是指舜祖"蟜牛(寅)"之妻,因为"虔"通掔(牽),"嘻(喜)"字甲骨文从鼓,训喜庆鼓乐,"虔"、"嘻"与"牛"一样都指地支第三位"牵牛=河鼓(寅)";
- ★ 所谓"季格",其实就是指舜父"瞽叟(寅)",因为这两个名字明显都是取自地支第三位"河鼓=摄提格(寅)";"允格(蟜牛)"与"季格(瞽叟)"父子无疑就像埃及法老 Pepi I、Pepi II 父子一样都是父子同名的国王;
- ★ 所谓"壽麻(魁)",其实就是指《史记》中的舜弟"象(巳)",因为"象"为 "罔象"、"象魏"之省称,"魁"通"魏"也为"象魏"之省称,都训古代建筑物之门 阙象魏,"壽麻"、"魁"和"象"这三个名字明显都是取自地支第 6 位"寿星—南门—大罔落(巳)";此外,所谓"壽麻正立無影,疾呼無響,爰有大暑,不可以往"的神话传说其实也是可以与《国语》所谓的"木石之怪曰蝄蜽、水之怪曰罔象"相呼应的,因为这两者都认为"象(壽麻)"这个著名恶人在死后其鬼魂变成了一个掌管"影子"(魍魉)和"暑旱"(罔象)的邪恶之神(也许他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暴晒而死的才会这么附会其事,待考)。

因此,既然"南岳氏"宗族的某位族长可以成为先王"蟜牛"之妻"女虔"的

继夫,就像"虞幕"可以成为先王"帝喾"之妻"阿女缘妇"的继夫一样,那么"南 岳氏"无疑是与"蟜牛"、"瞽叟(季格)"、"象(壽麻)"这几位国王或王子们是出 于同一亲属集团的,就像"虞幕"和"帝喾"是出于同一家族的一样。那么,"南 岳"究竟是出于"有虞氏"王室的哪一位国王之后呢?这我们只要看看记载"四 岳"历史最权威的文献《尚书·尧典》就可以知道了。因为,正如许多学者早就 指出过的,《尧典》中的"四岳"其实就是指该文开篇所提及"羲和"四族,即"羲 仲=东岳"、"羲叔=南岳"、"和仲=西岳"、"和叔=北岳"这四大宗族。他们真 正的身份大致就类似于后来的鲁国之"三垣"、郑国之"七穆"、鲜卑拓跋氏之 "八部大人"或后金政权的"八旗"等等,总之是一些源出王族而又摄政掌权的 世袭宗族势力。而据《尚书·尧典》列出的这些"四岳"族称,我们是不难通过 "干支密码"来找到其全部的来源的: 所谓和仲(西岳)、和叔(北岳),这两族的 名字明显是同出于"伯夷(未)"之干支"协洽调和(未)",所以这与《海内经》"伯 夷父生西岳"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所谓羲仲(东岳)、羲叔(南岳),这两族的名 字则明显是同出于"太皞伏羲氏(甲)"之干支"羲缝(甲)",所以这与《大荒西 经》"南岳娶女虔"的记载也是完全可以无缝连接的,因为"羲氏"与"和氏"两族 互相接收对方的寡妇王后为继妻这绝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因此,综合以上 分析,我们无疑已经完全可以指认,"有虞氏"王朝所谓的"四岳"其实都是王族 的分支后裔,其中"和氏"两支源出于"伯夷王",而"羲氏"两支则源出于"陈锋 王"并最终与"蟜牛王(女虔)"的势力相合并,他们在"尧舜时代"共同成为"有 虞氏"王朝的政权支柱,这就是"蟜牛"和"伯夷"两兄弟称王后带给整个"有虞 氏"王朝的最大政治遗产。事实上,"伯夷王"也正因为与"四岳"有莫大的关 系,所以才会被后世尊称为所谓"太岳"(见《说文》),即"四岳"始祖的总代表。

总之,通过以上种种文献证据的交织咬合,我们最终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蜗牛"和"伯夷"兄弟作为"虞幕"之后、"尧"之前的"有虞氏"第四、第五任国王之地位是完全可以确认的。至于后世的《国语》等文献之所以会把"伯夷"这位虞族国王说成是一位共工血统的大臣,并把其活动的时代说成是帝尧之后而非帝尧之前,其实只不过是把"伯夷"与他的后裔"伯夷氏(即和氏两族之总名)"之活动混淆了,因为"伯夷氏"一名到了尧、舜时代早就演变成了"和氏"的族号而不再是个人的名字了,就像后来楚国的"若敖"、鲁国的"季孙氏"都可以从人名演变成族名一样。而"和氏"家族(和仲、和叔)作为帝尧称王的两大支柱之一,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其一定参加了著名的"尧伐共工"战役(事见于《逸

周书》、出土汉简《孙膑兵法》等),并在战后"流共工于幽州"(《尧典》)而占领了该国,成了"共工国"新的世袭君主,而其后裔则变成了《国语》所谓的"共工之从孙四岳"(共工新国君的子孙兼四岳后裔)。显然,"伯夷"是一位帝尧之前的国王,而"伯夷氏"的族长们则是帝尧之后的大臣;"伯夷"是一位有虞氏本土的国王,而"伯夷氏"的族长们则是有虞氏血统的"共工国"列代殖民国君,这两者原不矛盾,都属史实。(羲氏、和氏又称阏伯、实沈,见表 4-11。)

(4) 尧舜禅让考

继"太岳伯夷"之后,接下来统治"有虞氏"城邦的第六、第七、第八任国王就是"伯夷"之侄"瞽叟"以及著名的"唐尧"和"虞舜"了。

"有虞氏"的第六任国王为什么是"瞽叟"?因为对"瞽叟"其人之身世记载最具权威性的《左传》早就明确告诉我们:"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也就是说,"瞽瞍"其实并不是像后儒孔安国等人臆测的那样是个天生的"微贱庶人",而是正如《左传·正义》所分析注解的那样曾经是个有"天命"在身、有"国土"在手的国王,就像乃祖"虞幕"的"无违天命"一样。何况"瞽叟"作为合法的继承人之一,他继乃父"蝺牛"和乃叔"伯夷"之后成为"有虞氏"的第六任国王,也是父系王朝世袭制度下可以想见的正常程序。此外,根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另一段"太皞有虞氏"之关键世系表述:

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

我们也能很容易推想出"瞽叟"的真正身份应该更可能是一位国王。因为,根据"干支密码"可知:

- ★ 所谓"咸鳥",其实就是指"伯夷(未)",因为"咸"通啗(喊),训贪吃頤养,"咸鳥"与"夷(頤)"一样明显都是代指地支第八位"咮=鷃(未)";
- ★ 所谓"乘釐",其实就是指"瞽叟(寅)",因为"乘"为"秉"之形讹,"釐(xi)"古通"僖",训喜慶鼓樂,"秉釐"与"瞽(鼓)"一样明显都是指地支第三位"秉=河鼓(寅)"。

所以,有鉴于前面我们已经分析出"瞽叟"并非"伯夷"之亲生儿子而仅是侄子,那么我们对这句"咸鳥生乘釐"最好的解释也许就是:"乘釐(瞽叟)"其实是紧随"咸鳥(伯夷)"之后的下一任国王,他自称是前任国王"咸鳥(伯夷)"的"犹子"或"继子",并想借此获得更多的政治合法性。

不过,无风不起浪,虽然"瞽叟"的本来身份确实很可能是位国王,但《尚书·尧典》通过"有鳏在下曰虞舜"等描写所暗示的"虞舜"出生后其父"瞽叟"一度"侧微"的说法也并非全是无据之言,因为"国王"和"庶人"这两种身份对于"瞽叟"这样一位生活在真实历史中的复杂人物来说其实是并不矛盾的:他完全可以是一位前半生做国王、后半生做平民的戏剧性历史人物。更何况,关于"瞽叟"从"国王"变成"庶人"的具体前因后果,我们其实还有更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有云:

帝挚(喜)立不善,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也就是说,虽然是身为"帝喾"的子孙,但历史上的"尧"其实并不是以合法 继承人的身份登上王位的,他是以前任某位国王道德"不善"为借口发动宫廷 政变而篡位的。只不过,正如前文分析的,这位历史口碑"不善"且唐尧身为其 "弟"的国王应该并不是东夷国王"少皞挚",而是某位"有虞氏"国王。事实上, 考虑到"挚"与"喜"不过是一音之转,我们理应推断,此"帝挚"当为"帝喜(釐)" 之讹,也即"乘鳌=瞽叟"。因为,一方面,"少皞挚"在中国其他文献记载中从 无任何"不善"的口碑或实迹,而"瞽叟"则是"先夏时代"中国的头号著名大恶 人,其"不善"口碑绝不输桀、纣:据《尚书·尧典》所谓"(虞舜)父顽、母嚚、象 傲"云云可知,"瞽叟"不仅本人又瞎又毒连亲生孝子都要追杀,而且还教唆出 了一个帮凶儿子"象"和一个帮凶老婆。当然,考虑到中国古代的"成王败寇" 道德评价体系,以上这些儒家文献津津乐道的"不善"也许并非史实,但"瞽叟" 至少有一项"不善"之举是完全可以坐实的,那就是其在"伯夷"死后"以侄继 叔"称王的缺乏合法性,毕竟,这绝不像"以子继父"那样是无话可说之举。而 另一方面,相比"少皞挚"远比"尧"的辈分高(即使按儒家旧说"少皞是黄帝之 子"也是如此),"瞽叟=帝喜"与"尧"本为平辈可称兄道弟也是史有明载的 (《史记》称"尧乃以二女妻舜",可见"尧"比"舜"高一辈而与"瞽叟"平辈),而这 也同样可证,此拥有"弟放勋"的"帝挚"本为"帝喜"之讹。而一旦我们明白了 《史记》所引之古文原当作"帝喜立不善,弟放勋立",那么我们就更能理解这场 政变的历史背景了。很显然,正是由于"瞽叟=帝喜"曾是一位"以侄继叔"的 国王,所以他才最终得罪了"伯夷"的嫡系继承势力"西岳和仲"和"北岳和叔", 引发了"不善"的口碑。而此"不善"也给了"尧"的支持者"东岳羲仲"、"南岳羲

叔"以反对自己的口实,最终在"四岳"一边倒不支持的情况下,"尧"这个"帝僖"之 "弟(堂弟或表弟)"便顺利地实现了"不流血政变",将"瞽叟"赶下了国王宝座。

因此,以上种种证据都表明,"瞽叟"确实应该是一位排列在伯夷之后、尧之前的"有虞氏"第六任国王,但也确实是一位最终被"帝尧"废为"庶人"并贬为"恶人"的短命倒霉国王。至于他为什么会被"尧"而不是被别人废黜下台,又为什么能在下台后仍然保留了自己儿子"虞舜"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这就要从接下来的两位国王"唐尧"和"虞舜"所身处的所谓"禅让制"历史背景之真伪性说起了(图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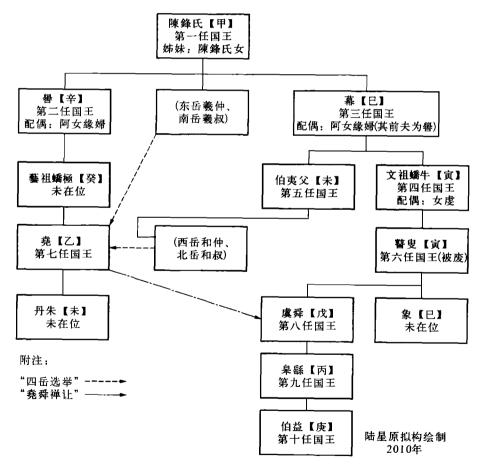


图 4-4 有虞氏王朝世系全图(西元前 24—前 22 世纪)

"有虞氏"的第七任国王为什么是"唐尧"?因为"干支密码"最终告诉我

们,《史记》等所谓"尧"的国籍是"陶唐氏"的说法完全是出于以讹传讹,"陶唐"原来不过是"尧"个人的另一个私名罢了,先商时代的中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唐国","尧"真正的国籍就是"有虞氏"。"陶唐"为什么就是"尧一放勳"的别名?因为"陶(yoo)"通"尧","唐"通"汤(荡)","陶唐"其实就是古成语"摇荡"、"倜傥",训摇举放荡、突出。而再据《禮·月令·註》"蕩,謂物動萌芽也"可知,"汤(荡)"本训萌芽,"尧(翘)"训尖端上翘,"放"通"荒(芒)","勳"古音通"元",训端首元始,四者作为人名都是代指天干第二位"端萌(乙)"。故"陶唐(乙)—尧(乙)—放勳(乙)"成立,就像甲骨卜辞中的"唐—天乙"都是商汤之等价名号一样。

所以,追根溯源,"陶唐氏"在先商时代根本不是什么国号而仅是一个私名兼宗族名,"唐尧"也并非什么"唐国人"而是一个古冀州"虞国人"。事实上,正如《左传》引述的《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所暗示的那样,"唐尧"的王权和江山并非是他本人赤手空拳打下来的,而是他凭着自己拥有的"有虞氏"王室血统"帅(因循)"来的、继承来的。至于《尚书•尧典》则更直白:"(尧、舜)类于上帝,禋于六宗",可见,尧的确不是什么开国之君,因为他的前任已有"六宗"之多。那么,"唐尧"所继承的血统衣钵或曰"天常(天命王权)",具体究竟是继承的哪位"有虞氏"先王呢?这我们只要继续看看《尚书•尧典》这份关于"唐尧"事迹的权威文献就可以知道了:

正月上日,(尧、舜)受终于文祖……

归,(尧、舜)格于藝祖,用特……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很显然,《尧典》中的这几处关键记载,清楚无疑地表明了唐尧、虞舜两王真正的权力基础是源自"文祖"和"藝祖"这两位明确被冠以"祖"字的受祭先祖,而非源自后世注解者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四岳选举"和"禅让制度"。因此,假如我们要想破解"尧舜禅让"以及"唐尧身世"这两个千古之谜,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破解"文祖"与"藝祖"之谜、"六宗"之谜。而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这个谜团的破解线索无疑是可以找到的。

首先,从中国人祭祀祖先的文化惯例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推知,"文祖"和"藝祖"这两位受祭先祖假如不是"有虞氏"王朝的开国始祖,那就必定是唐尧、虞舜两王的"亲亲近祖"(首选指父亲,父未亡则指祖父),因为始祖最大而近祖最亲,这两类鬼魂都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最重要祭祀对象。而在"尧舜禅让"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背景下,我们也很难想象除了这两类祖先,还有谁能配得上享用此国典重祀。

其次,根据"干支密码",我们知道"有虞氏"王朝的三位开国始祖其名号干支分别为"甲(陈锋氏)"、"辛(喾)"、"巳(幕)"(参见图 4-4),而这些显然与"文祖"及"藝祖"之名没有任何可以对得上的关系。因此,我们进一步可以用排除法推知,我们寻找"文祖"和"藝祖"的范围现在可以排除远祖一类而缩小到"尧、舜之亲亲近祖"。也就是说,在"文祖"和"藝祖"这两人中,其必有一人为虞舜的"亲亲近祖",也必有一人为唐尧的"亲亲近祖"。

再次,由于熟知的史实,即《史记》等文献明确记载舜父"瞽叟"其人在虞舜登基时根本就未死("舜之践天子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所以虞舜登基时所祭祀的"亲亲近祖"应该是其"生身之祖父"而非"生身之父"。而虞舜的生身祖父无疑是已知的,他就是"蟜牛"。显然,根据"干支密码","蟜牛(寅)"无疑应该就是虞舜两次在新年第一天就隆重祭祀的先王"文祖"。因为"文"古通"鼖"训"河鼓(寅)",而"蟜牛"从其妻名"女虔"可知又可称"虔",故"文祖(寅)=虔(寅)=蟜牛(寅)"成立。而既然"文(虔)祖"已可被确认为虞舜按照"亲亲"原则首选的祭祀对象,那么通过排除法我们最后也就可以确认,剩下的"藝祖"一名应该就是指"禅让"事件的另一主角唐尧的"亲亲近祖",或者更准确地说,"藝祖"就是"唐尧之父"(考虑到以长寿著称的唐尧"禅让"退位时已经年老,其父已成亡魂是必然的)。

最后,既然"唐尧之父"名叫"藝",而根据《国语·晋语·注》"藝,極也"可知,"藝"之本义训"極",干支也属"極(癸)",那么我们就能由此找出"唐尧"其人那神秘的身世来源了。因为,一方面,正如前述,《帝系》等文献已经告诉我们"帝喾产放勋",而此"某产某"格式无疑保留了中国一手文献的行文风格,据《山海经》等实例可知当解释为广义的"前辈产後辈";而另一方面,既然唐尧已经有了一个干支属"癸"的父亲"藝祖",那么由此可知"喾"这个干支属"辛"者必非其父"藝祖"之同一人,而是至少要再高一辈,而通过对比图 4-4 所列"有虞氏"王朝的年代和辈分关系,以及考虑到虞舜的辈分小尧一辈为其"女婿"的

旧说,我们把"喾"定为"尧"之祖父、"藝祖"之父无疑是最为合理的。而事实上,关于尧的父系血统是出于属"辛"和属"癸"的两位先祖,我们还可以从另一种文献来源获得独立的证实,那就是《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孔子整理的唐尧身世。只不过,《五帝德》版本把"辛"、"癸"两人的辈分完全颠倒了:"蟜極(癸)之子也曰高辛……高辛(辛)之子也曰放勋"(很明显,孔子们所见的一手文献应该与我们是类似的,那就是"高辛产尧"和"蟜極产尧"这两种原始格式的世系信息,但孔子们要排的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大一统"谱系,所以其结论只能是父子颠倒了,详说见后文)。但不管如何,我们由此又可得知,唐尧之父"藝祖(癸)"在先秦古文献中又有别名叫"蟜極(癸)",因为,根据"干支密码","蟜"训"蠆"(实例有《左传》郑子蟜名蠆),即指蠆尾、尾端终極之意,"蟜"、"極"、"藝"三字作为人名都是代指天干第十位"極(癸)","藝祖(癸)二蟜極(癸)"成立。(而很显然,正是由于"藝祖(蟜極)"和"文祖(蟜牛)"两人常常被古文献并列共称为"蟜、牛",所以才会导致后来舜的祖父"蟜牛"之名也被误冠以"蟜"字。)至此,"六宗"之谜(锋、喾、幕、牛、夷、極)全部破解。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最后可得的结论就是,正如《尚书》和《上博楚竹书·容成氏》等文献都把《尧典》列入《虞书》、把"唐尧"列入"虞代"所暗示的那样,"尧"本来确是一位拥有"有虞氏"王室血统的国王,而非什么子虚乌有的"陶唐国之王"。虽然唐尧的父亲"藝祖(蟜極)"只是一位在野的王子,但他的祖父却是该王朝的开国之王"帝喾"。而很显然,正是这种"开国太祖嫡孙"的显赫血统,才是他赖以登基称王的最大资本,因为相比被他废黜的"以侄继叔"者"瞽叟",尧的血统高贵性和政治合法性一点也不输给对手:从父系上说,他是"帝喾"之嫡孙无疑意味着他就是"羲氏"宗族之近亲后裔;从母系上说他是"虞幕(伯陵)"之妻"阿女緣婦"的嫡孙无疑意味着他也可算作是"和氏"宗族之近亲后裔,可谓是左右逢源。因此,相比"瞽叟"那即得罪了"和氏"又无缘于"羲氏"的尴尬血统来说,"尧"的血统无疑即可获得"羲氏"两族的无条件支持也有收买拉拢"和氏"两族的套近乎资本,这早已在暗中决定了他必将出任"有虞氏"第七任国王的命运。

"有虞氏"的第八任国王为什么是"虞舜"?本来,通过上文的系列分析,这个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无须回答了,因为"虞舜"的高贵血统本身就表明了其之所以能成为"有虞氏"第八任国王的充足理由,按照前述证据,他是"有虞氏"第三任国王"虞幕(已)"的曾孙子、第四任国王"文祖蟠牛(寅)"的孙子、第六任国

王"瞽叟(寅)"的儿子,因为比第七任国王"唐尧"的身世更加显赫更加合法,所以他最终替父亲"瞽叟"夺回了王位,成为"有虞氏"的第八任国王。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年代久远书缺有间,"虞舜"其人的历史本来就常常容易被与"夷舜"相混淆而陷入争议,再加上《大戴礼记·帝系》居然还把这种混淆的结果写成了一份煞有介事的拼凑伪造版"虞舜家谱"即所谓"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云云,所以我们还是有必要在此对"虞舜"的身世作进一步的澄清的。

"虞舜"、"瞽叟"、"蝺牛"这祖孙三代的血统为什么与穷蝉、敬康、句芒等这些所谓的东夷"颛顼後裔"都没有事实上的关系?因为,"干支密码"早就告诉我们,穷蝉(卯)、敬康(庚)、句芒(即"勾尨",属"亥")这些人物的名号干支都与"虞幕(已)"无关,而"虞幕(已)"则是《山海经》、《左传》、《国语》、《容成氏》等可靠史料一致确证了的"虞舜"祖孙之真正直系始祖。至于《帝系》所谓的穷蝉、敬康、句芒等几世名单,我们则完全可以从其他各种文献中找到其歪曲拼凑的来源:颛顼产穷蝉,本是来源于对《左传》中东夷传说"少皞氏有不才子穷奇"的歪曲误读,显然,高阳氏(颛顼)与青阳氏(少皞氏)、穷蝉与穷奇都不过是一字之差;颛顼接着依次生敬康(即苟康=后康=后庸=祝融之误)、句尨(即后土句龍之误,《左传》称"句龍为后土")两世并被最终牵强连接到"蟜牛"身上,则是来源于对《山海经》的神话谱系"颛顼……生祝融(敬康)"、"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句龙)、后土生噎鳴(蟜牛)"之歪曲误读。

当然,真正导致这份拼凑版"虞舜家谱"能够盛行于世的原因,则是周代分封的周王女婿兼"虞舜後裔"妫姓陈国之特殊祭祀风俗。正如后文将论及的,在妫姓陈国的祭祀名单上,既包括了"虞胡公"的父系祖先,也包括了周王室公主"太姬"的母系祖先,此外还包括了本地土著居民的各路祖先与神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颛顼"①。而正是这份堪称"淫祀"的祭祀名单,最终导致了拼凑版"虞舜族谱"的炮制出炉,并让儒家得以有材料编造"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虞舜"是依靠选贤任能的"禅让制"称王的等等一系列新故事。不过,幸好还有"干支密码"和《山海经》等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并非史实,虞舜根本不是儒家所谓的"异姓禅让制"之下白手起家的"有虞氏"第一任国王,而仅是"同宗世袭制"下的"有虞氏"第八任国王。

① 详见本书第五篇。

因此,综合以上我们对"瞽叟"、"唐尧"和"虞舜"这三位"尧舜禅让"故事的主角(图 4 - 4)所作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最后结论:

其一,虽然今本《尚书》、《史记》详加记载的"尧舜禅让"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确有其事,但是,这种"禅让"的实质并非如儒家学者所吹捧的是一种"任人唯贤"观念主导下的"异姓禅让(外禅)",而仅仅是一种"任人唯亲"观念主导下的"同宗禅让(内禅)"。也就是说,"尧舜内禅"其实是"家族世袭"的一种特殊实现方式,它和后世商王朝的"兄终弟及"或周王朝的"父死子继"并无本质的不同。

其二,就整部"有虞氏"历史而言,虽然"禅让事件"真实存在,但所谓的"禅 让制度"却并非真实存在。事实上,"尧舜内禅"完全是一项临时的政治安排而 非一项固定的政治制度:"唐尧"之所以没有把王位直接传给其亲生儿子"丹 朱"而"禅让"给了"虞舜",完全是因为这是他上台前与"和仲"、"和叔"两族达 成的临时政治交易所规定的。也就是说,由于"唐尧"夺取"瞽叟(帝僖)"的王 位本身就是一个超越固定制度之外的政治阴谋,它必然是以某项非固定制度 的临时政治安排为基础的,而各种文献记载告诉我们,这项临时政治安排就是 "唐尧"其实是以"不善"和"顽嚚"为名义废黜"瞽叟",并以"瞽叟"的未成年儿 子即下一代合法继承人的临时代理监护人名义登上王位的,因为他本人除此 之外找不到更好的合法称王之理由。所以,根据这种政治安排,"虞舜"一旦成 年并且没有"不善"和"顽嚚"之口碑,他就自然成了"尧"的第一合法继任者,而 "尧"的儿子"丹朱"倒反而不是合法的第一继承人。因此,对于所谓的"尧舜禅 让"故事,我们与其说是"尧让位于舜"倒不如说是"尧还位于舜"更贴切一些。 至于《史记•五帝本纪》等所谓的"舜"因为出生地位"侧微"没有合法继承权而 在"尧"死之后先"让丹朱"的说法则明显是儒家主观臆测之辞,是完全与最基 本的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假如我们用"干支密码"去重 新解读历史文献,我们将发现不仅"舜让丹朱"没有可能发生过,其他诸如儒家 所谓的"舜让禹"、"禹让商均"、"禹让皋陶"、"禹让伯益"、"伯益让启"等等著名 的"禅让"故事也一概没有可能发生过,"尧舜禅让"在中国先商历史上绝对仅 能代表一宗临时例外事件而非一项固定制度。

其三,就具体的历史过程来说,"尧舜禅让"虽然看似受到"唐尧"本人的口头认可,但却明显并非出于"唐尧"本人的内心意愿。也就是说,"唐尧"的让位于"虞舜"其实完全是被迫的而非主动的,他真正的愿望其实还是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丹朱"继位。因为,正如前文所述,"尧"作为国王的权力其实十分有

限,由于"做贼心虚"他上台伊始就通过政治交易把半壁权力出卖给了"和仲"、 "和叔",设立了所谓的"四岳咨政"制度。而在"四岳"尤其是"西岳和仲"和"北 岳和叔"的强大实力反对下,"尧"虽然费尽心机,多次想把王位传给儿子"丹 朱"也终未成功: 例如,据《尚书・尧典》记载,当"四岳"按照宗法制度有理有 据地提出让"虞舜"提早出任"尧"的共治者以利将来顺利继承王位时,"尧"虽 然用"我其试哉"的托词来暗示其试图用试出"不善"的办法再次剥夺"虞舜"的 继承权,就像他本人曾用"不善"的罪名篡夺"瞽叟"的王位一样,但却明显没有 实力一口回绝四岳的提议;又例如,当"尧"最终憋不住想把儿子"丹朱"推荐给 "四岳"出任继承人时,也曾玩过父子共唱双簧逼迫群臣表态的政治把戏,即 《尚书·尧典》记载的"放齊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之一幕 "毛遂自荐"加上"孔融让梨"的政治把戏。(按《尧典》所谓"放齊"其实就是"放 勳之子齊",即"丹朱"的别名,因为"齊"训协洽、调味劑,"丹"通鴅训鸟,"朱"通 咮,作为人名都代指地支第八位"协治=咮柳=鹑火=未"。所以"放齊曰'胤 子朱启明'"就是"丹朱"自己说自己很"开明"。)由此可见,《韩非子》所谓的"舜 逼尧"本来绝非是法家一家的偏见,而是完全可以从儒家本身的记载中也得到 印证的史实。

总而言之,"干支密码"给我们还原出的历史信息表明,"尧舜禅让"其实是"有虞氏"王朝特定政治格局下的特定历史产物:事实上,"有虞氏"王朝在"虞舜"时代之前,长期都由同宗的两大势力轮流执政,一支是"羲氏"诸族支持的"伏羲"、"喾"和"尧",他们分别出任了第一、第二、第七任国王;另一支则是"和氏"诸族支持的"虞幕"、"蟜牛"、"伯夷"、"瞽叟"、"虞舜",他们分别出任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八任国王,而"尧舜禅让"正是这两大势力最后达成政治妥协和实力平衡的产物。而这种"禅让"产物除了能代表着一个早期王朝所通常会遇到的幼稚不稳定性问题之外,并不能代表中国社会在"家天下"的王朝政治之前还存在过一个所谓"公天下"的"禅让制时代"。这就是"尧舜禅让"表面故事背后的深刻历史背景。

(5) 有虞氏末代国王考

继"尧"、"舜"之后,接下来统治"有虞氏"城邦的第九、第十任国王,即最后两位国王,就是"皋陶"和"伯益"了。

"有虞氏"的第九任国王为什么是"皋陶"?因为《山海经·大荒南经》早已明确告诉我们:

帝舜生無淫。

"淫"通"瑶(繇)"(说见《山海经·郭璞注》),"淫"与"皋繇(陶)"作为人名都是指代天干第三位"繇兆(丙)"。可见,"無淫(丙)=皋陶(丙)"成立,"皋陶"就是"無淫"即"帝舜"之子。况且,"無"音通"吴(虞)","皋"即"皞","無淫=虞淫"显然与"皋陶=太皞繇"一样都是带国族称号的复合型王名,都明确指出了"皋陶(無淫)"的国别属于"太皞氏(有虞氏)",其父"舜"当然也是指"有虞氏"的"虞舜"而非"夷舜"。因此,"皋陶"作为"有虞氏"第八任国王"虞舜"之子兼合法的第一继承人,其能出任"有虞氏"的第九任国王自然是当仁不让(后儒因"苍梧葬舜与叔均"称"商均=苍均"为舜子显伪)。

其实,关于"皋陶"其人的最终身份本是一位帝王而非臣子(当然任何帝王在登基前都做过臣子,皋陶也不例外),在中国各种文献记载中历来都是无人质疑的:《史记》引《汤诰》云"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就明确指出了"皋陶"是和"禹"拥有同等身份级别的王者;而《史记》等史料记载的"皋陶卒"未来得及登"天子位"云云之"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儒家故事更是径直称"皋陶"的职位为"天子",只不过由于要附会拼凑所谓的"禹让皋陶"之圣王禅让故事,这些儒家系统的史料才在形式上把"皋陶"这个有虞氏王朝的"实权天子"改写成了先夏王朝的"替补天子"罢了。所以,对于"無淫—皋陶"的最终考证而言,我们现在仅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帝王世纪》等后出著作所谓的"皋陶生于曲阜"乃是东夷人之说究竟是真是假。

"皋陶"真的是一个东夷人吗?毫无疑问,在汉代以前,所有的中国文献都无此种看法。相反,按照《尚书·皋陶谟》的权威记载,"皋陶"的国籍族属本属今山西省的"有虞氏"是明确无误的,这我们完全可以从"皋陶"的事迹只和古冀州"虞舜"之后裔或诸臣打交道、"皋陶"的终身供职之地都是虞舜之国等方面看出来。那么,汉代以后为什么会有"皋陶生于曲阜"的新说法出现呢?追根溯源,这还得要归咎于《左传》中的一段著名记载被误读后所造成的混乱。据《左传·文公五年》有云:

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

显然,后人由于不明偃姓的六、蓼两国君主乃是外来移民,于是误以为"皋

陶"这个"六国"的祖先乃是本地淮夷人,并且还把皋陶、庭坚这两位古人混淆合并成了一人;又由于不明偃姓乃是周王室的"赐姓"而非什么"古姓",于是又把偃姓的源头比附成所谓"偃(奄)"地即"少皞之墟(曲阜)"。然而,"干支密码"却可以告诉我们,以上的这些比附可谓是错到家了。事实上,六、蓼两国君主本来并非是淮夷土著,他们是周王室分封的来自汾水流域的外族,都是"有虞氏"诸王的后裔,其中"六国"(今安徽六安)为"有虞氏"第九王"皋陶=無淫(丙)"之后,"蓼国"(今河南固始)为"有虞氏"第四王"庭坚=鼓廷=蟜牛(寅)"之后。而事实上,周王朝在淮河流域分封的"有虞氏"诸王后裔还远不止此,例如,妫姓"陈国"(今河南淮阳)为"有虞氏"第八王"虞舜之後"、姜姓"许国"(今河南许昌)为"有虞氏"第五王"伯夷之後"、鲁县范氏宗族为"有虞氏"第七王"陶唐之後"等等。总之,考虑到周王室用其近邻姻亲今山西省的"有虞氏"诸王后裔镇守南疆乃是一项"基本国策",《左传》的记载不但不能证明"皋陶"是今山东省或安徽省的"夷人",反而进一步证明了"皋陶"本来就是今山西省的"有虞氏"王族。

因此,综合各种早期文献对"皋陶"其人所拥有的古冀州有虞氏国籍、帝舜血统、圣王身份等记载来看,"皋陶"绝对就是继"虞舜"之后的"有虞氏"第九任国王"無淫"之同一人。不仅如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还告诉我们,"皋陶(無淫)"其实还是"有虞氏"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在他的统治下,"有虞氏"城邦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都达到了巅峰状态。例如,据《帝系》记载"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可见"皋陶"的法制治国是卓有成效的,所以后世的中国人都奉"皋陶"为司法之神,并将其列为所谓的"上古四圣(尧、舜、皋陶、禹)"之一;又例如,据《大荒南经》记载,"帝舜生無淫,降载處,是謂巫载民……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穑,食也",可见"皋陶(無淫)"治理下的"有虞氏"城邦由于盐矿资源丰富、商业交通发达而可以在某种意义上"不劳而获",在后世人的眼中简直就是一个"乐土王国"或"极乐世界";而碳14测年和层位分析表明,考古学发现的陶寺遗址Ⅱ期那座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宏伟大城(图4-3)也很有可能就是在"皋陶"统治时代(约西元前22世纪)最终扩建完成的(其建造过程当跨越尧、舜、皋陶三世)。

"有虞氏"的第十任国王为什么是"伯益"?因为《史记·正义》等资料对此曾有明确的记载:"皋陶之子伯益",既然"皋陶"是"有虞氏"的第九任国王,那么在"父死子继"制度下其儿子"伯益"自然就是"有虞氏"的第十任国王了。当

然,关于"伯益"的身份曾经是一位国王,我们最早是从其王位被别人夺走的记载中得知的:《楚辞·天问》有云"启代益作后",可见,"伯益"不但是"有虞氏"的第十任国王,而且是最后一任"末代国王","有虞氏"的国土和"天命"正是在他的统治下被"夏后启"等外敌人侵者夺走的。

当然,关于"伯益"的真正族别国籍是属于"有虞氏"而非《国语·韦昭注》 所谓的是属于东夷"少皞之後",我们不仅可以举出前文已经证明了的"伯益 (庚) ≠伯翳(午)"之隐秘证据,还可以有更明显直接的证据,那就是《左传·昭 公三年》提供的另一段"有虞氏世系名单":

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

而根据"干支密码"可知:

- ★ 所谓"直柄",其实就是指"蟜牛(寅)"或者"瞽叟(寅)",因为"直"为"聽"之讹脱,"柄"通"秉",作为人名明显是代指地支第三位"秉=監聽=河鼓(寅)";而考虑到《左传》中"虞遂"每与"瞽叟"同时并提之文例(也许因为他们都是退位之王),例如《左传·昭公八年》就有"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置德于遂"之说,且《山海经》中"瞽叟"正作"秉釐(柄喜)",我们不妨暂定"直柄(寅)=瞽叟(寅)"。
- ★ 所谓"虞遂",其实就是指"伯益(庚)",因为"遂(隧)"古通"兑(税)",训 隧穴、库窒、税收倉藏,作为人名明显是代指天干第七位"窒=倉黄(庚)"。
- ★ 所谓"伯戲",其实就是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提及的胡公满的近祖、先周王朝的陶正"虞阏父(甲)"(约西元前 12—前 11 世纪),因为"戲"古通"罅",训罅缝,作为人名明显是代指天干第一位"阏逢(甲)"。

因此,"虞遂(庚)=伯益(庚)"成立,"伯益"的真正身份就是"有虞氏"王朝的第十任国王"虞遂",而不是东夷"有穷氏"的第二任国王"伯翳"。他和"直柄=瞽叟(寅)"、"伯戲=虞阏父(甲)"一样,都是虞胡公的直系祖先。至于这位末代国王的历史政绩,我们现在也可以有所推知,例如《世本》所谓的"化益作井"明显是信而有征的,因为陶寺城址内现已发现了大量深度达十余米且带有木构护栏的水井,足可印证史载;而《尚书》所谓的"益主虞、山泽辟"则是很可疑的情节,也许那是误把"虞益"的国号"虞"当作周代官号"虞(掌管山泽)"解释后敷衍而来的故事。

总之,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正如"有虞氏"的最初八王都是出于"虞舜"的同族近亲一样,"有虞氏"的最后二任国王"皋陶"和"伯益"其实也都是"虞舜"的纯正后裔,而且是完全符合后世"父死子继"宗法制度的嫡系子孙。显然,在经历了所谓"尧舜禅让"政治闹剧的最终阵痛后,"有虞氏"王朝在接下来的虞舜、皋陶、伯益这三王统治时代已经完全摆脱了舅系观念的残余影响,正式确立了父系王朝观念的绝对权威。不过,由于"尧舜禅让"和"四岳共治"等内讧毕竟严重损害了"有虞氏"城邦的国力,所以,在西元前 2100 年左右,当外敌夏王启的军队逼近国门之时,"有虞氏"早已经是个外强中干的病人了。正如《逸周书》所明确记载的:"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到了"伯益"在位的年代,有虞氏国君其实早已成了"四岳"等臣属手中的傀儡,他只能"娱于乐"而无法"争于权",而"四岳"等的"争于权"则最终导致了"民尽于刑",古老的"有虞氏"王朝终于在内外双重敌人的联合攻击下灭亡了,从此变成了他人的臣属附庸。

(6) 有虞氏的年代学框架

既然,以上我们对"有虞氏"的七世十王之间的血缘世次关系都已考证完毕,他们确实都是互为近亲的同一王朝之史实人物,那么我们据此就可还原出一份真正的"虞本纪"和"有虞氏世系"以补司马迁父子所谓"书阙有间"的千古遗憾了。以甲骨文中的"高祖婴"和古籍中的"夏后启"大致都可上溯到西元前2100年为基础数据,并将"有虞氏"王朝的总积年估算为7×30=210年,则"有虞氏"王朝的绝对年代应该在西元前2300—前2100年左右。显然,这与前述"陶寺遗址"的考古学测年是基本吻合的。而"有虞氏"王朝在被"夏后启"征服前的完整世系则可列表如下(表4-11):

	王名	干支	与前任关系	王名简释	资料证例	
1	陳 鋒 氏 (宓 養 氏 、 養 氏 、 阙 伯 、 太 皞)	於逢(甲)	有虞氏的前身 "太治者,十干者, 我治者,十一者, 我们, 我们的氏、 我们的氏、 我们的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锋通缝; 宓通處、 庫、罅,训罅隙; 截 一作戲,通虖、罅, 训缝隙	《史记》《尚 书》《大戴 礼记》	

表 4~11 有虞氏王名干支与世系 西元前 24—前 22 世纪

(续表)

					(次本)
	王名	干支	与前任关系	王名简释	资料证例
2	譽(高辛氏、 吳權、昧、晞)	柴、昭 阳 (辛)	甥或婿,有虞氏 政权建立者,堯 之祖父、藝祖 (蟜極)之父	譽通晧、槁,训柴; 權通權,训權火、 火照;昧、晞训昭 明、燥柴	《史记》《山海经》《左传》
3	幕(虞幕、有虞迵、伯陵)	阻、大 障、 南門、寿星 (巳)	姨表弟或胞弟, 陳 鋒 氏 之 甥 或婿	幕训帷幕門障;週通迥,训門扃;陵 训陵阻,又通棱、 櫺,训門闌	《左传》《国语》《容成氏》《山海经》
4	蝽牛(鼓延、 允格、文祖、 虔、庭坚)	攝 提 格、 乗、河 鼓、 牽牛(寅)	子	延為廷之說,训雷 霆般之鼓擊;文通 鼖,虔通擊、牽;允 通 兖、演,坚 谜	《山海经》《大戴礼记》
5	伯 夷 父(伯 夷、殳、咸 鳥、 臺 駘、和 氏、 实沈、太 岳)	鶉 火、协 洽、咮、星 烏、餾(未)	弟,西岳和仲氏 (实沈氏)、北岳 和叔氏之父	夷通頤,训頤養; 和训协洽調和;咸 通啗,训吃食;臺、 駘通騖、麳,训麥 实沈通"食啗"	《山 海 经》 《尚书》《大 戴 礼 记》 《左传》
6	瞽叟(季格、 乘釐、直柄)	秉、攝 提 格、河 鼓 (寅)	侄,蟜牛之子, 舜与象(壽麻) 之父	乘为秉之讹;釐通 僖,训喜慶、鼓樂, 柄通秉	《左传》《山海经》
7	堯(放勳、唐 氏、陶唐氏、 倪皇)	端萌(乙)	響之孙、藝祖 (蟜極)之子,丹 朱(放齊)之父	放通芒;勳通元、端;唐通藩,《禮· 月令·註》"藩謂 物動萌芽也",训 萌芽;倪训端倪	《尚书》《史记》《大戴礼记》《山
8	舜(重華、虞舜)	重光、著麗(戊)	瞽叟之子,堯之 共治者和繼承者	舜通蕣,训蕣華、 光華、華麗	《尚书》《史记》
9	皋縣(皋陶、無淫、咎陶)	蘇兆(丙)	3	淫通瑶、繇,見《山海經·西山经·郭璞註》"淫音遙, 與瑶同"	《尚书》《史 记》《山 海 经》
10	伯益(虞遂)	室 = 倉 黄 (庚)	子,为夏后啟 所滅	益训監阻窒塞,遂 训隧	《楚辞》

主要资料来源:《山海经·大荒海内经》、《左传》、《国语》、《史记》、《大戴礼记》、《今文尚书》、《楚辞》、《容成氏》(上博藏出土楚简)、《尔雅》。

七、"陬訾氏(子)=恆儀(子)"与 少皞氏世系考

中国最早的史实人物是谁?中国最早的史实王朝在哪里?毫无疑问,通过"干支密码"为我们考证还原出的尘封已久的"有虞氏"王朝世系,我们现在已经十分接近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了,无论如何,生活在西元前24世纪的"伏羲王(陈锋氏)"及其开创的"太皞有虞氏"王朝绝对是足够古老的人物和足够古老的王朝,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也可堪称是最古老的历史记录开创者之一了(全球已知最早的史实王朝,即苏美尔恩美巴拉格西(Enmebaragesi)王的"基什(Kish)第一王朝"和古埃及卓瑟(Djoser)王的所谓"第三王朝",其所代表的可坐实的连续"信史"起点也不过都是始于西元前26世纪左右,早于此两王的苏美尔历史传说和古埃及历史传说都是后出文献的虚构已如前述;而所谓的"印度河文明"分布地区则直到西元前1千纪才摆脱了"无名氏"的状态)。然而,"干支密码"却告诉我们,即使是如此古老的一个王朝,她也算不上是中国"信史"的真正开端,因为在中国诸多的非孤证古文献中,其实还记载着一个比"太皞氏"更古老的、同样也拥有确切时空地址和完整世系可供考证的王朝"少皞氏"。

要证明"少皞氏"这个中国最古老王朝的真实存在,当然首先必须要找到 其能与古文献记载相吻合的考古学实物证据。而十分幸运的是,在这个考古 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时代,这样的证据无疑是很容易找到的:事实上,中国古文 献所谓的"少皞氏之墟"并不在别处,它就是中国所发现的第一座"龙山文化古 城址"——"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据碳 14 测年数据,该城始建于距今 4 565±130 年,参见图 4-5)。

"少皞氏之墟"为什么不是在传统史学所公认的曲阜地区(泰山以南)而是在章丘地区(泰山以北)?显然,由于《左传·定公四年》有所谓"分鲁公以……殷民六族……而封于少皞之虚(鲁都曲阜)"的明文记载,所以尽管考古学家们早就发现了"城子崖城址"(1931年),却长久以来都没有意识到它的主人其实就是"少皞氏"。然而,假如我们不是拘泥于此段"少皞氏之墟"的片言只语而是从所有关于"少皞氏"王朝的总体史料记载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左传》所谓的"少皞氏之墟"其实是另有含义的,它其实说的是鲁国曲阜地区乃是古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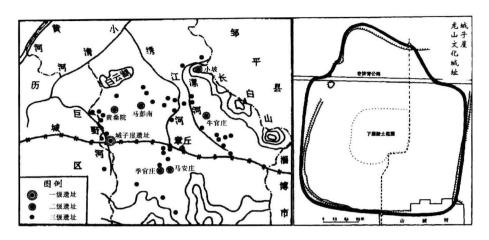


图 4-5 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及其附近的三级聚落群分布(约西元前 26一前 21 世纪)

夷"少皞氏"某个旁支后裔的故墟(即前文所述的有穷氏),至于真正的"少皞氏之墟",则无论从考古证据还是史料记载来看,其地望都是指向"城子崖遗址" 所在的章丘地区。

众所周知,在整个"山东龙山文化"的六大地方类型中,唯有分布于古济水流域的鲁西北"城子崖类型"才发现了大规模的城址群(目前已发现有阳谷景阳冈、茌平教场铺、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桐林等十余座该时期的大小城址),其繁荣度绝非仅有几座小城和"堌堆"类型遗址的曲阜附近之"尹家城类型"可比(该地区当时湖泊沼泽密布,居民较少);而在"城子崖类型"的五大古城址群沿着古济水两岸近似一字摆开的直线上,"章丘城子崖城址"不但恰好位于这条直线的最中心(其上、下游各两座大城),而且其巨达 20 余万平方米的城墙墙内面积也是所有同期龙山城址中最大的(此指龙山早期,到了龙山晚期,裹汾陶寺城址、阳谷景阳冈城址等都纷纷超过了它)①。因此,我们无论从该古城址在整个"古济水城址群"中所占有的地缘政治中心和人口密度中心之地位来看,还是从其本身所拥有的所谓"聚、邑、都"三级聚落结构来看(图4-5),其与《左传》所记载的那个外统诸多姊妹城邦(五鸠氏、五雉氏、九扈氏等)、内统诸多同宗部族(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等)的"少皞氏"城邦

① 王守功:《山东龙山文化》,2004年,第96—105页。

都是完全吻合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的"晏子對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临淄)"早已证明了"五鸠氏"城邦的确切位置就是此"古济水城址群"中的"临淄桐林城址",而《太平寰宇记》所谓"故顧城在(范)县东南二十八里,夏之顧国也"也证明了"九扈氏(九雇氏)"城邦的确切位置就是此"古济水城址群"中的"阳谷景阳冈城址"(范县与阳谷县近在咫尺),那么我们对作为"五鸠氏"和"九扈氏"之姊妹城邦的"少皞氏"城邦同样也位于"古济水城址群"即"城子崖类型"①之分布区内而不会远在他乡就更有绝对的把握了。总之,"章丘城子崖遗址"相比曲阜地区的"尹家城类型"更少水患而宜于人居、相比日照地区的"尧王城类型"更靠近中原而有利文化交通的诸多地缘优势特征,是完全可以与文献记载的"少皞氏"城邦之霸主地位和非偏僻特征互相吻合的。而与章丘地区适成对照的是,曲阜地区的汶泗流域无论是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约西元前4300—前2500年)还是"龙山文化"时期(约西元前2500—前2000年)都不是大型城址或人口密度中心之所在,显然与文献记载的霸主城邦"少皞氏"不符。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无言"的考古证据,"章丘城子崖古城址"还拥有更直接的文字证据足可以证明自己是真正原版的"少皞氏之墟",那就是自商末周初一直流传至今的章丘之古地名"谭"。

"谭"通"郯(谈)",《左传》之"谭国"和"郯国"两名正如《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载本为同一个"郯(谭)国",她是"西土"周王朝眼中重要的"东国"之一。虽然,在西元前 684 年齐桓公出兵伐谭导致"谭子奔莒"即举国迁往莒国附近的"郯国(新谭国)"(今山东临沂之郯城县),但正如《春秋·庄公十年·杜预注》所云:"谭国在济南平陵县西南",谭(郯)国人在西元前 684 年以前一直是世代居住在今"章丘城子崖遗址"附近的土著族群这一点是清楚无疑的(今城子崖遗址之"三叠城墙"最上层之周代城址就是其最后的遗迹),而司马迁把齐国临淄附近的"谭国"和莒国附近的"郯国"认定为同一国,这不仅是符合于《左传》的原始文意的,也是符合于考古事实的:一方面,新迁徙的"郯国"在《左传》的原始文意的,也是符合于考古事实的:一方面,新迁徙的"郯国"在《左传》首见于宣公四年(西元前 605 年)"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这显然是与旧"谭国"在《左传》中最后见于庄公十年(西元前 684 年)"齐师灭谭,谭子奔莒"是完全可以无矛盾地对接的;而另一方面,考古学发现的今章丘县存在从

① 本书的"城子崖类型"同时包含了所谓的"景阳冈类型"。参考同上。

龙山时代到春秋时代的列代城址而郯城县仅有战国城址这一事实,也足可以有力地证明"谭国=郯国",今临沂地区的"郯国"并非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古国而仅是一个亡国君主们的晚期避难地。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郯国"的真正故地并不在今临沂地区而是在今章丘地区,那么我们要证明"章丘城子崖遗址=少皞氏之墟"的证据链就可以成功建立起来了。因为,正如众所周知的,根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西元前525年)的明确记载,"郯国"正是有信史可考的、唯一的"少皞氏"嫡系后裔:

秋, 郯子来朝, 公与之宴。昭子问焉, 曰:"少皞氏鸟名官, 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 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 凤鸟适至, 故纪于鸟, 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 历正也。玄鸟氏, 司分者也; 伯赵氏, 司至者也; 青鸟氏, 司启者也; 丹鸟氏, 司闭者也。祝鸠氏, 司徒也; 鵙鸠氏, 司马也; 鸤鸠氏, 司空也; 爽鸠氏, 司寇也; 鹘鸠氏, 司事也。五鸠, 鸠民者也。五雉, 为五工正, 利器用、正度量, 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 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 不能纪远, 乃纪于近, 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 见于郯子而学之……

因此,无论是根据这段著名的"孔子学于郯子"记载来看,还是根据西周"谭大夫"所作的充满了天文学知识的古老诗篇《诗经·小雅·大东》来看,周代"谭(郯)国"故地所在的"章丘城子崖遗址"确实就是中国最古老的地方王朝"少皞氏"之都城所在地,龙山文化时代的"少皞氏"城邦及其后裔"郯(谭)国"确实就是中国最古老之历史知识和天文文化的伟大创造者和忠实守护者。

(1)《海内经》记载的少皞氏世系

虽然,正如"有虞氏"的古老历史可由其嫡系后裔"胡公满"为证一样,"少皞氏"的超级古老历史也可由其嫡系后裔"郯子"为证,但是,郯子的学生孔子早就指出过,周代的许多"古帝後裔"族群所亲述的本族历史仍然有许多是"不足徵"的:譬如,正如前文所述,《左传》中的真实版"有虞氏世系(虞幕、瞽叟、舜、虞遂)"与《帝系》中的伪造版"有虞氏世系(颛顼、穷蝉、敬康、句芒)"事实上就同是出于陈胡公家族之手的。因此,虽然孔子对郯子亲述的本族历史早就

有过"学在四夷(东夷少皞郯国),犹信"的最高评价,但我们仍然还是要用"干支密码"来对各种版本的"少皞氏世系"作出最后的检验,以期复原出最真实最完整的"少皞氏"历史。毕竟,《左传》中郯子直接告诉我们的"少皞氏"诸王名单明显并不完整,其直接可坐实者仅"高祖少皞挚"一王,而其他文献间接转述的"少皞氏"史料则是错讹百出、人神混杂而绝对有必要有所鉴别的。那么,除了"郯子版"的残缺世系,中国古文献中是否还保留着其他可资补正的"真少皞氏世系"片段乃至完整版的"真少皞氏世系"呢?十分幸运的是,"干支密码"告诉我们,这两种史料都是真实存在的。例如,关于"少皞氏世系"的最开端部分,即"少皞氏"的始祖究竟是谁,我们就有如下这些完全符合"干支取名制度"的古老史料可资证明。

"少皞氏"王朝的始祖究竟是谁?在我们已经考证过虞、夏、商、周等所有早期王朝的世系结构之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早就有了总结性的答案,那就是"少皞氏"的始祖也应该是一位舅系始王,即是一位与"高祖少皞挚"的始妣同名号的人物。而关于"少皞挚"其人的始妣,我们在众多古文献的记载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

《帝系》有云:"……陬訾氏,产帝挚……"

《世本》有云:"……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挚……"

《史记》有云:"……陬訾氏女,生挚……"

显然,在刨除了这些记载都把"陬皆氏女"列为"帝喾四妃"的拼凑剪接之劣迹(理由前文已述)以及抄本避讳等陋习("常儀"当作"恆儀")之后,我们是不难从中复原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的,那就是郯子亲口陈述的本族始祖"高祖少皞挚"(即帝挚)之母确实是一位名叫"陬皆氏女"或"恆儀"的始妣。因为,根据"干支密码","恆"训子孫綿恆有保障,"儀(俄)"通"我"、"窝(窠)"训窠室、營巢,"恆俄"与"陬皆"一样作为人名都是代指地支第一位"青章=营室=娵觜(子)"。所以,"陬皆氏(子)=恆儀(子)"成立,《世本》所谓的"娵皆氏之女曰常儀"无疑是信而有徵之史实。而根据"干支取名制度",我们知道,这位始妣"娵皆氏之女"的名号必定是借用自"少皞氏"王朝的舅系始王"陬皆氏"的,而由始妣"恆儀(子)"、舅系始王"陬皆氏(子)"、父系始祖"帝挚(辰)"组成的"三位一体"王朝始祖结构,无疑就是我们要找的"少皞氏"王朝之真正始祖(表4-12)。

	甲骨文和古籍中的先商始祖	古籍中的少皞氏始祖
集体始祖(族名)	有咸氏(有娀氏)	赤水氏(形魚氏)
舅系始祖/始妣	咸爨(帝俊)/爨母(简狄女)	陬眥氏(聽訴)/恆儀
父系始祖	高祖河(玄王契)	帝摯(炎居)

表 4-12 王朝始祖的三位一体结构: 先商始祖与少皞氏始祖之对比

而一旦我们确认了"陬訾氏产帝挚"这段"少皞氏世系"片段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在中国的古文献宝库中,能够与此段世系名单完全吻合而又更加完整的"少皞氏世系"其实也是存在的,那就是至今仍然被保留在《山海经·海内经》这一"甲骨文级"文献中的一段神秘文字:

……赤水之子聽試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

而据《山海经》注引《三皇本纪》可知这段世系一本又作:

……奔水氏之女曰聽載……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

显然,在这份古老的族谱名单中,我们不仅能找到"陬訾氏女(子)"和"帝挚(辰)",即"少皞氏"的前身"赤水氏(奔水氏)"城邦之始妣"聽訞(子)"和始祖"炎居(辰)",而且还能找到他们身后的连续两代继承人——"節並(寅)"和"戲器(酉)",而即使不考虑《海内经》还能为我们提供的另一段"少皞氏世系"(见下文),这也已经使得我们已知的"少皞氏世系"整整延长了一倍:

★ "聽託(聽談)"为什么就是少皞氏第一任国王之同名先妣"陬訾氏女"?因为无论按照先秦古文还是今文字形来看,此"聽"字都应该是"聚"字之形讹,聚通娵;"託(詙)"字都应该是"訿"字之形讹,訿即訾。所以今本《海内经》之"聽訞"和《三皇本纪》之"聽詙"在抄讹之前本皆当作"聚訿",而"聚訿=陬訾"作为人名当然就是代指地支第一位"娵觜(子)",所以"陬訾氏(子)=聽訞(子)=聽詙(子)=聽詙(子)=恆儀(子)"成立。

★ "炎居(帝哀)"为什么就是少皞氏第二任国王"帝挚(高祖挚)"? 因为 "炎"训大火,"居"训房;"哀"為"袁(爰)"之形讹,《三皇本纪》之"帝袁"本当为 "帝爰居"即"帝炎居"之抄讹脱略。所以"炎居(帝哀)"和"帝挚(执)"一样作为

人名都是代指地支第五位"大火=房=执徐(辰)","帝挚(辰)=炎居(辰)=帝 袁(辰)"成立。

★ "節並"作为少皞氏第三任国王为什么就是"帝克"? 因为"節"训節制、 導引攝提,"並"通秉;"克"通"格"即摄提格。所以《海内经》之"節並"和《三皇 本纪》之"帝克"一样作为人名都是代指地支第三位"摄提格=秉(寅)","節並 (寅)=帝克(寅)"成立。

★ "戲器"作为少皞氏第四任国王为什么就是"帝榆罔"? 因为据陆德明云"帝榆罔"本作"帝榆罡","罡"通罁,训罁斗、器皿。所以,《三皇本纪》之"帝榆罡(罔)"和《海内经》之"戲器"一样作为人名本都是代指地支第十位"作器(酉)","帝戲器(酉)=榆罡(酉)"成立。(戲为椒、鱼之讹,鱼与榆同音皆为族号"赤水氏"之别称,详说见后。)

(2) 少皞青陽氏考

当然,关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赤水氏"之四代世系聽託、炎居、節並、戲器其实就是"少皞氏"王朝之世系而非任何其他王朝之世系的考证,我们不仅可以从"少皞挚(辰)"母子与"炎居(辰)"母子的王名干支对应中找到突破点,更可以从另一个"少皞氏"的知名国王"少皞青陽氏(酉)"与"戲器(酉)"的王名干支对应中最终找到第二重的独立证据,以彻底打消"赤水氏=少皞氏"之论证的孤证性嫌疑。

《世本》云"青陽即是少皞";《史记》云"玄嚣是为青陽"。显然,关于在"少皞氏"王朝中曾经存在一位名叫"少皞青陽"别号"玄嚣"的国王,中国史料历来是别无异议的。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和传抄讹误,许多不懂"干支密码"或受抄写讹文误导的后世文献往往会把"少皞青陽"与"少皞挚"两位国王合并成同一人而混为一谈罢了。而"干支密码"告诉我们,"少皞挚"的王名干支属于地支第五位"执徐(辰)","少皞青陽=玄嚣"的王名干支却属于地支第十位"作器(酉)",此二名根本不可能是指同一个人物:因为,"青"为"耑"字之讹(二字篆书和古文本颇形似),耑通剬,训剬制作器;"陽"即"昜",为古文"曑(參)"字之讹;"嚣"通"器"或"鏊",训餠鏊、器皿;"耑曑"、"玄嚣"作为人名都是代指地支第十位"作器(酉)","少皞青陽(酉)—玄嚣(酉)"确实成立。

而一旦我们证明了"少皞青陽"和"少皞挚"确实是"少皞氏"王朝中两位不同的国王,并且都可以在《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赤水氏"世系中找到其对应的别名,即"少皞挚(辰)=炎居(辰)"为第二世国王和"少皞青陽(酉)=玄器

(酉)= 戲器(酉)"为第四世国王,再加上前已证明的"少皞挚"之舅氏"陬訾氏(子)=聽託(子)"为第一世国王,那么我们要据此推论出"赤水氏=少皞氏"完全成立显然已经有了75%的过硬证据。而事实上,我们能找到的证据其实还远不止此。正如下文即将论证的,不仅是上述这三位著名的国王,即使是"赤水氏"最不出名的第三世国王"節並",我们也有充分多的其他独立证据可以证明,他也是兼有"赤水氏"和"少皞氏"两种谱系记录的王者,"赤水氏=少皞氏"对于《海内经》中的所有四代"赤水氏"国王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所有世次排位关系都是100%成立的。不过在证明这一点之前,我们还有另一个重大的史实需要首先被证明,那就是所谓的"少皞青陽氏"其实本就是中国最著名的古帝"颛顼"之同一人。

"少皞玄嚣青陽氏"居然就是古帝"颛顼高陽氏"之同一人?显然,就表面来看,这个说法是和中国正史《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玄嚣是"黄帝之子"而颛顼是"黄帝之孙"互为矛盾的。但是,正如《五帝本纪》篇末之"太史公曰"所明确注明了的,《五帝本纪》与《史记》其他篇章的性质完全不同,乃是太史公在"五帝尚矣"、"书阙有间矣"的无奈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拼凑整理出来的,其内容不过是杂录群书而已,其多源性结构本身就决定了这是一份必然充满矛盾而仅可参考不可全信的文字。而当然,在这种来源不同却融汇一炉的文字中,我们假如遇到一些诸如"一人变多人"、"多人变一人"、"孙子比爷爷年纪大"(比如所谓"颛顼七世孙"舜比所谓"颛顼三世孙"禹的年纪还大)之类的矛盾说法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也许没有丝毫矛盾反而是不正常的了)。而"少皞青陽氏"在《五帝本纪》中一人分饰"黄帝之子"玄嚣和"黄帝之孙"颛顼两大角色明显正属于这种字面矛盾的典型案例之一,因为我们至少有如下三大关键证据可以有力证明,《五帝本纪》中的这场"一人变两人"魔术仅仅是杂取群书造成的,在真正的历史中,"玄嚣"原本就是"颛顼"之同一人:

其一,"干支密码"密码可以明确告诉我们,"颛"同"青(耑)","顼"通"嚣","陽"即"易(曑)",古帝"颛顼高陽"不仅是和"玄嚣青陽"干支属性相同都属"酉",而且其名号中的所有三个干支用字都是完全一致的。而更一致的是,由于"高"古通"皋(皞)","高陽"即"(少)皞陽","高陽氏"王名的前缀国号也与"少皞青陽氏"完全一致。此外,众所周知,"玄嚣青陽"中的"玄"字本来是后世五行家们配给"北方玄武帝颛顼"的,而这个"玄"字偏偏又点缀在了本该属于"西方白虎"而非"北方玄武"的"少皞玄嚣青陽氏"身上,可见"颛顼高陽"与"玄

器青陽"两名的来源和流传途径确有某种重叠一致性。所以,在这么多重的一致性面前,我们很难相信"少皞玄嚣青陽氏"与"颛顼高陽氏"这两个王名仅仅是巧合,他们当然有着本为同一人的巨大可能性。

其二,根据《左传》和《国语》等的记载,"颛顼"其人活动的时空区域也是和"少皞氏"王朝时代(前3千纪中期)以及古东夷"少皞氏"势力范围(即"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这两大时空坐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和"中原龙山文化"分布区即《史记》所谓的"黄帝子孙"们(帝喾、帝尧、虞舜、夏禹等)根本不可能有历史渊源关系而只能有神话渊源关系。例如,《左传》中的郯子将"少皞挚……为鸟师而鸟名"与"颛顼……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前后对举连述,而《国语》中的观射父更将"少皞之衰也"与"颛顼受之"这两者列为直接因果,明显都代表了在中国早期史料中凡提及"颛顼"必连带提及"少皞"的惯例。而事实上,正如前文已提及的,后来在春秋之际自称是"颛顼後裔"的"嬴姓"诸族群(如秦、赵)也同时被视为"少皞後裔"(如徐、奄)这一点,也足可间接反映"颛顼"其人与东夷"少皞氏"的密不可分之历史关系。

其三,也是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山海经·大荒东经》这篇"甲骨文级"文献一开篇就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帝颛顼"的血统和国籍确实就是"少皞氏"城邦的国王而不是任何别的国族的古帝王.

東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

显然,这和《帝王世纪》中"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传说一样,都明确肯定了"帝颛顼"是靠近"东海(中国海岸)"的"少皞氏"城邦之王室成员和著名国王。

因此,综合以上的证据,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少皞青陽氏(酉)=颛顼高陽氏(酉)"完全成立,著名的古帝"颛顼"确实就是古东夷"少皞氏"王朝的第四任国王。至于《五帝本纪》援引罗列的各种材料之所以会让"少皞青陽氏"一人分饰"黄帝之子"玄嚣和"黄帝之孙"颛顼两大角色,则完全是出于"大统一"理论和"五行终始"理论的需要而作的拼凑结果。(按照"大统一"理论的假设,上古只有"公天下"的圣王古帝而没有"家天下"的血统王朝,所以古代名词"少皞氏"必须是指一个帝王而非一个家族,而"颛顼"这个帝王当然也就必须与"少皞氏"之名脱钩;而按照"五行"术数理论之"土生金、金生水"次序,"黄帝三土

德帝"、"少皞氏=金德帝"、"颛顼=水德帝"这三帝必须被排列成祖孙三代,所以很容易理解,带"少皞"头衔的古王号"少皞青陽氏=玄嚣"是必须成为"黄帝之子"的,而不带头衔的"颛顼"是必须成为"黄帝之孙"的。)

而一旦我们知道了"少皞氏"第四世国王"少皞青陽氏(酉)"其实就是大名 鼎鼎的古帝"颛顼高陽氏(酉)"之同一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到前面的问题上 来,去找找"少皞氏"第三世国王究竟是谁了。因为,关于颛顼其人之父辈的记 载,在中国史料中是随处可见的。例如:

《世本》有云:"昌意生颛顼……"

《五帝德》有云:"昌意之子也,曰高陽……"

《史记》有云:"昌意之子高陽立,是为帝颛顼……"

毫无疑问,既然"帝顓頊"是真正的"少皞氏"国王,那么上列这些史料当然就是真正的"少皞氏"族谱之重要片段。而通过这段族谱的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少皞氏"的第三任国王即"颛顼"之父辈"昌意",他果然和"赤水氏"族谱中的第三任国王"節並(帝克)"的王名干支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昌"训倡導、牵引、攝提,"意"通"喜"训喜慶鼓乐,"昌意"作为人名与"節並(帝克)"一样都是代指地支第三位"河鼓=摄提格=秉(寅)","昌意(寅)=節並(寅)"成立。此外,根据《世本》等诸书之"(黄帝)产青陽及昌意"在《国语》中写作"青陽与夷鼓"、"青陽与苍林氏"的对应关系,我们得知"昌意"又有别号为"夷鼓"和"苍林氏"。而很明显,"夷鼓"当然是指"东夷"国王名"河鼓(寅)"者;"苍林氏"即"昌臨氏","臨(林)"通"監"也指地支第三位"監聽(寅)"。

所以,在"昌意=夷鼓=苍林氏=節並=帝克(寅)"这五重的"干支密码"证据链面前,我们只能毫不犹豫地认定:《海内经》"赤水氏"族谱中的第三任国王"節並(帝克)"本就是《世本》、《国语》诸文献中的"少皞氏"第三任国王"昌意(夷鼓苍林氏)"之同一人。而对比"赤水氏"族谱之"一世聽託(子)、二世炎居(辰)、三世節並(寅)、四世戲器(酉)……"以及"少皞氏"族谱之"一世陬訾氏(子)、二世帝挚(辰)、三世昌意(寅)、四世颛顼(酉)……"

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绝对是同一份族谱世系,其偶然雷同巧合的概率在 史学研究的精度要求下只能视为等于零。所以,以下等式都恒成立,

聽跃(子)= 陬訾(子),

炎居(辰)=帝墊(辰),

節並(寅)=昌意(寅)。

戲器(酉)=颛顼(酉)……

总之,"干支密码"告诉我们,"赤水氏"城邦就是"少皞氏"王朝的前身,正如"有娀氏"城邦就是"商"王朝的前身一样,这是绝不容置辩的史实。

(3)"少皞生般"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考证分析,我们已经找出了"少皞氏"王朝最早的四世国王之谱系,那么我们离复原出整个"少皞氏"王朝世系的目标就很接近了。现在我们唯一还有疑问的就是,"少皞氏"除了陬訾氏、帝挚、昌意、颛顼这四王外还有没有更多的王存在?从目前可见的各种文献记载来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基本肯定的。最保守地说,"少皞氏"王朝的世系至少还可以添加一位末代国王即《山海经•海内经》等文献明确提及的"般"。

《山海经·海内经》云:"少皞生般,般是始為弓矢……"

《山海经•大荒南经》云:"有國曰顓頊,生伯服(般)……"

《世本》云:"顓頊牛偁,偁字伯服(般)……"

《史记》云:"高陽生稱……"

显然,综合以上这些文献的记载来看,继第四任国王"颛顼"之后,少皞氏王朝还确实存在一位第五任国王"伯般=偁"。因为,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可以证明,相比《山海经》中同被列为少皞或颛顼①所生的火神"祝融"、司天神"重"、司地神"黎"、"三面氏"、"一目氏"等等神话传说人物,以及《左传》中被列为所谓"高陽氏八恺"的"苍舒、隤岂、檮寅、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等有凑数嫌疑的身份可疑人物,"少皞般"确实是一位"信而有徵"的史实人物,其作为"少皞氏"王室成员的年代、地域、族属、身份级别都是十分清晰而可加考证的。

其一,就名字本身来说,"干支密码"告诉我们,"伯般(偁)"不仅是一个符合"干支取名制度"的人名,而且和其前任们的名号一样都是属于用"十二支"而非"十干"命名的人物:因为,"般"通颁,训颁赐、贡赐贸易,又通凡,《玉篇》"凡,计数也";"服"古文作"般",为"般"字之常见形讹②;"稱(偁)"训稱量估

① 中国古籍中名"颛顼"的人物不止一个,就像"羿"至少有两个、"舜"至少也有两个、"鲧"至少有三个等等是一样的,除了此处考证的少皞氏国王"帝颛顼"外,另一个"颛顼"的考证可参见本书第五篇。

② 关于少皞王"伯服"即"伯般"之讹误,可参考著名的周幽王之子"太子伯服"又作"伯般"之案例。

算;"伯般(服)"与"稱(偁)"一样作为人名都是代指地支第十一位"估三奄贸(戌)","伯般(戌)三稱(戌)"成立。也就是说,根据前文发现的中国"十干取名制度"最早为山西省的"太皞氏"所首创,山东省"少皞氏"诸王的取名只用"十二支"而不用"十干"的实际惯例来看(少皞前四王名分属子、辰、寅、酉),采用"十二支"取名的"伯般(戌)"明显比采用"十干"取名的"祝融(庚)"等名号更符合"少皞颛顼所生"的时代地域特征。况且,比照《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五篇凡前缀"伯(霸)"字者如"伯陵"、"伯夷父"等人物其身份必为"君长(霸主)"的文例可知(此文例同殷墟甲骨文),"伯般"的"伯"字本身也足以说明他的王者身份,这是绝非不带"伯"字的"季禺"、"叔歇"或"苍舒"、"隤岂"之流可比的。

其二,就族属国别的清晰性来说,"伯般"确属少皞氏第四王"颛顼"之嫡系子孙、确属少皞氏城邦之土著国王这两点,也是《山海经·大荒海内经》内其他众多所谓的"颛顼苗裔"所不可比的。虽然,正如前述,"中扁"、"季禺"、"叔歇"、"淑士"、"三面"、"一目"等同见于该书的诸多人物或族氏也被描写为"顓頊之子"或"少昊之子",但是,他们无疑仍然可以被解释为只是具有少皞血统但却已迁居别地的后裔,或者只是因为曾是其臣属国而被迫祭祀少皞颛顼的外地部族,真正明确被从地域上定位在"有國曰顓頊"即"颛顼国"本国的唯有"伯服(般)"一人而已。再加上,"伯般"相比上述所有类似人物还是唯一一个既被说成是少皞后裔("少皞生般")又被说成是颛顼后裔("顓頊生伯服")的双重身份确认者,我们对他的"少皞氏"第五任国王之身份就更有充分的指认依据了。

其三,就人物的历史记录之完整性来说,"伯般"不仅有清晰的谱系血统和时空地域之归属,更有具体的历史成就被记录在案,那就是"般是始為弓矢"。显然,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中国的所谓"制作圣人"记载其实是"王名纪年"的特殊表现方式之一(即以王名记录发明年代),但凡拥有"制作圣人"记录的人物其身份必为历史人物而非神话人物、必为有独立纪年权的君主而非臣子,这在中国的早期一手文献如《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中尤其如此(在较后出的《世本·作篇》中,除了被归为所谓"三皇五帝"名下的附会臆造条目外也大多如此,例如"纣为玉床"、"武王作罢"、"鲁昭公始作玺"、"韩哀作御"等等,明显是在说"殷纣王某年发明"、"周武王某年发明"、"鲁昭公某年发明"、"韩哀侯某年发明"、"商武王某年发明"、"鲁昭公某年发明"、"韩哀侯某年发明"的意思,而并非是说这些王侯都是业余发明家)。因此,仅仅凭"少皞生般,般是始為弓矢"这一条"制作圣人"格式的记载明确出现在了《海内经》

之中,我们就已经可以认定"般"作为"少皞氏"国王的史实身份。况且,"弓矢"绝非什么普通之物,乃是上古威力最强大的远程武器,是国家政权的头号支柱,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明了新式"弓矢"就好比是发明了原子弹,所以中国人把这项重要发明权置于"伯般"名下,正说明了此人物不仅是位国王,而且是一代大国的一代名王。而事实上,即使在"少皞氏"王朝已知的全部五任国王陬皆氏、帝挚、昌意、颛顼、伯般中,能够被《山海经·大荒海内经》明确冠以"制作圣人"头衔的也仅此一人而已。

因此,综合以上三点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的可靠结论无疑就是:《山海经·海内经》等记载的"伯般(偁)"确实是颛顼之嫡系子孙、少皞氏王朝的第五任国王。

当然,在"伯般"之后,假如我们还想要再找到"少皞氏"王朝的其他国王恐怕就不太可能了。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伯般(偁)"应该就是"少皞氏"王朝的末代国王。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就明确记载:

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

显然,循该文同篇之"有禹攻共工國山"成例可知,此处同样被"攻"的"颛顼"应该是指"颛顼国",也即"有國曰顓頊,生伯服(般)"的"伯般"之国。因此,正如在"禹攻共工國"战争之后共工国被彻底灭亡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之中一样,"孟翼攻颛顼国(伯般)"战争无疑也意味着古老的"少皞氏"王朝之最终被颠覆(当然少皞氏仅仅是失去了霸主地位而成为新霸主们的附庸,其诸多后裔则并未被灭绝而一直流传下来,直到郯子可以教孔子)。而关于这一中国王朝历史和政治地缘格局的重大变化,我们不仅可以从这则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战争的记载中看出来,也同时可以从其他方面间接找到蛛丝马迹。例如,结合"般是始為弓矢"这则记载暗示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不难体会到"伯般"为什么要去当"新式弓箭发明家",或者中国第一位设立新兵种"弓箭手"的国王(因为考古学常识告诉我们弓箭在中国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般"不可能发明弓箭而只可能改良弓箭或改革兵种),因为矢石交加的残酷战场已经摆到了他的国门之下;又例如,结合考古发现,我们也不难理解"少皞氏"王朝及其建造的"章丘城子崖城址"到了龙山文化晚期(约西元前 2300一前 2000 年)为什么既不再是整个黄河流域的最大城邦,也不再是古东夷地区的最大城邦,因为

"孟翼攻顓頊(伯般)之战"①使得它早已经成为向西部诸邻国称臣的弱势城邦,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中心已经整体西移。总之,我们把"伯般"列为伟大的"少皞氏"王朝之终点,或者至少是其某一段历史的句号是完全合乎以上证据的。

(4) 少皞氏的年代学框架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史实王朝,少皞氏王朝至今可考的国王共有 五世五王,其具体王名干支属性和世系传承关系可列为表 4-13。

表 4-13 少皞氏王名干支与世系 约西元前 2450—前 2300 年

	王名/妣名	干 支	世次关系	王名简释	资料证例
1	陬 皆 氏 (聽	娵觜、管室、 青章(子)	帝摯之舅氏,少 線氏(形魚氏)" 城邦的人 城邦的十二支 早的度創立者	聽为聚字之形讹, 聚通輝;飫、該皆为 眦字之形讹,誠皆为 皆;恆訓子孫綿亙 有保障;儀通俄 (娥)训妻女、家室	《史记》 《山海 经》《三 皇本纪》 《世本》
2	摯(少皞摯、 質、炎居、帝 哀)/方雷氏 (雷祖)	執徐、大火、 房、明堂(辰)	甥,少皞氏联盟 政权建立者	炎訓大火,居訓房; 帝哀為帝袁(爱)居 之省訛,爰居即炎 居;方通房,雷訓震 (辰)、火	《山》《左 经》《传》《逸 传》》《 題书》
3	節並(帝克、 昌意、夷)/昌 養(淖子阿 女)	乗、攝提格、 河鼓、監聽 (寅)	子	節训鼓乐節律;並 通秉;克通格;昌训 倡导、摄提;意通 喜;苍为昌之讹;林 通臨、監	《 经 》《 经 》 多 》《 三 皇 之 大 戴 记 》
4	顓氏、 高 属 展 展 展 展 展 展 展 、 帝 横 罡)/ 鱼 婦 顕 鱼	作器、参(酉)	子	顓通揣、摶,訓摶埴 為器;頊通點、整, 按《集韻數整、器皿; 易為參之訛;賣即 耑之說;盧訓食器, 罡通綱,訓器皿	《《《《《经皇本传语记》《《经皇本》》

① 关于孟翼氏的考证,可参见本书第五篇。

(续表)

	王名/妣名	干支	世次关系	王名简释	资料证例
5	般(伯服、偁)	估、奄贸(戌)	子或孙,為孟翼 所滅	般通頒、凡,訓頒賜、賜貢貿易,《玉篇》"凡,計數也";服(般)為般之訛;稱訓稱量估算	《世本》 《山 海 经》《史 记》

主要资料来源:《山海经·大荒海内经》、《史记》、《三皇本纪》、《大戴礼记》、《左传》、《国语》、《世本》、《汉书》、《逸周书》、《尔雅》。

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建立起整部"广义先商年代学"的拱顶石:少皞氏王朝年代学的框架。也就是说,根据"干支密码"为我们发现和复原的这份真实版"少皞氏世系",我们首先可以确定的是,按5世国王的连续父子(甥舅)血统每世平均30年计,"少皞氏"王朝的历史总积年应该有5×30=150年左右。至于这个王朝的绝对起讫年代究竟在什么时间,我们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的分析中找到线索。

首先,根据最基本的名词解读,我们应该意识到,"少皞氏"这个王朝名字的本身就是一条确定其绝对历史年代的绝佳线索。因为,所谓"少皞氏"无疑是与另一个著名的王朝"太皞氏"相互对称而来的,而"太皞氏(有虞氏)"王朝正如前文所述恰恰是一个年代学框架已经确定了的王朝。所以,只要我们找出这两个名称间明显相互关联的王朝究竟在时空因果关系上是如何关联的,我们无疑也就找到了问题的初步答案。

而根据最基本的历史常识,我们知道,"少皞氏"和"太皞氏"这两个国号首 先可以肯定都不是它们的原始名称而是后起的"绰号",它们正式的原名应该 就是"皞"或"有皞氏",这就像所谓"西汉"、"北宋"其正式的原名就是"汉"、 "宋"一样。显然,两"皞"原本是两个重名的政权。那么,它们为什么会重名 呢?显然,根据"同名"必指有所"同类"这一最基本的语言逻辑来分析,两"皞" 重名的原因无非有两种可能:其一,它们是血缘、地域或文化上的正牌近亲同 类;其二,它们是以狐假虎威或攀龙附凤为目的的冒牌近亲同类。而根据我们 前文的分析,这第一种原因无疑首先是可以排除的,因为"少皞氏"和"太皞氏" 这两族一属"山东龙山文化"即所谓"东夷",一属"山西陶寺文化"即所谓"华 夏",两者无论从地理上还是血统、文化上都相隔千里,绝无同出一源的可能, 某些古籍记载的两"皞"皆为东夷同族其实反映的是周代的妫姓陈国等"太皞 後裔"从汾涑流域迁到东夷故地殖民后造成的假象。而既然它们不是同祖近邻的同类,那么它们的同名关系当然就只能是出于政治虚构的同类了,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无论是"少皞氏"还是"太皞氏",它们在中国历史中的实际角色都是诸多城邦之中实力最强的"霸主",所以两"皞"之间无论是谁冒认了谁的名,其政治动机明显都是在说自己是"霸主"的同类或继承者①,因为"皞"这个国族号一旦被某个霸主长期使用后自然就会成为"霸主"的代名词而备受追捧了,这就像"罗马"这个国族号,一旦被其帝国化的后裔长期使用后,自然就变成了政治魔力十足的"帝国"代名词,而成为这2000年间各种"非我族类"政权,例如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土耳其人的"罗姆(罗马)苏丹国"等所纷纷热衷于冒认的对象了。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皞"其实是"霸主"实力的代名词,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古学上发现的龙山文化时代诸城邦之"霸主"地位转移过程来分析出两"皞"之间的时空关系了。因为,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根据"少皞氏"所建的"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其占据"城市面积之最"即"霸主"地位的历史只在西元前2300年之前才存在,而西元前2300年后它非但不再是整个黄河流域的最大城市,而且也不再是古济水流域的最大城市,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只有西元前2300年之前的"城子崖遗址"才配得上"皞"的称号;而另一方面,根据"太皞氏"所建的"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城址"其开始占据整个黄河流域"城市面积之最"即"霸主"地位的时间也恰巧在西元前2300年左右,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少皞氏"和"太皞氏"确实是两个在时间上前后相接的王朝而不是在空间上同时并存的王朝,并且"少皞氏"在前而"太皞氏"在后。也就是说,结合我们对两"皞"国名间的冒认关系之分析以及对考古遗址时空分布的统计分析,我们的初步结论是:"少皞氏"王朝确实是中国最古老的王朝,其诸王统治的年代大致不会晚于"太皞氏(有虞氏)"王朝的开始年代,其绝对的起讫年代应该是在西元前2450—前2300年左右。

其次,除了"皞"字,"少皞"的"少"字也同样可以告诉我们,"少皞氏"是比 "太皞氏"更古老的王朝而不是相反。因为,根据古汉语的惯例,所谓"太(大)"

① 关于"皞"这个国族名的起源及其被先秦时代的列代霸主所假冒的详情,参见本书第五篇和第六篇。

与"少(小)"的互称共有两类含义:其一,是用来区分次序先后或数量大小的,即以"大小"代指辈分的"长幼"或者"大宗小宗"等概念,例如甲骨卜辞中有商王名"大甲"、"小甲"、"大乙"、"小乙",《史记》中有夏王名"太康"、"少康"、外族名"大月氏"、"小月氏"等;其二,则是用来区分所谓阴阳的,即以"大小"代指"男女"、"公私"、"外内"、"日月"等概念,例如《楚辞·九歌》之神祇名有"大司命(男神)"、"少司命(女神)",《史记》之官称有"太府(公库)"、"少府(私库)",《左传》称国君之妻为"小君(女君主)",甲骨卜辞称国王近臣为"小臣(内臣)"等等。那么,两"皞"的"少"和"太"究竟是指哪类概念呢?显然,比照前文我们已经得出关于两"皞"原本非亲非故的结果,"少皞氏"和"太皞氏"的互为指称显然不能适用第一类概念下的解释,因为它们既非"大甲"、"小甲"那样的同宗亲属可以分"长幼",也非"大月氏"、"小月氏"那样的同源胞族可以分"大宗小宗",所以,它们的大小之分只能用第二类概念来解释,那就是"少皞氏"属阴而"太皞氏"属阳。

"少皞氏"为什么属"阴"而"太皞氏"又为什么属"阳"?显然,在熟悉了"干支密码"的我们看来,这自然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正如《潜夫论·五德志》所云"少皞始作书契"(即书面文字化的纪时方法、取名制度),"少皞氏"是中国"十二支纪月"的最早系统化使用者之一,其王名采用"十二地支取名制度";"太皞氏"则是中国"十干纪日"的发明者,其王名采用"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混合取名制度"。所以,"少皞氏"属"月"、"地支"即"阴",而"太皞氏"则属"日"、"天干"即"阳"。

而既然我们明白了"少皞氏"之"少"并非是辈分小、年代靠后的意思,而是代表了其使用"十二支取名制度"的意思,那么我们对"少皞氏"和"太皞氏"这两个王朝究竟谁先谁后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毫无疑问,采用"纯十二支取名制度"的"少皞氏"要比采用"干支混合取名制度"的"太皞氏"年代更早,因为在人类文化的融合进程和因果关系中,"复杂混合"总是建立在"简单纯粹"的基础之上而因果次序居后的。所以,据此文化事实,我们将"少皞氏"的绝对年代排在"太皞氏"之前的理由无疑又增加了一条。而有趣的是,正如"太皞氏"第一王取名为天干第一位"阏逢(甲)"代表了其在 4 300 年前的"甲天下"地位一样,"少皞氏"第一王特地取名为地支第一位"陬皆(子)"似乎也想向我们后人证明,只有这位近 4 500 年前的章丘王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第一人,因为十二地支的"子天下"概念无疑比十天干的"甲天下"概念更加古老,他是一位比

"甲天下"还要"甲天下"的"子"字第一号人物。

再次,"少皞氏"之所以叫"少",除了代表"日月"之"月",其实更主要还是代表了"男女"之"女"。因为,正如考古学发现的临朐西朱封遗址 M1 大墓这一整个龙山文化时代的最高等级墓葬其墓主为女性,暗示了比"父权"更古老的"母权(舅权)"在"少皞氏"周边社会依然得到尊重一样,中国古文献中的"少皞氏"王朝也是一个充分体现了"母权(舅权)"与"父权"并驾齐驱的古老王朝。

例如,在今天尚能见到的"少皞氏"世系中,其所描述的基本谱系结构首先就与"太皞氏"、"夏后氏"、"先商"、"先周"等其他中国早期王朝的谱系结构迥然不同,因为它不仅记载了所有王朝都会记载的开国始妣,而且还额外隆重记载了几乎每代先王的配对先妣(末代国王"伯般"除外,参见表 4-13):

对于第一王"陬訾(子)",其有王妹"恆娥(子)"见于《世本》等记载;

对于第二王"挚(辰)"其有王后"雷祖(辰)"见于《海内经》等记载;

对于第三王"昌意(寅)"其有王后"昌濮(寅)"见于《史记》等记载;

对于第四王"颛顼(酉)"其有王后"鱼婦颛顼(酉)"见于《大荒西经》的记载。

(按,据《国语》"青陽,方雷氏之甥(生)也;夷鼓,彤鱼氏之甥(生)也"可知, "雷祖"又名"方雷氏",她生了孙子青陽(颛顼);"赤水氏"又名"彤鱼氏",它是 夷鼓王(昌意)的出生地。因为彤、赤本为一色,鱼、水本为一事。而由此可推 知,《大荒西经》之"鱼婦颛顼"一名本义应该是"彤鱼国国王颛顼之王后",因为 "婦"字在甲骨文时代之前是王后们的头衔之一,例如商王武丁最著名的王后 就叫"婦好"。)

显然,"少皞氏"这种完全"男女平等"式的世系记载,即使放在整部中国历史之中都是十分有特色的。而比照同样有此先公先妣并列祭祀风俗的殷商王朝,我们可以推知,这很可能意味着"恆娥"、"雷祖"、"昌濮"、"鱼婦颛顼"等"少皞氏"的这些先妣其身份不仅是人妻人母,而且还是名义上兼事实上的共治女王,因为据殷墟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同样实行"男女平等"祭祀制度的殷商王朝其王后中就历来不乏掌握最高军事权的"武女王"(例如"婦好")和掌握最高议政权的"文女王"(例如"妲己")。

又例如,结合前述《左转》中郯子所说的"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之史实,以及《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附禺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之明确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国语》中著名的

"颛顼绝地天通"故事背后的历史原型也许并不是什么"颛顼实行宗教改革"(史学界流行说法),而更可能是"颛顼实行女权改革",因为顓頊能娶"九嬪"无疑是和其先辈的"男女平等"观念格格不入的。显然,正是颛顼发动的这场"王权对后权的革命",才是所谓"民师(父系新贵)"代替"鸟师(舅系旧族)"之巨大制度变革的实质,也才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的"魚婦顓頊,死即復蘇"之神话的最好注解。(《大荒西经》有云"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蛇乃化為魚,是為魚婦顓頊,死即復蘇",明显是该神话作者在为"魚婦顓頊"这个死去的"末代女王"招魂,希望她能"蛇化為魚"、"死即復蘇"。而由此我们就不难想象,为了捍卫传统的女权,这位"末代女王"与其政敌"颛顼"、情敌"九嬪"们进行了多么激烈的斗争,以致以身相殉。)

总之,无论从考古发现的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之高涨"女权"与陶寺遗址发现的男尊女卑之高涨"父权"两相对比天壤有别来看,还是从少皞氏政权直到最后两王"帝颛顼"、"伯般"时代才最终发动革命确立了父系权威和王权权威的记载来看,中国早期文献把"城子崖遗址"的主人称为"少(女)"而把"陶寺遗址"的主人称为"太(男)"是绝对贴切的,因为"少皞氏"一名的真正本义其实就是"女皞氏",她是一个由女王们和男王们共同统治的国家。而基于"女权(舅权)"社会应普遍早于"父权"社会这一不必赘述的理由,我们无疑又将为证明"少皞氏"的年代早于"太皞氏"增添了新的支撑点。

最后,除了以上这些多学科的综合推理证据,我们必须指出,文献史料本身对"少皞氏"之年代要早于"太皞氏"的直接表述无疑仍然是我们很重要的判断依据之一。虽然,就表面上看来,由于晚出的五行谶纬著作常把"太皞伏羲氏"(木德青帝)列为所谓"三皇五帝"之首(青、赤、黄、白、黑"五帝"按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术数次序排列),从而导致某些学者误认为"太皞氏"比"少皞氏"更早的说法是古已有之;但是,只要我们懂得"少皞氏"其实就是旧史熟知的"颛顼高陽氏"而非什么"金德白帝"、"太皞氏"就是旧史熟知的"有虞氏"而非什么"木德青帝",那么我们将不难发现,就真正忠实历史的先秦史料而言,其对于"少皞氏"之年代要早于"太皞氏"其实都是高度一致肯定的。例如,在《左传》和《国语》这两座中国史料的宝库中,我们首先就能找到许多类似的证据。

《左传》中的大史克有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恺。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 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很明显,在大史克这位鲁国史家的历史知识体系中,"高陽氏=少皞氏"所处的年代是要更早于"高辛氏"和"尧"这两位"太皞氏"国王所处的年代的。而与此较暗示性的说法相比,《国语》中的两段记载无疑更加直白:《鲁语》中的展禽有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明确指出了"虞幕"这位"太皞有虞氏"国王在年代和辈分上是属于"少皞氏帝颛顼"的后生晚辈(虽然在血统上展禽误把他们混为了一族);《楚语》中的观射父有云"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不忘旧者,使复典之",更是明确指出了"少皞氏"其实是比"太皞氏"要早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前朝",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隔世"的,因为"少皞之衰"和"颛顼受之"的年代叫"九黎时代",而属于"太皞氏"即"尧"的年代则叫"三苗时代",两者的时代大背景完全不同。总之,在更加可靠的早期史料中,关于"少皞氏"王朝要早于"太皞有虞氏"王朝、"少皞帝颛顼"要早于"高辛氏"、"幕"、"尧"等等这些基本的年代先后概念,其实一直是清楚地存在着的。

而事实上,关于"少皞氏"早于"太皞氏"这种清晰的历史次序观念,即使到了最初版本的"大一统"五帝谱系中也仍然是被顽强地保留着的,甚至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例如,《大戴礼记·五帝德》有云"元器(少皞国王)之孙……曰高辛(太皞国王)";《史记·五帝本纪》有云"颛顼崩,而玄器之孙高辛立";显然,"太皞氏"王朝的父系始祖"帝喾高辛氏"在这些儒家的"五帝"谱系中不仅在时代顺序上依然保留了位于"颛顼高陽氏"之后的位置,而且在辈分上和政治上也被认定是"玄器"之后裔、"颛顼"之后继接班人,而正如前述,所谓"玄器"和"颛顼"其实本就是"少皞耑曑氏"之同一人。由此可见,"高陽氏"早于"高辛氏"这一基于史实的次序确实是诸多古史公认的而且绝无反例的,即使有心篡改历史者也不敢贸然篡改的。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与后世的五行谶纬版本"三皇五帝"不同,中国先秦文献中关于"少皞氏"王朝整体上早于"太皞氏"王朝的记载是空前一致绝少反例的。而以这些文献所提及的人物出场次序为据,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出,"少皞氏"的第四任国王"颛顼"最晚也不会晚到与"太皞氏"的第二任国王"高辛氏"同时(即按"高辛氏"第一年紧接在"高陽颛顼氏"最后一年的最低标准计);而假如我们再考虑到,事实上,在先秦文献中并不存在任何"少皞氏"与"太皞氏"两者之间的具体交叉事件被提及,那么,《国语•楚语》描写的两"皞"其实是"隔世"的关系无疑更加可信一些:也就是说,基于"太皞

氏"实际存在于西元前 2300—前 2100 年左右,"少皞氏"大致存在于"隔世"之前的西元前 2450—前 2300 年之判断基本上也是符合先秦史料的直接表述的。(事实上,考虑到也许还有漏载的王世以及城子崖城址实际上始建于 4500 年之前,我们把"少皞氏"的始年定在前 2500 年也未为不可。)

"少皞氏"王朝的绝对起讫年代究竟在什么时间?毫无疑问,通过以上这几点分析,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得出最终的结论,那就是与代表了"男权制度"、"十干纪日文化"和"华夷总霸主"的"太皞氏"城邦相比,其本身代表了"女权制度"、"十二支纪月文化"和"东夷小霸主"等更古老历史元素的"少皞氏"城邦无疑是个更加古老的王朝,其既符合考古发现又符合文献记载的真实起讫年代大致应该在西元前 2450—前 2300 年左右或更早些。而身处距今约 4 500—4 400 年前开创了这个伟大王朝的女王"陬皆氏"和国王"少皞挚"等人,无疑就是我们最终要寻找的中国最早之史实人物。他们和大约距今 4 600—4 500 年前苏美尔最早的史实人物 Enmebaragesi 王、古埃及最早的史实人物 Djoser 王一样,都是人类"信史"所能连续追溯到的最早起点。

第五篇 中国最早的城邦守护神—— 文献暨甲金文所见十二古国 与龙山文化十二城址考

1931年,当"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这座 4 500 年前的古城首次被考古发现,关于"龙山文化"(约前 2600—前 2000 年)的历史定位问题,无疑就成了中国历史学最富于想象力但也最富于争议性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新近发现的筑有高大城墙的"龙山文化城址"越来越多,一个由几十座大小古城址及其附属古聚落群所组成的庞大"城市群"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禁要问,对于这么一个遍布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其整体的"城市化"规模绝不亚于同时代的尼罗河流域或两河流域文明区的古城址群,其究竟是代表了一种怎样性质的社会,是无名可考的"史前文化"、"史前文明"还是有名有主有历史的"信史文明"? 其究竟与中国古文献所记载的"三皇五帝"们或夏王禹、商王契等有没有关系,它们的建造者和拥有者具体究竟是谁?

显然,事实已经证明,在"干支密码"尚未破解之前,我们要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虽然中国人拥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地理学文献,尤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不晚于前11世纪)、《尚书·禹贡》等等,但正如甲骨卜辞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高且要"就是"帝俊"、"高且河"就是"玄王契"一样,由于几千年间的地貌变化和地名变迁,这些辗转传世的古地理文献也早已不能直接告诉我们每座龙山文化城址的具体主人究竟是谁。不过幸好,随着"干支密码"的破解,这个棘手问题的解决已经迎来了转机。因为,只要放眼世界,我们不难发现,要找出中国的诸多龙山文化城址之真正主人,其关键并不取决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考证本身,而是首先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神话的理解程度,即取决于我们对"中国十二星神"

神话为什么又被称作是"十二地支神"的理解程度。

要研究龙山文化城址群的历史归属问题,为什么要首先去研究中国的神话?显然,乍听起来,这两个问题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假如我们对比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类似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问题其实本就是紧密相关而须臾不可分离的:

雅典城(Athens)为什么叫雅典?因为雅典城的守护神叫雅典娜(Athena);

墨西哥城(Mexico)为什么叫墨西哥? 因为墨西哥城的守护神叫墨西特利 (Mextli);

鹰城赫拉康波里斯(Hierakonpolis)为什么叫赫拉康波里斯?因为鹰城赫拉康波里斯的守护神是埃及鹰神赫鲁斯(Horus);

月亮城乌尔(Ur)为什么叫月亮城?因为该月亮城的守护神是苏美尔的月亮神 Nanna;

巴比伦城(Babylon)为什么叫巴比伦? 因为巴比伦城的守护神是号称巴比勒(Bel Belim 意为众神之神)的天神马尔杜克(Marduk)······

显然,仅仅从这些最耳熟能详的地名之中,我们就不难总结发现,在我们这颗星球上,其任何一处最古老文明的顶级地域名称,不管是西元前 26 世纪的 Ur 还是西元前 8 世纪的 Athens,不管是东半球的 Hierakonpolis 还是西半球的 Mexico,其最初的历史形态其实都是同出一源的,那就是它们都是来源自本地的神话与神祇。因为,虽然随心所欲地给山川土地取"俗名"是后世的"世俗社会"所常见的现象,比如貌似桌子的叫"桌山(Table Mountain)"、貌似牛头的叫"牛头山"、产盐的叫"盐湖城(Salt Lake City)"、产铜的叫"铜陵"等等,但在人类文明起源阶段的所有"神祇社会"看来,山川土地,尤其是作为全族全城邦之共同生活来源的"江山国土"、"乾坤社稷"等顶级概念,其本身无疑就是无比神圣的,其最高拥有权和命名权只能归之于神祇而非任何俗人俗物,其享受虔诚祭祀的名字是绝不容用任何"世俗"事物来随意命名的。

因此,对比以上这些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守护神"(Tutelary deity) 文化,我们不难想到,作为同样是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神祇社会"之一,中国 龙山文化诸城邦的顶级地域名称无疑也应该是与中国最古老的神祇们紧密关 联的。因为,《左传》等中国史料早就明确指出,中国最初的土著诸城邦也是存 在着清晰的"神不散非类、民不祀非族"观念的,而很显然,这种"各个地区各祀 其神、各路神祇各护其地"的观念正是一种标准的"守护神"文化观念,其与古希腊人那种"城邦守护神只庇佑自己最钟爱的城市"的所谓"地理神学 (topographical theology)"观念无疑是如出一辙的。那么,中国神话中的最古老神祇,即至今仍然保留在战国《楚帛书》中的"十二地支星神",其与中国古代的顶级地名之间究竟有无直接关联呢?其实,这只要看看下面这些实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因为,正如中国先秦时代的古人名都是带有"干支密码"的占星神话之产物一样,事实证明,中国先秦时代的顶级古地名其实也都是带有"干支密码"的占星神话之产物。

例如,《楚帛书》中有一尊代表地支第一位的神名曰"陬(子)",其相应的星名为"青章(子)"、"营室(子)",而我们发现在当代地图上也确有一个沿用自先秦时代的顶级地名曰"青州"(在今山东省北部),在古"青州"范围内更确有一座见载于《史记》等古文献的古城曰"营丘"以及一个见载于《水经注》等地理文献的古国曰"邹侯国"(邹通陬,今邹平县);

又例如,《楚帛书》中有一尊代表地支第二位的神名曰"如(丑)",其相应的 岁阴名为"赤奋若",而我们发现在当代地图上也确有一个沿用自先秦时代的 顶级地名曰"汝(如)河"(在今河南省中南部),在"汝水"迤西同属古南阳郡之 地更确有一个见载于《左传》等古文献的古国曰"鄀(若)国"(今南阳市附近);

又例如,《楚帛书》中有一尊代表地支第五位的神名曰"皋(辰)",其相应的星名为"大火(辰)",而我们发现在当代地图上也确有一个沿用自先秦时代的顶级地名曰"郯城"(郯通炎训大火,在今山东省),而在古"郯国"及其迁徙前故址"章丘城子崖遗址(谭国)"更确有一个见载于《左传》等古文献的古老部族曰"少皞氏"(皞通皋);

再又例如,《楚帛书》中有一尊代表地支第十二位的神名曰"涂(亥)",其相应的星名为"路踵(亥)",而我们发现在当代地图上也确有一对沿用自先秦时代的顶级地名曰"洛阳"、"嵩山"("洛"古通"路","嵩"古通"踵",在今河南省中西部),在"洛阳"、"嵩山"附近更确有一个见载于《左传》等古文献的古地名曰"三涂"(今嵩县)以及见载于《逸周书》等古文献的古国曰"有洛氏(涂山氏)"……

显然,对于历史地理学文献浩如烟海的中国而言,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这样的例证是随处可以找到的。而所有这些例证无不都在告诉我们,相比习惯于充当"地域守护神"的 Sin、Bel-Marduk 等古巴比伦"七大星神"或者

Apollo、Athena 等古希腊"奥林匹亚十二大神祇",我们中国的陬、如、皋、涂等上古"十二地支星神"很明显也是曾经充当过"地域守护神"这一最最基本的神话职能角色的:中国人之所以至今仍称"十二星神"的等价符号为"十二地支"而不是"十二天支",这绝对不是无缘无故而是另有其深意的。

而一旦我们能理解到中国神话体系与全世界任何古老文明的神话体系一样,都是以上管天文、下管地理为其最基本的两大职能而缺一不可的,中国最古老的顶级地名确实只可能是源自中国最古老的神祇"十二地支星神"的,那么我们要由此找出中国"龙山文化城址群"的各座城池究竟本名叫什么、究竟本为谁拥有,也就是件易如反掌的事情了。

事实上,结合考古证据、文献证据以及"干支密码"证据,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最早的汉语民族史其实是由十三个先商城邦的地方史组成的,其在考古学上的对应物就是黄河流域附近所发现的十三座中心国都级"龙山文化城址"(图 5-1)。而这十三个城邦除了"襄汾陶寺城址"的主人"太皞氏(有虞氏)"其国名乃是抄袭自"少皞氏"而不属于原始地名之外(考证已见前文),其余的十二个则都是自始至终都尊奉同一尊"守护神"并以之自名的古老城邦。而最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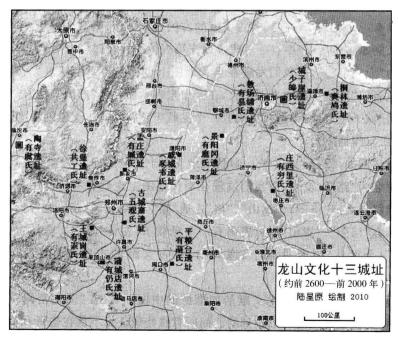


图 5-1 考古学发现的龙山文化主要城址分布(约前 2600—前 2000 年)

奇也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十二个城邦的顶级地名不但恰好是可以与《楚帛书》中的十二尊"地支星神"——对应绝无紊乱的,而且这些成组的顶级地名居然都能穿越 4 500 年的历史时空而一直被沿用到了今天,由此构成了一组全世界所仅见的"地名密码"和"书写在大地上的史书"。下面,就让我们通过翻阅这本神奇的"书写在大地上的史书",来初步复原出这十二座"龙山文化古城"那久被埋没的辉煌历史。

一、临淄桐林龙山文化 城址群与五鸠氏考

众所周知,今山东省淄河流域在 3 000 多年前本为姜姓齐国的领地。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上世纪发现的"临淄桐林龙山文化城址"(图 5 - 1)等淄河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齐国作为一个古老城邦,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还远远可以追溯到 4 600 年前的所谓"龙山时代"。

(1) 桐林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桐林(田旺)遗址位于今临淄区凤凰镇田旺村和朱台镇桐林村之间的台地上,其龙山文化早期的城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晚期扩建后更大)。而假如将该城址中心台地外若干个外围区域一并计算在内,则该遗址的总面积更可达300万平方米之巨①。此外,在该城址的四周不远,还有若干个规模略小的姐妹城址和聚落群,例如寿光边线王城址(城址面积5.7万平方米)、邹平丁公城址(城址面积10万平方米,另有早期小城面积约5万平方米)②、桓台李寨遗址、临朐西朱封遗址等等,它们共同拱卫着该中心城址组成了一个辐射半径达几十公里的密集古城址群和古聚落群。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明显属于城邦或城邦联盟规模的古城址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这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青州、淄河、邹平、临朐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地理文献所记载的營丘、蕤水等该地区附近的

① 秦岭:《中国山东龙山文化桐林遗址的调查、发掘与初步收获》。

② 王守功:《山东龙山文化》,2004年。

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古城邦的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 之第一位"陬(子)"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 青州:该地名始见于《尚书·禹贡》之"海岱惟青州",今则沿用为山东省县级市之市名,而根据"干支密码","青"作为地名其本义是代指地支守护神"青章=陬(子)";
- ★ 淄河:该河流名始见于《尚书·禹贡》之"潍淄既导",今仍沿用,而根据 "干支密码","淄"通"孳"、"訾",训孳生,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 "陬訾(子)";
- ★ 鄒平:该地名据《水经注》可知系源出于"鄒侯国",自见于《汉书·地理志》以来一直沿用至今,而根据"干支密码","鄒"通"媰(娵)",训媰孕,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娵訾(子)";
- ★ 临朐:该地名兼山名据《水经注》可知系源出于"朐瀰水",《国语》又作 "具水(朐水)",今仍沿称"弥河",而根据"干支密码","朐"通"姁(嫗)"、"煦", 按《禮·樂記》训煦嫗、孕育,"弥"为"嫛弥"之略称,古指婴儿,故"朐瀰"作为地 名其本义无非也是代指主司孕育和子息的地支守护神"娵(子)";
- ★ 營丘:即今临淄,该古城名始见于《史记·齐太公世家》,此外《尔雅·释地》所谓九州之一的"齐曰營州"、《汉书·地理志》所谓"或曰营丘"的"营陵县"(今昌乐)皆由此古城名比附挪用而来,而根据"干支密码","營"作为地名其本义很明显就是代指地支守护神"營室=陬(子)";
- ★ 蕤水:即今昌乐县尧河,该古河流名始见于《水经注》"蕤水……俗亦名之为青水",而根据"干支密码","蕤"训"草木實甤甤"即开花结籽、繁育,"蕤"与"青"作为地名确实可互训都是代指地支守护神"青章=陬(子)"。

(2) 五鸠氏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桐林遗址"附近地区的顶级地域名称最初一定是与地支守护神"娵(子)"有关,那么,我们要想找到其最初的主人就十分容易了。因为,中国史料对于"桐林遗址"所在的齐国故地之历史沿革早就有着十分明确的记载。

《左传·昭公二十年》云:"晏子對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齐)太公因之……"

《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祝鸠氏,司徒也;鵙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

显然,以"桐林遗址"为首的龙山文化城址群其 4 600 年前真正的主人其实就是以"爽鸠氏"为首的"五鸠氏"族群:因为按照"干支密码","鸠"与"聚(娵)"古为通假互训字,正如《尔雅·释诂》所言"鸠,聚也","鸠"作为顶级地名兼国族名本都是代指主司聚合孕育的地支守护神"聚=娵(子)",其与青州、淄河、邹平、临朐、營丘、蕤水等诸多本地地名完全是等价同源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从"桐林遗址"周围连续分布着"边线王"、"丁公"、"李寨"、"西朱封"等姊妹城址或次中心聚落的多元联盟式地缘政治结构来看,其与史载"五鸠氏"的"五合一"政治联盟结构也是可以很好地吻合的。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临淄桐林龙山文化城址群"其实就是先商时代"五鸠氏"城邦的废墟,它是"少皞氏"王朝(城子崖遗址)最重要的姊妹盟邦和最富裕的臣属方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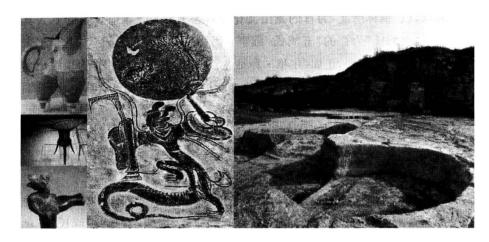
(3) 五鸠氏守护神"娵(子)=女娲(子)"与齐文化的起源

齐国故地"青州"真的像《尔雅·邢昺疏》说的那样是因为位居"东方少阳 其色青"所以才被称为"青州"的吗?齐国故城"营丘"真的像《毛诗正义·孔颖 达疏》说的那样是因为该城被"水所营绕"所以才被称为"营丘"的吗?毫无疑 问,通过以上分析,"干支密码"现在已经可以准确地告诉我们这些历史地理学 "干古之谜"的谜底:原来,"青州"的本义是指"青春生育女神"守护之地而非 什么"东方青色"之地,"营丘"的本义是指"营室星神"守护之城而非什么"水所 营绕"之城。总之,他们最终极的来源都是同一个古老的神话信仰:"五鸠氏" 城邦的守护神"娵"。

而事实上,除了以上这些片言只语的地名,"五鸠氏"的守护神"娵"留给齐国故地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娵"神原本并不是别人,她其实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家喻户晓的女神"女娲"和"嫦娥"之历史原型(图 5 - 2)。

上古的"娵"神为什么就是"女娲"和"恆娥(嫦娥)"之同一尊神祇?因为, "妈(窩)"古通"婐(窠)"训窩窟、窠巢、營室,"恆"训子孫綿恆有保障,而"娥(wo)"古音也通"妈(wo)","妈"、"恆娥"作为神祇名都是代指地支第一位"营室=青章=陬訾(子)",故"娵(子)=女妈(子)=恆娥(子)"成立。当然,除了"女娲"和"嫦娥"这两种在后世被人格化了的女神形象,古老的"娵"神信仰留给中国文化的还包括了如下这些更加"原生态"的非人格化象征符号。

A. 月亮和桂。正如《楚辞·天问》之"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所描绘的,月



球由于其视觉形象天然存在着盈亏圆缺的天文学周期变化,它毫无疑问会被 初民用来象征妇女在怀孕期间的腹部体积变化或者动植物生命体的母死子继 "死而复苏"变化,所以月亮无疑是生育女神"女媧=恆娥"的天然头号象征物。 当然,鉴于本属"恒星"的营室星座和本属"行星"的月球毕竟是两种独立的天 体,所以中国古人实际上是把营室星座之女神"女媧"和月亮女神"恆娥"看作 是一对"二位一体"的合璧双神的(在中国占星学中,赤道十二星座之神共有七 尊是与七大行星神祇配对的"二位一体"双神,详说参见下文),也就是说,她们 最早是神话职司完全相同、在某些场合下仍可被视作单一神格的。例如,在汉 画像砖石中,"女媧"与"恆娥"两者就都被画成是"人身蛇尾"和"捧月"造型之 女神,足见这两者在中国神话中的"二位一体"之渊源(也就是说,女娲的专利 造型"蛇尾"被借给了嫦娥,而嫦娥的专利造型"捧月"也被借给了女娲,参见图 5-2)。此外,正如前述,在中国神话中,日月星辰都是居住在各种神树上的, 所以月亮居住的神树"月桂"当然也是"娵=恆娥(子)"的另一象征物。不过, 根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的"有青樹,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云云 可知,月亮神树的原名本叫做"青树"、"姖木","炬(柜)"通"嫗"训煦嫗、娵育, "桂"即"柜"之俗字,都是代指"娵=青章(子)"。

B. 蚌蛤和蟾。正如《大戴礼记》之"蚌蛤龜珠,與月盈虧"所描绘的,蚌腹 生珠无疑天然与母腹生子有异曲同工之神似,而明珠又与明月之圆形、洁白光 亮相类似,且蚌壳开阖与月相盈亏也相类似,故蚌蛤珍珠无疑是生育女神兼月亮女神"女媧=恆娥"的又一主要象征物。不过,与蛤比起来,月中蟾蜍的神话无疑更广为人知,正如《淮南子》所云:"月照天下,蝕於詹諸(蟾蜍),"蟾蜍这种能冬眠后"死而复生"的动物无疑也是"死则又育"的月亮女神之最佳象征物(参见图 5-2)。

C. 混沌袋和蛇尾。混沌袋(包括人兽胎胞、鸟卵、蛇卵等等)自然是代表着生育,而蛇交尾也是牝牡交合之通喻,故这两者常被作为生育女神"娵(女媧)"的最基本造型元素,并被一起绘入了《楚帛书•陬神图》。而后世的女娲则以人身蛇尾为其"专利造型"。

D. 鸟巢。鸟兽之巢穴(当然也包括人造之窟室闺房)自然是喻义着夫妻 育儿之场所,此为"营室"星座的原始含义之一,已见前述。

E. 鸠鸟。正如今本《诗经》开篇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所描绘的,鸠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求偶生育之象征物。而事 实上,从古文字学上说,"鸠"字的本义也并非是指生物分类学上的具体某一种 鸟,而是指所有会成双结对鸠合团圆的鸟类(不管是形式上的还是实质上的); 或者,更精确地说,"鸠"的本字其实就是"隹",最早的中国人是以"隹(鸠)"作 为禽类的泛称的①,所以《左传》所谓的"五鸠"之中才会既包括了猛禽鹰类的 "爽鸠"、鹗类的"鴡鸠",也包括了布谷鸟类的"鸤鸠"、鸽类的"祝鸠"和"鹘鸠" 等等。至于从神话本身来看,中国古人不仅认为鸠鸟与鸟巢、鸟卵这两种生育 女神的象征物有关联,更认为鸠鸟与蚌蛤、月亮这两种月亮女神的象征物也有 关联,例如《礼记·月令》所谓的"雀(隹)人大水爲蛤"就说明了鸠(隹)与蚌蛤 在中国神话中本为一物所化,"鸠=蚌蛤";而《楚辞•天问》所谓的"夜光何 德……而顧菟在腹"更说明了月亮(夜光)在中国神话中本来就是由一只名叫 "菟"的神鸟所变,因为菟通鵵(鶅鵵),本就指鸟类(至于后世人常把"顧菟"解 读为"月中的玉兔"则完全是张冠李戴)。而《大戴礼记》所谓的"蚌蛤龜(鸠) 珠,與月盈虧"则最终告诉我们,这只由蚌蛤所化的名叫"菟"的月亮神鸟其实 也属于"鸠"类,因为"龟"古音"阄(鳩)",能够"與月盈虧"的神物"龟珠"其实就 是"鸠珠",可见中国早就有"鸠=月亮"的神话。总之,事实证明,信奉生育女

① 《说文》云"隹,鸟之短尾总名也",可见《说文》对"隹"字的定义与《左传》对"鸠"字的实际应用("五鸠")是若合符节的。再加上"隹(zhui)"、"鸠(轨 gui)"二字古音相近,且都有"鸠集(隹)"之义项,而《尔雅·释鸟·注》也有"隹,今鴉鸠"的记载,足证"鸠=隹"不浸。

神兼月亮女神"娵"的上古"五鸠氏"城邦其之所以把自己的国族号定为"鸠"是绝对有其充足理由的。

F. 小人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云"有小人國,名靖人",可见"女娲= 青章"守护之地"青(靖)州"也是神话中的"小人国"之所在,因为生育女神"女 娲"的神职就是生养、哺育小儿,"小人国"即"小儿国"之讹传。

G. 少司命。已见前述。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地支第一位星神"娵=女娲"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发展脉络,那么我们对该女神守护之地"五鸠氏"城邦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评价了。因为,根据"干支密码"破译的古文献证据,我们知道,以"女娲"信仰为标志,"五鸠氏"城邦至少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贡献过两项重大的发明,那就是后世儒家文化的直接源头"职官文化"和道教文化的直接源头"神仙文化"。

关于中国职官制度的最早起源,《左传》对此早有明确的记载,那就是古东夷"少皞氏"城邦和"五鸠氏"城邦早在西元前 3 千纪就实行过的所谓"鸟师而鸟名"即"鸟名官"制度。对于"少皞氏"而言,其中央政权的"鸟名官"共设有"一正四司"五大机构:除了由王族充任的总摄政官"凤鸟氏历正也"之外(因为《左传》明言"凤鸟氏"就是"高祖少皞挚"所属宗族),其下还设有"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这"四鸟"行政分工组织;而同样的,对于"五鸠氏"而言,其中央政权的"鸠名官"也共设有"一宗四司"五个机构:除了由其王族宗室充任的最高独裁官"爽鸠氏司寇也"之外(因为《左传》也明言"爽鸠氏"是"五鸠氏"的总代表,其属王族无疑),其下也是设有"祝鸠氏司徒也,鴠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鹘鸠氏司事也"这"四鸠"行政分工组织的。

那么,在这两个明显是一方抄袭了另一方的古老城邦之中,究竟是谁抄袭了谁的发明,究竟谁才是"鸟师而鸟名"制度的始作俑者呢?毫无疑问,根据上文我们对"鸠鸟"神话的分析,我们知道此制度一定是最早诞生于"五鸠氏"城邦而非"少皞氏"城邦的,因为,"少皞氏"城邦的守护神是位列地支第五位的"皞=皋(辰)"星神,而"皋"的神话象征物中并不包括任何鸟类(详说见下文),而与之相反,"五鸠氏"城邦的守护神"娵=女娲"却恰恰是以"鸠鸟"为其主要象征符号的。此外,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丁公遗址早期小城"等属于"五鸠氏"的古城址其始建年代之早(山东龙山一期)和直接叠压在大汶口文化层之

上的文化延续性也非直接建筑在生土层上的"城子崖古城址"(山东龙山二期)这一"少皞氏之墟"所可比拟的①。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五鸠氏"城邦确实是一个比"少皞氏"王朝(约西元前 2450—前 2300 年)更加古老的东夷古国,其开始建城立国的年代应该在西元前 2600—前 2500 年(山东龙山一期)左右。而其能证明自己确属中国最早之"国家机器"而非"原始部落"的最大证据就是其远在 4500 多年前就发明了的、取名自本国"鸠=女娲"信仰的"鸟师而鸟名"职官文化制度。因为,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这种"鸟师而鸟名"的文化制度其真正的含义是"以国家守护神之名义设置职官"而不是什么"原始东夷人崇拜鸟图腾",当然,事实上这也是全世界目前已知最早的被规范化了的"国家机器"制度:

所谓"祝鸠师=司徒(司土)",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一个"国土和人力资源部";

所谓"鴟鸠师=司马",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一个"国防部";

所谓"鸤鸠师=司空(司工)",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一个"工程建设部";

所谓"鹘鸠师=司事(司史)",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一个"文化教育部"。

而高居此"四鸠"行政机构之上的则是所谓的"爽鸠氏=司寇"这一由王族充任的掌管法典刑律和直接向国王负责的摄政王子兼宰相,其地位与古埃及以王子充任的 Tjaty(首席副王)略同。显然,正是因为这种"鸟师而鸟名"本是一种非关"图腾"的世俗官僚制度,其"鸟名"仅仅是徒有其表的神话外衣,所以它才会被另一个信仰有异的"少皞氏"城邦连"鸟(鸠)"字也懒得改动就照单全收了,最终变成了所谓"少皞氏鸟名官"的千古美谈。

当然,除了《左传》的古老记载,关于"鸟师而鸟名"这种古老国家机器的真实存在,我们今天还有诸多更加鲜活的证据可以提供旁证。一方面,我们通过古文字学的分析不难发现,后世中国人的"官场文化"中有很多文化元素无疑就是"鸟师而鸟名"文化在几千年后的直接残留物,例如,战国、秦汉等许多王朝都会把官府颁发的特权权杖做成鸠鸟造型并称之为"鸠杖"(图 5-2),这无疑是直接继承了"鸠=官"这一古老的文化观念;再例如,中国人至今都习惯于把官位称为"官爵(雀)",无疑也是受了"鸟雀=官"观念的直接影响。而另一方面,我们通过阅读近代的报纸还能惊奇地发现,假如计人变种版本,那么"鸟

① 王守功:《山东龙山文化》,2004年,第115—116页。

师而鸟名"这种 4 500 年前诞生的制度其本身直到 100 年前还是活生生地被 我们使用着的: 众所周知,从隋唐到晚清的1300多年间,中国的中央政府核 心机构一直都是比附《周礼》"六官"所设的"六部",而追根溯源,《周礼》所谓的 "六官"则明显是从"五鸠氏"城邦的"四鸠"官制(始于约西元前 2500 年)、"少 皞氏"王朝的"四鸟"官制(约西元前 2450—前 2300 年)以及"有虞氏"王朝的 "四岳"官制(约西元前 2300—前 2100 年)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 因为,"六官" 明显是由春、夏、秋、冬"四官"和"天地官"两部分组成,其中春、夏、秋、冬"四 官"无疑是对上古"四鸠=四鸟=四岳"官制的直接抄袭(《左传》中的"四鸟"号 称分管"启=立春、至=夏至、分=秋分、闭=立冬",《尚书》中的"四岳"也号称 分管"仲春、仲夏、仲秋、仲冬"),至于所谓天官、地官,其实就是正、副宰相,说 到底也是对总管"四鸠"的"爽鸠氏"、总管"四鸟"的"凤鸟氏"、总管"四岳"的有 虞氏"摄政"等等的直接模仿(虞舜称王前其身份就是"摄政"王子,《尧典》称其 主要职司包括"象以典刑、流宥五刑"等也即"司寇"),只不讨其把单一的摄政 宰相拆分成了正、副二相罢了。因此,《周礼》所谓的"六官"虽然就其细节内容 来说并不是对"周官"等上古官制的最准确描述(古今学者多有论述),但就其 主题框架而言则确实是对五鸠氏、少皞氏、有虞氏、夏后氏(《尚书》称其设有 "六卿")等先商时代中国官制的真实追忆,也是对商、周两王朝继承自前朝的 "行政机构设置理论"之真实总结:按《尚书·洪范》中殷商遗民箕子所述,商 王朝虽然机构繁芜、职官众多,但其所遵循的"八政"理论框架仍然是对上古 "五鸠"、"六卿"等简明官制的继承模仿,只不过由于商族是一个上古中国所唯 一仅有的"商业民族",所以其在"六卿"之外还另外增添了"货(财政商业)"、 "宾(外交通商)"这两大本族特色的政务系统而已;而周王朝在将此两项政务 裁并人"六官"之后,在形式上则最终完成了"复古",这就是后来一直被沿用到 20 世纪的"六官"儒家理论之来源。

因此,综上所述,以"爵"这一儒家礼器为纽带,以《周礼》这一儒家经典为标志,我们不难发现,由"五鸠氏"城邦所首创的"鸟师而鸟名"文化确实堪称是中国"职官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当然,除了"职官文化",在"五鸠氏"的诸多文化遗产中,其更能体现齐文 化本身之特色的则非"神仙文化"莫属。众所周知,中国道教的源头本是战国、 秦汉时代的神仙方术思想,而神仙方术的诞生地恰恰就是号称"方士们的老 巢"的齐国。那么,齐国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神仙方术的诞生地和"方士们的老 巢"的呢?显然,在找到了齐文化的真正源头"五鸠氏"之后,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齐国方士们的老祖宗"五鸠氏"城邦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最早的"神祇朝拜中心"和"神话纪念圣地",而从"神话中心"变成"神仙老巢"不过就是一步之遥。

根据前文的综合分析,我们知道,中国的"十二地支星神"虽然在天文学上的地位是很平等的,但在占星神话中的地位却并不平等而是有尊卑先后之分的。而按照一种最古老也最自然的排位原则,在子、丑、寅、卯等地支排序中排在第一位的生育女神"卿一女娲(子)"原本无疑是辈分最高的"一号大神",所以,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保留的"常羲(恆娥=女娲)生月十有二(十二月神)"和《淮南子·览冥》保留的"女娲补天"等神话中,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将"女娲"视为"众神之母"和"开天辟地之大神"的古老信仰观念。而据此最古老的神话逻辑去推理,我们首先就能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五鸠氏"城邦既然是众神之母"卿一女娲"的"地方崇拜中心",那它必然也是包括"卿"神在内的所有"十二地支月神"之总祭祀中心,这就像古希腊众神之神"宙斯"的"地方崇拜中心"奥林匹亚城其同时也是所有"奥林匹亚十二神祇"的总祭祀中心一样。因此,基于这种"女娲生十二月"本为众神之母的神话,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谓的"有女和(娥)月母之国"绝非是指别的国度,其本就应该是指"五鸠氏"这个"十二月神之母"守护之国。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五鸠氏"城邦在 4 500 多年前原本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头号圣地",那么我们对齐国地区在 2 000 多年前能够再次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求仙圣地"也就不难理解了,试看邹衍、徐福、李少翁、于吉等等,为什么这些最神秘的方术高人都是出自齐国故地的周围? 试看齐威王、燕昭王、秦始皇、汉武帝等等,为什么这些最伟大的帝王都要把寻找神仙的目标地点锁定在齐地的所谓"海外三山"? 显然,这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巧合,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此地本就是神话文化积淀和巫师人才储备最丰富充足的宝库。

当然,除了以上的理论推理,最终能够直接证明"神仙方术"和"神仙道教"本是源于先齐守护神"娵=女娲"及其统帅的"十二地支星神"的证据,则还要数既见载于《史记》也同时至今犹存的所谓齐地"八神"之祭祀遗迹。据《史记·封禅书》以及同书的韦昭注可知,中国目前已知的有史可考的最古老宗教圣地,即"天主、地主、阴主、阳主、日主、月主、星辰主、四时主"这"八神"的地方崇拜中心,其地理位置都是分布在齐国故地或其周边。而对照《山海经》、《楚

辞》、《楚帛书》等神话文献,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上这所有的八大圣地其祭祀对象无不都是与"娵"神有关的:他们的历史原型不是"娵"神本身,就是"娵"神生育出的"十二地支"群神。

A. "天主"。"天主"又名"天齐",《史记·索引》对此注解得很明白,"临菑城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齐也",也就是说,"天齐"的本义就是天之肚脐。但是,对于这种由地下水涌出地面而形成的泉眼而言,它本应该叫"地脐渊"才对,它现在又凭什么偏偏叫"天脐渊"?很显然,这只有联系到临淄先民所崇拜的本地守护神"娵"才可以得到圆满诠释,也就是说,临淄人所谓的"天脐"其实本就是指生育女神"娵",因为"娵"本就是代表了营室星座和月亮的天神所以称"天",因为"娵"本就掌管母腹生育和腹脐怀胎所以称"脐"。总之,齐人尊"天脐渊"为宗教圣地其实就是为了永久奉祀其最尊崇的本地守护神"娵"("天齐渊"泉水在1975年之前犹未干涸,参见图5-2)。

B. "月主"和"日主"。顾名思义,莱山圣地(今龙口县)所奉祀的"月主"当然就是指月亮女神"恆娥(嫦娥)",也就是先齐守护神"娵"的另一重要化身。至于成山圣地(今荣成县)所奉祀的"日主",其实也是"娵(子)"统帅下的"十二地支神"之一即"相(午)"之化身,此二神的"月、日配"实即"子、午配"也(详说见下文)。

C. "阴主"和"阳主"。正如前文已述,在所有的"十二地支星神"中,中国民间对之祭祀最多的就是生育女神"娵(子)"和长寿之神"且(巳)"这两尊神职互补的男女双神、《楚辞》特称之为"少司命"和"大司命",因为他们都是直接掌管人类生命的神。而很显然,按照汉语"阴阳"本可代表"男女"的古老定义,齐人所谓的"阴主"和"阳主"无疑与楚人所谓的"少司命"和"大司命"在神话概念上是完全等价的,三山圣地(今莱州)奉祀的"阴主"当然就是指掌管创造生命的女神"娵(少司命)",之罘圣地(今烟台)奉祀的"阳主"当然就是指掌管延长寿命的男神"且(大司命)"。

D. "四时主"和"星辰主"。顾名思义,琅琊圣地(今胶南)奉祀的"四时主"和"星辰主"当然是指春、夏、秋、冬四季之神和周天十二星座之神。而根据战国《楚帛书》的图文并茂之明确记载可知,战国齐人所谓的"四时主"其实就是指十二星神中的"秉司春(寅)"、"且司夏(巳)"、"玄司秋(申)"、"涂司冬(亥)"这四位星神,因为作为月份之神他们本身就分别代表了四季的首月即孟春月、孟夏月、孟秋月、孟冬月,所以他们又可进一步凭着其作为每季"老大"的地位

而总管四季,就像"娵"可以凭着其作为岁首"老大"的地位而总管一年十二个 月一样。

E. "地主"。顾名思义,泰山梁父圣地(今泰安市)所奉祀的"地主"当然就是指"东皇泰一=皋(辰)"即"夏至祀地"之农神(地腊神),而该神也是"娵"所生的"十二地支神"之一(详说见下文)。

因此,综合以上的"女娲生十二月"神话和"齐地八神"证据,再加上我们在 齐国故地"山东龙山文化"诸遗址中发现的最典型陶礼器鸟形三足"鬶"之佐证 (图 5 - 2),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以下的重要结论:

其一,对于战国、秦汉时代齐国地区的神仙方术文化来说,我们确信其直接的文化源头就是齐国本地的"十二地支星神"信仰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确信,中国神仙道教的"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之核心思想其实就是直接脱胎于先齐文化的"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喻义脱胎复活、不死永生)"之"月母不死"神话思想的,因为月神"恆娥(娵)"本就是先齐的守护神("月母不死"后来即演绎成著名的故事"嫦娥偷吃不死药")。

其二,对于齐文化本身来说,我们确信其直接的源头就是 4 500 年前"五鸠氏"城邦的守护神文化即"女娲—嫦娥文化",也就是"桐林—丁公"诸龙山文化遗址那著名的"鸠形陶器文化",毕竟,无论是对于像"天齐渊"这样的天然"地标"来说,还是对"龙山文化白陶鬶"这样的考古"地标"来说,它们都是谁也无法视而不见的,它们都是"女娲守护神"亲自遗留下的最过硬实物证据。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齐地方史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齐国故地的顶级地名和文化特征找到了该地"桐林遗址"等古城的主人"五鸠氏",那么我们无疑就可以据此初步复原出一份真正拥有考古学依据的"先齐"地方史了。而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年》的明确记载:"晏子對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齐)太公因之",我们可以将"先齐"地方史的编年框架直接复原如下:

其一,约西元前 26 世纪,正如上文所述,以"爽鸠氏"为首的"五鸠氏"族群建立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规范化"国家机器",即由一位宰相(王子兼司寇)统领的"四鸠"行政机构,并成为第一个载入信史的汉语土著城邦。

其二,约西元前 25一前 19 世纪,"五鸠氏(浑敦氏)"城邦继续保存了其本地文明,但她已降格成为了新崛起的"少皞氏"、"有扈氏"、"有穷氏"、"有易氏"等历代东夷总盟主的称臣纳贡之国。

其三,约西元前19一前17世纪,在中原政局的变动下,"五鸠氏"城邦的名义宗主国改成了夏王朝的同盟封国"顧国",而"顧国"的末代国君名叫"季荝",此即《左传》所谓的"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

其四,约西元前 17—前 13 世纪,"五鸠氏"被其邻居"逄国(少皞氏后裔)" 所吞并,而"逄国"的开国国君名叫"逄伯陵",此即《左传》所谓的"有逢伯陵 因之"。

其五,约西元前 13一前 11 世纪,"五鸠氏"故地被"肇域彼四海"的商王武丁并吞,建立了殷商血统的"蒲姑国",此即《左传》所谓的"蒲姑氏因之"。

其六,约西元前 11 世纪,在周公东征之后,追随殷王武庚反周的殷遗民 "蒲姑国"终于被消灭,周王朝把"蒲姑国"之土地和遗民都分封给了其新征服 者"太公望(吕尚)",建立了姜姓齐国,此即《左传》所谓的"而後太公因之",当 然,为时长达 1 500 年的"先齐"地方史至此也就宣告结束了。

(关于季前、逢伯陵等人的来龙去脉详见下文。)

二、平顶山蒲城店龙山文化 城址群与有仍氏考

众所周知,今河南省汝河流域和南阳盆地在 2 800 年前本为姬姓應国、姜姓申国等诸侯的领地。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本世纪新发现的"平顶山蒲城店龙山文化城址"(图 5-1)等汝河、南阳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應国和申国这对古老的姊妹城邦,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还远远可以追溯到 4 000 多年前的"龙山时代"。

(1) 蒲城店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蒲城店遗址位于今平顶山市东约9公里的卫东区东高皇乡 蒲城店村北,其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面积约4.1万平方米(另发现有二里头早期的城址面积约5.2万平方米)①。此外,在该城址的周边地区,还有若干个规模不等的姐妹城址或聚落遗址,例如方城平高台龙山文化城址等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纵横近百公里的古城址群和古聚落群。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占地广阔且跨越了龙山和二里头两个时代的古城址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平顶山蒲城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5 期。

群,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 找到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汝河、舞阳、犫河、叶县等该 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谢国、北筮山、慎阳、 都国、應国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城址群的主人们无疑应该 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二位"如(丑)"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 汝河:该河流名始见于《诗经·汝坟》,今仍沿用(但其干流历经改道,今已变成了南汝河与北汝河两条河流),而根据"干支密码","汝"同"如",作为地名其本义明显就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如(丑)";
- ★ 舞阳:该地名原作"潕陽",据《水经注》可知系得名于潕水,古共有"潕阴"、"潕阳"两县,今仍沿用为县名,此外,春秋的许国迁到今叶县后也被称为"鄦国",而根据"干支密码","舞"通"武"训奋武,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赤奋若=如(丑)";
- ★ 犫河:该河流名始见于《史记》等,今仍沿用,古时其附近更设有犫邑、 犨县等,而根据"干支密码","犫"通"啁",训啁鸣号叫,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 指地支守护神"元号=如(丑)";
- ★ 叶县:该河流名始见于《左传》等,今仍沿用,而根据"干支密码","叶(莱)"通"泄"训发泄、奋发,"莱"作为地名其本义就是来源自上古的地支守护神"赤奋若=如(丑)";
- ★ 谢国:即今南阳市,该古国名始见于《诗经·崧高》之"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以及《左传·定公元年》之"仲虺居薛(谢)",此封国即周王母舅姜姓申国之前身,本为商王室分支"奚仲氏"族长"仲虺"的领地,周代被赐姓"任",而根据"干支密码","谢"、"薛"古音通"泄"训发泄、奋发,"谢"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来源自上古的地支守护神"赤奋若=如(丑)";
- ★ 北筮山:即今南阳市卧龙岗,该古山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山前还有"南筮聚",而根据"干支密码","筮"古音"曳"(见《集韵》),可通假"泄(洩)"训发泄、奋发,"筮"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来源自上古的地支守护神"赤奋若一如(丑)";
- ★ 慎阳:即今正阳县,该古地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等,附近则有同名的"慎水",而根据"干支密码","慎"通"嗔"训嗔怒、怒号,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元号=如(丑)";
 - ★ 鄀国:即今南阳市西部,该古国名始见于《左传》,此外也见于《鄀公平

侯鼎》等出土金文,而根据"干支密码","都"作为地名其本义明显是代指地支守护神"赤奋若=如(丑)";

★ 應国:即今平顶山市,该古国名始见于殷墟甲骨卜辞、西周金文以及《逸周书》等,据《括地志》该地又有應山、應水等,而根据"干支密码","應"通 "鹰"训鹰扬奋武,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赤奋若=如(丑)"。

(2) 有仍氏者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蒲城店遗址"之主人的明确范围,即该先商古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如(丑)"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城邦,那么,我们要找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时代属于先商"和"国名干支属丑"这两大条件的古国在可靠的中国史料记载中明显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有仍氏",其他文献或写作"有披(戎)氏":

《左传·哀公元年》有云:"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有云:"昔有仍氏生女······有穷后羿灭之······"

《左传·昭公四年》有云:"夏桀为仍之会……"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戎(仍)"古通"汝(乃)"(见《诗·大雅·注》),训嗔怒(汝)、戎武,"有戎氏"作为顶级地名兼国族名无疑就是代指主司鹰扬奋武的地支守护神"如(丑)",其与汝河、舞阳、犨河、叶县、谢国、北筮山、慎阳、都国、應国等诸多"蒲城店遗址"附近的顶级地名是完全等价同源的。因此,"有仍氏"作为一个既能满足年代跨越龙山和二里头两时代(夏后相、有穷后羿如前所述皆属于西元前20世纪左右龙山时代末期的人物,夏桀则为二里头时代的人物),又能满足国名干支含义属于"丑"的著名古国,其地理位置和废墟遗迹只可能是指"蒲城店遗址"而不可能是指其他时空的古文化遗址。而另一方面,我们从考古学发现的今汝河流域和南阳盆地一直都是二里头文化(夏后氏文化)的主要分布区这一点上看,该地区能够成为夏王朝王后"缗"和太子"少康"的娘家兼首选逃难地也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的,正如《史记·货值列传》所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谓之'夏人'","有仍氏"的地理位置原就该位于此夏都西南大后方的"夏人老巢"之地。至于后世有的注疏家把"有仍氏"说成是位于今山东金乡或济宁,则完全是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先商时代之地缘政治格局相违背的,众所周知,金乡或济宁地区当时乃是"东夷人的

老巢"和岳石文化广为分布的大后方,夏王少康又怎么可能逃到杀父仇人的老 巢地区去寻求避难和支持其复仇"中兴"?夏王桀又怎么可能跑到世仇的敌人 老巢那里去开什么"同盟大会"?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平顶山蒲城 店龙山文化城址群"其实就是先商时代"有仍氏"城邦的废墟,它是"夏后氏"王 朝及其前身"有崇氏"城邦(王城岗遗址)的最重要姻亲盟邦和臣属方国。

(3) 有仍氏守护神"如(丑)=應龙(丑)"与应申文化的起源

当然,除了"有仍氏"、"應国"、"谢国"等地名,"如"神作为一尊历时几千年的本地守护神,其能留给汝水、南阳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如"神原来并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山海经》中著名的超级战神"應龙"之历史原型——关于该神的造型,我们至今还可以从南阳地区出土的诸多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亲眼见到(图 5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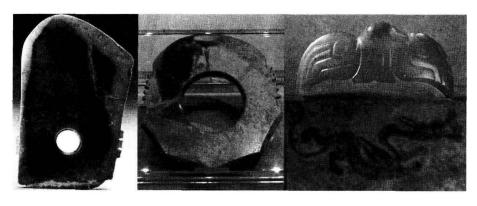


图 5-3 如神=應龙的象征物:龙山文化的奋羽状扉齿玉威(前 3 千纪)、二里头文化的玉璧威(前 19—前 16 世纪)、西周應国墓地出土的玉鹰(前 11—前 8 世纪)、汉代應龙画像石(前 202—220 年)

上古的"如"神为什么与"應龙"本是同一尊神祇?因为,除了一望而可知的"應"通"鹰"训鹰扬奋武,"應(丑)=赤奋若(丑)=如(丑)"成立这一"干支密码"证据外,我们从《山海经·大荒东经》描述的"應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这一神话本身也能看得出来,"應龙"作为一位能够战胜中国最著名的战神"蚩尤"的超级战神,其神话职司无疑是与"如三元号"星神的奋武怒号之名是完全相称的。不过,除了"應龙"这一瑞兽神龙形象,古老的"如"神其实还给中国文

化留下了更多其他的象征物符号或等价化身,其中有些化身的知名度甚至比 "應龙"本身还要高,例如"太岁"等等,下面仅举几例:

A. 噎鸣。据《山海经·海内经》之"后土生噎鳴"以及《山海经·大荒北经》之"后土生信"两条记载可知,"如(丑)"神在上古中国神话中原本还有另外两个重要的别名,即"噎鳴(丑)=信(丑)","信"古通"伸(呻)"训呻吟号鸣。而关于"噎鸣"的具体造型,《山海经·大荒西经》也有明确的记载,即"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上,名曰嘘……下地是生噎(珂案:即嘘),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可见,"噎鸣(丑)"原本就是上古星座"嘘=虚(丑)"之别名,今本《山海经》的"袁珂案"注解无误,而"噎=嘘"神的"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上"之造型,我们则完全可以从《楚帛书·如神图》所描绘的人面、鸟身无臂膀、头上长脚之神祇造型得到最直观的印证(参见本文第一篇)。

B. 岁星和若木。《山海经·海内经》有云"喷鳴生岁十有二",显然,按照 《山海经》神话的一贯逻辑可以推知,正如能够"牛月十有二"的"常羲=恆娥= 娵"其本身即兼为月神一样,能够"生岁十有二"的"噎鸣=如"当然其本身也即 兼为岁星之神。而根据"干支密码","歲"通"噦"、"翽",其本义为鸟鸣如铃、翽 翽奋飞,就是"噎鸣=赤奋若(丑)"的意思,而甲骨文的"歲"字形同武器,也是 代表了"如(丑)"星神这尊超级武神。那么,"如(丑)"神为什么会被中国古人 视为兼职的岁星神呢?因为,上古中国的北方居民本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出纳 火"生活作息制度,即半年蛰居户内(半地穴建筑)围着长明火过冬,半年熄火 迁居户外(草庐席棚)农作。而这两个半年的关键交替日期就是仲秋月的"纳 火"又称"改岁",正如《诗经·豳风·七月》有云"十月蟋蟀人我床下,穹窒熏 鼠,塞向墐户……曰为改岁,人此室处"(周历十月即夏历八月仲秋)。所以,黄 河流域的先民就以"虚=太岁(丑)"星座当令的仲秋月作为新的一个"生活年 度"的开始标志(《尧典》:"星虚以殷仲秋"),并称一年的长度为"一岁"。而另 一方面,由于木星是颗著名的纪年天体,大致每岁移动一个星次,其天文学意 义与"如=虚"星座类似,故古人最终就将这两者配对成"二位一体"的双神,并 称木星为"岁星"。而由此也可见,中国人为什么至今都说"岁"是一颗凶星, "太岁"头上不能动土了,因为"太岁"星其实本就是一尊以凶悍威武、号叫怒哧 为其职司的超级战神。当然,作为一种最主要的星辰,正如月亮有其神树"妒 格"、太阳有其神树"扶桑"一样,十二颗"岁星=赤奋若"也有一颗叫"若木"的 通天神树专门来承载(见《山海经・海内经》)。而此神树也是后世所谓的"蟠

桃仙树"之原型:"桃(啕)"训号啕,即"元号=岁星(丑)"。

- C. 干戚。《韩非子·五蠹》有云"执干戚舞";《诗经·大雅·公刘》有云 "干戈戚揚"。自然,作为"武"和"舞"的标志性道具,干戚天然就是奋武兼舞蹈 之神"如"的象征物。此外,据《礼·檀弓·注》"戚,憤恚也"可知,"戚"还有憤 恚、怒哧之意,也是指"赤奋若(丑)=如(丑)"。可见,肇始于龙山文化时代的 中国著名古礼器"玉戚"原本应该就是"如"神信仰的产物(图 5-3)。
- D. 鹰。《史记·天官书》有云"岁星一曰應星";《楚辞·天问·王逸注》有云"有翼曰應龙"。可见,无论是行星"岁星=應星"还是恒星星座"元号=應龙",其名字和造型都是离不开"鹰(應)"、"鹰翼"这类象征符号的。毕竟,"應龙"神名字的本义就是鹰扬奋武。
- E. 舞雩神。《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也就是说,"應龙=怒=嘘"除了是武舞神之外,还兼为超级风雨神,蚩尤和夸父这对风雨神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因为他的"怒"气能"嘘"成风化成雨。所以,后世中国人都把婆娑起舞视为求雨秘诀(见《周礼·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地支第二位星神"如=應龙"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发展脉络,那么我们对"應龙"神信仰与汝水南阳地区的诸多地方文化特征之联系就会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了。

例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为什么要说"應龙处南极"?如前述,在天文学和占星学上,"應龙=虚(丑)"星座所代表的方位应该是北偏东方向,与南方无关。但现在通过历史地理学的考证,我们现在终于知道,这个"應龙处南极"的说法本来是源自地理学而非天文学的,因为"應龙"神守护的上古城邦"有仍氏(應国)"本来就是龙山文化十二城邦之最南一国(参见图 5-1)。由此,我们再一次印证了"蒲城店遗址"确实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仍氏之墟"。

又例如,《史记》为什么会说"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俗杂好事……故至今谓之'夏人'"?显然,比照"先應"、"先申"文化本来就是一种崇拜武神"應龙"和崇尚忠勇威武的文化来看,这也丝毫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后世以忠勇、好武、好事为特色的南阳地方文化显然是直接继承了其本地祖先"有仍氏"这支夏人母族的影响。

再又例如,今天的河南省平顶山市为什么会把"鹰城"选为了自己的城市

别名,并把本地西周應国墓地出土的"玉鹰"定为了自己的城市市徽(图 5 - 3)? 虽然,就该事件本身来说,这纯属是一个历史的巧合:因为 1986 年的平顶山 人既不知道"地名干支密码",也不知道"鹰"其实是象征着地支第二位星座"如 (丑)"而不是什么上古的"鹰图腾";但是,假如我们把该事件放在四五千年以 来汝水南阳地区的文化大背景下来看,那么我们也许就会说这并非是什么巧 合了,因为在西周地名的一个"應"字和西周文物的一个"玉鹰"这两者之间的 汉语语境联结其本身就并非巧合,而是一种"應龙"文化在该地无孔不入影响 下的历史必然。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應、先申地方史

关于姬姓應国、姜姓申国之前的豫西南地区之地方史,本来除了《史记》记载的"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寥寥数语而外,毫无疑问纯属一片空白。不过,在我们找出了"蒲城店遗址"原主人的真名"有仍氏"之后,这种令人遗憾的历史空白状态无疑即将得到改变。因为,只要我们按照"干支密码"的指引去重新解读各种史料,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的"先應"、"先申"历史其实早就被记录在案,该地区性古老文明所创造的历史无疑是"广义先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关于"先應"、"先申"的历史人物,通过"干支密码"的帮助,我们无疑马上就能在中国史料中直接钩稽出如下这些响亮的名字,从而彻底弥补本地区至今还没有先商史实人物的历史空白。

其一,后缗(约西元前 20 世纪),先商时代的有仍氏公主,夏王"相"的王后、夏王"少康"的母亲,夏王朝复国的头号女英雄。而按照"干支密码","缗"为"敏"之假借字,训"武敏(武奋)"即地支第二位"赤奋若(丑)","敏(缗)"显然是代表其娘家母邦"有仍氏"的氏称,这一点与我们前文多次论述的先商女子有氏无名或名从父兄丈夫的习俗是完全一致的。(按,先商时代有"氏"无"姓",或者说是"氏"、"姓"合一,"敏"大体相当于商周时代的"姬"、"姜"之类,是用以标志女性的族属国别之称谓。)

其二,女艾(约西元前 20 世纪),先商时代的有仍氏国君(或王子),是夏王少康的娘家亲属(母舅、表兄弟或表侄子之类)。而按照"干支密码","女"通"如(汝)",为其族号,证明其族属就是汝河流域的"有仍氏";"艾"则为其私名,干支属天干第九位"孙艾(壬)",证明其名并非杜撰。而据《左传·哀公元年》记载的"少康……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云云可知,他正是"少康中兴"的两大名将功臣之一。显

然,假如他不是"武斗神之国""有仍氏"的国王或摄政王子,有权力调动"有仍 氏"全族的力量来与当时的超级大国"有穷氏"相对抗,我们是很难想象他仅凭 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出这一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壮举的(要不然中国的"三 代"就不是"夏商周"而是"穷商周"了)。

其三,汝鸠和汝房(约西元前 17 世纪),夏末商初的有仍氏贵族,商汤之大将。按照"干支密码","汝(丑)"为"有仍氏(丑)"的族号;"鸠"、"房"则为私名,干支分属地支第一位"聚(子)"、第五位"房(辰)",证明二人之名皆非杜撰。而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的"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人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云云可知,汝鸠、汝房兄弟和伊尹一样,都是"弃暗投明"的商朝开国功臣,其作为"卧底者"和"策反者"的政治军事角色是完全可与伊尹相比肩的,只不过伊尹策反动员的是"夏后氏"城邦本部,而汝鸠、汝房策反的是夏王朝的娘家老巢"有仍氏"城邦而已。他们还留有题名著作《尚书·女鸠》和《尚书·女房》(已失传)。

其四,仲虺(约西元前 17 世纪),夏末商初的商王族"奚仲氏"之族长,商汤之大将和左相,灭夏后被分封在谢(薛)即今南阳。而按照"干支密码","虺"通"夔",干支属地支第三位"夔(寅)"。其人事迹前文已述。他还留有著作《仲虺之诰》(见引于《墨子》和《左传》)。

而在以上这份"有仍氏"的"武将十间谍式"名人名单之外,我们最终可以复原出的整部先應、先申地方史也是一部以"武力战争"为主题的历史。也就是说,整部"有仍氏"城邦的历史其实共可分为三段,其时间分界点则为两场著名的、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的战争。

第一场战争,就是前述的"女艾谍浇之战"(约前 20 世纪)。其起因前文已述,是源于东夷"有穷氏"王朝的举国千里西征。该战争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防御战,即《左传·哀公元年》记载的"后缗……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有仍氏"显然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而第二阶段则是反击战,"女艾谍浇"无疑彻底取得了成功,使得"有仍氏"及其姻亲之国"夏后氏"彻底避免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后果。

第二场战争,则是至今还鲜为人知的"商汤斩夏耕之战",而实际上这场战争就是经常被后人张冠李戴的"夏商鸣条之战"(约前 17 世纪)。如上所述,"有仍氏"作为"夏后氏"的姻亲族和战略大后方,其命运始终是和"夏后氏"连在一起的。"夏后氏"王朝的第一次亡国危机正是靠逃难到"有仍氏"才得以缓

解复苏。所以,作为第二个同样也想要灭亡"夏后氏"的商汤王来说,其和"有 仍氏"之间早晚必有一战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关于他们之间的战争,中国文 献有没有记载呢? 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发现这是有记载的,那 就是《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谓的"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 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走厥咎,乃降干巫山"。竟 山,据《水经注》"醴水又东南,与皋水合,水发皋山。郭景纯言,或作童山"云云 可知,即今之叶县附近;巫山(筮山),即前述南阳之北筮山。所以,这场所谓的 "成湯斩夏耕之战"其实就是商汤消灭夏桀的残余势力"夏耕"和"有仍氏"之 战,其两大战场章山、巫山皆在"有仍氏"国境之内。至于"夏耕(己)"其人,根 据"干支密码"可知"耕"训天干第六位"耕犁=则(己)",他应该就是《左传》所 谓的"季荝(己)",他是夏王桀的三大同族猛将之一,被《诗经•商颂》称为"苞 有三蘖"的"顧国"之诸侯(关于"顧国"和"季荫"的详细考证见下文)。显然,夏 耕(季前)和夏桀是在"顧国"和夏都"斟寻"都被商汤征服后各自南逃到"有仍 氏"试图东山再起的,此即《左传》所谓的"夏桀为仍之会"。但他们最后还是被 商汤的南征大军所消灭,夏耕更是成了"無首操戈盾立"的厉鬼,此即著名的 "桀败于有戎之虚(有仍氏),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史记・殷本纪》):"有 戎"即"有仍"已如前述,"鸣"即"噎鸣(丑)","条(啕)"训号啕即"玄枵(丑)", "鸣条之野(丑)"当然就是指"有仍氏(丑)"的国土。而经过此惨烈的"鸣条之 战"后,独立的"有仍氏"王国从此就灭亡了,其国土成为了商王的"南土"而被 一分为二,其北部汝水流域被分封给了投降商王朝的汝鸠、汝房兄弟,并继续 沿用了"有仍氏"的干支同义地名"應"(此据《古本竹书纪年》"殷时已有應国" 及殷墟卜辞,当然这是指商代夏遗民之應邑而非周代姬姓應国)。其南部"谢 (薛)"地区则被分封给了商汤的"左相"仲虺(当然,"谢国"的名字也是沿用的 本地旧称),而夏桀在"鸣条"被擒后则被商汤就地放逐,顺古汝水、淮河漂泊南 下去了其最后的流放地"南巢"(今安徽省)。

总之,从大约 4 300—4 000 年前建都"平顶山蒲城店城址"成为"夏后氏"的盟邦开始到最终击退"有穷氏"王子"椒"的进攻为第一阶段(约前 24—前 20世纪),从"女艾谍浇之战"到"夏桀为有仍之会"为第二阶段(约前 20—前 17世纪),从"商汤斩夏耕之战"变成商王畿之"應邑"和"谢人"直到姬姓應国建立为第三阶段(前 17—前 11 世纪),"先應"、"先申"的地方史无疑一直是轮廓清晰而可考可辨的(代替任姓谢国的姜姓申国则建于西元前 9—前 8 世纪),以

"平顶山蒲城店城址"等古城址为基地的"有仍氏"城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相当 重要的地方性文明分支之一。

三、濮阳戚城龙山文化城址与豕韋氏考

众所周知,今河南省濮阳地区在三千多年前本为姬姓衛国的领地。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本世纪新发现的"濮阳戚城龙山文化城址"(图 5-1)等濮阳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衛国作为一个古老城邦,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同样也远远可以追溯到距今 4 600—4 000年前的"龙山时代"。

(1) 戚城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戚城遗址位于今濮阳市区,其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大致呈方形,南北稍长约 405 米、东西稍窄约 390 米,包括四面城墙在内,城址面积初步估计近 16 万平方米,年代则至少距今 4 200 年①。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地处战略关键位置的颇具规模的古城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这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濮阳、大伾山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殷墟卜辞和传世文献记载的攸侯国、顿丘、衛国、兖州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城邦的主人们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三位"秉(寅)"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濮阳(戚城): 濮阳得名于古代的濮水,今为河南省地级市名,戚城为《春秋》之名邑,而根据"干支密码","樸(濮)"通"枹"训枹鼓,"戚"通"鼜(qì)",作为地名其本义都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河鼓=秉(寅)";

★ 大伾山:该山名始见于《尚书·禹贡》,今沿用,而根据"干支密码", "伾"通"噽"、"鼙",训鼙鼓、喜庆,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河 鼓=秉(寅)";

★ 攸侯国:即今延津县胙城附近,该古国名始见于殷墟甲骨卜辞(《合集·36484》等),"攸"通"條(桃)",即《括地志》所谓"桃城在胙城县东"之古"桃

① 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濮阳戚城遗址龙山文化灰坑清理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

城",而根据"干支密码","桃(條)"通"鼗"训鼗鼓,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河鼓=秉(寅)";

- ★ 顿丘: 又作"敦丘",即今濮阳市清丰县,该古地名始见于《诗经·衛风·氓》等,而根据"干支密码","敦(顿)"通"錞"训錞于、金鼓之声,作为地名 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河鼓=秉(寅)";
- ★ 衛国:即今淇县、滑县等地,其中滑县之古章乡即《左传》所谓的"相土之东都",是古章国所在地,姬姓衞国正是沿用其旧名而来,而根据"干支密码","章(衞)"通"韗"训韗鼓,又通"虺"训鼓乐雷鸣(《说文》),作为地名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河鼓=秉(寅)";
- ★ 兖州:即今濮阳、聊城一带地区,古九州之一(非指今山东省之"兖州市"),始见于《尚书·禹贡》之"济河惟兖州(古济水与古黄河之间叫兖州)", "兖州(沧州)"因"沧水"而得名,而根据"干支密码","沧水"古又作"衍水","沧(允)"、"衍"古音皆通"演"训击鼓表演,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河鼓=秉(寅)"。

(2) 豕韋氏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戚城遗址"附近地区的顶级地域名称最初一定是与地支守护神"秉(寅)"有关,那么,我们要想找到其最初的主人就十分容易了。因为,中国古代文献对于"戚城遗址"所在的古衛国之历史沿革早就有着十分丰富的记载:

《水经注·济水注》有云:"濮渠又东迳章城南,即白马县之章乡也。史迁记曰,夏伯豕章之故国矣……"

《后汉书·郡国志·杜预注》有云:"(白马)县东南有韋城,古豕韋氏之国……"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有云:"乐正后夔……生伯封……谓之封豕(豕章)。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

《诗经·商颂·长發》有云:"武王(成汤)载旆,有虔秉钺······韋、顧既伐, 昆吾夏桀······"

《国语·郑语》有云:"大彭豕韋……则商灭之矣……"

显然,以"戚城遗址"为首的龙山文化城址聚落群其 4 200 多年前真正的主人其实就是"豕韋氏(封豕氏、大彭氏、韋国)":因为按照"干支密码","豕(豨)"古音通"喜(施)"训喜庆、旗鼓,"韋"通"韗"训韗鼓,"彭"训鼓声,其作为

顶级地名兼国名、族名都是代指主司鼓乐礼节、击鼓摄众的地支守护神"河鼓=摄提格=秉(寅)",其与濮阳、大伾、顿丘、衛、攸、兖等诸多本地地名完全是等价同源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从"戚城遗址"正处于"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这三种文化的分布交界地之考古学特征来看,其与古文献记载的统治着古白马县章乡(今滑县)附近的"豕章氏"曾屡次成为东夷(有穷后羿)、夏(孔甲)、先商(成汤)这三方轮流征服的对象这一地缘政治结构特点相比,这两者也是可以很好地吻合的。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濮阳戚城龙山文化城址"其实就是先商时代"豕韋氏"城邦的废墟,其别名为"大彭氏",它是有城氏(先商)的姐妹城邦,也是先商、夏、东夷这三大势力集团的交界地和拉锯争夺对象,是整个先商时代的中国地缘政治舞台中心和军事战略要冲。

(3) 豕韋氏守护神"秉(寅)=夔(寅)"与衛文化的起源

当然,除了"豕韋氏"、"濮阳"等古今地名,"秉"神作为一尊历时几千年的本地守护神,其能留给濮阳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秉"神原来并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中国著名的音乐神"乐正后夔"之历史原型。

"乐正后夔"究竟是人还是神?显然,假如仅仅按照古文献的字面意义去读,那么我们是很难分辨清楚的。例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有云"乐正后夔……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显然,比照世界性存在的把神祇当作王朝始祖的普遍现象,例如古罗马的贵族们称自己是战神(Mars)的后裔、古埃及的法老们称自己是太阳神(Amun)之子等等,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封豕氏"(豕韋氏)之始祖"乐正后夔"无疑也有两种可能的身份:其一是史实性的该国先王,其二则是虚构性的该国国神。但是,假如我们考虑到"干支密码"等提供给我们的如下三方面证据,那么我们就会轻松判断出,《左传》、《尚书》等所谓的典乐官"夔"其历史本来面目就是一尊神祇——"豕韋氏"城邦的守护神。

其一,就"乐正后夔"其人的生存年代来说,《左传》称其比有穷后羿的时代略早即是西元前 21 世纪的人物,而《五帝德》等则称其为尧时代即西元前 23 世纪的人物,两者相差几近 200 年,所以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就不具备最起码的资格而更有可能仅仅是个神话传说人物;其二,就"夔"其人的事迹来说,《尚书·尧典》称其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显然已经是一种神祇才具有的

超能力(要是凡人早被百兽撕成碎片了),而《山海经·大荒东经》称其造型为"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人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等等,其"非人"的神话特征更是毕露无遗了;其三,就"夔(虺)"这个本义为"犪牛"、"擂鼓虺鸣"的名字来说,其不但与《楚帛书》之"秉"神的干支属性完全相同,即"秉=河鼓=牵牛(寅)",而且其传说中的世袭圣职头衔"乐正"也是和喜庆鼓乐之神"秉"的神话职司是完全相一致的。因此,比照以上几点证据,我们可以得出的综合结论就是:"乐正后夔"本来的身份应该是神而非人,他其实就是《楚帛书》中的地支第三位神祇"秉(寅)"。

当然,除了"夔","秉"星神其实还有更多别的化身也是很重要的,例如:

A. 牛郎织女。毋庸赘言,作为地支第三位"牵牛(寅)"星座之星神,"秉(寅)"当然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喜庆爱情神"牛郎星"之历史原型(图 5-4)。不过,在最初的占星神话中,牛郎、织女这对"二位一体"星座其名字的本义应是男耕星、女织星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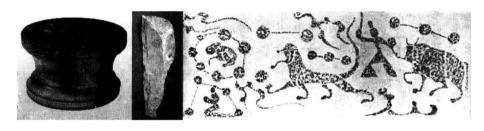


图 5-4 秉神=夔的象征物:龙山时代的陶鼓、石磬(西元前 3 千纪)、 汉代的牵牛织女星座画像砖(西元前 202—前 220 年)

- B. 牛皮鼓和磬。已如前述(图 5-4)。
- C. 喜鹊。《诗经·鄘风》有云"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淫荡无良)",可见将 喜鹊比作男女偷情由来已久,这也是后世所谓"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文化原型。
- D. 伶伦。《世本》有云"伶伦造律吕"。显然,所谓音律始祖"伶伦"也是鼓神"夔"的别名,因为"伶"通"聆"训聆聽,"伦"通"銮"(藍),与星座名"監聽—夔(寅)"字义全同。

而一旦我们认清了"乐正后夔"的守护神身份,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神人混杂的早期文献史料中读出更多的历史真相了。

譬如,对于原本被儒家经典奉为信史的所谓"尧使夔教舞"、"舜使夔作乐" 等等故事(见《大戴礼记·五帝德》),我们现在就可以直接判断出其并非史实 而仅是一段美丽的神话。而这段神话性描写其背后所间接反映的真实历史则是:作为音乐神"夔"守护之地,濮阳地区早在唐尧、虞舜时代就已经是中国"礼乐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中心了。而《尚书·皋陶谟》的一段著名记载无疑也间接反映了"豕韋氏"古国当年的音乐技术水平:"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当然,关于"乐正后夔"带给濮阳本地文化的丰富"音乐细胞"和"礼乐风 教",我们除了可以从上述这些关于"乐正后夔"的神话传说中间接看出来,更 可以从诸多史实记载中直接看出来: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有姓名事迹可考 的音乐家——殷纣王的乐师"师延"(西元前 11 世纪)就是濮水流域的本地人 士(《韩非子》称其"至于濮水而自投",按"狐死必首丘"的古代风俗推断,其人 的家乡必在濮水附近);而此后的师涓、师曹、师襄子等中国早期的著名音乐大 师也绝大多数是出于衛国;而假如我们再考虑到春秋时代那"听郑衛之音则不 知倦"的音乐口碑(《礼记·乐记》),我们不得不承认,"乐正后夔"信仰对濮阳 地区的文化影响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直接继承了"豕韋 氏"之土地子民的姬姓衞国为什么最终会成为中国的"音乐之都"。而比"音乐 之都"更为重要的则是,濮阳地区其实还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两大发源地之一, 因为"礼乐"本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所以孔子一直视衛国为其"第二故 乡",提倡"鲁衛之政,兄弟也",并一有灾难就避居衛国(总共在那里居住了十 余年),因为那里不仅有蘧伯玉这样的儒家"先贤"可以为其友,更有师襄子这 样的音乐天才可以为其师。尤其是,正如《史记·孔子世家》所云"孔子弟子多 仕于衛",儒家文化虽然是鲁国人孔子创立的,但其真正的发展中心却一直是 在衛国,假如没有衛国人子贡这个又富又贵又有人缘而事业有成的儒家弟子 为榜样,儒家学说最初显然是不会有太多追随者的,它也许早就淹没在百家争 鸣之中而自我消亡了。

不过,与"郑衛之音"的鼻祖"夔神礼乐文化"一直受到儒家的高度赞扬不同,"郑衛之音"本身却是历来受到儒家的极力抨击的。因为,正像音乐神"后夔(寅)"其本身的另一种神话化身就是喜庆爱情之神"牛郎织女星(寅)"一样,"郑衛之音"的另一重含义其实就是张扬男女私情、关注女性情感的所谓"郑衛淫风"。虽然,"郑衛淫风"是从周代才开始出名的濮阳民风,由音乐之神"夔=牵牛"演变成爱情神话"牛郎织女鹊桥会"更是相当晚出的事情(其文字证据始

见于南朝人编辑的《古诗十九首》等),但我们通过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中那明显已经格式化了的"牛郎织女图"(图 5-4)也不难看出,此种爱情文化的起源其实很可能是由来久远的:毕竟,事实证明,"牛郎织女=牵牛=河鼓(寅)"星座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先商时代就已经与所有的"十二地支星座"一起诞生了,而谁都不难看出,谁要想把这对"男耕女织"的星座变成"男欢女爱"的星座其实不过是半步之遥、早晚之事:试看,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国王为什么是一位西元前 21 世纪的 章国国王?(《左传》所谓"乐正后夔取玄妻"其实是以守护神名兼国名代指章国的某位佚名国王。)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倾人之国"的女子为什么是一位西元前 17 世纪的章国公主?(《国语》所谓"与伊尹比而亡夏"的"妹喜"本是"章国=有施氏"公主,详说见下文。)殷商王朝这个章国的胞族政权(两者都属"下七垣文化"分布区)为什么是一个中国列代所罕见的以"牝鸡司晨"而著称的另类王朝?《诗经》中的衛国人为什么要把男女约会的地点惯称作"桑中"(比喻主管蚕桑纺织的织女神)?显然,这些重要的"先衞"文化之特征无疑都是与音乐喜庆之神"秉—夔=牵牛织女双星"紧密关联的,都是"郑衞淫风"、"牛郎织女鹊桥会"等文化的最直接源头。

总之,事实证明,"豕章氏"城邦在 4 200 多年前曾经将音乐神"秉=夔(寅)"奉为其城邦守护神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这不仅有"豕章氏"、"濮阳"等地名本身的"干支密码"可以为证,也有濮阳地区的"濮衛之音"和"濮衛之风"等地方文化特征可以为证。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衛地分史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濮衛故地的顶级地名和文化特征找到了该地"戚城遗址"等古城的主人"豕韋氏(寅)",那么我们无疑就可以据此初步复原出一份真正拥有考古学依据的"先衛"地方史了。显然,"干支密码"证明,旧史所谓的濮阳地区乃是所谓"颛顼(酉)之墟"、"昆吾(巳)故地"等等传说都是不足凭信的(前者是出于早期"五行理论"的术数安排而把"北方黑帝颛顼"配给了衞国这个中原"北土"国家的结果,后者则是出于对衞国所造"昆吾观"与夏代"昆吾国"的牵强混淆)。先衞地方史的真正编年框架应该是由如下的这几部分构成:

其一,西元前 23—前 22 世纪,"帝尧……(举)夔教舞……"(《大戴礼记·五帝德》);"帝(舜)曰:夔,命汝典乐……"(《尚书·尧典》)。也就是说,自从尧、舜时代起,以"夔"为其守护神的"豕韋氏"城邦就已经开始成为"有虞氏"王朝的称臣盟邦了。虽然,如上所述,这两段记载本身都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

但是,只要我们能辨别清楚人与神之分别,那么神话本身也就马上可以转化为历史。所谓"尧舜命夔典乐",假如按照古史中常见的神话逻辑去"翻译",无疑是可以直接被释读成"有虞氏王朝命豕韦氏部族祭祀音乐神夔"或"尧舜用夔—河鼓星座之名命名和册封了诸侯国豕韦氏"的。而通过上述两条记载的间接描述以及考古发现的濮阳戚城遗址其建城年代确实要早于西元前 2200年之事实,我们无疑可以确认,至迟在西元前 23 世纪,以"夔"为守护神的"豕章氏"城邦就已经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了。

其二,西元前 21 世纪,"(夷)舜……卒于鸣條……"(《孟子·离娄下》)。 关于有穷氏的首任国王"夷舜(大業伯朙氏)"并非有虞氏国王"虞舜(重華)"之 同一人,详考已见前文。那么,夷舜最终的丧身之地"鸣條"究竟是何地呢?显 然,无论从地缘政治格局还是从整个"有穷西征"的军事地形分析来看,此"鸣 條"应该就是前述的延津县之古"桃城"、殷墟卜辞所谓的"攸(條)",也即是"豕 章氏"城邦的领地。因为根据"干支密码"易知,條(攸)、桃、鼗诸字古皆可通 用,都指"鼗鼓"即"豕韋氏"的守护神"河鼓=秉",而"鸣"则为传抄之衍文(与 著名的"鸣条之战"地名相混淆所致)。因此,《说文》等文献所谓的"舜居姚虚 (桃城)"大体是正确的,只不过此"舜"并非是西元前 22 世纪的"虞舜"而是西 元前 21—前 20 世纪的"夷舜",此"姚虚"(條)也并非是夷舜的家乡而是他的 客死之地罢了。而所谓夷舜"卒于條",无疑是在说"有穷氏"西征侵略的头一 个目标正是"豕韋氏"。但是,夷舜显然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

其三,西元前 21—前 20 世纪,"昔有仍氏生女,鬓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 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餍,忿类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夷羿……冯珧利决,封豨是射……"(《楚辞·天问》)。也就是说,虽然"豕韋氏"暂时在"姚虚"打败了夷舜,并通过与夏族(有仍氏)公主的联姻而确保住了其一方小霸的威望(从此衛地也成了夏王相的名义领地,直到春秋时衞成公还不忘"命祀相"),但该国后继国君"伯封"由此而产生的"贪婪无餍"之霸主骄态马上又遇到了挑战:在他的卧榻之侧,一个新的超级霸主诞生了,他就是"有穷氏"的第二任国王后羿。显然,后羿正是借着"为夷舜报仇"的口号而一举把这个小霸王"伯封"统治下的"豕韋国"消灭吞并的。从此,"豕韋氏"城邦的王统一度中断,以至于其守护神"夔"的香火祭祀都几乎断绝了。

其四,西元前20世纪初,"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

發》);"商丘(帝丘)……相土因之……"(《左传·襄公九年》)。毫无疑问,立国已逾几百年的"豕韋氏"王国最终在后羿率领的"有穷氏"军队全力进攻下灭亡了,但是,事实证明,"有穷氏"的军事胜利也许并未取得实质性的长期成果,因为"豕韋氏"故地在此后很快又被其同盟唇齿之邦——商王"相土"所收复: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旧所谓"相土因之"的"商丘",其实就是指后来衞国的都城"帝丘"(在今濮阳县,"帝丘"正是得名于"帝相土")而非宋国所都之商丘,《左传》又称之为"相土之东都"。所以,《诗经》所说的相土东征海外,其征伐的对象绝对就是指"有穷氏"占领下的濮阳"帝丘"地区。显然,"有娀氏(商)"城邦在"豕韋氏"土著居民的支持下,其要想乘有穷、有夏两强鹬蚌相争的大好机会来一举坐收其渔翁之利收复"豕韋氏",这是绝对做得到的。而在"相土东征"之后,"豕韋"古城从此就有了"相土之东都"(临时陪都而非首都)这个美名了。当然,"相土之东都"不过是殷人子孙的夸耀之词,就当时的实际而言,相土的东征之师不过是帮助"豕韋国"重新获得了独立而已,相土并未真正吞并其比邻之国而长期迁都于此地。

其五,西元前 19 世纪前期,"王亥託(博)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恆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楚辞·天问》)。也就是说,在商王相土收复"豕韋氏"使其重新获得独立百余年之后,这块战略要地又一次易手,这次能够"殺王亥(商王)、取僕牛(即豕韋氏)"的是东夷的另一个著名城邦"有易氏"。那么,《山海经》、《楚辞》所谓的"僕牛"为什么不是指"大个头驯牛"而是指"豕韋氏"守护神的别名"牵牛(寅)"?显然,这不仅是因为"干支密码"可以告诉我们"僕牛氏(寅)—豕韋氏(寅)",更因为"僕牛"假如作"大个头驯牛"解释的话,那该段《大荒东经》的上下文在语法上是根本读不通的(郭璞显然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河伯、僕牛皆人姓名",实则为族名)。此外,王亥到有易氏诸国去经商虽然不排除有"作服牛"之举,但有易氏国王作为一个大国之君,他显然应该对王亥管辖下的"僕牛国"而不是几头黄牛水牛更感兴趣才对。(按今濮阳市南乐县有"仓颉陵","仓颉=王恆"已如前述,故后人在此"僕牛氏"故地纪念王亥、王恆父子无疑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其六,西元前 19 世纪后期,"殷主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古本竹书纪年》)。此战为先商著名之战,详情前文已述。而作为殷王上甲微灭亡有易氏的战果,殷人收复吞并"僕牛国(豕韋氏)"无疑是此

战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地理上说"豕韋氏"正位于殷与"有易氏"之间,上甲微要伐"有易氏"是不可能不先伐"豕韋氏"的,参见图 5-1)。从此,殷人终于第一次彻底吞并了"豕韋氏",将濮阳地区纳入了"下七垣文化"范围之内。而"豕韋氏"从此又多了一个殷王加封的别名"缙云氏":"缙"训晋鼓,明显也是代指该地的守护神"河鼓—夔(寅)"的;"云"则是殷人"云师而云名"制度的产物(见下文)。

其七,西元前 18 世纪前期,"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韋'之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就是说,在被殷人和东夷两大势力拉锯争夺了几百年之后,"豕韋氏"又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外来征服者,这个人就是夏王孔甲的大将刘累。从此,这块被改称为"御龙氏"的土地就一直属于强大的夏后氏王朝所有,直到该王朝的灭亡:所谓"御(wu=仵)"通"拊(wu=撫)"训"拊鼓(寅)",与"豕韋(寅)"同义。不过,夏王孔甲从殷王们手中夺取"豕韋氏"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夏、商两个前盟友明显就此开始结下了仇恨,并最终导致了商汤伐夏桀之战。

其八,西元前17世纪,"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 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国语・晋语》);"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韋、顧既 伐,昆吾夏桀·····"(《诗经·商颂·长發》);"大彭豕韋·····则商灭之矣·····" (《国语·郑语》)。显然,正如东夷外族统治"豕韋氏"很快就会遭到反抗一样, "御龙氏"对拥有殷人近亲血统的"豕韋氏"之统治无疑也是要很快遭到反抗 的。所以,当"豕韋氏"的后裔再次发动反抗而建立独立的"有施氏"城邦之际, "夏桀伐有施"对其进行再次镇压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么,这个作为夏桀王后 "妺喜"之故乡的"有施氏"城邦为什么就是指位于今濮阳地区的"豕韋氏"而不 是旧注所谓的是位于今山东滕州呢?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施"训旗 帜、旗鼓、指挥摄提,其作为地名是代指地支第三位"河鼓=摄提格=秉(寅)"; 而"有施氏"古又称"有喜氏",其嫁给夏王桀的王族女子也叫"妺喜",可见该女 子的祖国确实是喜庆鼓乐之神"秉(寅)"的"地方崇拜中心",其地必在濮阳附 近而不是滕州。因此,毫无疑问,通过这两条记载,我们明确可以看出,"有施 氏"确实是一个"豕韋氏"的后裔国家,只不过其再次赢得独立的历史十分短 暂:仅仅几年之间,它就再次被夏王桀征服了,其最美丽的本族公主"妺喜"也 被夏王桀掳走。至于这块土地,则再一次变成了夏王朝的附庸国"韋国",成为 了夏王桀政权的三大实力支柱(韋、顧、昆吾)之一,是其防御北方殷人的最前

线。不过,正如前几次一样,夏王桀的"韋国"也没有能够维持多久,其很快就迎来了此地历史上的第八次易手:商汤王的"韋、顧既伐"之战。而在此最关键的一战之后,"豕韋氏"故地从此就划归殷商王朝的王畿东土了,其地作为商王们四出征伐的战略要地,一直是被本就属于殷人近亲胞族的当地"施氏"后裔以及殷商王室的贵族诸如"攸侯喜"之类共同牢固镇守着,直到近600年后的周武王伐商此地第九次易手。

其九,西元前 11 世纪,"武王……咸刘商王纣……甲申,伯弇以虎贲誓,命伐衞(韋),告以馘俘……"(《逸周书·世俘解》)。也就是说,在武王伐商的大背景下,作为殷人同族的"韋氏=施氏"当然是周人征服的重要目标,他们在周朝大将"伯弇"率领的虎贲精锐攻击之下只能接受被馘杀、被俘虏的命运。而此地经过几年后的第十、第十一次易手,即武庚叛乱和周公东征的两次征服,这些古老"豕韋氏"的直系后裔最终就被分配给了姬姓衞国、鲁国等东方主要诸侯国成为当地的"国人"居民之骨干,此即《左传》所谓"(衞国)殷民七族"中的"施氏"、"(鲁国)殷民六族"中的"條氏"等等。此外,殷遗民宋国人所设的"彭城"(今徐州市),则是迁徙安置"大彭豕韋氏"后裔的最著名地点,这里就是后世所谓"大彭国=彭祖"的混淆传说之发源地(因为该地本为"大彭国"殷遗民迁居地,后为"彭祖"后裔楚国所占有)。当然,以"施氏"被姬姓衞国占领为标志,先衞的历史在经历了十一次"城头变换霸王旗"之后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四、滕州庄西里龙山文化 城址群与有穷氏考

众所周知,今山东省汶泗流域在 3 000 多年前本为妊姓薛国、姬姓鲁国等诸侯的领地。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本世纪新发现的"滕州庄西里龙山文化城址"(图 5-1)等汶泗流域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薛国作为一个古老城邦,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还远远可以追溯到 4 000—4 600 年前的"龙山时代"乃至更早。

(1) 庄西里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在属于"山东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的今鲁南地区,目前已经有几个规模不大的龙山文化城址或疑似有城址的遗址被发现,例如滕州庄西

里龙山文化城址^①、费县防城遗址(可能是城址)、兖州西吴寺遗址(可能是城址)等等,此外在泗水尹家城遗址还发现了同时代最高级别的贵族墓地,而这些遗址则共同组成了一个纵横上百公里的古城址和古聚落集群。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地域广阔的、在考古学上被归类为"尹家城类型"、并在晚期受到"王油坊类型"影响的古城址集群,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不难找到这答案。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费县、滕州、沂河、蒙山等该地区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西周金文和传世文献记载的缗、徐方、诸、穷桑等该地区的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城邦大联盟的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四位"余(卯)"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 费县:该地名始见于《尚书·费誓》等,今沿用为县名,而根据"干支密码","费"通"剕",训剕割、析割,作为地名其本义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析木=余(卯)";
- ★ 滕州:该地名源自古滕国,始见于《左传》等,今仍沿用为市名,而根据 "干支密码","滕"古音通"疼",训伤疼、伤折,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 护神"折木=余(卯)";
- ★ 沂河:该河流名始见于《尚书·禹贡》之"淮沂其乂",今仍沿用,而根据 "干支密码","沂"通"析",作为地名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析木=余(卯)";
- ★ 蒙山:该山名始见于《尚书·禹贡》、《楚辞·天问》等,今仍沿用,蒙山古又作岷山、汶山等,而根据"干支密码","蒙(氓)"古通"泯(刡)",训泯灭、刡削、析割,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析木=余(卯)";
- ★ 缗:即今金乡县东北古泗河沿岸一带,该古地名始见于《左传·僖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而根据"干支密码","缗"古通"泯(刡)",训泯灭、刡削、析割,作为地名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析木=余(卯)";
- ★ 徐方:该古方国名始见于《尚书》、《逸周书》、《诗经》以及出土金文等,据《史记·集解》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可知,古徐国之都原在滕州薛国故城一带(今发现有商代城址),古九州之一"徐州"即由此得名,而根据"干支密码","徐"金文本作"余",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是指地支守护神"余(卯)",此

① 燕生东、刘延常:《滕州市庄西里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3》,文物出版社。

外,《墨子》、《韩非子》等又称"徐"国为"蓋"国,也就是《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谓的"蓋余之國",而"蓋"古通"割",也训析割,代指地支第四位"析木=余(卯)";

★ 诸:即今费县、临沂一带,该古地名始见于《春秋·庄公二十九年》"城诸及防",古又称"鉏"、"诸冯"等,而根据"干支密码","诸(鉏)"古通"诛",训诛杀、诛除、殚灭,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殚阏=余(卯)";

★ 穷桑:该古地名始见于《逸周书》、《左传》等,古又称"空桑"、"穷石",据《括地志》"空桑之地,今名空實,在曲阜縣南二十里女陵山"云云可知即今曲阜一带,而根据"干支密码","空(穷)"古通"攻",训攻伐、杀伐、析斵,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析木=余(卯)"。(此外沂水古又称"江水"即"空水",见《史记》引《汤诰》。)

(2) "有穷氏"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庄西里遗址"之主人的明确范围,即该先商古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余(卯)"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城邦,那么,我们要找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时代属于先商"、"地望属于东夷"和"国名干支属卯"这三大条件的古国在可靠的中国史料记载中只有一个,那就是"倍伐氏"城邦及其后继政权"有穷氏":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云:"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

《左传·襄公四年》有云:"昔有夏之方衰也,(有穷)后羿自鉏迁于穷石······"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倍"通"剖","伐"训砍伐析斵,"空(穷)"通"攻",训攻伐、析斵,"倍伐氏=有穷氏(卯)"作为顶级地名兼国族名无疑就是代指主司剖削砍伐的地支守护神"析木=余(卯)",其与费县、滕州、沂河、蒙山、缗、徐方、诸、穷桑等诸多"庄西里遗址"附近的顶级地名是完全等价同源的。因此,"倍伐氏(有穷氏)"作为一个既能满足年代属于龙山时代(少皞氏时代)、地望属于东夷(緡淵、鈕),又能满足国名干支含义属于"卯"的古国,其地理位置和废墟遗迹只可能是指"庄西里遗址"古聚落群而不可能是指其他时空的古文化遗址。而另一方面,我们从考古学发现的鲁南地区"尹家城类型"诸龙山遗址曾有发生文化类型转变迹象①的事实来看(受到了王油坊类型的影响),这与

① 王守功:《山东龙山文化》,2004年,第130页。

文献记载的"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少皞氏后裔征服緡淵地区土著建立倍伐国)之历史情节也是大体可以吻合相呼应的。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滕州庄西里龙山文化城址群"其实就是先商时代的东夷城邦"倍伐氏("有穷氏")"的废墟,这是一个由外来的"少皞氏"后裔征服本地土著居民建立的新城邦即《左传》所谓的鲁国版"少皞氏之墟",此城邦后来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跨地千里之"准帝国"即"有穷氏王朝"。

(3) "有穷氏"守护神"余(卯)=奢龙(卯)"与薛鲁文化的起源

当然,除了"有穷氏"、"缗渊"、"蒙山"等古今地名,"余"神作为一尊历时几千年的本地守护神,其能留给汶泗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余"神原来并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管子》等文献记载的刑罚司法神"奢龙"以及虹蛇神"䗖蝀"之历史原型(图 5-5)。



图 5-5 余神=奢龙的象征物:山东龙山文化的虹形刃口玉器"璋" (前 3 千纪)、殷墟甲骨文中的两头蛇形"虹"字(前 14—前 11世纪)、战国的两头蛇形螮蝀纹玉器"璜"(前 5—前 3 世纪)

上古的"余"神为什么与"奢龙"本是同一尊神祇?因为,"奢"古音通"佘(蛇)","余"和"佘"古为同一字,"奢龙"作为神祇名就是代指地支第四位"余=析木(卯)",故"奢龙(卯)=余(卯)"成立。此外,我们根据《管子·五行》记载的"奢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士師"可知,"奢龙"这个神话中的"士師

(刑法官)"①其神职也是与桎梏刑罚之神"余=天梏"完全相当的,而所谓"辩乎东方"就是指"余=析木(卯)"星座的斗建指向是位于正东方"卯"位。不过,除了"奢龙"这一拟人化的形象,古老的"余"神留给中国文化的象征物符号更多的则是一些凶残神兽之造型,其中有些化身的知名度显然比"奢龙"本身还要高得多,例如"飞廉"等等,下面仅举几例:

A. 蛇。《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云"有神,人面大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即奢龙)"。显然,"奢龙(奢比尸)"的造型原本就是离不开"蛇"元素的。而证之以《楚帛书·余神图》之神像居然就是两条合体的蛇(参见本文第一篇),我们就更能确信,"奢龙=余"神为什么要"珥兩青蛇"了,因为正如前述,该星神之名"奢=佘=蛇"原本就是取自"蛇"的,为的是用毒蛇这种最令人恐怖震慑的动物来象征刑惩杀罚之神的恐吓威慑力。

B. 虹。《山海经·海外东经》有云"虹虹……各有两首……";《尔雅·释天》有云"䗖東,虹也"。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认为彩虹乃是一种天上的神兽,具体地说就是一种名叫"䗖蝀"的璜形两头蛇。而事实上,殷墟甲骨文中的"虹"字也正是取像于两头蛇之形的(图 5-5)。而一旦我们注意到了"虹"的两头蛇造型与"奢龙"神的"珥兩青蛇"造型之高度相似性,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后世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将该种天象命名为"虹(空)"了,因为按照《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的"奢比尸(奢龙)……一曰肝(虹)榆之尸"可知,在中国神话中"奢龙=析木"星座与"虹=肝榆=䗖蝀"这两种天象本来就是一对"二位一体"的双神:根据"干支密码","肝(赣)"字通"攻(贡)"、"虹(空)"训刀兵攻伐、析斵,与前述地名"穷石"之"穷(空)"相同;"䗖"一作"蛴(折)"训折断,"蝀"指"析木(卯)"代表的正东方位,可见"虹=肝榆=䗖蝀=析木(卯)"成立。当然,除了名字,两头蛇神"虹"与杀伐神"析木=奢龙"的神话职司也是完全类似的。例如,《诗经·鄘风·蝃蝀》为什么说"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史记·天官书》为什么说"白虹屈短,上下兑,有者下大流血"?因为"虹=蝃蝀"和"析木"一样在中国神话信仰中本来就是指刀兵刑罚和血光不祥之兆。

C. 飞廉。《楚辞·远游》有云"前飞廉以启路";《汉书》注曰"飞廉·····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我们知道,"飞廉"这尊开

① 按,今本《管子》误"士師"为"土师",显误。"士師"为中国古代主刑狱杀罚之官,例如《孔子家语》就有"季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的记载。今据此订正。

路神之名明显也是从"余(卯)"神转化而来的,因为"蜚(飞)"通"剕","廉"通"镰",都训切割、析割,都是代指地支第四位"析木=余(卯)"。当然,除了保留了"蛇尾"这个"奢龙"神的标志性造型,"飞廉"的神话角色还是有所变化的,它已经从开刀之凶神变成开路之凶神了。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地支第四位星神"奢龙—余"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发展脉络,那么我们对"奢龙"神信仰与汶泗流域的诸多地方文化特征之联系就会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了。

例如,关于古代东夷"有穷氏"的直系后裔"徐夷"之风俗民情,《史记·货殖列传》为什么会有"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之评价?显然,这是与所谓"徐夷"几千年来一直都以刑法之神"余(徐)"为其守护神信仰是有莫大关系的。而关于"有穷氏"后裔重视刑法之习,我们其实也可以从前已述及的"有穷氏"之另一著名后裔秦始皇家族看出来:众所周知,自诩为刑罚神"蜚廉"后裔的嬴姓秦国人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刑法、最重视法家理论,并唯一按照法家理论实行了彻底"变法"的"法制国家"。《史记·秦本纪》有云:"蜚廉生恶来",根据"干支密码",此号称"善走"的"蜚廉"显然是指秦人的守护神而非真实始祖,而"恶(亚)来革"才是秦人的真实始祖,因为其名号前有"亚"这一见于甲骨文的商代官名,而且其名号"来革二己"也是完全符合"干支取名制度"的,参见上篇(表 4-1)。

又例如,关于"有穷氏"及其后裔徐人、秦人在内的诸多政权,我们为什么发现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力迷信者?显然,只要我们能用刀兵血光之神"余=奢龙"的文化特征去比照,那么这些行为特征也许就会得到更充分的动机诠释了:原来,"有穷后羿"要不顾后果地千里西征去建立中国第一个"准帝国","徐偃王"要不自量力地与姬周王朝争天下,秦始皇要不计代价地建立中国第一个"大统一帝国",其背后其实还有刀兵威慑之神"余"在暗中作祟。

再又例如,关于考古学上与"有穷氏"对应的"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之文化特征,我们为什么会发现该类遗址附近地区是所谓的"璋"这种虹形刃口玉礼器(图 5-5)的发源地?显然,假如我们还不知道该地的守护神就是"余=奢龙",那将是很难解释这一问题的。而我们现在则可以知道,这种两头蛇造型的玉器很显然是象征了"虹=余=奢龙"的礼器(其定名为"璋"也明显有误,此姑且沿用之)。而(山东型)"璋"文化的传播无疑可以与"有穷氏"的西征综合

起来研究。而由此还可以推知的另一重要结论就是,近代学者所谓"东夷人信仰鸟图腾"的争论可以就此结束了,因为同属东夷"少昊"后裔的"有穷氏"其信仰象征物就是与"鸟"毫无关系的"两头蛇",何况正如前述,不管是"鸠鸟"还是"蛇",中国龙山文化诸城邦的真正信仰都是直指"十二星座"而非什么"鸟图腾"、"蛇图腾"的。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薛、先鲁地方史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薛鲁故地的顶级地名和文化特征找到了该地"庄西里遗址"等古城的主人"有穷氏(卯)",那么我们无疑就可以据此初步复原出一份真正拥有其考古学依据的"先薛"、"先鲁"地方史了。诚然,关于薛、鲁诸国之前的鲁南地区之地方史,相比鲁北的"爽鸠氏"而言至今都是一片自相矛盾的混乱状态:例如,鲁南地区这个在龙山文化时代并无大中型城址的地方真的既是"炎帝神农之都"、"黄帝的诞生地"又是"少皞氏之墟"吗?曲阜这个东夷人的老巢真的曾经做过其世仇死敌殷商王朝的首都"奄"吗?薛国故城遗址这个东夷族"岳石文化"的重镇真的是中原夏王朝之"车正奚仲"的封地吗?但是,在"干支密码"的证明下,我们知道,以上这些对中国古文献的断章取义解读都是不足为凭的,中国古文献对"先薛"、"先鲁"地方史的记载原本是十分详尽的,我们据"地名干支密码"等证据可以复原出的真正先薛、先鲁地方史之编年框架其结构可简述如下。

其一,西元前 24一前 22 世纪,"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山海经·大荒南经》)。也就是说,与其他的汉语土著城邦不同,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告诉我们,汶泗流域的龙山文化诸城邦并非都是纯粹的土著居民。该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本来是此地著名的大汶口文化(距今约 6 300—4 500 年)之主人,他们是一个喜欢生前"凿齿"、以压扁头颅为美的非汉语民族(但其语言应仍属于古汉语的亲属语言),而借由此考古学的著名特征与《大荒南经》相比对,"凿齿氏"也成为全人类已知最早的有确切族名可考的部族之一。显然,至迟在 5 000 年前就建造了的"滕州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址"等古老遗址就是他们那灿烂的史前文明之见证物。然而,事实证明,真正有能力将这种"史前文明"带人有文字记录之历史阶段的却并不是这些土著居民本身,而是一些外来人侵者,他们就是崇拜杀伐之神"奢龙"的"倍伐氏(有穷氏)"和崇拜射箭神"羿"的"有扈氏",而这两族都是有明确记载的汉语古族"少皞氏"之胞族近亲。而随着"羿(有扈氏)殺鑿齒"这场战争的结束,"凿齿

氏"这个古老民族就此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而"凿齿氏"故地这块广大的土地则成了东夷霸主"有扈氏"分封建立的同胞新城邦"倍伐氏(有穷氏)"之殖民根据地,此即《帝王世纪》所谓的"少昊邑于穷桑"之史实基础,同时也是考古学发现的"龙山文化尹家城类型"在晚期受到了"王油坊类型(或与之类似的景阳冈类型)"之文化影响的最好注解。从此,一个取代了与世无争之"凿齿国"的充满杀机之"穷桑国"就正式诞生了。而作为中国上古的最著名战争策源地,这个新城邦所导演的每一次对外战争都将深刻改变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其二,西元前 21—前 20 世纪,"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浑 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 椿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 三凶,谓之饕餮。舜……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 裔,以御魑魅……"(《左传•文公十八年》)。也就是说,大约在西元前 21—前 20世纪,"少皞氏"的"不才子"、直系大宗后裔"倍伐氏(穷奇氏)"的王权被其 某个旁支小宗后裔"夷舜"在内讧火并中推翻了。而这支仍然沿用旧国名"穷" 的"夷舜後裔"从此就日渐代替"少皞氏"和"有扈氏"成为了整个东夷地区的新 盟主,被其用各种压制手段"投诸四裔"打败称臣的不仅有本地的东夷旧族"穷 奇=倍伐氏(卯)",更有同属东夷的"浑敦=五鸠氏(子)"、"饕餮=有易氏 (未)"等等,此外该城邦还打败了颇受东夷影响的夏族"檮杌=有鬲氏(酉)"。 (按:《左传》此段文字本是太史克受命所作的政治演说,其目的并非述史而是 要设强词以夺理,以期可以让新继任而唯典故成例是从的鲁宣公哑口无言,故 其中捏合史料传说为我所用的夸张谬误颇多,例如其故意把"虞舜"和"夷舜" 的事迹混为一谈,又故意把历代有穷氏君主的开疆拓土之功都归于"夷舜"一 人,还故意把"帝鸿氏有不才子浑敦"这种神话传说成分也一并拼凑进史料以 形成修辞上的工整对仗、铿锵有力:但很明显,由"帝俊生帝鸿"排比出的"帝 鸿生浑敦"是出自《山海经》的"帝俊妻常羲(浑敦)生月十有二"神话而非史实。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在解读时是必须注意的。关于"饕餮=有易氏"、"檮杌=有 鬲氏"的详说参见下文。)

其三,西元前 20 世纪,"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就是说,原本从西北向东南征服了沂水流域土著异族的"少皞氏"后裔"有穷氏"现在又开始把征服的矛头转向了更

加广阔富饶的西方中原列强,他们通过重(夷舜伯朝氏)、该(寒浞)、浇、熙(鸟俗氏椒)、修(戈殪若木氏)等几代国王的努力,尤其是通过后羿(大费伯翳)那绝世武功的努力,最终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真正地跨千里的"准帝国",初步实现了他们"遂济穷桑"即跳出穷桑(穷石)老巢驰骋中原的伟大梦想。

其四,西元前 19—前 17 世纪,"少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左传·哀公元年》);"夏后启(扃)使蜚廉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墨子》);"海岱惟青州……厥贡盐絺……铅松怪石……"(《尚书·禹贡》)。也就是说,随着以过、戈为基地的"有穷帝国"被夏王少康、杼父子灭亡,"有穷氏"的老巢"蜚廉"城邦最终也成为向"夏后氏"王朝称臣纳贡的臣属国,其职责是向夏后扃等夏王们进贡金属矿石,具体而言就是今山东半岛的铅矿石。

其五,西元前17世纪,"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楚辞·天问》);"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古本竹书纪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左传·昭公十一年》);"桀蔽於末喜、斯觀……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有子·解蔽》);"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四年》)。也就是说,在败给了夏王朝并以"蜚廉氏"的名义替其当了百余年的矿工之后,"有穷氏"王朝的一支遗民"有缗氏"再次成为了中原大地改朝换代的策源地,他们的国王"斯觀"不仅通过两次造反而消耗了夏桀的国力并最终赢得独立,还通过美人计等反复腐蚀夏王朝,最终促成了汤武革命和夏王朝的彻底崩溃。那么,"斯觀"为什么是一位"有缗氏"(岷山氏、蒙山氏)的国王呢?因为,根据"干支密码","斯觀"之族称"斯"通"析",本是代指地支第四位"析木=余(卯)",与"有缗氏(卯)"的国号干支属性相同;而"觀"训门楼台觀,干支属地支第六位"南门(已)",可见这是一个既有名又有族氏的"有缗氏"史实人物。

其六,西元前 17—前 11 世纪,"疆埸之邑,一彼一此……商有姺、邳(飛廉氏)……"(《左传•昭公元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纣蔽於妲己、飛廉……以惑其心,而亂其行……"(《荀子•解蔽》)。也就是说,虽然商汤消灭了夏桀,但殷人并没能就此改变汶泗地区与中原世代为敌的格局,"有穷氏"之后裔方国"邳(飛廉氏)"继承了其前辈的向西进军国策,再一次成为了整个殷商王朝的心腹之患;虽然最终在殷纣王的强大攻势下该地的一部分曾被短暂地划归殷人殖民者所有(即《左传》所谓的"殷民六族"之"徐氏"和"殷民七族"之"锜氏"),且该国的某些东夷贵族也归顺了商王朝(例如秦国的始祖"亚来革"即为纣王的名将,"亚"为殷人的正规官职,常见于殷墟

卜辞),但殷纣王也因此而耗尽了国力从而无法避免其亡国的下场。那么,商代的东夷"邳"为什么也是"有穷氏"的后裔?因为,根据"干支密码","丕(邳)"古同"音(剖)","邳"即"倍伐氏"之省称,其本来就是"有穷氏"一族的最古老别称。(由此可见,近代史家所谓"南庚迁奄"是指殷王曾迁都曲阜地区的说法是完全有违历史记载之本义的,那里在纣王"克东夷"之前根本就不是殷人的领土,又谈何建立殷都于此呢?关于南庚所迁"奄"不在曲阜地区可参见下文。)

其七,西元前11一前10世纪,"疆埸之邑,一彼一此……周有徐、奋……" (《左传•昭公元年》);"(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能盈 以畔……"(《逸周书·作雒解》);"(周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 (《孟子・滕文公下》): "淮夷徐戎并兴……我惟征徐戎……"(《尚书・费誓》)。 "周缪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史记·秦本纪》)。也就是 说,即使到了西周,以徐戎(飞廉)为首的汶泗流域之东夷仍然是中原王朝的头 号劲敌,他们自称为"王",多次严重威胁到了周王朝的生存。因此,为了彻底 地消灭这个肆虐了千余年的战争策源地,周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 根本的一条就是把"徐戎"迁出曲阜附近地区,在那里新设立了任姓薛国(周文 王的母舅之子孙)和姬姓鲁国(周文王的孙子伯禽)这两个强大的亲信封国(此 外还有其他的附庸国)。从此,在这条"釜底抽薪"妙计的作用下,徐戎、赣榆 国、邗国等众多国名干支属"卯"的"有穷氏"后裔就在撤退到边缘地区的过程 中日渐衰弱下去,再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而向周王朝投降的原曲阜地区号 称"伯翳(有穷后羿)之後"的诸族群,则被远远发配到了江国、黄国、鍾離国、赵 城(赵人)、西陲(秦人)等边陲地区去替周王朝戍守边关,并被先后赐姓"嬴", 也即《说文》所谓"嬴,少昊氏之姓也"。当然,随着薛、鲁等国的建立,先薛、先 鲁的历史到此也就画上句号了。

五、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 城址与炎帝氏考

众所周知,今山东省章丘市附近地区在 3 000 多年前本为谭国的领地。 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上世纪发现的"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图 5-1)等该地区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谭国作为一个"少皞氏"城邦 的嫡系继承者,其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确实如中国史料所载是可以直接 追溯到 4 500 年前的"龙山时代"的。

(1) 城子崖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与少皞氏考

据相关报道,城子崖遗址位于今章丘市龙山镇,其龙山文化时期的版筑夯 土城址,南北最长处 540 米,东西宽约 455 米,墙基宽约 10 米,城址面积约 20 余万平方米①。是整个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约西元前 2600—前 2300 年)规模 最大的古城址。此外,在该龙山城址之上,还发现有叠压的岳石文化城址、周 代城址等。而综合该地附近发现的其他考古遗址可以发现,该地区是一个自 4 500 多年前以来一直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所在地,更是一个自 8 000 多年前 以来一直未曾中断的土著定居者聚居地。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龙山文化的标志性古城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这答案的。因为,根据传世文献或出土文字所记载的谭国、盧縣、關蘆水、烈山、逄国、岱宗等该地区的顶级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城邦的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五位"皋(辰)"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也即前文我们已经详细论证过的"少皞氏"部族:

- ★ 谭国:即今章丘市,该古国名始见于《左传》等,正如前述,"谭国"又作 "郯国"(《史记》),而根据"干支密码","郯(谭)"通"炎"训大火,作为地名其本 义当然就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大火=皋(辰)";
- ★ 盧縣:即今济南市长清区,该古县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等,此"盧縣"又作"雷县",而根据"干支密码","盧"训盧舍房屋,"雷"则训震雷、震倒、倾斜,作为地名其本义都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房=执斜=皋(辰)";
- ★ 關蘆水:即今章丘市之武原河,该古河流名始见于《水经注》等,而据《逸周书·职方解》"兗州……其浸盧、維"可知,此關蘆水当即是上古名浸"盧水",而根据"干支密码","盧"训盧舍房屋,"盧"古又通"雷"训震雷、震斜,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房=执斜=皋(辰)";
- ★ 烈山:即今济南之历山,该古山名始见于《左传》等,今济南犹有因之命名的历城区,而根据"干支密码","烈"训烈火、大火,"烈山(历山)"作为山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大火=皋(辰)";

① 王守功:《山东龙山文化》,2004年,第40—41页。

★ 逢国:即今西起济阳县东至青州市的古"逢山"地区,"逢"又作"逢",该 古国名始见于《左传》,称"逢伯"之国,又见于"济阳县刘台子西周贵族墓地"出 土之带"逢"字青铜铭文,是一个统治济南地区的商代古国,其扩张所及还到达 过临淄、青州地区,周初被姜姓逢国取代,而根据"干支密码","逄"通"庞 (房)",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房=皋(辰)";

★ 岱宗:即今泰山,该古山名始见于《尚书》等,而根据"干支密码","宗" 训宗庙高房,"岱宗"作为山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天宗=房=皋(辰)"。("岱"字考释详后。)

总之,通过以上这些地名干支密码的分析,我们对前文已经作出的"城子 崖遗址=少皞氏之墟"这一结论无疑又增添了最直接的独立证据。因为,"少 皞氏"就是"少皋氏","少皞氏"作为顶级地名兼国名、族名其本身就是代指主 司雷火的地支守护神"皋(辰)",其与谭国、盧縣、關蘆水、烈山、逄国、岱宗等诸 多本地顶级古地名无疑是完全等价同源的。

(2) 少皞氏守护神"皋(辰)=炎帝(辰)"与先谭地方史

关于谭国之前的济南、章丘地方史,在我们确认了"城子崖遗址"其实就是真正原版的"少皞氏之墟"之后,接下来我们所要考虑的最首要问题,当然就是在"少皞氏"王朝之前该地是否还存在过一个所谓"炎帝氏"的问题了,因为,《山海经·海内经》和《逸周书·尝麦解》等文献都曾明确提及所谓"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陬訾氏)生炎居(少皞挚)……";"赤帝(炎帝)分正二卿,命……少昊以临四方……";也就是说,少皞氏的开国始祖"陬訾氏"和"少皞挚"在中国古文献中历来都被视作是一个更古老的帝王"炎帝"之子孙后辈的。那么,这个不仅关系到"先谭"地方史,更关系到整个中华文明之信史开端的"炎帝"究竟是何许人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并参考前述古罗马人认战神Mars为祖先、古埃及法老认太阳神Amun为父亲、"豕韦氏"认音乐神"乐正后夔"为始祖、秦国人认刑法神"飞廉"为始祖的世界性惯例,我们理应得到的最终结论就是,作为中华民族公认的伟大始祖,"炎帝"其实本非凡人而是天神,他其实就是中国十二地支星神中的第五位、"少皞氏"城邦的守护神、大火星座之神"皋(辰)"。

"炎帝"为什么是天神而非凡人?"炎帝"为什么就是《楚帛书》中的辰月之神"皋"?显然,至少从如下的四条理由来看,我们的这个判断是完全可以成

立的。

首先,在最早记载"炎帝"其人的《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五篇文献中,"炎帝"本来就是以神祇而非凡人的角色出现的,因为他的名字是后缀式的"某帝"而非"帝某"。而按照甲骨文时代的古汉语语法(《大荒海内经》之行文格式同于殷墟卜辞已如前述),"某帝"与"帝某"的含义是有天壤之别的:"某帝"一如"上帝"、"昊天上帝"等本来都是指神而非人,人间的史实帝王在《大荒海内经》五篇中则只称"帝某"比如"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俊"、"帝鸿"等等,绝无混淆。因此,考虑到从古至今我们只听说过有"炎帝"、"黄帝"而闻所未闻有"帝炎"、"帝黄",我们首先就可以确认"炎帝"之名本就是指一尊神祇而非凡人。(而与之相反,"帝尧"、"帝舜"到了后世则也有被称为"尧帝"、"舜帝"的。)而按照"干支密码","炎"训大火,"炎帝"在上古中国神话中的原型当然就是"大火—皋(辰)"神。

其次,在中国所谓的"正史"记载中,"炎帝"虽然有时也被视作是一位历史人物,但这位所谓的史实人物其唯一的可考"事迹"即著名的"炎黄大战"却仍然是一场神话:《史记·律书》有云"昔黄帝(与炎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贾谊《新书》有云"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可见,后世传说中那场人类之间的"黄炎之战"其实本来就是一场云神黄帝与火神炎帝之间的"定火灾"之战,其神话主题无非是在赞美"云雨"可以战胜"火灾"的自然规律。(当然,"涿鹿之战"则是另有其事而被掺和于此的,详情可参见下文。)

再次,在中国古籍中,"炎帝"又常被称作"炎帝神農氏",而"神農"的"神"字本身就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炎帝"就是"神"。那么,"炎帝"和"神農氏"这两个看似有所差别的名字为什么本是指同一人(神)而非两人(神)呢?很显然,这只要看看这两个名字背后的"干支密码"就可以辨别出真伪了:"農(辳)"古通"桭"或"榮",本义是指棟榮房振,即代指地支第五位"房(辰)";而"炎帝"当然就是"大火星(辰)之天帝"的意思,所以,"炎帝(辰)=神農氏(辰)"成立,《世本》记载的"炎帝即神農氏"无疑是条所出有本的可靠资料。

最后,在中国的占星神话中,地支第五位星神"皋(辰)"的基本神话职司主要共有三项:雷火(即《左传》所谓"大辰……火房也")、农时(即《国语》所谓"天驷……辰马農祥也")、庙堂建筑(即《史记》所谓"心为明堂……房为府"),而古文献记载的"炎帝"之三大职业特长与此也是完全相同的:其一是《左传·哀公九年》所谓的"炎帝为火师",可见"炎帝"即火神;其二是《周易·系辞

下》所谓的"神農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可见"炎帝神農氏"即农业神;其三则是《淮南子·主术训》所谓的"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可见"炎帝神農氏"也是庙堂建筑之神。

因此,综合以上几大理由,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中华民族共同追认的始祖 "炎帝神農氏"(图 5 - 6)其在中国历史中的真实身份本就是神祇而非凡人,他 其实就是《楚帛书》中的地支第五位神祇"皋(辰)"。

而既然我们已经弄清楚了"皋(辰)=炎帝(辰)"这一最关键的史实,那么我们要想完整复原出济南地区这块"炎帝"守护之地的历史就不再有任何的障碍了。毫无疑问,结合考古学发现的"城子崖城址"是建于"生土层"之上的事实,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先谭"地方史的最早开端并不是从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炎帝氏"开始的,而应该是从将"炎帝"当始祖神供奉的少皞氏国王"陬訾氏"和"帝挚"开始的,其主要各阶段的历史概貌如下。

其一,约西元前 2500—前 2300 年,《山海经·海内经》有云"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託(聚皆氏)生炎居(少皞挚)";《路史·后纪》有云"(炎帝)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而守之"。也就是说,远在约 4 500 年前,以"炎帝"为守护神的"少皞氏"部族就建造了"城子崖城址"这座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规划性的都城(其特点是先造空城后住人),并建立了第一个有具体王名世系可考的王朝。而在陬皆氏、帝挚、昌意、颛顼、伯般等"少皞氏"诸王统治的时代,该王朝所"羁縻"的名义版图还包括了"五鸠氏"、"五雉氏"、"九扈氏"等几乎所有的东夷城邦,是中国的第一个"准中央政府"。

其二,西元前 24—前 19 世纪,《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也就是说,"少皞氏"的统治在顓頊时代就已开始受到了其臣属"孟翼氏"(即"九扈氏",说见后)的挑战,而到了其末代君主"伯般"手中就彻底灭亡了,其地开始成为了纷纷崛起的东夷新霸主"孟翼氏"、"有穷氏"、"有易氏"等轮流争夺之对象,其国号也降格成了所谓"烈山氏"(仅仅管辖一山之地)。不过,根据考古发现的"城子崖遗址"之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两者紧密相叠未有中断之迹象来看,该城邦的东夷文明血统显然并未就此中断。毕竟,无论是"九扈氏"还是"有穷氏"、"有易氏",这些东夷新霸主本来就属于"少皞氏"的近亲同族,他们对此地的政治控制无疑更可能是继承性的而非破坏性的。

其三,西元前 19—前 17 世纪,《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云"昔爽鸠氏始居此

地,季前因之";《古本竹书纪年》有云"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九扈)"。也就是说,在西元前 19—前 18 世纪,"烈山氏"和其同胞城邦"爽鸠氏"一样,都是随着其旧盟主"九扈氏"、"有易氏"的对夏保卫战之失败而向夏王"不降"投降的。从此,"烈山氏"就一并归夏王朝所分封的"顧国"羁縻管辖了,而"顧国"的末代统治者就是著名的"季荝"(说见下文)。当然,由于遥远的夏王朝毕竟鞭长莫及,在这期间该城邦显然是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的,其本地的古东夷文明血统并未就此断绝。

其四,西元前 17—前 11 世纪,《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云"昔爽鸠氏始居此 地……有逢伯陵因之"。也就是说,在沉沦了500多年后,大神"皋"守护之地 又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逢国",又出了一位伟大的君王"逢伯陵"。正如 前文所述,"逢国"本是一个位于今章丘、济阳一带的古国,它是"少皞氏"和"烈 山氏"的同族继承者。在"烈山氏"被夏人的"顧国"统治后不久,随着商汤、夏 桀大决战的到来,该地的土著居民在"逢伯陵"的领导下重新独立,建立了"逢 国",并向商汤称臣结成了"反夏同盟"。而在与夏人的"顧国"进行最后的决战 中,"逢伯陵"依靠"韋、顧既伐"的商汤军队的帮助,成功杀败了"顧国"的末代 君主"季荝",此事件就是所谓的"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显然,这次改朝 换代事件的历史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因为"有逢氏"的武装并不是仅仅用来搞 "起义"的,事实上其更主要的功能是用来搞"扩张"以图恢复乃祖"少皞氏"的 霸业。而在这种历史使命感的驱动下,"逢伯陵"最终得以顺利吞并其东邻"爽 鸠氏"故地,并使得千年后的晏子和齐景公都牢牢记住了自己的名字。不过, "逢伯陵"的海岱霸业并没能延续到商代的结束,因为他的后代遇到了更有霸 气的殷髙宗武丁。西元前 14—前 13 世纪,随着武丁的"肇域彼四海",聚鸠之 地最终被收归商王室,成了商王子孙"蒲姑氏"的封国兼私产。从此,地削权降 的"有逢氏"就彻底衰弱了。

其五,西元前 11 世纪,正如西周金文有云"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逢伯)、尃古(博古)"。也就是说,随着周公对东夷的地毯式扫荡征服,与周王朝实力相差悬殊的东夷各国明显只有"馘俘"和"投降"这两种选择,而"逢国"在初战落败后明显是选择了后者,所以他们才会被周王赐封于故土建立"谭国(郯国)"以"存弱国,继绝世"。当然,随着"谭国"以及紧邻监视她的姜姓逢国(今济阳)的建立,"先谭"的地方史也就此可以画上句号了。不过有一点值得指出,与其他东夷城邦不同,"谭国"与其前身政权"少皞氏"、"烈山氏"、"有逢

氏"等的血统和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该国国祚有幸在近 2 000 年的血雨腥风中从未中断,所以我们才能在西元前 525 年凭借"孔子学于郯子"的历史契机而直接知道到了距今近 4 500 年前的"少皞氏"王朝这个真正的中国信史总源头。(而与之适成对比的是,位置看似更偏僻安全些的"少皞氏"东邻"五鸠氏"其文化却至少经历了两次大换血,先是被商王王族"博姑氏"占领,后又被周王朝的姻亲姜姓齐国所灭。)

(3)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中国早期"准中央王朝"简史

中国人为什么至今都习惯自称是"炎黄子孙"而不是"伏羲女娲之子孙"? 中国"中央王朝"历史的开端为什么偏偏就是从火神"皋(炎帝)"守护之地"少皞氏"开始的?显然,假如没有"干支密码"的帮助,那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最好回答也许只能是"巧合"二字。但是,通过前文我们对"干支密码"的破译以及对《楚帛书·十二月神图》的解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一切其实并非巧合,而是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因为,在西元前3千纪以降的中国神话中,"女娲(子)"虽然号称是"众神之母","伏羲=羲和(甲)"①虽然号称是"众神之父",但真正的"众神之神"则另有其人,他就是"炎帝(辰)"这尊在所有地支十二星神中地位最崇高的"主神"。

"炎帝"为什么会是地支十二星神中的"众神之神"?因为,根据中国占星神话的终极源头——中国天文学的解释,雷火神"炎帝(辰)"所代表的地支第五位星座"大火(辰)"原本就是天文学意义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性星座:

一方面,"大火(辰)"星座是先商时代的仲夏月之标志星座,正如《尚书· 尧典》所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每当一年中日照最长的夏至日(日永)和 "仲夏"月份的到来,大火星座(星火)就会升到黄昏初夜的"中天"(西元前 2000年以前),用其准确而充满神秘的方式告诉人们"郊祭=夏至节"这个上 古中国最大年书的到来(《礼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

而另一方面,"大火(辰)"星座更是"出内火"这一中国古代最最重要的生活作息制度的标志星座,正如《左传·襄公九年》所云"古之火正,或食于心……以出内火……祀大火而火纪时焉",每当"大火"星座重新以完整造型升起在地平线上空的月份(即《礼记》所谓"季春出火"),就是中国先民举行"出

① 伏羲(又作包羲等等)在中国历史中也共有两个,其一是史实人物"太皞氏"的始王,其二则是神话中的"天干日神",即十日之母"羲和"的男版化身十日之父"宓羲"。参见本书第七篇。

火"仪式熄灭长明灶火、举家迁居野外草庐踏春下田的时刻(此即"寒食节"和"清明节"的源头);而每当"大火"星座彻底没人地平线不可再见的月份(即《夏小正》所谓"八月,辰则伏"),则是中国先民举行"纳火"仪式采集火种建新灶、举家团聚回归长明火暖房准备"改岁"过冬的时刻(此即"中秋团圆节"的源头)。可见,对于过着半年"出火"野外活动、半年"内火"蛰居过冬的先商居民们来说,"大火(辰)"星座在天文历法上的重要性是绝对无可取代的。

当然,除了天文历法上的天然重要性,最终能够促使"大火星=炎帝"坐稳 "众神之神"宝座的则是中国早期的历代"中央王朝"(霸主城邦)对该神的直接 推崇。因为,事实证明,中国最早有史可考的三个"中央王朝"为了在宗教宣传 上也尽量体现其"众王之王"的政治地位和霸主实力,他们最终都是一致性地 选择了"炎帝"这个"众神之神"作为自己国家的守护神和王朝徽号的(尽管他们在称霸之前所供奉的本地守护神原本都不是"炎帝"):

其一,"少皞氏"王朝(约西元前 2450一前 2300 年)。

如前所述,"少皞氏"城邦无论是就其所实行的"鸟师而鸟名"制度明显有 抄袭"五鸠氏"的痕迹来看,还是就其十分靠近"五鸠氏"的地理位置来看,该城 邦的族属原本很可能就是出于"五鸠氏"的某个分支的,也就是说他们原本应 该也是一个奉"鸠鸟=女娲(子)"为守护神的部族,其本名即《左传》所谓的"凤 鸟氏"。但是,由于这个后来居上的"凤鸟氏"在若干年后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 个"准中央王朝","五鸠氏"后来反而降格成了其臣属城邦之一,所以我们最终 看到的结局就是,该王朝毅然决定另请高明,把"炎帝(辰)"这尊"众神之神"第 一次和"众王之王"挂起钩来,重新定位为本国的首席守护神。而相应地,该王 朝的国名就此从"凤鸟氏"改为了"有皞(皋)氏",其本国山水之名也改成了烈 山、盧水(即赤水、彤鱼水)等,以纪念其新守护神"皞=炎帝(辰)"。

其二,"有虞氏"王朝(约西元前 2300—前 2100 年)。

综合考古发现、古文献记载以及地缘格局分析来看,"襄汾陶寺城址"原本应该是一个由该地的土著居民"伊耆氏"结合外来的东方移民所建立的新型城邦,该城邦的神话信仰也是一种全新原创的"十天干日神"信仰,其与东方诸族那种古老的"十二地支月神"信仰是颇异其趣的①。但是,由于"伊耆氏"城邦执行的向东扩张争霸政策之需要,以及外来的东方移民和东方因素不断增多

① 关于"伊耆氏"的来龙去脉,作者将另文详述。

的影响,该王朝也最终决定要把"炎帝氏(辰)"定为自己新的城邦守护神,把 "太皞氏(辰)"和"有虞氏(辰)"定为自己新的国号,以此宣示其将全方位地继 承"少皞氏"那未尽的霸业。而在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宗教改革"影响 下,从此,我们就看到了汾水流域的众多顶级地名都被汉语民族用"炎帝 (辰)=房(辰)"之尊名重新命名了起来:

- ★ 所谓"汾水",即"棼水"也(棼训楼房)、"房(辰)"星座之水也;
- ★ 所谓"雷首山",即雷火神"炎帝(辰)"之山也:
- ★ 所谓"吴城"(吴训矢斜),即"执斜=房(辰)"星座之城也:
- ★ 所谓"霍国",即"燿国"(燿训火)也、"大火(辰)"星神之国土也。

("汾水"今称汾河,"雷首山"即今之中条山;"吴城"为周代虞国之都城,在 今平陆县;"霍国"即今霍州市。)

而与之类似的,汾水流域"太皞氏"王族们的血统也被最终改革成了《山海经》所谓的"炎帝之孫伯陵(太皞氏国王虞幕)"、《说文》所谓的"神农之後太岳(太皞氏国王伯夷)"、《国语》所谓的"少典(蟜極)娶于有蟜氏(蟜極妻)生炎帝(炎帝族国王尧)"①等等,相比"少皞氏"国王们的血统"炎帝之妻生炎居(少皞氏国王挚)"简直是冒认到家了。

其三,"夏后氏"王朝(约西元前 2100—前 1650 年)。

正如前文已述,夏王朝的前身本来是叫"涂山氏(有崇氏)",是一个以地支第十二位神祇"涂(亥)"为其守护神的城邦。但是,自从夏王"启"战胜了有虞氏末王"益"夺取了中原霸权之后,为了宣示自己霸主地位的"合法性",该王朝也毅然决定要更改自己的国号为"夏(辰)",改自己的国都名为"寻(燖)",以便在字面上就可继承"有虞氏(辰)"的天命:所谓"夏(厦)",即高房大厦也,当然是指地支第五位神祇"房=炎帝(辰)"。从此,继"少皞氏"和"太皞氏=有虞氏"这两个自称"炎帝子孙"的王朝之后,中国又有了第三个自称为"炎帝氏"的王朝。而关于这个王朝与火神"炎帝"的紧密关系,我们仅举一个小例子就能体会出来:《国语》有云"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

① 按"少典"即《尚书·大诰》之"小腆(指殷王子武庚)",本义为小君嗣子、王子。故《国语·晋语》所谓"少典娶于有蟜氏……生炎帝"其本义是未登基称王的王子"小腆蟜極"娶了其同名号的先妣"有蟜氏女",生了炎帝氏的伟大国王唐尧。后人不察,乃以"少典"讹为人名,又将黄帝、炎帝本为兄弟之神话掺入,于是最后就变成了"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的所谓古帝族谐。

也就是说,按照占星神话,"夏后氏"王朝兴起的真正原因是源自火神(祝融)的庇佑,而"夏后氏"王朝亡国的根本原因也是源自火神(回、禄)的降灾惩罚,总之,是成也火神、败也火神了(当然,这种晚出传说把"炎帝=吴回=辰"、"祝融=禄=庚"等不同火神混为一谈是不足凭信的)。

而显然,正是由于以上的这三个中国最古老的"中央王朝"或者至少是"霸主城邦"对"炎帝"神话所进行的800余年不遗余力之尊崇推广,才最终造就了"炎帝"这尊神祇不仅持续拥有着中国"众神之神"的尊贵头衔,还更拥有了比任何其他神祇都多很多倍的忠诚信仰者即所谓的"炎帝之苗裔"。因此,直到今天,虽然已经相隔几千年,但我们身边的大多数可上溯到先商时代的汉族古姓仍然过半是出于"炎帝氏"的,例如出于第一个"炎帝氏—少皞氏"的逢、谭、谈诸姓人士,出于第二个"炎帝氏—有虞氏"的姜、妫、范、申、许、陈、高、陆、袁、田、孙、卢、骆诸姓人士,出于第三个"炎帝氏—夏后氏"的莘、辛、婁、曾、杞诸姓人士等等。而在如此面积广大和如此历史悠久的"群众基础"之上,我们中国人所最有共同认知的族源说法当然就只能是"炎帝之子孙"、"炎黄之子孙"而不是什么"女娲之子孙"或"应龙之子孙"等等别的说法了。(黄帝的来历见下文。)

(4) 华夏全民守护神"炎帝(辰)=龙(辰)"与中国龙文化的起源

当然,"炎帝"这尊神祇对于中国文明而言,其最重要的影响不仅在于他是中国最早的三个霸主王朝在800年间所选定的"国神",更在于事实上他是整个华夏民族在4500年间所选定的民族精神之最高象征。因为,直到今天,我们十几亿中国人仍然是以"龙的传人"而为世界所知的,而根据"干支密码","龙"(图5-6)这个象征了中国人团结统一的绝对标志物其最初的含义就是代表着雷火之神"炎帝"。

"龙"为什么也是"皋=炎帝(辰)"的象征物之一?显然,假如没有"干支密码"的帮助,关于"中国龙的起源"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继续让其付诸争议了。但是,"干支密码"现在已经可以明确告诉我们,"龙"作为一种神话动物,其历史原型绝非什么"蛇图腾",更不是什么"龙有九似"的九不像,其真正的自然原型物只有唯一的一种:雷电;而雷电本为地支星座"皋=大火=房=震(辰)"的神话创意原型已如前述,该星座那红色"大火三星"加"倾斜高房"的综合喻义本来就是"能震倒高房的天火"即"雷电"。因此,我们最后可得的结论就是,"龙=雷电"确实是"皋=炎帝(辰)"的天然象征物之一,而且是其最著名、最有



图 5-6 皋神=炎帝的象征形象:陶寺遗址出土的火红色龙纹彩绘陶盘 (前 24—前 22 世纪)、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火焰卷边形龙首纹青铜 饰牌(前 19—前 16 世纪)、殷墟甲骨文中的闪电形"龙"字和商代 的玉龙(前 14—前 11 世纪)、汉代的炎帝神农氏画像石拓本(前 202—220 年)、东皇泰一(炎帝)的祭祀圣地东岳泰山(岱宗)

影响的象征物。至于中国神话中的"龙"与"雷电"究竟有何相似性,我们仅需举出以下四点证据就足够能让这个问题不言自明了:

其一,雷电能预兆降雨,而中国龙也能降雨。《淮南子》有云"龙致雨",可 见雷、龙同其天职。

其二,雷电是自我发光体,而中国龙也是自我发光体。《说文》有云"龙,能幽能明",可见"龙"绝非蛇、蜥蜴等普通动物,它本来就是个电灯泡般"能幽能明"的透明光源体,可见雷、龙同其体质。

其三,雷电的汉语模拟发音为"隆隆(long)之声"(所以《楚辞》直呼雷神为"丰隆"),而中国"龙"字的发音也是"隆(long)","龍(龙)"通"靇(霳)"训雷,"龍"本来就是"靇(霳)"的本字,可见雷、龙同其音。

其四,震雷闪电的自然外形是曲折而有开叉分支的线条集束,而中国"龙"

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也是曲折而有开叉分支的线条集束(图 5~6),可见雷、龙同其形。

因此,综上所述,雷电和龙其职、其质、其音、其形全同,很难不作一物解。 而事实上,关于龙就是雷电神的化身,中国古文献本身也早有直接性的记载, 例如,《山海经·海内东经》有云"雷泽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可见,"雷神=龙" 确实成立。

当然,除了龙(雷电神),"炎帝=皋"留给中国文化的还有其他的众多象征物,兹可一并总结如下:

A. 荧惑星(火星)。《史记·天官书》有云"心为明堂, 荧惑庙也", 可见, 包括红色恒星"心宿二"在内的中国星座"大火(心宿)"与红色行星"火星(荧惑)"这两者本来就是一对"二位一体"的双神, 因为"某某庙也"是《天官书》描写星座与行星之"二位一体"关系的标准术语(其他"某某庙也"例见下文)。

B. 火灾神吳回。《左传·昭公十八年》有云"禳火于……回、禄","回"即 "吳回","吳"训斜矢,"回"通"燬"训火,都是代指地支第五位"执斜三大火(辰)"。可见"皋=吳回(辰)"成立。而再考虑到文献中的"吳回"仅司职"火正"而不管农业、建筑等"皋"星神司职的其他事项,则"吳回"应该更可能是行星神"荧惑"的别名。不过,由于中国的火神总共有四五个之多,其中尤以"吳回=荧惑(辰)"和"祝融=禄(庚)"最为出名,所以后世往往"回、禄"或"康、回"并称,到了春秋时代就合并成了一个新神名"回禄(康回)",其职司仍然是接受"禳火"祭祀。

- C. 草药神。《世本·作篇》有云"神农和药济人",可见"炎帝神农氏"的神职还包括了由农业活动"尝百草"衍生而来的草药业。
 - D. 地腊神。即所谓"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详说见后文)。
- E. 东皇太一。《楚辞·九歌》所列至尊天神"东皇太一(泰一)",其实也是指夏至星神炎帝: 因为"炎帝一大火"星座在天文学上属于"东宫苍龙"之首,所以称"东皇(煌)";因为"泰"古音通"岱"、"帝(带)",所以称"泰一(帝一)"。而祭祀"炎帝一东皇泰一"的最古老朝圣中心当然就是"少皞氏"境内的镇国之山"岱宗(泰山)",显然,后世的中国帝王都将亲自到泰山祭天、梁父祭地(即祭东皇泰一)列为最高规格的国家圣典,其最早的源头就是近四千五百年前"少皞氏"将本国的最高山命名为了炎帝之山"岱宗"(图 5-6)。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地支第五位星神"炎帝=皋"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完整发

展脉络,那么我们对 4 500 年以来中国文化的许多核心特征之起源就会有更 多更深刻的了解了,毫无疑问,这些核心特征必然与华夏全民族的共同守护神 "炎帝"是脱不了关系的。

例如,中国人为什么至今都以"中国红"作为本民族的吉祥颜色?显然,这与"炎帝"这尊由红色大火星所代表的红色火神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这种代表"炎帝=皋=龙"的红色我们不仅可以从战国文物《楚帛书·皋神图》中看得到(皋神被描绘成红脸红身的三首神),更可以从陶寺遗址出土文物"红色龙纹彩绘陶盘"上看得到(图 5-6)。

又例如,中国人为什么至今都以"中医中药"这门独门秘技而著称于世界?显然,这与古老的"炎帝神农氏"风俗信仰对中草药行业的支持促进也是分不开的。

再又例如,中国人为什么至今都习惯以"天打雷劈"作为最通用的誓言口头禅?显然,这与中国的众神之神"炎帝"本就是一尊雷电神更是有其绝对的渊源关系的。

不过,与以上的这一切比起来,"中国龙"这一"炎帝"的头号象征物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更为深远而普遍。因为,古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学的发现都能明确告诉我们,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绝非自今日始,远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华夏民族就已经是一个以"龙"为其统一文化符号的"龙族"了。

《左传·昭公十七年》有云"昔者……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少皞……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诚然,关于"少皞氏鸟师而鸟名"之谜,我们前面已经解读过了,那么"炎帝氏火师而火名"、"大皞氏龙师而龙名"这两句所指又是怎么回事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破解下,我们知道,"火师而火名"其实就是"龙师而龙名"的修辞互文,其实质本指同一类事件,因为"龙"和"火"都是指地支第五位神祇"皋=炎帝(辰)"的象征物。所以,这两句的完整文意经过复原后就应该是:"炎帝氏龙师而龙名(兼用火师而火名)"、"大皞氏龙师而龙名(兼用火师而火名)"。至于这段文字中的最后一个模糊概念,即《左传》在此所谓的"炎帝氏"究竟所指为谁,我们则可以用最简单的"排除法"直接推导得出: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国古文献记载的"炎帝氏"共有三个:少皞氏、太皞氏、夏后氏;而《左传》在此已经指出"炎帝氏"不等于前面两个,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左传》此所谓的"炎帝氏"其实就是指"夏后氏"。而据此结论,《左传》此两句著名史料的最后

厘定翻译就是:

"夏后氏龙师而龙名"、"有虞氏龙师而龙名"。

也就是说,据此记载,华夏民族以"龙"为其统一标识符号的历史确实由来 久远,其确切的文化源头(刨除少皞氏对鸟、龙混用的年代)至少可以直接追溯 到西元前 24—前 17 世纪,即虞、夏两大"准中央王朝"统治的 600 多年间所一 直贯彻执行的"龙师而龙名"文化制度。

当然,关于这个 4 300 年前的"龙师而龙名"时代的真实存在,我们除了拥有《左传》的这段概括性文字记载可以为证,其实还有更多的细节证据可以为证,这些证据既有古文献方面的,也就出土文物方面的。

例如,在古文献方面,《尚书·尧典》就可以告诉我们,"有虞氏"王朝的"龙师而龙名(火师而火名)"并非仅是一句空话而是确有实际内容的,那就是所谓的"四岳"世官制度:根据"干支密码"易知,"岳"古音通"燿",其本义可代指地支第五位神祇"大火=皋(辰)"的象征物"燿燿火光";因此,《尧典》所谓的"四岳"其实就是"四燿"分官制度,就是"火师而火名(龙师而龙名)"制度的最具体体现,和前述"爽鸠氏"治下的"四鸠"分官制度以及"少皞氏"治下的"四鸟"分官制度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而假如我们再考虑到《山海经·海内经》还有所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的"有虞氏"谱系之记载,那么我们对"有虞氏"王朝本是一个既实行"火师火名"(例如西岳=西燿)又实行"龙师龙名"(例如先龙)的王朝就完全可以坐实了。至于"夏后氏"王朝实行过"龙师而龙名"的文献证据,那就更加直白易懂了,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有夏王孔甲时代分封的世官"御龙氏"、《庄子·人间世》记载有夏王桀时代被杀的世官"关龙氏"(关龙逢)等等,皆属不言而自明的"龙师而龙名"实例证据。

再例如,在出土文物方面,"陶寺遗址"发现的最高规格大墓(王级大墓)都有"龙盘"随葬这一事实首先就足可证明(图 5 - 6),古冀州汾水流域的"太皞氏"王朝确实是一个以"龙=大火"星神为其国家守护神并因此也很有可能实行过"龙师而龙名"制度的古国。至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那些精美绝伦的龙首纹青铜饰牌(图 5 - 6)、"陶质龙纹透底器"、"镶嵌绿松石龙形器"等等无疑也是对其主人"夏后氏"王朝之崇拜"龙=大火"星神的最好证明,是该王朝有可能实行过"龙师而龙名"制度的可靠旁证。

因此,综上所述,《左传》所谓的虞、夏两朝都实行"龙师而龙名"的记载总体上确属史实。事实再次证明,"太昊伏羲氏"和"夏后氏"王朝绝非如后世五

行家所编造的那样都是什么"色尚青"的"木德王",他们真正的"幸运色"和"吉祥物"都是红色的龙(当然,由于"皋"和"涂"同是夏人的守护神,所以红、黑两色都是其吉祥色)。而在这两大"准中央王朝"600 多年的经营之下,类似"御龙氏"、"关龙氏"、"应龙氏"、"勾龙氏"之类的族名或类似"晏龙"、"苗龙"、"先龙"之类的私名(以上"龙名"见于《左传》、《山海经》等)在当时的华夏诸城邦无疑是无所不在的,任何有名有姓(氏)的华夏人物即使其本身与"龙"无关,但其父族、母族的庞大血缘网络中要想彻底隔离掉"龙"族的身影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此历史基础之上,对于今天的任何一个华夏苗裔而言,其想要把自己的祖先远远追溯到某个名为"龙"的古代世族或某个名为"龙"的古代贵族人物那里,在理论上说那是必然可以办到的事情(虽然实际上由于史料湮没无闻并不一定能真正办到)。可见,今天的中国人自诩为"龙的传人"绝非仅仅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史实。

六、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 城址与五觀氏考

众所周知,今河南省郑州地区在 2 700 多年前本为姬姓郑国的领地。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上世纪发现的"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图 5-1) 等郑州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郑国作为一个古老城邦,其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至少还可以追溯到 4 000—4 600 年前的所谓"龙山时代"。

(1) 古城寨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古城寨遗址位于今新密市东南 35 公里的古城寨村,其龙山文化时代(距今约 4 600—4 000 年)的城墙为东西长方形,城址面积 17.65 万平方米,周围环绕护城河。在该城址的东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龙山时代夯筑建筑群,其中大型房基 F1 为面阔七间、三面有回廊的结构复杂之宫殿式建筑①。此外,在该城址的四周不远,还分布有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 5 300—4 800 年)的郑州西山遗址(城址面积 3.1 万平方米)、龙山文化末期与二里头文化新砦期(距今约 4 000—3 800 年)的新密新砦遗址(城址面积约 100 万平

① 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年第5期。

方米)、二里头文化时代(距今约 3 800—3 600 年)的新郑望京楼遗址(城址面积约 37 万平方米)等不同时代的系列古城址,这里无疑是一个连续繁荣了千余年的古老文明之废墟。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早就拥有了豪华宫殿的王都级古城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这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新密、汜水、管城、大隗山、溱水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洧水、圃田泽、郊、卷县、鄶国等该地区的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古城邦的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六位"且(已)"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 新密:该地名之"密"源自古密国、密县,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等,今沿用为县级市名,而根据"干支密码","密"通"閟"训閟门,作为地名其本义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南门=且(巳)";
- ★ 汜水:该地名始见于《山海经·中山经》、《史记》等,今仍沿用为荥阳市镇名和河流名,而根据"干支密码","汜"即地支第六位之"巳",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是代指地支守护神"且(巳)";
- ★ 管城: 今郑州管城区之地名源自古之"管国",始见于《逸周书》等,"管"字《墨子》作"關"、出土《利簋》铭文作"闌",即前述夏代关龙逢的封国"關龙氏",后来也是周初管叔鲜的封国,而根据"干支密码","管(關)"、"阑"皆训门關、门阑,作为地名其本义都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南门=目(已)";
- ★ 大隗山:该地名始见于《庄子》等,今沿用为新密市的山名兼镇名,而根据"干支密码","隗"通"闱"训门闱、象魏阙,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南门=1(巳)";
- ★ 溱水:该河流名古本作"潧",始见于《诗经》等,今仍沿用,而根据"干支密码","潧(溱)"通"罾"训罾網篱落,作为地名其本义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大荒落=且(巳)";
- ★ 洧水:即今双洎河,该古河流名始见于《诗经》等,而根据"干支密码", "洧"通"囿(闱)"训苑囿藩墙、篱落门闱,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 "南门=且(巳)";
- ★ 圃田泽:该古泽名一作"囿中",位置在今郑州、中牟之间,始见于《周礼》等,为古代著名的"十泽"之一,而根据"干支密码","圃"、"囿"皆训园圃樊篱、苑囿篱落,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大荒落=且(巳)";

★ 郊:即今郑州管城区,该古地名始见于《春秋》等,而根据"干支密码", "郊"通"閟"训閟门,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南门=且(巳)";

★ 卷县:在今郑州、原阳之间的古县,该古县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而《史记》所谓"汤归至于泰卷"的"泰卷"即当在此古县附近,而根据"干支密码",《史记》的"泰卷"在《尚书·序》中通假作"大坰","坰(扃)"训门扃,故"卷(坰)"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南门三月(巳)";

★ 鄶国:在今新密市,该古国名始见于《逸周书》、《国语》等,而根据"干支密码","鄶(hui)"古音通"阓(hui)"训门阓,作为地名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南门=且(巳)"。

(2) 五觀氏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古城寨遗址"之主人的明确范围,即该先商古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且(已)",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城邦,那么,我们要找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时代属于先商"和"国名干支属已"这两大条件的古国,在可靠的中国史料记载中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五霸之首"昆吾氏",别名"五觀氏":

《白虎通》有云:"昔昆吾氏,霸干夏者也……"

《左传·昭公元年》有云:"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 觀、扈······"

《国语•楚语》有云:"启有五觀……"

《楚辞·离骚》有云:"启九辩与九歌,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後兮,五子(五觀氏)用失乎家巷……"

《逸周书·尝麦解》有云:"其在啟之五子(五觀氏),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

《史记·殷本纪》有云:"汤自把钺以伐昆吾……"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五(吾)"通"囿(圄)"训园囿禁圄、藩篱围墙,"觀" 训门阙台觀,"昆"通"閫"训閫门,"五觀氏(昆吾氏)"作为顶级地名兼国名、族 名无疑就是代指主司门户藩篱的地支守护神"且(巳)",其与新密、汜水、管城、 大隗等诸多"古城寨遗址"附近的顶级地名是完全等价同源的。因此,"五觀氏 (昆吾氏)"作为一个既能满足年代属于先商时代,又能满足国名干支含义属于 "巳"的古国,其地理位置只可能是位于"古城寨遗址"所在的郑州地区,而不可 能是位于杜预所谓的"顿丘卫县"。(夏代"昆吾国"与楚先公"昆吾=樊"无关,也与卫国"昆吾观"无关已如前述。)此外,我们从考古学所发现的"古城寨遗址"那些同时代所罕见的恢弘宫殿来看,其与"五觀氏(昆吾氏)"那足以压倒夏王启之霸主地位的实力也是很能相称的;我们从"古城寨遗址"的地理位置紧邻"王城岗遗址"和"二里头遗址"这两个夏都遗址的格局来看,其与文献记载的"五觀氏(昆吾氏)"与"夏后氏"两族本为近亲胞族、形同父子的关系也是完全可以对应吻合的。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新密古城寨 龙山文化城址",其实就是先商时代"五觀氏(昆吾氏)"城邦的废墟,该城邦是 与"夏后氏"距离最近的邻邦,也是与"夏后氏"渊源最深的胞族。而"五觀氏" 不但在夏朝初年就是一个堪与"夏后氏"分庭抗礼的著名霸主,更在整个大禹 子孙称霸的年代始终与"夏后氏"保持了唇齿相依的关系。总之,考虑到考古 学发现的中原最早之城堡"郑州西山城址"就是出现在"五觀氏"故地这一点,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五觀氏"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其实就是 "夏后氏"王朝的文明启蒙者和先行者,就像"五鸠氏"城邦曾是"少皞氏"王朝 的文明启蒙者和先行者一样。

(3) 五觀氏守护神"且(巴)=轩辕(巴)"与郑文化的起源

不过,与"五觀氏"比起来,郑州地区的另一个古地名无疑更能直接说明该地与"且(已)"神话的直接关系,那就是至今都充满了神秘色彩的"轩辕之丘"。

《大戴礼记·帝系》有云"黄帝居轩辕之邱";《焦氏易林》有云"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史记·集解》皇甫谧有云"黄帝生于寿丘……居轩辕之丘"。可见,关于今河南新郑地区本名"轩辕之丘(寿丘)"这一点,中国史料历来是不乏记载的。那么,"轩辕之丘"究竟是否真的是指今郑州、新郑地区呢?显然,这只要根据"干支密码"来核对一下就可以知道了:"轩(闬)"训窗槛、门轩,"辕(園)"训園囿篱落,所以"轩辕"和"寿"作为地名必然都是代指地支第六位"南门一大荒落一寿星一且(巳)"的,其与五觀氏、昆吾氏、新密、汜水等诸多新郑附近之干支属"巳"的顶级地名都是同源同义的,因此,古人关于"轩辕之丘(巳)=寿丘(巳)"就在新郑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只不过,同样是根据"干支密码",我们还知道,新郑的这个"轩辕之丘(巳)"其最早的主人其实并非是"黄帝氏(戌)"或"有熊氏(酉)",而恰恰是我们前面已经反复考证过的"五觀氏(巳)=轩辕氏(巳)"。也就是说,"轩辕"这个至今仍让无

数中国人为之着迷的名字,其本来并非是某个史实人物的私名(比如传说中的 黄帝之私名),而是一个先商时代的星座别名、新郑地区的"守护神"神名兼地名。(当然,"黄帝氏"和"有熊氏"这两个部族,在后来也都统治过"五觀氏"故地,所以才导致了后世文献往往误三者为一事,但"黄"、"熊"两族显然都是外来统治者而非此地的土著居民。详说见下文。)

"轩辕"为什么是一尊星神而非凡人?本来,关于这些问题,中国神话的两大宝库之一《楚辞》早就为我们阐释得很清楚了:《楚辞·远游》有云"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也就是说,"轩辕"本是一座中国神话中高高在上不可攀援的"南天门",而非一个凡人,因为正如前述"轩辕"的文字学本义就是指"门"(假如不作攀援天门,而作攀援凡人黄帝解很显然是扞格难通的)。而《远游》的作者之所以想要攀爬"轩辕"这座天门其动机逻辑也是不难顺利解释的:他就是为了要求见"寿星(已)"以祈求延年益寿、不死成仙,因为在中国占星神话中天门神"南门(已)"本来就是兼职的长寿神"寿星(已)"。此外,"轩辕"这个古老星座名虽然在秦汉时代早已被挪用到了别的地方(即今日星图上的狮子座α星等十七恒星),但其作为"天门神"的古老占星学含义还是在潜移默化中被保留下来了:《史记·天官书·正义》有云"(轩辕)主烽火、备警急",可见,汉代的"轩辕"星官仍是保留了"预警看守国门"的古意的,而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了"轩辕(已)=南门(已)"是绝对可以成立的。

因此,综上所述,作为"轩辕之丘"的守护神,"轩辕(巳)"本来就是《楚帛书》中的"且(巳)"神之同一尊神祇。至于在该神众多的其他化身别名中最为今人所熟知的形象,也并非是什么"云师而云名"的"黄帝",而是中国人至今都最最喜闻乐见的长寿神"南极老人",即俗称的"老寿星"(图 5 - 7)。

上古的新郑地区守护神"轩辕=且(巳)"为什么就是"南极老人(巳)"之同一尊神祇?因为,《山海经·大荒西经》早就明确告诉我们:"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可见,"轩辕"作为"轩辕之国=轩辕之丘"的守护神,不仅其"不壽者乃八百歲"的神话特技是与"南极老人=寿星"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其"江山之南棲為吉"的神话吉祥方位"南"也是与"南极老人"的"南"完全一致的,都是由"南门=亢"星座的斗建坐标方位"正南偏东 30 度"敷衍而来。因此,再综合"干支密码"证据,我们不难确认"轩辕=且(巳)=南极老人(巳)"的最后成立。而既然"轩辕(巳)"本为地支第六位星神的身份已经明确,那么我们对其留给中国文化的其他相关神话象征物也就能——有所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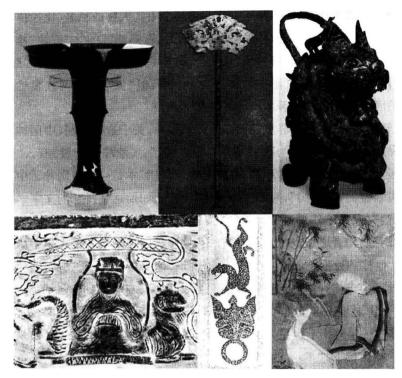


图 5-7 且神=轩辕的象征物:龙山文化的竹节寿木纹蛋壳陶杯、竹节寿木纹玉簪(前 3 千纪)、商代的虎噬人卣(前 17—前 11 世纪)汉代画像砖中的骑虎西王母、白虎与衔环铺首(前 202—220 年)、明代画家吕纪的南极老人图(1477—?)

考确认了,下面兹举几例:

A. 看门虎。《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云"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楚辞·招魂》有云"虎豹九关"。可见,中国神话中的天关大门从来都是由一些虎形神人或神兽看守的。而既然"干支密码"告诉我们"轩辕(巳)"就是虎尾神"且=祖状之尸(巳)"的等价化身,那么我们对《楚辞·远游》记载的"轩辕不可攀援"之说就可以作出更完整的解释了:原来,《远游》的作者之所以在"得一"悟道前不敢攀爬天门,并非是因为他的"飞天"能力不够(这我们可以从下句"从王乔而娱戏"看出来,他本来就是仙人之同道,而且《楚辞》中的主人公从来都是"飞天"自如的),而是因为他惧怕看守天门的噬人虎神"祖状之尸三轩辕"。(而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人最喜欢把衔门环的"铺首"做成虎头形以镇宅门、把石虎立于墓前以镇阴宅宅门的习俗信仰之由来,参见图 5-7。)

B. 启明星(金星)。《史记·天官书》有云"亢为疏(荒)庙,太白庙也"。也就是说,正如前文所述,此"某某庙也"本是一种标准格式的中国占星学术语,其含义是指七大行星之一"启明星(太白)"与恒星星座"大荒落(亢)"本是一对"二位一体"的双神。那么,中国占星神话为什么要把"启明星(金星)"与"亢"星座视作同类呢?因为,金星的天文观测特征原本就是偕日共升、偕日共落,也就是有预兆"日出(象征生命诞生)"和"日落(象征生命死亡)"之功能的,其与"寿星一亢"星座所拥有的"预兆生死寿夭"神话职司无疑是相当吻合的。而另一方面,根据"干支密码","启"训门户开启,"明"通"幪"训幪障,"启明(巳)"之名显然也是由"大障一南门一亢(巳)"直接衍生而来的。因此,"启明(巳)— 亢(巳)"完全成立。可见,在天文学上标志日落西方的"西方太白金星"原本也是"轩辕一亢一旦(巳)"的象征物之一。

C. 轩辕之台。《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 畏軒轅之臺"。也就是说,"轩辕=南门"星神除了其本人负责镇守南天门外, 其副手化身"轩辕=西方太白星"还负责镇守西天的仙关,所以,面对这尊噬人 的"西宫白虎"神坐镇的正西方,任何的"射者"都是"不敢西向射"的。

D. 昆仑山与蒙谷。《山海经·海内西经》有云"昆侖之虚……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可见,作为"启明(开明兽)=轩辕"星神所坐镇的西天神山,昆仑山无疑也是"轩辕"的又一大著名象征物。而事实上,昆仑山还有另一个别名"蒙谷(蒙汜)",其作为神话中西方日落之地的代名词在中国古文献中也是常被提到的(见《楚辞·天问》)。而根据"干支密码","昆"通"阃"训阃门,"蒙"通"幪"训幪障、"汜"即"巳",明显都是代指"天门轩辕=大障(巳)"的,所以"昆仑=蒙汜=轩辕"成立。("昆仑"之"仑"则训沦落、没落,意指西方为日落沦没之地)。当然,在《山海经》、《庄子》等的记载中,昆仑山地区其实还有另一个古老的别名"都廣之野(少廣)","廣"通"横"训门屏、门栏,也是指代"轩辕=南门(巳)"的神话地名。(而"轩辕"之所以常被误认是"黄帝",很可能也是与此"横"字近似"黄"有关。)

E. 西王母陆吾。《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昆侖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可见,后世中国神话的核心人物"西王母"明显也是集"虎形"、"昆仑"、"西方"诸元素于一身的"轩辕"星神之"二位一体"化身,或者,更精确地说,她就是中国的金星女神(西方的金星女神则是爱神维纳斯)。而另一方面,根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的"昆侖之丘,是實為帝之下

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云云可知,所谓"西王母"其实仅是个头衔尊称,该女神真正的名字本叫"陸吾",也即《庄子》中的"肩吾"。而据"干支密码","陆"为"囿"之音近借字,训囿墙篱落,"肩"为"有(囿)"之形近讹字,故"陸吾=肩吾=囿吾=昆吾=轩辕(巳)"成立。总之,西王母囿吾(图 5 - 7)作为中国的金星女神,其原始神职就是掌管仙界西门"昆仑山(帝之囿)"的虎形看门女神兼延年益寿女神,也即后世所谓的"不死药"之所有者和看守者。而这一系列绮丽神话的起源,则明显是更古老的"轩辕=寿星(巳)"之占星神话。(按昆仑山、西王母等本出上古神话,而后世另有借用此神话命名诸多真实地名、国名者,例如《穆天子传》有周穆王游"昆仑之丘"和"西王母之邦"两地,《史记》有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等等,切不可混为一谈。)

F. 灵寿木(建木)。《山海经·海内经》有云"都廣之野······灵寿实华······ 冬夏不死",又云"有木,青葉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郭璞注云"灵寿,木名 也,似竹有枝节";《呂氏春秋·本味》高誘注云"寿木,崑崙山木也;华,实也,食 其实者不死,故曰寿木"。《淮南子·坠形》有云:"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 下。"显然,综合这几条记载来看,"灵寿木(建木)"这棵神树无疑也是"轩辕"星 神的又一重要神话象征物,因为该神树不仅长在了"轩辕=西王母"的神话领 地"昆仑山(都廣)"上,而且其树名也与"轩辕(巳)"一致:"建"通"健"训健康, 又通"键"训门户关键,"建木"与"寿木"明显都是代指地支星神"寿星=南门= 轩辕(巳)"的。因此,"灵寿木=建木"成立,它们都是延年益寿神"轩辕=西王 母"的必要神话道具。而一旦我们找到了昆仑山神话的真正吸引力其实就是 "灵寿木"这棵竹节形的"长寿不死神树",那么,我们也就找到了后世一切中国 神话的逻辑总源头了:"西王母"为什么会成为仙界的总领袖?因为她是生产 "不死药"的神树"灵寿木=建木"的拥有者(后世讹改成了所谓"蟠桃树"); "羿"为什么会成为仙界的头号叛逆英雄?因为他是唯一能成功偷到"寿木仙 药"的人(见《海内西经》"昆侖之虚……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嫦娥"为什么 会成为头号天仙美女?因为她是唯一能吃到"寿木仙药"而驻颜有术的人;而 《楚辞》则更认为,正是因为"轩辕不可攀援",人类攀爬不上寿木神树采摘不到 仙药,才被迫另辟蹊径研究起了"炼气"修仙道术……(据考古发现,龙山时代 的中国人确实是以饰有竹节纹(灵寿木纹)的最贵重陶、玉礼器作为祈求长寿 的信仰标志物的,而《汉书》所谓"赐太师灵寿杖"无疑也是此古老神话影响下

的文化遗迹,参见图 5-7。)

- G. 出门神"祖"。正如《诗经·大雅·烝民》所云"仲山甫出祖",中国古代出门皆需行"祖祭"。当然,这个出门神"祖"显然就是指古南天门之星神"且(巳)"。
 - H. 大司命。已见前述。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地支第六位星神"轩辕=且"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发展脉络,那么我们对"轩辕"神信仰与郑州地区的诸多地方文化特征之联系就会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了。

例如,根据《宋书・礼志》引《韩诗》记载的"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 两水上,招魂续魄,秉蘭草,拂不祥"云云可知,郑国地区本来就是中国"上已 节"的最早发源地,而溱、洧这两条郑国的母亲河则是"上巳"祭祀的中心圣地, 《诗经・郑风・溱洧》这首郑国名诗就是由此而作的。那么,"ト巳节"这个以 卫生健康(洗濯大潔)、延续生命(招魂续魄)为主题的文化节日为什么偏偏是 诞生在郑州地区的呢?显然,在我们确认了"轩辕(巳)"的先郑守护神地位之 后,我们对此千古之谜就可以给出最终的答案了,原来,所谓"上巳"乃是郑州 地区先民"五觀氏(轩辕氏)"祭祀其本地守护神"轩辕(已)"的全民节日,故该 庆典的举办日期选定在每年的"巳日"即"轩辕之日",该庆典的举办地点选定 在溱、洧这两条"轩辕国之河"的河畔,该庆典的主题活动是"轩辕=寿星=大 司命"的神话职司健康卫生、清洁沐浴、延命招魂,该庆典的象征道具则是"蘭 草"即門闌神"轩辕"的仙草("蘭"通"阑",本义为清洁卫生、阑障性命之草木, 故中国古代名兰之植物甚多,既有木兰也有兰草)。此外,后世的"上巳节(三 月三)"还有祭祀"西王母"的神秘习俗,无疑更能直接证明此古老文化节日与 "轩辕=西王母"神话的同源性。(又据《汉书·地理志》等记载,中国最早的 "延寿城仙人祠"也恰巧是位于"轩辕之丘"郑州地区附近的。)

又例如,《左传·宣公三年》有云:"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可见,"兰"本是郑国本地人认定的天赐"国花"(兰有国香)。那么,兰草为什么在郑国会拥有如此大的文化影响力呢?显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兰草文化与灵寿木神话一样,都是"轩辕"这尊先郑守护神留给这片美丽土地的标志性文化遗产。

再又例如,郑州附近地区为什么是中国神仙道教文化的两大发源地之一

(另一个即前述齐国故地),曾经诞生了"御风而行"的列御寇、"金丹鼻祖"魏伯阳这样的神仙道教界巨星?显然,假如我们考虑到郑州地区本来就是长寿神"轩辕=寿星"和不死药主人"西王母"的守护之地,是延年益寿、长生不死文化的策源地,那么我们对此地曾经率先孕育出这些神仙文化成果也是不会感到太惊奇的。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郑地方史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郑州地区的诸多顶级地名和文化特征找到了该地"古城寨遗址"等古城的主人"五觀氏(已)",并认清了"轩辕之丘"与"黄帝氏"、"有熊氏"的神话区别与地理联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凭此去重新解读那人神混杂、血统错乱的今本传世文献,并从中复原出真正有考古学依据的"先郑"地方史框架了。而综合对各种文献的重新解读,"先郑"的编年地方史框架最后可概括如下。

其一,约西元前26一前22世纪,"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山海经·大荒西经》);"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白虎通》)。也就是说,远在"夏后氏"称王称霸之前,"昆吾氏"这个号称"轩辕之国"的古老城邦就已经是一方小霸主了。而结合考古证据来看,"昆吾氏"作为"中原第一霸",其称霸范围当然最可能的就是其邻国兼胞族"有崇氏(夏后氏前身)"、"有仍氏"等城邦。考虑到"古城寨遗址"的城垣面积,在当时,它是仅次于"少皞氏"、"有虞氏"等"中央王朝"的实力型城邦。

其二,西元前 22—前 21 世纪,"启有五觀……"(《国语·楚语》);"昔有鄶君(五觀氏)啬俭,减爵损禄,群臣卑让,上下不临,後君小弱,禁罚不行,重氏(崇氏)伐之,鄶君以亡……"(《逸周书·史记解》)。也就是说,中国历史的"第一霸"五觀氏(鄶)在称霸一方几百年后,终于遇到了内外两方面的严重挑战:对内它被僭越的臣子逼迫而让出了政治实权(後君小弱),对外它又被原臣属国"有崇氏(重氏)"夺取了霸权。于是,在一场"重氏(崇氏)伐之,鄶君以亡"的激烈战争中,五觀氏(鄶)终于被有崇氏(重氏)的新国君启所打败,从此变成了"有崇氏"的附属国,而"有崇氏(夏后氏)"经此一战则奠定了其称王称霸几百年的基础。(按《逸周书》之"鄶君以亡"是出于周穆王时代的西周文献,所以不可能是指东周初年才灭亡的妘姓"鄶国"。不过,这两个"鄶国"确实是因为同处郑州地区而同名的。)

其三,西元前21世纪,"疆埸之邑,一彼一此……夏有觀(五觀氏)、扈……"(《左传·昭公元年》);"太康失国,昆弟五人(昆吾氏),须于洛汭……"(《史记·夏本纪》);"启九辩与九歌,夏康(太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後兮,五子(五觀氏)用失乎家巷……"(《楚辞·离骚》)。也就是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老霸主"五觀氏"虽然已被夏王征服,但在夏王太康时代还曾一度独立复兴,并率军人侵了夏的王畿之地"须于洛汭"。

其四,西元前20世纪,"浞……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靡自有鬲 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左传·襄公四年》);"昔有过浇杀斟 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左传・哀公元年》);"斟灌氏,夏同姓诸侯……" (《世本》);"其在啟之五子(五觀氏),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 厥国,皇天哀禹,赐以彭寿(靡),思正夏略·····"(《逸周书·尝麦解》)。也就是 说,"五觀氏(斟灌氏)"作为"夏后氏"的胞族在一度获得独立复兴几十年之后, 又第二次被外邦灭亡,这一次的征服者是更强大的敌人东夷"有穷氏"王朝。 而对比分析所有史料,这段历史明显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著名的"后 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和"逢蒙学射于羿",此"夏"据地缘关系分析明显应该是指 更靠近东夷的所谓"夏同姓斟灌氏","夷羿"在世时真正征服的"夏民"应该就 是指此虎牢天险以东的"斟灌氏"而不是指更靠西的"斟鄩氏"(夏之首都),而 "夷羿"对待这些"夏民"也明显是采用了半自治的"夏政",并让原"斟灌氏"的 王族"靡(逢蒙)"等继续担当本地的长官兼自己的大臣:而第二部分则是《左 传》所谓的"有过浇杀斟灌"、"靡奔有鬲氏",也就是说到了寒浞、浇时代,"有穷 氏"不仅要占用"斟灌氏"的国土,更要杀光或赶跑土著的"斟灌氏"族人,用东 夷殖民者彻底取而代之,并在此建立"有穷氏"的新都城"寒(閈)=轩辕"(此即 规模巨大的"新密新砦遗址")。从此,古老的"斟灌氏"部族就开始四散流亡 了。而其精英余烬则由"靡"率领逃到了夏人的南方后院之一"有鬲氏"地区 (详见下文),并与自己的胞族"斟鄩氏(夏后氏)"结成了抗夷复国的同盟。而 第三部分则是"靡(彭寿)"这位夏王朝复国中兴的头号英雄率领"斟灌"、"斟 鄩"两族联军打着拥护夏王"少康"的名义逐步打败了"有穷氏",初步收复了失 地。当然,我们之所以能复原出以上这段曲折的历史,最终完全是依赖"干支 密码"告诉我们的"彭寿=靡"这一关键结论:"彭(逢)"通"閱","寿"训门幪, "靡"音"糜"(門),"逢蒙"《荀子》作"蠭門",作为人名都是代指"寿星=南門 (巳)",故知"彭寿=逢蒙=靡(巳)"成立。

其五,西元前 20—前 18 世纪,"帝宁(杼)……迁于老丘……"(《古本竹书纪年》);"昔者夏后启(扃)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墨子·耕柱》);"昆吾作陶……"(《吕氏春秋》)。也就是说,自从"昆吾氏(五觀氏)"和"斟鄩氏(夏后氏)"两族在战斗中结成生死友谊的同盟之后,这两个原本就血缘相近的城邦从此就彻底整合为唇齿相依的一体了,昆吾城不但依旧是夏王朝最坚强的东方屏障,而且在"帝宁"、"扃"等时代一度还是其都城(陪都)所在地和工商业中心。所谓"老丘(巳)",当然就是指新郑地区的"寿丘=轩辕之丘(巳)";所谓"昆吾作陶"、"昆吾铸铜",其实就是指夏王朝的"陶铸工业"当时一度是由"昆吾氏"(望京楼遗址)一族所垄断的,而这时正是中国锡青铜工业的开端年代。所以直到周代,专业铸造者仍然被习惯性地称为"昆吾氏"(例如《逸周书·大聚》有云"乃召昆吾,冶而铭之金版")。

其六,西元前17世纪,"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始征……" (《孟子•滕文公下》);"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 行……"(《荀子·解蔽》);"昔者桀杀关龙逢……"(《庄子·人间世》);"汤自把 钺以伐昆吾·····"(《史记·殷本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经·商 颂•长发》)。也就是说,作为夏后氏的唇齿之邦,"昆吾氏=葛=关龙氏"直到 最后的时刻仍然是夏王朝的最有力捍卫者,它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拯救夏桀, 但三次努力都被夏桀给破坏了: 第一次是昆吾的君主"葛伯"(可能就是关龙 逢)为了阻止商汤的侵略而主动进行内政改革"放而不祀"强军简政("葛"通 "阖"训阊阖天门,作为地名明显是守护神"轩辕=南门=巳"的代称,可见"葛 国"即昆吾氏之别名),但"葛伯"这种改革努力却被夏桀所信任的亲商汤内奸 散布谣言说成是"葛伯仇饷",于是商汤得以找到借口提前对"葛伯"开战(地点 当即"郑州大师姑城址"),从而彻底打乱了夏王朝的整体战略部署(但此战后 殷人并未获得实质性胜利,所以最后还要有商汤二征昆吾氏);第二次是昆吾 的君主"关龙逢"进谏夏桀不要中了伊尹、斯觀等敌国的反间计,但"关龙逢"反 而被谗杀("关龙氏"本为"昆吾国=管国"之别名前文已证);第三次是昆吾国 面对吞并了韦、顾等国之后无比强大之商汤进行的最后总动员保卫战(地点当 即"望京楼城址"),但由于得不到夏桀的援军而彻底亡了国。总之,正是由于 夏桀中了反间计、美人计等而自毁长城三次都拒绝了昆吾氏的帮助,才最终导 致了商汤可以乘虚而入。

其七,西元前 17一前 11 世纪,"汤归自夏,至于大坰"(《尚书·序》);"伊

尹放大甲干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 立其子伊昳、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古本竹书纪年》):"仲丁迁于 嚣……祖乙圮于耿……"(《书序》):"祖乙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古本竹书纪 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载民》,二曰《玄鸟》……" (《吕氏春秋·古乐》):"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山海经·海内 经》)。也就是说,西元前17世纪,在"昆吾国"被灭亡之后,殷人在此兴建的 "郑州商城遗址"就成了商汤、太甲等殷王们的陪都和镇压夏遗民伊尹族人叛 乱的大本营"大坰"。"坰"一作"桐"、"耿(炯)",皆古之通假字或同义字,都是 此地守护神"南门=轩辕(巳)"的代称;而从西元前16世纪开始,郑州地区的 两座城池更先后成为殷商王朝的正式首都,其中"郑州商城遗址"这座太甲所 居的陪都旧城"桐=耿=大垌"是仲丁正式建都之城("耿"故地在周代改名 "嚣",故《书序》称"仲丁迁于嚣"),而"郑州小双桥遗址"则是两元前 15 世纪 "祖乙圮于耿"后所建之新城"庇"。"庇"通"閟"训閟门,即春秋古战场"邲"和 今地名"新密"之同义词,也是守护神"南门=轩辕(巳)"的代称。(事实上,殷 王建都于郑州地区正是造成"轩辕之丘"后来变成"黄帝氏"之同义词的原因之 一,因为"黄帝"是殷人的守护神,说见下文。至于南庚所迁"奄"则是"大问"二 字合文之讹。)而从此之后,虽然西元前 14 世纪著名的"盘庚自奄(大坰)迁殷" 使得昆吾故地不再是殷都,但此地仍然是殷商支族"葛天氏"的封地(即《左传》 殷民七族之"樊氏",或从音乐之乡韋国迁来),该族人以擅长音乐文艺而著称,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创作了《玄鸟》等八篇诗歌的"帝俊八子(八个后裔)"。(当 然,此风气也是造成本地盛行"郑衛之风、靡靡之音"的源头。)

其八,西元前 11—8 世纪,"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郐仲恃险……君(郑桓公)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国语》)。也就是说,在武王灭商之后,昆吾故地这块商王畿最后又变成了姬姓"管国"和妘姓"郐国"之封地,而此两国的国名显然还是沿用着此地的古地名:"管"通"關"即"關龙氏","郐"如前述即"有郐氏"。(事实上,妘姓"郐国"建国于郑州地区正是造成"轩辕之丘"后来又变成"有熊之墟"和"祝融之墟"之同义词的根本原因,因为妘姓"郐国"本是"祝融之後"别号"有熊氏",详说见下文。)而直到西元前 8 世纪,随着周王室的东迁和郑武公的东征灭妘姓郐国建立姬姓郑国,门神兼长寿神"轩辕"对这方沃土的文化统治才彻底结束,"先郑"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取而代之的则是今天我们所熟知

的郑国、郑州之历史。

七、阳谷景阳冈龙山文化 城址群与有扈氏考

众所周知,今山东省东平湖、菏泽地区在 3 000 多年前本为风姓须句国、姬姓曹国等诸侯的领地。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上世纪发现的"阳谷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图 5-1)等东平湖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须句国作为一个古老城邦,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还至少可以追溯到 4 000—4 600 年前的"龙山时代"。

(1) 景阳冈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景阳冈遗址位于今阳谷县城东 20 公里的景阳冈村,其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址平面为舟形,呈东北一西南轴向,长 1 150 米,宽 280 米至 370 米不等,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该城址是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山东龙山文化城址①。此外,在该城址之上还发现叠压有岳石文化的城垣残基;而在该城址的四周不远,还有若干个规模较小但始建年代更早的姐妹城址,例如阳谷皇姑冢城址(城址面积约 6 万平方米)、阳谷王家庄城址(城址面积约 3 万一4 万平方米)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密集的古城址群。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规模非凡、历史久远的古城址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阳谷、菏泽、鄄城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顧国、任国、宿国、须句国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城邦群的主人们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七位"相(午)"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 阳谷:该地名源出《山海经》所谓的"常阳之山(常羊之山)"而始见于《左传》,为春秋著名的会盟地,今沿用为县名,而根据"干支密码","常阳(常羊)"即是"相羊(徜徉)",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是指地支守护神"敦牂=相(午)";
- ★ 菏泽:该地名始见于《尚书》等,今沿用作山东省之市名,而根据"干支密码","菏(涸)"古音"顧(固)",训看顧,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是指地支守护神

① 王守功:《山东龙山文化》,2004年,第42—47页。

"天睢=相(午)";

- ★ 鄄城:该地名始见于《史记》等,今沿用,而根据"干支密码","鄄 (juan)"古音通"豢"、"眷",训绳豢绑缚、眷顧看视、徽缠看守(《广韵》"甄,音券,视也"),作为地名也是指地支守护神"天徽=相(午)";
- ★ 顧国:即今范县,该古国名始见于《诗经·商颂·长发》之"章、顧既 伐",而根据"干支密码","顧"通"扈"训看顧徽守扈止拘禁,作为地名也是代指 地支守护神"天徽=相(午)";
- ★ 任国: 即今济宁市,该古国名始见于《左传》,而根据"干支密码","任 (凭)"通"憑(馮)",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憑翼=相(午)":
- ★ 宿国:即今东平县,该古国名始见于《左传》,而根据"干支密码","宿" 通"束"训束缚徽缠,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天徽(午)";
- ★ 须句国:即今梁山县,该古国名始见于《左传》,而根据"干支密码", "须"训须留、安宿、安祥,"句"训拘止、徽缠看守,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 支守护神"天徽=相(午)"。

(2) 有扈氏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景阳冈遗址"之主人的明确范围,即该先商古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相(午)",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城邦,那么,我们要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时代属于先商"和"国名干支属午"这两大条件的古国在可靠的中国史料记载中只有唯一一个,那就是在中国古籍中到处可见其名的"有扈氏".

《左传·昭公元年》有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 无淫者也……"

《史记·夏本纪》有云:"有扈氏不服,(夏王)启伐之,大战于甘……"

《楚辞·天问》有云:"(殷先王)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 牛羊……"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扈(雇)"训扈止、看顧,"有扈氏"作为顶级地名兼国名、族名无疑就是代指主司扈民安邦、守护安祥的地支守护神"相(午)",其与阳谷、顧、宿、须句等诸多"景阳冈遗址"附近的顶级地名是完全等价同源的。因此,"有扈氏"作为一个既能满足存在年代属于先商,又能满足国名干支含义属于"午"的著名古国,其地理位置和废墟遗迹只可能是指"景阳冈古城址群",

而不可能是指其他时空的古文化遗址。而另一方面,我们从地缘格局的分析来看,首先,考古学发现的"景阳冈城址"恰好位于"山东龙山文化"的最西边缘,向西就是与"河南龙山文化"的交界过渡地带,这与史料记载的"有扈氏"既属于东夷"少皞氏"之胞族,又主要与其西部的夏王朝及先商王朝发生政治斗争关系的记载是完全可相吻合的;其次,"景阳冈城址"那38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堡本身也足可证明,它确实是一个后来居上能有实力压倒其旧盟主"少皞氏"而与夏王启"大战于甘"一争高下的东夷诸族之新领袖,《汉书·地理志》等所谓"有扈氏"在今陕西户县(鄠县)的说法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陕西至今未发现有可与夏王争霸的龙山城址,且其地也非东夷);最后,"景阳冈城址"所统领的龙山文化"景阳冈类型"和"王油坊类型"这两种基本近似的古文化类型其分布区完全占领了山东、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①,即使刨除诸多的古代湖泊沼泽面积(当时此地为巨野泽、雷夏泽、孟诸泽等一系列巨大的湖泊沼泽所覆盖)其本身占地面积和向外辐射距离仍然都是同时代的诸文化类型中最大的,而这种考古特征也与文献记载的"九扈氏"至少有九族之多远超"五鸠"或"五雉",是所有东夷古国中体量最巨大者之史实也是完全吻合的。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阳谷景阳冈 龙山文化城址"其实就是先商时代"有扈氏"城邦的中心废墟,它是一个夹在 "少皞氏"王朝之后和"有穷氏"王朝之前这几百年间称霸整个东夷地区的东夷 领袖城邦。

(3) 有扈氏守护神"相(午)=羿(午)"与梁山泊文化的起源

当然,除了"有扈氏"、"阳谷"、"顧国"等古今地名,"相"神作为一尊历时几千年的本地守护神,其能留给东平湖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倉(相)"神原来并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神话英雄"羿"之历史原型(图 5-8)。

众所周知,中国古文献中共记载有两个"羿",其一是凡间的英雄国王"有穷后羿",其二则是天界的英雄神祇"射日之羿"。那么,上古的"相"神为什么与"射日之羿"本是同一尊神祇呢?因为,一方面,"羿"通"翼","羿"、"相"作为神祇名都是代指地支第七位"翼=相(午)","羿(子)=相(子)"是明显成立的;

① "景阳冈类型"和"王油坊类型"无论在地貌生态上还是在文化特征上都是十分相似的,参见王守功:《山东龙山文化》,2004年,第131—133页。





图 5-8 相神=羿的象征物:龙山文化的绳纹鸱枭耳白陶鬶(西元前 3 千纪)、商代的鸱枭青铜尊(前 17—前 11 世纪)、汉代的羿射扶桑十日画像砖(前 202—220 年)

而另一方面,《山海经·海内经》也早就明确告诉我们"帝俊("俊"字当为衍文) 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也就是说,天神"羿"的职司是"扶下國"、"恤百艱"、救苦救难、守护安祥,这与"冯翊=相"星座的占星神话含义"凭靠翊护"也是完全吻合的。当然,除了"羿"这个最著名的人格化形象,古老的"相"神信仰还给中国文化留下了其他的一些极其重要的象征符号,兹举几例如下:

A. 弓箭和矰绳。正如《海内经》所云,"彤弓素矰"天然是"羿"的神话道具象征物,几千年来从未改变。而甲骨文"午"字的造型如前述也是一条"安全绳",与矰绳同义。

B. 扶木(扶桑)。《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可见,按照《大荒东经》这种甲骨文级文献的权威描述,"羿射十日"这个中国神话的原型本来应该是"羿收发十日于扶木",因为,按照"干支密码","扶"训扶助、辅翼,也即"羿扶下國"之"扶",本是"翼=相(午)"星神的代名词,所谓"扶木(扶桑)"就是"羿神之树"的意思。而中国神话之所以要把"金乌十日"所居住的神树叫做"扶木(午)",则是因为"翼(午)"星座所代表的天文学"斗建"方位恰恰是"正南方午位",是每天太阳最高时所处的方位。所以,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午"与太阳是密不可分的:太阳最高的空间方位叫"正南

午",太阳最高的时间刻度叫"日中午",而代表了太阳由上升到下降之转折点的"太阳神树"当然也应该叫"午木"即"扶木"。至于后世的人们常把"羿神运转扶桑十日"的神话说成是"羿射扶桑十日",则完全是因为要与"羿"的另一象征物"彤弓素矰"整合混编为单一故事所导致的。

C. 常羊山(湯谷)。《山海经·海内经》有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人。"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此"常陽山(常羊山)"就是前述"湯谷"之同一神话地名,因为"陽(羊)"即"湯",都是"翼=相羊(午)"星神的代名词。当然,"湯谷"作为神话中太阳的出没老巢其义与"扶桑"完全等同,都是代表了"羿神"。而正如前述,今山东省阳谷县之名其实也是直接由此守护神神话衍生而来。

D. 太阳和金乌。《楚辞·天问》有云"羿焉彃日,烏焉解羽"。也就是说,正如许多学者早就指出过的,"羿"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日神。只不过,"羿"充当日神仅仅是一种兼职,他是通过"翼(午)"星座与七大行星之一"太陽星(日)"的占星学"二位一体"关系而最终成为日神的。而一旦我们理解了行星"日"与"翼(午)"星座的占星学等价关系,那么我们对"日"为什么又叫"太陽星"这个问题也就能给出其最终答案了:原来,"太陽"之"陽"字的本义是指"常陽山"或"暘谷(湯谷)"之"陽",也即"相羊"之"羊";"太陽星(太祥星)"的最初始含义其实是"看顧安祥之大星"的意思,而不是代表什么"陰陽"之"陽"的意思。当然,关于"羿(午)=太阳神(午)",我们除了可以从"干支密码"中找到证明,也还可以从《楚辞·九歌·东君》中找到旁证:"照吾槛兮扶桑……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可见,除了"扶桑"这一象征物,中国太阳神"东君"的喜欢弯弓射箭也是与"羿"完全相同的。

E. 鸱枭(猫头鹰)。《楚辞·九歌·东君》有云"操余弧兮反沦降……杳冥冥兮以东行";《楚辞·天问》有云"鸱、龟衔曳"。也就是说,结合前述"頵羝(群鸱)上有扶木"的记载,我们还可以知道,"鸱"(图 5-8)也是与扶桑树和"翼"星座神话有关的,因为太阳在中国神话中除了白天被天上的金乌运载往西行,黑夜里还必须要被地下的鸱枭(著名的守夜鸟)运载往东行,以构成"东升西落"的完整循环。

F. 方相氏。《周礼·夏官·方相氏》有云"方相氏……黄金四目……以索室歐疫"。可见,这个后世著名的看家驱鬼神祇"方相氏"其实就是"扶下國恤百艱"的天神"羿—相"之同一人,因为他们不仅神职相近,造型相关(黄金四目

喻义太阳般明亮的眼睛可以看顧守护,也即喻义"天睢=太阳"星神),而且名字本身就完全相同都叫"相"。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地支第七位星神"相=羿"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总体发展脉络,那么我们对"羿"神信仰与东平湖地区的诸多地方文化特征之联系就会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了。

例如,关于这块古称"巨野泽"或"梁山泊"地区的民风,《史记·货殖列传》 为什么会有"能恶衣食,致其蓄藏"的评价?显然,假如我们考虑到此地的先民 早在 4 300 多年前就已经选择了"羿"这尊挑战百艰、守望安祥的天神为其精 神文化的支柱,那么我们对"羿"神的子孙们能够以吃苦安平、善于守藏而著称 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

又例如,在这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含景阳冈类型)"的分布区,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是"墨家"这种以"墨守"和"墨侠"而著称的文化思想之发源地?显然,假如我们能考虑到此地更早的"羿"神文化本来就是强调看守翊护、扶下恤艰、抱打不平,那么我们对宋国大夫墨子的理论和行动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

再又例如,在古梁山泊周边数百里的范围内,为什么恰好就是中国"侠文化"和"梁山好汉文化"的发源地,并诞生了"侠客鼻祖"墨者集团历代"巨子"、"好汉鼻祖"盗跖以及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彭越、宋江等等一系列好汉式的人物?显然,假如我们考虑到"羿"这尊好打不平的神祇对此地居民的几千年潜移默化之影响,那么我们对此也是不会感到太奇怪的。

总之,事实证明,以绳纹陶器(图 5-8)为特色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含景阳冈类型)"确实就是增绳之神"羿"的守护地,这是一个唯一能完整解释以上种种梁山泊文化之起源的可靠结论。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须句、先曹地方史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东平湖地区的诸多顶级地名和文化特征找到了该地"景阳冈遗址"等古城的主人"有扈氏(午)",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复原出一份真正有考古学依据的"先须句"、"先曹"地方史之编年框架了,下面是我们初步可以得到的复原结果。

其一,约西元前 25—前 24 世纪,"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左传·昭公元年》)。也就是说,早在近 4 500 年前,以"阳谷皇姑冢城址"为都城的"有扈氏"作为"少皞氏"王朝的臣属城邦之一就

已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之中了。当然,《左传》所谓的"九扈氏"被封官为"九农正"的说法我们并不能按字面直接去理解,事实上,"九扈氏"除了是"少皞氏"名义上的臣属外是完全独立自治的,其所谓"扈民无淫者"的职责很明显是与"农正"(为"少皞氏"提供农业服务)无关的,其真正的历史含义应该是指该城邦在"少皞氏"王朝的认可下自主选择了守护神"相=羿"及其同义的国名"扈(雇)"这一历史性事件,因为"扈民无淫"(看护驱邪)如前述正是"方相氏=羿"的神职。

其二,约西元前 24一前 22 世纪,"有池名孟翼(有扈氏)之攻顓頊之池……"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曰鑿齒,羿(有扈氏)殺之……"(《山海经·大荒南经》)。也就是说,由于"九扈氏"这个号称"九族合一"的强大政权本来就人多势众,势力远及曹、宋之地(王油坊类型),她的综合国力后来居上很快就超过了"少皞氏",她的国都也从 6 万平方米的"阳谷皇姑冢城址"迁到了 38 万平方米的新城"阳谷景阳冈城址",一举超过了 20 万平方米的"章丘城子崖遗址"(少皞氏之都)。而以此国力变化为基础,"有扈氏(孟翼氏)"更在中国历史中写下了最早两场"国际战争"的记录,在距今大约 4 300 年前,先是一举打败了北方的"准中央王朝"少皞氏(顓頊之国),再是大举入侵并消灭了东南方的非汉语古国"鑿齒氏",从此开始了其长达 200 年称霸东夷的历史。(按"孟翼氏"即《说文》所谓"老扈氏",是"九扈氏"中的王族,其地位相当于前述的五鸠王族"爽鸠氏"或五鸟王族"凤鸟氏"。)

其三,约西元前 21—前 19 世纪,"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 (《史记·夏本纪》);"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 (《左传·昭公元年》);"有夏之方兴也,扈失弱而不恭,身死国亡……"(《逸周书·史记解》)。也就是说,作为东夷的总盟主而且是地域最靠西的东夷城邦,"有扈氏"对于新崛起的西邻"夏后氏"王朝要凌驾于自己之上而称霸整个天下当然是不服的,所以这两大强国最终"大战于甘"("甘"通"阚",也训阚视、监守,"天睢三午",即今梁山县之古阚城)。不过,由于"夏后氏"对其属国的统治相对更为有力且资源充沛军力强大,而"九扈氏"对其东夷盟邦不过是"羁縻"而已(且其本身也是一分为九的)无法集中调度资源,所以"有扈氏"最终还是因实力"失弱"而战败了,其国王"身死",其政权"国亡",其遗民最后只能投靠孪生城邦东夷"有易氏"而变成了后者的附庸国。

其四,约西元前 19—前 18 世纪,"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 夫牛羊……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楚辞•天问》);

"有因民國,勾姓黍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博)于有 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伯念(稔)有易,有易潛出,為國王獸, 方食之,名曰搖民(因民)……"(《山海经·大荒东经》);"不降即位,六年,伐九 苑(九扈)……"(《古本竹书纪年》)。也就是说,西元前19世纪时,"有扈氏"早 已完全失去独立而成为了"有易氏"的附庸组成部分,《楚辞》所谓"有扈牧竖"、 "其命何从"完全指出了此时的"有扈民"仅仅是"有易民"的听命仆人和影子。 两国早就合并为一了(所以古文献往往将该两族名字混用,例如"有易潜出"实 际即指"有扈潜出","弊于有扈"实际即指"弊于有易")。然而,西元前 19 世纪 的"有扈氏"听从"有易氏"的命令杀害殷王王亥并没有给它带来好运,此后不 久夏王"不降(循鞈)"在殷王上甲微的请求下命令其手下的大将"河伯"率夏王 朝大军出兵攻打"九扈氏(九苑)"和"有易氏"正是由此直接导致的。而在夏、 殷两国联军的强大攻势下,有扈、有易这两个东夷古国终于被"稔(灭)"掉 了①。从此,"九扈氏(九苑)"的战俘们就被替乃祖报仇的殷王带回国内变成 了所谓的"因民": 据"干支密码","因"训因凭依托,"苑"古音通"絭(鄄)"训絭 缠看守,都可代指"慿翼=天徽(午)",本都是"有扈氏(午)"的别称。显然,这 些"因民"的结局只能有两种,他们要么是变成殷王鬼魂"方食其头"的活杀祭 品,要么就是变成"为国于兽"的放牧奴隶。而"有扈氏"的土地则作为夏王朝 的战利品被分封给了夏王的近臣同族们,建立了血统完全不同的新"顧国",此 即《说文》所谓的"扈(顧),夏后同姓所封"。

其五,约西元前 17 世纪,"昔爽鸠氏始居此地……(顧伯)季前因之……" (《左传·昭公二十年》)。也就是说,作为夏王新分封的诸侯,"顧国"的势力一度是相当强大的,其不仅坐拥有扈、有易两地,而且在末代顧伯"季荝(夏耕)"统治的时代还向东征服了"烈山氏"("少皞氏"的继承者)、"爽鸠氏"这两大古老城邦,成为夏王朝半壁江山的拥有者,即史称的"苞有三蘖"之首。

其六,西元前 17一前 11 世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诗经·商颂·长发》);"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季荝)……"(《山海经·大荒西经》);"(顧伯)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左传·昭公二十年》)。也就是说,随着夏王朝的衰落,作为夏王属国的"顧国"自然免不了成为商汤王"九征"的对象之一。而在商王成汤和逢国君主逢伯陵的东西两面夹击之下,同样尊

① "稔"为熟透终老、收割灭亡之意,词例可参见《左传・昭公十八年》"是昆吾稔之日也"。

"羿"为本国守护神的"顧国"就此亡国,此地从此就成了殷商王朝的"东土"重镇。不过,镇守此地的殷人也仍然是沿用着此地古老的信仰和古老的地名的,例如《左传》中被鲁国接收监管的"殷民六族"之"萧氏":根据"干支密码"易知,"肃(萧)"通"宿"训止宿安祥,也是代指"相祥(午)",周代的风姓宿国无疑是在殷遗民"萧氏(宿氏)"被发配迁徙到鲁国后而占据其故地殖民立国的。

其七,西元前 11 世纪一西元前 639 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也就是说,随着武王伐商和周公东征,自西元前 11 世纪起,此地又被周王朝重新分封给姬周的"西土"近亲,属于"太皞之後"的风姓任、宿、须句诸族。因为,周王朝对于与其比邻而居、通婚有年的"太皞氏(有虞氏)之後"一向都是很信任的,历来都将他们视作是与己同类的"诸夏之国",所以在封完了姬姓的王子之后,其所征服的多余土地自然就要尽量分给他们去镇守,比如同属"太皞之後"的妫姓陈国、姜姓齐国等等,而风姓任、宿、须句国当然也忝在其列。不过,既然"同甘"就必须"共苦",当西元前 639 年"邾人灭须句"之时,姬姓的国君们(鲁僖公)和风姓的公主们(须句国公主成风)对于这场"蛮夷猾夏"之变显然也是"感同身受"而齐声哀叹的。

八、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 城址群与有易氏考

众所周知,今山东省聊城附近的古夷仪聚在 2 600 多年前一度曾为姬姓邢国的所在地(前 659—前 635 年)。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本世纪新发现的"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城址"(图 5-1)等聊城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夷仪邢国虽然是个短命的小国,但其所继承的本地城邦文明或地方史其实却源远流长,至少还可以追溯到 4 000 多年前的所谓"龙山时代"。

(1) 教场铺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教场铺遗址①位于今茌平县南乐平铺镇教场铺村的西北,其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东茌平教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城墙的发现与发掘》,《考古》2005 年第1期。

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或环壕聚落)呈东西略长、南北略短的椭圆形,城圈内东西约 230 米,南北约 180 米,总面积近 5 万平方米;而其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址平面呈横长方形,加上城垣宽度估计面积可达 40 万平方米左右。此外,在该城址的四周不远,还有若干个规模较小的姐妹城址,例如东阿王集城址(城址面积 3.8 万平方米)、茌平大尉城址(城址面积约 3 万平方米)、茌平乐平铺城址(城址面积 3 万余平方米)、茌平尚庄城址(城址面积约 3 万平方米)等等①,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迄今所知最密集的龙山文化古城址群。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密度超群的古城址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这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聊城、茌平、东阿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古济水、榖國、夷儀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城邦群的主人们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八位"壮(未)"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 聊城:该地名始见于《左传》之"聊、摄以东",为春秋时代齐国之西境,今则沿用为地级市名,而根据"干支密码","聊"通"柳",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是指地支守护神"柳=壮(未)";
- ★ 茌平:该地名源自本地之山丘名"茌山",而始见于《汉书·地理志》,今沿用为县名,而根据"干支密码"易知,"茌"本当作"莊",《汉书》因要避汉明帝刘莊之讳而改,"莊(壮)"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是指地支守护神"壮(未)";
- ★ 济水: 古济水为"四渎"之一,今聊城东面之黄河大体与古济水故道相当,而根据"干支密码","济(剂)"本训调味剂、滋味调和协治,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协治=壮(未)";
- ★ 穀國:即今平阴县,该古国名始见于《春秋》之"穀伯綏來朝",而根据 "干支密码","穀"训五穀食粮、飯餾(柳),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 "柳=壮(未)";
- ★ 阿: 今东阿源自古"阿邑";今聊城古有夷儀聚,即《左传》之"齐桓公迁邢于夷儀",而根据"干支密码","阿(猗)"、"夷"、"儀"都通"颐"训颐养贪吃,作为地名其本义都是指地支守护神"咮=壮(未)"。

① 以上遗址究竟是夯土城墙还是堌堆、环壕聚落遗址仍有争议,但就像夏墟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都没有外城墙一样,城市并不一定要有城墙。参见栾丰实:《海岱地区史前考古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5 期.

(2) 有易氏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教场铺遗址"之主人的明确范围,即该先商古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壮(未)"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城邦,那么,我们要找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时代属于先商"和"国名干支属未"这两大条件的古国在可靠的中国史料记载中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我们前文已经屡屡提及其事迹的"有易氏(有狄氏)",别名"五雉氏":

《左传·昭公元年》有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 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云:"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因民=有扈氏)······"

《楚辞·天问》有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昏(唇)、微遵跡,有狄(有易)不寧……"

《周易》有云:"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後号啕,丧牛于易,凶……"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狄(易)"通"翟"训翟雉、鹑鸡等啄食不停的"贪吃"鸟,"有易氏(五雉氏)"作为顶级地名兼国名、族名无疑就是代指主司厨灶食物和田业的地支守护神"壮(未)"的,其与聊城、茌平、济水、穀國、东阿等诸多"教场铺遗址"附近的顶级地名是完全等价同源的。因此,"有易氏"作为一个既能满足存在年代属于先商,又能满足国名干支含义属于"未"的著名古国,其地理位置和废墟遗迹只可能是指"教场铺古城址群"而不可能是指其他时空的古文化遗址。而另一方面,我们就地缘格局来看,考古发现的"茌平教场铺城址"与"阳谷景阳冈城址"基本上是以一对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都十分接近的孪生"双城"形式出现的,而这种"双城"关系显然也与史料中的"有易氏"和"有扈氏"总是结对出现形同孪生的关系是完全可以互为吻合的(例如《左传》中的工正"五雉"与农正"九扈"相配对,《山海经》中的"有易"与"因民"互指等价,《楚辞》中的"有扈"与"有狄"互指等价等等)。此外,相比传统所谓的"有易氏位于河北省易水河畔"的说法,"茌平教场铺城址"无疑也比"易水河畔"要更接近安阳地区的"商王王亥"以及濮阳地区的"僕牛氏",更符合史料所载的这几个城邦之间存在的频繁往来关系。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茌平教场铺 龙山文化城址群"其实就是先商时代"有易氏"城邦之废墟,该城邦县继"少皞 氏"、"有扈氏"、"有穷氏"这三个城邦之后称霸东夷地区的另一个小霸主。 ("茌平教场铺遗址"的岳石文化古城是当时东夷地区最大的古城。)

(3) 有易氏守护神"壮(未)=后稷(未)"与姬周王朝起源之谜

当然,除了"有易氏"、"聊城"、"济水"等古今地名,"壮"神作为一尊历时几千年的本地守护神,其能留给聊城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臧(壮)"神原来并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中国著名的稼穑田神"后稷"之历史原型。此外,作为地支第八位"星鸟=鹑火(未)"星座之星神,"壮"同时也是我们最熟悉的神鸟"凤凰(鸑鷟)"之历史原型(图 5-9)。



图 5-9 壮神=后稷的象征物:龙山文化的"鸟喙形"(咮形)三足黑陶鼎(前3千纪)、西周青铜鼎上的"凤鸟"(鸑鷟)纹饰(前11—前8世纪)、汉代画像砖上的"朱雀衔食"(西元前202—220年)

"后稷"究竟是人还是神?显然,在我们知道了《史记》所谓的尧、舜之典乐官"乐正后夔"、殷王纣之开矿官"蜚廉"等等本来皆非史实人物而是守护神之后,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史记》所谓的尧、舜之"农师",其身份显然也是很容易分辨的。毫无疑问,就以下几方面的证据来看,"田正后稷"与上述的"乐正后夔"、"蜚廉"等一样其真实面目本来也应该是一尊神祇——"有易氏"城邦的守护神。

其一,《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云:"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也就是说,"后稷"本来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由上古及于商朝代代有之的所谓"古官名"。而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中国上古官名无一例外原都是以各城邦的守护神命名的,也即按所谓"某师而某名"命名的,因此,"稷"这个名字无疑也应该首先是个守护神之名。而根据"干支密码","稷"训禾谷、餾粮;"注(柱)"古通"咮(噣)"训鸟喙啄食,明显都是代指地支第八位"柳(餾)=咮=星鸟(未)"的,所以,"后稷(未)=

柱(未)=有易氏(未)"成立,"后稷"最早确实是"烈山氏(少皞氏)"的子城邦 "柱(有易氏)"的守护神。当然,晚到商代他还成了周人的守护神。(至于"弃(丑)=后稷(未)"则明显不能成立,可见"后稷"绝非周始祖"弃"的私名。)

其二,《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稷降以百谷",也就是说,"后稷"本来就是一尊从天而降赐给人间百谷种子和无尽食物来源的天神,而不是后世儒家所谓的"能殖百谷百蔬"的种地苦力。因为,会"盗火种"的一定是天神普罗米修斯,而天天都烧火的只是火头军;会"降百谷"的一定是天神后稷,但年年都种植百谷的只是苦力老农。这两类行为的区别在古人看来绝对是云泥有别、不容混淆的,"赐种赐基因"的权力显然只属于天神而非凡人。因此,"后稷"的神祇身份显然是有甲骨文级别的古老文献为证的,至于后世的某些儒家著作把他说成是一个脾气古怪而喜欢玩泥巴种地的凡间国王则明显是无稽之谈。

其三,《春秋元命苞》有云"稷,岐颐目求,是谓好农,盖象角亢,载土食谷",也就是说,"后稷"的长相并非是凡人,而是一个大嘴裂开、两眼贪婪乞求、头尖似角、专吃谷物的怪物。而现在证之以《楚帛书·壮神图》,我们发现这两者居然是完全吻合的,战国的"壮"神也是被画成张口吐舌、头尖似角、大肚贪吃之神怪的。因此,据此记载,"后稷"也明显是"壮(未)"神的别名而不是任何凡人。

因此,比照以上三点证据,我们得出的综合结论就是:"后稷"本来的身份确实是神而非人,他其实就是《楚帛书》中的地支第八位神祇"壮(未)",也即"有易氏"的守护神。当然,除了"后稷",古老的"壮"星神其实还有许多别的化身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

A. 饕餮。正如《吕氏春秋·先识》所云"周鼎著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饕餮"作为一个中国最著名的贪吃鬼,无疑天然是《楚帛书》中的长舌贪吃神"壮"的最好象征物。

B. 巨人和大人国。《史记·周本纪》有云"后稷……为儿时, 屹如巨人之志"。也就是说, 田神兼食神"后稷"的另一著名形象就是"巨人", 而该神守护之国则为"大人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云"有波谷(榖)山者, 有大人之國", 显然, 这个"大人国"的地名"穀=稷(未)"就是指其巨人守护神"后稷"。那么, 中国神话为什么要把"后稷"说成是个巨人呢?因为, "壮=后稷=饕餮"本来就是个大肚子的贪吃鬼(见《楚帛书》), 其营养最好、肚子最大、身体最胖最高, 他不做"巨人"谁还配做"巨人"呢!

- C. 凤凰(大鹏、朱雀)。《庄子》有云"鹏(凤)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鹏即庞也,为"凤"的本字;《说文》有云"皇,大也",皇即"凰(鵟)"本字。也就是说,中国最著名的神鸟"凤凰(庞皇)"其字面含义本是"庞大皇巨之鸟",也是代指巨人星座"后稷=星鸟=朱雀"的象征物符号(图 5 9)。
- D. 天槐星(水星)。《史记·天官书》有云"七星为员官,辰星(水星)庙,蛮夷星也",可见,这组"某某庙也"的术语再次为我们指出了"辰星(水星)"本是"七星=鹑火(未)"星座之"二位一体"配对行星的事实。而据同书可知,"辰星(水星)"的古星名本来叫"天槐星(兔星)","槐(兔)"通"嚵"、"饞",训鸟喙、啄食、馋嘴,也是指"饕餮=咮(未)",可见这两种天体的占星学意义确实是等价的。那么,中国天文学为什么要把水星和"柳=咮"星座视为同类呢?因为,水星的天文观测意义本来就是太阳的贴身侍卫,只有在日出之前、日落之后、日全食这三种"太阳被遮蔽吞食"的情况下它才会被肉眼看见,所以它天然就是一颗标志"吃食(太阳)"的行星,其与"饕餮=柳(未)"这个"贪吃星座"的占星含义是完全类似的。至于所谓的"蛮夷星"之名,则是得自上古汉语民族对外族人侵者的称呼,在华夏族看来,外族人侵者一般都是些身材高大的"巨人族"、贪婪掠夺的"饕餮鬼",所以他们将外族一概以"夷(鶇)"、"狄(翟)"、"三苗"、"九黎(莱)"等"巨人后稷=饕餮=星鸟"的代名词称呼之,要之,最初的"夷狄"本是一种对外族的敬畏之称而非蔑称。

而一旦我们认清了"田正后稷=壮"的守护神身份,那么我们对古老的 "壮"神在聊城地区乃至整部中国历史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就会有更多更深刻 的理解了。

首先,关于"有易氏"故地这块古济水流域的沃土本身而言,我们就不难发现,其有诸多文化特征都是直接源自该地守护神"壮二后稷"的。

例如,对于聊城这块本属古"巨野"地区的土地,《史记·货殖列传》为什么会有"巨野……其俗……好稼穑"的评价?(如前述,有易、有扈自古为孪生城邦,其民风都是互相影响的,该地区实际是信仰双神的。)显然,这与此地先民对"田正后稷"的千年信仰是分不开的。

又例如,"有易氏"故地为什么到了春秋时代还被孔子说成是"长狄"的故乡,是所谓的"防风氏"之后?显然,这正是此地的"后稷大人国"神话之名扬四海所导致的。因为,《国语·鲁语》中孔子所谓的"防风氏……其骨节专车……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

為大人"云云,按照"干支密码"看来,其完全是一段标准的"后稷大人国"神话:所谓"防"古音通"封"训长大、巨大,"风"通"凤"可训"星鸟(未)","汪"即"长王(未)","漆"古音通"稷(未)","翟"训雉翟即"鹑火(未)",可见,"防风氏=汪芒氏=封嵎=漆=長翟(未)"成立,孔子所列的所有国族名、地名都是直指巨人神"后稷(未)"而去的。至于《左传·文公十一年》所谓的"鄋瞒侵齐,遂伐我……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云云,则仅仅是说春秋时人沿用了古代"夷狄大人国"的传说而把其北方敌人鄋瞒国通俗化地称为"长狄",而并不是说鄋瞒国真的就是"长狄": 鄋瞒国自有其国名"鄋瞒"(外来语译音),本不叫"长狄"(汉语);鄋瞒国人虽然个别身材较高,但也绝不至于像孔子说的是身高三丈的"巨人",更绝不至于会有一个"其骨节专车"的祖先"防风氏"。

因此,综上所述,聊城这座绰号"凤凰城"的古城确实是无愧其名的,其本 地祖先确实是一个以"巨鸟凤凰"和"巨人后稷"作为守护神的古老城邦。(虽 然今天的所谓"凤凰城"其得名也许纯属巧合。)

不过,除了"有易氏",田神"后稷"对中国历史的最大影响则是其另一个著名的守护之国——姬周王朝。正如众所周知的,姬周王朝的政治文化宣传本就把"后稷(未)"视作是自己的父系始祖"弃(丑)"之同一人的;而尚不为今人所知的是,该王朝其实还曾想尽办法把本国的一切都打上与"后稷(未)"相关的文化烙印,不论是其国号、国姓、国鸟、国家幸运星座还是其国都、山川地名、畿外分封诸侯国国名等等,皆是如此:

- ★ 周(国号):"周"通"调",训滋味调和、协治,又通"咮(啁)",即代指美食神"咮-协治=后稷(未)";
- ★ 姬(国姓):"姬"通"颐",训大快朵颐、饕餮而食,也是代指"饕餮=后稷(未)";
- ★ 鸑鷟(国鸟):《国语·周语》有云"周之舆也,鸑鷟鳴于岐山",此即后世传为美谈的"凤鸣岐山"传说。而根据"干支密码","鸑鷟"又名"鸀",鸀通"噣(咮)",本义为整日啄食不停的贪吃雉鸟,也是代指周人的守护神"饕餮=咮=后稷(未)";
- ★ 咮(国家幸运星座):《左传·襄公九年》有云"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也就是说,为了政治宣传,周王朝把古代的天文历法也改了,把"出纳火"的标志星座由"大火(辰)"改成了

本国的保护星神"后稷=鹑火(未)";

- ★ 邰和酆(国都):"邰"为先周的都邑,"酆"为西周两京之一。而根据"干支密码","邰"古籍一本作"斄"训麳麦、禾稷,"豐"训巨大,《方言》有云"凡大人谓之豐人",可见"邰"、"豐"都是代指"巨人后稷"的都邑名;
- ★ 岐山、渭水、漆水、雍州(王畿地名):"岐"通祁训岐峻高大、巨人,"渭" 训胃口大开、饕餮,"漆"通稷,"雍"训雍和、协治,都是代指"巨人后稷=饕餮= 协治(未)";
- ★ 齐、鲁、莒、陈、沫邦(诸侯国名):"沫"(周人所改殷墟之新地名)通"秣" 训粮秣、粮餾,"齐(哜)"训哜尝、饕餮吃食,"鲁"通"穞"训稻穞、禾稷,"莒"通 "稆"训稻稆、禾稷,"陈"古通"田"训田稷,也都是代指"田正后稷=柳=饕餮=协洽(未)"。

那么,对于这个同样对"后稷"无比崇拜的周王朝而言,其与年代更早的 "后稷之国"即"有易氏"之间究竟是否有什么历史渊源呢?《国语·鲁语》所谓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 为稷"云云是否可以解释为"周弃继承了有易氏",两者本属同族呢?显然,这是一个真正值得我们去进一步研究的有趣问题。至少,就目前来看,比照"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原则,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只不过,"有易氏" 故地本来就有两个共同祭祀"后稷"但血统截然不同的古国,其一是前 25—前 19 世纪的东夷族古国"烈山氏之子曰柱(有易氏)",其二则是前 19—前 17 世纪的夏族殖民诸侯国"顧国"。如前述,"有易"和"顧国"都是统治有扈、有易孪生双城的大国,其祭祀的对象既有"羿"也有"后稷",故《逸周书》称其为"谷平氏",即指其既统治"谷三后稷(未)"守护之地,又统治"平(冯)三冯翼三羿(午)"守护之地。所以,对于历来都自称"我有夏"(参见《尚书·立政》)的周人来说,其显然更可能继承的是夏人的"谷平氏(顧国)"而非真正的东夷"有易氏"。

因此,综合以上诸信息,再考虑到先周王朝本就是建立于西元前 17 世纪左右(见前文),其与西元前 17 世纪"顧国"被商汤消灭的时间也是可以衔接吻合的,我们不妨初步假定,古文献《汤诰》所谓"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後有立"云云,很有可能就是指商汤在灭顧、灭夏后分封三支夏遗民的封诰,其封夏禹之后"伊尹"于伊水边的夏邑(斟寻),封皋陶(咎繇)之后"咎单"于有虞氏故地,而迁封名义上的"后

稷"子孙、"谷平氏"统治者"顧伯(午)季荝(己)"之后于渭水流域以戍边拓荒(当时此地本为非汉语民族所居),并按照"黄帝氏(殷人)"的"云师而云名"官制加封该族为"叔均(云)",这也许就是姬周这个自称"姜(午)嫄(己)"后裔的伟大王朝之真正起源:因为"叔"训豆粮、粮餾(柳),"叔均氏"即"柳=周(未)"地方之长官也。当然,由于商汤这种形同发配充军的"分封"实在没有什么光彩可言,"顧伯季荝=夏耕=姜原"更是被商汤斩首的敌酋,所以后世的周人就避讳而隐去不提了,他们仅仅是把"顧荝=姜原"的胞妹"姜嫄"当做始妣来供奉,把西迁的一块新领地改名为"扈"以示不忘本而已。(这也是后人往往误以为"有扈氏"在今陕西户县的根本原因。)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邢、先毅地方史

关于"先邢"、"先穀"的聊城地方史,就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来看,大致可以由如下几部分组成。

其一,约西元前 25—前 22 世纪,"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左传·昭公元年》)。也就是说,早在近 4 500 年前,以"在平教场铺城址"为都城的"有易氏(五雉氏)"作为最早的汉语城邦之一就已经出现了。该城邦在"少皞氏"盟主的认可下最终选择了"翟(易)=雉=后稷"为其守护神兼国名,此即《左传》所谓的"五雉夷(顾)民":"雉=后稷"的神职当然就是用禾稷颐养人民。而且,这个城邦控制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一城一地,还遍布了古济水两岸,共计有"五雉"之多。显然,《左传》的这些记载无疑是可以与考古学的发现完全相呼应的,如前述,该地区附近确实共发现了五座龙山文化城址(教场铺、王集、大尉、乐平铺、尚庄),而且"教场铺城址"出土的蛋壳黑陶等器物确实很精美。

其二,约西元前22—前21世纪,"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下》)。也就是说,作为"有扈氏"的孪生城邦,"有易氏(防风氏)"的国君早在"有扈不服夏王启"之前就与夏王禹发生过冲突了: 所谓"禹致群神",就是说夏王禹大会十二星神守护的诸城邦逼他们称臣纳贡(此种盟会春秋时代也常见);所谓"会稽之山",就是指夏王新征服的"昆吾氏"境内之山,因为"会"音通"阓 hui"训门阓,"稽"通"耆"训老寿,都是代指"昆吾=南门=寿星(巳)";而所谓"後至,禹杀而戮之"则是指"有易氏"拒绝称臣被杀(显然是杀给当时的东夷总盟主有扈氏看的)。

其三,约西元前21一前19世纪,"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

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左传·文公十八年》)。也就是说,约西元前 21 世纪,随着"有扈氏"这个孪生老大哥被夏王启消灭,"有易氏(饕餮氏)"原本曾经一度向其邻居小霸主"豕韦氏(缙云氏)"称臣为子辈,并赢得了短暂的安宁。但是,由于新崛起的东夷强国"有穷氏(夷舜)"不久后开始进攻"豕韦氏","有易氏(饕餮氏)"还是被卷入了战争,并最终被夷舜打败"投诸四裔",假如不是夷舜突然"卒于鸣條(豕韦)",该国差点就亡国了。至于《左传》太史克所谓的"(饕餮)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云云之说辞,则都是对"饕餮国"守护神神话的敷衍,其非关历史事实甚明。

其四,西元前19世纪,"王亥託(博)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山海经·大荒东经》);"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楚辞·天问》)。也就是说,随着"有穷氏"被夏王朝赶出中原失去霸权,"有易氏"终于可以填补政治真空而实现其称霸东夷的梦想了,该国不仅在西元前19世纪彻底兼并了其孪生城邦"有扈氏",更一举打败了两代殷王王亥、王恆而占领夺取了早已衰弱的"僕牛氏(豕韦氏)"。此外,再加上"烈山氏"、"浑敦氏"等也归其羁縻管辖,该城邦控制的范围一度达到了五国之多,表面上是完全可以与夏王朝并驾齐驱的东夷霸主了(当时夏王朝控制的地区也就五六国而已)。而考古学发现的40万平方米之"教场铺岳石文化城址"无疑见证了该国最辉煌的时刻。

其五,西元前19—前17世纪,"昔谷平之君,愎类无亲,破国弗克,业形用国,外内相援,谷平以亡……"(《逸周书·史记解》);"有毛民(有易)之國,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循鞈,循鞈殺綽人。帝念(稔)之,潛為之國,是此毛民……"(《山海经·大荒北经》);"昏、微遵跡,有狄(有易)不寧……"(《楚辞·天问》);"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綽人)也……"(《古本竹书纪年》)。也就是说,"有易氏(谷平氏)"虽然靠填补政治真空取得了短暂的霸权,但其本身的实力无疑是不能长久维持这种霸权的,对内来说,它本身那座40万平方米的都城是根本无法与夏王朝那些动辄上百万平

方米的大城相提并论的;对外来说,他对其臣属国的控制一般仅是"破国弗克" 羁縻而已,其统治外邦的能力是根本无法与已在外邦设官的夏王朝相提并论 的,尤其是"僕牛氏(豕韦氏)"更是殷人的近亲国,其成为内奸只是早晚的事 情。于是,在这种"愎类无亲"、"外内相援"的形势下,夏王循鞈与夏武将河伯 的侵略之师、殷王上甲微的复仇之师终于联合打败了"有易氏(綽人)"王国,使 此地的东夷遗民都成了"潛為之國"的"毛民"即夏或商的战俘集体奴隶。而夏 王在此旧"谷平国"的废墟上则建立了沿用旧称但血统不同的殖民国家新"谷 平国(顧国)";"毛"通"秏"训"飯之美者"(《说文》)、"餾=稷(未)","毛民"即 "有易氏"遗民也;"綽"通"喝(咮)"为"有易氏(未)"的族氏号,"綽人(綿臣)"即 "咮氏"而名"臣"之国王也。

其六,西元前17世纪以后,"(商汤)章、顧既伐,昆吾夏桀……"(《诗经·商颂·长发》);"(顧伯)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如上所述,夏王朝分封的"顧国"其实是"谷平国"这个双城古国的略称,所以"有易氏"最后阶段的地方史是包含在"顧国"历史之中的。而随着谷、平两地的最后一任半独立统治者"季前(夏耕)"的战败逃亡,"有易氏"故地从此就成了商王朝的王畿东北之边疆,其东南部被封给"殷民七族"之"飢氏(阿氏)",此即周代"阿邑"和"榖国"之前身;其西北部的聊城地区则从此成了偏僻之地,到了周代更成为了"鄋瞒"等北狄异族的出没地和战场。而事实上,西元前659年,姬姓邢国正是在被北狄攻破旧都之后才逃亡迁居到此"三不管"之废地以寻求齐国霸主的保护的。那么,面对这块一度荒芜了千年的土地,老天是否不再给其任何的机会了呢?或者,"谷平国"的末代君主"顧伯季荝"真的就是"姜原=台璽"之同一人,其后裔早已经迁徙到渭水流域开创了姬周王朝而并未真正灭绝呢?显然,就目前的证据来看,后一种可能性无疑更大。

九、温县徐堡龙山文化 城址与共工氏考

众所周知,今河南省温县、济源地区在3000多年前本为己姓温国、姬姓原国等诸侯国的领地。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本世纪新发现的"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址"(图5-1)等温县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温国作为一个古老城邦,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也可以追溯到

4 000-4 600 年前的"龙山时代"。

(1) 徐堡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徐堡遗址^①位于今温县东北沁河岸边,其龙山文化的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西城墙残长 360 米,南城墙残长 500 米,东城墙残长 200 米,北城墙被沁河冲毁,现存城址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此外,在该城址以北仅7.5 公里处还发现有面积似乎更大的博爱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城址面积30.8 万平方米)。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古城址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这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太行山、黄河、温县、覃懷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轵、湛水、原邑、邢国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古城址群的主人们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九位"玄(申)"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 太行山:该山名始见于《左传》,据《列子》"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云云可知其本名为"太形",本专指今王屋以东、沁河附近之高山,今则沿用为整个太行山系之总称,而根据"干支密码","形"即"井",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是指地支守护神"东井=玄(申)";
- ★ 黄河: 古称"河水",先商时仅指济源、温县附近一段,而根据"干支密码","河(荷)"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就是指地支守护神"河灘=玄(申)";
- ★ 温县:该地名始见于《左传》等,今沿用为县名,而根据"干支密码", "温"古通"涒",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就是指地支守护神"涒灘=玄(申)":
- ★ 覃懷:该地名始见于《尚书·禹贡》,今则沿用为沁阳市的两个区名"覃懷"、"懷庆",而根据"干支密码","覃"通"灘","懷"通"槐(鬼)",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河灘=與鬼=玄(申)";
- ★ 轵:即今济源市轵城镇,该著名古城始见于《史记》等,而根据"干支密码","轵"通"载",训舆载、承载,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舆槐 = 玄(申)";
- ★ 湛水:在今济源市,该古河流名始见于《水经注》"湛水出河内軹縣西北山",此湛水之畔古又有湛城,而根据"干支密码","湛(dơn)"通"澹","灉",作

① 马世之:《徐堡城址的性质问题》,《中原文物》2009 年第 2 期。

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河灘=玄(申)";

- ★ 原邑:即今济源市,该古地名始见于《左传》等,为周王大臣原伯之封邑,而根据"干支密码","原"训源泉井渠,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东井=玄(申)";
- ★ 邢国:在今温县东,该古国名始见于出土铭文和《春秋》等,而根据"干支密码","邢"同样通"井",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东井三玄(申)",故可知《说文》"邢,周公子所封國,地近河内懷縣"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今邢台市的姬姓邢国其始封地确实是在汉代河内郡懷縣,该国共有两块封地,一是王畿内沿用古地名的封邑"邢"(温县),二是沿用"邢"之名而拥有的原殷纣王之沙丘故地(邢台)。

(2) 共工氏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徐堡遗址"之主人的明确范围,即该先商古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玄(申)"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城邦,那么,我们要找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时代属于先商"和"国名干支属申"这两大条件的古国在可靠的中国史料记载中只有唯一一个,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中鼎鼎有名的"共工氏":

《国语·鲁语上》有云:"共工氏之伯(霸)九有也……"

《管子·揆度》有云:"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 天下……"

《逸周书·史记解》有云:"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有虞氏)伐之,共工以亡……"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西北海之外……有禹攻共工國山……"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共"训拱懷,"工"通"鸿(洪)"训洪水,"共工(洪鸿)"作为顶级地名兼国名、族名无疑就是代指主司懷山襄陵之洪水的地支守护神"玄(申)",其与太行山、黄河、覃懷、温县、轵城、湛水、原邑等诸多"徐堡遗址"附近的顶级地名是完全等价同源的。因此,"共工氏"作为一个既能满足存在年代属于先商,又能满足国名干支含义属于"申"的著名古国,其地理位置和废墟遗迹只可能是指"徐堡古城址群"而不可能是指其他时空的古文化遗址。而另一方面,我们从地缘格局的分析来看,史料记载的"共工国"其最接近的地缘邻邦是"有虞氏"(唐氏)、"夏后氏(禹)"、"先商"(关于先商和共工氏故地的

接触证据见下文),除此三者外,别无可信的早期记载(共工与颛顼争帝头触不周山明显是个神话),而考古学发现的"徐堡城址"其四周的地缘关系也正好与此完全吻合(见图 5-1)。此外,"共工氏"的"霸九州"被古文献明确指出是依靠其独特的天然地理优势即"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而非依靠其综合国力获得霸权的,也就是说"共工氏"是一个靠水路交通便利谋取经济利益、靠水险山高打败敌人、靠捏紧别人的交通生命线而挟制邻国的国家,而这一点也与"徐堡城址"、"西金城遗址"这些龙山古城前有大河、沁水围绕可以四通八达,后有太行、王屋屏障可以稳守家园的地理特征是完全吻合的(按古黄河从今沁河口开始折北而行,所以龙山时代的"共工氏"是东、南两面都有黄河的)。至于《管子》所谓"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即该地水患频仍,我们也完全可以从"徐堡城址"的北半部已经在龙山时代末期被沁水冲毁这一点得到印证。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址群"其实就是先商时代"共工氏"城邦的废墟,它是一个最早称霸的古黄河北岸之古老城邦(古称河内地区),也是黄河这条"中国文明母亲河"的河名诞生之地。

(3) 共工氏守护神"玄(申)=河伯(申)"与覃怀(懷)文化的起源

当然,除了"共工氏"、"河水"、"太行山"等古今地名,"玄"神作为一尊历时几千年的本地守护神,其能留给覃懷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玄"神原来并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水神"河伯(共工)"之历史原型(图 5 - 10)。

正如前述的两个"羿"一样,常常令今人混淆不清的"河伯"和"共工"在中国古文献中本来也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指代。就"河伯"来说,其一方面可以指现实世界的诸侯"河国之伯"(即共工国的后继政权),另一方面也可以指该国的守护神"水神河伯";而就"共工"来说,其一方面可以指现实世界的古老城邦"共工国",另一方面也可以指该城邦的守护神"洪水神共工"。那么,上古的"玄"神与"河伯"、"共工"这三者为什么本是指同一尊神祇呢?因为,"河(荷)"训荷担,"共工"训拱懷扛抬,"河伯"、"共工"作为神祇名都是代指地支第九位"河灘=與鬼(申)",故"玄(申)=河伯(申)=共工(申)"成立。当然,除了"河伯"和"共工"这两种人格化了的形象,古老的"玄"神信仰留给中国文化的遗产还包括了如下这些重要的象征符号:



图 5-10 玄神=河伯的象征物:龙山文化的水涡形玉牙璧(前3千纪)、二里头文化的鱼蛇纹陶盆(前19—前16世纪)、商代的玉龟(前17—前11世纪)、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上的交体玄鱼承载宇宙图、汉代画像砖上的河伯出行图、四象之一龟蛇同体的"玄武"(前202—220年)

A. 天漢(银河)。《史记·天官书》有云"漢者,其本曰水"。正如前述,"涒 攤"这个古星座名本来就是取自银河之名"漢"的,因为该星座是中国赤道十二 星座中仅有的两个与银道相交并以银河命名的星座之一,而相较另一个银河 星座"河鼓"所代表的季节(夏、秋两季洪水季节),"涒攤"星座露出地平线的季 节(冬、春两季枯水期)无疑是中国先民最渴求水神赐水的季节,所以,中国天 文学就最终把该星座选定为了中国的"水神之星",与银河"天漢"一起构成了 "二位一体"的同名双星。

B. 洪水。《淮南子·本经训》有云"共工振滔洪水"。毫无疑问,"共工"作为一尊水神,宇宙任何的洪水事件必然都是要由他负责的。但是,作为历史考证,我们首先必须明白一点,《山海经·海内经》所谓的"洪水滔天,鯀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仅仅是个神话而已,这和苏美尔或西方的"洪水方舟"神话一样,都是人类"创世纪类型神话"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与史实无涉。至于今本《尚书·尧典》所谓的尧、舜、禹治水之说,则不过是一个整合了神话成分的史诗故事。那么,中国神话中为什么要有这段"洪水"故事呢?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要从水神"共工三玄"的另一种更重要的神话象征物"幽都"与"黄泉"说起。

C. 幽都(玄丘)与黄泉。《山海经·海内经》有云"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

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有大玄之山,有玄 丘之民,有大幽之國";《楚辞•招魂》亦有云"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显 然,正如世界上的大多数古老民族都有把"地下世界"和"水下世界"相提并论 的传说一样,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中,"玄"神所掌管的"水下世界"也同样是阴间 地府(幽都)的代名词之一。也就是说,顾名思义,地支第九位神祇"亥(申)"其 在中国神话中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其实并不是"水神",而是大地之根基"幽都 神"。因为,所谓"河灘(荷担)"就是指地下的洪水世界本是"荷扣"承载大地、 高山和天穹的宇宙根基,所谓"舆鬼(懷)"、"玄(悬)"就是指宇宙间的万物其实 都是被地下汪洋大水所"舆"、所"懷"而"悬"浮于其上的。总之,由最下层的 "汪洋洪水层"、居中层的"大地山川层"、最上层的"星空天穹层"所共同组成的 宝塔形结构就是中国神话中的宇宙总体结构,而在这三层宇宙结构中,水神兼 幽都神"共工=玄"所主宰的地下"洪水层"无疑是最基础、最原始、最巨大因而 也必须首先"被建造"或"被创造"的一层。所以,当中国的"创世神话"或"创世 史诗"在追溯历史的源头之时,其总是最先提及"洪水"元素也就是十分必然的 事情了(埃及、苏美尔也颇类似),因为,正如《楚辞•天问》所说,"洪泉极深,何 以填之","洪泉(黄泉)"这种传说中的地底超级大水本来就是中国神话所认定 的宇宙万物之第一载体、宇宙第一推动力。

D. 共工之臺。《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显然,比照前述的"轩辕之臺",我们知道这又是一个神话地名,其义就是指"共工"统治的幽都地狱其人口在大地的北方(因为北方比较阴暗),故"射者不敢北向"。简而言之,"轩辕之臺"就是西方的天堂仙门,而"共工之臺"就是北方的地狱鬼门,两者都是"射者不敢向"的。

E. 大力神鳌龟和赑屃。《淮南子·览冥训》有云"断鳌足以立四极……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楚辞·天问》有云"鳌戴山抃";《左思·吴都赋》有云"巨鳌赑负,首冠灵山"。显然,与上述的"洪水承载宇宙"神话比起来,"巨鳌(赑屃)承载宇宙"的变形版神话无疑更为我们今人所熟知。关于我们的宇宙本是建立在大乌龟(鳌形水神)背上的说法,我们不仅可以从诸多文献中看到,更可以从全中国无所不在的旧式石碑之赑屃底座上看到。而由此可见,"共工=河伯"其实也是一尊最能背负重物的大力神。

F. 玄鱼、玄蛇。《楚辞·九歌·河伯》有云"乘水车兮荷盖……乘白黿兮逐文鱼";《楚辞·天问》有云"不任汩鸿(洪)……鸱、龟曳衔"、"鲮鱼何所";《归

藏·启筮》有云"共工人面蛇身朱发"。显然,鱼类、龟蛇等水族可以作为水神"河伯=共工"的象征物那是再天经地义不过的事情了。关于这类神话造型,我们至今还可以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鱼蛇组合纹饰、《楚帛书》中的黿身蛇首"玄"神造型、汉代画像砖上的龟蛇同体"玄武"造型等等古代图像中直接看到。不过,与上述文物比起来,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诸多"玉牙璧"(旧或称玉璇玑)无疑是更早的"玄"神象征物:通过对比汉代的马王堆帛画之"地底交体玄鱼"造型可知,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所谓"玉牙璧"其实就是一种三尾或四尾的"交体玄鱼形玉器",其造型的内有圆孔、外有对称出牙轮廓是与帛画造型完全一致的(只不过,由于帛画是侧视图,故只绘对称二鱼,而"玉牙璧"是俯视图,故须绘三鱼或四鱼,见图5-10)。而事实上,这种玉器的用途应该也是祭祀幽都之神"玄"以祈求镇邪消灾、往生极乐的。

G. 鬼与神。中国人为什么至今都称非人的灵异世界为"鬼"为"神"?显然,按照"干支密码",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所谓"神",其来源自然是"河伯"对应的干支"申";所谓"鬼",其来源也自然是"共工"对应的星座"舆槐(鬼)"。可见,在中国神话中,"河伯=共工(申)"最初绝不仅是"黄河神"之类的小神,他是一尊上管"河灘"星座以及整条银河,中管所有江河湖海,下管幽都黄泉、灵魂往生的三界全能之主宰神,所以他的尊号才会成为普天下鬼神的总称代名词,人类卜神问鬼也必须要用龟甲(河伯信使)才能诵试。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地支第九位星神"共工—河伯—玄"在中国文化史中的 发展脉络,那么我们对"共工"神信仰与覃懷地区的诸多地方文化特征之联系 就会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了。

例如,今王屋山下的济源地区为什么会是"愚公移山"这个著名神话故事的发源地?显然,假如我们考虑到该地区的古老守护神"共工=河灘(荷擔)",本来就是一尊以担荷负载天下重物为己任的大力神,那么我们对济源先民的这个传说就一点也不会感到陌生奇怪了,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无论是凡人"愚公"的担土运石,还是天神"夸娥氏(舆媿氏)"的担负搬运太行、王屋两山,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无疑都是与担荷宇宙之重的"共工氏"完全一致的。

又例如,覃懷地区这块古称温、轵的地区为什么会被司马迁描写成一个"土地小狭人民众、其俗纤俭习事"的地方?显然,鉴于本地先民很早就认同了"共工氏"神话中所包含的忍辱负重、勤俭耐劳之文化品质并一致挑选了其为自己的守护神,我们对此地的民风能够以愚公式的"纤俭习事"而著称也是不

会感到太奇怪的。

再又例如,覃懷地区为什么是《水经注》所谓的"河精(河伯)授禹《河图》" 之地,也是《尚书·禹贡》所谓的"覃懷底绩"即洪水首度出现之地?(按《禹贡》 中凡言底绩、底平、底定者皆属亟需"治水"的洪水泛滥之地,其中最先出现的 就是冀州的覃懷。)显然,鉴于覃懷地区本来就是洪水神"共工=河伯"的地方 崇拜中心,我们对后世的多种"洪水"神话往往都与此地有关也是不会感到太 奇怪的。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温、先原地方史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温县、济源地区的诸多顶级地名和文化特征找到了该地"徐堡遗址"等古城的主人"共工氏(申)",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复原出一份真正有考古学依据的"先温"、"先原"地方史之编年框架了,下面是我们初步可以得到的复原结果。

其一,约西元前 25-前 24 世纪,"共工氏之伯(霸)九有……"(《国语•鲁 语上》);"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管 子・揆度》);"昔無懷氏封泰山……原注:古之王者,在伏羲前"(《管子・封 禅》);"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也就是说, 大约在 4 400 年前,即"有虞氏(伏羲)"王朝还尚未建立以前,"共工氏(无懷 氏)"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之中并率先称霸于古河内地区了,该国国 君通过出访泰山(岱宗)附近的东夷"少皞氏"等城邦并参与其祭神会盟(就像 春秋列国国君经常要到他国访问一样),从而率先学到了东方的"十二地支星 神"文化,并借此机会向与会的其他城邦宣布,自己的城邦将尊奉水神"玄"为 自己的城邦守护神,并采用"水师而水名"制度。从此,"共工氏"就成了首批拥 有东夷式守护神的中原城邦之一,而"共工氏(无懷氏)"的国王也以第一个登 临泰山祭拜十二天神的非东夷国王之荣誉而被载入史册,成为管仲所谓的"封 泰山七十二家"之第一家。显然,《尚书·尧典》所谓的"舜……东巡守,至于岱 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正是完全效仿了其前辈"无懷氏"的行动而来的。 当然,4400年前的"无懷氏"国王访问泰山诸国事件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国 际外交"事件。

其二,约西元前24一前22世纪,"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有虞氏)伐之,共工以亡……"(《逸周书·史记解》); "尧伐共工……"(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膑兵法·见威王》)。也就是说,"共 工氏"的"水师而水名"其实是徒有虚名的,该国君主真正实际推行的是"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的一人独裁制度,所以在西元前 24 世纪"有虞氏"王朝建立之后,"共工氏"的综合国力就已经相形见绌而不再是河内地区的霸主了。而到了西元前 23 世纪唐尧王的时代,"共工氏"更是彻底被"有虞氏"的旁支王族"四岳"所征服而灭亡了,其国土变成了"有虞氏"血统的"四岳共工国"。

其三,约西元前 22—前 20 世纪,"有禹攻共工國山……"(《山海经·大荒西经》)。也就是说,西元前 22 世纪,随着"夏后氏"的崛起并力图代替"有虞氏",作为最靠近"夏后氏"的"有虞氏"血统"四岳共工国"自然难免第一个被开刀问罪。而在这场"禹攻共工"之战后,有虞氏血统的"四岳共工国"从此又变成了夏后氏血统的"河伯国"。

其四,约西元前 20 世纪,"帝降夷羿,革蘖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楚辞·天问》);"洛伯用(夏王仲康)与河伯、冯夷(夷羿)斗……"(《古本竹书纪年》)。也就是说,随着"有穷氏"伐夏远征军的到来,"河伯国"这个夏王分封的诸侯国自然也难免要被卷入战争。该国先是作为夏的同盟军南渡黄河救援夏王而被后羿打败,其夏人血统的君主也被后羿"射夫河伯"杀死了;尔后,随着夏人血统的"河伯"被杀,"河伯国"的本地族群(包括同属河内方言区的原共工氏和四岳氏)终于赢得了第二次独立,他们新选出的土著血统"四岳河伯"自然要反戈一击加入"冯夷(夷羿)"的大军讨伐其世仇"洛伯用(夏王仲康)"。"洛伯用"为什么就是指"仲康"?因为"用"通"庸","庸"、"康"二字都从"庚"训"庚"("有洛氏"即"有崇氏"见下文)。"冯夷"为什么就是指"夷羿"而不是旧注所谓的"河伯名冯夷"?因为"冯夷"即"夷冯","冯"与"羿"一样都指地支第七位"冯翼(午)","夷冯"当指"夷羿"无疑,而"河伯"并非古东夷人,根本不可能名叫"夷冯"。

其五,约西元前 20—前 19 世纪,"帝宁居原……"(《古本竹书纪年》)。也就是说,在史称"少康复国"和"帝杼东征"的大背景下,一度恢复独立并与"有穷氏"结盟的"四岳河伯国"自然要成为夏王朝反攻倒算的重点对象,其首都"原(今济源附近)"最终在夏朝王子"帝杼(帝宁)"的军事进攻下被重新征服了。显然,《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帝宁居原",无论就文字分析还是地缘分析来看,都不会是指夏王朝曾迁都于此。因为,古文字分析告诉我们,"居"不是"都","帝宁"不过是曾经讨伐过此地并镇守于此而已(当时他还是夏王少康的太子);而地缘分析则告诉我们,夏人的老巢并不在此,黄河以北也并非夏人的

战略推进方向,所以此地根本没有作为夏都的资格,而仅是再度建立了夏人血统的"河伯国"。(此夏人的"第二河伯国"后来很可能就是由帝杼的旁系子孙们继承统治的)。

其六,约西元前 19 世纪,"王亥託(博)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伯念(稔)有易,有易潛出,為國于獸……"(《山海经·大荒东经》); "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綽人)也……"(《古本竹书纪年》)。也就是说,作为唯一直接与"先商"城邦接壤的夏王朝属国(图 5-1),"河伯国"不仅历来是夏、商两族贸易的中介地,也是夏王朝干预古河内地区政局的战略前沿据点。因此,当北方政局出现了"有易殺王亥、取僕牛"这一重大事变之后,"河伯国"就受夏王之命直接进行了外交干预和军事准备,并最终以自己的商业利益受损为借口而联合殷王上甲微出征"有易氏"。而在夏王不降亲帅的王师北上策应之下,"河伯"率领的夏、殷联军作为先锋部队显然进展顺利,最终以"河伯稔有易(杀綿臣)"而结束了这场大战。

其七,约西元前 18-前 17 世纪,"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 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逸周书。 史记解》);"黄帝(殷商)战于阪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也就是说, 自从"河伯稔有易"之战后,"河伯国(阪泉氏)"作为夏王朝北土的军事机器日 益名声大噪,从此开始了其一发不可收的穷兵黩武之发展。很显然,从地缘格 局分析,除了夏王不降"伐有易"之战外,前述的夏王孔甲"更豕韋之後"之战、 夏王桀"伐有施"之战无疑都是要以"河伯国"为其先锋力量的。但是"用兵无 已,诛战不休"毕竟是难以持久的,尤其是从孔甲时代起"河伯国"的主要敌人 已经从衰弱的东夷变成了新兴的狡诈殷人。因此,到了夏桀时代,"河伯国(阪 泉氏)"终于在殷商王国(黄帝氏)广泛展开的外交战和间谍战之阴谋中变得 "并兼无亲"、"诸侯畔之",最终因为"文无所立"情报不灵而遭到了彻底的失 败,其残部只能"徙居至于独鹿"(但不久也被殷人所消灭,见下文)。那么,中 国文献中这个神秘的"阪泉氏"为什么就是"河伯国"?因为,根据"干支密码", "泉"训井泉,当然是代指"东井=河灘(申)",与"河伯"是干支同义词;"阪"则 为古河内地区常见的地理名词(《水经注》称怀县有黄马阪、旋门阪等,且引应 瑒《灵河赋》直称此地附近为"阪泉")。所以,"阪泉氏"其实就是夏代的"河伯 国",而旧注所谓"阪泉氏"是五帝时代之古国的说法则明显不确。(关于"黄 帝"和"独鹿"的考证见下文。)

其八,西元前17—前11世纪,"河亶甲居相·····"(《书序》)。也就是说,随着成汤的灭阪泉氏、灭夏,覃懷地区从此就成了商王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约西元前16世纪左右,此地还一度曾经是商王"河亶甲"的封地(当时他应该还是王子,在位商王则是其兄仲丁或外壬),他也因此有了"河亶"这个封邑前缀名。那么,既然"河亶"这个名字一望而可知就是"涒灘"的同义词,也即前文分析过的是中国古代存在"河灘"这个天文兼占星术语的实例证据,其明确代表了该商王的初始分封地名,那么《书序》提及的"河亶甲"所居之"相"又是指哪里呢?毫无疑问,按照历史常识推理,这个"相"当然也不可能指另一个地方,它其实就是指"河亶=覃懷"地区在周代的一个地名"向":《左传·隐公十一年》有云"王·····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向·····懷",此"向"古音通"相",在今济源市坡头乡,与温、原、懷等覃懷名邑都相去不远,很明显就是西元前16世纪的"河亶王子"所居之地。当然,在"河亶甲"之后,直到周武王伐商建立己姓温国、姬姓原国为止,此地就再也不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中心了(《国语》之殷敌"有苏氏"不可能在殷王畿内,并非指此周代"苏忿生之田"甚明),先温、先原地方史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十、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 城址与三鬷氏考

众所周知,今河南省淮阳附近地区在3000多年前本为妫姓陈国的领地。 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上世纪发现的"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图5-1)等淮阳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陈国作为一个古老城邦,其 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至少也可以追溯到4500年前的"龙山时代"。

(1) 平粮台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平粮台遗址①位于今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的平粮台,其龙山文化的城址(距今约4500—4100年)平面为正方形,长宽均为185米,有城墙残高3米多,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该城城墙下有基槽,采用同时期最先进的小版堆筑法建成。南城门东西两侧有门卫房,门道路土下还铺设有陶水管道,

① 曹桂岑:《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3)》,文物出版社,1984年。

城内发掘过十多座房基,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是夯土高台建筑。城内还发现有陶窑、窖穴和墓葬,出土遗物中有铜炼渣等。可见这是一座有防御设施、有社会分工的城市。此外,该城址附近还分布了"郾城郝家台遗址"(城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杞县鹿台岗遗址"等诸多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或二里头文化的聚落遗址。

那么,对于这么一座技术含量很高的精致古城址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这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颍河、项城、杞县、涡河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宛丘、胡国等该地区附近的古代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城址群的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十位"曑(酉)"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颍河:该河流名始见于《逸周书·职方解》等,今沿用,而根据"干支密码","颍(滎)"通"鎣"、"盈",训鎣器、器皿,作为地名其本义就是指地支守护神"作器=曑(酉)";

★ 项城:该城名始见于《春秋》,为古项国之都城,今则沿用为县级市名,而根据"干支密码","项"通"工",训工巧制作,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作器=曑(酉)";

★ 杞县:该地名源自著名的古国"杞国",始见于《论语》等,今沿用为县名,而根据"干支密码","杞"通"器",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是指地支守护神"作器=曑(酉)";

★ 涡河:该河流名始见于《说文》等,古字本作"濄",今沿用,而根据"干支密码","濄"通"撾",训撾击捶打、制作打造,又通"鍋",训鍋子器皿,作为地名 其本义都是指地支守护神"作器=曑(酉)";

★ 宛丘:即今淮阳县,该古地名始见于《诗经》等,为古陈国之都城,而根据"干支密码","宛"通"盌(碗)",训器皿,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是指地支守护神"作器=曑(酉)";

★ 胡国:即今郾城县,该古国名始见于《春秋》等,而根据"干支密码", "胡"训瑚琏,即古礼器"胡簋",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作器= 曑(酉)"。

(2) 三鬷氏者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平粮台遗

址"之主人的明确范围,即该先商古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曑(酉)"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城邦,那么,我们要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时代属于先商"和"国名干支属酉"这两大条件的古国在可靠的中国史料记载中只有唯一一个,那就是至今仍然常被误解而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三鬷氏",别名"有鬲氏":

《左传·襄公四年》有云:"靡奔有鬲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 浞而立少康……"

《史记·殷本纪》有云:"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鬷,俘厥宝玉,義伯、仲伯作《典宝》……"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云:"昔有飂叔安(后羿),有裔子曰董父(寒浞)……以服事帝舜(夷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三"通"参(曑)","鬷"、"鬲"皆训鼎鬲、器皿,"三 鬷氏(有鬲氏)"作为顶级地名兼国名、族名无疑就是代指主司工巧作器的地支守护神"曑(酉)",其与颍河、项城、杞县、涡河、宛丘、胡国等诸多"平粮台遗址"附近的顶级地名是完全等价同源的。因此,"三鬷氏"作为一个既能满足存在年代属于先商,又能满足国名干支含义属于"酉"的著名古国,其地理位置和废墟遗迹只可能是指"平粮台古城址"而不可能是指其他时空的古文化遗址。而另一方面,我们从地缘格局的分析来看,文献记载的"三鬷氏"之比邻关联地区既有东夷的"有穷氏"(夷舜),又有"昆吾氏"(靡)和"有仍氏"(鸣条)这两个夏王朝的主要同族城邦,这与考古发现的"平粮台古城址"恰好处于岳石文化(东夷)与二里头文化(夏)之直接交界地带也是完全吻合的。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淮阳平粮台 龙山文化城址"其实就是先商时代"三鬷氏"城邦的废墟,它是一个地处夷、夏 之间的"夏后氏"胞族城邦,该国国土在后来的历史中曾一度被"有穷氏"王朝 统治而一分为二:其一半是夏人血统的"三鬷氏",另一半则是东夷人血统的 "鬷夷氏"。

(3) 三鬷氏守护神"曑(酉)=巧倕(酉)"与芈姓楚国起源之谜

当然,除了"三鬷氏"、"颍河"、"宛丘"等古今地名,"曑"神作为一尊历时几千年的本地守护神,其能留给豫东淮阳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昜(曑)"神原来

并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中国最著名的巧匠神"巧倕"之历史原型。此外,他也是中国两个"颛顼"之一——楚国始祖神"颛顼(檮杌)"的历史原型(图 5 - 11)。



上古的"曑"神为什么与"巧倕"、"檮杌"、"颛顼"本是同一尊神祇?因为,"捶(倕)"古通"揣(摶)"、"剬",训摶埴(制陶术语)、剬制、捶打、打造制作;"颛"即"剬","頊"通"囂(鏊)"训釜鏊器皿,"颛顼"即剬制鏊器;而"檮"通"擣(捣)"训捶打捣击,"杌"古通"橛"训木橛棒槌、捶打,"檮杌"也是打造制作之义。所以,"巧倕"、"檮杌"、"颛顼"作为神祇名都是代指地支第十位"作器(酉)","曑(酉)=巧倕(酉)=檮杌(酉)=颛顼(酉)"成立。此外,又据出土青铜器"义楚 鍴"的铭文可知,"颛=檮=倕=鍴"也是"酉"字形的古代酒器名称,所以以上 诸神名同时还是可直接代表酒坛星座"酉=作器"的天文术语。当然,除了"巧倕"和"檮杌颛顼",古老的"曑"星神其实还有许多别的化身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

- A. 酒和酒坛。已见前述(图 5-11)。
- B. 能兽(熊)。已见前述。
- C. 天酒(甘露)。《瑞应图》有云:"王者施德惠,则甘露降,一名天酒。"可见,中国文化中著名的祥瑞标志物"甘露"其最初也是酒神"颛顼"的象征符号之一。毕竟,在古人看来,酒是一种人工所造最神奇的物品(致幻剂),其和甘露一样都有通天、通神的奇妙效果。而以酒通天本来就是酒神"颛顼=倕"的神职之一,所以后来《国语》等才会有"颛顼绝地天通"的传说("檮杌颛顼"既然

有能力让天地通,他就也有能力让天地不通,这和由"羿护十日"到"羿射十日" 的神话演变路线是完全相类似的)。

D. 约约星(流星)。《尔雅·释天》有云:"奔星(流星)为约约。"《开元占经》有云:"流星出,天子使也。"显然,根据"干支密码","约"和"约"都通"酌"训酌酒、酒器,正可代指地支第十位"作器(酉)","约约"无疑也是"颛顼=曑(酉)"的"二位一体"配对天体象征物。(酒可盟约通使故又称"使星"。)那么,在中国天文学中,流星为什么会被视为"颛顼=曑(酉)"星神的化身象征之一呢?因为,众所周知,"曑"星座(猎户座)本来就是著名的"猎户座流星雨"之发生区域,而"猎户座流星雨"是以能见度较高和定时守信著称的,其作为一种"天使定时约会"式的自然现象无疑与"颛顼=曑"星神的"以酒通使鬼神"神职也颇为吻合。所以,中国天文学最终把它们等而视之。

E. 欃枪(彗星)。《尔雅·释天》有云"彗星为欃枪",此外《史记·天官书》还称"欃枪"别名"天棓"。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欃"音"参"(见《史记·天官书·韦昭注》);"枪"与"棓"都训连枷器、棒杵等捶打工具,都可代指地支第十位"倕=作器=参(酉)","欃枪=天棓"无疑也是"颛顼=曑(酉)"的"二位一体"配对天体。

F. 兔神捣药(檮杌)。《乐府诗》有云:"采取神药山之端,白兔捣成虾蟆丸。"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考虑到"欃"与"毚(兔)"本可通假、"捣药槌"与"枪棓"本为一物、"捣(擣)"即"檮"本为一字这三大共同元素,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著名的"玉兔捣药"神话(图 5-11)其最原始的版本其实与月亮无关而是与"檮杌=参"星神紧密相关的:所谓"玉兔"和"捣药槌"、"捣药钵"的神话三要素组合,从古文字学和天文学的诠释来看,其实就是指巧匠神"檮杌=欃(兔)"用其"万能神槌(流星或彗星)"在"酉字形酒缸(参宿七星)"里捶打原料酿造"通神药(酒)"。也就是说,这本是一幅总结描述"猎户座流星雨"的上古天文实录(流星像来回飞动的捣药棒槌一样频繁划过"酉"星座),是人类已知最早的流星雨实录。比照《国语》"商之兴也,檮杌(流星或陨星)次与丕山"云云之记载可知,"檮杌"这个描述流星或陨星的术语也许不晚于商代(西元前 17—前 11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而一旦我们认清了"檮杌颛顼 = 曑"的守护神身份,那么我们对古老的 "曑"神在淮阳地区乃至整部中国历史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就会有更多更深刻 的理解了。 首先,关于"三鬷氏"故地的淮阳地区本身而言,我们就不难发现,其有诸 多文化特征都是直接源自该地守护神"巧倕=檮杌颛顼"的。

例如,根据前述《史记》的记载,夏末商初的"三鬷国"本就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其工匠手艺向称发达,以至于引得商汤王竟要不顾廉耻地来"俘厥宝玉",并还要用一篇官方文件《典宝》来为他的掠夺进行辩护,可见该国的工艺品确实是精妙得令人垂涎的。那么,"三鬷氏"为什么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手工业"高科技中心"呢?显然,假如我们考虑到该古国所选择的守护神本来就是一尊巧匠神"倕",那么我们对他们的这一地方产业特色就不会感到太惊奇了,很显然,此地本来就是 4 100—4 500 年前的一个手工业中心,所以他们后来才有资格选择"巧倕=参"作为他们的守护神并得到其他诸城邦的认可,此即《尚书·尧典》中的"帝曰:畴若予工? 佥曰:垂(三鬷氏)哉!"云云所反映的史实背景。

又例如,关于"三鬷氏"的"工业中心"地位,我们除了在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也可以在考古发现中找到相应的线索:如前所述,作为"三鬷氏之墟"的"平粮台古城址"无论在建筑设计的考究上(中国第一座正方形城市)还是设施完备的程度上(管道排水系统等)都是同时代所少见的,其诸多遗迹充分体现了该古城的工程设计水平和工匠手艺。那么,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毫无疑问,这个原因同样还得从该城的守护神"巧倕"身上去找:对于"三鬷氏"的居民们来说,他们的都城可以没有别的城邦面积广大,但却绝不能没有别的城邦精美壮观,不然他们就没脸对别人说自己是"巧倕"的后裔、没脸去祭祀守护神"巧倕"了。而事实上,假如不是商汤对此地的"俘厥宝玉"一掠而空,我们在此地周围也许真能发现"宝玉"等宝藏,毕竟,该古国所在的颍河流域在地理上确实很接近中国古代的南方玉石诸产地,他们很有可能是真的制作过大量商汤王所渴望的"宝玉"的。

再又例如,根据《国语》记载的"有虞氏(陈国)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云云可知,周代统治淮阳地区的妫姓陈国是把"颛顼"列为始祖而祭祀的。但是,正如前文分析的,陈国的真正始祖只有有虞氏王朝的"尧"、"舜","颛顼"作为一个东夷帝王应该和他们完全无关,他们为什么要张冠李戴地去追认祭祀别人的祖先呢?显然,在"颛顼=倕"这个结论的指引下,我们现在对这个貌似荒谬的问题已经可以作出解答了:原来,妫姓陈国并没有冒认祖先,更没有篡改历史,他们不过是在"依礼行事",所谓"尧"和"舜"固然是"陈胡公"的真正

父系祖先值得祭祀,但"颛顼=倕"作为宛丘本地的"地头蛇"守护神无疑也理该受到名义始祖规格的祭祀,因为此"檮杌颛顼"并非彼"戏器颛顼"原本就是人神殊途的两个人物;至于"黄帝"则是陈国始妣"太姬"的母系名义祖先,同样应该受到最隆重的祭祀(毕竟"太姬"公主才是陈国这份嫁妆的真正法定拥有者)。

不过,除了"三鬷氏"和陈国,"巧倕=颛顼"对中国历史其实还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因为,有一个曾经开辟了中华文明之半壁江山的伟大王朝——芈姓楚国,其所选择的守护神也同样是巧匠神"檮杌=颛顼"。事实上,"干支密码"可以告诉我们,楚国人对该神的崇拜热情是远非妫姓陈国这个"颛顼神的过继子孙"可比的,他们不但把自己的血统直接描述为"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而且还把自己的一切身份证明都打上了"檮杌颛顼"的烙印,不论是其国号、国氏、国史名称还是其国礼、国都、国家爵号等等,皆是如此:

- ★ 楚(国号):"楚"训箠楚敲击、锤击打造,其本义即代指巧匠神"倕=颛顼(酉)";
- ★ 熊和酓(国氏): 据史载,楚国虽有周王的赐姓"芈"(芈即咩,训鸣叫,指熊绎封地丹阳属于古鸣条之国),但其本国的人名称谓却是执行另一套系统的,例如其有所谓屈、景、昭、老等族氏,而其王族的氏就是"熊",例如鬻熊、熊绎、熊康、熊通等等,出土简帛则写作"酓"。而根据"干支密码","熊(熒)"古音通"鎣",训鎣器,"酓(饮)"通"盒",训饮酒、器盒,原来也都是代指守护神"作器=颛顼(酉)";
- ★《檮杌》(国史):《孟子·离娄下》有云"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也就是说,楚国人曾把其本国的国史称为"檮杌"。而正如前述,"檮杌"本来就是酒神"颛顼"的等价别名;
- ★ 包茅缩酒(国礼):《左传·僖公四年》有云:"齐侯……伐楚……'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也就是说,在周代,楚国的外交国礼(所谓的贡品)一直就是包茅(灌酒通神道具),因为该国不负酒神"颛顼=檮杌"之名,其缩酒通神技艺一直是"领先国际水平"的;
- ★ 郢(国都): 据史载,自楚武王、楚文王称王以来,楚国的国都或陪都不管迁徙何处其名都叫"郢",例如有鄢郢、鄀郢、纪郢、寿郢等等。而根据"干支密码","郢"通"鎣"训鎣器,显然也是个代指"作器=颛顼(酉)"的顶级地名;
 - ★ 敖(国家爵号): 据史载,春秋楚国的官制与中原列国不同,其仍然是保

持了"某师而某名"的古老制度遗风的,具体而言,其许多官爵乃是"敖师而敖名"的,例如有若敖、霄敖、莫敖、杜敖等等。而根据"干支密码","敖(嚣)"通"鏊"训釡鏊器皿,作为官号兼族号其含义当然也是指楚国的守护神"作器—颛顼(酉)"。

因此,综合看来,楚国人对巧匠神兼酒神"檮杌颛顼"的崇拜无疑是真挚而 热烈的,其与最早崇拜"檮杌颛顼"的"三鬷氏"之渊源关系明显要比妫姓陈国 更为紧密。那么,按照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代礼法制度,我们 是否可以推断,芈姓楚国的真正始祖就是更古老的"三鬷氏"呢?毫无疑问,在 "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知道这个假设是完全可以得到证明的,因为,中国 史料对于这个"熊氏"王国的祖先"有熊氏=三鬷氏(酉)"的来龙去脉早就有着 完整而明确的记载。当然,为了最终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得先从"三鬷氏"的历 史也即"先陈"地方史本身说起。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陈地方史

关于"先陈"的淮阳周边地区之地方史,就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来看,大致可以由如下几部分组成。

其一,约西元前 24—前 22 世纪,"帝曰:畴若予工? 佥曰:垂哉……" (《尚书·尧典》);"昔者绩易(三鬷氏)强力四征,重丘(有崇氏)遗之美女,绩易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逸周书·史记解》);"有鯀攻程州(三鬷氏)之山……"(《山海经·大荒北经》)。也就是说,早在有虞氏王朝时代(西元前 24—前 22 世纪),以"巧垂"为守护神兼国族称号的"三鬷氏(绩易氏)"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国历史之中,并以其手工业的发达而著称于世了。但是,这个一度技术发达、经济繁荣、"强力四征"的富庶城邦,由于其西邻姻亲城邦"有崇氏(重丘)"的蓄意颠覆、阴谋设套"遗之美女",而终于走向了衰亡。大约在西元前 22 世纪,该古国在外敌威逼及"大臣争权"的内外交困下被"国分为二",其富庶的南部地区"程州(郢=颍)"被同处颍水流域的"有崇氏(鲧)"吞并成为加盟属国,其贫瘠的北部地区虽然暂时独立(名义上向五觀氏称臣)但已经不堪一击。那么,"绩易氏"为什么就是"三鬷氏"的别名?因为"绩"训织造、制作,"易"为"曑"之讹,"绩曑氏"与"三鬷氏"一样无疑都是代指地支第十位"作器—曑(酉)"的国名。

其二,约西元前21—前17世纪,"颛顼(巧倕)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 檮杌……舜(夷舜)……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檮杌、饕餮,投诸四裔……"(《左 传·文公十八年》);"昔有飂叔安(夷羿),有裔子曰董父(浞),实甚好龙,能求 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 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靡奔有鬲氏。 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 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 于過,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左传·襄公四年》)。

也就是说,自从"国分为二"之后,"三鬷氏"的北半部分"颛顼之子檮杌"早 已经注定了其被人并吞的命运,而这一次捡到大便宜的则是其东邻"有穷氏" 王朝。显然,无论是"流檮杌"的夷舜、"封诸鬷川"的夷羿(飂叔安)和寒浞(董 父)、还是過浇、戈豷,"有穷氏"的这五代国王从始至终都是以此古国"檮杌= 鬷川=過=戈"为其西征伐夏的军事基地的。因为,根据"干支密码"可知, "過"通"過(涡)",而"涡=檮杌=鬷川(酉)"成立已见前述,可见这前三个地名 都是指今涡河边的杞县一带地区(该地有较多山东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东 来影响)。至于"戈",据旧注"戈在宋、郑之间"可知也是指此"過"地,只不过这 并非是本地旧名而是征服者"倍伐(戈)氏=有穷氏"带来的新名。当然,按照 史载,此地既是"有穷氏"王朝"革蘖夏民"的策源地,也是"少康灭浇于過"、夷 王豷又夺回戈(過)地、"后杼灭豷于戈(過)"这三回合拉锯战的争夺目标和夏 王朝最终复兴的标志性纪念地。而在夏王朝彻底征服了"過"地之后,"戈=有 穷氏(卯)"这个地名就被永远清除了,而"豢龙氏"(寒浞)的杂脉东夷殖民者 "鬷夷"则被赶回了东夷老家即今曹县、定陶一带,此即《后汉书》所谓"隋陰郡 定陶有三鬷亭"的来源。(按,"飂=劉=卯"即指"有穷氏=卯";"安=羿= 午";故"飂叔安=有穷后羿"。"豢"音通"寒","董=踵=浞=亥",故"豢龙董 父=寒浞"。至于"豢龙"之所以称"龙",则是因沿用了夏朝"龙师而龙名"的结 果,因为古籍明言"有穷氏"的官制是沿用"夏政"的。)

不过,与"過"这个"北绩易国"迭经战乱几乎被夷为平地不同,今淮阳、郾城一带的"南绩易国"即"有鬲氏"此时却作为夏王朝复兴的大后方基地而有幸再次繁荣起来,由于夏之同盟国君"靡(彭寿)奔有鬲氏"南逃于此,此地一时间成了"二国之烬(夏、五觀氏)"的精英荟萃之地,人才、财富源源聚积。最终,"靡"正是利用了这些流亡势力组成的新军一举杀回了老家,赶走了"有穷氏"侵略者。而从此,"夏(寻)"的本部就有了一个全新的绰号叫"斟寻氏","五觀氏"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绰号叫"斟灌氏",因为这两国的贵族都是在"斟三有鬲

氏"居住了几十年的流亡贵族之后代,他们已经与未流亡而"从逆"过的其他夏人贵族有了本质的区别了:根据"干支密码","斟"训斗勺器皿,其与"有鬲氏"同样都属于"作器=曑(酉)"的代名词。

其三,约西元前17一前13世纪,"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鬷,俘厥宝玉,義伯、仲伯作《典宝》……"(《史记·殷本纪》)。也就是说,在和复兴的夏王朝一起繁荣了几百年后,随着"汤革夏命"的到来,夏人的两大南国后院"有仍氏(鸣条国)"和"三鬷氏"也难免要和夏王朝一起走向灭亡。作为商汤王灭夏的最后一个攻击目标,"三鬷氏"显然既无抵抗之力又有"匹夫怀璧"之罪,殷人是绝不会放过这个塞满了宝玉财富和能工巧匠之地的。而在"汤伐三鬷"之后,财宝和工匠都被掠夺一空的古老城邦"三鬷氏"就此灭亡了。此地成了商王畿的东南大门。(镇守此南、北绩陽国的殷人就是后来的"长勺氏"和"尾勺氏",他们是周王用武力强迁到鲁国的"殷民六族"之二族,见《左传》。)

其四,约西元前 13 世纪,"挞彼殷武,奋发荆楚。采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武丁)之绪……"(《诗经·商颂·殷武》);"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荥水(颍水) 窮焉。有人三身(参斟),帝俊(殷商)……生此三身之國(荆楚),姚(曹)姓……"(《山海经·大荒南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祝融的官号),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山海经·大荒南经》);"顓頊(巧倕)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山海经·大荒西经》);"帝高阳(颛顼)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祝融)……"(《楚辞·离骚》)。

也就是说,在被建都于"大坰"和"庇"(皆在郑州)的商王朝统治了几个世纪之后,随着"盘庚渡河迁殷"而导致的殷人主力撤出黄河以南地区,在西元前14—前13世纪,向来都不安分的夏遗民们又得到了谋求自由活动的空间,他们这一次都聚集在了"三鬷氏"的子孙"荆楚"的旗帜下展开了叛乱(主要是有鬲、有仍两族后裔)。但是,这次叛乱终于在一代名王殷高宗武丁的亲征下被平定了。

那么,对于其都邑王畿远在黄河北岸的武丁来说,他是如何重新定位黄河南岸的政治格局的呢?显然,根据文献的记载来看,武丁的政治手段还是很灵活的,他并没有再一次大费周章地远渡黄河在此开辟新殖民地,而是采取了"以楚制楚"的政策,就地挑选了原"荆楚"贵族中的一个亲股分子"伯庸(祝融)"为其代理人,并按照商朝"云师而云名"的制度封其官爵为"義均(云)",就像商王封姬周始祖的官爵为"叔均(云)"一样。而这个"義均"所管理的半自治

政权"三身国"显然就是指"三鬷氏"故地,因为该国的地理标志物仍然是"荥水(颍水)",该国所祭祀的守护神仍然是"巧倕(帝高易颛顼)"。而所谓"義"通"犧(犧)"指古礼器"犧尊",即代指"作器=曑(酉)","犧云(酉)"的意思就是指"犧楚(酉)"地区的长官;所谓"三身"就是"三甚(叁斟)"之讹,"三沈"与"三鬷"一样都是指星座神祇"斟=参(酉)"守护之地。

因此,综上所述,根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云云分析,芈姓楚国的真正历史源头应该就是西元前 13世纪武丁分封的"三身国",该国因为是殷人的臣属国兼通婚国(该国有"姓"就是为了和王族通婚用的,《山海经》之"姚"即"曹"之通假字,为楚王室"妘"、"曹"、"羋"三姓之一,"曹"姓自商沿用到周,最为古老),所以称自己是商先王"帝俊(高祖夒)"的子孙;该国又因为是"三鬷氏"血统的夏遗民,所以也称自己是其守护神"巧倕=帝高易颛顼"的子孙。

其五,约西元前 13—前 11 世纪,"(楚灵王)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楚先公樊),旧许是宅……"(《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陆终氏……产六子……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四曰求言,是为云郐人……"(《大戴礼记·帝系》);"黄帝(殷商)有熊国君少典之子,有熊,即今河南新郑是也……"(《焦氏易林》);"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史记·殷本纪》);"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紂……"(《史记·楚世家》)。

也就是说,武丁的"以楚制楚"政策虽然取得了其期望中的绥靖南疆之成效,楚人在有殷之世确实再未正式叛乱过,但这同时却也为这个"三身国(有熊氏)"打着"黄帝、帝俊之後"的旗号暗中蚕食殷商王朝的南土埋下了隐患。约在西元前 13 世纪末或西元前 12 世纪,"伯庸(祝融)"的长孙、楚先公"昆吾"终于一举吞并了"旧许"(许昌地区)和"郐"(新郑地区),并派遣其弟"求言"镇守"郐"地。从此,新郑地区就有了所谓"有熊之虚"和"祝融之虚"的称号了。当然,由于"有熊氏"是打着"黄帝"即殷商的旗号而吞并这些地区的,所以当时的商王在实力不够的情况下也只好默认了既成的事实,并加封"有熊氏"之君为所谓"三公"之一,尊号"鄂侯":所谓"鄂(噩)"通"囂(敖)",训釜鏊器皿、"作器=参(酉)",当然也是代指"有熊氏(酉)"的守护神。

但是,到了殷末,以尚武著称的殷王纣终于对这种既成事实忍无可忍了,

于是他就设计诱捕杀害了当时的鄂侯("昆吾"的直系后裔,名号辈分今已无考),囚禁了"西伯"。但是,纣王的这种政治幼稚举动给他带来的是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最终使周、有熊这两大反商势力走到了一起结成了同盟:一方面"西伯"周文王依靠其鄂国盟友提供的"有熊九駟"为贿赂得以逃回西土(因为巧匠神之国"有熊"继承了其祖先长于手工制造的传统,其制造的马车是当时最精良的),另一方面继任的"有熊氏"国君则彻底与殷商决裂,任由周文王和周武王在其眼皮底下伐崇、伐商而不闻不问(崇侯虎之国和孟津渡口皆与新郑之邻邑近在咫尺),并还派遣了其最著名的本族谋臣"鬻熊"(鄂侯的旁支小宗贵族而非公族)作为外交使节兼军事顾问("文王之师")常驻姬周,共同协调反商大业。显然,殷王朝正是在这南土、西土两大世仇的共同合谋下灭亡的。

其六,约西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有熊氏)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逸周书·作雒解》);"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楚灵王)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国语·郑语》)。

也就是说,"有熊氏"虽然暗中支持了周武王的伐商,但当周人一统天下之后,"有熊氏"马上发现自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由于"有熊氏"表面上一直是脚踏两只船对殷、周两大王朝保持"中立"的,所以周王朝的一家独大最终让其"中立"政策彻底破产,"中立"的政治含义一下子从"周人之友"变成了"周人之患",毕竟,如前所述,周、熊两族原本是同列"三公"平起平坐的。因此,当周武王一死、三叔和武庚的叛乱一经发动,"有熊氏(熊盈族十七国)"马上又加入了反周的一方。但是,这一次"有熊氏"的赌注是彻底压错了地方,周公很快平定了叛乱,"有熊氏"这个"反动之国"就此被打入了黑名单,从此消失在了中国正史之中。而这就是造成历史学家们至今只知道"有熊氏"是"黄帝氏(殷人)"所封建之国而不知"有熊氏"其实就是"先楚"王朝的原因。

当然,正如周人无法将殷遗民赶尽杀绝一样,他们也无法将"熊盈族十有七国"的庞大族群彻底消灭掉。于是,秉承着武丁"以楚制楚"的一贯政策,周王朝精心挑选了如下这些亲周的"有熊氏"贵族来代理其统治先楚遗民:其一是"文王之师"鬻熊的曾孙熊绎,如前述这本是"陆终六子"中排行最靠后的一

支"有熊氏"旁支没落贵族,但由于鬻熊常年居住于周、助周有功的缘故,这支 被周王赐姓"芈"的有熊后裔一跃而成了"祝融"的直系合法继承人,他们率领 熊盈遗民的主力(即淮阳、旧许、南阳盆地之夏遗民)定居"鸣条三芈"故地之丹 阳(有报道称即"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并继承了"楚"和"熊氏"的国族号,其级 别是"子男之田"(不列为诸侯的自治族群);其二则是先楚公子"求言"和"安" 的后代分别被赐姓"妘"(得名自"犧云氏")和"曹"(得名自星神"浩(曹)器"), 如前述这也是两支"有熊氏"的旁支,他们的身份与独立的"芈姓"楚国不同,其 级别是所谓的"采卫"附庸也即周王室贵族的瓜分剥削对象。其中一支受命留 在了新郑地区(郐、邬等),成为王畿内的王室直属附庸(王室的集体奴隶);另 几支则被发配到了东夷故地(邹、偪阳等),成为姬姓鲁国的附庸(非王室的集 体奴隶),也即周公自己的剥削对象。至于"樊(昆吾)"、"惠连"、"彭铿"等其他 先楚宗族,则由于其有帮助武庚叛乱的罪名而早已"血食无存"了,当然也就谈 不上有赐姓封土的资格。从此,作为姬周王朝手下败将的楚人就再也不敢提 什么"有熊氏(鄂侯)"的话题了(据《噩侯驭方鼎》等出土金文可知,"熊盈族十 有七国"中最南部的一国被征服后改封为姞姓鄂侯国,"鄂侯"一词也早已成了 周人的战利品之一,不复为楚人所有),他们只敢说自己是"颛顼(倕)"、"祝融" 和"鬻熊"的后裔。而时间一长,今天的我们就再也无法复原"樊(昆吾)"之后 的至少四五代"有熊氏(鄂侯)"国君之世系名单了。

当然,除了被外迁的楚人、邹人、偪阳人,古淮阳地区也仍然有大量的熊盈遗民,他们则连同这块土地被分封给了周王室的公主"太姬"和女婿"胡公满"(有虞氏的后裔),建立了妫姓"胡国"("胡"为此地之旧称),后来又改称"陈国"。不过,作为"倕"神守护之地的新统治者,妫姓陈国也明智地沿袭了古老传统,他们继续祭祀"颛顼(巧倕)"之神,以谋求与本地居民的融合,此即前述"有虞氏(陈国)禘黄帝而祖颛顼"的由来:因为,酒神"颛顼"固然是本地的头号守护神,云神"黄帝"(殷人始祖神)作为"犠云氏"的加封者兼通婚者其实也是本地的半个守护神(当然黄帝也是"太姬"的母系守护神)。

十一、辉县孟庄龙山文化 城址群与有娍氏考

众所周知,今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在3000多年前本为姬姓凡国等诸侯国

的领地。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上世纪发现的"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图 5-1)等新乡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凡国作为一个中国土著城邦,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也可以远远追溯到4000—4600年前的"龙山时代"。

(1) 孟庄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孟庄遗址①位于今辉县市孟庄镇东侧,其龙山文化的城址平面略呈方形,面积约12万余平方米。而在龙山城址之上还直接叠压有二里头时期的下七垣文化城址、商代晚期城址。此外,在该城址附近还发现了"安阳后岗城址"(面积不明)等诸多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的城址或聚落遗址。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连续繁荣了近千年的古城址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这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漳河、淇河、内黄、牧野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冀州、邠阜、攒茅、凡国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城邦群的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十一位"辜(戌)"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漳河:该河流名始见于《尚书·禹贡》等,今沿用,而根据"干支密码","漳" 通"商",训商量、商贸、估量,作为地名其本义就是指地支守护神"奄贸=辜(戌)";

★ 淇河:该河流名始见于《诗经·邶风·泉水》等,今沿用为河流名、淇县县名,而根据"干支密码","淇"通"棋"、"锡(赐)",训贡赐贸易、赌棋博财,作为地名也是指地支守护神"奄贸=辜(戌)";

★ 内黄:该地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等,系得名于该县西南之古黄泽, 今沿用为县名,而根据"干支密码","横(黄)"通"衡",训衡量、估算,作为地名 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大量=姑(戌)";

★ 牧野:该地名始见于《尚书·牧誓》,又作"坶野",今沿用为新乡市的区名,而根据"干支密码","牧(坶)"通"茂",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奄茂=辜(戌)";

★ 冀州:该古地名始见于《尚书·禹贡》等,最初本是指以淇(冀)水流域为中心的古"河内"地区,即《尔雅·释地》所谓的"两河间曰冀州",而根据"干支密码","冀"音通"易(赐)"训贡赐贸易,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

① 钱耀鹏:《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奄贸=辜(戌)";

★ 邠阜(豳阜):即今安阳附近,该古地名始见于《逸周书·度邑解》之"维王克殷国……于殷郊,王乃升邠之阜以望商邑",《史记》作"豳阜",而根据"干支密码","邠(豳)"通"颁",训颁赐、贡赐贸易,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奄贸=辜(戌)";

★ 攒茅:即今修武县附近,该古地名始见于《左传》等,而根据"干支密码","攒"训攒聚财物、掩取财富,"袤(茅)"通"贸",训贸易,"攒茅"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奄贸=辜(戌)";

★ 凡国:即今辉县西南,该古国名始见于《春秋》等,而根据"干支密码", "凡"训凡括、计数估量(见《玉篇》),"凡"也是"般(颁)"的本字,训颁赐贸易,作 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奄贸—辜(戌)"。

(2) 有娍氏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孟庄遗址"之主人的明确范围,即该先商古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辜(戌)"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城邦,那么,我们要找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时代属于先商"和"国名干支属戌"这两大条件的古国在可靠的中国史料记载中只有唯一一个,那就中国汉语诸族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商"的前身"有城氏(有娀氏)",今本古籍或又写作"简(减)氏",殷墟甲骨文则作"戌(成)":

《诗经·商颂·长发》有云:"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诗经·商颂·玄鸟》有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大戴礼记·帝系》有云:"有娀(娍)氏之女也,曰简(减)狄氏,产契……"

《世本・居篇》有云:"契居蕃(凡)……"

《史记·殷本纪》有云:"天乙立,是為成(娍)湯……"

殷墟卜辞(《合集•32117》)有云:"壬辰卜,其求年于戌(城)要……"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所谓"成汤"之"成","简(减)狄"之"减(咸)"、"有 娀(城)"之"城"古本一字,都是指殷墟卜辞中"戌婴"之"戌"字,其本义无非都 是成平、咸同、均衡称量①,"有娍氏"作为顶级地名兼国族名无疑本就是代指

① 可参见《周禮・地官・调人・疏》"成,平也";以及《礼记・王制・注》"成,计要也"。

主司称量和贸易的地支守护神"辜(戌)",其与淇河、牧野、攒茅、凡国等诸多"孟庄遗址"附近的顶级地名是完全等价同源的。因此,"有成氏"作为一个既能满足存在年代属于先商,又能满足国名干支含义属"戌"的古国,其地理位置和废墟遗迹只可能是指"孟庄古城址"这一本地区的中心城址而不可能是指其他时空的古文化遗址。而另一方面,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和研究也表明,殷商文明的源头"下七垣文化"分布区确实也是位于今辉县、安阳一带,这与《商颂•玄鸟》称殷人自其始祖"玄王契"时代起就一直是"宅殷土芒芒"之记载也是完全吻合的。此外,我们从"商"、"殷"这两个"有城氏"的后继国号来看,"商"训商量称量、商业贸易,"殷"通"匀(钧)"训均衡称量,其与淇河、凡国等干支属"奄贸一大量一姑(戌)"的古老顶级地名也是完全同源同义的。可见,《世本•居篇》明确指出的"契居蕃(凡)"无疑是信而有征的,至于古今许多学者把殷商族群的发祥地说成是"商丘(周代宋国)"、"鸟图腾的东夷族"、"北方游牧民族"等等则完全是张冠李戴的臆测之辞。

因此,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辉县 孟庄龙山文化城址"其实就是先商时代"有城氏"城邦之都城"蕃(凡)"的废墟, 这是一个自古就居住于此的土著汉语民族所建之古老城邦,也是无数的考古 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最想寻找而又不得其要领的神秘殷商王朝之真正发祥 地。也就是说,《史记·殷本纪》所谓的"盘庚……复居成汤之故居"原本并没 有说错(虽然其把盘庚北迁说成了南迁),今新乡、安阳一带不仅是盘庚、武丁 的晚商"殷墟",更是成汤称王之前的先商"殷墟",是一个真正的"双重殷墟"。

(3) 有娀氏守护神"辜(戌)=黄帝(戌)"与殷商文化的起源

当然,除了"有城氏"、"凡国"、"内黄"等古今地名,"姑"神作为一尊历时几千年的本地守护神,其能留给新乡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姑(辜)"神原来并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始祖神之一"黄帝"的历史原型(图5-12)。

作为世界闻名的中华民族之始祖,"黄帝"的史实身份为什么是天神而非凡人?"黄帝"为什么就是《楚帛书》中的戌月之神"辜"?显然,至少从如下的四条理由来看,这个判断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首先,在最早记载"黄帝"其人的《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五篇文献中,"黄帝"本来就是以神祇而非人王的角色出现的,因为他的名字和"炎帝"一样都是



图 5-12 姑神=黄帝的象征物: 辉县孟庄龙山城址出土的陶器纹饰"云纹"和"凡(般)"字形陶杯、山东龙山文化的"凡(般)"字形黑陶杯(前 3 千纪)、商代最盛行的青铜器纹饰"云纹"和"牛纹"、商代的"凡"字形青铜觚(前 17—11 世纪)、汉代画像砖上的黄帝(前 202—220 年)

后缀式的"某帝"而非"帝某"。而事实上,这种格式的"帝"名在《山海经·大荒海内经》的所有五篇文字中,也仅有"炎帝"和"黄帝"两例而已,足可见"黄帝"之名本来就是指一尊神话地位堪与众神之神"炎帝"比肩的大神。至于该神的更早期原型究竟是龙山时代"十二星神"神话中的哪一尊神祇,我们则可以在"干支密码"中找到解答:"黄"通"衡(横)",训衡量、估算,"黄帝"就是"衡量均平之天帝"、"估量商贸之天帝"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地支第十一位星神"辜(贾)=大量(戌)"的别名。

其次,在中国古籍中,我们要找到直称"黄帝"为神祇的记载也是不难的, 例如《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就说得很明白:"黄帝,古天神也……"

再次,在中国的古文献宝库中,举凡将"黄帝"列为史实人物的所谓"正史" 其时代都明显晚出,而且其所谓的"史实情节"完全都是辗转抄袭《山海经·大 荒海内经》等更早期文献中的神话情节而仅仅做些"人性化"的"翻译"处理的, 所以很明显,"黄帝"原本就是一尊神祇,只是到了后来才按照历史编写者的需 要而变成了一位人王。例如,西汉时代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蚩尤作 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正史 故事,其所有关键情节就都是"翻译"转抄自"甲骨文级别"的古老文献《山海 经·大荒北经》的,而在《大荒北经》中,这原本明显是个正义主神率领群神战 胜邪恶之神的故事:"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 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显 然,这个能够统领武斗神兼雩舞司雨之神"應龍"、干旱女神"女魃"等神祇打败 凶残的兵神"蚩尤"、暴戾的风神"風伯"、滥施淫威的雨神"雨師"的"黄帝",假如其不是天神又能是何人。而这个"水旱相斗"的古老神话其最初的主旨本是意在解释神秘的自然现象而非政治现实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事实上,"黄帝杀蚩尤"神话的最早版本应该仅仅是"應龙、女魃斗蚩尤",而与"黄帝"或"涿鹿"无关,就像《大荒东经》收录的同一神话之更早版本"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下旱魃),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云云那样。《大荒北经》删掉"夸父"而加人"黄帝"和"冀州"其实已经是晚出的殷人改编版神话,因为"黄帝"是殷人守护神而"冀州"是殷人所居。至于其他文献将该神话的战场由"冀州"改为"涿鹿"则更完全是后世别有用心者二次掺入的政治元素,详说见下。)

最后,在中国的占星神话中,地支第十一位星神"辜(戌)"的神职本是《史记·天官书》所谓的"西宫咸池(成貤)"即称量咸平、《尔雅·释天》所谓的"西陆昴(贸)也"即商贸财富①,而古文献记载的"黄帝"之所谓"职业特长"与此也是完全相同的:正如《大戴礼记·帝系》所云"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极畋土石金玉……节用水火材(财)物";可见,刨除"化神话为凡人"的戏说外衣,"黄帝"本来也是一尊主司度量衡("设五量"、"度四方")和商贸财富("金玉"、"财物")之神。当然,假如我们考虑到《世本》中本来就有"黄帝乐名咸池"的记载,那么我们对"黄帝三西宫咸池三西陆星昴三辜(戌)"这一结论的证明就可以更加充分而直接了。毫无疑问,所谓"咸池之乐"正是中国古人祭祀"黄帝"这尊"称量公平和貤赐富足之神"的最好证明。

因此,综合以上的几大理由,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作为中华民族至今都念念不忘的两大始祖之一,"黄帝"在中国历史中的真实身份本就是神祇而非凡人,他既不叫"轩辕(巳)",也不叫"有熊(酉)",他最早的名字其实就是《楚帛书》中的地支第十一位星神"辜(戌)"。

当然,除了"咸池之乐","黄帝=辜"所留给中国文化的还有其他的众多象征物符号,兹举几例如下:

A. 寒冬神司中(冬至)。《尚书·尧典》有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正如前文所述,"昴"星座在西元前3千纪本来就是寒冷的"冬至(日短)"和"仲冬

① 按《史记》所称之"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虚危",其实就是《尔雅》所称之"(东陆)大火、(南陆)鹑火、西陆昴、北陆虚",也即《尚书》所称之"四仲星"星火、星鸟、星昴、星虚,故知"西宫咸池=西陆星昴=辜(戌)"必成立。参见《尚书·尧典》。

月"的天文标志星座。因此,地支星神"黄帝一昴(戌)"其最早的也是最首要的身份就是主司寒冬之神。而主司"冬至"的寒神与主司"夏至"的暑神无疑是天文意义最重要的两大星神,所以这两尊神祇在后世都被加号称帝,即所谓的"黄帝"与"炎帝"。当然,正如《礼·乡饮酒义》所云"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冬"的本字为"中",在中国人看来,寒冬的另一重天然喻义就是"中藏"、冻结储蓄、聚敛藏富,而这种喻义显然也是与商贾财富神"黄帝一贾"是很相般配的。所以,该神祇在出土的战国简帛和先秦文献中还有另一个著名的别名叫"司中"(见《周礼·春官·大宗伯》等),也即"司冬神"。

B. 觚(酤)和盘(凡)。《论语》有云"觚不觚"。如知,由于考古学至今未发 现自铭为"觚"的先秦礼器,所以关于"觚"究竟为何物至今仍然是个谜(今出土 所谓"觚"是按宋人《考古图》姑且定名的)。但是,根据"干支密码",这个千古 之谜的答案本来很简单,所谓"觚(估)"其本义并非是特指某种酒器,而是泛指 所有可以充当"量杯"以估算液体容积的器皿,其引申义则为按定量"酤"酒、待 价而"沽"、贸易"贾"贩。显然,这一切概念都是古老的星神"辜(酤)"得以命名 的源头,"觚"当然也是"黄帝(辜神)设五量、度四方"的最原始象征物。那么, 中国最早的觚一般究竟长什么样子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则可以从另一个古 老的汉字"凡(盘)"看出来: 如前述,"凡(盘)"的本义是凡计盘算,也是"辜= 大量"的同义词;而"凡"字的甲骨文造型明显是个"象形字",所以我们完全由 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属于西元前3一前1千纪的出土中国礼器中,举凡貌似 "凡"字形而有可能有"量杯"作用的其实都可定名为"盘(凡)"或"觚(酤)",它 们都是代表了"黄帝=凡=辜"的象征符号(图 5-12)。而由此再反观孔子所 谓的"觚不觚",则其含义就再也不会扞格难通了:"觚不觚"之叹其实就是度量 衡失准、公平失去保障、社会失去价值标准之叹,而与旧注所谓"觚做得不像 觚"无涉。

C. 衡(北斗)。如前述,"黄帝"本得名于"衡","戌"星座也是取象于"秤", 所以同样代表了衡(秤)和升斗量具的北斗星(璇玑玉衡),自然也是"黄帝 (戌)"的"二位一体"配对星神。

D. 云中君。在《楚辞·九歌》中,冬藏之神"司中(司冬)"又被称作"云中君(云冬君)",因为"云"通"匀(钧)"训匀平、钧衡,明显与"黄帝(衡帝)"之名同义;而另一方面,正如《春秋元命包》所云"阴阳聚为云",在中国人看来,"云"本来就是一种积聚、富有的象征物,其和富藏之神"司中=黄帝"的神职也是十分。

类似的,所以,中国占星望气之学最终就把"云"和"昴"星座配对起来构成又一对"二位一体"的天象,"黄帝"又有了一个化身副神"云中君"。(所以在《九歌》中"云中君"的排位仅次于"东皇泰一"。)

E. 槃木(蟠木)。《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有山名曰衡天……有槃木千里"。显然,根据"干支密码","衡天山"和"槃(盘)木"也都是"黄帝=昴(戌)"的象征物。不过,"槃木"与其他神树不同,它并非是大行星所居,而是"衡(北斗)"之所居。不过,随着历史的演变,该神树后来常被与另一神树"桃木(若木)"混为一谈,变成了中国最著名的仙树"蟠桃树"(因为周历以冬至月为岁首,冬至神话与岁星神话很容易就会被合并起来),并彻底取代了"建木"而搬到了昆仑山上。所以,上古中国的五大神树到了今天就仅存其三了:蟠桃、月桂和扶桑。(当然,"十干日神"也有其神树"楓木"等等,参见后文。)

F. 牦(旄)和牛。《史记·天官书》有云"昴曰髦头,胡(姑)星也,为白衣(云)会"。可见,牛尾形礼器"白旄(髦头)"也是"昴=姑"星神和"白云"神的象征物。至于"牛"为什么也是商贸神"姑"的象征元素,前文在解读《楚帛书·姑神图》的牛角造型时已经述及,因为古中国人和古罗马人一样,都认为牛是最重要的财物和最贵重的商品,所以中国人称一切值钱的东西都叫"物(牛一样的财货)",就像古罗马人称货币为"pecunia(牛币)"一样。当然,后来随着"黄帝"这尊神祇的日益出名和重要,"白旄"也就成为中国帝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的两大权杖之一(《史记·周本纪》),以象征其掌握了"权衡之柄"也即权衡裁量和制定尺度(法律)之权。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地支第十一位星神"黄帝=辜"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发展脉络,那么我们对"黄帝"神话与"殷墟"地区乃至整个殷商王朝的诸多文化特征之联系就会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了。

例如,对于"殷墟"的民风,《史记》为什么会有"民俗憬急,仰机利而食"的评价?显然,这与此地几千年来都信奉财神兼赌神"黄帝"的文化大背景是分不开的,殷人从来都是无愧于其"商人"的双关语称号的。

又例如,作为上古"冀州"的中心,该地为什么也是《山海经》所谓"黄帝乃令應龍攻之(蚩尤)冀州之野"神话的发源地?很显然,这是因为"黄帝"的地方崇拜中心本来就是这块"冀州之野"。事实上,殷墟卜辞常见之"上下帝"(简称"帝")即指"黄炎二帝","上帝"即指"黄帝"。可见,殷人确实是把冬至神"上(商)"看作是众神之神"下(夏)二炎帝"的二位一体神也即至尊至亲神的。

当然,除了在"殷墟"本土,"黄帝"信仰同时也是西元前 17 世纪以后整个中国的最核心信仰,因为,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把所有华夏族地区统一起来的 "超级王国",殷商王朝对其守护神"黄帝"的热烈推崇自然也代表了整个中国 对"黄帝"的热烈推崇。而关于殷人是如何热烈推崇其守护神的,我们只要看看以下这些殷商王朝的国家标志符号与"黄帝"的紧密关系就可以看出来了.

- ★ 商和殷(国号):"商"训商贸,"殷"通"云"、"钧"训殷富、钧衡称量,其本义即代指天秤星兼商贸神"奄贸=黄帝(戌)"。
- ★ 城(国氏): 虽然,殷遗民在周代被赐姓为"子"(由宋微子的爵位"子"挪用而来),但殷商的原始姓氏或族称显然并非是"子"而是"城(城)=咸(戌)",例如其始王称为"咸夒(简狄)",其头号名王叫做"成汤"等等,皆是源自其守护神"咸池=黄帝(戌)"的。
- ★ 云师而云名(国家官爵号):《左传·昭公十七年》有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显然,与其前辈的"鸟师而鸟名"、"龙师而龙名"一样,殷商这个"黄帝氏"王朝的"云师而云名"也是一种以其国家守护神"云中君=黄帝"之名作为官爵号的官制。如前所述,这种制度至少已经对三个著名的古国产生了影响,那就是西元前 19 世纪被封为"缙云氏"的豕韦国、西元前17 世纪被封为"叔云氏(叔均)"的周国、西元前 13 世纪被封为"犧云氏(義均)"的有熊国。(限于篇幅,其他"云名官"在此就不赘述了。)
- ★ 云纹和牛纹(国徽): 与史籍中的"云师而云名"相呼应,考古学家发现,自 4 000 多年前的"孟庄遗址"开始殷人的少数贵族就开始使用"云纹"了(旧称云雷纹),而到了成汤建立商朝以后,云纹装饰更成了殷商青铜器的最主要装饰符号,俨然又是一个"云器而云食"的时代。显然,相比前朝二里头文化的"龙纹"当道以及后世周人的"凤鸟纹"当道,殷人的"云纹"和"牛纹"无疑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国徽"之一(图 5 12)。
- ★ 色尚白(国色):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色尚白。"(见《史记·殷本纪》) 毫无疑问,殷人之所以崇尚白色,乃是因为他们崇尚白云神"黄帝=云中君" 所致。
- ★ 蕃、亳(国都):如前述,无论是先商之都"契居蕃"(辉县孟庄遗址)、早商之都"汤始居亳"(偃师商城遗址),殷商的国都名都是以商贾财神"黄帝"之名命名的:"蕃(盘)"即盘算神之都也,"亳(博)"即博彩财神之都也。(事实上,成汤除了把夏都"寻"改名为"亳",他把夏都的"镇国之山"即孔甲田猎的"萯

山"也改名为了"景山","景(凉)"通"量",也是代指"黄帝=大量"。)

- ★ 蒲姑、宋、奄(胞族诸侯国名):《左传·昭公九年》有云"武王克商,蒲姑、商(商丘)、奄,吾东土也"。可见,除了殷商的本国王畿,举凡殷民所到之处,不管是主动征服还是被动迁徙,他们都不忘记把财神兼云神"黄帝"的名号带来作地名:"蒲姑国"(齐国的前身)即博弈贾贩神之国也,"奄国"(鲁国的前身)即奄贸星座之国也,"商丘"(宋国首都)即商业博彩神守护之城也,"宋"(通"中")即云中君保佑之邦也。
- ★ 黄帝(王室名义始祖):《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云"黄帝生禺猇(昌若), 禺猇生禺京(凉=淫梁)";《山海经·海内经》有云"黄帝生駱明(烙明=昭明), 駱明生白馬(伯駭=王亥),白馬是為縣(蹊)"。可见,自商先王如昭明(駱明)、 昌若(禺猇)、淫梁(禺京)、王亥(白亥縣)等等开始,殷商王室历来都是把其守 护神"黄帝"当作神话性的始祖神看待的。
- ★ 黄帝子孙(殷商王朝统治下的华夏族名义共祖):《国语·晋语》有云 "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 姜水成",也就是说,在殷商王朝长达 600 年的统治影响之下,到了春秋战国时 代,殷商守护神"黄帝"早已成了中国人公认的共同始祖。那么,"黄帝"究竟是 如何会成为华夏共祖的呢?(要知道,这种说法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很显然,这终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殷商王朝对"黄帝"神话的推崇传播太 过成功持久,以至于潜移默化间华夏大地无人能抵抗其影响力。而具体说来, 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又主要可以分成三大步骤: 其一,"黄帝"作为殷商的守 护神,他本来就是殷人公认的神话始祖(不管是王族还是非王族);其二,随着 商王朝成为汉语民族的第一个统一政权,"黄帝"又成了所有"云师而云名"诸 族的神话共祖,例如先楚有熊国(犧云氏)和先周"叔云氏"就都自称是"黄帝之 後";其三,即使到了商王朝彻底被颠覆的周代,由于周王朝的奠基者周文王本 人就是殷商公主"太壬"的儿子,而且其妻子之一也是殷王帝乙的王妹,所以他 也是打着"商王室(黄帝氏)的外甥兼女婿"的旗号而继承殷商的"天命"的,所 以周代的"黄帝"信仰不仅没有冷却反而更加炙热,就此一举超过了众神之神 "炎帝"而跃居首位,因为周人为了标榜其代商称王的"合法性",从"文王受命" 起就一直自称其"姬姓"血统是源自"黄帝氏(太壬娘家)"的,而"炎帝"此时则 仅仅是其臣属的"姜姓"诸国的神话始祖。而在殷、周这两大王朝 1 400 年的 持续推崇下,中国历史的一切关键人物、时空、事件从此就都与"黄帝"紧密相

关而不可分割了:例如,今郑州地区古本为"轩辕之国",但由于殷商王朝(黄帝氏)、有熊国(黄帝子孙犧云氏)和妘姓郐国(黄帝十二姓之一"妘=荀")对此地长达900年的建都和占领,于是"轩辕(已)"就变成了"黄帝(戌)"的附属品,即所谓"黄帝轩辕氏";又例如,《世本》所谓的"仓颉造字"本为殷先王王恆时代的事件,但由于王恆的名字没有其名义始祖"黄帝"响亮,于是最后就变成了所谓"黄帝史官仓颉造字",而与此类似的还有"黄帝臣挥(相土)作弓"、"黄帝臣胲(殷先王王亥)作服牛"、"黄帝臣胡曹(殷先王曹圉)作衣"、"黄帝臣夷牟(周先公)作矢"等等;再又例如,原本明明是殷遗民兼周人姻亲的任姓铸国(祝国),由于周王朝的政治宣传需要,也被加了一顶"封黄帝之後于祝"的大帽子(《史记》),从此也有幸跻身《国语》的"黄帝十二姓"之一。总之,事实证明,"大邑商"这个伟大的王朝,其留给中国文化的最宝贵遗产既非殷墟甲骨文,也非殷遗民孔夫子,而是她所创造的充满了凝聚力的"黄帝"文化。正是因为有了"黄帝"这个人人都认同的伟大始祖,中华民族才能在"炎黄子孙"的信仰支撑下日益发展壮大,乃至其"大一统"国本历3600余年而至今屹立不倒。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凡地方史

既然,我们已经通过新乡、安阳地区的诸多顶级地名和文化特征找到了该地"孟庄遗址"等古城的主人"有娍氏(戌)"即"先商"城邦,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复原出一份真正有考古学依据的"先凡"地方史之编年框架了。当然,如下列出的这份先凡地方史,事实上也是一份殷商王朝的发迹史。

其一,约西元前 22 世纪,"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帝俊生帝鴻……"(《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娀氏之女也,曰简(减)狄氏,产契……"(《大戴礼记·帝系》)。也就是说,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知,"有娀氏"这个以"黄帝"为其守护神的城邦早在大禹之前就已经"長發其祥"存在有年了,而到了"禹敷下土方"的年代即西元前 2100 年左右,"有娀氏"除了是中国诸多有具体国名可考的古老城邦之一,更已经是一个有具体王名世系可考的信史王朝了。而这个王朝的始王、始妣和始祖就是"帝俊(高祖要)"、"简狄氏女"和"契(高祖河)"。

其二,约西元前 21—前 20 世纪,"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诗经·商颂·玄鸟》);"契居蕃(凡)……"(《世本·居篇》);"帝俊生晏龍(相 土)……"(《山海经·大荒东经》);"玄王桓拔,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相 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發》)。也就是说,以"蕃(凡)"为其都城、以"殷土芒芒"为其后院的"商"城邦在经过了帝俊、玄王契、昭明、相土等几代君主的努力之后,已经是一个"海外有截"的即初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城邦了。

其三,约西元前19世纪前期,"王亥託(博)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山海经·大荒东经》)。也就是说,在王亥时代,商城邦虽然遭受了"有易殺王亥"的政治挫折,但这种挫折其实是该国正迅速崛起向外扩张的外在反映。因为,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大约在昌若、淫梁时代(约西元前2000—前1900年),"孟庄城址"曾经被洪水等天灾人祸所毁坏①,该国一度处于历史的低谷之中,而这与《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的昌若(禺猇)、淫梁(禺京)两先公一度曾沦落为"海神"的记载也是颇相符合的:要知道,中国人的海神、河神往往都是用治水者或溺毙水中者充任的(例如后世之海神天妃就有传说是溺死海中者)。而直到"曹圉"、"王亥"时代,"有成氏"才重新崛起,"王亥"更是殷墟卜辞中首先称"王"者,足见当时的商城邦之实力和自信。("昌若=禺猇"即《庄子》所谓海神"海若"。)

其四,约西元前 19—前 17 世纪,"苍颉造文字……"(《世本》);"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古本竹书纪年》)。也就是说,到了王恆(仓颉)、上甲微时代,殷商城邦已经彻底完成了"王亥"时代的未竟事业,把自己建设成了一个文治武功都令人称羡的国度:其所率先发明的"显性十干取名制度"以及新式的"仓颉汉字"正开始引领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进入了全新的文化发展阶段,而其强悍的军事能力也已经得到了实战的初步检验。

其五,约西元前17世纪,"汤封于攒茅……"(《商君书·赏刑篇》);"黄帝(商王)战于阪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昔阪泉氏(河伯)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逸周书·史记解》);"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沙颍河)……"(《吕氏春秋·慎大》);"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史记·殷本纪》);"武王(成汤)载旆,有虔秉

① 钱耀鹏:《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1 年第1期。

钺……韋頋既伐……"(《诗经・商颂・长发》);"黄帝(商王)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桀)戰於涿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汤自把钺以伐昆吾……"(《史记・殷本纪》);"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有仍氏),遂放而死……"(《史记・夏本纪》)。也就是说,在西元前17世纪,殷商王朝在成汤(大乙)的统治下通过"商汤伐夏桀之战"终于灭亡了夏后氏王朝及其所有盟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民族的统一王国。而对于这场著名战争的过程和路线,经过"地名干支密码"的复原其具体共包括了如下四大部分(参见图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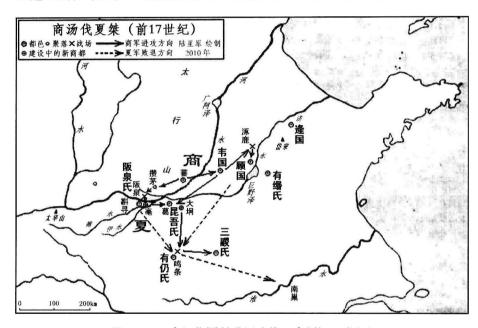


图 5-13 商汤伐夏桀进军路线示意(前 17 世纪)

A. 阪泉之战——该战是"夏商大战"的首战,也是最离奇的一战,因为上述古文献的记载明确告诉我们,商汤是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偷袭"闪电战"而侥幸成功的,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首先,商汤从其老巢"蕃"(辉县孟庄遗址)出发,用情报战使得夏都北部屏障"阪泉氏(河伯国)"的防御意识严重削弱(文无所立),从而一举偷袭占领了"攒茅"这一沁河北岸的前进基地并建立了城池(焦作府城遗址)。其次,商汤再用情报战和反间计使得"阪泉氏"产生了内讧(智士寒心),从而乘机里应外合彻底征服了沁河南岸的"阪泉氏"本土(今温县、孟津、济源一带),将其君主也赶跑了(徙居至于獨鹿)。而在顺利歼灭了"阪泉氏"封国并渡过黄河之后,夏都"斟寻"(偃师二里头遗址)显然已经

是无险可守了,因为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二里头遗址"根本就没有外部城墙,是座"不设防"的首都,其防守完全是依赖"阪泉氏"守卫的黄河天险以及"昆吾氏"守卫的虎牢天险的。于是,面对长驱直人的商汤军队,夏王桀只能"未接刃而走"仓惶南撤,迁都到了"有仍氏(沙颍河之南)"去开"有仍之会"了。而商王汤在伊尹等夏族内应的帮助下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夏都,并按照"汤与伊尹盟"的盟约把夏都"斟寻"(偃师二里头遗址)及部分的夏遗民分封给了伊尹,而商王自己则在其东侧建立了新都"亳(偃师商城遗址)",此即所谓的"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跟从夏朝列代先王定居偃师)"。从此,夏王朝的灭亡是指日可待了。

B. 涿鹿之战——商汤虽然通过反间计和偷袭闪电战—举拿下了夏都斟 寻,但夏王朝的势力仍然是令人生畏的。如前述,商汤居亳后的第一战即所谓 "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其实是徒劳无果的。此外,正如《书序》记载的,"汤既胜 夏,欲迁其社不可",商汤在彻底打败夏桀之前,他对被征服的夏贵民也仍然只 能是采取忍让政策的。于是,狡黠的商汤选择暂时放弃近在眼前的硬骨头"昆 吾氏(葛国)"而迂回开辟了远在东方的第二战场,挑起了夏商之间的第二场大 战"獨鹿之战"。根据"干支密码"易知,"獨鹿(涿鹿)"即"噣陆","噣"通"咮", "喝陆(喝之陆野)"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就是指地支第八位"咮=柳(未)",也 就是指"有易氏(未)"的故地、夏之盟国"谷平国(顧国)"之北半部(即今聊城地 区);可见,"獨鹿(未)之战"其实就是著名的"汤伐韋、顧之战"。而商汤此战的 巨大战果无疑是有目共睹的:刹那之间,夏王桀的王牌力量竟然四损其三,不 仅章、顧两国的军力被全歼国土被占领,而且前此"徙居至于獨鹿"的"阪泉氏" 也顺带被商汤消灭了。因此,也正是由于此战的战略意义堪称是夏、商双方的 分水岭之战或总决战,是开创了600年殷商王朝的奠基之战,以至于后来的殷 人在纪念和赞颂此战时先是动之以史诗(《诗经·商颂》),后更是编之为神话, 从此,所谓"黄帝(商朝)战炎帝(夏朝)于涿鹿之野"、"黄帝(商王)杀蚩尤(夏 桀)于涿鹿之野"的神话就纷纷出炉了: 如前述,"黄帝战炎帝以定火灾"本来 是一个寒冬神挑战炎夏神、云神挑战火神的"寒暑大战"神话,其背后所曲折反 映的则是远自孔甲时代就存在了的夏、商两族不睦之政治概况(黄、炎二神即 商、夏两国的守护神),但却还远非有具体的战场可寻,但随着"汤伐韋、顧之 战"的胜利,黄、炎二神的战场显然就可以彻底坐实于"涿鹿"了;如前述,"應 龙、女魃斗蚩尤"神话原本与"黄帝"无关,但很不巧的是,夏王桀的名号"履癸"

其干支属性恰好与暴风雨之神"蚩尤(癸)"相同①,于是,殷人干脆就直称夏桀为恶神"蚩尤",并在"蚩尤"的敌人名单中加上了本族守护神"黄帝",从此,"黄帝杀蚩尤"就彻底取代了"應龙杀蚩尤"而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史诗神话,而顧国(涿鹿)故地的寿张、阚乡等地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所谓"兵主蚩尤"的葬身纪念地了(见《史记》)。

C. 昆吾之战——不过,与史诗神话中的"黄帝(商王)杀蚩尤(夏桀)于涿鹿"不同,历史中的夏桀和夏耕显然并未就此被杀,他们还在依靠"昆吾国"(郑州大师姑遗址和新郑望京楼遗址等)这个最后屏障作挣扎抵抗。而关于"昆吾之战"的详情已如前述,商汤以"亳"和"韋顧"为其前进基地,从东、西两方面夹击展开钳形攻势,最终歼灭了"昆吾国"这个夏王朝四大王牌军事力量中的最后仅存者,并在其地建造了陪都"大坰(郑州商城遗址)"。

D. 鸣条之战——此战的详情也已如前述,商汤以"昆吾国"故地和"大坰"为其前进基地,一举攻灭了"有仍氏(鸣条)"和"三鬷氏(大沙)",打败并放逐了夏王桀。

当然,在这历经数十年的四大战役之后,殷商王朝的都城和陪都早已经迁到了"亳"和"大坷",从此,"辉县孟庄遗址"或曰"蕃(凡)"就再也不是殷商王朝的王畿中心了。

其六,约西元前17—前11世纪,"盘庚即位,自奄(大冋)迁于北蒙(荒),曰殷……"(《古本竹书纪年》)。也就是说,经过了300年的沉默,随着西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的北迁返回祖先故地,"蕃(凡)"再一次成了近畿之地而繁荣起来,直到周武王伐商建立姬姓凡国为止。"先凡"的历史就此结束。

十二、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 城址群与有崇氏考

众所周知,今河南省嵩山、洛水地区在 2 700 多年前本为东周王国的实际领土及其首都雒邑之所在。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上世纪发现的"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图 5-1)等嵩洛地区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雒邑东周国作为一个古国,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还可以

① 关于"蚩尤=癸"以及其神话职司的考证见本书第七篇。

追溯到 4 000-4 600 年前的"龙山时代"。

(1) 王城岗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王城岗遗址①位于今登封市告城镇西北约 500 米的岗地上, 其龙山文化的大城平面呈正方形,面积 34.8 万平方米。而在该大城的东北角 还发现有两座年代更早的龙山文化小城。此外,在该城址的附近,还分布有二 里头文化新砦期(距今约 4 000—3 800 年)的巩义花地嘴城址(城址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约 3 800—3 600 年)的偃师二里头遗址(遗址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等不同时代的系列古城址或大型聚落遗址,这里无疑是一个连续繁荣了千百年的古老文明之废墟。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规模不小、持续繁荣的古城址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是不难找到答案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嵩山、洛河、瀍河、涧河、渑池、豫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涂山、崇国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该龙山文化城址群的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十二地支星神"之第十二位"涂(亥)"为其守护神的古老部族:

- ★ 嵩山:该山名始见于《尚书·尧典》、《诗经·崧高》等,古字本作"崇山"、"崧山",今沿用,而根据"干支密码","崇"通"踵(重)",作为地名其本义是指地支守护神"路踵=涂(亥)";
- ★ 洛河:该河流名始见于《尚书·禹贡》等,古字本作"雒水"、"雒陽",今沿用为河流名、洛阳市的市名,而根据"干支密码","雒"通"路",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路踵=涂(亥)";
- ★ 瀍河:该河流名始见于《尚书·禹贡》之"伊雒瀍涧",今沿用为河流名、 洛阳市的区名,而根据"干支密码","瀍"通"躔",训躔踪行迹、履行路径,作为 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路踵=降婁=涂(亥)";
- ★ 涧河:该河流名始见于《尚书·禹贡》之"伊雒瀍涧",今沿用,而根据 "干支密码","涧"通"践",训履践、行路,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 "路踵=降屢=涂(亥)";
 - ★ 渑池:该地名始见于《史记》等,今沿用为县名,而根据"干支密码","虽

① 方燕明:《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龙山晚期大型城址》,《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28日第1版。

(渑)"古通"塓(冥)",据《说文》"塓,塗也"可知本义为路塗,作为地名其本义也 是指地支守护神"涂(亥)";

- ★ 豫州(涂山): 涂山在今嵩县境内,该古地名始见于《尚书》等,即《逸周书》所谓"三涂",而根据"干支密码","涂"通"豫(余)","豫州"这个得名于"涂山"的地名其本义当然就是指地支守护神"涂(亥)";
- ★ 崇国:即今洛阳、登封一带,该古国名始见于《诗经·皇矣》之"帝谓文王……以伐崇墉",为商纣王之大将崇侯虎之封国,而根据"干支密码","崇"通"踵",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指地支守护神"路踵=涂(亥)"。

(2) 有崇氏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王城岗遗址"之主人的明确范围,即该先商古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涂(亥)"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城邦,那么,我们要找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时代属于先商"和"国名干支属亥"这两大条件的古国在可靠的中国史料记载中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夏王朝的前身"有崇氏",别名"涂山氏":

《逸周书•世俘解》有云:"崇禹生开(启)……"

《国语·周语上》有云:"昔夏之兴也, 融降干崇山……"

《左传·哀公七年》有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有禹攻共工國山……"

《国语・楚语》有云:"启有五觀(之战)……"

《史记·燕召公世家》有云:"(夏王)启与交党攻(虞王)益,夺之……"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崇"通"踵","有崇氏(涂山氏)"作为顶级地名兼国名、族名,无疑就是代指主司踵迹路塗的地支守护神"涂(亥)",其与嵩山、洛河、瀍河、涧河、渑池等诸多"王城岗遗址"附近的顶级地名是完全等价同源的。因此,"有崇氏"作为一个既能满足存在年代属于先商,又能满足国名干支含义属于"亥"的著名古国,其地理位置和废墟遗迹只可能是指"王城岗古城址"及其附近的先商古聚落群而不可能是指其他时空的古文化遗址。而另一方面,我们从地缘格局的分析来看,古文献记载的"有崇氏(夏后氏)"其最先用武力征服的三个邻邦是共工氏、五觀氏、有虞氏,而这与考古学发现的"王城岗遗址"确实同时是"徐堡遗址"、"古城寨遗址"、"陶寺遗址"这三者的最近邻邦这一事实也是完全吻合的(参见图 5-1)。

因此,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们最终的结论就是,考古学发现的"登封 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其实就是先商时代"有崇氏"城邦的废墟,这里也是夏后 氏王朝的最早发祥地。

(3) 有崇氏守护神"涂(亥)=鲧(亥)"与嵩维文化的起源

当然,除了"涂山氏"、"嵩山"、"雒水"等古今地名,"涂"神作为一尊历时几千年的本地守护神,其能留给嵩雒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因为,"干支密码"告诉我们,《楚帛书》中这位貌似陌生的"蒤(涂)"神原来并不是别人,他其实就是中国著名的敷土神"鲧"之历史原型,其别名也叫"后土"、"土伯"等等(图 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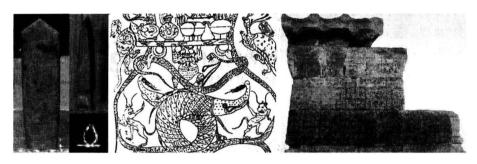


图 5-14 涂神=鯀的象征物:龙山文化的玉圭(前3千纪)、二里头文化的圭形玉器(前19—前16世纪)、殷墟甲骨文中的"土(社)"字(前14—前11世纪)、马王堆汉墓帛画上的土伯、嵩山的汉代建筑启母阙(西元前202—220年)

"鲧"为什么本是一尊神祇而不是旧史所谓的史实人物"夏禹之父崇伯 鲧"?"鲧"为什么就是《楚帛书》中的亥月之神"涂"之同一尊神祇?显然,至少 从如下的三条理由来看,这个判断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首先,在最早记载"鲧"其人的古文献《山海经·海内经》中,"鲧"本来就是以神祇的身份出现的:"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显然,"鲧"这种能飞上天庭偷窃天帝之神物"息壤"的神话法力不要说其所谓的儿子"禹"不能比拟,就是连能偷"西王母"不死药的大神"羿"也要相形见绌(偷上帝当然比偷小神西王母更难),简直就是中国版的普罗米修斯神(这两尊神祇都是为了人类的公益而非私利去偷天的,绝非那些偷不死药的贪生怕死之辈可比)。可见,"鲧"在中国最早的文献记载中本是一尊神祇而非凡人,这一点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其次,在中国的所谓"正史"中,有关"鲧"的记载也全部是时间晚出而内容雷同于其原版神话的,可见"鲧"确实并非有实迹可考的史实人物:例如,《尚书·尧典》所谓"(尧、舜)殛鲧于羽山"的记载,就明显是从前述"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神话"翻译"转抄而来,只不过,《尚书》的作者们已经把"帝(天帝)"曲解成了"帝尧"、把火神"祝融"偷换成了摄政王"虞舜"罢了。

最后,在中国的诸多古文献记载中,正如前文所述,所谓"崇伯鲧"的妻子叫"女志氏"、儿子叫"禹"的世系名单也是明显不符"干支取名制度"而纯属讹传伪造的(见本文第四篇),"鲧"真正的身份其实只可能是"崇伯禹"的守护神兼名义祖先而非其真实的父亲。因为,"有崇氏(涂山氏)"的守护神"涂"不仅与《山海经》中的"鲧"名号干支相同,而且其神话职司也完全相同:就"干支密码"来说,"鲧(xi)"音"系",据《说文》"鯀,从魚系聲"可知,今人常常读"鲧(xi)"为"鮌(gun)"完全是错误的,"鲧(xi)"与"鮌(gun)"完全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字。而"鲧(xi)"古通"蹊",即"溪(谿)"之本字,本义为蹊径、路塗,其与"涂"一样都是代指地支第十二位"路踵=涂(亥)"。可见"鲧=涂(亥)"成立;而就神话职司来说,《山海经·海内经》称"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可见"鯀"作为一尊"布土"、填平沟渎的土神其与《史记·天官书》所谓"奎(奎婁=涂)……为沟渎"的占星职司以及"涂"神神名代表的塗泥司土神职也是完全类似的。

因此,综合以上几点理由,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山海经》所谓的"鯀腹生禹"就像前述的"乐正后夔生伯封"、"蜚廉生恶来"或者"战神 Mars 生罗马王"一样,都是一种标准格式的守护神始祖神话而非史实。"崇伯鲧"这个"有崇氏"的名义始祖其历史本来面目就是《楚帛书》中的地支第十二位神祇"涂(亥)"。

当然,除了"鲧",古老的"涂"星神其实还有许多别的化身和象征物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

A. 息壤和沟渎堤防。已见前述。

B. 旱神女魃(赤水女子獻)。《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有人衣青衣,名 曰黄帝女魃……所居不雨……後置之赤水之北……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 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沟渎";又云"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 显然,根据"干支密码","魃"通"跋"训路途跋涉、"獻"即"大淵獻"之略称, "魃"、"獻"作为神名都是代指地支第十二位"路踵=大淵獻=亥",其与"涂= 鲧(亥)"完全等价;再加"魃(獻)"神所主司的"北行"、"沟读"等神话职能与 "涂=降婁"星座所代表的"北方(亥位)路踵星"和"沟渎星"之占星学特征也是完全相吻合的,我们不难得知旱神"女魃"其实也是"涂"星神的另一别名或"二位一体"化身。事实上,旱神的止雨生晴、水来土掩、以旱抗涝神职,正是从土神"鲧"的堙息洪水、填海造陆、填塞沟渎神职派生而来的。

C. 行道神軷和石敢当。《诗经·大雅·生民》有云"取羝以軷"(旧注: 祭行道之神也)。显然,这尊世界上最早的交通道路神"軷"其实也是地支星神"涂(亥)"的别名,因为"軷"训跋涉行路、路途,其神名和神职都与"涂=路踵(亥)"完全一致。而事实上,这尊"軷"神直到中古时代乃至今天仍然还能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只不过其名字稍有不同,叫做"石敢当",石即土石,敢通"巌"、"巘"训"大渊巘(亥)","石敢当"即挡在"巷陌桥道之冲"的道路神神主,可用以厌禳灾殃保太平,亦属上古之遗风(参见《辍耕录》等)。

D. 社神后土(勾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云"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毫无疑问,中国人历来祭祀最繁的社神"后土勾龙"无疑也是布土之神"鲧=涂"的重要化身。"勾(句)"即沟读,"句"又通"均(垢)"训土垢塗泥,"均龙=涂(亥)"显然成立。

E. 冥神土伯。《楚辞·招魂》有云"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王逸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可见,作为"后土"的另一别名,幽冥之神"土伯"也是"涂"神的化身。

F. 羽山和黄熊。《国语·晋语》有云"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毫无疑问,"羽山"和"黄熊"也是"鲧=涂"的两大象征符号。那么,中国神话中的"鲧"为什么总是要被"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呢?因为,正如上述,"涂=鲧=土伯"作为土地神的另一大兼职天然就是主司地府的冥神。因此,作为一尊冥神,"鲧"假如自己不先被"殛"死掉一回,他又如何能进入冥界去统治死鬼们呢。至于其死后所化的神兽"黄熊",那当然也是幽都冥界的绝妙象征:一方面,正如《山海经·中山经·中次九经》所云,"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可见,熊作为一种山居穴处的著名冬眠动物,其与山土地狱神兼死亡长眠神"鲧"的神话特征是完全契合的;而另一方面,"黄熊"之"黄"则直白地表明了其源出"黄泉"鬼域的身份。(《山海经·海内经》有云"共工生后土",可见后土神"鲧"同时也是黄泉神"共工"形同父子的搭档。可参见图 5-14 的马王堆帛画,其"土伯"正是居于幽都玄鱼和地面之间。)至于"羽渊"(羽山、羽郊),其实就是"余渊"之讹,即"涂山"和"大

淵獻"的略语,即指祭祀"鲧"的圣山"三涂山"(位于夏后氏国境),故《国语》称 其位于"夏郊"。

G. 填星(土星)。《史记·天官书》有云"填星……女主象也……其一名曰地侯"。可见,正如前述的日、月、木星、火星、金星、水星诸行星都有其配对的"二位一体"星座一样,土星"填星"也有其配对的"二位一体"星座"涂=女魃=降婁(亥)",因为其星名"地侯"与"土伯(亥)"为同义词,其"女主象"占星喻义与"女魃(亥)"同,可见"填星(亥)"就是"土伯=女魃(亥)"的占星神话原型。(按今本《天官书》将"填星庙"列为中宫之北斗,明显是受五行学说之影响,为了把填星配上"中央戊己土"方位而篡改了古代天文学的原貌,而"干支密码"则可以告诉我们真正原版的"填星庙"其实就是"降婁"星座。)

H. 玄圭。《尚书·禹贡》有云"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可见,"圭"这种著名的中国礼器与"有崇氏"是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的。而"干支密码"告诉我们,"圭"其实就是象征"有崇氏"守护神"涂=鲧(亥)"的专用礼器,因为"圭"通"畦",本义为土地田畦,其作为礼器之名就是代指地支第十二位"涂(亥)"的;此外,甲骨文中的"土(社)"字其与出土玉圭的造型也是十分相似的(图5-14)。因此,当我们明白了"圭"的本义其实就是象征"后土"神以及土地所有权之后,我们对《周礼·春官·典瑞》所谓"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云云就能作出更深刻的理解了:原来,周代的王、公、侯、伯等列国国君们之所以要人手一圭,正是象征了他们都是拥有"国土"的统治者;而本身没有封土只能依附于国君们的子、男等小贵族则只能人手一璧,以象征他们都是虽拥有金玉财富却没有全权领地的次级贵族。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地支第十二位星神"鲧=涂"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发展脉络,那么我们对"鲧"神话信仰与嵩雒地区"有崇氏"(夏后氏)的诸多地方文化特征之联系就会有更多更深刻的理解了。

例如,关于"有崇氏"的职业特长,《世本·作篇》等文献为什么会有"鲧(有崇氏)作城郭"、"禹作城"的记载,而《吴越春秋》等更认为这是中国的"城郭之始也"?显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半真半假的说法其实正是源自"有崇氏"对其守护神"后土勾龙=鲧"的信仰:说其半真,是因为考古学家确实发现了"有崇氏"部族擅长筑城的证据("王城岗城址"是黄河以南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说其半假,则是因为"有崇氏"的筑城既称不上是技术最好的(比不过"三鬷氏"),也称不上是规模最宏伟的(比不上"有虞氏"),更称不上是历史最早的

(比不上"昆吾氏"的前身无名城邦"郑州西山城址"),所谓"鲧作郭"、"禹作城" 更多的是反映了"有崇氏"城邦珍视土地资源、重视土建工程的文化观念,也即 对勾龙神"鲧"的信仰文化。

又例如,关于"夏后氏"的文化遗产,《尚书》和《史记》为什么都留下了关于"夏社"这一重要祭祀设施的记载,而这个"夏社"也是中国最早见于记载的社神祭祀中心?显然,在理解了"夏后氏(有崇氏)"最早的守护神本来就是"后土=社"之后,我们对嵩雒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社"文化的发源地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再又例如,关于嵩雒地区的名胜古迹,今嵩山脚下为什么至今都保留着著名的启母石和启母阙(图 5-14)等文物并流传着夏王启是从"启母石"里蹦出来的传说?显然,在理解了夏王朝的始祖神"涂山氏=后土"本来就是一尊主司土石大地的神祇之后,我们对这个古老的传说就再也不会感到突兀难解了:因为《淮南子》等所谓的"禹生于石"和"启生而母化为石"神话无疑都是更古老的《山海经》"鲧腹生禹"神话之翻版,其本义无非都是在说土石大地之神"涂"是大禹、启等夏王的守护神兼名义始祖神。

最后又例如,关于"夏后氏"的开国史,中国百姓乃至部分历史学家为什么至今都喜欢谈论所谓"大禹治水"的话题而不顾这个故事是多么地有悖于历史常识和考古事实?(如前所述,龙山文化时代从未发现过"郑国渠"、"都江堰"之类的大型水利设施,而且当时地广人稀,洪水对人类的危害程度其实远没有后世严重。)很显然,这种历史观念的形成无疑也是与"夏后氏"的先民崇拜土神兼旱神"鲧一女魃"大有关系的,正如《山海经·海内经》所云"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在夏人看来,本国的始王"崇伯禹"天然就是应该与本国的守护神兼名义始祖"鲧"进行"配祭"的,而这种"配祭"关系反映在其本族的史诗神话中,自然就变成了大禹王和土神"鲧"一起在汪洋洪水上"布土(敷土)"建设大地的地基,并将新建好的大地划分为"九州(九块大陆)"的神祇创世故事,以及大禹王和旱神"鯀—女魃"一起下凡救民、填没洪水、以旱抗涝的神仙济世故事。而后人不察,乃将这些明显的神话故事硬是"化神奇为平凡"写入了正史如《尚书》、《史记》等等,"大禹治水"也就成了中国人最熟知的有关嵩雒文化之"史实"了。

(4) 地名干支密码复原出的先周嵩维地方中

关于先周时代的嵩雒地方史,就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与考古证据来看,大

致可以由如下几部分组成。

其一,约西元前 24—前 22 世纪,"夏鲧(有崇氏)作城·····"(《吕氏春秋·君守》)。也就是说,结合考古发现可知,早在夏后启尚未建立"夏后氏"王朝之前,以后土神"鲧"为其守护神的"有崇氏"城邦就已经在嵩雒地区建立了。

其二,约西元前 22 世纪,"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楚辞·天问》); "昔者绩易强力四征,重丘(有崇氏)遗之美女,绩易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 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逸周书·史记解》);"有鯀攻程(郢)州之 山……"(《山海经·大荒北经》);"有禹攻共工國山……"(《山海经·大荒西 经》);"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昔禹致群 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有易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下》)。 也就是说,到了西元前 22 世纪,"有崇氏"的第一个知名国王"禹"终于出现在 了中国信史之中。不过,大禹的这个王位并非是靠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得来 的,而是靠"伯禹腹鲧"即"有崇氏"本族的王权神授和血统渊源得来的;大禹的 这种"合诸侯于涂山"、擅自杀戮"防风氏"等作威作福的霸权更不是靠传说中 的"治水有功"而得来的,而是靠其用暴力手段先后征服"绩易氏(郢州)"、"共 工國"等邻邦所树立的恐吓效应而得来的。

其三,约西元前 22—前 21 世纪,"昔有鄶君(五觀氏)啬俭,减爵损禄,群臣卑让,上下不临,後君小弱,禁罚不行,重氏(崇氏)伐之,鄶君以亡……"(《逸周书·史记解》);"启有五觀……"(《国语·楚语》);"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史记·燕召公世家》);"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逸周书·史记解》);"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史记·夏本纪》)。也就是说,到了崇伯禹的外甥启的时代,"有崇氏"终于迎来了其最好的历史性发展机遇,他先是乘着"五觀氏(有鄶氏)"的内乱将这个同胞城邦顺利吞并,再是趁着"有虞氏"王朝的内乱一举打败了其末代国王"伯益",从而彻底夺取了中原的总霸权,并从此改国号为"夏(辰)",以表示自己是众神之神"炎帝(辰)"直接庇护下的众王之王。虽然,对于这个"众王之王"也会有人表示不服,例如东夷地区的总霸主"有扈氏",但是,此时的"夏后氏"早已经是一个巨无霸了,实际上,包括其姻亲城邦"有仍氏"在内,"夏后氏"共统辖着"有鬲氏"、"五觀氏"、"共工氏"、"有虞氏"等六大城邦,几占汉语十三城邦的一半,小小的"有扈氏"是根本不堪其一击的。显然,嵩雒地区的"三千年帝都"黄金时代正是从此刻开始的。

其四,约西元前 21—前 20 世纪,"太康失国,昆弟五人(昆吾氏)须于洛 汭……"(《史记•夏本纪》);"太康居斟寻……"(《古本竹书纪年》);"洛伯用(仲康)与河伯、冯夷斗……"(《古本竹书纪年》);"浇谋易旅,何以厚之? 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楚辞•天问》);"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左传•哀公元年》)。也就是说,崇伯禹和夏王启虽然一度"统一"了汉语世界的半壁江山,但这种"统一"完全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仅仅几十年后,由于夏王太康的无能,各个原本勉强称臣的城邦立即脱离了夏王朝的控制,把"有崇氏"城邦打回了原形。尤其是,在强大的东邻"昆吾氏(斟灌)"的逼迫下,夏王太康不得不选择放弃"崇"(王城岗遗址)而迁都于洛汭之"寻"(后称斟寻,即巩义花地嘴遗址)以避其锋芒,此即所谓的"太康失国"。但是,比太康更惨的则是其继任者仲康(洛伯用)和夏后相,他们连"寻"这个临时据点也保不住,因为他们的敌人是更加强大的"有穷氏",最终在夷羿(冯夷)、寒浞、浇等有穷氏国王的攻击下,夏后氏彻底亡了国(今巩义花地嘴遗址发现有"新砦期"的东夷风格之虹形"玉璋",当即受"有穷氏"的影响而来)。

其五,约西元前 20—前 19 世纪,"少康……邑诸纶……"(《左传·哀公元年》);"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逸周书·尝麦解》);"帝宁(杼)……迁于老丘……"(《古本竹书纪年》);"昔者夏后启(扃)……陶铸之于昆吾……"(《墨子·耕柱》)。也就是说,有感于唇亡齿寒的教训,"斟鄩(夏)"和"斟灌(昆吾)"两族的亡国遗民终于联合在了一起,在斟灌国君"彭寿(靡)"的率领下逐步收复了失地。而在夏王朝复辟的初期,由于嵩雒地区的"寻"、"纶"等地设施简陋,所以从帝杼(宁)到帝扃的六世夏王都是建陪都于斟灌国的"老丘(新密新岩遗址)"的,正在重新建设中的"斟鄩"地区诸城市一度不再是夏后氏的政治经济中心之所在。

其六,约西元前 19—前 17 世纪,"均國(高)生役來(廑),役來生循鞈(不降)……"(《山海经·大荒北经》);"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今偃师东首阳山)……"(《吕氏春秋·音初》);"斟寻……桀亦居之……"(《古本竹书纪年》);"昔者有洛氏(夏)宫室无常,池囿大,工功日进,以後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逸周书·史记解》)。也就是说,大约从夏王扃(均國)统治的末年开始,夏王朝的首都再次发生了迁移,嵩雒地区的"斟寻"(今偃师)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前次太康所居巩义之"寻"仅是逃难地而已)。而这座伟大的都城就是考古发现的"偃师二里头

遗址"。但是,由于从孔甲到桀共四代国王对这座都城的建设投入太大(宫室 无常),以至于成了商汤等敌人的政治攻击之口实,夏王朝(有洛氏)终于为此 付出了亡国的代价。

其七,约西元前17世纪,"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 夏……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 (《吕氏春秋•慎大》);"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汤归至 于泰卷,中垒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 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 劳干外,其有功乎民……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後有立。昔 蚩尤(桀)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 毋之在国,女毋我怨……'"(《史记·殷本纪》);"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 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 孕……故命之曰伊尹……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 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吕氏春秋•本 味》)。也就是说,在西元前 1650 年左右,随着"未接刃而桀走",夏王朝在嵩雒 地区的 450 年统治就此结束了,"斟寻氏"故地又迎来了一个半新不旧的统治 者: 夏遗民伊尹建立的"有侁氏(有莘氏)"封国。说它旧,是因为这个国家不 仅血统族属未变,其国君伊尹本来就是夏遗民(所以他才能到夏王桀那里骗取 信任而做间谍内应),而且其国号也是沿用的本地旧称:据《说文》"侁,行貌" 云云可知,"侁"训行走、行路,又通"跣(践)"训履践、踵迹,按照"干支密码"都 是代指地支第十二位"路踵=降履(亥)",其与"有洛氏"、"有崇氏"、"涂山氏" 等嵩雒地区的古地名是完全等价的。(故《吕氏春秋》称此"有侁氏"地近"伊 水"。)说它新,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政治身份和疆域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正如前述,作为《汤诰》所封的三大虞、夏遗民封国之一(所谓"古禹之後" 伊尹、"皋陶之後"咎单、"后稷和夏耕之後"周弃),该国不仅政治地位变成了商 王朝羁縻下的半独立政权,而且疆土也仅剩了半壁江山:根据灭夏之前伊尹 与商汤达成的"侁商同盟条约"(伊尹之盟),"斟寻氏"故地被一分为二,其东部 归商王占领并建造了新的商都"亳"(偃师商城遗址);其西部斟寻旧城(偃师二 里头遗址)则仍由伊尹领导的夏遗民"有侁氏"居住并保留了"夏社",以代替无 后绝嗣的"夏桀(蚩尤)"继续祭祀鲧(勾龙)和禹。显然,这份"以土地换和平" 的条约是东亚历史上已知最早的"国际条约"。

其八,约西元前17世纪,"疆埸之邑,一彼一此……商有姺(有莘氏伊尹)、 邳……"(《左传•昭公元年》);"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 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史记·殷本 纪》);"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 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古本竹书纪 年》)。也就是说,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虽然商汤兑现了"侁商同盟 条约"把夏旧都斟寻分封给了伊尹建立了"有姺国",但商王朝对伊尹这个靠做 间谍内奸起家的夏遗民显然并不放心,所以当若干年后商汤一死,新即位的商 王太甲就"不遵汤法"单方面撕毁了"侁商条约",试图吞并整个"斟寻氏"故地 以便永绝后患。当然,对于这种违约行为,夏遗民们是绝不能接受的,于是伊 尹这位"有姺氏"国君就领导夏遗民发动了政变,一举占领了近在咫尺的"亳", 而把太甲赶到了"桐(大坰)"并自己称王"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一度恢复了 夏人的完全独立,此即《左传》所谓"商有姺、邳"的"有姺国叛乱事件"。而直到 若干年后首任伊尹"挚"去世(三年或七年皆未必可信),其子孙们争权内讧(伊 奋、伊陟以及继位称王的第二任不知名之"伊尹"),一直在陪都"桐(大坰)"等 待机会的太甲才终于能趁乱出兵杀死第二任"伊尹",--举收复了"亳",恢复了 商王朝的最高统治。至于再次向商王投降的伊奋、伊陟等夏遗民,除了能分到 一些"其父之田宅"以便继续祭祀伊尹"摰"的鬼魂之外(殷墟卜辞证明殷人是 很怕伊尹的厉鬼为祟的),显然再也没有资格称王称伯了。

其九,约西元前 16—前 11 世纪,"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迁于嚣(大坰)……"(《尚书·序》);"命此文王……續女维莘"(《诗经·大明》);"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之美女……献之纣……"(《史记·周本纪》);"帝谓文王……以伐崇墉……"(《诗经·皇矣》)。也就是说,经过了 100 多年的辉煌,伊雒地区的"亳"随着末代"伊尹"即太戊之臣"伊陟"的去世,日渐失去了其对商王的吸引力,因为随着殷人本族势力的日益强大,夏遗民的"地头蛇"势力对于维护商朝的统治已经不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了。因此,在西元前 16 世纪末,商王仲丁终于决定正式定都郑州地区的"大坰(嚣)",因为那里已经培育出了完整的殷人贵族势力,他们无疑是商王朝更可靠的支柱。不过,商王对于夏旧都仍然是不放心的,所以大部分夏遗民也被同时迁离,被发配去了西北方戍边(今陕西合阳),此即殷末姒姓方国"有莘氏(有侁氏)"的来源(此国与伊尹时代一样仍然以出美女著称)。至于伊雒地区,则

从此成了历代"崇侯"的管辖地,直到末代的"崇侯虎"被周文王伐灭。此外,在周公坐镇此地平叛并建立东都雒邑之后,此地的殷遗民中还有一支被发配到了衞国,此即《左传》所谓"殷民七族"中的"终葵氏":因为根据"干支密码","终"通"踵","葵"通"逵(奎)"训道路,"终葵氏(踵奎氏)"作为地域性族名其本义当然就是指其世居祖籍"崇(踵)"。而在"终葵氏"被迁出"崇"地之后,先周时代的嵩雒地方史也就此宣告结束。

十三、龙山文化城址群印证下的 中国守护神文化

黄河为什么叫"河(荷)"? 嵩山为什么要叫"嵩(踵)"? 虞、夏、殷、周这些王朝为什么要叫虞(矢)、夏(夏)、殷(匀)、周(调)? 青、兖、冀、徐这些所谓的"九州"为什么要叫青(性)、兖(演)、冀(锡)、徐(余)? 显然,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的顶级古地名或朝代国名其最初的来源都是完全相同的——就其形式源头来说,它们都是源自不晚于龙山时代就已成型的"十二地支星神"之名;就其本质源头来说,它们则都是源自中国天文学的"赤道十二星座"之名。总之,它们都是源自中国文明所独有的"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

而事实上,关于龙山文化时代的中国就已经存在着严整有序的"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这一重要事实,我们今天不仅可以在"干支密码"证据中找到间接的证明,更可以在古文献的自我阐述证据中找到最直接的证明。

(1) 尧舜十二州考

《尚书·尧典》有云"(尧、舜)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显然,由于缺乏更具体的州名及地理方位信息,"尧舜十二州"在严肃的历史学家看来必然是很值得怀疑的,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汉人在"禹贡九州"基础上再加三州以模拟汉代行政区划的附会篡改。但是,通过我们前文的具体分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样的判断完全是武断无据的。因为事实很明显,《尚书·尧典》等所谓的"尧舜十二州"其实就是指龙山文化时代的十二个汉语土著城邦,它们为了区分彼此而按照占星神话各选了一尊"地支星神"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该"十二州(十二古国)"的具体地名和地理方位信息可总结如下(表5-1):

表 5-1 先商十二城邦守护神与龙山文化城址对照 (陆星原制,2010年)

星 座	守护神名	先商古 国原名	龙山文化 城址	其他相关的顶级历史地名	周代国名
子=菅室	陬=女娲	五鸠氏	临淄桐林	青州、淄河、邹平、临朐、朐 濡水、营丘、蕤水、女和月母之国、 替州、浑敦氏	齐国
丑=虚	如=應龙	有仍氏	平顶山蒲城店遗址	汝河、舞阳、舞阴、筮山、巫山、 葉县、犫河、谢国、郡国、應国、 有戎之虚、鸣条之野	應国
寅=牵牛	秉二夔	豕韋氏	濮阳戚城遗址	濮阳、大伾山、顿丘、攸侯国、兖州、沇水、僕牛氏、御龙氏、有施 氏、章城、桃城、濮水、缙云氏、 衛国	濮阳
卯=析木	余=奢龙	有穷氏	滕州庄西里遗址	费县、滕州、沂河、蒙山、徐方、诸、穷桑、盖余之国、徐州、倍 伐、緡山氏、緡渊、邳、穷奇氏、 蜚廉氏	薛国
辰=大火	皋=炎帝	少皞氏	章丘城子崖遗址	谭国(郯国)、盧縣、關蘆水、逢 国、岱宗、济南历山(烈山)、烈 山氏、赤水氏	郯国
巳=亢	且=轩辕	五觀氏	新密古城寨遗址	新密、汜水、溱水、洧水、大隗山、圃田泽、卷县、管国、郐国、会稽山、斟灌氏、葛国、昆吾、桐宫、大坰、阑	鄭国
午=翼	相一界	有扈氏	阳谷景阳冈遗址	阳谷、鄄城、菏泽、顧国、任国、 宿国、须句、常阳谷、九扈、九 苑、因民、摇民、孟翼氏	须句
未=鹑火	壮=后稷	有易氏	在平教场 铺遗址	聊城、茌平、济水、穀國、夷儀聚、涿鹿、九淖、五雉氏、有狄 氏、防风氏、东阿、綽人、毛民、 饕餮氏	夷儀那國
申一與鬼	玄=河伯	共工氏	温县徐堡遗址	太行山(大形山)、河水、覃懷、温县、轵、共山、湛水、原邑、邢邑、无怀氏、阪泉氏、河伯国	温国

(续表)

	守护神名	先商古 国原名	龙山文化 城址	其他相关的顶级历史地名	周代国名
酉=参	参 =巧垂	有鬲氏	淮阳平粮台遗址	颍河、项城、涡河、宛丘、胡国、 杞国、三鬷、程州(郢州)、有熊 氏、熊盈国、三身国、鄂国、檮杌 氏、缋昜氏	陈国
戌=昴	辜=黄帝	有娍氏	辉县孟庄遗址	漳河、淇河、内黄泽、冀州、邠 阜、攒茅、凡国、牧野、倉水、蕃 (凡)、商、殷土	八国
亥=降婁	涂=鲧	有崇氏	登封王城岗遗址	嵩山、洛河、瀍河、涧河、渑池、 涂山、豫州、崇国、有侁(莘) 氏、有洛氏、重丘、重氏	維邑周国

因此,事实证明,相比所谓的"禹贡九州","尧舜十二州"才是龙山文化时代中国真正的地理原貌,4500—4300年前由"五鸠氏"、"有仍氏"、"豕韦氏"、"有穷氏"等十二个古国所建造的十二座"龙山文化城址"至今犹存,这是谁也难以否认的事实。至于"禹贡九州",则明显是一个商周时代才出现的地理概念,其托名称"禹贡"不过是出于对"崇伯禹"这位"大地神崇鲧之子"、"地理学之鼻祖"的尊敬罢了。因为,"尧舜十二州"的地理范围完全符合龙山时代汉语居民的定居区域,而所谓"禹贡九州"的地理范围却远远超出了这个区域,明显是殷王武丁拓土千里后才可能有的地理观念;此外,《尚书·禹贡》中所列的九州物产有很多是龙山文化时代根本不会出现的(例如扬州的"贡金三品"、梁州的"厥贡镠、铁、银、镂"等等)。总之,只要我们刨除一些错误的解读,例如旧日史家认为"十二州"(十二古国)乃是尧、舜自上而下发布命令所"肇"的(实际上《尧典》说得很明白,"倕国"、"夔国"等名字是各国报名自选兼公推公认的即所谓"畴若予工、佥曰"云云),旧日儒家认为"十二牧"(十二古国国君)乃是尧、舜自上而下任命的地方官等等,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史料对4500—4300年前的中国"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是早有明确的记载的。

(2) 十二分野考

《史记·宋微子世家》有云"荧惑守心(大火),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 《滕王阁序》有云"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鹑尾),地接衡庐"。可见,即 使到了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甚或就是今天,虽然"九州"等新的地理概念 早已经替代了尧、舜时代的"十二州",但肇始于 4 500—4 300 年前的以天空 "十二星座"对应大地"十二分野"的占星学观念依然是牢固地存在于中国人的 思维方式之中的,只不过,这一次中国人所重新诠释的"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 其所适用的地理范围已经更加宏伟而广阔了(表 5-2)。

					-							
十二星次	寿星	大火	析木	星纪	玄枵	诹眥	降娄	大梁	实沈	鹑首	鹑火	鹑尾
周秦分野	郑	宋	燕	吴越	齐	I	鲁	赵	魏	秦	周	楚
汉晋分野	兖州	豫州	幽州	扬州	青州	并州	徐州	冀州	益州	雍州	三河	荆州

表 5-2 《晋书・天文志》中的十二分野

毫无疑问,除了为反映汉语民族的总体生存空间早已大幅度地扩展之事实而作出的必要修改,形成于周、秦两汉时代的"十二分野"地理区划其与古老的"尧舜十二州"地理区划在基本理念上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3) 广义先商史的多维时空框架

既然,龙山文化时代的中国存在"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这一点已经确证 无疑,那么,我们基于"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而复原出的广义先商史也就更加 基础坚实了。而这种中国文明所独有的天地合一、天人合一式"守护神文化" 告诉我们,中国的广义先商史其实并非像今日的某些史书所描绘的那样是单 线式的,而是多维时空立体交织式的,其总体的时空结构可初步归结为表 5~3。

表 5~3 广义先商时代中国历史的多维时空框架(西元前 25—前 17 世纪) (陆星原制,2010 年)

- ◆ 东夷方言城邦: 少皞氏(辰)、有穷氏(卯)、有扈氏(午)、有易氏(未)、五鸠氏(子)
- ◆ 河南方言城邦: 夏后有崇氏(亥)、昆吾氏(巳)、有仍氏(丑)、有鬲氏(酉)
- ◆ 河内方言城邦: 有虞氏(辰)、共工氏(申)、豕韦氏(寅)、先商有城氏(戌)

	历史纪年可选用的中央王朝	东夷霸主	河南霸主	河内霸主
前 25-前 24 世纪	少皞氏王朝	少皞氏★	昆吾氏	共工氏
改朝换代的标志》	性历史事件: 有扈氏攻颛顼和少	> 皞般之战、陈	锋氏建立有	虞氏王朝
前 24—前 22 世纪	有虞氏王朝	有扈氏	昆吾氏	有虞氏★
改朝换代的标志(生历史事件: 禹攻共工之战、启	攻益之战、启	与有扈氏之品	ŧ
前 22-前 21 世纪	夏后氏王朝(前夏)		夏后氏★	豕韦氏
改朝换代的标志的	生历史事件:有穷后羿西征灭夏	、相土东征		

(续表)

	历史纪年可选用的中央王朝	东夷霸主	河南霸主	河内霸主
前 20 世纪	有穷氏王朝	有穷氏★		先商
改朝换代的标志	性历史事件:少康复国、帝杼东行	E.	<u> </u>	
前 19 世纪		有易氏	夏后氏★	
	夏后氏王朝(后夏)	上甲微、不	降联军灭有	易氏之战
前 18前 17 世纪			夏后氏★	先商

显然,真正连续的中国信史正是从这些"四王"(少皞氏、有虞氏、夏后氏、有穷氏)、"六霸"(共工氏、昆吾氏、有扈氏、豕韦氏、有易氏、先商有娀氏)以及所有十三大国的多维时空互动关系中开始的。虽然,为了纪年方便,我们也可以按照传统的方式把这段历史划分为五大王朝(少皞、虞、前夏、有穷、后夏),但这绝不是说这些所谓的"中央王朝"是可以和秦汉隋唐等集权政体相提并论的。毕竟,"地方守护神信仰"这种文化现象其本身就是一种多元社会的产物。

(4) 中国历史的多元神话与统一文化

"雅典娜"只是一个神话,但"雅典"却是一座百分之百真实的城市;"黄帝"也只是一尊神祇,但"黄帝氏"却是一个百分之百真实的王朝。毫无疑问,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貌似悖论的结论,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神话其实比历史更真实。而对于先商时代的中国而言,这一点尤其如此:举凡天文历法、地理国别、人名族氏、礼器用具、思维方式、行为风俗等等,中国历史的开篇词汇无不是以"十二地支守护神"的各种同义词写就的。只不过,由于远在3600多年前,"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本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已经早早的结束了,所以我们今人才会对其感到既十分熟悉而又十分陌生。

"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为什么在 3 600 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因为,远在 3 600 多年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统一王朝——殷商王朝就已经建立了,中国社会的核心部分从此就不再是一个城邦林立的多元社会了。因此,原本很适应于城邦林立多元社会的"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现在显然已经不再适应于商王朝这个统治了所有十三个汉语城邦的新王朝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从此就必须面对被商王朝不断改造的命运。具体而言,在殷商王朝的 600 年统治下,该古老的文化思想体系至少在以下几方面都受到了重大的修改:

其一,抬高殷人守护神"黄帝"的神话地位,以证明殷商王朝的"天命神佑"之合法统治。具体而言,就是把成汤伐夏桀的历史故事神化成"黄帝战炎帝"、"黄帝杀蚩尤"等等。此外,黄帝的神话谱系也相应地被附会夸大了,例如《山海经》中就有"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生帝顓頊"、"黄帝生犬戎"、"黄帝生北狄"等明显"不古"的神话谱系记载。从此,"黄帝(上帝)"就升格成了与众神之神"炎帝(昊天)"平起平坐的至尊天神和全民始祖神(包括了汉语和非汉语族群)。"十二地支神祇"之间的原始平等性就此被彻底打破了(这也是周代"昊天上帝=昊帝+上帝"一神论的源头)。

其二,改变殷人始王"帝俊"的身份,将其由"人鬼"提升为天神,以此神化殷商王室的血统。例如,《山海经》就有所谓"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和"帝俊妻常羲(恒娥),生月十有二"的神话,把日神"羲(甲)"和月神"恆娥(子)"都说成是"帝俊"的妻子。而很显然,这种"生十日"、"生月十有二"的开天辟地之功业原本是只有上帝本人才配拥有的。"帝俊"显然已经被神化为上帝的"二位一体"化身了。此外,《山海经》还有所谓的"帝俊生后稷(姬周氏)"、"帝俊賜羿(有扈氏)彤弓素矰"、"帝俊生三身(有熊氏)"等等记载,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攀龙附凤式的虚假贵族谱系所衍生出的新神话谱系,后稷、羿、三身(巧倕)等等地支星神从此也都成了帝俊的子孙后辈了。而事实上,由于古文的"帝俊=夒"在后世常常被讹写为"夔(kuì)=喾(ku)",所以这个新编版本的神话谱系后来还演变成了《大戴礼记》中著名的"帝喾四妃"谱系:"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逢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显然,"帝喾次妃陈逢氏(甲)"就是"帝俊之妻羲和(甲)","帝喾次妃陬訾氏(子)"就是"帝俊之妻常羲(子)";至于契、后稷周弃则本来就是"帝俊"的嫡亲子孙或挂名子孙兼姻亲。

其三,夸大殷人始王"帝俊"的子孙谱系,以突出殷商王室的"万国之父"地位。也就是说,除了上述"帝俊(喾)四妃"、"帝俊赐羿(有扈氏)"、"帝俊生三身(有熊氏)"等等汉语族群内的虚拟谱系,"帝俊"还被编造为许多非汉语族群的共同始祖,例如"帝俊生白民"、"帝俊生黑齒"等等。从此,中国神话所反映的中国文化之内涵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汉语族群本身,而日渐成为一种有对外吸收能力的崭新文明了。

其四,抬高殷人始祖"帝鸿(契)"的地位。例如《左传》就记载有"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浑敦(五鸠氏)",《路史》有"帝鴻生白民及嘻(蟠

牛),嘻生季格(瞽叟),季格生帝魁(象)"等等。

其五,打破"尧舜十二州"地名不可修改的旧习,首开修改古老地名和各地守护神文化的先例,以便消灭各个古老城邦的独立倾向。也就是说,殷商王朝与所有此前的征服者不同,他们曾把大量被征服的殖民地地名都改成了"商(戌)"的同义词,而不管其旧地名喻义的是哪尊守护神。例如他们曾把"五鸠氏(子)"改成了"博姑氏(戌)"、把"有崇氏(亥)"改成了"亳(戌)"、把占领"三鬷国(酉)"的部分土地改成了"黄国(戌)"、把占领"邳国(卯)"的部分土地改成了"奄国(戌)"等等。而这种篡改地名的文化清洗手段到了周代更被发扬光大,周人也把带"周(未)"的同义词地名几乎带到了所有主要的大国,例如齐国、鲁国、陈国、莒国、沫邦(殷墟故地)等等,此外还发明了用君王私名而非守护神之名来命名国族的补充手段,例如用周文王"昌(寅)"之名命名了"晋国(寅)"、用周厉王"胡(酉)"之名命名了"鄭国(酉)"等等。

而经过以上这些有意无意地对"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的大肆修改之后, 商、周以降的中国人即使学问再渊博如孔夫子者,其想要仅仅依靠"有典有册" 的殷人、周人文献去复原出中国历史的原貌无疑就会变得十分困难了。

不过,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的历史外貌虽 然因为种种原因被涂改肢解,但归根结底,其核心内涵却从未被中国文明所放 弃,毕竟,殷人、周人等"篡改者"其本身的文化基因说到底也还是以此为基础 而形成的,殷人从未放弃对其古老地支守护神"黄帝"的热烈信仰,周人也从未 减弱对其古老地支守护神"后稷"的无比崇拜,今天的中国人更是从未放弃"龙 的传人"和"炎黄子孙"的骄傲称号。因为,说到底,"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虽 然是一种有着"一分为十二"多元化外衣的文化,但更是一种有着"十二地支星 座彼此同轨不可分割"内涵的文化,是一种多元之中有统一、统一之中有多元 的文化有机体。毫无疑问,在43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之所以会出现如图5-1 所示的那样一幅整齐划一的"十二州"版图,其本身就说明了"十二地支守护神 文化"所具有的非凡内在凝聚力,要知道,这种诸神与诸城邦的"严格——对应 关系"在古代苏美尔、古埃及或者古希腊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他们最常见 的是一神守护多城或者一城拥有多神的混乱局面)。而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因 为这种"十二地支守护神文化"的顽强存在,才是中国文明虽然历经了五个千 年纪仍未被中断灭绝,仍然能在统一凝聚力和多元包容力这两者的巧妙平衡 中生生不息的神秘力量源头之所在。

第六篇 最早的中国——凌家滩遗址 出土玉牌饰所见十二星座图 与大汶口文化城址考

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中国汉语诸方言族群的历史是从西元前26一前25世纪建立的"五鸠氏"城邦和西元前25世纪建立的"少皞氏"王朝开始的(分析见前文)。这些中国最早的汉语土著城邦不仅留给了我们一个东西纵横千余里的"龙山文化城址群"废墟古迹,更留给了我们一种至今仍然生机勃勃的汉语文化。不过,同样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知,最初仅仅局处于黄河流域的汉语族群并非是中国大陆这块辽阔土地上的唯一土著民族,汉语族群所建立的"少皞氏王朝"或"龙山文化城址群"也并非是中国文明的唯一源头。事实上,中国文明的最早发源地并不在地处大陆腹地的黄河流域,而是在濒临浩瀚太平洋的东部沿海地区;中国文明的最早创造者也并非是汉语族群的直系祖先,而是与汉语族群同源异流的另一些古老姊妹族群。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文明的摇篮其实就是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等沿海类型考古文化的所在地。

一、中国文明的海洋摇篮

人类文明的摇篮究竟是在大海之滨还是大河谷地?确实,就普遍流行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似乎早有定论,无论是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无名氏"史前文明,还是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这些古老文明无不是以肥沃而适宜农耕的大河谷地为其生存基地的。

但是,对于需要"定点"细节证据而非"定面"粗率概括的专业研究来说,这

样的表述明显是太过草率的。因为,地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以上的这些大河谷地实际上无不是与海洋直接连通着的,而按"点"状而非"面"状分布的考古遗址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在这些所谓的"河谷文明"的庞大躯体内,唯有那些最靠近海岸线的地段才是它们迈向文明的确切起点站。例如,两河流域的政治中心虽然长期都在今伊拉克中部和北部地区(例如基什、阿卡德、巴比伦、尼尼微等),但其最早的几个文明城邦诸如埃利都(Eridu)、乌尔(Ur)、乌鲁克(Uruk)等等却都是分布于紧靠波斯湾古海岸线的南部苏美尔地区的;印度河流域的政治、文化、经济重心在有史可考的年代虽然一直都位于其上游地区,但其史前文明的最早策源地却是在更靠近印度洋海岸的下游地区(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等遗址);至于尼罗河流域的两大文明摇篮,即上埃及的基纳(Qena)省(附近有涅伽达[Naqada]遗址和"帝王谷")和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区(附近有萨卡拉[Saqqara]遗址和"大金字塔"),其中一个本就有古道东通红海,另一个则本就濒临地中海,这两地无疑都是整个尼罗河流域最靠近海洋的古代人口密集地。

当然,正如现代的历史教科书早就载明的,人类文明的摇篮其实远不止"大河谷地"这单一的类型。而在其他各种类型的古老文明中,我们能从中找到的唯一共同特征还是"海洋":例如,正如众所周知的,中美洲的"玛雅文明"、"阿兹特克帝国"以及南美洲的"印加帝国"就并不属于"大河谷地文明",而是属于所谓的"丛林文明"或"高原山地文明",但中美洲和南美洲两地最早建有大型"金字塔"等文明标志物的文化遗址,即奥尔梅克(Olmec)文化诸遗址、摩切(Moche)文化诸遗址,其地理位置其实也同样都是位于滨海地带的(即今墨西哥湾的滨海地带、秘鲁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地带)。此外,还有本就发源于爱琴海上的"米诺斯文明"这一典型的"海洋文明"就更不用说了,这当然是一个完全由海洋哺育的文明骄子。

因此,对比以上这些古老文明无一例外都是发源于沿海地区之史实,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全新的重要结论,那就是人类一切独立或半独立起源的古文明虽然在最终的发展方向上未必都会变成"典型的海洋文明",但其最早的起点原型却必然是同一种"广义的海洋文明"(可参见图 6-1)。而作为这些古文明的同路人,中国文明的诞生显然也不会例外,她同样离不开海洋的哺育。因为,和世界其他的沿海地区类似,上古中国的沿海地区天然就拥有非沿海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巨大资源优势,而这种被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归纳为"鱼盐之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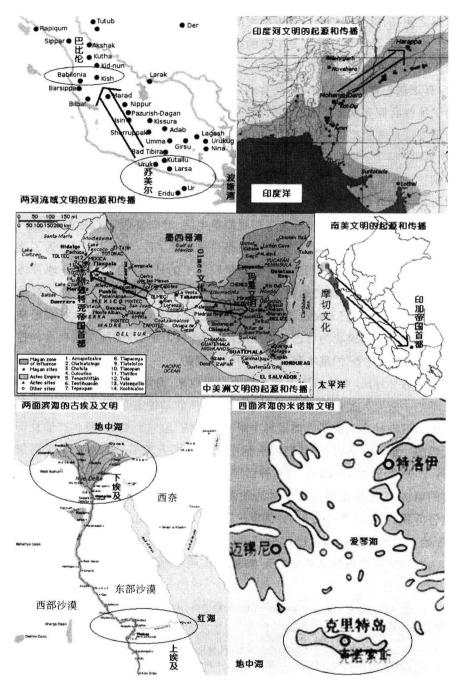


图 6-1 人类文明的海洋摇篮(由于海岸线的变迁,以上这些古文明遗址距离古海岸线都比现代更近)

舟楫之便"的资源优势恰恰是人类文明诞生的主要"催化剂"。

一方面, 盐作为一种人类生存的必需品, 其对于早期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是今人所无法想象的。事实上, 在5000多年前地广人稀、野生食物充沛的地球上, 真正缺乏食物的人群^①是没有的, 但缺盐缺碘的人群却比比皆是。因此, 对于那些既拥有众多不靠海的邻族, 又本身占据了沿海地带的人群来说, 海盐资源不仅是能直接供应他们自己的必需品, 也是能间接控制其他人群、其他地区、其他产业(主要是农畜业), 以及其他各种自然资源的有力武器, 而对于像中国这样本就拥有着广阔内陆纵深的地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 再加上鱼虾珠贝等多种海洋资源带来的财富刺激, 相比内陆的农牧社会, 沿海地带的某些定居社会无疑天然就拥有着诸多摆脱简单生活、趋向复杂分工的文明因素, 例如, 为了能更好地开发资源, 他们无疑是最早需要工匠、商人的社会; 为了能更好地保卫资源, 他们无疑是最早需要专职武士的社会; 为了能更好地管理资源, 他们无疑是最早需要知识分子(专职的巫师僧侣)的社会; 为了能更好地垄断资源和权力, 他们无疑也是最早需要国王和王朝的社会。而以城墙堡垒或金字塔等巨型建筑物为标志的原始城市(资源权力中心)无疑正是在这种控制和争夺"资源优势"的基本需要下才得以出现的。

而另一方面,由于自近万年前发明舟楫以来,海洋以及各种与海相通的河流湖泊一直是人类社会交流物资、信息和人员的最佳通道,那些人口密度最高的史前沿海社会更成了人类世界中眼界最开阔、思想最复杂、最具有信息资源优势的一群人。所以,在他们的头脑中就诞生了人类最早的专业学术思想体系:以天文历法为基础的"占星神话宇宙论"。而他们之所以会有探索浩瀚宇宙的想法,则完全是因为在面对浩瀚海洋时受到的震撼性启发:历史常识早就告诉我们,世界各地最早的"创世论"神话无一例外都是以"海洋(古埃及)"、"原始水阿普斯(Apsu,古巴比伦)"②或者"浩洋淫水(中国)"③等"海洋元素"作为其宇宙论模型的基本构造元素的;而按照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观点,我们的

① 据司马迁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吡窳偷生……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显然,这是关于 2000 多年前中国江南"未开发地区"的经济实录(因为没有开发商品经济,故曰"不待贾而足"、"无千金之家"),而由此上推到 5000 多年前,整个地球都属"未开发地区",其"地广人稀、吡窳偷生、无饥馑之患"的程度都是一样的。当然,这种"无饥馑"是群体意义而非个体意义的。参见《史记•货殖列传》。

② 参见肖巍:《宇宙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③ 参见《淮南子·览冥》。

确也很难想象,一个连大海都没有见过的人是会有发明宇宙论或天文坐标系的眼界胸怀和想象力的。而这场看似无形的思想变革无疑正是"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物,也是"文字时代"或曰"原史时代(proto-history)"①的前奏曲。因为,人类的外部信息载体之所以能实现从"记事符号"到"记言文字"的飞跃质变,人类社会之所以会被割裂成"识字的文化人"和"文盲"这两大阶层,其最初的推动力就是因为人类的思考和讨论范围已经被一分为二:人人能懂的日常生活问题和只有内行人能懂的专业学术问题,而最初的"文字"正是这些学术团体发明的专门用来记录专业问题的"术语文字",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大多数人"看了不懂",②而不是像原始的象形图画符号、石块计数数字那样其目的是让大多数人"一看就懂"。

当然,关于中国文明本是诞生于沿海地区这一点,我们除了拥有以上这些理论性的间接证据,同时还拥有着更多实质性的直接证据。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即考古方面的"龙山文化源自东方"证据和古文献记载方面的"九黎乱德"证据。

(1) 考古学发现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

虽然,正如我们前文所考证的,今黄河两岸的"中原文明"其本地连续信史的源头本是发端于龙山文化时代(约西元前 2600—前 2000 年)的十三个汉语城邦,但是,近一个世纪的全东亚范围之考古发现可以告诉我们,龙山文化十三个城址群的文明诸要素其实还有更古老的源头,那就是大汶口文化(其晚期约为西元前 3000—前 2600 年)、良渚文化(其早、中期约为西元前 3200—前 2600 年)和凌家滩文化(约西元前 3300 年)等年代更早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之考古文化。这些文化不仅是中国文明的最早源头,也是整个东亚文明的最早源头。

① 按,"原史时代(proto-history)"一词有各种定义,本文的定义是指"信史王朝"之前,虽然没有系统化的历史可考证,但却有零星的国名、族名、神名、王名等文字信息可考证的"非无名氏"古代文明社会。例如苏美尔文明的"早王朝时代 I、II 期"、古埃及文明的所谓"早王朝时代",以及下文即将论述的中国文明之"大汶口文化城邦时代"。至于印度河文明虽然有疑似"文字"的符号被发现,但其各种"破译"方案至今仍然是证据不足而可随意假设的,我们至今也只能以"无名氏"称之。

② 人类早期的古文字都是极少数人的专用物品,西方学者将其主要功能概括为"方便对别人的奴役",例如迈锡尼文明的克诺索斯和派洛斯宫殿所发现的线形文字 B 文档,据信分别仅有75 人和 40 人能掌握其读写。参见了,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年,第 249—251 页。

例如,自龙山文化时代起,中原文明的贵族等级秩序就一直是用爵(鬶)、 鼎等三足礼器的多寡优劣来表达的。而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最早发明使用三 足礼器的考古文化其实本是东部海岸的良渚文化及其前身的崧泽文化、马家 浜文化(图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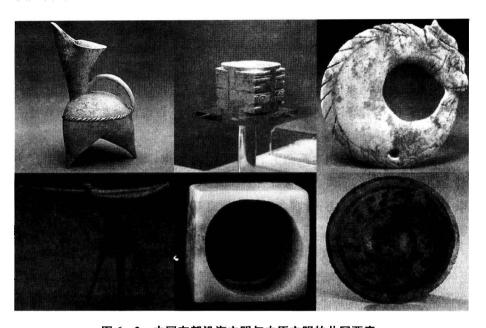


图 6-2 中国东部沿海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共同要素:
左:大汶口文化三足白陶鬶与二里头文化三足青铜爵

中: 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与龙山文化玉琮 右: 凌家滩文化玉龙与龙山文化龙纹陶盘

又例如,自龙山文化时代起,中原文明的宗教祭祀制度就一直是以圆璧、方琮等几何形玉器为其最高规格祭品的①。而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最早发明使用圆璧、方琮等玉礼器的考古文化也是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图 6-2)。

再又例如,自龙山文化时代起,中原文明的中央王朝标志徽号一直都是 "龙"和"兽面纹"。而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最早使用"龙"和"兽面纹"的考古文 化其实就是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图 6-2)。

最后又例如,中国文明的核心标志"十二地支天文学"、"十二地支神话"和

① 关于玉璧和玉琮的起源和用途,作者将另文论述。

"汉字体系",其最早的发明者其实也是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主人们(详说见后文)。

因此,综合以上这些最核心的证据,再加上考古学还发现丝织、针砭等中国人的最著名国粹和犁耕、打井等中国定居社会的最必要技术也都是由这些东部海岸的先民们所发明的,我们不难得出最终结论,4 600—5 300 年前,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等考古文化所占据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确实就是中国文明的诞生地。

(2) 古文献记载的九黎族

事实上,与考古学发现的零星旁证十分契合的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宝库中其实也早就有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更宏观正面之报道。例如:

《国语·楚语下》有云:"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為巫史……顓頊受之……使復舊常,無相侵瀆……"

《左传·昭公十七年》有云:"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也就是说,《国语》和《左传》的记载早就暗示我们,"少皞氏"王朝(西元前25—前24世纪)这个汉语民族最早的史实王朝其文化风俗和宗教信仰并非是其本族自创的,而是继承来源自一个名叫"九黎"的、年代更古老的庞大异族群体。而这个"九黎"异族发明的"鸟师而鸟名"等等风俗信仰直到"少皞氏"王朝的第四任国王颛顼统治的时代(前24世纪)仍然深深影响着东夷诸城邦乃至所有的汉语城邦,以至于这位著名的国王不得不进行了一场涉及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全面改革,用"民师而民事"代替"鸟师而鸟名"等等古老的"九黎"风俗制度。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这场改革只在政治制度方面取得了局部的成功,至于在文化、宗教方面则是完全失败的。事实上,正是在颛顼及其继任者伯般的统治下,"少皞氏"王朝最终在"孟翼氏"的内讧逼宫之战中早早就灭亡了。

那么,这个神秘而古老的"九黎"族群究竟是何方的部族呢?显然,综合古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至少有如下的几条线索可供寻访其踪迹:

其一,这个"九黎"族群一定是一个规模大于或不小于东夷五城邦族群的庞大势力,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颛顼王为什么会为"九黎亂德"而感到恐惧,既不敢出兵去征服消灭对方,又要在国内搞改革抵制对方的"文化侵略";

其二,这个"九黎"族群一定是一个比"五鸠氏"和"少皞氏"更古老的族群, 并且至少到颛顼在位时代(前 24 世纪)仍然与汉语十三城邦并存于世;

其三,这个"九黎"族群一定是与东夷五城邦保持接壤关系的邻族。而东 夷五城邦的西邻是中原八城邦,北邻是渤海和华北平原荒地(当时是沼泽森林 区,是著名的考古真空地带),所以根据排除法,"九黎"族群一定是位于东夷五 城邦(古济水流域)的东南方向之邻族;

其四,根据古文献记载,中国早期的霸权中心其转移方向一直是从东往西的,依次为西元前 26 世纪的"五鸠氏"(今临淄)、西元前 25 世纪的"少皞氏"(今章丘)、西元前 24 世纪的"有扈氏"(今阳谷)和"有虞氏"(今襄汾),而考古学研究也告诉我们,中国黄河流域的古文化传播方向在二里头文化时代(前19—前 16 世纪)之前也一直是从东往西的,例如河南龙山文化就是在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所以,"九黎"族群作为东夷诸城邦的文化源头而不是被影响者,其地理方位也应该是从中国的最东部地区去寻找。

因此,综合看来,要完全满足以上这些条件,"九黎"族群的时空位置就只能是坐落于中国东部海岸地区、距今约 4 000—5 000 年前的晚期大汶口文化(不包括古济水流域)、山东龙山文化的尧王城类型和杨家圈类型(即沂水沂山以东)以及良渚文化的分布区。

(3) 中国文明的诞生地

当然,最后我们必须指出,一方面,由于考古文化类型的地理分界线与实际政区国族的分界线从来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考古学所谓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其所能对应的史载国族其实是包括了几个语言和风俗都颇不相同的对象,例如居于古济水流域讲汉语方言的"东夷族"、居于鲁东南地区讲非汉语的"九黎族"之北方分支(以上两者其考古遗存基本没有"生前凿齿"等习俗,即使有也不排除是收容的外族奴隶),以及有特殊"生前凿齿"风俗和"头颅变形"风俗的、比"九黎"更古老的汶泗流域土著"凿齿族"①等等;而另一方面,根据汉语古文献称其东南邻居为"九黎"而非"一黎"可知,"九黎"其实也并不是指某个单一的族群,他们在具体语言族别上也许有"九"族之多,在考古学上则可分别对应大汶口一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至于这几个滨海

①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12页。

民族的语言,虽然据文献记载它们应该都不属于汉语方言(因为九黎地区的历史被排除在了汉语十三城邦自述的本族历史系统之外),但从地缘关系和考古文化的亲缘关系来看,它们本应该是和古汉语关系最亲近的亲属语种,而与"南岛语系"、"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或百越语等远缘语言无关:因为《左传·哀公十二年》曾明确告诉我们"吴人藩卫侯之舍……卫侯归,效夷言",也就是说吴国故地之"夷言(九黎语之江南分支)"是一种操汉语者仅花几天时间接触就能够初步掌握的语言;而相比起来,《说苑》则明确告诉我们"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也就是说真正的百越口语如"越人歌"之类是操汉语者根本听不懂而需要翻译的,尽管鄂君子皙其实是个长期接触大量百越臣民且对其有热烈拥抱之情的楚国封君。因此,在语言学上,我们不妨假设,这些今天早已经消亡了的古老"九黎语"应该和其姊妹语种"汉语"一起被分类为一个独立的新语族——属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s)的"九黎一汉语族"(Jiuli-Han languages)。

而在理清了以上这些极易混淆的分类概念之后,那么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诞生地究竟在哪里就可以有一个更准确的定义了。从地理上说,这是一个南至钱塘江人海口、北至胶东半岛、南北纵横千余里的沿海类型古文明区,其整体规模与后来黄河流域的汉语十三城邦分布区大体相当(图 6-3);从语言族属上说,这里最早的居民则是一些相当于"远东的苏美尔人"的、早已消亡了的"九黎语"族群(但其语言和族源仍然是与华夏族十分接近的);从考古学上说,这里则是距今约 4 600—5 300 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古济水流域除外)、良渚文化和凌家滩文化之分布区,这里不仅发现有中国最早的中心城市,例如五莲丹土、固镇垓下、滕州西康留等几座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有围墙的城市)和余杭莫角山遗址等几座良渚文化的城市遗址(类似西方的没有城墙之城市),更发现有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系统和原始天文学之实物证据,例如"大汶口陶尊文字"、"良渚玉璧字符"、"凌家滩玉牌饰星图"等等。

显然,在距今 4 600—5 300 年前的"前龙山时代",相比仅仅发现了一座原始小城(面积约 3.1 万平方米的"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且缺乏文字系统和天文学系统,更缺乏各种专业分工体系和等级制度的黄河流域之汉语地区,濒临太平洋的中国东海岸地区早就已经是诸多文明古国的立国之地了。而进一步的历史地理学和古文字学的考证还可以告诉我们,这种中国最早的文明并不仅是一种躺在博物馆里的文明,更是一种可以和我们今天的历史紧密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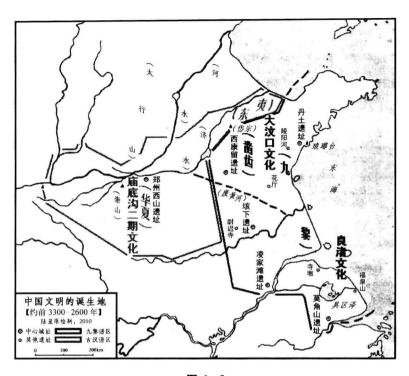


图 6-3

在一起的活生生的文明,也就是说,这种文明并不全是所谓的"史前文明",而是大部分有自称国号可考、有地方史可供追溯的"原史文明"。至少,就这种文明的两个最繁荣之群体,即五莲丹土大汶口文化城址群和良渚文化遗址群来说,她们的情况就是如此:事实上,她们不仅拥有"九黎"这个汉语邻居们赠与的泛泛绰号,更还拥有着其骄傲自称的真正国号被铭刻于文物、流芳于万世。

二、五莲丹土大汶口文化城址考

众所周知,今山东省日照市的附近地区在 3 000 多年前本是已姓莒国的领土。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上世纪发现的"五莲丹土大汶口文化城址"等日照附近的古代遗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莒国作为一个著名古国,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还可以追溯到 4 800 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代",远远早于任何一个中原古国。

(1) 丹土遗址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丹土遗址①位于五莲县城东南约 37.5 公里处,濒临黄海(古称东海),其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略呈椭圆形,东西长 400 余米,南北宽近 300 米,城内面积 9.5 万平方米;城壕宽约 10 米,口至底深约 2.5 米;城墙仅存墙基部分,墙体残宽约 10 米,残高约 1 米,墙为分层堆筑,夯层较平整,每层厚 0.10—0.20 米。而在该大汶口城址之上,还叠压有扩建的龙山文化早期城址(城内面积 11 万平方米)、龙山文化中期城址(城内面积 18 万平方米)。

此外,在该城址附近,还分布有同属大汶口时代的莒县陵阳河遗址(遗址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米,出土有大量西元前2800年的陶尊文字)等聚落遗址,以及属于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日照尧王城遗址、日照两城镇遗址(遗址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连云港藤花落城址(城内面积14万平方米)等城址群和聚落群。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至少在 4 800 年前就已经拥有了文字和城市这两大 文明标志物的古城址和聚落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这究竟是 一个文字符号无法释读、种族国别皆无从稽考的"无名氏"史前文明,还是一个 有国名和族属可考、有历史线索可寻的"原史时代"之古老文明呢?

显然,假如"丹土城址"是一座别的大陆的古城,那么我们只好被迫得出结论说,它确实是一个"史前文明"。因为,正如前述,该地区古代居民所使用的语言本就是一种早就消亡了的语言,所以该地区出土的古文字一般而言也是一种"死文字"或"疑似文字"(就像"线形文字 A"或所谓"哈拉帕[Harappan]文字"一样),"丹土城址"的历史价值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史前文明"(就像米诺斯文明或印度河文明那样)。

但是,幸运的是,"丹土城址"事实上并不在别的大陆,它恰恰就位于中国大陆的东海岸;"丹土城址"和"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尊文字也不是别的文字,它恰恰是汉字的前身,是一种全世界仅有的不依赖于某种特定口语的"通用文字"。因此,尽管这种古文字背后的口语语言早已经失传,但我们依然能轻易地释读这种文字,就像一个不懂汉语口语的日本人也照样能直接读懂许多中国汉字书写的地名、人名一样。

①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五莲丹土发现大汶口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01年1月17日。

当然,在假设这种"大汶口陶尊文字"就是华夏、九黎两族群所共同使用的 "原始汉字"的前提下,我们要找出"丹土城址"的主人无疑还是要求助于"干支 密码"这种破译汉语古地名的关键工具的。而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不 难发现,"丹土城址"其实和汉语族群的十三城邦一样,其国号、族名兼顶级地 名本来也是用"十二地支星神"的等价同义词来命名的。因为,无论从今天仍 被印在地图上的琅琊、沭河、浔河、崂山、浯河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皋虞、椑县、良城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该大汶口文化城邦的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中国"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五位 "皋(辰)"为其守护神的古老九黎语部族:

★ 琅琊:该地名始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史记》等,秦汉设有琅琊郡,今沿用为胶南市的镇名和山名、海湾名,而根据"干支密码","琅"通"良",是"朗(烺)"的本字,训明朗火光,又通"廊"训廊庙、高房;"邪(琊)"则通"斜(徐)"训高危倾斜,"琅琊"作为地名其本义就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大火=房=执斜=皋(辰)";

★ 浔河:该地名始见于《水经注》等,今沿用为莒县的河流名,而根据"干支密码","浔"通"燖"训火,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大火=皋(辰)";

★ 嶗山:该山名古本作"榮山(勞山)",始见于《史记》等,今沿用,而根据 "干支密码","榮"训屋宇、房屋,"榮"又通"熒"训熒火,故"嶗山"作为地名其本 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房=大火=皋(辰)";

★ 浯河:该河流得名于"郚邑",始见于《左传》,今沿用为河流名以及安丘县的镇名"郚山镇"、"临浯镇"等,而根据"干支密码"的提示以及出土金文常把"勾吴王"通假写作"攻敔王"的成例,我们可以推知,"浯(敔)"古通"吴(矢)"训偏矢倾斜(徐),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执徐=皋(辰)";

★ 皋虞:即今即墨市东部,该古县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而根据"干支密码","皋虞(吴)"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就是指"执徐=皋(辰)";

★ 榫县:即今莒县东南,该古地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而根据"干支密码","椑"通"庳"训房舍,又通"僻(俾)"或"颇(彼)"训僻斜、偏颇,作为地名 其本义也都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房=执徐=皋(辰)";

★ 沭河: 该河流名始见于《逸周书·职方解》,为莒地的"母亲河",而根据 "干支密码","沭"古音通"矢(执)",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执

徐=皋(辰)";

★ 良城:即今邳州市,该古地名始见于《左传》之"晉侯會吳子于良",而根据"干支密码","良"同"琅琊",作为地名其本义就是代指地支守护神"大火=房=执徐=皋(辰)"。

(2) 良夷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丹土城址"之主人或其直系后裔的明确范围,即该非汉语的东海岸土著方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皋(辰)"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国族,那么,我们要找的最后答案其实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非汉语"、"地处东海岸"、"国名干支属辰"以及"文化血统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这四大条件的古代国族在可靠的史料记载中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在殷末周初曾经与中原王朝有过贡赐贸易往来的东方古国"良夷":

《逸周书·王会解》有云:"周公旦主东方所之……稷慎(进贡)大廛;秽人(进贡)前兒……良夷(进贡)在子,在子鳖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则鸣曰'在子'……东越(进贡)海蛤……且瓯(进贡)文属……"

显然,根据这段来自 3 000 多年前的史料,我们很容易做出判断,那就是这个"良夷"国明显就是"琅琊"地区的最早主人,因为他们完全符合上述的四大条件:

其一,根据与"良夷"国并列的远方进贡者"肃慎"、"秽人"、"东越"、"且瓯"等等都是非汉语民族之事实可知,"良夷"确属是一个非汉语的远方异族。

其二,根据"良夷"国进贡的土特产"在子"本为一种所谓"鳖(鱼)身人首"的海洋动物①这一点可知,"良夷"确属是一个滨海的国度;而我们从周人唯独称其为"夷"可知,该东方古国既不在辽东半岛或朝鲜半岛("肃慎"、"秽人"等国之所在),也不在长江以南("东越"、"且瓯"等国之所在),而只能是在"东夷"诸族的邻接地区即今山东和江苏两省的沿海。(周人以"夷"特指山东省之"东夷"、淮河两岸之"淮夷"是众所周知的。)

其三,根据"干支密码","良夷"之"良"明显就是"琅琊"之"琅",两者都是 代指该国的守护神"皋(辰)",所以"良夷"其实就是"琅琊夷"。

① 《逸周书》所谓"鱼身人首"的"在子"明显应该是一种海洋哺乳动物,具体品种待考(或即所谓人鱼)。

其四,根据考古发现的日照附近地区在殷末周初之前其土著文化从未受到中原文化的明显影响,以及汉语古文献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性报道也是从殷末周初才突然出现的这一事实可知,"良夷"应该就是"丹土大汶口文化城址"之主人的本地直系继承者。

当然,与汉语地区的龙山城址不同,由于缺乏连续和详细的王朝谱系和历史事件记载,我们要最终由"琅琊"和"良夷"推论出"丹土城址"统治的地区在4800年以前的国名就是"良",除了要依靠以上这些历史地理学的间接证据,还需要找到出土文字的直接证据。而十分幸运的是,这样的直接证据我们在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中其实已经找到了,那就是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著名"陶尊文字"(丹土遗址也已有所发现)。而在这些"陶尊文字"中有一个被许多学者释读为"炅"或"昊"的关键字符①(图 6-4)恰可证明,在西元前29世纪统治着今天日照市所辖诸县区的"丹土城址"之主人确实就是一个以"良=皋(辰)"为其守护神兼国名的部族。因为,对比殷墟甲骨文中的同形汉字,并按照"干支密码"进行分析,这个所谓的"炅(昊)"字严格说来本是一个合体字,或者说是由两个字符组成的词,其"九黎语"的原始读音固然已无从知晓,但其字义却仍然可用古汉语的同义字词固定释读为"良(烺)王"②,"良=皋=大火=辰"。所以,证之以4800年前琅琊先民亲手写下的"良王"之国号竟然与3000年前之"良夷"国号以及今天的"琅琊"地名完全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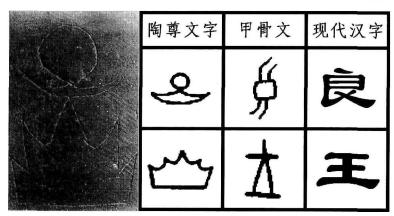


图 6-4 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良王"(约前 2800 年)

① 参见高广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32—140页。

② 关于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的系统化释读考证,详见本书第七篇。

同之事实,我们再也无法否认,"五莲丹土大汶口文化城址"的主人确实就是 "良夷"的直系祖先,这个在 4 800 多年前由"良王"所统治的国度确实就是"琅琊"这一神秘古地名的直接来源,这一历史事实至此可以完全定论。

(3) 先莒地方史

既然,历史地理学、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的三重证据都已经证明了"丹土 大汶口城址"确实就是中国"原史时代"的神秘古国"良国"的废墟,那么我们要 初步复原出古琅琊郡地区的"先莒"地方史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就目前可见 的文献资料来看,所谓"先莒"的地方史大致可以由如下几部分组成。

其一,约西元前 29一前 27 世纪,根据五莲丹土遗址和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发现的"良王"等陶尊文字以及城址、玉器、酒具礼器等遗迹可知,当时的日照市所辖诸县区已经是一个体制完备、文化繁荣的文明古国所在地了。该"九黎族"古国的核心信仰是"十二地支星神"中的第五位神祇"良(辰)=皋(辰)",故其国号也自称为"良"。该政权的实际权力中心则共有两个:其一是作为宗教祭祀中心的"莒县陵阳河遗址",该地以贵族墓地等祭祀场所为主;其二则是作为行政管理中心的"五莲丹土遗址",该地以城墙围壕等军事设施为主。显然,这是一个战略布局与古埃及王国或者西周王国都颇为类似的古代城邦:考古发现,古埃及的首都,无论是古王国的孟菲斯还是新王国的底比斯,其主要的布局都是分为东部的居住区和西部的墓葬区两大中心的;而西周王朝先以丰和镐为两京、后以宗周和成周为两大政治中心的战略布局也是人所共知的。此外,比照考古证据以及本地后期历史的合理前推可知,"良国"应该还是其西邻"凿齿国"(滕州西康留大汶口城址)的名义盟主。

其二,约西元前26—前24世纪,"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国语•楚语下》)。也就是说,大约在距今4300—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早期,立国已久的九黎族"良国"终于走向了其繁荣的顶峰,该国不仅在本地建立起了总面积都达数百万平方米之巨的新双都:日照两城镇遗址和日照尧王城遗址,而且还将其政治、文化的势力影响扩张到了整个山东半岛,使得统领着东夷方言五大城邦的"少皞氏"王朝也甘拜下风,在所谓"九黎亂德"的文化攻势面前完全处于守势。显然,无论从都城"王畿"的面积来看,还是从蛋壳陶、玉器等出土礼器的质量和数量来看,当时的九黎族"良国"(两城镇遗址)都是要略胜于汉语系东夷城邦"少皞氏"(城子崖遗址)的。

其三,约西元前24一前20世纪,"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有人曰

擊齒,羿殺之·····"(《山海经·大荒南经》);"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 (《山海经·大荒西经》)。也就是说,虽然没有直接的明文记载,但从文献记载 的东夷"少皞氏"王朝在其邻邦"孟翼氏(有扈氏)"的逼宫攻击下走向灭亡、处 干九黎族"良国"保护下的非汉语附庸国"凿齿氏(今曲阜附近地区)"也被"羿 (有扈氏)"顺带消灭等山东半岛的地缘政治大背景来看,龙山文化后期该地区 的古文明无疑讲入了一个整体衰弱和内讧纷争的时代,因为当时的东亚大陆 之政治经济中心已经整体西移到了"有虞氏"、"夏后氏"等所在的黄河中游地 区,山东半岛已经开始被边缘化了。而根据考古发现,原为山东半岛两大经济 文化中心之一的"良国"其自身也不能幸免此难。此时的"日照尧王城遗址"等 已经彻底衰败,而其南部却新崛起了一个可与日益衰败中的"日照两城镇遗 址"相对抗的"连云港藤花落城址","良国"的势力范围事实上已经一分为二。 显然,在海盐资源的垄断权被山西的池盐等取代之后,经济产业遭受了结构性 崩溃的九黎地区已经进入了内讧分裂和战乱衰败之中。自然,这样的一个自 身已经内讧分裂的九黎"良国"是再也保护不了其附属邻邦"凿齿氏"的,所以 只能眼睁睁看着它被东夷新霸主"有扈氏"率领"倍伐氏(有穷氏)"等杀伐攻 灭,其地就此变成了所谓的"少皞氏之虚",也即汉语新城邦"倍伐氏(有穷氏)" 的领地。

其四,约西元前 20—前 11 世纪,"海岱惟青州······莱夷作牧······"(《尚书·禹贡》);"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东就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周公旦主东方所之·······良夷(进贡)在子······"(《逸周书·王会解》)。

也就是说,随着黄河流域代替东部海岸地区成为中国大陆新的人口重心和经济中心,在夏、商两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被彻底边缘化了的九黎"良国"地区经历了一个真正的"黑暗千年"。显然,摆在他们面前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像其邻居"有穷氏(邳、徐)"那样选择向西部中原不断发动进攻以跳出牢笼,最不济也能掠夺一些资源和人口以补充国力;要么就彻底坐等下去,直到别人来灭亡自己。事实证明,这两条出路都有人选择。

就一分为二之后的南部"良国"遗民来说,他们选择了后者,他们在"藤花落遗址"修建起了内外双重城墙,妄图稳固自守等待时机。但考古证据显示, "藤花落遗址"在龙山文化末期曾遭受了"王油坊类型"即汉语族群的人侵而彻 底被废弃。显然,根据"干支密码",我们知道这个人侵者不是别人,他就是"有穷氏"。因为,历史地理学的证据显示,"藤花落遗址"附近的顶级古地名直到今天仍然叫"赣榆(卯)",而这明显是源自"有穷氏(卯)"的守护神"奢比=肝俞之尸"。因此,在这千年之内,"良国"的南半部遗民一直是"有穷氏"及其后裔国家邳、徐的侵略目标和称臣属国,直到最后被其彻底同化。

至于北部的"良国"遗民,他们则选择了前者,即他们最终是通过北上与其他"九黎"遗民合并而保持住了千年的独立和种族延续,终于变成了"九黎"的最后一支遗民"莱夷"。"莱夷"为什么就是"九黎"的后裔?因为"黎(釐)"、"莱(麓)"本就是通假字,"莱夷"就是"黎夷",喻义麳稷、巨人后稷、饕餮鬼,如前述都是汉语族群对外族的泛称。显然,"莱夷"在岳石文化时代、商周时代一直都是以进攻者的姿态出现的,所以商周统治者对该地的政策只是羁縻性地要求"莱夷作牧"而已(让其成为形式上纳贡而实际上独立的牧民官)。而我们通过股末周初"莱侯与太公争国"这段记载也不难看出,"莱夷"或"良夷"的所谓纳贡其实也是平等贸易性质的,北半分支的"良国"后裔对中原王朝从未真正屈服过。

其五,西元前11一前6世纪,"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逸周书·作雒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蒲姑……"(《史记·周本纪》);"琅邪郡……姑幕(县),都尉治,或曰薄姑……计斤(县),莒子始起此,後徙莒……"(《汉书·地理志》);"十有二月,齐侯灭莱……"(《春秋·襄公六年》)。

也就是说,在3000多年前,随着徐、商奄反抗周王朝东侵的战争,原本与商奄和姬周这交战双方都无关的九黎"良夷"故地却意外地遭受了池鱼之殃,因为正如前述,东夷血统之徐国和建立在徐国故地的殷商血统之奄国都是以其东邻"良夷"故地为拓土方向和战略后院的。因此,随着三叔和武庚的失败以及奄国故地被姬姓鲁国占领,奄国的殷商遗民显然只能向东退却到其后院地区,"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向更好欺负的"良夷"开刀,占领了后来称作"计斤"(今胶南市西南)和"姑幕"(今安丘市和诸城市一带)的地区,建立了全新的奄国。

那么, 奄国为什么要把这方原名"琅琊"的土地改称"计"和"姑"?因为根据"干支密码", "计"训计算, "姑"训估算, "计"、"姑"、"奄"三名都是代指殷商王朝的守护神"姑=奄贸(戌)"。总之, "计斤(圻)"也罢、"姑幕(坶)"

也罢,本都是这些殷商遗民们不忘故土的意志表达。但后人不察,以至于误 鲁东南之"姑幕"为鲁北之"薄姑",又误这个"周代殷商遗民之诸侯国"为"商 代之诸侯国"。

当然,最大的误解还在于,今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被周公"残奋,迁其君蒲 姑"逃难到"良夷"故地的"新奄国"其实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莒国"之同一国。 "奄国"为什么就是"莒国"的前身?这不仅因为他们的疆土相同都位于"良夷" 故地,更因为他们的血统相同都属殷商遗民:按照《左传•文公七年》的记载 "穆伯娶于莒,曰戴己"云云可知,莒国本姓"己",属于和"壬"姓薛国一样的"显 性十干"姓氏,都是周王朝赐给殷商王室后裔的"特种姓氏",也即《国语》所谓 的"黄帝氏(殷裔)十二姓"之一。至于为什么该国要改国号"奄"为"莒",这个 理由我们前文已经提及,那就是周人对待战败国的文化清洗政策之一就是要 把一切属于"商(戌)"之同义词的国号都改为"周(未)"之同义词,例如改"殷 墟"为"沫(秣)邦"、改"蒲姑"为"齐(哜)国"、改"奄"为"鲁(穞)国"、改"新蚕国" 为"莒国"等等。因此,战败后的"新奄国"假如不改称"莒国"以示臣服,他们就 有被周军赶尽杀绝的可能。当然,在这一切各取所需的改国名、改地名之文字 游戏背后,真正受到损害的则是既与殷商守护神无关又与姬周守护神无关的 "良夷"土著,他们在"琅琊"老巢的历史就此莫名其妙地被画上了句号,"先莒" 的地方史就此结束。至于避难到琅琊台更北面的胶东半岛之残留"莱夷",从 此当然也就更孤立无援,虽然他们几经奋斗,但最终还是在汉语列强的削弱和 围攻下于西元前 567 年被齐国彻底消灭。

三、良渚文化遗址群考

众所周知,今太湖周围地区,在 2 600 多年前本是姬姓吴国的领土。而证之以实地考古的结果,即上世纪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群"这一环太湖地区的庞大密集之古遗址群,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吴国作为一个著名古国,其所继承的本地文明或地方史的开端其实至少还可以追溯到 4 800—4 300 年前的"良渚文化时代(中晚期)",其和同时代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之文明古国一样,都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发祥地。

(1) 良渚文化遗址群附近地区的地名干支密码

据相关报道,良渚文化遗址群主要分布于今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规模

最大的莫角山遗址^①位于今杭州市西北 25 公里,该遗址的中心土墩平面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约 670 米,南北宽约 450 米,总面积约 30 万平方米,土层厚达 10.2 米。大土台上还有三个小的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势:南为乌龟山,北为小莫角山,东为大莫角山,整个人工堆建的巨大土墩台基形同一座所谓的"土筑金字塔"。而在这个大土台上,现已发现有大片的夯筑基址和大型柱洞遗迹,是当年大型建筑的遗迹。而紧邻莫角山遗址西北的就是反山遗址墓葬群这一所谓的"良渚王陵"。

此外,在"莫角山遗址"之外的太湖周边地区,还分布着"青浦福泉山遗址" (残留之人工土墩东西长 94 米,南北宽 84 米,高 7.5 米)、"武进寺墩遗址"(残留之人工土墩高约 20 米,直径约 100 米,遗址总面积 90 万平方米)等诸多建有所谓"土墩金字塔"的大型聚落遗址,而这些以"土墩金字塔"为其特色的中心聚落或曰"没有经典城墙的城市"则连同其附近的中小聚落一起构成了4 800—4 500 年前整个东亚大陆上聚落密度和人口密度都最高的古文明区。当然,在这个遗址群中,今人也同样发现了类似"大汶口陶尊文字"的所谓"良渚文字",以及各种体现了复杂逻辑思维能力的繁缛神秘之抽象图案。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远在西元前3千纪前期就已经拥有了原始文字、原始城市和超高密度人口的古聚落群而言,其当初的"主人"究竟是谁呢?这究竟是一支脱离于中国历史之外的"史前文明",还是一支真正属于中国历史之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呢?显然,鉴于前例已经证明,"地名干支密码"对"前龙山时代"的"九黎"地区同样适用,我们是不难就此直接找到答案的。事实上,无论是从今天仍被印在地图上的震泽、漕湖等该地区附近的现代地名来看,还是从各种古地理文献记载的具區泽、鷗陂、苞山、御儿、槜李城、句章等该地区附近的古地名来看,这个著名的良渚文化"古国"之主人无疑应该就是一个以中国"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一位"陬(子)"为其守护神的古老九黎语部族:

★ 震泽:该地名始见于《尚书·禹贡》,本指古之太湖,今沿用为吴江市之镇名。而根据"干支密码","震"为古"娠"字,训妊娠孕育、怀胎鞠养,"震泽"作为地名其本义当然就是代指地支守护神"鞠=浑沌=娵(子)";

★ 漕湖: 本名"巢湖"(今安徽"巢湖"乃是抄袭借用自江苏"巢湖"之名,

① 严文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详说见下文),该湖泊名始见于《越绝书》之"吴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人 濱,出巢湖……人大江,奏廣陵",今沿用为苏州市湖泊名,而根据"干支密 码","巢"训窟巢營室,"巢湖"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營室= 娵(子)";

- ★ 具區泽:即今太湖,该古地名始见于《逸周书·职方解》、《尔雅·释地》等,而根据"干支密码","具"通"煦(朐)"①,"區"通"嫗","具區"即古成语"煦嫗",训孕育鞠养,作为地名其本义就是代指地支守护神"鞠=陬(子)";
- ★ 鷗陂:在今苏州市附近,该古地名始见于《越绝书》之"(吴王)阖庐……射于鸥陂",而根据"干支密码","鷗"通"嫗"训煦嫗鞠育,"鷗陂"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鞠=陬(子)";
- ★ 苞山:即今太湖之洞庭西山,该古地名始见于《水经注》等,而根据"干支密码","苞(胞)"训胎胞浑沌衣,"苞山"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浑沌=娵(子)";
- ★ 御儿:即今桐乡市,该古地名始见于《国语》等,又作"语儿"、"囿"等,而根据"干支密码","语(御)"古音通"乳"训乳养、鞠育,"儿"训幼儿子息,"御儿"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鞠=娵(子)";
- ★ 槜李(里):即今嘉兴市,该古地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等,又作"就李"、"醉李"等,而根据"干支密码","槜(醉)"通"隹(鸠)"、"就"通"鸠","槜(就)李"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鸠=娵(子)";(按,"李"通"里","槜李"本为上古里邑之名,故《春秋》杜预注所谓"吴郡嘉兴县西南有槜李城,其地产佳李故名"云云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臆测附会之辞,此地绝对应该是先有"槜里"这个地名然后才会有"槜李"这个果树名的,这就像先有"福州"然后才会有"福橘"一样,只不过"李"、"里"二字恰好在古代本就可以通假罢了。)
- ★ 句章:即今慈溪市,该地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等,而根据"干支密码","句"通"煦"训煦嫗鞠养,"章"即青章,"句章"作为地名其本义也是代指地支守护神"鞠=青章=娵(子)"。

(2) 欧人考

既然,通过以上的历史地理学初步分析,我们已经锁定了寻找"良渚文化

① "朐"通"具"、"朐水"可假作"具水"之实例已见前文,参见《国语》。

遗址群"之主人或其直系后裔的明确范围,即该非汉语的东海岸土著方国一定是一个信仰地支守护神"娵(子)"并以该神之别名作为自己国号的古老国族,那么,我们要找的最后答案其实已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因为,同时符合"非汉语"、"地处东海岸"、"国名干支属子"以及"文化血统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这四大条件的古代国族在可靠的史料记载中只有唯一的一个,那就是在夏末殷初(前17世纪)和殷末周初(前11世纪)都曾经与中原王朝有过贡赐贸易往来的东方古国"欧人(沤)":

《商书·伊尹朝献》^①有云:"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鰂之酱,鲛 黻利剑为献……"

《逸周书·王会解》有云:"周公旦主东方所之……稷慎(进贡)大廛;秽人(进贡)前兒……良夷(进贡)在子……欧人(进贡)蝉蛇,蝉蛇顺,食之姜……"

显然,根据这两段来自西元前2千纪的史料,我们很容易做出判断,那就是这群所谓的"欧人"很明显就是"具区泽"地区的最早主人,因为他们完全符合上述的四大条件:

其一,根据与"欧人(沤)"之国并列的外邦进贡者"肃慎"、"秽人"、"越"、 "良夷"等等都是非汉语民族之事实可知,"欧人"确属是一个非汉语的远方 异族。

其二,根据"欧人"之国进贡的特产"蝉蛇(黄鳝)"至今仍为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周边之著名特产这一点可知,"欧人"确属是一个滨海的国度,但他们并不是什么后世闽、浙之地的"东瓯"、"西瓯"人,而是太湖之滨的土著后裔。

其三,根据"干支密码","欧人"之"欧(沤)"明显就是"具区"之"区",两者都是代指该国的守护神"娵(子)",所以"欧人"其实就是"具区人"。

其四,根据考古发现的太湖地区之"马桥文化"(约前 1900—前 1200 年)既有本土"良渚文化"的继承成分,又有外来"印纹陶文化"等的影响之事实可知,在夏桀、伊尹时代和商纣、周公时代来中原进贡的"欧人"应该就是"良渚文化"之主人的本地直系继承者。只不过,这时的"欧人"早就已经是受"越人"和"东夷"等邻居之支配或影响的文化附庸国了,所以中原王朝往往把他们和越人合称甚至混称为"越汉"。

① 此《商书》逸篇今保存于《逸周书·王会解》。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历史地理学的间接证据可以帮助我们顺利地推理出 "良渚文化"的主人其本名为"欧(沤)",我们还有更关键的出土文字之直接证 据,那就是与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齐名的良渚文化"玉器文字"。众所周知, 良渚文化"玉器文字"中最著名的就属那个被某些学者释读为"岛"的字符① (图 6-5),由于该字符本都是精刻于贵重的玉璧、玉琮等玉礼器之上,且已经 发现了多例而非孤证,所以历来学者们都将其视为"良渚古国"的王权象征用 字或族徽符号,甚至有人将之与同时代的古埃及鹰形王名字符联系了起来(两 者确实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而现在"干支密码"则可以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以 上这些学者们所作的定性判断无疑是正确的,这个良渚刻符确属"原始汉字" 或曰"九黎文字"无疑,只不过这个所谓的"岛"字其实并不宜直接读"岛":事 实上,这个字本来也是个合体字,或者说是由两个字符组成的词,其九黎语的 原始读音固然已无从知晓,但其字义却仍然可用古汉语的同义词固定释读为 "隹(鸠)王"或"鸥(区)王",其本义都是指该王国的守护神是以鸠鸟(鸥鸟)为 象征物的鸠聚嫗孕之神"娵(子)"②。所以,"良渚文化城址群"的主人确实就 是"欧人"的直系祖先,这个在 4 800-4 300 年前由"鸥王"所统治的国度确实 就是"具區泽"这一神秘古地名的直接来源,这一历史事实至此可以完全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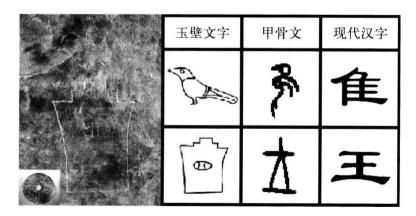


图 6-5 上海博物馆藏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刻画文字 "隹(鷗)王"(约前 2800—前 2300 年)

① 李学勤:《李学勤集——追溯,考据,古文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② 隹、鸠、鸥、区、嫌、陬、娶、聚诸字都是发音近似、字义相关的通假字。关于良渚文化"玉器文字"的系统化释读考证详见本文第七篇。

(3) 先吴地方史

既然,历史地理学、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的三重证据都已经证明了"良渚 文化城址群"就是中国"原史时代"的两大古国之一"鸥国"的废墟,那么我们要 初步复原出古具区泽地区的"先吴"地方史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就目前可见 的文献资料来看,所谓"先吴"的地方史大致可以由如下几部分组成。

其一,约西元前 29—前 27 世纪,根据良渚文化诸遗址所发现的"鸥王"等 玉器文字以及所谓的"土墩金字塔"等遗迹可以推知,当时的环太湖地区已经 是一个体制完备、等级森严、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所在地了。而我们根据该 "九黎族"古国所选择的守护神是"中国十二星神"的第一号神祇"娵(子)"之事 实还可推知,该"鸥国(子)"的立国称王之始年应该不会晚于同属九黎的"良国(辰)",即不会晚于西元前 2800 年左右,因为在"十二地支"中,"子"总是排在 "辰"前面的。① 不过,由于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地形平狭、水陆交通便利等自然地理特征所导致的地少人多之地缘格局,这个"欧人"古国在建国伊始就是一个与其北方邻居颇不相同的政权:她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邦",而是一个由几大城邦或聚落群联合组成的"原始王国"。

其二,约西元前27—前24世纪,"石楼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遁甲开山图》);"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国语•楚语下》)。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鱼盐舟楫"类型的南方古国(良渚文化各遗址多有船桨出土),人多地少而又崇尚武力的九黎"鸥国"早在其立国于"莫角山遗址"不久便开始了其长达数个世纪的向长江以北殖民扩张之进程。而其仗着"舟楫之便"沿海路北进的最辉煌成果就是建立了"新沂花厅遗址"(图6-3)这个考古学发现的著名"良渚殖民地"②。当然,这个紧邻古琅琊地区的殖民地无疑是要沿用其故乡"巢湖(漕湖)"之旧名而自称"有巢氏"的,此即所谓"昔有巢氏治琅琊石楼山之南"。而以此为基地,"鸥(鸠)人"们率领着九黎诸族继续向四周扩张,使得该地区附近从此留下了"鍾吾(章吾)"、"鍾離(章離)"、"州來(鸠來)"、"淮河(隹河)"等一系列带"章"或"鸠(隹)"字头的古地名(后来统治这些地区的汉语

① 按,关于良渚文化的精确测年和详细分期目前仍然没有定论,西元前 3300—前 2200 年的年代数据未免太过粗略,而天文学的"干支密码"也许能给我们提供这个关于良渚文化中晚期(鸥国)之始年的重要参考数据。可参见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 年第 3 期。

②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诸族都沿用了这些地名),并最终在一两百年后令强大的"少皞氏"王朝也感受到了"九黎乱德"的威胁。("鍾吾"在今宿迁市,"鍾離"在今凤阳县,"州來"在今凤台县,这个地区与"少皞氏"王朝的后裔"有穷氏"一族明显已经直接接壤,可见"九黎乱德"的始作俑者应该既包括"良国"也包括"鸥国"。)显然,这一伟大的百年跨海远征,与2000多年后姬姓吴国沿海路和邗沟北上扩张的百年争霸史是极其相似的,两者的行为都是由太湖流域特有的资源利益和地缘政治所决定的。

其三,约西元前 24—前 20 世纪,"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逸周书·史记解》);"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山海经·大荒南经》)。也就是说,正如前述,随着 4 300 年前东亚大陆的人口重心和经济中心开始整体西移到"有虞氏"、"夏后氏"等所在的黄河中游地区,九黎地区已经开始被边缘化了。而受边缘化影响最深的当然就是"有巢氏(鸥国)"这个地跨长江南北、最依赖对外经济的"水泽王国"。所以,此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中的他们不但完全无法援助"凿齿氏"等九黎诸族的唇齿之国,甚至连其自身也在"臣怒而生变"的内讧以及"羿殺凿齿"的外患之夹击中彻底解体亡国了:考古发现表明,东夷霸主"有扈氏(羿)"及其附属盟邦"倍伐氏(有穷氏)"等不仅侵略消灭了整个"凿齿国"和半个"良国"(藤花落遗址),而且还趁乱入侵到了长江以南的"鸥国"本土,其考古证据就是在太湖周边地区发现的明显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有扈氏、有穷氏)入侵影响的所谓"广富林文化"(该次中原文明的南下绝对堪称是"泰伯奔荆蛮"的最早版本)。当然,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之核心部分或曰"第一鸥国"此时早就解体了。

其四,约西元前 19—前 12 世纪,"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逸周书·殷祝解》);"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鲫之酱,鲛酦利剑为献……"(《商书·伊尹朝献》)。也就是说,在"第一鸥国"彻底崩溃之后,其遗民在外来势力的影响下早已经分裂成了几个不同的分支:其中留在江南本土的几支被称为"沤人"、"仇州"等等,他们是深受中原和百越影响的"马桥文化"之主人,在夏桀商汤时代经常向中原王朝进贡通商,其考古遗迹则有"江阴佘城城址"(约西元前 16—前 12 世纪)等古城废墟;其北上殖民的一支则在"有穷氏(邳国)"等古东夷势力的压迫下最后从"新沂花厅遗址"辗转退却到了今

安徽巢湖一带,与当地九黎土著一起建立了与其故土之"有巢氏"同名的新"巢国",也即夏王桀最后的流亡之地"南巢"。当然,"有巢氏(鸥人)"和夏王桀纷纷迁居此地并不仅是为了来避难,他们其实也是为了来"淘金":因为考古发现证明,此地在夏商之际不仅照旧有"鱼米舟楫"之利而且还新添了铜陵古铜矿这一青铜时代的宝藏,此地的文化面貌也因而迅速地"商化(中原化)"。此即《尚书·禹贡》所谓的"淮、海惟楊州,陽(楊越)、鳥(鷗人)攸居,貢金三品"。

其五,约西元前11一前6世纪,"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尚 书•序》);"周公旦主东方所之……欧人(贡)蝉蛇……"(《逸周书•王会解》); "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 王……"(《史记·吴太伯世家》);"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鍾離而 还……"(《左传·昭公二十四年》)。也就是说,随着姬周王朝东侵伐商这场中 国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天下)大战"之爆发,即使是地处汉语世界之外的"巢 国"和"欧人"也不能幸免: 就"有巢氏(鸥国)"后裔建立的殖民国家"巢国"来 说,该国在面对侵略的威胁时除了马上向伐商成功的周武王纳贡称臣外也别 无他法,从此,"巢国"就日益成为姬周、芈楚等强大王国的附庸,直到最后被姬 姓吴国彻底灭亡(西元前518年);而就江南本土的"欧人"来说,他们被姬姓吴 国灭亡的年代应该更早,《逸周书》所谓"欧人贡蝉蛇"虽然表明在周成王时代 "欧人"尚有余支,但至迟到吴王寿梦在位的年代(前 585—前 561 年),"欧人" 之国显然已经被"益大称王"的姬姓吴国以及会稽越国这两大强邻彻底瓜分并 吞了,因为自寿梦时代起一直被汉语文献连续详细记载的吴国大事编年中再 也没有提及过"欧人"这一族了。从此,"欧人"也罢,"巢国"也罢,"鍾離国"(嬴 姓贵族统治下的欧人)也罢,所有古老的"良渚文化"遗民都退出了中国历史的 舞台,"先吴"的地方史也就此结束。(当然,被吴国征服的"欧人"臣民其语言 和文化仍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最终在与古汉语的融合中影响到了"吴 语"这一汉语新方言的形成。)

四、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牌饰 所见十二星座图考

最早的中国历史究竟是从何时何地开始的?显然,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

现在已经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 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是诞生于沿海地带一样,中国历史中的最早篇章也是从太平洋海滨的琅琊台之"良国"和具区泽之"鸥国"开始书写的,而这两个同属"九黎语"族群的古国其建国年代都不晚于西元前 2800 年。也就是说,事实证明,中国文明迈入"原史时代"的时间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苏美尔文明①和古埃及文明②迈入"原史时代"的时间(约前 3000—前 2900 年)是大体上保持同步的,两者相差不超过一两百年。而这三个最古老的文明同时出现文字、国名和王衔的时代,当然也就是人类历史(原史)的真正开端。

不过,历史归历史(history),文明归文明(civilization)。事实上,假如我们把寻找"最早的中国"之范围从较严格的"中国历史"之范畴转换成较宽泛的"中国文明"之范畴,那么我们完全还可以找到比"良国"和"鸥国"更加古老的"文明源头",那就是堪称全中国最富丽堂皇的"史前文明"遗址: 距今约5 300—5 500 年的含山凌家滩遗址。当然,根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我们知道,这个"凌家滩文化"其实也是个沿海类型的考古文化,因为在 5 300 年前,此地距离古长江口和古海岸线都不是很远(参见图 6-3)。

(1) 含山凌家滩遗址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据相关报道,凌家滩遗址③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镇西南约 10 公里处,遗址总面积约 160 万平方米。该遗址内已发现有大型墓地、10 余万平方米的中心居住区、2 700 平方米的红陶块建筑、红陶块砌成的水井、玉器加工作坊、围壕等重要遗迹,已出土有精美贵重之玉器 1 200 多件。而根据碳 14 测年数据,该遗址的年代约为西元前 3500—前 3300 年。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规模可观、文化发达的古文化遗址而言,其 5 300 年前的居民群体究竟是否已经是一个所谓的"文明社会"了呢?显然,要回答这

① 古代苏美尔最早可识别确认的"楔形文字"出现于 Jemdet Nasr 时期(Uruk III 期),而关于 Jemdet Nasr 时期的开始年份,据其发掘者的最新研究,已经从过去估计的西元前 3200 年之早退缩到了西元前 3000—前 2900 年左右。参见 Roger Matthews, Secrets of the Dark Mound: Jemdet Nasr 1926-1928(Iraq 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Aris & Phillips Ltd, 2002。

② 古埃及最早可释读的象形文字出现于旧史所谓的"第一王朝",而关于"第一王朝"的开始年份,虽然在以前有从西元前 3400 年(high chronology)至西元前 2900 年(low chronology)不等的假说,但结合最新的 C-14 测年数据以及考古研究进展,西方学术界目前普遍公认的数据一般是西元前 3000 年左右。参见 K. A. Kitchen,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Egpty", World Archaeology, Volume 23, Issue 2, 1991, 100,

③ 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9 年第 11 期。

个问题,我们首先还需要弄清楚所谓"文明标准"的问题。

文明(civilization)这一术语虽然源自西方,但"文明"这一基本概念却是东西方都有的:相较于古代的拜占庭法律有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古代的中国商周王朝其实也有所谓"国人"与"野人"的区别;相较于现代的西方学者有所谓"文明"与"原始"的学术定义,现代的中国人其实也有所谓"城里人"与"乡下人"的世俗定义。总之,无论是作为日常生活的用语还是历史学的术语,"文明"一词的基础含义原本都是十分清晰的:所谓"文明(civilization)",就是指社会的权力中心,西方人称之为"civil(全权市民团体)"或"city",中国人称之为"国"或"城里";而所谓"前文明(pre-civilization)"或"原始",就是指一种尚未分化出"中心"与"边缘"的较简单社会。

因此,只要我们把握了"文明=权力中心"这一拥有世界性认同基础的普适概念,那么对于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所谓"文明标准"争论①,我们就会有一个最合理的判断标准了。例如,在当今中国最流行的、由西方早期的"挖掘者"们(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制定的所谓"文明标准"之四大标志物(城市、金属、文字、大型宗教建筑),就明显没有一种是真正可以用来准确标志"文明社会"的:

其一,就"城市"来说,它固然是"civilization"的同源词,但事实上,关于何种考古遗址才能算作"城市",这在全世界是并无统一的硬件标准的,它或者有城墙或者没有城墙,或者有王宫或者没有王宫,或者人多面积大或者人少面积小,不一而足,所以,西方学者所谓的"城市",实际上常常暗指的是某种西方标准的城市,而按此标准,那当然是无法真正辨识全世界所有的"文明"的,例如土耳其的 Catalhoyuk 遗址按照某种西方标准(居民超过5000)已被定义为世界最早的"城市",但事实上这座8000年前的"城市"并不是某个古老文明的权力中心而仅仅是一个居住人口密集(由特殊地理环境造成)的"母权制"平等社会;

其二,就"金属"来说,最新的考古证据表明,世界各地最早对金属冶炼感兴趣的一般都是半农牧半采猎部落而非复杂文明社会,因为"采矿"是"采拾者"的特长;而且,在规模化的锡青铜工业诞生之前,人类早期的金属工具(红铜、砷青铜等)其对石器工具根本就没有替代性优势可言,其对社会经济结构

①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的影响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所谓"铜器时代"并不必然代表"文明",而 所谓"石器时代"也并不必然代表"原始",例如,考古学发现,中国最早使用青 铜器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 4 700—5 000 年)就并没有迈人"文明时代"(他 们的居住地和墓葬都没有分化出"中心"与"边缘"),而古埃及人建造大金字塔 时仍然以石器工具为主也并不能说明他们的社会尚未迈人"文明时代";

其三,就"大型宗教建筑"来说,这更是一个既无法定性又无法定量的模糊概念,根本不适合拿来当"文明标志物",例如中国"红山文化"(约西元前4000一前3000年)就发现有所谓的"大型祭坛"和"女神庙",但这个被学者们一致归类为所谓"母系社会"的远古族群显然还是个"前文明"的简单社会;

其四,就"文字"来说,正如前文所述,有无"文字"技术本是区别"有史社会(包括原史社会)"与"史前社会"的天然标志,而并非是区别"文明社会"与"前文明社会"的标志。例如,"印加帝国"就没有文字,但其社会结构属于"文明"无疑。所以,这是一个混淆了"历史(history)"与"文明(civilization)"两大基础概念的张冠李戴之标准。

那么,既然城市、金属、文字、大型宗教建筑这"四大标准"都不足以担当 "文明标准",我们的"广义先商文明"研究究竟应该用什么标准去判断和寻找 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呢?显然,根据前述"文明=权力中心"的世界性通用定义 以及总结近百年来的考古成果,我们不难得出如下这三条更符合中国历史之 实际的全新"文明标准":

A. 宏观硬件标准:拥有"权力中心"的外围反差背景,例如《史记》所谓的 "都、邑、聚"三级结构卫星聚落群;

B. 微观硬件标准:拥有"权力中心"的物质标志,例如王墓、王宫、精美礼器群等等;

C. 软件标准: 拥有"权力中心"的思想标志,例如宇宙论神话或天文学神话。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这个所谓的"文明标准"问题,那么我们要确定"凌家滩遗址"这一古代聚落的社会性质就十分容易了。很显然,相比"郑州西山城址" (约前 5300—前 4800 年)等黄河流域的同时代遗址,"凌家滩遗址"这个史前社会无疑更有资格被称为"文明社会"。因为,首先,就遗址本身来说,"凌家滩遗址"作为一个非自给自足性"中心聚落"其与周边背景的地位反差是十分明显的,该遗址所独有的"陶器简陋而玉器发达"、"器物类型与周边迥异"等现象

都在说明,该超大型聚落是个依靠控制周边资源来生存而非生产力平衡自给的"权力中心",它那颇有别于"北阴阳营文化"母体背景的考古学特征①并非是地域族属不同所造成的,而是其"权力中心"的地位与周边"卫星地区"的地位完全不同所造成的(所以点状的"凌家滩遗址"至今未发现其面状的"同类文化",而"郑州西山城址"则被淹没在了周边文化之中);其次,就出土文物而言,"凌家滩遗址"发现的玉器陪葬品价值和礼制规格(如玉冠、玉人等)除了时代局限性所造成的工艺水平差距外其实都并不亚于陶寺遗址的大墓,其07M23、98M29、87M15、87M4、87M1等都绝对堪称是史前的"王者大墓",显示了此地必然曾经是座财富云集的"王者之都";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凌家滩遗址"还出土了中国天文学和占星神话的最早实物证据,即刻画有十二星座天文坐标图的玉牌饰(图 6 - 6),显示了此地必然曾经是个学术中心和宗教中心。因此,"凌家滩遗址"在硬件和软件诸方面都完全符合真正的"文明标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就目前所知,整个中国文明的最早起源地无疑就是5300年前的"凌家滩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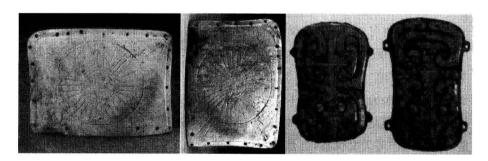


图 6-6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牌饰(约前 35—前 33 世纪)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约前 19—前 16 世纪)之结构对比

(2) 世界最早的十二星座天文坐标图

凌家滩文化玉牌饰(编号 87M4:30),1987 年出土于含山凌家滩遗址 87M4 大墓,发掘者称之为"玉刻图长方形片"。该玉牌饰长 11 厘米,宽 8.2 厘米,厚 0.2—0.4 厘米。玉呈牙黄色,表面抛光润亮,正面呈长方形,反面略内凹,长方形的两端略内弧,有三边琢磨出凹边,边宽约 0.4 厘米,凹约 0.2 厘

① 田名利:《凌家滩墓地玉器渊源探寻》,《东南文化》1995 年第 5 期。

米。两端短边各钻五个圆孔,上下两长边一边对钻九个圆孔,另一边在两端各对钻两个圆孔。当然,最令人感到惊奇的则是该玉牌饰的正面所刻画的神秘图案(图 6-6)。

这件奇特的玉器其当初的用途究竟为何?其上所刻的神秘图案其当初的含义又究竟为何?显然,假如这是件其他史前文明或已消亡文明所遗留的古老文物,那么我们是很难就此问题作出什么可靠的结论的,"外星文明"的寻找者们显然又会有用武之地了。但是,由于这是出土于从未中断过的中国文明范围之内的文物,所以在前文所举的一系列例证和分析面前,我们很容易就作出判断,这件刻画有十二个全同几何图形的玉器其用途和含义一定是和5000年中国文明的核心文化"十二星座神话"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件5300多年前的玉器其基本的用途本是一块标志"十二地支星神"信仰和王者身份的"玉牌饰",其基本的图画含义则是一幅"十二星座(十二月神)图"。

凌家滩遗址编号为 87M4:30 的玉器其当初的用途为什么是"玉牌饰"而 不是某些学者猜测的所谓"玉版"或"玉质日晷"?因为,根据《周礼•天官•小 宰》记载的"聽間里以版圖"之案例以及考古发现的"侯马盟书"玉版(前5世 纪)等出土实物可知,"版"的本义是指珪形(五边长条形)或长方形的平板玉 片、木片,其长度数量级为古尺一尺左右(20-30厘米),其图文以朱墨书写为 主,然而,凌家滩"玉片 87M4:30"其形制既非五边形或长方形(有圆角),也不 是平板(其截面为弓形),而且尺寸太小(其边长仅有几寸),四周还有密集穿 孔,图文也是契刻而非书写,所以根本就不符合"玉版"的定义。至于说该玉器 是"玉质日晷"等天文仪器,当然就更不可能了:简单的天文学常识可以告诉 我们,"日晷"的功能是基于"晷针"对其垂直平面的日照投影,而该"玉片"既无 安装"晷针"的结构而且其表面弯曲不平、"刻度"随意,根本不利于实际测量 (凌家滩遗址出土有表面平直且平行度精确的三角形玉片,可见该"玉牌饰"之 所以没有做成精确的平面和几何刻度并非是其工艺水平有限,而是其功能用 途根本不在于此)。总之,"河图洛书玉版"也罢、"玉质天文仪器"也罢,这些太 过"现代化"的功能要求对于这块 5 300 年前的凌家滩古玉而言都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因此,综合对比各项造型特征,我们唯一能找到的较合理解释就是,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编号 87M4:30 的神秘玉器其真正的用途应该是一块"玉牌饰",因为与该玉器的各种构造元素都完全相一致的文物我们已经早有发现,

那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毫无疑问,但凡看过这两者的外观对比图(图 6~6)的人都不难发现,它们绝对是既形似更神似的同一类东西:

其一,这两者的总体规格尺寸和外观造型都十分接近,凌家滩"玉牌饰"为 11×8.2 厘米的圆角长方造型,二里头"青铜牌饰"为 14.2×9.8 厘米的圆角长方造型。

其二,这两者的材质相近,凌家滩"玉牌饰"的材料为玉自不必说,二里头"青铜牌饰"的材料主体其实也是一种广义的"玉"即"绿松石",青铜则起框架和衬托作用。总之,玉也罢,绿松石也罢,吉金(青铜)也罢,都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最贵重、最华美的工艺品材料。

其三,这两者的关键结构相同,都有周边小孔暗示了其为连接附件而非单体物件。

其四,这两者出土时的位置相同,都是位于墓主的胸腹部。

其五,这两者所出的墓葬等级也相似,都是出于富贵者的大墓。

显然,以上这些证据都可一致证明,参照二里头"青铜牌饰"的考古学定名,凌家滩"玉牌饰"这一定名无疑是比"玉片"或"玉版"更为合理贴切的①。

而一旦我们能够证明,凌家滩87M4:30 玉器的真正功能是"玉牌饰"而非什么"玉版"或"玉质天文仪器",那么我们对该"玉牌饰"上所刻画的神秘图案就会有一个定性的认识了:很显然,正如二里头"青铜牌饰"上的龙首纹(兽面纹)是代表了"十二星神"信仰的王族徽记一样,凌家滩"玉牌饰"上的十二个树叶状标志物也是代表了"十二星神"文化的神圣徽记。只不过,前者是用代表单一星神"炎帝=皋(辰)"的"龙"来作徽记,而后者则是用代表所有十二位星神的"十二星座图"来作徽记的。当然,为了最终能证明凌家滩玉牌饰上的奇特图案并不是当代某些学者所谓的"原始八卦图"②,而是一种世界上最早的"十二星座天文坐标图",我们除了要对该玉牌饰的外在用途作出如上的宏观解释,还必须要对该玉牌饰的图案细节作出如下的微观解释。

首先,凌家滩玉牌饰上的十二个"树叶状标志物"造型究竟代表的是什么东西?显然,假如我们就此套用所谓的"原始八卦图"假说是不会得到任何确

① 关于凌家滩玉牌饰的具体用途之细节,作者将另文专述。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切结果的,因为这些发掘者所称的"圭形纹饰"明显与"八卦图"、"洛书河图"等等用阴爻阳爻或数字代号构成的图案没有直接可比性。但假如我们用"十二星座天文坐标图"假说来解释,则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很清楚了:这十二个"树叶状标志物"无疑是代表了中国神话中的"通天树"之枝叶,以及寄宿在这些枝叶上的十二组发光星体(日、月、星等)。因为,正如前述,中国神话中的十日(十金乌)、十二月(十二鸠)等星体都是以寄宿于通天树上的神鸟为其载体和象征物的。

其次,凌家滩玉牌饰上的十二个"树叶状标志物"为什么既要画成"全等图形",又要分成8+4之内外两圈?显然,假如我们就此直接套用"四象生八卦"的解释也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因为在后世的《周易》图解中"四象"与"八卦"并不等价,两者往往是用两种大小不同或图样不同的标志符号来区别表示的。但假如我们用"十二星座(十二月神)图"假说来解释,则此代表了"一年十二月"的图案就完全可以与中国天文学的传统对应起来:因为,如前所述,战国《楚帛书》中的十二月神其地位就既是平等的又是分为两组的,其中有四尊神祇因为兼职为"四季神"而被独立分组,即所谓的"秉司春"、"且司夏"、"玄司秋"、"蒤司冬"。可见,将一年的十二个月或者周天的十二星座分组为4+8结构乃是中国天文历法的固有传统。

最后,假如以凌家滩玉牌饰上的外圈某个"树叶状标志物"为圆周排序起算点,该图外圈的四个"树叶状标志物"为什么会位于第一、五、七、十一这几个并不完全对称的特殊位置?显然,对此问题"四象生八卦"理论更是彻底无力回答的,因为无论是"四象"还是"八卦"都是绝对对称的四元结构或八元结构,而凌家滩玉牌饰的图案却明显不同,其外圈四个标志物之间的夹角并未对称性地分为四个90°角(图 6-7)。但是,假如我们用"十二星座图"假说来解释,则此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因为根据北半球的天象特征和中国大陆的气候特征,在中国历法的十二个月份中,有四个月份无疑最为重要,即传统"夏历"的正月岁首、五月夏至、七月岁中、十一月冬至,这些月份在先商时代其可见的当令星座分别是"舆鬼河滩(申)、大火(辰)、河鼓织女(寅)、大梁(戌)",而这些月份或星座的循环排序无疑正是第一、五、七、十一位,这与凌家滩玉牌饰上的外圈四个"树叶状标志物"之排序是完全吻合的(图 6-7)。至于这四个星座所代表的四个月份在中国人的天文历法体系中究竟有何种特殊的重要意义以至于它们要被特别罗列出来,我们则可以指出,它们不仅是上古"物候历(夏历的

前身)"的岁首和岁中以及"天文历(周历)"的岁首和岁中,而且事实上它们还是至今都遗风依旧的中国四大古老民俗节日之所在,借用道家的术语可称之为"四腊"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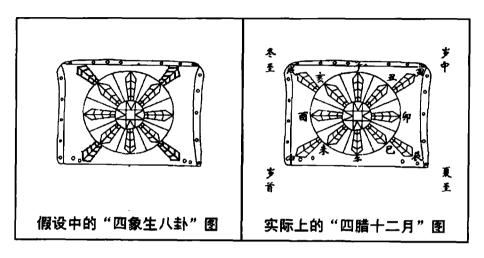


图 6-7 对凌家滩玉牌饰图案(约西元前 3500—前 3300 年)的两种解读方案:需要篡改原图才能解释得通的"原始八卦图"假说与不需要修改原图就能直接解读的"十二星座天文坐标图"假说

★ 正月春腊,即岁首节,也即后来中国最大的节庆"中国新年(春节)"之雏形,其共包括了除夕、元旦、立春、迎春等等一系列节日,而"干支密码"告诉我们,该节日的诸多最古老元素都是由该月的当令星座"舆鬼=涒滩(申)"衍生出来的,例如"燃放爆竹驱鬼"用以祭祀"舆鬼星"、"傩(滩)戏"用以祭祀"涒滩星"等等;

★ 五月夏腊,即夏至节,后来则发展为夏至、端午等一系列节日,统称"五月节",而"干支密码"告诉我们,该节日的诸多最古老元素都是由该月的当令星座"大火=神农=龙星(辰)"衍生出来的,例如"悬硃符(火符)"用以祭祀"大火星","涂雄黄酒(雄黄为赤色矿物兼药物)"、"斗百草插蒲艾"、"采杂药佩香囊"、"吃粽子(粽叶也为药草之一种)"用以祭祀"药王星神农","赛龙舟"用以

① 按,后世道家称"正月一日为天腊,五月五日名地腊,七月七日名道德腊,十月一日名民岁腊,十二月节日名侯王腊",显然,考虑到十一月冬至节"祭天"在后世为皇帝所垄断,民间不得与祀,所以反推上古,可以想见上述"五腊"之祀原当仅有"四腊"(正月、五月、七月、十一月),其中十月、十二月的二腊本是从十一月冬至大腊节拆分而来。参见《云笈七籤》。

祭祀"龙星"等等;

★ 七月秋腊,即岁中节,后来则发展为立秋、七夕等一系列节日,统称"七月节",而"干支密码"告诉我们,该节日的诸多最古老元素都是由该月的当令星座"河鼓=牛郎织女(寅)"衍生出来的,例如"喜蛛应巧"用以祭祀"天喜星河鼓","为牛庆生"、"摆放五生盆祀牵牛星"用以祭祀"牵牛星","九月授衣(周历九月即夏历七月)"①、"七夕晒衣(晒织女所造之天衣)"②、"拜织女"、"穿针乞巧(女红针织)"用以祭祀"织女星"等等;

★ 十一月冬腊,即冬至节,至今有"冬至大如年"之称,而"干支密码"告诉我们,该节日的诸多最古老元素都是由该月的当令星座"司中=姑=昴(戌)"衍生出来的,例如"舅姑赠鞋帽"用以祭祀"姑星",画"九九消寒图"用以祭祀"司中(司冬)"星、"以金银小锞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包金包银吃蛋饺(金元宝财富)"③用以祭祀"贸易财神星"等等。

总之,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定义"四时大祭"的历法共有四种:其一是纯粹"天文历"定义的"四仲"(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其实证即《尚书·尧典》和殷墟卜辞;其二是纯粹"物候历"定义的"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其实证即《楚帛书》;其三是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实用"民俗历"定义的"四节"(启三立春、至三夏至、分三秋分、闭三立冬),其实证即《左传》记载的"少皞氏"历法④;其四则是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实用"民俗历"定义的"四腊",其实证即此5300年前的凌家滩玉牌饰"四腊十二月图"。(按"臘"通"獵"训狩猎动武、猎猎奋武,即"岁星三赤奋若三丑"之同义词,本义是指一岁一祭、年节。该词汇本身

① "九月授衣"见西周金文及《诗经·豳风·七月》。

② "七夕晒衣"见《世说新语·任诞》。

③ 按,"包金银"等冬至习俗今日亦见于正月新年,盖周代曾以冬至月为正月岁首,故后世的新年年俗有许多是挪用自上古冬至习俗的,例如正月"接财神"之俗本来就是冬至习俗。关于上述中国节日习俗,可参见《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等。

② 按,《左传》记载的"启、至、分、闭"北方四节与南方"四腊"中的 3 个节日都是相同相近的,一月立春(启)、五月夏至(至)与春腊、夏腊全同,自不必说,十月立冬(闭)与十一月冬腊其含义也基本近似,只不过前者的含义是"迎接仲冬月(周历除夕月)"而后者的含义是"庆贺仲冬月(周历岁首月)"而已。所以,南北方时令民俗真正的差异只有一个,那就是八月中秋节(分一秋分)与七月秋腊(立秋)的区别。因为,仲秋月在上古的中国北方本是所谓的"纳火"之月,也即《诗经•豳风•七月》所谓的"十月改岁"之月(周历十月即夏历八月仲秋),是蛰居过冬作息制度的关键时令,必须大作准备并隆重祭祀以祈求神祇保佑。但气候温暖的中国南方显然没有穴居封户过冬的必要,所以他们本来不过"中秋节"而只过"孟秋腊"。因此,综合南方的"四腊"和北方的"出纳火",中国古代总共有六个最隆重的节日,而这六大节日在四五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正月新年(春腊)、三月清明(出火)、五月端午(夏腊)、七月七夕(秋腊)、八月中秋(纳火)、十一月冬至(冬腊)。

虽然晚出,但字义甚合中国上古原本要过四个年节的古意,故借用之。)

因此,综合以上的分析,再加上前文已经述及的天文学证据,即中国天文学之"十二支星座"按照"岁差"数据计算其整体的成型年代应可追溯到西元前2900年左右(当时的地支十二星座基本上是沿着天球赤道两两相隔30°等距排列的,与今天大不相同,参见图6-8),其原理相同的雏形版本之诞生年代更不排除可以早至西元前3500—前3000年,我们完全可以由此而确信,凌家滩玉牌饰87M4:30上所绘的神秘图案确实是一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星座天文坐标图"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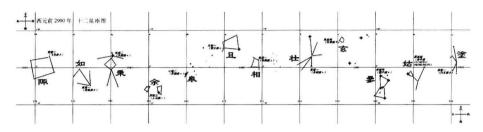


图 6-8 西元前 2900 年的中国十二星座分布示意

(3) 中国文明在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中的地位

中国历史的最早开端在哪里?

事实证明,这开端不是 3 300 年前的殷墟,而是 4 800 年前的"良国(琅琊国)"与"隹国(具区国)"。

中国文明的最早开端在哪里?

事实证明,这开端不是3700年前黄河流域的二里头"青铜文明",而是5300年前太平洋沿岸的凌家滩"天文学文明"。

显然,通过前述一系列基于"干支密码"的考证分析,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作为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广义先商文明"最终通过"干支密码"得以复原重建,无疑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整体格局和起源研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也就是说,仅仅凭着中国文明是独立起源于西元前 3300 年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西方某些学者

① 当然,5300年前的星座之具体造型与3800—4000年前肯定是不一样的,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目前还无从考证凌家滩文化时代的十二星座与王亥时代的十二星座有何细节差别。不过,关于48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时代之十二星座造型,我们却有着相当多的了解,它们和后世的十二星座在总体上是基本类似一脉相承的,仅是在局部造型上有所差异。参见本书第七篇。

所谓的"人类文明起源一元论"假说完全是一种坐井观天式的狭隘观点,人类文明起源的真实历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任何理论假说所能推测的极限。事实上,人类文明的最早独立发源地绝非仅有一个,而是至少有三个,正如表6-1所示,这三大文明分支其实是完全平行同步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广义先商文明"绝对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者之一,以"广义先商文明"为其研究起点的"广义中国学"理应和"亚述学"和"埃及学"一起并列为人类最主要的三门历史学学科。当然,这样的评价对古老而独特的中国文明而言也未必能算完整,因为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中国大地其实还有比"广义先商文明"更古老的中国"原文明(proto-civilization)"存在……

表 6-1 人类文明的三大独立发源地(旧大陆部分)

	中国文明 (商汤王之前)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汉谟拉比王之前)	古埃及文明(雅赫摩斯 [Ahmose]王之前)
史前文明(约 西元前 34— 前 30 世纪)	凌家滩文化、良渚早期文化等(约西元前 3300—前2900年)	乌鲁克 IV 层、III 层 文 化 (约 西 元 前 3300—前 2900 年)	涅伽达 III 期文化(约 西元前 3200—前 3000 年)
原史文明(约 西元前 30— 26世纪)	良王国和鸥王国(约 西 元 前 2800—前 2500年)	早王朝 I 期、II 期 (约西元前 2900— 前 2600年)	早王朝时期(约西元前 3000—前 2600 年)
早期信史文明(约西元前 26—前17世纪)	爽鸠氏城邦、少皞氏 王朝(约西元前 2500—前2300年)	基什第一王朝、乌鲁 克第一王朝、乌尔第 一王朝(约西元前 2600—前 2300年)	古王国(约西元前 2600前2150年)
	有虞氏王朝(约西元 前 2300—前 2100 年)	阿卡德王朝、古提 (Gutian)王朝(约西 元前 2300—前 2047 年)	第一中间期(约西元前 2150—前 2040 年)
	夏后氏王朝、有穷氏 王朝、先商城邦(约 西 元 前 2100—前 1650年)	乌尔第三王朝、伊新 (Isin)第一王朝、拉 尔萨(Larsa)王朝 (约西元前 2047— 前 1674年)	中王国、第二中间期 (约西元前 2040—前 1540年)

第七篇 人类唯一的思维型文字体系——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与 汉字干支密码起源考

按照《世本》和《说文解字》等古文献所载,中国汉字是在商先公"沮诵(曹圉)"和商先王"仓颉(王恆)"两人统治的时代(西元前 20—前 19 世纪)才开始被"造"出来的。而按照西方学者们的观点,中国文字的起源更是仅仅只能追溯到殷墟甲骨文本身(西元前 14—前 11 世纪)。然而,自 1960 年起,随着所谓"大汶口陶尊文字"(约西元前 29—前 28 世纪)在莒县陵阳河遗址等处不断地被发现①,随着所谓"良渚玉璧刻符"(约西元前 29—前 24 世纪)的不断被重新认识,我们对以上这些貌似合理的说法无疑已经可以作出更多的历史过程之补充:中国最早的文字体系真的仅仅是从"仓颉造字"或"盘庚迁殷"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吗?中国更早于此的历史记录(即前文所述始自近 4 500 年前少皞氏王朝时代的华夏历史)真的是靠"神农结绳记事"、"伏羲画八卦"或者"故老口耳相传"这样的匪夷所思之手段记录下来的吗?

毫无疑问,随着"干支二十二字密码"这种"汉字字根"信息的破译,我们对以上这些直接关系着中国先商历史之整体可靠性的问题其实已经有能力作出最后的判断。而以"干支密码"为线索,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最有据之答案就是,现代考古学所发现的"大汶口陶文"和"良渚玉文"确实是已知最早的可以释读的中国文字;肇始于4800年前的中国"原史"和肇始于4500年前的中国"信史"之连续记载确实是当时的中国先民直接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中国的"前

① 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

甲骨文时代"绝不是像南亚次大陆的所谓"吠陀时代"那样,是个只有口语传说 而没有文字凭据的可疑"有史时代"。

一、人类的四种独立起源文字之对比

人类的"文字体系(writing system)"究竟是如何发明的?文字的独立起源过程究竟需要具备哪些软件和硬件条件?显然,关于这个十分有趣而又重要的问题,古今中外历来都有无数的理论和争议足以让我们不知所从。但是,假如我们不是去纠缠于理论而是首先从出土文字的应用实例来分析,那么,最基本的事实其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就目前已知的所有四种独立起源文字而言,其最早的内容和用途明显都是与神话和政治有关:古埃及最早的文字实例是描述"Horus鹰神"(兼为王号)等神祇和"鲇鱼王"等王名的;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实例是神庙团体或城邦政府的账目和签名;奥尔梅克—玛雅文字的最早实例则是关于占星学神话和王名的;至于中国最早的文字,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其内容也是与星座神祇和王号有关(图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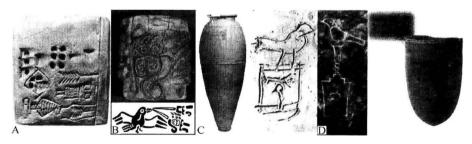


图 7-1 A. 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约前 3000—前 2900 年)、B. 奥尔梅克文化 最早的文字(约前 650 年)、C. 古埃及最早的文字(约前 3000—前 2900 年)、D. 中国最早的文字:"良渚玉璧文字"和"大汶口陶尊文字"(约前 2800 年)

因此,综合以上证据,我们不难作出初步的总结,那就是任何人类社会群体其独立发明文字体系的前提条件其实共有两个:其一是某种政治机构例如所谓"城邦(city-state)"或"王国"已经存在;其二则是某种历史性的神话思想已经存在。

所谓政治机构的存在,就是指专业文字工作者团体(例如神庙团体或财政机构)的存在,因为文字技术明显是一种专业化处理信息的团体需求而非日常的个人需求;所谓历史性神话思想的存在,就是指天文历法、世袭谱系等时间性观念已经在神祇体系和宇宙论中普遍存在,因为文字技术本来就是为了记

录天象变化、王权更替、账目收支、创世神话等历史性的动态演化事件而设,并非是为记录循环往复的生活琐事和静态沉淀的图腾观念而设。

既然,通过对比世界各大文明的类似案例,我们已经知道了文字起源的真正前提条件之所在,那么由此就不难推知,中国文字的起源也一定是与中国的神话体系和神授王权制度有关,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与中国所特有的赤道十二星座天文学及其占星神话衍生物有关。当然,要最终证明中国文字确实是起源于中国天文学和十二星座神话,我们还必须从"大汶口陶文"和"良渚玉文"等著名的考古实物证据分析起。

二、大汶口陶文和良渚玉文的释读

根据考古发现,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文字,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所谓陶尊文字,主要发现于莒县陵阳河、大朱家村、杭头、诸城前寨、五莲丹土、日照尧王城等遗址,据碳 14 测年数据,距今约 4 800 年(前 2780 年 \pm 145)。而与之大致同时代且风格十分相似的良渚文化之玉器刻画文字一般认为也属于这一体系。此外,还有同期的其他一些古文化遗址也有少量类似的文字被发现(例如北阴阳营遗址等)。而比照殷墟"甲骨文"命名之成例,这两者自然也可合称为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图 7-2)①。



图 7-2 中国最早的文字: 大汶口陶尊文字(约西元前 2800 年)和 良渚陶文、玉璧文字(约西元前 2800—前 2300 年)

① 按,陶文和玉文的区别完全是相对性的,事实上,大汶口文化晚期和山东龙山文化早期也有一些类似于良渚文化的玉文,良渚文化也有一些类似于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此外,北阴阳营文化等也发现有少量属于该系统的文字符号。参见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985年第2辑。

显然,正如许多学者^①所指出的,这些在近5000年前就被刻画干大口尊、 玉璧、玉琮等神圣"礼器"上的神秘符号,其实际功用不仅与后来商代青铜器上 的族徽文字颇相类似,而且与同时期古埃及陶、石器皿上所刻的王名刻字也惊 人的一致(这三者都是刻在器皿上的王名或族徽);其抽象构图不仅与后来商 代甲骨文和金文的造型有着极大的类似性,而且与同时期古埃及的荷露斯 (Horus)王衔象形字符之造型也有着惊人的巧合(尤其是这三者都有鸟形符号 作为主要构件,参见图 7-1);而反观另一方面,它们与距今约 8 000 年前的裴 李岗文化"贾湖甲骨文"、距今约6000-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陶文"等 所谓的"原始刻画符号(又称 Proto-writing 原文字)"却都有着很显见的本质区 别:前者精美神秘,而后者却简陋潦草;前者尽显专业规范性,而后者却尽显 日用随意性。因此,无论从正面对比还是反面对比来看,许多学者把大汶口一 良渚"陶玉文"视作是最早的中国文字无疑是很正确的判断,只不过,由于他们 并没有找到破译这些古文字的系统化方法,所以至今尚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 终极证明而已(毕竟,古文字是不能靠看图说话就能猜出来的,例如同样都是 鸟形字符,古埃及文字、良渚文字、奥尔梅克—玛雅文字对其的解释就大相径 庭)。然而,在诸多考古新发现以及"干支密码"的帮助下,我们现在无疑已经 可以做到这一点。

(1) 释"王"

众所周知,德国人戈罗特芬德(Grotefend)破译楔形文字的第一个关键性假设就是将出土铭文中反复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样直接释读为逻辑上最可能频繁使用的单词"王"②。毫无疑问,这种在破译技术中最常用的假设是完全符合现代密码学(cryptography)的理论和统计学的原理的。所以,这种以释读"王"字为突破口的技巧不仅帮助戈罗特芬德成功破译了楔形文字,而且也帮助商博良成功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因此,循着同样的原理,我们要想彻底破译大汶口一良渚文字,其最关键的步骤也在于首先要找到高频率出现的"王"字。而在目前已知的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字"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王"字确实是存在的,它就是作为单体字或合体字都有最高出现频率的多级台阶形字符,其非简化的单体标准字形即图 7-3 中编号为 DW 的字符。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

² C. W. Ceram, Gods, Graves & Scholars, Bantam Books, 1980.

L5 è	LH1企	D12€	DIIZ	D6 €	D5 🖹	D4 🚡	DH2±	DH5食	DW 🗦	大汶
) © (10	*	П	j	વ)	1	赤	蚁]	No.	0 -
			❖		9)		₽ Ċ	&		良渚
		ĺ			9			戋		文字
										,

图 7-3 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字"(约前 2800—前 2300 年)

图 7-3 中的 DW 为什么就是中国最早的"王"字? 因为,综合密码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分析,至少有如下四点过硬的证据促使我们必须作出这个结论。

其一,从统计数据方面来看,DW 在已发现的约 25 例大汶口文字中作为单体字共出现 5 例,其出现频率是所有单体字符中最高的,为 20%;再加上其作为合体字 DH5 和 DH2 的组成部分至少还出现了 10 例(DH5 下部旧释"五峰山形"者实际上是"台形"简化而成,DH5 下部未简化之一例可参见图 7-2),其总的出现频率更在 60%以上①。此外,在良渚玉器文字中,DW 还曾作为 LH1 类型合体字的组成部分(旧释亦以为"山字形")而共出现了近 10 例。因此,根据"王"字或其类似概念的字在人类早期的简单标名文字体系中普遍都会高频率地出现这一事实,我们初步可以认定,此字符 DW 的字义应该是与"王"、"伯"等字相近或等同。

其二,从古文字学方面来看,4800年前的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之DW其字形结构无疑与33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之"王"字十分类似,两者都表现为正中尖顶、左右对称的三级台阶结构,这是任何人都能直接看得出来的,只不过,殷墟甲骨文的"王"字其写法更加的简化一些罢了(图7-4)。因此,基于中国文明诸要素自西元前3千纪直至商代从未彻底被中断这一考古事实,我们同样可以推论,大汶口陶文字符DW应该就是甲骨文"王"字的等价原型字。

①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从原始到文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5—1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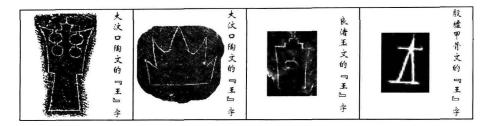


图 7-4 大汶口—良渚陶玉文(约前 2800—前 2300 年)和 殷城甲骨文(约前 1300 年)中的"王"字

其三,从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的出土情况来看,这些大口尊"礼器"上的文字除了都被精心刻画于显眼部位之外,有些还被涂抹以朱红颜料以示神圣和尊敬。然而奇怪的是,根据相关报道,只有所有的 5 例 DW 单体字符以及带有DW 成分的某些合文字符才被"涂朱"。因此,针对这种"涂朱"与"不涂朱"待遇迥然有别的独特现象,假如我们不把这"涂朱"的唯一对象 DW 视为至尊无上的"王"字,那我们将很难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其四,从综合的考古成果来看,通过对比西元前 4—前 3 千纪本地区出土的诸多"王"级文物,细心的观察者将不难发现,"陶玉文"之 DW 字符这个中国最早的"王"字其文字造型其实也是和中国最早的王权标志物紧密相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汉字"王"字的造型来源,其实并不是当今学术界最流行的所谓"不纳柲之斧钺形"①,而是"尖顶王冠之形"。因为,任何看过图 7-5 的人都会无法否认,4 500—4 800 年前的 DW 字符其与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的 4 500—5 300 年前之"尖顶镂孔玉冠饰"(良渚玉冠饰旧称玉梳背)之造型是完全一致的: DW 字符的外廓为多级"台型","玉冠饰"的外廓也为多级"台型";DW 字符的正中都有"尖顶","玉冠饰"的正中也都有"尖顶";DW 字符内部常带有圆孔(大汶口陶文)、长椭圆孔或复杂花纹(良渚玉文),"玉冠饰"的内部也都带有镂空的圆孔、长椭圆孔或其他复杂的镂空花纹。至于这种早已失传了的凌家滩一良渚式"尖顶王冠"之所以能必然代表"王",我们则可以从其出土时那与众不同的气势看出来:相比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大小各级遗址动辄一墓出土玉钺、石钺达数十件乃至上百件的现象,"尖顶王冠"却从来都是只出于顶级聚落之顶级大墓且一墓往往只出一件的;相比于玉石钺的批量制造和加工简单(只

① 栾丰实:《大汶口文化——从原始到文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要随形磨光并对钻一粗孔无须专业工匠制造),"尖顶王冠"的制造则明显是用材精选(杂质很少的美玉)、费工费料(从天然形状消磨成平板玉片需要浪费掉大量玉材)而超级昂贵,其雕琢非专业工匠不能为之(薄片玉器镂空在上古有很高的技术难度和报废率)。事实证明,这种不仅见于 5 000 多年前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而且见于 4 000 多年前的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非凡"尖顶王冠饰",其比凡俗实用的"钺"更能象征"王"之非凡地位这一点绝对是无可置疑的。



图 7-5 大汶口—良渚陶玉文"王"字的造型来源和原始含义:上: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镂孔尖顶玉冠饰和戴尖顶冠玉人(约前 3500—前 3300年);中: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镂孔尖顶玉冠饰(玉梳背)和玉琮上刻画的戴尖顶冠神人像(约前 2800—前 2500年);下:临朐西朱封遗址出土的王冠形玉簪首(约前 2300年)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最终可得的结论就是,不论从字形、字义还是字源来看,图 7-3 中的 DW 字符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王"字,其字形本是"尖顶冠形"而非"五峰山形";其字义本是"戴王冠的人"而非"操斧钺的人";其字源本是取材于凌家滩一良渚式的"王冠"而非"权杖"。至于其字音,由于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的使用者本来属于早已消失了的"九黎"族群而非汉语族群,我们尚无法准确得知。不过,比照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文明之王号语音往往被后起异族模仿继承之案例(例如希腊人入侵埃及也自称"法老",斯拉夫人、印度人仿效罗马也自称"凯撒"等等),以及"九黎"诸语是比任何已知语言更接近汉语的近亲语言之事实,我们不妨可初步推定,汉语"王"字的语音本来也是直接继承模仿自"九黎"诸语的,陶玉文 DW 的语音本来就是读 wang 或其近似发音。(事实上,考虑到 DW 其实也是"冕"的本字,古音同"晚=wan",其在音韵学上不过是一音之转,我们同样可以得出此结论。)

而在找到了最关键的"王(冕)"字之后,那么我们对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的系统性破解就可以在此可靠基础上顺利进行了。

(2) 释"良"与"良王"

在目前已发现的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中,图 7-3 所示的 DH5 即所谓的"日火山"字形无疑是最著名的一个。旧释或以之为"灵"、或以之为"昊"等等,不一而足①。然而,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陶玉文 DH5 本是一个合文字符,也就是说 DH5=D5+DW: 其中 DW 可释为"王"字已证; D5 则参照"干支密码"可释为"良(朗)"字,训明朗、烺火,其干支属于地支第五位"明堂=大火(辰)",其字形则明显与甲骨文之"良"字一脉相承,都是代指"大火(辰)"星座(图 7-6)。

陶玉文 D5=良(朗),比照甲骨文其字形可描述为上"日"下"火",故许多学者或将之直接释为"炅"、"旦"等字,并将之视为 DH5 的简写体。然而,对于这两种相隔了 1500 年的字体来说,这样的直接画等号诠释无疑是十分粗率而有可能存在偏差的。事实上,比照古文献中"隐性干支密码"的应用实例,并考虑到前文已经分析过的历史地理学证据,我们现在知道,相比"D5=炅"、"D5=良"无疑是更为系统合理的释读,因为这不仅是一个有当地古地名"琅

① 以下凡称"旧释"者,皆指唐兰、李学勤、王树明等诸家学者所释,详细释者与释读见解此不一一列出,可参见栾丰实:《大汶口文化——从原始到文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9—112页。

良渚	大汶口 陶文	殷墟甲骨文	现代汉字
) 0 (9	K,	良

图 7-6 陶文"良"字

(良)琊"为证的结果,而且也是一个基于"陶玉文"与"甲骨文"的系统整体相似性而非个别字体相似性而得出的结果。因为,正如图 7-6 所示,陶玉文 D5 作为简写体文字其真正的异写字体并不是 DH5 的"日火山"而是 L5 的"火日火"。而良渚陶文 L5 无疑与殷墟甲骨文的"良"字是十分类似的,都是"两火夹一星"的结构(圆圈形即"星"形),都是在描写 5 000 年前中国天文观测的首要对象"大火三星"(图 7-7)。

因此,综合来看,陶玉文 D5=L5 虽然也可按旧释勉强读作"炅"等字,但最能够在形、义、音各方面都尽量接近原貌的释读无疑还是"良":其字形既可与两颗辅星包夹一颗大明星的"大火三星"天象直接对照,也可与甲骨文的"良"字直接对照;其字义本为明朗(良)闪亮的火红色星光;其字音则与莒县、日照地区的古名"琅琊"相近。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分析,陶玉文的单体"良"字应该是某些贵族的私名,表示其取名时占卜的结果为地支第五位"辰"(此种单体的"良"字不仅见于陶文也见于玉文);而由此构成的著名合文字符"DH5=D5+DW"即所谓的"日火山"字符则可释读为"良王",此为 4 800 年前琅琊古国的国君尊号,其诸城前寨发现的一例 DH5 表面被"涂朱"也证明了这一点。

(3) 释"住王"

图 7-3 中与 DH5 同样著名的良渚玉文 LH1 可释读为合文"隹王",详说已见前文。虽然,作为单体的"隹"字目前似尚未发现,但图 7-3 所示的合文 LH1 本身已发现了近十例,而这已经足可向我们证明,"隹(鸥)王"与"具区古国"确实存在:该国的守护神就是 LH1 上半部的"隹(鸥)"形字符,即地支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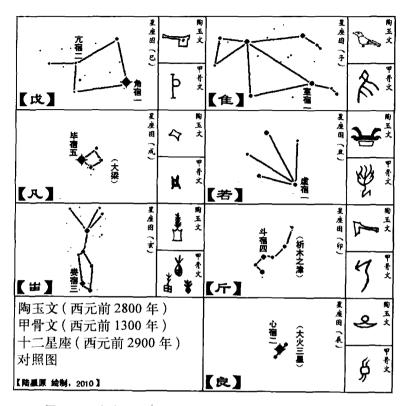


图 7-7 大汶口良渚陶玉文的天文学起源(西元前 2800 年)

一位"聚=鸠(子)",该字形则是直接取象于最早版本的"营室(子)"星座(在飞马座和仙女座内)。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变革,4800年前的"营室"星座其造型与后世颇有不同,乃是一头鸠鸟之形(图7-7)。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发现的各例"LH1=隹王"字样中,其下半部的"王"字形轮廓内表示王冠镂空结构的图形相当复杂且各不相同,这无疑显示了其比大汶口陶文更接近实物造型的特点(图 7-2)。而这一点与最早的"王冠"实物目前只发现于凌家滩、良渚等南方文化类型之事实也颇为契合,显然暗示了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晚期文化之间的某种时间次序关系,无疑为我们研究"隹(鸥)国"与"良国"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而另一方面,由于近十例"隹王"字样所写实的"王冠"图案并不相同,我们也可推知,良渚文化的"隹(鸥)王"绝不止一位,也许有五位、十位或更多,这也为我们研究"隹(鸥)国"的世系和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4) 释"王若"

图 7-3 所示的大汶口陶文 DH2,旧或释为"皇"字,不确。因为,比照前例可知,这也是一个双字的合文:其上部为略去镂孔结构的简写体"DW=王"字,表面涂朱;下部为左右对称的奋张羽翅形,另有"盆形"部分是朱绘的(未刻),整体结构参照"干支密码"可释为"若"字,其干支属于地支第二位"赤奮若(丑)",整体字形则明显是取象于上古"虚(丑)"星座,与甲骨文"若"字一脉相承(图 7-7)。

显然,根据 DH2 内含有"王"字并且带有"涂朱"这两大证据可推知,此 4800—4600年前的合体陶文"王若"本是一位王者的名号。只不过,这个"王若"与前述的"良王"、"隹王"不同,根据古汉语的语法分析可知,这是一个后置的私名而非前置的国号或族氏:后置的"若"字表示该国王诞生取名之时占卜的结果为地支第二位"丑"。也就是说,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有真名可考的中国君主之一。当然,考虑到陶文"王若"已经发现了两三例,我们尚不能确定这几例"王若"究竟是指同一位国王还是不止一位彼此重名的国王。

至于说 DH2 下半部的字形结构表现的是四羽奋张之形而非其他事物的证据,我们除了可以通过对比殷墟甲骨文的"若"字而得到("若=惹"古通"如=怒",训愤怒奮张,见前文),也可以通过对比战国《楚帛书》中描绘的"如(若)"神之四首奮羽造型而得到。显然,大汶口陶文"若"字的造型几千年间一直都未大变,是一个直接取象于上古"虚"星座五星造型的最古老汉字。

(5) 释"凡"

图 7-3 所示的大汶口陶文 D11,字形作容器侧面之形,由于该字与甲骨文"凡"字的字形十分接近,故旧释皆以为是"凡"字,可从。"凡"为"盘(般)"的本字,训盘算计量、颁(般)赐、贡赋、贸易、商贾,作为人名可专指地支第十一位"贾=姑(戌)"。至于该字的造型,则是直接取象于上古的"大梁"星座,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变革,4800年前的"大梁"星座其原始造型并非是千年后的"戌"字形杆秤而是侧视的觚盘之形(图 7-7)。

而根据陵阳河遗址发现的一例大口尊上同时刻有上"王"下"凡"两字之现象,并且"DW=王"字照例被"涂朱",我们还可进一步推知,这个"凡"字至少有一例是指某位"良国"君主的私名。当然,和"王若"一样,"王凡"也是目前所知最早有其真名可考的中国君王之一。

此外,由于陶尊文字"凡"已经发现了不止一例,并且除上例外其他案例并

未与"王"字同刻一器,所以也不排除某些"凡"字或为别的贵族之私名。

(6) 释"戊(阅)"

图 7-3 所示的大汶口陶文 D6,字形作有孔斧钺形,与另一个"涂朱"之"DW=王"字同刻于一个大口尊上。由于该字符"象形程度"极高,故根本不会被误读,旧释 D6 为"戉"字在总体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对比文献中"干支密码"的用字成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D6=戉"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象形字",它作为人名并非是代表"斧钺权杖",而是代表"門阈(戉)"和"國界":戉(或),为阈、域、國之本字,训门阈阻限、國域界阻,也即代表了地支第六位"且=南门(已)",其字形则是模仿自上古的"亢=南门(已)"星座(图 7-7),喻义上古的家族大门和城邦国门都是由执斧钺的武士把守的。

此外,根据"王"、"戉"两字被刻于同一个大口尊并且"王"字还被"涂朱"之事实,我们还可直接推知,这个私名为"戉"的陵阳河遗址之主人其身份也是一位"王",而且是本地"良国"之王。而"王戉"、"王凡"和"王若"这三人无疑都是中国最早的有真名可考的国王,他们都是西元前 2800 年以降"良国"的历代统治者。当然,由于时代太早、史料匮乏且地处汉语世界以外,对于这些国王之间的世系辈分关系,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其详。

(7) 释"斤"

图 7-3 所示的大汶口陶文 D4,字形作有柄工具之形,旧释为"斤"字,可从。"斤"通"析",作为人名可专指地支第四位"析木=余(卯)",其字形则是代表上古的"析木(卯)"星座。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变革,4 800 年前的"析木"星座其原始造型并非是千年后的"卯"字形而是斧斤之形,即今人所谓的南斗六星(图 7-7)。而由于未带"王"字也未"涂朱",这一位(或几位)私名为"斤"者也许并不是"良国"之王而仅是"良国"的普通贵族(据报道出土"斤"字之墓等级似乎也不高)。当然,"斤"不管是国王还是贵族,他都是中国最早有真名可考的人物之一。

(8) 释"吏(圭)"

图 7-3 所示的大汶口陶尊文字 D12,字形作土块上有植株之形,旧或释为"封"字,义虽相涉,但音、形、字源关系皆不确。事实上,根据"干支密码",该字应该释读作殷墟卜辞中的同形同音常用字"叀(惠)","叀(hui)"通"畦(音恚)"、"跬",训土田、跬步、路踵,为"圭"的本字,其造字来源明显是取象于上古"十二星座"中的"路踵=奎娄(亥)"星座,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历经变革,

4 800 年前的"奎娄"星座其原始造型并非是千年后的"亥"字形足爪而是五角 土块之形也即玉礼器"圭"的造型(图 7 - 7)。

而一旦我们通过分析 D12 字符知道了"奎娄(亥)"星座的原型,那么我们对许多千古之谜也就可以有第一手的诠释证据了:中国古人象征土地权的玉礼器"圭(珪)"为什么要做成五角形的长条?因为中国后土星神"奎娄"的星座造型本来就是五角形的长条(省略去植株部分);中国的大地神为什么本名叫"鲧(蹊)"?因为"蹊"古音通"畦(圭)"、"惠(叀)",系该星神的最初本名,其历史可以远远追溯到 4 800 年之前。至于周人常用的"封"字则仅仅是一个借用了"叀"偏旁的新造会意字(从叀从寸),其字形从"叀"喻义用手(寸)划分土地(圭通"刲"本有画刻划分之义),其字音则与"叀"无关而是借读自"豐"(豐盛盛大之义),其含义是大封国土的盛大仪式①。

因此,结合古文献和甲骨文的用字实例,我们最后可得的结论就是,大汶口陶文"D12=圭"其最初的读法就是"鲧(xi)",这是中国已知名"鲧"的诸多人物中年代最早的一个。不过,由于该大口尊上未带"王"字也未"涂朱",这位"鲧一世"也许并不是一位良国国王而仅是一位贵族,他当然也是中国最早有真名可考的人物之一。

(9) 中国最早的文字体系

4800多年前的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究竟是否属于成型的文字体系?显然,通过以上的分析释读,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固然,和西元前3000一前2900年的古埃及早期"象形文字"、苏美尔早期"(还未作楔形的)楔形文字"一样,约西元前2800年的早期中国文字并不能够表达完整的语句(前两者也不能),但却明显已经能够表达完整的词汇了,其表达的概念清晰性和完整可释读性是绝不逊色于同时期内的世界任何文字体系的。

事实上,与"半坡陶文"等其他古文化出土的所谓"陶文"完全不同,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目前已发现的所有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不仅是完全可以准确释读的,而且也是言简意赅、井然有序、信息丰富的:其中既包括了顶级地名兼国族名"良王"、"隹王"等,又包括了国王世系名单"王戊"、"王凡"、"王

① 按,甲骨文"叀(圭)"字之不同异写,旧释往往拆为"叀"(卜辞假借作语助词)、"邦"、"封"三字。可参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

若"等,还包括了一系列贵族的私名"良"、"凡"、"斤"、"叀"等等①,而这一切竞然又可以和历史地理学的地名孑遗信息以及"干支密码"的天文神话孑遗信息绝无矛盾地完全对应起来,这绝对不是什么"原始刻画符号"所能做到的。

拥有着 4 800 多年悠久历史的汉字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显然,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用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正如殷墟甲骨文的干支二十二字是直接起源自中国天文学知识一样,4 800 年前最早的中国文字其核心部分也是直接起源自中国天文学暨中国占星神话的启示的。正如图 7-7 所示,目今所见之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不仅全数可以在殷墟"甲骨文"中找到其音、形、义的"三位一体"继承者,而且其符合"干支取名制度"的诸字字形也全数可以与 4 800 年前的"赤道十二星座"排列相印证。

因此,基于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这一承载了丰富历史信息的古老证据, 我们最终得以证明,中国最早的文字体系确实是诞生于 4 800 多年之前,确实 是直接源自 4 800 年前的抽象天文学而非任何具象实物。虽然,从理论上说, 这种早期文字体系似乎应该叫做"九黎文字",但考虑到"汉字"这一独特的东 方文字体系本来就是一种超越语种的文字(例如后来日本、朝鲜、越南等不同 语言都吸收了大量基于"汉字"的词汇),"九黎文字"与"汉字"完全是一脉相承 的同一种文字而不是两种文字,我们仍然可以按照该种文字最大最久的用户 汉语民族之名义称其为"原始汉字"。而这种自 4 800 前诞生以来直到今天仍 然充满生命力的文字体系,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文字体系,也是人类最 值得骄傲的伟大发明之一。

三、陶寺朱书陶文的释读

如果说,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所出土的"陶玉文"是世界上最早的"汉字",那么,龙山文化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汉语汉字"。所谓"汉语汉字",就是指龙山文化汉语十三城邦所使用的、从东方九黎族那里学来的文字体系。当然,由于这两大族群地缘相近、语言类似,本就形同手足兄弟,所以这种学习借用其实是一种直接继承和发展的过程而非西方

① 在已发现的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中,仅据作者所知,其可释读者就远不止此十字,而且还有多字连书而堪称中国最早之"原始文献"者。限于篇幅,关于其他重要的陶玉文之释读,作者将另文专述。

人观念中的吸收引进"外来文字",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以下的实际分析中看出来。

陶寺朱书陶扁壶,1984年出土于襄汾陶寺城址内 I 区的灰坑 H3403,年代不晚于陶寺晚期(约西元前 2100—前 2000年)。该扁壶的正面和背面各有一个"朱书"字符,系用类似毛笔的工具蘸红色朱砂颜料书写而成(图 7-8)。①此外,据报道,2006年在陶寺遗址灰坑 IH64 也发现了属于陶寺晚期偏早的字迹不清之朱书陶片,初步证明了该"朱书陶文"并非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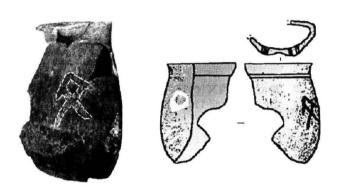


图 7-8 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扁壶 (约西元前 2100—前 2000 年)

关于陶寺"朱书陶文",自公布以来其释者众多,最流行的观点是其正面字符为"文"字,背面字符为"堯"字。然而,根据"干支密码",我们知道,这两种释文都是有待商榷的。

其一,就该扁壶的正面字符来说,其字形固然酷似殷墟甲骨文"文"字的某些字形,故释"文"字并无大错;但假如我们考虑到早期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造型本来还有其他繁复笔画,直接写作四笔之"文"乃甲骨文晚期的简写体,那么这种"酷似"之说就会失去其基础。而假如我们再考虑到"在丙曰爻兆"的"干支密码",那么我们将立刻明白,这个所谓的"文"字其更合理的释读应该是"爻",因为汉字"爻"从甲骨文时代直到现代其字形从未变过,都是只有交差的四笔,这与"朱书陶文"之正面字符完全相同(图7-9)。当然,无论是释"爻

① 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文"字朱书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 第1期,2001年11月。

(繇)"、"兆"还是释"文",该字的含义本是代指天干第三位"爻兆(丙)"这一点显然是完全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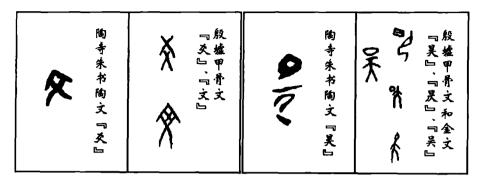


图 7-9 陶寺朱书陶文(约前 21—前 20 世纪)与殷墟甲骨文(约前 14—前 11 世纪)的对比

其二,就该扁壶的背面字符来说,旧释将该字与"堯"字相关联则完全就是 牵强比附的结果了,因为一方面甲骨文中究竟有无"蠢"字、何字为"蠢"字本身 就有争议,"堯"很可能是后出的汉字;而另一方面该"朱书陶文"的字形结构无 论与哪种"堯"字比较都相去甚远。事实上,该字符上部作单体"○(日)"字形 并与下部结构悬空隔开是很明显的,而"堯"字则至少要有两三个"◇"形再加 上与"地平线"结构紧密连接形成两三个古"土"字才能解释得通。所以,比照 后世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真正与该"朱书陶文"的背面字符最为相似的汉字 其实是上"日"下"天(大)"的古"昊"字: 也就是说,该"朱书陶文"的上半部应 释读为"○(日)"字偏旁;下半部应释读为"卩"字偏旁,"卩"与"大"皆为人形, "『"上加一横(指事符号)即古"天"字,与"大"字上加一横(指事符号)即为 "天"字之义相同(图 7-9)。至于该字的读音,根据"干支密码"告诉我们的"昊 (皋)=吴(虞)=矢(昃)=大火(辰)"可知,在汉字起源时代"昊"字共有三种可 能的读法:或可读为 hao(gao),或可读为 wu(yu),或可读为 ze(ce),也即后世 的昊、吴、昃三字之读音。当然,这个字无论是读昊、虞还是头,也无论是作为 地名、国名还是人名,其本义都是专指地支第五位"皋(辰)"即"大火"星座,这 一点显然也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初步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距今超过 4 000 年的陶寺"朱书陶文"确实是一种可以精确释读的早期汉字,其与 4 800 年前 的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以及 3 300 年前的殷墟甲骨文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同一种文字体系之产物。

至于,该"朱书"陶扁壶上的"昊爻"两字其含义和用途究竟是什么,其历史 意义究竟有多大,我们则可从以下几大方面去作出基本的分析和评价。

首先,就文字学方面的意义来说,4000多年前陶寺朱书陶文的"爻(丙)"字作为中国出土文字中提及"羲、芒、爻、圉"等"隐性十干汉字"的历史实证之第一例,其对古文献记载的"十干"汉字之发明过程无疑是最直接而完美的证明:正如"大挠(虞王尧)作甲子"等传说所反映的,汾水流域之"有虞氏"王朝确实是"隐性十日天干"的最早发明者和实践使用者。

其次,就历史地理学方面的意义来说,正如陶寺朱书陶文的"爻(丙)"字可以直接证明"十干"汉字的诞生地点的确是在汾水流域一样,陶寺朱书陶文的"昊(辰)"字也完全可以直接证明,陶寺龙山城址的主人其国号的确就叫"昊(虞)",因为,比照前述的大汶口陶文之成例可知,陶寺朱书陶文"昊爻"两字同书一器之正反面其作为题名必然是代表一个国族名和一个私名,既然"爻(丙)"字只能是私名(如前述,上古"十干"汉字例不用作地名或国名),那么"昊"字就必然是指 4 000 多年前陶寺本地的地名兼国名。至此,以第一时间兼第一手的自书国名出土文字为证据,"陶寺遗址=太昊之墟"这一历史事实已经可以 100% 地坐实。

最后,就历史学本身的意义来说,4000多年前的陶寺朱书陶扁壶之出土还可以有力地证明,中国古文献记载的"有虞氏"王朝(西元前24一前22世纪)之世系名单其最早的来源本就是一种书面的可靠文字材料而非什么"故老口耳相传"的口头传说材料。至于该陶扁壶上明显应为人名的"吴爻"两字究竟所指为谁,我们则可以通过对比传世古文献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一方面,根据"干支密码"的破译,史载"太昊氏(有虞氏)"王朝的世系名单中确实本有一位干支属"丙"的国王"皋繇(皋陶)",毫无疑问,假如我们要把陶扁壶之"吴爻(丙)"二字直接释读成"有虞氏"的第九任国王"皋繇(丙)"之名,这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因为"吴(皞)"可通"皋"、"爻"可通"繇"本是古文字学的常识。而另一方面,根据考古学的综合年代分析,该朱书陶扁壶被书写的年代(约西元前21世纪)既然正好大致稍晚于"皋繇"的在位年代(约西元前22世纪),那么我们将该"朱书陶文"的内容释读为"吴爻=皋陶"其在年代学背景上也是基本可以吻合的,因为,与大汶口陶尊文字或者良渚玉璧文字完全不同,陶寺朱书文

字的载体陶扁壶本就不属于贵重的"礼器",而且该陶扁壶在被写上"朱书"之前本身已经是报废的碎片,其断茬边缘也被涂朱一周,可见其实际的用途本非时王或新殁王自铭其珍宝美玉或陪葬礼器,而仅是一种"昊爻"的后代书写其"先祖"或"先王"之名讳以实施占卜巫蛊术的道具:正如殷人患病后常书先王或先祖先妣之名讳于甲骨以卜问其是否降祟于子孙一样,该陶片亦当是为卜问"昊爻"是否降祟子孙一类的占卜目的而为(所以其被使用过后和殷墟甲骨的命运一样都被弃埋于"灰坑")。总之,假如没有其他相反的证据,我们基本上可以初步认定,"昊爻=皋繇"是目前所知中国第一个可被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之双重证据所证实的国王,按照前文所复原的中国早期王朝之世系,他在位统治的年代要比甲骨文中最早的史实人物"高祖饔(帝俊)"还要早一两代或数十年。

四、汉字的载体: 从契刻到朱书

中国汉字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显然,以 4 800 年前的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4 000 年前的陶寺"朱书陶文"、3 300 年前的殷墟"甲骨文"这三种已被破译的出土文字证据为支点,其总体的轮廓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相比根本无法深刻理解汉字文化的西方学者之错误论断,即所谓中国文字是起源于 3 300 年前的甲骨文,我们现在知道,中国文字的起源其实至少还应该被提前 1 500 年。

然而,这样的证据体系虽然足以证明汉字起源的时间点,但却还不足以证明汉字起源后的连续发展过程。也就是说,相比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和殷墟"甲骨文"这一头一尾的成批量、系统性证据,在这两者之间的 1 000 多年过渡性时间内,中国文字的发展似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空白期":就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证据而言,在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早商二里岗文化连续相继的 1 000 多年中(约西元前 2500—前 1300 年),可以确认并释读的中国文字遗迹一直十分罕见,包括"陶寺朱书陶文"(约西元前 21—前 20 世纪)、"小双桥朱书陶文"(约西元前 15—前 14 世纪)等,其已发现的总数也不过数十字而已,而且还没有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那样有系统性。那么,这种十分反常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真的曾经中断过所造成的,还是由于该 1 000 多年内的中国文字遗迹尚未被考古学家们所发现而造

成的? 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从考古证据本身去分析。

首先,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的可靠记载,殷商王室的谱系一直是延续不断的,其带"显性干支"的王名世系一直可以追溯到西元前 19 世纪的"上甲"和"王亥",其带"隐性干支"的王名世系更一直可以追溯到西元前 22—前 21 世纪的"高祖燹"和"高祖河"。而很显然,这些王名都是与干支汉字紧密相连的,所以汉字的发展在该时期应该从没有中断过。而假如再考虑到文献记载的"少皞氏"和"太皞氏"两王朝之世系也可连续追溯,则即使是在更早的西元前 25—前 22 世纪,汉字的使用和发展也应该从没有中断过。总之,大量综合的证据表明,汉字发展曾遭千年中断的可能性并不比汉字连续发展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根据考古发现的襄汾陶寺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等该时期的一系列都城遗址之规模、结构来看,甲骨文时代之前的1000多年其实是一个中国文明高速成长的时代,当时中国的王城、王宫之规模不断扩大并跃居世界最前列,而其青铜工业、牛马车辆、远程贸易、征服战争等新的文明因素也都不断增加且快速升级,显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对文字这种大型复杂社会的专业管理工具之需求是绝对会有增无减的,百业皆兴而文字独衰之奇怪现象是绝对不可能真实存在的。

最后,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所有前甲骨文时代的中国文字,无论是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陶寺朱书陶文"还是"小双桥朱书陶文",其与殷墟"甲骨文"这一成熟的汉字体系在字音、字形、字义乃至语序、语法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其间绝无任何的中断突变迹象。事实上,"陶寺朱书陶文"和"小双桥朱书陶文"之类的遗迹已经证明,虞、夏、早商的中国出土文字与其前辈和后继者的区别只是在量的方面有所偏少而并非在质的方面彻底"绝迹"。

因此,通过对以上这些综合证据的分析,我们完全应该相信,这个所谓的 虞、夏、早商"文字缺失"现象仅仅是个表面的假象,真实历史中的文字发展必然进程与出土文字的数量偶然"缺失"这两者是绝对不宜混为一谈的。至于造成这种奇怪假象的真正幕后原因,其实在分析陶寺"朱书陶文"的时候我们已经接触到了,那就是自从华夏族十三城邦借用"九黎文字"记录本族历史之日起,中国的文字体系就经历了第一场革命,只不过,这场革命并非是语言文字本身的革命,而是书写工具的革命。中国汉字从其前身的书、契并用文字变成

了世界上第一种纯粹用"墨水"书写的文字。而正是由于早期颜料墨迹的容易模糊、容易抹去、难以保存等诸多原因,考古遗迹中的中国文字才终于出现了近千年的数量性"缺失"。

众所周知,人类的二维平面文字按其硬件载体之不同无非可以被分为两类(除去争议中的"三维文字"结绳记事):一类是对文字载体做"减法"的契划雕刻,例如中国的陶玉文、甲骨文、金文、国外的石雕铭文、泥版文献等等,这种"减法型"文字的主要品种无疑是最容易被永久保存的,所以考古出土的人类早期文字绝大多数都是属于此类型;另一类则是对文字载体做"加法"的涂印书写,例如中国的朱书陶文、朱书甲骨文、墨书简帛文献、纸墨印刷书籍、国外的纸草书、羊皮纸文献等等,这种"加法型"的墨水颜料文字虽然是现代最通用的文字形式,但其长期可保存性无疑是相对较差的,所以绝大多数的中国纸张文献今天所见者多为辗转传抄或翻印的版本而非原版(所以在近代有大量仅存抄本的先秦两汉古文献都曾被认为是"伪造"的,直到考古发现了一些简帛残文才为其中的某些古籍翻了"冤案")。尤其是,假如我们考虑到西周的木质笔牍文献至今一件也未发现,但我们通过文献的记载和出土金文的旁证已能确知其一定大量存在(因为西周人的主要书写工具很显然是"管"和"牒"、"册"而不是笨重不便的青铜铭文),我们就更能理解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某些载体脆弱的古文字类型确实有发生"集体性考古缺失"的可能。

因此,根据"陶寺朱书陶文"和"小双桥朱书陶文"等数量虽少却证据确凿的实例,我们完全可以推知,我们今天之所以无法见到更多虞、夏、早商时代之出土汉字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中国文字的硬件载体在 4 500 年前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即原本用刀具刻划的陶玉文字被用原始毛笔蘸朱砂等"墨水"书写的文字所彻底取代了。而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等大量被"涂朱"的各种实物遗迹告诉我们,早期中国的"朱书"或者"朱画"其书写绘画材料要么是根本不吸水且表面光滑的精致陶器、玉器、甲骨、象牙等材料,要么是极易腐朽、极易字迹糊化的原始纺织品、木器(注意不是周代才发明的竹简)等材料。而显而易见的是,前者明显类似周代以降的笏板或今天的粉笔黑板,属于可被轻易擦除并反复使用的临时性书写系统,等到这些材料出土被发现时,它们不是变成了一块早就被擦干净了的"黑板",就是变成了一块朱砂颜料早已经模糊成一团的不明"涂朱"礼器(图7-10);至于后者则和纸张一样本就不易长期保存,即使侥幸保存到了今天,其结构也早就模糊不清,只能让我们看见

模糊一团的"涂朱"纺织品残迹或"涂朱"朽木残迹,根本不可能看出什么"字迹"。因此,除了在某些极端罕见的情况下,我们是很难有机会看见类似"陶寺朱书陶文"和"小双桥朱书陶文"那样的早期"朱书"文字的①。



图 7-10 仰韶文化毛笔彩绘"鹳鱼石斧图"(约前 4000—前 3500 年);大汶口文化中期毛笔朱书陶文(约前 3500—前 3000 年);二里头文化"涂朱"玉礼器(约前 1800—前 1600 年);契刻涂朱甲骨文、毛笔朱书不契刻的甲骨文(约前 1300—前 1050 年)

至于黄河流域的汉语十三城邦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字"革命",我们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找到其充足的理由。

其一,考古资料的简单对比分析告诉我们,相比更偏爱"减法型"契刻图案和素面单色陶的大汶口一良渚文化之主人,汉语十三城邦的主要前身"仰韶文化"的主人本来就是一个以"加法型"彩绘图画和彩陶为其文化特色的族群,他

① 按,中国自古就有所谓"敬惜字纸"的习俗,此外还有不直呼、直书"名讳"的习俗,这与古埃及人或大汶口九黎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皿上是迥然不同的。而这些主动性大规模"消灭文字"的习俗也很有可能是造成前甲骨文时代"出土文字"贫乏、缺失的一大原因,待考。

们早在西元前 5—前 4 千纪就能用原始的毛笔绘制出像"鹳鱼石斧图"这样的 具有"文字画"性质的经典作品(图 7-10)。所以,作为这种深厚文化传统的拥 有者,他们无疑更可能会选择毛笔朱书而非刀具契刻。

其二,出土文字实物告诉我们,大汶口一良渚"陶玉文"这种中国汉字的鼻祖虽然主要属于"减法型"契刻文字,但更严格地说,这种文字其实也同时属于"加法型"朱书文字,因为正如前述,这些文字不仅在契刻后被大量"涂朱",而且还有只朱书而不契刻的(例如前述"王若"合文的下半部)。而假如我们考虑到年代更早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约西元前 3500—前 3000 年)还出现过疑似古文字的陶背壶"朱书"字符(图 7-10)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理解,中国文字的硬件革命早晚会到来,因为其"减法型"的外表下早就蕴含着"加法型"文字的种子。

其三,中国文字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减法型"契刻文字虽然是中国最早的出土文字,但从来都不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字类型,因为"朱书"文字不但天然比契刻文字更具"神圣性",而且也天然比契刻文字更具方便实用性,所以,在这双重优势之下,不仅虞、夏、早商时代朱书文字彻底压倒了契刻文字,而且即使到了甲骨文时代,殷墟"甲骨文"这种貌似属于主流的契刻文字其实仍然是"朱书"文字的附属品。殷墟出土的一些先朱书或墨书后契刻,甚至只有朱书或墨书而没有契刻过的甲骨文(图7-10)以及一批朱书墨书玉璋可向我们直接证明,毛笔朱书或墨书文字无疑仍然是商周时代的主要文字类型,契刻只不过是一道把本不易保存的朱墨书甲骨文永久凝固起来的工序罢了,就像后世文人用毛笔写好碑文让石匠去凿刻加工的工序一样。

总之,一切事实都告诉我们,中国人把毛笔和墨汁视为首选书写工具的历史绝不是从 2 200 年前的所谓"蒙恬笔"时代开始的,早在 4 500 多年前,汉语十三城邦的"毛笔革命"就已经为中国特有的"书法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场关键的"毛笔革命"正是造成中国早期出土文字的"贫乏"与传世文献的"过剩"这两者形成强烈反差的终极原因。

五、汉字的族属:从九黎族的 "十二支"到华夏族的"十干"

在汉语十三城邦高速崛起的年代,紧接着 4 500 前关于汉字的第一场"毛

笔革命"之后,4300年前的有虞氏王朝又发动了关于汉字的第二场"汉化革命",他们把原本仅含有九黎族"十二支"神话基因的原始汉字体系扩充为了也含有汉语民族"十干"神话基因的"二十二干支"综合基因文字体系。显然,正如前文已述及的,文献记载的"伏羲氏始作书契(隐性十干汉字)"、"大挠(唐尧)作甲子(隐性二十二干支)"等传说无疑正反映了这场历史性的革命成果,而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陶文"昊(辰)爻(丙)"两字无疑也最直接地证明了这场革命的成果。

那么,有虞氏王朝为什么要将原始汉字的基因从"昊"等"十二地支"扩充为"爻"等"二十二干支"呢?因为,与崇拜"赤道十二星座"之恒星群神的沿海九黎诸族不同,汾水流域的汉语族群本来就是最崇拜太阳神的。而为了使借用自东方邻居的"九黎文字"更方便于本族人的使用和认同,仿造九黎族的"十二星神"神话创造本土的"十日神"神话体系、仿造九黎血统的"十二支"旧文字创造本族血统的"十干"新文字,这无疑是有虞氏王朝的最佳选择和必然选择。从此,真正意义的"汉字"即"汉语汉字"就最终定型了。

那么,九黎族原创的"十二地支星神"之详情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能使其完整复原,汉语诸族原创的"十天干日神"之历史原貌又是如何的呢?显然,在"干支密码"的帮助下,这些神祇其实是并不难找到的:按照《山海经·大荒海内经》等甲骨文级别的古老文献之记载,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汉字的神话原型显然可复原如下。

- (1) "畢方=甲"与"勾芒=乙"
- 《山海经•海外南经》有云:"畢方鳥在其東……"
- 《淮南子•氾论训》有云:"木生畢方……"
- 《博雅》有云:"木神謂之畢方……"

显然,根据《尔雅·释天》之"在甲曰畢"可知,"畢方"这尊中国神话的木神本属于"十日神"之一,其神名的本义就是代指天干第一位"畢=甲"。此外,据《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的"羲和者……生十日"可知,木神"畢方"还有别名为"羲和(娥)",他同时也是所有"天干十日神"的总代表即太阳女神,其性别在后世的流传中由女变男,就变成了更著名的十日神之父"宓羲"①,因为"羲"通

① "伏羲(宓羲)"在后世的神话中之所以常与"女娲"一起组成男女配偶始祖神,就是因为他是"十日之父"即阳气之父,而"女娲"则是"十二月之母"即阴气之母。

"罅"训缝隙,作为神祇名与"畢方"一样都是代指天干第一位"畢=於缝(甲)"。至于今本《山海经》把太阳女神兼木神"羲娥"之名讹写成"羲和",则明显是后世传抄者比附《尧典》中的"羲、和"二氏连读而来。(事实上,"羲娥"在《楚辞》中又名"宓妃",后人不察,乃进一步讹传此"宓妃"为洛神。)

不过,"畢方"并非是十日神系统中唯一的"木神",还有一位"木神"无疑更为著名:

《山海经•海外东经》有云:"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云:"木正曰句芒······"

显然,根据本文考订之《尔雅·释天》"在乙曰端萌"可知,这第二尊木神"句芒"也属于"十日神"之一,但其神名的本义则是指天干第二位"端萌(芒)=乙"。此外,据《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韓流(乾荒)擢首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云云可知,木神"句芒"还有别名为"乾荒",因为"乾"训上出、萌发,"荒"即"芒"之形讹。

(2) "相繇=丙"与"禺镥=丁"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 土。其所歇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 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

显然,根据本文考订之《尔雅·释天》"在丙曰繇兆"可知,"相繇"这尊中国神话中的源澤水神也属于"十日神"之一,其神名的本义就是代指天干第三位"繇兆=丙"。

不过,与这尊被视作天河大水神"共工(河伯)"之副手的小水神"相繇"相比,还有一尊同属十日神系统的水神无疑更为著名: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

显然,根据《尔雅·释天》之"在丁曰强圉"可知,这第二尊水神"禺强"本来也属于"十日神"之一,但其神名的本义则是指天干第四位"强圉=丁"。此神也即后世中国神话中的"五方神"之一"北方水神"。

(3)"重=戊"与"黎=己"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云:"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印(抑)下地……"

《国语·楚语》有云:"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重司天以屬神……黎司 地以屬民……" 显然,根据本书考订之《尔雅·释天》"在戊曰重光、在己曰屠犁"可知,这两尊在中国神话中主司托举天地的兄弟之神"重"与"黎"也都属于"十日神"之一,其神名的本义则分别是代指天干第五位"重光=戊"和天干第六位"屠犁(黎)=己"。其中,哥哥"重"是托举天空之大力神,弟弟"黎"则是压抑平整大地的大力神。

(4) "祝融=庚"与"燭龍=辛"

《山海经·海内经》有云:"帝令祝融·····"

《墨子•非攻下》有云:"天命融(祝融)降火……"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云:"火正曰祝融……"

显然,根据《尔雅·释天》"在庚曰室"可知,"祝融"这尊中国最著名的火神本也属于"十日神"之一,其神名的本义是代指天干第七位"窒=庚",因为"融"通"墉"训窒塞墉防已如前述。(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此火神"祝融"与楚始祖"祝融—伯庸"本为两人:一为天神,一为以该天神名为号的国王。后世常将此二者混为一谈,曾导致了无数的历史性误会。)

不过,除了"祝融"这尊最著名的火神,十日神系统中其实还存在着另一尊同样也颇有名气的火神。

《山海经·海内经》有云:"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竭)。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楚辞•天问》有云:"燭龍何照……"

显然,根据本文考订之《尔雅·释天》"在辛曰昭阳"可知,这第二尊"是燭九陰"的火神"燭龍"也属于"十日神"之一,但其神名的本义则是指天干第八位"昭阳=辛",因为"燭"训燭照(昭),其神职也是主司"照"和"明"的。

(5)"夸父=壬"与"蚩尤=癸"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有人珥兩黄蛇,把兩黄蛇,名曰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

显然,根据本文考订之《尔雅·释天》"在壬曰逊艾"可知,"夸父"这尊中国著名的奔走如风之神本也属于"十日神"之一,其神名的本义是代指天干第九位"逊艾=终=壬",因为"夸"训夸大、过头、终极,"父"训父老、终老。而所谓的"欲追日景……未至死于此"云云之神话情节,也明显是利用该"天干日神"主司的日暮途穷、终老过时之含义敷衍而成。

至于"夸父"的具体神职为何,我们则可以从其神祇战友"蚩尤"的故事中 找到答案。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云:"蚩尤所棄其桎梏,是為楓木……"

《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

显然,根据这些最早最权威的记载,"蚩尤"这尊后世最著名的战神其最初的神话职司本是一尊风神,其自然象征物为"风木(枫木)",其神力为"纵大风雨"。因此,比照前述"十日神"两两成对神职相近的惯例可知,在神话中与"蚩尤"一起被杀的死党战友"夸父"也应该是一尊风神,所谓"夸父追日"的故事正是从风急善走之自然特征联想敷衍而来。因为,根据《尔雅·释天》之"在癸曰极"可知,"蚩尤"也属于"十日神"之一:"蚩"即后世所谓的"蚩尾"之"蚩",其本义为蠆尾末极、蝎尾蜂极,"尤"训尤极,其神名的本义就是指天干第十位"极 = 癸"。因此,后来汉字的"風"字构造要从"虫(蚩省)",其逻辑就是从风神"蚩尤"而得来的。(当然,我们同样必须指出,此风神"蚩尤"与夏王"蚩尤三履癸三桀"本为两人:一为天神,一为与该天神同名同干支的国王。后世的殷人常有意无意地将此二者混为一谈,最终导致了无数的历史性误会。)

(6)"汉语民族文字"的诞生

总之,基于中国神话和出土文字这双重证据,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畢、芒、繇、彊、重、犁、庸、燭、夸、蚩"这十个神名用字(表 7-1)的原型汉字,例如见于陶寺朱书陶文的"爻(繇)"字等,正是 4 300 年前有虞氏王朝所全新发明的"隐性十干"汉字;而继承改良自古老九黎文字的"隐性十二支"汉字,例如见于陶寺朱书陶文的"吴(皋)"字等,通过与这些"隐性十干"汉字的融合,无疑最终构成了汉字的"日月合璧"基因序列,也即汉字体系的二十二字"总字根",它们是后世所有"核心汉字"之音、形、义的直接或间接总源头。从此,汉字就从一种"九黎语、汉语通用性文字"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汉语文字"。

天 干	神名	神话职司
甲 ————————————————————————————————————	羲娥(畢方)	木神
乙	乾荒(勾芒)	木神
丙	相繇	水神

表 7-1 《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中的"十干日神"

(续表)

天干	神名	神话职司
T	禺疆	水神
戊	重	司天神(山神)
린	黎	司地神(土神)
. 庚	祝融	火神
辛	燭龙	火神
壬	夸父	风神
癸	蚩尤	风神

六、汉字的密码: 从隐性干支到 显性干支

按照《世本》和《说文解字》等的记载,中国汉字最早是由"沮诵"和"仓颉" 即商王曹圉和王恆(前 20一前 19 世纪)两人所造。虽然,就"造字"这一概念 的通俗含义来说,这样的描述明显是有违"九黎造字"这一史实的,但是,假如 我们能考虑到,"造字"对于汉字体系这一复杂历史产物而言其实还可以有"革 新改造旧文字"的含义,那么我们就会理解,"仓颉造字"这一广泛见诸史籍的 古老记载绝非是后人的凭空编造,而是另有深意的史实。也就是说,所谓"沮 诵(曹圉)造字",其本来就是指商王曹圉领导的殷商先民在西元前 20—前 19 世纪创造了全新的、按照实际天象描摹而成的"显性十二支汉字"(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其考古学证据则是殷墟甲骨文中的王名"王 亥",这是曹圉(沮诵)为他儿子所取的名字,也是商王采用"显性干支汉字"取 名的最早史实案例(因为正如前述,地支第十二位星座本名"圭"不名"亥");而 所谓"仓颉(王恆)造字",其本来是指商王王恆领导的殷商先民在西元前 19 世 纪创造了全新的"显性十干汉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考古 学证据则是殷墟甲骨文中的王名"上甲": 这是王恆(仓颉)为他儿子所取的名 字,也是商王采用"显性十干汉字"取名的最早史实案例。从此,殷商王室的男 女老少就开始了用"甲乙丙丁"取名的漫长历史: 上甲(微)、太乙(成汤)、武 丁、母辛(妇好)、太壬、妲己、武庚……总之,《世本》所谓"沮诵、苍颉作书"其本

义并非是说沮诵、苍颉二人最早发明了整个汉字体系,而是说这两位商先王曾 经领导殷商先民发动了一场汉字发展史上最重大的"文字革命",也即汉字发 展史上的第三场革命。

自西元前 29 世纪"原始汉字"诞生以来,在汉字的早期发展史上,其有据可查的重大变革共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爽鸠氏、少皞氏等汉语诸城邦发动的从硬物契刻到软笔朱书的"毛笔革命"(约前 26 世纪);第二次是有虞氏王朝发动的从"十二地支"到"二十二干支"的"汉化革命"(约前 24 世纪);而第三次就是商先王"沮诵"和"仓颉"发动的从"隐性干支"到"显性干支"的"密码革命"(约前 20—前 19 世纪)。

毫无疑问,与前两次换汤不换药的所谓"革命"相比,这第三次"革命"无疑更具实质性,因为,原始汉字体系原本无"秘密"可言,但自从"陬、若、鼓、析"和"畢、芒、繇、彊"等"隐性干支汉字"被"子、丑、寅、卯"和"甲、乙、丙、丁"等"显性干支汉字"替代之后,中国汉字就彻底被分解割裂成了"显性"的天文历法专用字和"隐性"的日常性用字两大部分,而大部分古老汉字在被剥离了天文和神话的原始含义后,其字音、字形、字义的来源都随着其主要用途的改变而日渐异化成了"秘密",从而最终造成了古汉字的造字创意被后人们所彻底遗忘。

不过,幸运的是,与此相应,真正能够把"显性"和"隐性"这貌似无关的两部分汉字联系起来的"汉字干支密码"也就此诞生了:作为文字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专业知识,类似于"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條,在丁曰圉"这样的"汉字字根口诀表"从此就被归纳编制出来,并且因为其有"翻译"上古文献之功能而被各种专业团体在小圈子内继承保留下来,直到在春秋战国时代被最终写进了《尔雅·释天》等著作之中。当然,这份历史意义绝不亚于"罗塞塔碑"或"贝希斯顿铭文(Behistun Insciption)"的"汉字密码字典"最终也成为我们今人能够复原中国广义先商史的决定性工具。

那么,3800多年前的"沮诵、苍颉造字"运动究竟使多少古老汉字的造字本义被深深埋藏?"干支密码"又究竟能为我们破解多少"千古之谜"?下面,就让我们以"东南西北"、"春夏秋冬"等一些貌似比"二十二干支"更加"原始"、更像"字根"的日常用字为例,来看看它们事实上是如何不配当"字根"而只配充当"二十二干支"之派生字的。

(1) 释"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四字,自《说文》以来释者甚多,然大意不外乎是说这四个汉

字都是直接取象于自然现象的独立概念。可是,"干支密码"现在却告诉我们,这四个貌似属于"字根级"的汉字其实也并非是最基础的概念,它们的造字创意其实也都是"十二地支星座"中代表正北、正南、正东、正西四个方位的星座即子、午、卯、酉这四大星座的派生概念:

★ 东:《说文》引旧说以为"东"字像"日在木中"之形,喻义东方的扶桑神木为日出之所。而根据"干支密码"对殷墟甲骨文"东"字的分析,这种旧说虽然古风犹存但却并不确切,因为殷墟甲骨文"东"字根本没有"日"字偏旁的影子,其真正的字形本应为"木有树瘤"即树木被砍割受伤后结疤肿大之形(见图7-11),借以喻义著名的正东方星座"析木(卯)"是砍析树木之星。事实上,"东"字古音通"疼(痛)"、"刭(刑)",本义为"刭割疼伤之木"即今之所谓"瘿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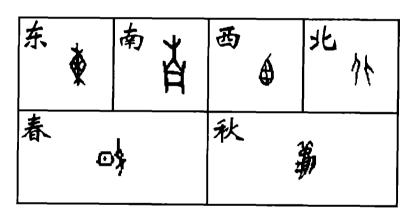


图 7-11 殷墟甲骨文:东、南、西、北、春、秋

★ 南: 近代学者多以"南"字像"钟镈乐器"之形,假借为南方之南,不确。因为根据"干支密码","南"字古音"寧 ning",为"寧"之本字,本义为安寧、安祥,喻义著名的正南方星座"敦祥(午)"。事实上,殷墟甲骨文的"南"字并非"六书"中的象形字,而是一个和"寧"字类似的会意字,字形为从"凡(盘)"从"大(人形)",喻义某"大人"依凭盘案而席地寧坐、晏享太平(图 7-11),其与"鵉(寧)"字的会意结构("心"依凭"皿"而安居"宀"之下)完全类似。

★ 西:《说文》以为"西"字象"乌在巢上"之形,不确。因为根据"干支密码","西"为"犧"之本字,本义为犧尊、器皿,喻义着著名的正西方星座"作器(酉)"。殷墟甲骨文"西"字本就是作瓠器之形(图 7-11)。此外,甲骨文"鹵"

字偏旁从"西",像器皿盛盐粒之形,也从侧面证明了"西"的本义是可盛盐粒的容器而不是漏洞百出的鸟巢。

★ 北:《说文》以为"北"字为"背"之本字。而根据"干支密码","北"为"妃(配)"、"胚"之假借,训妃匹婚配、娶妻怀胎,正是喻义着著名的正北方星座"娶=营室(子)"。

因此,中国汉字的北、南、东、西四字,其实都是按照营室(子)、敦祥(午)、 析木(卯)、作器(酉)这四大星座之占星学含义所造的派生文字。

(2) 释"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四字,今释多以四季物候特征零碎比附,歧说纷出,从无定论。而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可知,这四个貌似必然与物候相关的"字根级"汉字其实却另有所本,它们的造字创意本来也都是源自中国天文学的,具体地说就是源自所谓"四仲星"的,即"星鸟(未)以殷仲春"、"星火(辰)以正仲夏"、"星虚(丑)以殷仲秋"、"星昴(戌)以正仲冬"。其具体的造字过程如下:

- ★ 春: "春(chun)"通"鹑(chun)",按照"干支密码"可知,其字义来源明显 是仲春之星"星鸟=鹑火(未)",代表了西元前 3 千纪春夜黄昏的实际天象。 殷墟甲骨文已有"旾(春)"字。
- ★ 夏:"夏"通"厦",训大厦堂房,按照"干支密码"可知,其字义来源明显 是仲夏之星"星火=房(辰)",代表了西元前3千纪夏夜黄昏的实际天象。
- ★ 秋:"秋"通"啾"、"愁",训啾鸣、号叫、悲愁、怒号,按照"干支密码"可知,其字义来源明显是仲秋之星"星虚=玄号(丑)",代表了西元前3千纪秋夜黄昏的实际天象。殷墟甲骨文"龝"字本作昆虫振翅而鸣之形(图7-11),代表了"秋(啾)"字的原型。
- ★ 冬: "冬"之本字为"中",《禮·鄉飲酒義》有云"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可见"中(鍾)"之本义训中藏富足、鍾聚茂足,而按照"干支密码"可知,其字义来源明显是仲冬之星"星昴=奄茂(戌)",代表了西元前3千纪冬夜黄昏的实际天象。

不过,与东、南、西、北四字皆见于殷墟甲骨文不同,由于春、夏、秋、冬四字中仅有春、秋两字见于殷墟甲骨文,夏、冬两字如见明显是后出字兼假借字,所以中国古文字学界至今仍有"殷人只有春、秋两季而无冬、夏两季"的假说。毫无疑问,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假说是明显有违常识的,殷人的智商即使再低下,他们的体温感觉系统也不至于分不清四季分明的东亚季风气候。

那么,在周代人用春、夏、秋、冬表示四季之前,中国汉字体系中是否还有更古老的四季表达方式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古文献给我们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例如,《尔雅·释天》和殷墟卜辞就曾给我们描述过另一个古老版本的四季表达方式."寿为荃天,夏为昊(下)天,秋为晏天,冬为上天":

★ 苍天: "苍"音通"臧",即指《楚帛书》中的地支第八位星神"臧(壮)", "壮天"与"春天"一样明显都是代表了仲春之星"壮=鹑火(未)"。

★ 昊(下)天:"昊(皞)"即指地支第五位星神"皋",甲骨文则作"下(夏)", "下"通"斜(野)"、"墅(厦)",训野外房厦(别墅),"昊天"(下天)与"夏天"一样明显都是代表了仲夏之星"皋=房(辰)"。

★ 旻天: "旻"通"奋(坟)",即指地支第二位星神"赤奋若","旻天"与"秋 天"一样明显都是代表了仲秋之星"虚=赤奋若(丑)"。

★ 上天: "上"音通"商"、"藏", 训商贸、冬藏, 即指地支第十一位星神"奄贸", "上天"与"冬天"一样明显都是代表了仲冬之星"贾=昴(戌)"。

由此可见,殷墟卜辞的"上(藏)"、"下(野)"就是我们要找的冬、夏二字之初文,其造字本义为天文学概念"上半年(冬藏季)"、"下半年(夏野季)"之义,也是黄、炎二帝的代名词,原不作高上、低下解。

(3) 释"四方"和"四风"

既然,我们已经明白了"东南西北"和"春夏秋冬"这些基础汉字的本义,那么我们对既见载于《山海经·大荒海内经》和《尚书·尧典》,又见载于出土甲骨文的所谓"四方"和"四风"神话体系就会有一个彻底的了解了。

《山海经•大荒海内经》有云:

"東方曰折,來風曰俊……"

"南方曰因,來風曰辰(原讹作"民")……"

"{西方曰}夷,來風曰弟(原讹作"韋")……"

"北方曰鵺,來風曰倓……"

殷墟甲骨文《合集·14294》有云(已据《合集·14295》"西方曰彝,风曰弟" 订正):

东方曰析,风曰劦。

南方曰因,风曰散。

西方曰彝,风曰弟(原讹作"西方曰弟,风曰彝")。

{北方曰}夗,风曰殷。

显然,按照"干支密码"我们不难得知,此所谓"析、因、夷、鵷"之"四方"神 名其实就是东、南、西、北四字的同义词:

- ★ 析:"析"指正东方星座"析木(卯)",神话中为主管正东方之星神;
- ★ 因:"因"训因依、凴托,指正南方星座"馮翼(午)",神话中为主管正南方之星神:
- ★ 夷:"夷"卜辞作"彝",训彝器、器皿,指正西方星座"作器(酉)",神话中 为主管正西方之星神;
- ★ 鵷:"鵷"字按《尚书·尧典》作"隩",本义为堂奥、居室,指正北方星座 "营室(子)",神话中为主管正北方之星神。

而同样的,此所谓"俊、辰、弟、倓"之"四风"神名其实也是春、夏、秋、冬四字的同义词:

- ★ 俊:"俊"通"鵔"训鹑鸟,卜辞则作"劦(协)"训滋味协治,都是指仲春之星"协治=鹑火(未)",神话中为主管春天和春季季风之星神;
- ★ 辰:"辰"字今本《山海经》误作"民",卜辞则作"散"通"炜"、"燬"训火,都是指仲夏之星"大火(辰)",神话中为主管夏天和夏季季风之星神:
- ★ 弟:"弟"字今本《山海经》作"韋",据卜辞《合集·14295》可知为古"弟"字之形讹,"弟(涕)"通"嗁(啼)"训啼号,都是指仲秋之星"赤奋若=玄号(丑)",神话中为主管秋天和秋季季风之星神(旧释卜辞西方风名作"丯",不确,"丯"为"弟"之异体);
- ★ 倓:"炎(倓)"音通"奄",卜辞则作"殷",都训殷实富有,都是指仲冬之星"奄贸=昴(戌)",神话中为主管冬天和冬季季风之星神。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知道,甲骨文的主人殷商王朝不仅清楚地知道 "东南西北"这"四方"的概念,更清楚地知道"春夏秋冬"这"四季"的概念。只 不过,由于"干支密码"的失传有年,他们对这些时空概念的文字表达早已不能 被后人直接阅读了。

七、汉字干支密码的终结者: 八卦和五行

虽然,在理论上,"仓颉造字"这一场重大的"文字革命"是导致汉字的原始 创意注定被日渐遗忘的终极原因,但就实际情况而言,由于"干支密码"在有商 一代毕竟在专业天文和神职人员中继续得以流传有序,所以汉字原始创意的 真正失传是晚到周代(西元前 11—前 3 世纪)才发生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 因最终导致了周代以降的中国人即使在《尔雅·释天》这样的"古今汉字对照 字典"帮助下也不再能读懂其中的真实含义了呢?显然,按照前文的系列分 析,我们知道,这一定是与中国的神话信仰暨哲学体系在周代发生了重大的改 变、古老的"干支神话"已经被新兴的"八卦"术数和"五行"哲学所彻底取代有 关:因为作为汉字体系的"总字根","二十二干支"原本就是以二十二尊神祇 的神权权威形式而存在的,神权既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 "八卦"考

周代以降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读不懂"干支密码"?毫无疑问,这头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惑于《周易·系辞》中那段歪曲史实而杜撰的"汉字起源于八卦说":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而《说文解字》则据此进一步演绎为八卦、结绳、书契的"汉字简史"三部曲: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易八卦……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黄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

显然,正是在此"八卦"为万物之本的神秘主义术数理论影响下,"二十二 干支"作为汉字"总字根"的地位终于被彻底否定,代之而起的则是所谓"伏羲八卦"衍生汉字的造字理论。从此,《尔雅·释天》中的"干支密码"就只能彻底被后人抛弃遗忘了。然而,在诸多考古证据给我们还原出的真正汉字历史面前,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样的神秘主义"造字理论"完全是出于《周易》这种姬周王朝官方哲学的人为杜撰。事实上,汉字与"八卦"的真正关系并不是"汉字仿造自八卦",而是"八卦仿造自干支汉字",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历史演化过程是先有二十二干支,次有六十四筮卦,最后才有所谓的"八卦"。(伏羲氏真正创造的并非"八卦"而是"十干"已见前文之考证。)

筮卦术数究竟是如何诞生的?综合考古证据和史料证据,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其诞生的基本过程。

首先,根据考古发现的最早筮卦实例即所谓的甲骨文和金文之"数字卦" 皆属殷末周初之事实,以及《世本》所谓"巫咸作筮"、《史记》所谓"(周文王)为 六十四卦"之记载,我们初步可以推断出,用一把筮草棍随机产生的奇数、偶数当作占卜工具的筮卦术数其诞生年代不会早于商代,而《周易》、《归藏》等体系宏伟的筮书其诞生年代则不会早于殷末周初。因此,相比早在4800年以前就已经诞生了的"十二支汉字"以及4300年前就已经诞生了的"十干汉字",筮卦术数及其伴生产物"六十四卦"和"八卦"绝对是后来者。假如这两者之间确实有渊源关系的话,那一定是"筮卦"渊源自"干支"而不是相反。

其次,根据"干支密码"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筮卦"与"干支"之间也确实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的:一方面,"干支取名制度"作为一种基于随机性占卜技术的人名获取方法,其自西元前3千纪诞生伊始就是与"鸟占"、"抓阄"、"龟卜"等等密不可分的,筮草奇偶之占无疑是这些古老占卜技术的后来升级版本;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干支密码"还能告诉我们,无论是出土还是传世所见的各版本算卦筮书,其中所列的"六十四卦"卦名及卦辞其实也无不是全数抄袭自"二十二干支"神话的,例如:

★ "十二地支星神"之第十二位为"涂=婁(亥)",其神话主题为"履(屢)践道路",而《周易》也有一个"履卦(九九六九九九)",其算卦主题也是"履道坦坦";

★ "十天干日神"之第五位为"重=著離(戊)",其神话主题为"附丽(離) 成双",而《周易》也有一个"離卦(九六九九六九)",其算卦主题也是"黄離(黄骊)";

★ "十二地支星神"之第八位为"壮=鹑火(未)",其神话主题为"肥壮美味",而《周易》也有一个"大壮卦(九九九九六六)",其算卦主题也是"羝羊不羸";

★ "十二地支星神"之第九位为"玄=东井(申)",其神话主题为"汲水", 而《周易》也有一个"井卦(六九九六九六)",其算卦主题也是"可用汲"……

总之,《周易》、《归藏》等殷末周初之筮书无论就其"二进制"的随机数字结构来看,还是从其具体的占卜内容来看,其在本质上都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新发明,那些看似令人神秘莫测的"六十四卦",其实都不过是将更古老的"二十二干支"随机占卜体系挪用拆分后的结果(因为要直接制作类似"二十二面体骰子"的随机占卜工具从来都是不现实的,所以二十二种干支占卜结果其实际对应的"抛硬币式"或"数草棍式"奇偶随机结果必然是2的指数倍,比如2×2×2×2×2=32或2×2×2×2×2=64等)。

最后,根据出土和传世文献中的筮占实例,我们还可以知道,尽管在表面

上"八卦"比"六十四卦"更简单原始,"八卦"理应比"六十四卦"更早诞生,但实际上"八卦"是比"六十四卦"更晚产生的,而且其身份一直都是"六十四卦"占卜体系的内部附属物而从未成为独立的占卜体系,传说中的所谓"伏羲画八卦"根本就不可能真实存在过(例如,在《左传》这本充满了卜卦预言的巨著中,我们就只能找到用"六十四卦"占卜的实例而从未发现有用"八卦"占卜的实例)。

那么,"八卦"为什么不可能作为独立的占卜体系被实际使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乾、坤、坎、離、震、艮、巽、兑"这八个卦名的真实来源和含义就会一目了然了:

- ★ 乾: 马王堆帛书《周易》"乾"作"键(健)",训关键、门关,又训健康、卫生防病,其抄袭来源明显就是地支第六位"阻=寿星=南门(已)",故《周易•乾》有"君子终日乾乾(健健)、夕惕若,厉,无咎"之语,其本义为君子日夜警惕门键安全和防病保健,可确保身家性命无咎无灾(可见儒家将"君子终日乾乾"解释为君子们道德高尚、自强不息明显是加入了附会说教因素,《周易》和"老黄历"一样都是只讲吉凶宜忌不讲善恶的);
- ★ 坤: 马王堆帛书《周易》"坤"作"川","坤"即"申","川"训川流河水,其 抄袭来源明显就是地支第九位"玄=輿鬼=河攤(申)",而"坤(川)"通"衮"、 "鬼(怀)"通"裹",其引申义皆为包怀身体之衮衣鞋帽,故《周易•坤》有"履霜 (足包以御寒鞋)"、"含章(上身包以文彩章服)"、"括囊(财物包以囊袋)"、"黄 裳(下身包以裙裳)"、"玄黄(袪鑛冬装大礼服)"等语,其本义为像水一样地怀 抱、悬系之卦、穿衣包装之卦;
- ★ 坎: 马王堆帛书《周易》"坎"作"習坎","習"通"摺(折)","坎"通"砍"训 砍伐折断,其抄袭来源明显就是地支第四位"折=析木(卯)",故《周易·坎》有"習坎,入于坎窞,凶"等语,其本义为关于折断、曲折、陷害、凶险之卦;
- ★離:"離"通"丽"训附丽、俪偶,其抄袭来源明显就是天干第五位"著離(戊)",故《周易・離》有"畜牝牛吉"、"黄离元吉"、"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王用出征"等语,其本义为畜养牛马以牝牡成双成俪为大吉,人生大事以附丽配偶、附丽君王为大吉,以突如其来的分离为大凶,其伤害堪比烈火焚身、死亡、被遗弃杀害(《诗经·鲁颂》有云"有骊有黄","黄离"即"黄骊",指成对的良马);
 - ★ 巽:"巽"通"逊",其抄袭来源明显就是天干第九位"终=逊艾(壬)",故

《周易·巽》有"频巽,吝"、"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等语,其本义大意为濒临逊退终老,虽然有所吝惜,但即使没有及早行动有个好的开端(先庚三日为戊日,离开一旬之首甲日已经晚了半旬,绝对不算一个好的开端),只要能坚持到最后有个好的终局(后庚三日为"壬"日即每旬第九日"终"日,相当于今之周末),也算大吉大利:

★ 震:"震"即"辰",其抄袭来源明显就是地支第五位"大火(辰)",故《周易·震》有"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之语,其本义为雷火声震可以带来雨水和丰收,故遇此征兆者必然亨通,理应开怀大笑,而不必因震惊百里而"丧匕鬯";

★ 艮:"艮"通"报",训以徽绳报牵、限制看守,其抄袭来源明显就是地支第七位"天徽(午)",故《周易·艮》有"艮其背"、"艮其趾"、"艮其腓"、"艮其 限"、"艮其身"、"艮其辅"诸语,其本义为用绳索仅仅报牵捆绑奴隶或牲口的身体某一部分皆有"不获其身"而走失的风险,唯有"敦艮(绳捆敦厚结实),吉"才是上上大吉之看守策略;

★ 兑:"兑"通"隧"、"税",训隧穴、库窒、税收倉藏,马王堆帛书《周易》作 "夺",亦训税收夺取,其抄袭来源明显是天干第七位"窒=倉黄(庚)",故《周 易・兑》有"商兑未寧,介(勿)疾有喜"之语,其本义为依赖商业充税虽然劳碌 不宁,但只要不去抱怨就必会得到收获和喜悦。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周易》所标榜的万物之源"八卦",就其卦名的本义来说本是"二十二干支"的一部分,是分别代表了"保健(已)、川包(申)、折断(卯)、附丽(戊)、逊终(壬)、震雷(辰)、报绑(午)、税收(庚)"这八种古老神祇的代号,至于后世把"八卦"说成是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这八大元素则是与原义已有了相当差距的晚出衍生说法。而由此也可见,对于这一组既杂有"天干"又杂有"地支"、而且还有重大缺失(二十二干支缺了十四种)的杂乱拼凑之"八卦"代号来说,其本身绝非是独立自洽的占卜体系而是必须依附于整个"六十四卦"系统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六十四卦占卜"而从来没有"八卦占卜"这一事实也是早就被诸多出土实物和传世史料所证实了的。总之,先有"二十二干支",次有"六十四卦",最后才有"八卦"①,这就是被《周易》"伏羲始作八卦"假说所掩盖的历史真相。

① 注:关于"六十四卦"与"二十二干支"的具体拆分对应关系,限于篇幅,作者将另文专述。

(2) "五行"考

除了《周易》这一由周王室"创造"并推广的颠覆性新信仰,另一个导致"干支神话"和"干支密码"最终被彻底废弃的重要原因则是所谓的"五行"哲学。因为,正如《周易》利用"八卦"篡夺了"二十二干支"的至尊地位一样,"五行"哲学也利用"金木水火土"篡改了"十干日神"的历史原貌,致使"干支密码"彻底寿终正寝。

虽然,与"伏羲作八卦"纯属附会杜撰不同,作为"十干"的伴生产物,"五行"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确有其悠久的历史(近代某些学者将《今文尚书》中的"天乃赐禹洪范九畴、五行"之古老传说视为后出伪作是缺乏证据的),但是,此"五行"非彼"五行",被今人所广为熟知的"甲乙二木、丙丁二火、戊己二土、庚辛二金、壬癸二水"这一固定的配对关系绝非"五行"概念的本来面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山海经·大荒海内经》中的"十干日神"其五对"双神"所主司的自然元素原本应该是"甲乙二木、丙丁二水、戊己二土、庚辛二火、壬癸三风"。显然,两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最早见载于《礼记·月令》、《管子·五行》等文献的今版"五行"其与周代以前的"五行"之关系同样是颠覆性为主而非继承性为主,正如表7~2所示,其改动的总比例高达60%—70%。

《山海经·大荒 海内经》版本之 "五行"	羲、乾荒	相繇、禺强	重、黎	祝融、燭龙	夸父、蚩尤
	【木】	【水】	【山、土】	【火】	【风】
《礼记·月令》 版本之"五行"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木】	【火】	【土】	【金】	【水】
相同或相异	[_√]	[×]		[×]	[×]

表 7-2 "十干"与"五行"配对的古今差异

因此,在如此高的篡改比例之下,自周代以降的中国人假如还想通过"五行"与"十干"的对应关系去读懂"十干汉字"的若干原始本义也必将十分困难。他们显然既无法从"庚辛属金"中读出"辛=寨=昭阳"的本义为"薪柴火把照明",也无法从"壬癸属水"中读出"壬=终=逊艾"的本义是"如风般巽退归终"。而在周代开始盛行的"八卦"术数和"五行"理论这两大终结者的夹击之下,"汉字干支密码"从此在中国人的大脑中被彻底抹去,汉字"总字根"的原始

创意从此就成为了千古之谜。

八、思维型文字与语言型文字

按照西方语言学的观点,人类已经发明的文字体系无非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代世界最流行的、因而也常被他们视作是人类文字之完美正格的所谓"表音文字"(phonogram),例如拉丁字母文字、阿拉伯字母文字、日本假名等等;另一类则是古代世界最常见的、因而也常被他们视作是原始文字之孑遗另类的所谓"表语文字"(Logogram),例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等等。而汉字作为一种亲缘关系距离他们最远的古老文字体系,自然也就被他们随手划入了后者的范围。

然而,对于西方学界这种出于"语言学"而非"文字学"^①的非专业分类定义,拥有着全世界最悠久发达之"文字学"传统的中国学术界理应有资格提出质疑:人类的文字体系真的仅仅是语言体系的附属品吗?"文字学"真的仅仅是"语言学"的附属分支吗?汉字的起源和特点真的可以用西方的"语言学"方法而不是专门的"文字学"方法去分类定义并给以有效的研究吗?显然,通过前文的一系列举证和分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近代以来基于西方"语言学"概念而对汉字体系所作的种种旧论假说基本上都是难以成立的,不论是"汉字西来说(来自楔形文字)"、"汉字象形说"还是"汉字属于表语文字说",都是如此。

西方学者借用纯粹的"语言学"概念去研究"文字学"的问题,这本身不仅是一种外行的表现,更首先是一种视野狭隘的表现。因为,根据心理学、生物医学、人类学等诸多其他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的"语言"并不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信息系统,它是和人类的"思维"紧密相连而须臾不可分割的。因此,文字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信息载体,其天然的服务对象就有两个:思维和语言。而依据主要服务对象之层次的不同,人类的文字体系也天然可以分为两大类:思维型文字与语言型文字。所以,西方语言学所谓的"表音文字(phonogram)"和"表语文字(Logogram)"在真正独立的文字学专业看来明显都是属于同一类

① 西方学术界历来认为,"文字学"仅仅是"语言学"的分支之一。例如,瑞士的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就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为了表现前者"。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7页。

文字,即"语言型文字",因为这两种文字按定义都是用来表达词语的,只不过前者主要表达的是词音而后者主要表达的是音形义一体的词素而已;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汉字却并不在其列,因为,汉字不仅是单个模拟音形义语言结构的符号,更首先是通过单字的内部结构和多字的外部组合体现思维结构的符号:事实上,汉字是人类现存唯一的"思维型文字"。

汉字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导致了现代医学必须区分"汉字型母语患者"和"拼音形母语患者"互为另类人群的文字?因为中国汉字本就是一种与其他任何文字都迥然有异的"思维型文字",其在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发育过程中不仅产生了软件性的影响,而且最终还产生了硬件性的影响:它直接导致了以汉字(包括中国汉字和日本汉字等)进行思维的人群成了所谓"右脑型"的语言者,与其他"左脑型"的语言者在脑科学的特征上和脑损伤所致语言障碍症的治疗方式上都迥然不同。①

汉字为什么可以被中、日、朝、越等诸多语言语法迥异的国族共同接受使用并字义不变,从而可以展开让西方人视为奇迹的、仅仅依靠思维认同而非语言认同的"国际笔谈(communication by writing)"?因为中国汉字本就是一种"思维型文字",其文字首先代表的是思维概念而非语言词汇。

汉字为什么可以在总字数大于字母文字千百倍的困难前提下仍然可以很快速地被中国的中、小学生所学会牢记并掌握?因为中国汉字本就是一种"思维型文字",其貌似繁多的文字量其实都是符合思维规律的同一概念链条之产物,是可以让人独立思维"举一反三"、不教自会、不学自通的,并不像西方文字体系那样严重依赖零碎难记的词库基础和复杂繁多的语法知识,离开口耳相授根本就无法自学贯通。(所以西方最早期的汉学家往往能在一句中文也不会说的情况下自学读懂汉字古文献。)

汉字汉语为什么可以让任何人自由地排列组合创造新词而又不必受太多语法的约束?因为中国汉字本就是一种"思维型文字",而类似"自己对自己说"的思维过程是只依赖于概念的正确性而不依赖于载体工具的正确性的,所

① 中国人和日本人等汉字型母语的使用者其右脑对语言功能的影响与左脑同样重要,他们与拼音型母语的使用者无论在科学理论上还是在临床实践上都分属完全不同的医学类型,这是现代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共识。可参见李传玲、王荫华:《右半球梗塞与汉语语言障碍的神经心理学研究》、《徐州医学院学报》1999 年第 19 期,第 4 页; HATA T., "Recongnition of Japanese Kanji in the left and right visual fields", Neurophycholgia, 1977 年第 15 期等。

以汉字文句的可理解性仅仅取决于其内在思维概念的通顺性而不是表面语法 结构的"合法有效性"。

汉字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可以反作用影响其口语的文字,而不是仅仅被其口语所影响的"口语附属品"? 因为中国汉字本就是一种"思维型文字",所以正如大脑指挥嘴巴、思维决定语言一样,汉字的书面语体系也同样是汉语口语的统治者而非其奴隶。事实上,汉字是可以脱离汉语而与汉字识字者的思维直接沟通的信息系统,所以她根本不会像古埃及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罗马的拉丁文或古印度的梵文那样,由于"文字奴隶"的"语言主人"之死亡而跟着一起死亡:事实是,按照西方语言学的标准定义,尽管中国的当代汉语与早已灭绝的九黎语(约前 29—前6世纪)、上古汉语(约前 26—前4世纪)、中古汉语(约5—12世纪)等早就不属于同一种可直接无障碍对话的语言,但汉字却依然可以应变自如,继续扮演着其历代文言官话和各路方言乡谈之总灵魂的角色。

那么,中国汉字这种"思维型文字"的鹤立鸡群之特质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呢?毫无疑问,通过大汶口文化陶尊文字和陶寺朱书陶文等出土证据所展示 的汉字起源之原貌,我们知道,这正是天文学"干支术语"这一汉字体系"总字 根"所带来的结果。因为,按照十二星座之空间次序以及十天干之时间次序创 造的"二十二干支"之每组汉字,其本身就像"阿拉伯数字"那样是超越了语言 的模块化纯粹思维概念:例如,代表了十二赤道星座之第五位的"昊"字在陶 寺朱书这一早期汉字体系中就仅仅是与思维模块"大火=执斜=房=辰"—— 对应而与语言单词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的,你可以把该字假借读为皋(昊) goo、昃(矢)ze、虞(吴)yu等皆可;又例如,代表了十进制纪日周期之第三位的 "爻"字在陶寺朱书中也同样仅仅是与思维模块"繇兆=丙"——对应却与语言 单词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的,你可以把该字假借读为繇(爻)yao、文(纹)wen、 兆(肇)zhao 等皆可。而凭借着"二十二干支神祇"在中国文化信仰中的至尊 地位,早期中国汉字的其他部分也无不是围绕着这颗"结晶核"不断模块化结 晶成长的:后人或直接拿"干支"诸字当部首造合文新字、或间接按"干支神 话"造新字。而即使到了周代以降,"干支密码"虽然被日渐废弃埋没,但由于 汉字体系的模块化概念链条已经牢固形成,"干支汉字"作为汉字体系"总字 根"的核心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不可动摇。

总之,遍观人类历史,中国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久、内部凝聚

力最强、自我繁殖力最旺盛的文明,其与中国汉字这种人类唯一的"思维型文字"之历史贡献是分不开的:当别的民族还是一些依靠着"共同口语"松散维系的人群之时,中华民族早已经是一个依靠着"共同思维"紧密凝聚在一起的族群;当别的文明由于其文化灵魂"民族语言"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改变颜色之时,中国文明的文化灵魂"汉字"却依然保留了其基础本色。无论如何,这是全人类最最值得骄傲的伟大发明之一(表7-3)。

表 7~3 世界三大文字起源地区的文字史大事年表

时间	中 国	美索不达米亚及周边	埃及
约 前 31— 前 29 世纪	大汶口一良渚"陶玉 文"出现,"十二支" 出现	(不成句无语法的、 非楔形的、释读有争 议的)"原始楔形文 字"出现	(不成句无语法的、释读 有争议的)早期埃及"象 形文字"出现
约 前 26 世纪	朱书"毛笔革命",汉 语城邦"十二支"地 名出现	成句有语法的真"楔 形文字"(属苏美尔语)出现	成句的埃及"象形文字" 出现
约 前 24 世纪	汉字"黎夏合璧革命","十干"汉字出现	"阿卡德楔形文字" (属闪米特语)成型 出现	"金字塔铭文"(Pyramid Text)出现
约前 19— 前 18 世纪	"沮诵、仓颉造字",显 性干支二十二字出现	古巴比伦文献"汉谟 拉比法典"	"原始西奈字母"出现
约前 14— 前 11 世纪	殷墟甲骨文、金文、 筮卜六十四卦相继 出现	乌加里特(Ugaritic) 字母和腓尼基字母 相继出现	埃及文献"银版条约" (埃及—赫梯和平条约)
前 4—前 2 世纪	竹简普及、纸张出现,隶书"今文"代替篆书"古文","干支密码"失传	帕拉维(Pahlavi)文 (采用阿拉米字母书 写的波斯文)出现, 楔形文字日渐失传	埃及开始使用希腊字母 (科普特文和希腊文), 古埃及文字日斯失传
7-8 世纪	(雕版)印刷术出现, 汉字开始成为东亚 文化圈的通用文字	美索不达米亚开始 使用阿拉伯文	埃及开始使用阿拉伯文

如果说,整部西方文明史是用二十六个"拼音字母"写成的,那么,中国文明的整部历史就是用二十二个"干支密码"写成的。因为,本书将证明,除了殷墟甲骨文的主题是用王亥、大乙、武丁、妣辛等无数殷商先祖先妣的干支名字组成的,中国古史中的其他关键词汇原来也都是用干支术语组成的。

本书以战国《楚帛书》和《尔雅·释天》记载的"隐性干支"术语为基本依据,初步考释出了一批以"隐性干支"命名的中国商代暨先商时代之神名、人名、地名和国族名,并指出所有这些干支术语和汉字创意的总源头,都来自四千八百多年前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中国天文学知识和占星历法制度。

本书利用"干支密码"对古文献的辨伪能力以及对甲骨文、陶文等出土文字的释读能力,初步考证复原出中国广义先商时代的五个信史王朝之列王世系,以及十五座龙山城址或前龙山城址的原名和完整地方史,同时,还原了炎帝(夏至星神)、黄帝(冬至星神)等星座神祇乃"神话人物"而非"信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定价: 49.80元 http://www.sassp.org.cn